從淪陷到解放

1931年至1948年的长春

霍燎原　崔国玺



长春文史资料 47辑

值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献给在沦陷中蒙受苦难、为解放英勇斗争的长春人民。

前　言

硝烟散尽，五十年弹指一挥。抗日战争，这场我国人民觉醒、奋起，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全民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在这欢呼和平，欢庆胜利的时刻，在全人类即将迈进二十一世纪门槛的时刻，我们耳厢似乎又传来了几千万涂炭于战争中的亡灵，那悲惨的呻吟和沉重的喘息。

受害者，艰难地走出战争的阴影，以大邦之国的潇洒与宽容，率先道出了“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的千古绝响；可杀人者，那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邻邦，时至今日，对待“侵略”二字却还在遮遮掩掩。1995 年 8 月 9 日，刚上任的日本文相岛村宜申，竟大放厥词，说什么“侵略或非侵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战争不就是彼此进行侵略吗？优胜劣败，打胜了的一方成为侵略对方，不是吗？”何等荒谬，令人发指，竟出自于现任日本内阁大臣之口。

现实容不得诗人的胸襟，树欲静而风不止，仅仅相逢一笑，何能泯却恩仇?! 这应当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欢呼声中的一记警钟。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即为了那已被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吧，我们献给长春人民《从沦陷到解放——1931 年至 1948 年的长春》，这部用血与火，仇与恨凝成的长春地区断代史。

在过去了的，那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中，长春，这颗中国北方的明珠，遭受了倍加沉重的灾难。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就沦入了日寇之手，直至八·一五光复，整整十四年。满洲国、新京、高粱花、五色旗、亡国奴、良民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断代史，这是烙在中国史册的一段屈辱史、灾难史，同时也是一段不愿做奴隶人民的抗争史的胜利史。

历史证明，长春人民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人民，长春是具有反抗外来侵略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历史上最黑暗、严寒的日子里，长春人民十四年如一日，英勇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历史告诉人们，全民族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和自由而英勇斗争，任何残暴的侵略者都注定要走向灭亡。在中国人民百多年来反击外敌入侵的历史上，抗日战争作为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而光荣地载入史册。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追忆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长春人民一定会继续发扬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为把长春建成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感谢作者的辛勤劳动。

编者

1995年8月15日

长春文史资料

编辑/《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长春市锦水路28号
邮编/130061　电话/8946068
印刷/新华广告公司印刷部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02—051号

1995/2

目　录

一、长春沦陷与伪满定都

1、“九一八”事变前的长春

长春的历史沿革与市区概况 长春，位于我国东北地区松辽平原的中部、伊通河畔，地势是稍有起伏的准平原。长春地方，清初属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领地。嘉庆五年(1800 年)，设长春厅，隶属于吉林将军，建衙署于伊通边门附近的新立城。道光五年(1825 年)，移署至宽城子(今长春市南关区一带)。光绪十五年(1889 年)，长春厅升格为长春府，领农安县，仍隶属于吉林将军。民国二年(1913 年)，废府，改为长春县，隶属于吉林省吉长道。民国十四年(1925 年)，分设长春市政公所。民国十八年(1929 年)，改称长春市政筹备处，废道制，仍保留长春县，隶属于吉林省。

“九一八”事变前夕，长春是一个人口 12 万余，面积约 21 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市区由三部分组成：旧城、商埠地和“铁路附属地”。

旧城即长春城，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 年)，占地约 8 平方公里，周围有 4 米高 10 公里长的城墙，先后建有东、西、南、北、西南、西北等 6 座城门，还有后建的 4 座便门和两座内门。主要街路有南北走向的一条，即南大街与北大街；东西走向的四条，即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与四道街。商业区主要集中于南大街、北大街与三道街；道、府、县衙署大都设在四道街。

商埠地位于旧城北面，包括今天的长春大街以北，七马路以南，东大桥以西，大经路以东的地区，面积约 4 平方公里。1907 年初，成立了开埠公司，1909 年，正式开辟为商埠区。主要街路有 8 条，南北走向的两条，即大马路与大经路；东西走向的 6 条，即二、三、四、五、六、七马路。商埠地设有市政公所、道尹、市政筹备处等衙署。1907 年，日本领事馆也由旧城迁至此区。

"铁路附属地"分俄、日两块。沙俄在入侵东北后，即根据强迫清政府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东北修筑了丁字型的中东铁路，本线由满洲里至绥芬河，支线由哈尔滨至旅顺、大连。同时于 1899 年在长春二道沟修建了宽城子车站，随后，在车站附近占地 4 平方公里，设立了俄国在长春的"铁路附属地"。俄国"铁路附属地"建有三条大街，即为一匡街、二酉街、三铺街。此外还建有其他一些机构。

日本经过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后，攫取了俄国在南满的一切特权。1906 年，在东北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随后于 1907 年在长春头道沟修建长春车站，并以铁路用地为借口，擅自私购土地，在靠近商埠地北面的头道沟及偏东地段设立了"满铁附属地"，占地约 5 平方公里。"满铁附属地"建有棋盘型的街路：以长春车站为基点向南和偏南延伸的有 3 条，即为中央通（今斯大林大街站前至胜利公园段）、日本桥通（今胜利大街）和敷岛通（今汉口大街）；此外还有车站东的南北走向的东一条至东八条通和车站西的南北走向的西一条至西四条通；横向街路则有日出町、富士町、三笑町、吉野町、祝町、室町、小川通、朝日通等。在"满铁附属地"还设有日本人的医院、学校、住宅、旅馆、邮局、公园以及满铁的分支机构。此外，日本殖民者还在"满铁附属地"获得了驻军、设警与领事裁判等特权，驻有日本关东军部队和日本宪兵队，设有日本警察署及其派出所。

日本军警势力及罪恶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长春的军警机构与势力主要有：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司令部及

下属第四联队第一、第二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关东军宪兵队长春分队，关东军铁岭卫戍医院长春分院，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察署，“满铁附属地“警察署及派出所。

驻长春的日本军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支配下，横行霸道，到处欺凌中国人民，作恶多端。特别是1927年夏，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策划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东北为中心的“积极政策”，决定了“以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方针之后，日本军警在长春的罪恶活动加剧，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极力为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做准备。

1913年3月3日，日本洋行勾引日本警察，将中国人开的德发合商号店主和柜伙多人，强行带至日本警察署，严刑拷打，折磨致死1人。

同年9月15日，住长春的日本人欺侮、殴打一名中国卖梨老翁，中国巡警出面干涉。日本头道沟的军警百余名，拥至中国警察署，殴打中国警察，抓去中国巡警刘耀东等5人。

1929年8月16—18日，日军非法在长春城内进行演习，横冲直撞，扰乱市街。

同年9月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指挥日军在长春作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肆意践踏中国民众的农田。据中国地方当局调查，被日军踏毁的农田达1 500余亩。

同年11月1日，驻长春的日本领事馆警察，无理干涉长春市政，挑起与长春市民的冲突，开枪打死长春市民7人。

1930年6月2日，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士兵，无故开枪打死中国农民宁宝臣。

1931年6月9日，日军和日本领事馆警察联合进行军事演习，在旅团长与警察署长指挥下，越出“满铁附属地”，进行城市巷战演习，用以炫耀日军武力。

同年7月15日，驻长春的日军第三旅团司令部公开向中国地方当局宣布：自是日起废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

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

同年8月29日，驻长日军再次越界进行军事演习。

同年9月2日，日军驻长部队宣布：把长春城西的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作为日军演习地点，并于当日在上述地区进行攻击长春的演习。

2、万宝山事件

朝侨擅自毁田开渠 1931年3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怂恿亲日恶棍郝永德，在长春商埠地大马路，成立了"长农稻田公司"。4月，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身份租得三区万宝山附近萧雨春、张鸿实等12人生熟地500垧，租期10年。契约的最后一条写明："此契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1] 但郝永德自恃有日本人撑腰，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竟于同时将所租土地转租给李升薰等9名朝鲜人，所订的契约也未报县政府批准。因此两个契约都属无效。

万宝山地区不在日本"租界地"或"满铁附属地"内，是不准朝鲜人擅自垦居的。然而李升薰等180余名朝鲜人却从4月13日起，在马家哨口开始挖掘由马家哨口至姜家窝堡，长达20华里的水渠，并截流筑坝，准备引伊通河水入渠。水渠所经之处，为41户中国农民耕种多年的熟地，朝鲜人事先不与中国地东相商，就非法破土动工，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引起中国农民的强烈不满。由于挖掘、截流，直接毁坏中国农民的良田40余垧，如遇水灾，将会有近万垧良田遭受水害。而且，由于截流、筑坝，也必然阻断长春至农安的水上航行，直接威胁沿岸

---

① 《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与地东签订的租地种稻契约》，1931年4月16日。

以航运为业的农民生活。因此，当朝鲜人开始挖渠后，当地中国农民则多次加以阻止，但却屡阻不止。至5月下旬，沟渠已完成大半，中国农民无法，便求助于政府解决。5月27日，当地民众203人联名上书吉林省政府，“控告郝永德勾结日人引来韩人，毁田种稻”。省政府认为：朝侨未经允许，擅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随即于29日命令长春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前往劝止，并令朝侨出境。[①] 31日，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绮，奉命带领警察数人前往马家哨口，执行省府命令。当天即有一半朝鲜人撤走，其余一半人则由申永均等6人代表具结停工，其内容略谓：“今蒙贵局长忠告劝导，始知被郝永德欺蒙，大众情愿停工，于2日内全体回长，决无迟延。倘至期如不走者，代表等甘愿领咎，恐口无凭，立此甘结是实。”[②] 可是到了次日，朝鲜人竟变卦，50余人出见公安局长鲁绮，声称“至死不能停工出境”。鲁绮随将申永均等10人带至县政府详讯。同时也将“违法招雇韩人之郝永德解县暂押”[③]。此事至此也还不难解决，但在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却于6月1日起非法派日本便衣警察携枪到万宝山地区“保护韩人”，督催挖渠，阻止中国警察执行勤务，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在日警支使下，挖渠的朝鲜人于6月2日，在马家哨口打伤了中国农民马万山、韩殿成2人。6月5日，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又非法增派多名日警，到万宝山地区执行“特勤”。

对朝侨与日警的非法行径，长春市政筹备处曾向日本驻长春领事进行了严正交涉，但日领事总是强词夺理，一拖再拖，并恣意扩大事端。先是日领事同意长春市政筹备处关于双方派人共同实地调查的建议，并于6月8日共同签订了撤退双方警察，停止挖掘工作，保持工作现状，调查后公平解决等四项《临时协

---

① 《吉林省政undefined第一二七三号指令》，1931年5月29日。

② 《韩人代表申永均等6人具结》，1931年5月31日。

③ 《熙洽为报告处理韩人挖沟种稻案情形致张作相电稿》，1931年6月5日。

定办法》[①]，可是在调查之后，日领事却背弃信义，撕毁了这个临时协定，于11日竟以“韩人贫弱可悯，所挖水道工作，将次完成，拟令韩人于本日继续实施河流水堰工作，以免有误本年农作”[②]等为由，拒不撤退日警和停止朝侨挖渠工作。12日，日警又率领105名朝侨返回工地，并携带机枪保护朝侨继续挖渠。随后，又限令朝侨于7月5日前“一律竣工”。6月25日又开始筑坝。此后，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农民的一垧或数垧良田被淹。

日警欺压中国农民　面对日本警察支持朝侨的野蛮行径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无能，直接受害的长春县二、三区各村农民，忍无可忍，经过计议，于7月1日早7时，集聚400余人，手持锹镐到马家哨口，进行填沟毁坝。在场日警无理阻拦，农民代表则据理力争。当日计填沟约2华里。7月2日晨，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率领30名武装警察，携带手枪、步枪，赶至马家哨口，阻止当地中国农民填沟毁坝，并将上前论理的农民代表孙荣卿逮捕。愤怒的中国农民一拥齐上，将日警包围，救出代表孙荣卿。蛮横的日警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中国农民则跳入水沟内躲避，并用所带猎枪进行自卫还击。双方相持半个小时之久，均无受伤者。此后，中国农民经长春县公安二分局长田锡谷和三分局长曹隆标等人劝阻，陆续散去。

企图扩大事态的日方得寸进尺。当日，日本领事田代在长春召集日本军警头目议定了三条措施：(1)继续派兵镇压中国农民；(2)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抗议；(3)以实力支援韩民继续开渠。随即调动日本军警，开赴万宝山。到7月3日，在万宝山的日本军警已增至近80名，其中宪兵20名，警察近60名，配有机枪6挺，快炮两门，气势汹汹，始临大敌。日本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于7月2日下午6时向关东厅发放信鸽，请求“再以1 000余

---

① 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78—79页，中华书局，1988年8月。

名出动于上水路"。后因信鸽被我梨树县蓝家堡子农民截获,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侵驻万宝山地区的日本警宪更无视我国法律,肆意践踏我国主权,又犯了很多罪行,如,强占民房,威胁群众。当月初旬,他们闯入马家哨口前村于永和家,吓死正在分娩的儿媳母子。15日,日警又在马家哨口进行机枪演习,演毕威胁在场的中国农民,说:如果今后再有什么"格外举动",将用机枪把你们"均行打死"[1]。四出捕人,搜缴中国农民枪支弹药。先后曾捕去中国村民十五六人,施以吊打、灌辣椒水与煤油等酷刑,进行残酷迫害。12日,更有数名日警到长春头道沟庆丰达栈,探找孙荣卿。孙不在,日警便将孙的亲友暴打了一顿。埋设地雷,修筑工事,禁止中国农民在5华里内通行。公然将日本国旗于马家哨口河岸与黄家窝堡北山韩家坟等地悬挂。还派出华捕,四处侦察农民代表住处,诱以高额赏金,寻捕代表。

日方制造谣言,煽动排华 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却贼喊捉贼,捏造了在万宝山有数百名朝鲜人被中国人残杀的谣言。利用重金收买《朝鲜日报》记者和特派员金利三,连续向朝鲜各地发出急电,颠倒黑白,煽风点火,煽动仇华情绪。7月上旬,朝鲜仁川、汉城、元山、镇南浦、新义州等地有暴徒洗劫华侨住处,殴打、残杀华侨,闯入中国驻汉城大使馆内行凶杀人,抢掠财物与文件,使华侨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次排华逆流中,被残杀的华侨达1 500余人,受伤者数千人,财产损失达数亿元,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迫归国避难。在日本的华侨也不断遭到殴打与残杀。在中国的青岛以及中朝边境地区,也多次发生日本人殴辱、伤害中国民众的事件。

中日地方交涉,毫无结果 面对这样严重的形势,国民党南京政府只是对朝鲜排华事件进行了一些抗议与交涉,而对万宝山事件却不以为然。7月8日,南京国民党中政会责成地方当局

---

① 《万宝山事件调查,中日警察在该处拟留之经过》。

处理。万宝山事件则转入由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进行交涉，先后共谈判了12次。中方代表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与忍让，但日方代表仍然强词夺理，百般狡辩，对中方的合理要求一概加以拒绝。直至8月8日，日方才答应从万宝山地区撤走日本警察，但声称：在日警撤走后，"如不能保护鲜人维持工事，随时仍可派日警前往"。而对非法进入万宝山的朝鲜人，则一直坚持"不能退出"。而日本警宪侵犯中国主权和给中国农民造成的损失等问题，则毫无结果。

其实，日本侵略者根本无意谈判。他们恣意挑起万宝山事件是企图通过它来煽动日本人的仇华情绪，制造武力侵占东北的借口，掀起侵华战争的舆论黑潮。他们通过万宝山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中村事件"等，达到了煽起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目的，并利用这些事件为烟幕，加紧向中国东北调兵遣将，落实侵略计划，进行发动侵略战争的各种准备。紧接着，日本关东军便于9月18日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万宝山事件是日本侵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舆论准备，加速了事变爆发的进程。

3、日军侵占长春经过

"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按其侵占中国东北的既定方针，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天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事先制订的阴谋计划，派河本末守中尉率松田军曹等几名部下，炸断了在柳条湖村附近的满铁线路一小段路轨，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由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按照既定的军事部署，派兵攻打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随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又下达了对沈阳及长春、营口、凤凰城等地全面进攻的命令。在沈阳的中国驻军，因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损失很大，被

迫撤出防地，只有王铁汉团在撤退前进行了还击，伤敌数十名。至19日早5时，北大营被日本军队占领。进攻沈阳其他地方的日军，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至19日中午就占领了整个沈阳城。

日军在攻占沈阳当日，又相继攻占了长春、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城市。攻占长春时，日军损失较大。

长春失陷前的中日兵力及部署 侵占长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阴谋的组成部分。在“九一八”事变前，驻在长春的日军除在长春市街和近郊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外，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还于9月13——14日，率领数名参谋抵达长春与公主岭等地，“视察”与“检阅”所驻日军的军事活动，并训令日军要尽“保卫”日本“在满利益”的“天职”。“九一八”事变时，又把侵占长春作为日军侵占沈阳，占领南满的第一期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日军发起攻打沈阳城后不到两小时，便下达准备攻占长春的命令。随后不久，便开始偷袭驻长春的中国驻军，挑起了战火，不到一日，就将长春全部占领。

“九一八”事变前夕，驻守长春的东北军数量不少，实力也较强。在南岭，驻有步兵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一团、炮兵第十九团和一个辎重营；在二道沟驻有步兵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三团第二营；在旧城驻有步兵第二十三旅第六六六团一个营。总计兵力5 000余人，有各种炮50余门。其中驻南岭的部队又是东北军的精锐。而当时驻在长春的日本关东军人数约占中国驻军的1/4。计有步兵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四联队的两个大队和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的一个中队，总兵力约1 200余人。如果再加上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另外三个中队和骑兵第二联队，总兵力也不超过2 000人。从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只要我方组织好兵力坚决抵抗，完全有可能打退日军的进攻。

但是，由于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妥协退让方针的束缚，长春地方军政当局却十分麻痹与松懈。对日军在头道沟等地大肆堆积沙袋，架设铁丝网，修筑工事等等别有企图的异常表现熟视无

睹，对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与紧张形势麻木不仁，对日军将要发动的侵略战争活动没有任何戒备。

然而，日本关东军方面却丝毫没有放松其侵略步伐。当1931年9月19日0时15分，日军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少将得悉日军在沈阳挑起战火的情报后，即刻决定以第四联队的一部对长春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另派第四联队主力乘车南下，援助沈阳日军。据此，日军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长黑石武城少佐率第五、第七两个中队，于3时10分从头道沟西部日军营地出发，准备偷袭南岭的中国驻军；第四联队主力则积极准备乘车南下援助驻沈日军；驻公主岭的日军骑兵第二联队也整装待命。3时5分，接到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于"步兵第四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负责长春的警备，同时秘密准备攻击该地附近的中国军"[①] 的命令后，长谷部照俉终止了第四联队主力南下的决定。随后，下达了对长春进行总攻击的命令。除命令第四联队第二大队的两个中队继续向南岭中国驻军进攻外，又命第四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率领第四联队主力（包括第一大队第一、第二、第三中队和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以及机枪中队），于4时10分从头道沟营地出发，偷袭二道沟的中国兵营。同时，又调派驻公主岭的日军骑兵第二联队来长增援。

日军偷袭二道沟 9月19日4时30分，日军第四联队主力到达二道沟，包围了中国驻军的兵营，向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三团第二营突然发起攻击。第二营的官兵奋起抵抗。战斗开始不久，二营营长傅冠军不幸中弹受重伤，随即阵亡。营长的牺牲激怒了二营的官兵，特别是营部警卫排的战士，更把为营长报仇的子弹射向日本侵略军。战斗至8时半左右，日军一部冲入营内，二营将士凭借俄式兵营设施继续与敌人激战。10时左右，

---

①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4页。

日军动用了山炮和曲线炮进行轰击，使二营伤亡很大。同时，由于受到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避免冲突，不准抵抗”命令的约束，更使二营官兵斗志减退，士气低沉。结果，坚持到上午11时10分，二道沟中国兵营被日军攻占，二营官兵战死40余人，受伤60余人①，被俘380余人②，其余少量官兵撤走。日军被击毙24人，击伤23人③。

日军攻占南岭　9月19日3时10分，从头道沟营房出发的日军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于5时左右到达南岭，随即开始偷袭东北军炮兵第十九团和步兵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一团。先是日军以炮兵团为主攻目标，中国军队毫无准备，有些枪械弹药还锁在库内。战斗打响后，仓促应战，陷于被动。不久，炮兵第一营驻地被攻破，大炮16门被毁坏，有些士兵还在梦中就遭日军残杀。受到日军袭击后，炮兵团长穆纯昌和步兵团长任玉山急电吉林向熙洽请示，要求还击敌人。但熙洽却严令：不准抵抗。一切按照蒋主席铣电办理，避免冲突。可是，一部分爱国官兵却拒不从命，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砸开仓库铁锁，取出一些枪械弹药，奋起还击，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日军则撤至袁家窝堡一带。此后，日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又调派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主力，由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率领驰援长春。上午9时，该部赶至南岭，与在袁家窝堡的日军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会合。10时半左右，这两支日军以步兵团为主攻目标，分东西两路一齐围击南岭中国兵营。下午2时，日军骑兵第二联队也从公主岭赶至长春南岭增援。在日军新的更大的攻势面前，南岭的东北军爱国官兵继续进行了一些抵抗，给敌人以不小的杀伤。但因受“不准抵抗”命令的约束，斗志不强。几小时后，穆、任两团长分别率领

---

① 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第9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

② 〔日〕永见文太郎：《新京案内》，康德6年版，第118页。

③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9页。

所部撤出战斗。炮兵团撤至城南40余里的新立城，步兵团撤至城东数十里的稗子沟。下午4时许，日军占领了南岭的中国兵营，随后，又放火烧毁了一部分中国兵营。是役，中国军队损失很重，阵亡170余人，受伤130余人[①]。另有数十门大炮和大批弹药等物资，尽被焚毁或落入敌手。日军被击毙42名，击伤56名[②]，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长小河原被击伤，其第三中队长仓本茂被击毙。[③]

汉奸投敌与长春沦陷 日本侵略军在攻占南岭与二道沟中国兵营期间及以后，又派兵侵占了长春市公安局、市政筹备处、吉长镇守使署、长春县公署、无线电台、《大东报》社和各银行等机关。同时，又通过南满铁路运来大批日军至长春，最北开到米沙子站，用以防备与阻止双城、哈尔滨等地中国军队南下支援长春。此间，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周玉柄和市公安局长修长余等人，完全按照熙洽的"不准抵抗"命令办事，使在市政筹备处前的第二十三旅所属机枪队一连人被日军缴械。而修长余还通过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领事田代重德搭桥，与日军第四联队长大岛陆太郎见了面。见面后，修向大岛表示投降，请求由市公安局警察队维持市内"治安"，保证不发生有损中日感情的任何事情。并答应了大岛提出的将驻市内的第二十三旅六六六团一个营兵力全部迅速撤走的要求。随后，第六六六团团长马锡麟率所部一营兵力于当日全部撤离长春，开往乌拉街。修长余则带领近800名警察，在日本驻长春的宪兵分队监视下，维持市内"秩序"。到19日午夜前后，整个长春则沦入敌手。侵占长春后，日军又到处抢掠民财，收缴民枪，毒打民众，犯下了许多罪行，给长春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9月21日早晨，日军又侵占了吉长铁路局，杀死杀伤

---

① 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第9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

②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资料丛编》译稿，第9—10页。

③ 《满洲日报》昭和6年9月21日，第一版。

路警多人，缴械数十人，并占领了吉长铁路沿线[1]。此后数日，日军又进一步控制了长春的公安、通讯、金融和军工生产等各个要害部门，为其后来建立法西斯殖民统治打下了基础。

从上述情况看，日军所以能在一日之内就侵占了整个长春，除其本身作了充分准备，并采取突然袭击之外，还和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密切相关。在这种屈辱的对外政策下，长春地方军政当局，事前十分麻痹，毫无警惕，未作任何准备；事发后，则“不予抵抗”，被动挨打，毫无守土保疆意志；驻在长春的东北军各部队各自为政，不相配合，更利于日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虽有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准备和奋起抵抗，但也得不到必要的援助与支持，而且还不时受到一些破坏与压制，当然也不可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和长春的迅速沦陷。

4、伪满定都长春

日本确定长春为伪都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我国东北，作为其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在派兵侵占长春和东北各地的同时，又在积极筹划建立统治东北人民的殖民机构。自“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起，日本关东军的头目就连续多次召开会议，策划与制定殖民统治方案，确定在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其中，在1932年1月4日的殖民统治方案中，首次确定将伪满洲国的首都设在长春。2月25日，指使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通电，正式宣布在东北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其中的内容包括确定长春为伪满的“国都”。到了3月10日，即伪满洲国执政举行“就职典礼”的第二天，伪满国务院则发布第一号布告，正式宣布伪满洲国“奠都”长

---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200页。中华书局，1988年8月。

春。14日又发布第二号布告，正式宣布将长春改为“新京”。

长春被定为伪都的条件 当时，长春是个不大的城市，市区面积约21平方公里，人口12.7万，比沈阳、哈尔滨、吉林等城市都小。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什么选中长春作为伪满政权的“首都”，而未选中象沈阳、哈尔滨、吉林等东北较大的城市呢？这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切身利益以及当时长春的各种具体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长春和沈阳、哈尔滨、吉林等城市一样，交通比较便利。长春是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的连接点，又是吉长、吉敦铁路（后又连接1933年4月通车的敦图路和1934年4月通车的天图线）的起点，铁路运输四通八达。而且，长春与日本一些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比较密切与方便。从铁路方面看，通过南满铁路及其他铁路，既可经由大连，再经过水路到达日本，又可经由安东或开山屯，再经过朝鲜抵达日本，即有三条交通线。从航空方面看，自长春至日本东京可以开辟中日之间较短距离的航线。由于长春与日本交通联系的密切与便利，更利于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伪满政权的控制。同时，再从地理位置看，长春地处东北的中心，比起地处东北偏南的沈阳，偏北的哈尔滨和偏东的吉林来，更有控制东北各地的便利条件。

第二，长春和沈阳、吉林等城市一样，都是日本殖民者经营多年的据点，不仅有占较大面积的“铁路附属地”，而且还获得了长期居住、开商埠、领事裁判等特权。即日本的殖民势力在长春有相当大的基础，可以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依托。同时，长春又区别于沈阳、吉林与哈尔滨。在沈阳、吉林等城市，日本的殖民势力虽然也有相当大的基础，但这些城市都是从清朝到奉系军阀时期的政治中心，特别是奉系军阀的势力与影响是很强很深的。而哈尔滨则是俄国经营多年的城市，除有奉系军阀势力与影响外，苏联的势力与影响也是很强很深的。而且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也还掌握在苏联手中。从当时的情况看，

只有长春，上述的这些政治势力与影响都较弱较小，是日本殖民者视为“政治色彩稀薄”的理想城市①。

第三，长春市区地域宽旷，地价便宜，每平方公里只需5万余元，便于日本殖民者对土地的低价“征购”与掠夺。同时，长春虽然不象沈阳、吉林、哈尔滨等城市位于东北的较大河流——辽河或松花江主流沿岸，水力资源那样充足，但也较为充裕。不仅地下水较为丰富，而且也有水量较多的伊通河从市区附近流过。因而，根据当时的需求和条件，解决城市发展的用水问题也不算难。

总之，从政治、交通、自然、地理条件等各个方面来看，长春既有沈阳、哈尔滨、吉林等几个城市所共有的“长处”，又有本身所特有的“长处”。日本帝国主义者选定长春作为伪满洲国“首都”，对其推行既定的侵略政策，实现其先长期霸占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和东南亚各国，进攻苏联的野心与目标是较为有利的。可以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个“最佳”选择，他们自己也夸耀说：奠伪都于长春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断”②。

5、傀儡政权在长春出笼

出笼前的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者确定长春为伪满首都是与其筹划建立伪满中央政权一起进行的。为了建立伪满中央政权，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首先在东北各地物色与扶植了一些亲日军阀与政客，拼凑了一些地方傀儡政权。主要有：在吉林省，扶持卖国求荣的熙洽，于9月28日抢先宣布吉林省“独立”，成立了以熙洽为长官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在辽宁省，在策划扶植袁金铠、于冲汉、阚朝玺等汉奸成立了“奉天地方自

---

① 〔日〕永见文太郎：《新京案内》，康德6年版，第26页。
② 〔日〕永见文太郎：《新京案内》，康德6年版，第27页。

治维持会"、"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等伪组织后，又将汉奸臧式毅拉出，于12月16日，成立了以臧式毅任伪省长的伪奉天省政府；在黑龙江省，则扶植在哈尔滨的汉奸张景惠，于1932年1月3日建立了以张景惠为省长，吉祥为代理省长的伪黑龙江省政府。此外，还利用汉奸制造"地方自治"等办法，控制了一部份县级政权。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把其豢养多年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由天津弄到东北，先让其住在汤岗子温泉疗养区满铁经营的对翠阁旅馆，不久又迁至旅顺的大和旅馆，由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等负责监护。

此后，关东军又通过一系列幕僚会议和汉奸们"建国会议"，策划确定建立伪满洲国的各项政策，进行建立伪满中央政权的各种准备。1932年1月22日，在沈阳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召开了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人员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内、和知、片仓以及土肥原、花谷等人，讨论由松木侠起草的伪满洲国"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卫"条例、交换备忘录等。接着，于2月5日至11日，15—16日及25日，先后召开了10次"建国幕僚会议"①，紧张地策划如何建立伪政权，怎样控制东北的铁路、矿山、森林、海关、税收、财政以及起用日本人充当伪满官吏、实施移民制度、警察制度等问题。

2月16日，由张景惠按照关东军司令官的指令，在沈阳召开了有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人参加的伪"建国会议"。该会议由板垣主持，本庄、三宅、石原、驹井、土肥原等出席。17日，按照关东军指定的人选，成立了由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墨特色木丕勒(齐王)、凌升为委员的"东北行政委员会"。18日，发表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独立宣言"，宣布东北脱离南京政府。这个"独立宣言"的

---

①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78—392页。

署名为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凌升等7人，但实际上汤玉麟、齐王、凌升等3人并未到会。马占山虽然到会，但未在宣言上签字。当日，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23日到齐齐哈尔，25日组成以马占山为首的伪黑龙江省政府。

2月18—25日，伪"建国会议"继续进行，张燕卿、谢介石、赵仲仁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伪"建国大纲"的具体内容。25日，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东军幕僚会议决定的"新国家体制"，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设在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①。

同时，关东军司令官还于1月29日派板垣到旅顺，探询溥仪态度。溥仪表示愿当"元首"，但须复辟"帝制"，保留"皇帝"称号。2月23日，板垣再次到旅顺，与溥仪密谈，胁诱溥仪答应出任"执政"。

2月29日，关东军指使汉奸，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伪政府《组织法》，3月1日又发表伪《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随后又于3月1日与4日，先后分别派出汉奸6人与29人为东北人民的"敦请"代表，连续两次到旅顺"恳请"溥仪出任伪满元首。第一次，溥仪按照关东军的事先部署，让郑孝胥出面代他接见，以责任重大为"理由"，表示"谦让"，予以"婉辞"。第二次，溥仪又根据关东军的事先安排，故作忸怩之态，答应"暂任执政一年"。

经过两次"请驾"之后，溥仪等人在日本警宪的严密监护下，于3月6日，从旅顺乘车抵达汤岗子。当天，板垣也到汤岗子与溥仪会晤，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选，并使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换文方式，签定了卖国求荣的"密约"。同日，作为伪执

---

①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91—392页。

政府的先遣人员，包括“内务大臣”8 名，随从 3 名，护军 8 名，厨师 9 名，勤杂人员 4 名，勤务兵 3 名，女佣人 8 名，计 43 名，乘车抵达长春，准备在长春迎接伪执政溥仪。

3 月 7 日，以张景惠、赵欣伯、凌升、赵仲仁、谢介石等 10 人为“迎接使”，由沈阳来到汤岗子。次日上午 8 时，溥仪在日本军警的监护和“迎接使”的簇拥下，从汤岗子出发，乘车前往长春，至下午 3 时，抵达长春车站。溥仪来长春，受到了日伪各方面人员“隆重”、“热情”的“欢迎”。未到长春前，即有熙洽、张海鹏、荣厚等人专程赶至公主岭站进行迎接，到长春后，则有齐王、马占山、金璧东和日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第一大队长小川、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等人进入车内予以迎接。到长春站站台上迎接的则有：日本宪兵队和各种服装的队列。在队列中既有“袍子马褂”，又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旗帜有伪满国旗、日本太阳旗，还有“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青龙旗”[①]。溥仪下火车后，又改乘汽车抵达刚刚设置的伪执政府(前吉长道尹衙门处)，沿途又受到了“热烈”欢迎。除有悬挂着的伪满国旗和醒目的标语外，还有日伪事先安排好的各界“代表”的欢迎队列和人群。

伪建国典礼与密约 3 月 9 日下午 3 时，在长春的伪执政府，举行伪满洲国的“建国”仪式，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就执政职。参加典礼的共 121 人，其中日方 44 人，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满铁总裁内田、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关东警务局长林、关东军参谋板垣、海军少将小林、驻吉林总领事石射、满铁理事川石、伪黑龙江省顾问村田、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驻长春领事田代、伪奉天省顾问金井、伪吉林省顾问三桥、伪自治指导部顾问中野、陆军参与官土岐、关东军副官住友、关东宪兵队队长二宫、驻哈尔滨领事泷川、关东军特务部长驹井、关东军参谋和知、林、驻

---

①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312 页。

奉天领事森冈，以及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员 22 人；中方 77 人，除溥仪外，还有伪奉天省长臧式毅及王庆璋、李颜等"官民"代表 16 人，伪吉林省长官熙洽及荣厚、孙其昌、谢介石、荣孟枚、张燕卿、修长修、艾乃芳等吉林及长春市各方面代表 34 人，伪黑龙江省长官马占山及韩云阶、赵仲仁等"官民"代表 8 人，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及范熙中、李绍庚、金荣桂等哈尔滨特别区"官民"代表 13 人，伪蒙边督办张海鹏及凌升、齐王等内蒙古有关代表 10 人和清宣统皇帝时的旧臣郑孝胥、罗振玉、宝熙、溥佳、德楞额等[1]。会场警戒森严，参加者以黄色为标志，没有标志者不准进入。会上由张景惠和臧式毅两人献上伪国玺与伪执政玺，郑孝胥代读"执政宣言"，内田康哉代表来宾致祝词，宝熙代读溥仪的答词[2]。

3 月 10 日，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圈定的名单，签字任命了一小撮汉奸充当伪满洲国官吏。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臧式毅任伪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省省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兼伪黑龙江省省长，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伪吉林省省长，谢介石任伪外交部总长，冯涵清任伪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任伪实业部总长，丁鉴修任伪交通部总长，赵欣伯任伪立法院长，于冲汉任伪监察院长，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北满特别区长官，张海鹏任侍从处武官长。14 日，又任命于芷山为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吉兴为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齐王为伪兴安局总长。

伪满洲国的出笼，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这出政治丑剧的导演就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东北的集中代表——关东军。从炮制殖民统治方案，到策划扶植东北各地汉奸宣布"独立"、"自治"以及胁诱溥仪，使之充当伪政权的傀儡头目，都是由

---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 405—409 页。中华书局，1988 年 8 月。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 403—405 页。中华书局，1988 年 8 月。

关东军一手筹办的。当然对汉奸们来说，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必须出卖中国东北的主权。就拿3月6日溥仪与本庄繁签定的密约[1] 来看，其主要内容是：(一)伪满的"国防"及"维持治安"要"委诸"日本负责，而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二)伪满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的管理及新路的修筑，均委诸日本；(三)对日本军认为必要的各项设施伪满要给以"竭力援助"；(四)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官吏，而这些官吏的任免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五)将来由"两国"(日伪)缔结正式约时，要以此密约所列的各项宗旨与规定为立约的基础[2]。

这样，随着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出笼，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其"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的目标。此后，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势力，便利用这个傀儡政权，进一步地夺取与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一切大权，实行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殖民统治、镇压、掠夺与奴役。

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设立了伪满政权的中央机构之后，即逐渐地把长春变成了其实现殖民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统治的中心。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设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殖民统治机构和御用团体，而且也制定与颁布了许多实行殖民统治的法西斯法令与政策，并通过这些机构、团体、法令与政策，来发挥其殖民统治中心的作用。

---

① 密约上所用的时间是3月10日。

②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二、"军政国"首府的法西斯统治

1、侵驻长春的日本殖民势力

日本帝国主义在派兵侵占长春之后，即对长春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与镇压。为此，不断调整与扩大其殖民机构与势力，并把长春建成"军政国"的"首府"①。

日本军警机构与势力 自"九一八"事变至伪满政权建立后的几个月内，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的军事机构与队伍主要有：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司令部及所属第四联队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独立飞行第八中队、关东宪兵队长春分队等。

1932 年 9 月 15 日，日伪在长春签定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之后，日本在长春的军队机构和队伍有了较大的变化与增加。当年 10 月 30 日，主宰东北殖民地一切生杀大权的关东军司令部，由沈阳迁至长春。先在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内，后迁至"大同大街"西侧西公园南(今斯大林大街 47 号，中共吉林省委办公楼址)。关东军司令部在"九一八"当时，内设幕僚及兵器、经理、军医、兽医、法务等部，1932 年后改为参谋、

① 1941 年 11 月 3 日，日本关东防卫司令部高级参谋片仓衷在奉天某一会议上讲话时承认：伪满洲国乃是根据军方要求而建立的"军政国"。转引自：解学诗《历史的毒瘤》，第 48 页。

副官、管理、兵器、经理、军医、兽医、交通监理、特务(先叫统治部,后改特务部,1934年12月撤销)等部。1937年后,又增设了兵事、弘报、运输、人事等部,到1940年时,达11个部。特务部负责管辖对伪满的统治事务。参谋部内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课,分管作战、情报、教育、对伪满政策等事务。后期又设立了第五课,管理"占领区行政"。关东军下属机构有驻东北各地的师团、独立守备队、旅顺要塞司令部、关东宪兵队等。其中,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也随关东军司令部的北迁,于1932年10月,由沈阳迁至长春。先设在满铁大和旅社(今春宜宾馆址),1935年,迁至"大同大街"东侧(今吉林省政府大院)。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分5个宪兵队,其中在长春的为"新京"宪兵队。"新京"宪兵队下辖8个分队,两个分遣队。其中在长春的有城内、"附属地"两个分队。1934年,增设南岭分遣队,翌年取消。1936年,将城内分队降为分遣队,1938年取消。同时设立"南新京"分队,将"附属地"分队改为北分队。

自1932年以来,日本在长春的军事机构与队伍还有:日军"新京"警备司令部与警备队(驻西广场西南方)、陆军旅团司令部(驻西广场西方)、第一独立守备队(后为第二独立守备队)、骑兵联队、第一战车军团、第二飞行集团司令部与第七飞行团、高射炮联队、"新京"特设宪兵队以及关东军仓库、医院、兵器厂、汽车修配厂、飞机场、马匹防疫部,还有驻伪满海军部(在西广场)。

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长春的军事机构与势力更为庞大,有关东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第三十军司令部、第一百四十八师司令部、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三旅团司令部、大陆铁道队司令部、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等。

驻长春的日本警察机构,除原有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满铁附属地"警察署外,还随着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与关东局的先后设立,在"大使馆"与关东局,分别都设立了警务部。至1937年12月后,日本对东北实行所谓"废除治外法权",将一大批日本

警察机构和人员转为伪满洲国警察机构与警察。在长春的日本警察机构和人员也有一些变动。将“大使馆”警务部和关东局警务部取消，将“满铁附属地”警察署交给伪满首都警察厅所辖，将“新京”总领事馆警察署改为伪首都警察厅所辖的中央通警察署，将其中的日本警察都改为伪满警察。

日本行政机构与势力 1932 年 12 月 1 日，在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设立了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大使馆”内设有管外事的参事官(1 人)和警务部。参事官下设总务、经理、政务、通商、情报、秘书、文书、电信、朝鲜等 9 课；警务部下设第一、第二、第三 3 个课。“大使馆”下辖有总领事馆、领事馆、领事分馆等机构，在东北计有总领事馆 5 处，领事馆 8 处，领事分馆 8 处。在长春的有“新京”总领事馆，地址在朝日通(今上海路吉林省政协大院)。

1934 年 9 月之后，根据日本内阁决定，对在东北的殖民机构实行“二位一体制”，取消了关东厅，在驻伪满大使馆下设立了关东局，由“大使”兼任其长官。关东局设总长一人，协助“大使”负责对满铁、关东州、电电公司[①]、“满铁附属地”行政等进行监督。关东局内设官房与司政、警务、监理等部。关东局警务部长及大使馆警务部长，统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兼任，监理部长由关东军交通监理部长兼任。

在“满铁附属地”还设有满铁长春地方事务所，1938 年扩大为“满铁新京支社”。1939 年，还在“大使馆”内设立了直属的教务部，管理在伪满的日本人教育。

总之，在日本统治我国东北的 14 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的军政殖民机构和势力是不断进行调整与扩充的。通过调整与扩充，不断加强对伪满政权的控制，并不断加强与扩大对包括长春人民在内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殖民统治与镇压。

---

①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简称。

附：　　(1)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及参谋长副参谋长系列表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

司令官	任职年月日	参谋长	副参谋长
本庄繁	1931.8.1	三宅光治、桥本虎之助	
武藤信义	1932.8.8	小矶国昭	冈村宁次
菱刈隆	1933.7.28	小矶国昭	冈村宁次
南次郎	1934.12.10	西尾寿造	板垣征四郎
植田谦吉	1936.3.6	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	今村均、笠原幸雄、石原莞尔
梅津美治郎	1939.9.7	饭村裕、木村×、吉木×、笠原幸雄	秦彦三郎、池田纯久

山田乙三	1944.7.22	笠原幸雄、秦彦三郎	池田纯久，松村知胜

(2)历任驻伪满大使、关东局总长序列表

(1932年8月——1945年8月)

大　使	任职年月日	关东局总长	任职年月日
武藤信义	1932.8.8		
菱刈隆	1933.8.22		
南次郎	1934.12.25	长冈隆一郎 大野绿一郎	1934.12.26 1935.5.11
植田谦吉	1936.3.28	武部六藏	1936.4.15
梅津美治郎	1939.9.10	大津敏男 三浦直彦	1938.3.28 1941.2.8

山田乙三	1944.7.18	山田乙三	1945.7.18

2、伪政权中央统治镇压机构

伪满政府机构的演变 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政权的中央机构之后，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进行了多次的调整与改组。自1932年3月1日至1934年3月1日，伪满政权名为“民主共和制”，实行所谓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四权分立的四院制，在“元首执政”之下设置一府四院七部。一府，即参议府，设正副议长各1人，分别由汉奸与日本人担任，主要是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指示或认可，提出伪国务会议所要决定的主要事项，基本上是用于走过场的机构。四院，即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和法院。七部，即国务院下设民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等部。1933年3月又增设了文教部。国务院内还设有总务厅与兴安局(不久改为兴安总署)、法制局、资政局(3个月后取消)和“国都”建设局。国务院设总理1人，由汉奸充任，总务厅设日本人长官1人。名义上伪满洲国的全部行政大权由汉奸总理统辖，实际上掌握在日本人总务长官手里。国务院所属各部分别设总长1人，均由汉奸充任，作为傀儡。各部内均设有总务司，各总务司长均由日本人充任，分别掌管各部的实权。监察院院长由汉奸充任，下设监察部与审计部。监察部长为日本人，掌握监察院的实权。立法院只任命一名汉奸院长，院长下只设了秘书厅。立法院的职能常为参议府所代替，立法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法制局长手中。法院的司法大权也由日本人官吏操纵。

1934年3月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伪满政权改为“君主制”，使担任两年“执政”的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帝国的“皇帝”。这时，伪满中央政权机构也随之进行了一些变更，实行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规定立法院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司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在“皇帝”之下，除原有一府四院外，还在伪皇宫设置了宫内府、尚书府，分别负责掌管“帝室”事务和典守“御玺”、“国玺”及“诏书”、“敕书”等用“玺”事务。伪国务院又于1934年11月，将兴安总署改成蒙政部。伪国务总理改称伪国务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改称各部“大臣”。在总务厅内设立企划处，将恩赏处改为恩赏局，需用处改为营缮需品局。取消法制局，在总务厅内设法制处，将原法制局的统计处划归总务厅，参议府则成为“皇帝”的咨询机构。至1935年5月，进行了人事大更动，除少数汉奸保留原职外，其余的都作了更换，将日本人认为不可靠或不驯服的汉奸换掉或让其担任虚职，换上一些被日本人信任或与之关系密切的汉奸。如将主张东北“国际共管”的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撤掉，换上驯服于日本人的铁杆汉奸张景惠；把“建国”的“元勋”臧式毅、熙洽、张海鹏等人调离原职，委以闲差，以削弱其势力。

至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之际，为了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法西斯统治，又对伪满机构进行了大调整，实行所谓的“简素化”、“一元化”和“效率化”，从纵的或横的方面不断强化伪总务厅的权力。其具体情况是：将伪满国务院的9个部减为6个部，即治安、民生、司法等行政3部与产业（1940年改称兴农部）、经济、交通等经济3部。将原实业部改为产业部，财政部改为经济部，军政部改为治安部，取消民政部，文教部、外交部与蒙政部，新设民生部。在伪国务院内设内务、外交、兴安等3个局，将民政部警务司业务转至治安部，民政部地方司业务划归内务局，民政部其他业务划归民生部。将外交部通商司业务划归经济部商务司，外交部其他业务归外务局掌管。将蒙政部的警察行政

划归治安部，其他业务归兴安局掌管。将军政部的马政局并入产业部畜牧局(1939年后又划回治安部)。将文教部划归民生部文教司。还撤销了监察院，其所属的行政监察划归总务厅官房，其会计、检查划归新设的审计局掌管。在“皇帝”下，于1939年1月设立了军事咨议院，于1940年7月设立了祭祀府。

1937年的机构改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伪中央各部(以及各省、县)机构中，普遍推行了次长制，即将伪国务院各部内的总务司取消，改设官房，同时在各部“大臣”下设日本人次长，掌握各部的实权。通过总务长官主持，在每周星期二召集各部次长开会(被称作“火曜日会议”)，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旨意，商讨与确立伪满的各项重大政策与法令。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伪总务厅的权力，完善了“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了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压迫与经济统制。

至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为了加强对我国东北的控制与掠夺，使伪满成为支撑战争的基地，又对伪满政权机构进行了一些改组与调整。1942年4月，将主持外事业务的外务局升格为外交部，10月，在民生部下设立了“国民勤劳奉公局”。1943年4月，将民生部的文教司又升格为文教部，用以加强其殖民文化教育的统治。同月，将军警一体的治安部取消，新设了军事部，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总务厅内设警务总局，实行政警合一，在司法部内增设了“司法矫正总局”，以期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与镇压。1944年8月，根据太平洋战争失利，美机轰炸沈阳、鞍山等一些地方的紧迫形势，在总务厅内设置了防空部，用以统辖各部各省的防空事宜。1945年3月，撤销了民生部，将民生部的劳务司与“国民勤劳奉公局”合并为“国民勤劳部”，以进一步强化对东北人力资源的掠夺。至此，伪满国务院的机构又变成了9个部。至1945年5月，伪总务厅将其所属的企划、地方、统计等处和官房等合并，组成企划局，由总务厅次长兼任其局长，以图维持摇摇欲坠的伪满统治。



为了加强对长春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设立了地方政权机构，称为“新京市政公署”，1933 年 4 月，改称“新京特别市公署”。

伪满国军的建立与扩充　除了伪满政权机构之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在长春建立了伪满的军警宪特组织。首先建立了由日本军官直接控制的伪满国军，作为关东军镇压东北各族人民的帮凶。1932 年 3 月，任命马占山为伪军政部总长。4 月，于沈阳建立了伪军政部，作为伪满国军的中央指挥机构。伪军政部内设参谋司、军需司与中央军事宣传委员会(后改为军事调查部)，分管作战、军需和宣传教育等项事务。由于马占山重新宣布抗日，则由伪军政部次长王静修代理部务。随后，根据关东军制定的伪《满洲国陆海军条例》和《军警担任区域》等规定，以归降的熙洽、于芷山、张海鹏、程志远等部军队，计约 12 万人为基础，编成了伪满国军。下分 5 个警备军、海军江防舰队及铁路警护队。

在伪满国军成立的同时，关东军司令部派遣以陆军大佐多田骏为首计 21 名关东军现役军官组成的顾问团，于 7 月初在伪军政部内成立顾问部。由上述这些日本军官充当伪军政部及各警备军和海军的顾问，直接控制伪满国军的各级机构与部队。同月，将伪军政部迁至长春，任命张景惠为伪军政部总长，将由日本人和田劲为司令官的靖安游击队编入伪满国军。1934 年后，实施募兵制，将原有 5 个警备军划为 5 个军管区和 4 个兴安警备军(在吉林军管区内，设有长春地区警备司令部)。以后，军管区逐渐增加，警备军取消，至 1941 年，军管区达 11 个。伪军的兵力开始为 14 万人，此后根据 1933 年日本陆军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关于控制伪满国军兵力与兵种的要求，确定伪满国军人数为 6 万人，兵种只有步兵与骑兵。于是从 1934 年始，对伪军进行整编，至 1935 年，伪军减少为 7 万人。同时又大批增加了派入伪军各级机构的日本军职人员，使伪军中的日本军官由 1933 年的 350 人猛增至 1937 年的 4 500 人，大大强化了对伪军

的控制。到1940年后，伪满国军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规定凡东北境内19岁以上青年男人都有服兵役3年的义务。实行征兵制后，伪满国军的兵力又有增加。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由于关东军大批兵力南调，为补充镇压东北人民的兵力，则将伪满国军扩大，兵力逐渐增至15万人，并增强了工兵、辎重、高炮、飞行队等兵种。

伪满国军除伪军政部(1937年改为治安部，1942年改为军事部)及其顾问部、马政局等机构设在长春外，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陆续设在或迁至长春。1932年至1933年间，有伪首都警备军、翊卫军、新京警备独立骑兵旅(也称第一旅)、侍从武官处(后改侍从武官府)和军乐队等。1934年之后，又设立了伪将军府、军用通信本处(包括军用电台、通信养成所、信鸽班等机构)和护军。翊卫军改称禁卫军(包括步兵团一个营、骑兵连、炮兵连等)，独立骑兵旅划归伪第二军管区管辖。1937年之后，又设立了一些伪军事机构：包括1937年6月建于沈阳12月迁入长春的伪陆军军需学校，1937年9月建立的伪陆军兽医学校，1939年4月建立的伪陆军军官学校以及伪新京第一飞行队、新京军需处、新京恩赐医院等。自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至伪满垮台，又在长春设立了伪高射炮队(1943年移往鞍山)、伪陆军军需厂、伪陆军飞行队司令部(后改为航空队司令部)、伪防空战斗飞行团、伪陆军高等军事学校等机构。

伪满宪兵队的组成　在伪满国军中还建有独立成系统的伪宪兵队组织。最早的伪宪兵组织，是在伪满政权成立后不久，在长春设立的伪京师宪兵司令部和3个警备军司令部下分别设立的3个督察队。在沈阳的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内还设有宪兵练习部(又叫宪兵养成所)。1934年7月，将宪兵养成所迁至吉林，改为宪兵训练所，扩大了训练规模。1935年3月，以吉林宪兵训练所毕业的第一期学兵为骨干，吸收各督察队的一些队员，组成伪满宪兵队，有设在吉林的伪宪兵队司令部和在伪首都与5个军

管区司令部所在地的6支宪兵队。每队先设一个连，翌年又增加了第二连与第三连。伪首都宪兵队因长春无房舍，暂住吉林东大营。1936年春，伪京师宪兵队司令部取消，伪宪兵训练所改为宪兵训练处，于当年秋冬，与伪宪兵司令部一起迁至长春南岭。伪首都宪兵队改为"国都宪兵队"，也随之迁至长春南岭。伪国都宪兵队设队长与指导官各一人，队内设副官、经理、警务、兵器、医务等室，辖有两个连和四道街分遣所。至1937年春，伪宪兵队增至8支。

1938年，伪宪兵训练处又迁回吉林。当年夏，伪宪兵队进行了改组，将其编成甲乙两种宪兵队。由宪兵训练处的大批学兵和从各宪兵队中抽出部分兵力，集中到松浦镇，组成独立宪兵队，也叫乙种宪兵队，编成10个连，开赴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沿岸，以配合日军的对苏作战。(乙种宪兵队于1940年夏解散。)抽调部分队员后，各宪兵队所余人员，编成甲种宪兵队，继续留在原地区活动。伪国都宪兵队也抽出数十名兵力，参加独立宪兵队，其余宪兵迁至六马路。1939年6月，根据伪皇帝发布的"敕令"，将伪宪兵队司令部改为宪兵总团司令部，在团长、顾问、参谋长下设有参谋、副官、军需3个处。1943年参谋处内又设3个课，1945年副官处内也设一个课。总团的团长由汉奸充任，实权掌握在日本人顾问及参谋长手中。伪国都宪兵队改为国都宪兵团，内设总务、警务、特务3个课，下辖两个连。团长由汉奸充任，实际权力由日本人指导官及各课长、连长所掌握。至1945年，伪宪兵总团辖有16个宪兵团和1个训练处，计有伪宪兵2 800余人，其中伪国都宪兵队200人。

伪警务司与伪首都警察厅　日本在建立伪满国军的同时，还建立了伪警察机构。伪满统辖东北各地警务的"中央警察机构"是设在伪民政部内的警务司。伪警务司内设有总务、特务、保安、外事4科和督察、侦缉2室。首任伪警务司长是日本人甘粕正彦，直接掌管伪警察方面的大权。1935年2月，撤销外事科，

新设司法科。1937年后，随着伪满政权机构的改组和日本撤销所谓“治外法权”的实施，伪警务司划归伪治安部，司内机构扩充为警务、警备、特务、检阅、保安、刑事、教养7科和督察官、兵事恩赏2室。1940年，调整为警务、警防、特务、保安、刑事、教养6科和兵事恩赏1室。1932年6月，在长春设立了伪中央警察学校，由民政部直辖，作为伪警察教育的最高机关。1939年6月，设立了由伪治安部直辖的指纹管理局。

在伪警察的中央机构下，各省、市、县、旗也设有其下属的警务厅、警察厅、警务局、警务科等各级机构。在长春，于1932年6月，设立了伪首都警察厅，隶属于伪民政部，管辖范围为伪首都及长春县。1937年后，随着伪满政权机构改组，将伪首都警察厅升格，隶属于伪国务院，规定由伪国务总理大臣直辖，实则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日本人长官直辖，警务范围缩小为伪新京特别市，长春县的警务划归长春县警务局。将设在长春的“满铁附属地”警察署及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划归伪首都警察厅管辖，并接受了一批日本警察。1940年11月，根据所谓“市警统一”的精神，将首都警察厅降格为伪新京特别市所辖的一个局，由伪新京特别市长管辖。

伪首都警察厅设有警察总监，由汉奸充任，首任总监为修长余。1936年增设了副总监，由日本人充任，直接掌管伪首都警察厅的实权。伪首都警察厅内设有警务、警防、特务、保安、司法、卫生6科和督察室。1937年增设外事科，1939年增设建筑工场科，1941年又增设经济保安科与兵事恩赏室。至此，伪首都警察厅计有9科2室。伪首都警察管辖下的机构有伪警察署、消防署等。伪警察署有大经路、四道街、南关和小合隆、卡伦、大屯、米沙子、双城堡等警察署与一个消防署，还有一个由日本人为主力组成的游动警察队，又叫警察游击队，专门负责讨伐抗日武装力量。还有一所伪新京警察学校。1936年初，吸收了宽城子警察署，1937年12月后，接收了日本在长春“满铁附属地”警察署

（称中央通警察署）和领事馆警察署（称“新京”警察署），将小合隆、卡伦、大屯、双城堡、米沙子等警察署划归长春县，在八里堡、孟家屯等地分别设立了东荣、安民两警察署。至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所辖的警察署则有长通路、宽城子、敷岛、大同、顺天、和顺、安民、东荣等8个和另外1个消防署，下设108个派出所或分驻所，共有伪警察2 600余人，平均57户，287人就有一名警察监管。

伪保安局的设立　1937年后，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加强其所谓“谍报”、“防谍”等“秘密战”，在伪首都新京设立了伪中央保安局这一伪满特务组织，作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辅助力量，进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为保密起见，将伪保安局隐藏在伪警察机构之内。伪中央保安局一直以“中央分室”或“治安分室”的名称，设在伪警务司内。各地方保安局也以“分室”名义设在各省的伪警务厅内。伪保安局的在编人员全系日本人，当然也利用一些中国人充当密侦、联络者等为其服务。伪中央保安局长由伪治安部日本人次长兼任，其次长由伪警务司日本人司长兼任。至1943年机构改组后，伪中央保安局长由伪警务总局长兼任，其次长由伪警务局特务处长兼任。伪中央保安局名义上归伪治安部管辖，实际上受关东军参谋部领导。为加强对伪中央保安局的监督指导，关东军第二课直接派去校佐，充任伪中央保安局的参与官。伪中央保安局内，设3个科，后来增至8个科，分别负责文书经理、情报、防谍、“外国人”防谍、对苏蒙情报、无线电搜查、邮检、化学等方面的特务工作。

在伪中央保安局下，设有各个伪地方保安局，特别是边境各省都设有伪地方保安局。在伪都新京特别市，于1937年12月，在伪首都警察厅内设立了伪保安局首都办事处。1939年之后，扩充为伪新京地方保安局。伪新京地方保安局长由伪首都警察厅日本人副总监兼任。伪新京地方保安局内分3个股，分管总务人事、欧美、亚洲等有关事务。1942年后，伪新京地方保安局内

又设立了特谍班，专门负责侦察、监视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反日团体及其活动。特谍班由伪新京地方保安局的日本人理事官、事务官负责领导。在伪都计有两个特谍班，总班长分别为菊谷鹰司和竹村某，另有特谍班长 9 名，参加的人员约 30 名，并使用密侦 30—40 名。形成了密集的侦谍网，用以监视与控制中国人及外国人的言行，并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随意逮捕、监禁与残害长春人民。

3、法西斯统治与残酷镇压

各种法西斯法令的推行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傀儡政权之后，便操纵这个机构，推行殖民主义的反动法令。其中有：1932 年 9 月的《治安警察法》、《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10 月的《出版法》，12 月的《暂行枪炮取缔规则》，1933 年 12 月的《暂行保甲法》，1935 年 11 月的《火药取缔法》等。通过这些反动法令，剥夺东北各族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权利，镇压与破坏各种反日活动。尤其在《暂行惩治盗匪法》中，还赋予日伪军警对抗日军民以“临阵格杀”与“酌情处置”等特权，使之可以随时随地随意残杀抗日军民，而不用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也不负任何责任。1937 年 1 月，伪满公布了《刑法》，较以前的《治安警察法》等扩大了定罪范围，加重了处罚，并继续保留了“临阵格杀”和“酌情处置”等特权。1941 年 12 月，伪满政府又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及《治安维持法施行法》，1943 年 9 月，颁布了《思想矫正法》与《保安矫正法》，1944 年 6 月颁布了《时局特别刑法》。这些法令又较以前的法令更加严刻，只要对日伪反动统治稍有不满，流露出抵触言论，就会被日伪警宪以“思想检查”为由，冠以“思想犯”、“国事犯”等罪名，而加以逮捕与迫害。而且还规定日伪警宪有行使“预防拘禁”与“保护监察”的特权，只要认为民众有“犯罪”可能，就可实行“预防拘禁”或“保护监察”，或者

按两个“矫正法”的规定，把民众投入变相的监狱——“矫正辅导院”内进行迫害、奴役和残杀。随着这些法西斯法令的实施，为日伪军警实施法西斯统治与镇压，制造血案，提供了便利，怂恿了日伪军警的暴虐与凶残。

日伪对长春及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与镇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以军事讨伐为主 1932年至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为确立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了以军事讨伐为主的镇压方针。即纠集日伪军警宪特力量，对活跃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与“扫荡”，妄图扑灭抗日烈火。为了纠集各种镇压力量，日伪曾先后成立了一些新的镇压机构。1932年10月，设立各级“清乡委员会”，负责招抚抗日武装人员，收缴枪支，改编伪军及“自卫团”等所谓“治安”工作。伪中央清乡委员会设于长春，委员长由伪国务总理充任，委员有伪总务长官、伪军政部日本人顾问、军政部总长、民政部总长等。1933年6月，将“清乡委员会”取消，成立了各级“治安维持会”。“治安维持会”继承“清乡委员会”的业务，并联络协调各镇压机构，共同镇压东北各族人民。伪治安维持会的头目，清一色为日本人担任。设在长春的伪中央治安维持会的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充任，副委员长由伪民政部和伪军政部日本人次长充任，委员由日本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驻伪满海军部、“大使馆”、关东局以及伪军政部、民政部、兴安总署的日本人军官和官吏组成。在长春，还设立了伪新京治安维持会，“委员长”由关东军第一课长斋藤大佐担任。

1935年9月，设立了各级伪警务联络委员会。伪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设在长春，“委员长”由关东宪兵司令官充任。委员有关东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长、日本驻伪满大使馆警务部第一课长、关东局警务部警务科长、伪民政部警务司长、铁道总局警务处长等。伪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下设干事会，干事长为关东宪兵司令

部警务部长，干事有关东宪兵司令部部员、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嘱托军官、关东局事务官、伪民政部科长、伪蒙政部科长、铁道总局警务处科长、伪中央治安维持会干事等。还有关东军司令部第一、第二、第三课的参谋人员充当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有关警务（镇压）政策、情报、机构等方面的联络以及思想对策方面使用警务管制事项的立案审议，以期强化对东北各族人民的镇压。

在长春县，利用在"九一八"事变前存在的"保卫团"镇压民众，于1932年与1933年，也先后建立了伪清乡委员会与治安维持会。建立伪治安维持会时，解散了保卫团，将保卫团一部分人改编为伪警察队。建立了以当地军警为主体的伪自警队和治安工作队，对长春县各地开展讨伐、"宣抚"、收缴民间武器等活动。

在长春的日伪军警宪特机构和人员，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镇压方针，积极调派各种镇压力量，对长春及附近一些地区的抗日武装和民众进行疯狂的讨伐。其中，较大的讨伐活动如下：

（一）1933年7月下旬至8月，以伪军吉长地区警备司令邢士廉及日本人顾问河岐为头目，纠集伪新京警备军3个连，独立骑兵旅1个团及游动警察队和吉海、吉长、哈长铁路线的伪军共6个连，组成2 000人的双伊支队，对在双阳、伊通一带的殿臣、宋国荣等部抗日军进行讨伐[①]。

（二）1933年9月上旬，伪新京警备队和游动警察队等，对长春西北方小合隆、蔡家窝堡一带的抗日山林队进行讨伐[②]。

（三）1933年10月中旬，伪新京独立骑兵旅一团与日军第十团、独立守备队及伪吉林省警备军、黑龙江省警备军各一部、伪靖安军等，对在双阳、伊通、磐石一带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

---

① 〔伪满〕《大同报》，大同2年7月22日、27日第7版。

② 〔伪满〕《大同报》，大同2年9月6日第7版。

独立师和殿臣部抗日军进行数十天的连续讨伐[①]。

(四)1936年5至6月，伪国都宪兵队组成60余人的讨伐队，由日本人连长寺尾甚内指挥，对伊通县乐山(今属长春市郊区)一带殿臣、海青、天地荣等部抗日武装进行讨伐。同年8月，由队长魏海福、日本人指导官久米乙彦指挥，再次对伊通县乐山进行讨伐、杀害了"海青部"首领和村民3人。

日伪警宪还对长春的中共地下组织及民众进行了破坏与镇压活动。如1934年4月，长春的日伪警宪及其他城镇的警宪，在长春及哈尔滨、沈阳、双城、珠河(今尚志县)、呼海铁路沿线等地，抓捕了中共及民众团体人员40余名，使这些地方的中共、工会、共青团等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34年5月，长春的日伪警宪逮捕了长春二中及其他学校的教员9人，枪杀了4人，5人下落不明。

中期——军事讨伐与政治镇压相结合 1936年至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与强化其殖民统治体系，实行了以军事讨伐与政治镇压相结合的'官军民'三位一体的"持久治安肃正"的方针。关东军制订了1936年3月至1939年3月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提出了以"治标"(军事讨伐)工作为主，同时与"治本"(与军事讨伐相配合的各项工作，包括集团部落、保甲连坐、警备道路、经济封锁、"宣抚"工作等)工作相结合的"治安肃正"办法，划出了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4省及伪安东、通化两省各一部为重点讨伐地区，先后进行了"东边道"、三江地区和三省(吉林、"间岛"、通化)联合等3次大讨伐又于1936年4月，将伪警务联络委员会改为伪警务统制委员会，以强化对东北各族人民的镇压功能。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委员长、委员等成员，基本上保持伪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干事会人员也基本未变。伪警务统制委员会于1937年11月末撤销。1938年

---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498页。

1月中旬，设立了伪警务联络委员会。地点在各日本宪兵队本部或有将校军官的宪兵分队本部所在地，委员会仍以宪兵队长为委员长，委员由各日伪有关镇压机关人员组成。其中，伪新京警务联络委员会由日本"新京"宪兵队和伪首都警察厅职员组成，参加的人员还有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职员、伪满国军军事顾问、伪满宪兵司令部职员、伪治安部警务司职员、伪保安局职员、伪铁路警护总队职员等。1939年4月，设立了伪防卫委员会，将以前存在的伪治安维持会、伪警务联络委员会撤销，合并到伪防卫委员会中。伪防卫委员会设在各省公署所在地与伪都新京，委员长由各日军防卫兵团司令官或参谋长充任。委员长下设参事与委员，由日伪各有关兵团长、伪满地方政权行政官吏、"协和会"头目、警务机构头目以及有关"特殊会社"头目等充任。其中，设在伪新京的防卫委员会的参事有伪新京市长、伪首都警察厅总监、伪协和会首都本部长等，委员有驻伪都的日军头目、特务机关长、宪兵队长、伪新京特别市副市长、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伪新京地方保安局长、参事、伪协和会首都本部事务长、伪新京高等检察厅日本人检察官等。

这一阶段，在长春的日伪军警宪特，除派出兵力，参加了对东北各地抗日武装的军事大讨伐外，也对长春及其周围地区的抗日志士及各阶层民众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与镇压。其具体事例为：

（一）1936年11月，由日本新京宪兵队队附西田指挥，以日本宪兵和警察40人负责警戒，将过去抓捕在押的抗日武装人员30名，用汽车拉至长春东北郊20公里的刑场，全部予以枪杀。

（二）1937年6月28日，在"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伪皇宫护军与制造事端的日人发生纠纷，护军兵士踢死日人放出咬人的狼狗。随后，日本"新京"宪兵队出动，驱车闯进伪皇宫内，强行抓走护军11人，进行严刑拷打逼供，并以"反满抗日"之罪名，威胁溥仪把这11名护军赶走。不久，又将护军改编成伪警察队。

（三）1938 年 10 月，日本殖民统治者为防止黄金流入华北，指派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对长春市的金店业进行大搜查，将天宝、洪兴等大金店经理及店员 20 余人抓去，没收黄金一批，并对天宝金店罚款 30 万元。结果使长春金价上涨，金银首饰匠 600 余人失业。

（四）1939 年 7 月，伪首都警察厅敷岛警察署等日伪警察，先后逮捕了在牡丹江哗变入苏境又返回长春及昌图、开原等地的 4 名伪军兵士。其中 1 名在押送途中跳车身亡，其余 3 名被押至伪国都宪兵团审讯、监禁。

（五）1941 年 1 月 4 日，驻哈尔滨王岗的伪军第三飞行队一连人哗变，投奔抗联，遭到日伪军警的镇压。随后，伪国都宪兵团，按照哈尔滨伪第四宪兵团提供的黑名单，逮捕了在长春的伪军第一飞行队杜准尉等 40 余人，严刑拷打逼供，后因查不出实据而不得不释放。

此外，日伪还在长春及周围各县建立了一些"集团部落"和实行保甲连坐。1937 年度，长春县设有伪保 5 个、甲 33 个、牌 254 个，伪自卫团 254 个。双阳、农安、德惠、榆树、九台等 5 县共设保 100 个、甲 1 366 个。1938 年度，建立的"集团部落"，榆树县 326 个、双阳县 11 个，德惠县 6 个，长春、农安、九台县不详。

后期——以政治镇压为主 1941 年至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不断动摇和行将灭亡的殖民统治制度与体系，除调派较多的日伪军警对冀热辽地区进行疯狂讨伐和残酷镇压外，对东北其他地区，则实行以法西斯政治镇压为主的所谓"秘密防御战"方针。通过特务、密探等的恐怖统治，不断加剧其法西斯血腥镇压。其主要目标是捕杀反日党派、团体和知识界的爱国志士，同时也不放过对其他阶层民众的迫害。有时则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企图把抗日力量一网打尽。此外，一些特务活动还针对苏蒙的谍报人员。

这一阶段，长春的日伪军警宪特也和东北各地的一样，对各

党派人士和各阶层民众实行的法西斯镇压活动十分繁多，举不胜举。仅1943年至1944年的一年零7个月期间，其逮捕事件就高达4 600余件，平均每天8件多，逮捕人数为9 200余人。1942年末至1944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伪首都地方保安局进行的主要逮捕案件，计29件，共逮捕335人，其中附上判处死刑意见上送伪新京高等检察厅者27人，附无期与有期徒刑意见者197人，在保安局杀害者23人，送交日本"新京"宪兵队作细菌实验用的16人。现将几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事件列举如下：

（一）有关镇压反日党派、团体事件

（1）逮捕镇压反日团体

在日伪警特机关策划下，由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安井寻志为头目，组成以日本人警察为骨干的130余人的搜查队，于1941年12月30日夜，对在长春的爱国学生、职员、文艺工作者组成的秘密团体"铁血同盟"、"恢复会"、"青年读书会"等进行大搜捕，共捕去数十人。翌年3月下旬，日本宪兵队又逮捕了长春的伪建大学生反日团体的成员17名。其中折磨致死者10余人。

（2）逮捕中共地工人员

1944年1月，日本"新京"宪兵队在长春逮捕了自1939年由中共山东分局派至长春的地工人员李友云。李经不起考验，供出了一些机密，并为敌人服务，使中共地工人员李振邦、王玉枝等先后被捕。

（3）逮捕国民党地工人员

1944年4月，伪首都警察厅特务警察60余人，由副总监三田正夫指挥，逮捕了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主任石坚等100余人。数日后，又根据被捕人员供出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一些情况，从5月至8月，相继在沈阳、营口、盖平、哈尔滨等地，逮捕了

380余人。部分人被判刑，其中被处死和折磨致死者多人[1]。

（二）有关镇压知识界爱国人士事件

（1）大同剧团事件

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以“宣传反满抗日思想”为罪名，将设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文化宣传部内的大同剧团团长赵刚和部分演员逮捕，经严刑审讯，赵刚被折磨致死[2]。

（2）传单漫画事件

1942年冬，长春市内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反日传单与漫画。日伪出动了大批警察，对伪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师道学院、音乐院、文化国高等学校师生进行大肆搜捕，抓去师生100余人，其中一些人被关押进伪司法部的“思想矫正局”，或入劳工大队，继续加以迫害与奴役。

（3）逮捕王则事件

王则是“满洲映画协会”（即“满映”）的主要编导之一，曾为编导一些进步影片奔走于长春与天津、上海之间。1944年春，当王则乘坐火车从长春至天津的途中，遭到伪首都警察厅特务警察逮捕。敌人严刑审讯、逼供，王则坚贞不屈，拒不承认任何反日活动。后被折磨6个月，病死。

（4）逮捕王天穆事件

1944年5月，伪首都警察厅和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的警察特务，逮捕了伪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的《青年文化》杂志社总务部长兼《青年文化》、《协和青年》等刊物主编王天穆及编辑共11人，经酷刑折磨后，全部被秘密处死。

（5）初光剧团事件

1944年夏，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以“编演反满抗日内

---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第625—652页。中华书局，1988年8月。

② 于堤：《长春人民抗日斗争部分史料》，《长春史志》，1990年第2期，第29—30页。

容的剧目”为由，将初光剧团团长初光及演员30余人逮捕。

(6)逮捕张辛实事件

1944年秋，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以公演的话剧《沙沉》有反“满”抗日内容为由，将“满映”话剧团编导张辛实及妻、妹等人逮捕。

1941——1944年间，日伪警宪特机关，共逮捕有爱国思想的作家、记者、编辑、画家、编导、出版业者等100余人。有的判刑，有的杀害，有的送至“司法矫正局”进行“思想矫正”，有的押送到中苏边境修筑工事，难得生还。

(三)有关镇压市民事件

(1)东大桥菜市场事件

1942年6月，因东大桥菜市场的日本人评购员打骂、欺压、刁难菜民，引起菜民不满，群起痛打了这名日本人评购员。伪首都警察厅长通、和顺两警察署警察则大肆搜捕菜民群众，先后共捕去100余人，审讯逼供后将5人处以徒刑。

(2)关东军仓库失火事件

1943年秋某天夜里，关东军仓库发生大火，烧毁了大量军用物资。日伪当局认为这是“有计划的谋略放火”，由日本“新京”宪兵队及各分队，将居住在仓库周围大房身机场一带的居民，以“放火团嫌疑罪”，大加逮捕审讯。

(3)勒死日本人警长事件

1943年11月，伪四道街警察署的一名日本人警长，在南岭被人勒死。伪首都警察厅组成4个搜查队，进行侦捕“犯人”。抓去裕昌粮栈店主和10余名农民，进行严刑拷打逼供，打死一名拒不承认的农民，然后在制造的假供认书上印上死者手印。并制造假死亡诊断书，以得传染病为名，将尸体烧掉。其余的人被屈打成招，判了徒刑。审讯期间又折磨致死2人。

(4)打死日本人警尉事件

1944年冬，伪顺天警察署一日本人警尉，在牡丹公园被人

用扁凿子打死。日伪派警特大肆逮捕中国民众。其中从陶赖昭抓来一名青年木匠，被重刑折磨致死。又从宋家洼子抓来数名木匠，严刑逼供，并加以监禁。

4、伪协和会在长春的反动活动

伪协和会的设立 伪满政权建立后，曾经参加建立伪满政权的一部分日本法西斯分子，并没有捞到权益，仍处于在野的地位。这部分人并不甘心，依然在下面活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原"满洲青年联盟"的骨干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等人，他们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以期辅佐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支持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首肯，遂于1932年4月1日，在沈阳举行了结党宣誓，初名为"满洲协和党"。但是由于虚伪标榜"无党无偏"政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同意用"党"的名称，遂改称为"协和会"。于是，经关东军几名参谋和原"协和党"要员的积极筹备，便于1932年7月18日，在伪满国务院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伪协和会的创立宣言、纲领、章程和"役员"名单。确定由伪满执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名誉顾问，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任名誉理事，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任会长，伪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任理事长，下设理事33人，分由伪政府内的汉奸与日本人官吏充任。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于当年7月25日，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召开了伪协和会成立大会。本庄繁、溥仪以及满铁、关东厅的头目出席了会议。会上，溥仪致训词，打出反对"政党政治"的招牌，鼓吹"王道政治"与"五族协和"。会上，还正式颁布了伪协和会的创立宣言、纲领和章程等文件。其创立宣言提出：创立伪协和会的宗旨是"遵守建国精神，以王道为主义，致力民族协

和”,用此来巩固伪国的“基础”,并排除“遭受资本主义重压”、“共产主义扰乱”和“三民主义欺瞒”等祸害[1]。其纲领共提出三条,即:(一)宗旨:以实践王道为目的,铲除军阀专制之余毒;(二)经济政策:通过振兴农政,致力于产业改革,以保障国民之生存;(三)国民思想:重尚礼教,乐于天命,谋求民族协和与国际和睦[2]。其章程共 11 章 35 条,规定了伪协和会的目的、委员会及理事会、中央事务局、政经调查会、分会、联合协议会等机构及其权限。从伪协和会的创立宣言、纲领和章程可以看出,关东军设立伪“协和会”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它鼓吹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振兴经济”、“民族协和”等殖民论调,排斥与诋毁反日和一切进步思想,用以欺骗与毒害中国东北各族人民,掩盖其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实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民族压迫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实质。

伪协和会成立大会后,先在沈阳设立了中央事务局,随后,又陆续在沈阳、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热河、延吉、呼伦贝尔等地设立了地方事务局。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局长为伪外交部总长谢介石,次长为伪民政部总务司长中野琥逸。伪中央事务局委员共 10 人,中日人各半,由日人掌握实权。1933 年 3 月 15 日,伪中央事务局由沈阳迁至长春,设在“满铁附属地”中央通(今斯大林大街北段)东侧,后迁至伪协和会馆(今斯大林大街 76 号,吉林省军区第二招待所址)。

伪协和会的改组与扩大　伪协和会成立后,为调整它与伪满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日本殖民统治效力,先后进行了多次改组。第一次改组是 1934 年 9 月,即在伪满实行“帝制”不久,正是伪协和会得到初步发展时期。到 1934 年初,在中央事务局下设有 7 个地方事务局,37 个办事处,有 900 个分会,30 万

---

① 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第 185 页。

②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 125 页。

会员。但是，由于伪协和会在农村中大量地吸收了地方实力派人物，使之与伪满政权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与对立。当然也影响了伪协和会上层与伪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次改组的目的，就是企图使伪协和会与伪满政权机构"一体化"。改组的内容为：将中央事务局内的总务、组织、宣传、审查4处，改为庶务、组织、社会、经理4科；设立中央事务局委员会，委员会内设视察室与调查室，中央事务局委员会由原10人增至15人。中央事务局的头目进行了更换，在野的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等5人退职，换上了一些伪满政权机构的官吏。如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兼任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伪国都建设局总务处长结城清太郎任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专职委员等。1935年9月，由原"满洲青年联盟"干将平岛敏夫接替阪谷希一，专任中央事务局次长，伪民政部大臣吕荣寰任中央事务局长。

第二次改组是在1936年7月25日。当时正值伪协和会成立4周年之际。改组的目的仍然是调整伪协和会与伪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次改组重新制定了纲领、章程和工作方针。新制定的纲领规定：伪协和会是"唯一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它的任务是："传扬建国精神，实现民族协和，振兴国民生活，彻底宣德达情，完成国民动员。"这一纲领较之以前的纲领增加了"彻底宣德达情"、"完成国民动员"等两项任务，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功德"，彻底地灌输到东北各族人民群众之中，把东北各族人民"动员"起来，使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效力。按照伪协和会的新纲领和章程，在机构和人事方面都作了一些变动。以中央本部为最高指导机关，设立中央本部委员会代替以前的理事会，并设立中央本部的咨询机关。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任会长，伪大同学院院长井上忠也任中央本部长。中央本部的事务机构设有总务、指导、企划、监察4部，分由日人平岛敏夫、中野琥逸、半田敏治与和田劲担任部长。在伪都，还设有中央事务局直属的"临时新京

特别工作委员会”，以便强化伪都新京的“协和会”工作。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半田敏治。此外，还将县、旗的办事处改为县、旗本部，并在伪首都及其它一些市设立了市本部。1936 年 9 月，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发表了伪《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宣称：伪协和会是用所谓“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实现其理想”的“唯一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这一声明，突出地阐述了伪协和会与伪政府的关系及反动作用，即伪协和会不是伪政府的从属机关或对立机关，而是伪“政府精神之母体”，伪政府是以“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为基础组成的机关，而真正的伪协和会会员，均应在政治、经济、思想上以“建国精神”为指导，完成对全体“国民”的动员，来实现其法西斯殖民统治。通过这次改组，不仅使伪协和会提高了地位，而且还扩大了组织，增加了反动活动。至 1936 年 9 月末，伪协和会有分会 1 800 余个，会员 43.9 万余人[①]。其中，在伪都有分会 47 个，会员 4.2 万余人。

第三次改组是在 1937—1938 年，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的需要，为强化伪协和会的毒害与欺骗作用而进行的。1937 年 4 月，伪协和会中央本部进行了人员调整，由曾任伪民政部警务司长的甘粕正彦任总务部长兼企划部长（后总务部长由皆川丰治接任），伪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长古海忠之兼任指导部长，只有监察部长仍为和田劲。5 月，中央本部长井上忠也退职，于静远继任。8 月，中央本部为统一伪协和会内部的认识，制定了新的会员规则和分会组织规则。以前的协和会会员分为普通会员、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 3 种，各种会员入会都有严格的规定。新的会员规则则对会员作了统一的要求，规定：“凡致力于完成本会目的，年满 20 岁以上，身心健康的满洲帝国人民”，均可成为会员。1938 年 2 月以后，中央本部机构与人员又有新的变动，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 160 页。

本部长由伪满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充任;在中央本部下设企划局、总务部、实践部、辅导部和审查官室,各局部室头目均由伪政府的现职官员充任。总务部长为皆川丰治,企划局长为松木侠。此外,还对伪协和会的章程及中央本部规则作了部分修改。通过这次改组,加强了伪协和会的自身管理和思想统一,增强了伪协和会的反动职能,也进一步扩大了伪协和会的组织,增加了会员。1938 年 11 月末,计有省本部 17 个,市、县、地区本部 123 个,分会 3 200 余个,会员 113.7 万余人[①],较 1936 年 9 月末增加分会 1 300 余个,增加会员 69.8 万余人。其中,设在伪都的分会 130 个,会员 9.9 万余人,较两年前增加分会 83 个,增加会员 5.7 万余人[②]。

第四次改组是在 1941 年 4 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与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为确立战时体制,要求伪满实行"国民总动员",因此又对伪协和会进行了改组。在 1941 年 4 月之前,就进行了部分人事更动,三宅光治接任中央本部长,总务部长皆川丰治升任副本部长,甘粕正彦再次就任总务部长。这次改组的特点是,彻底实现伪满政府与伪协和会"表里合一"的"二位一体制",伪满中央政府的官吏同时也是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官吏,伪满各省省长与次长,同时也是该省伪协和会的正副部长,伪市、县、旗长及副市、县长、旗参事官,同时又是该市、县、旗伪协和会的正副本部长。这样,就使伪政府的官员具有了"国民运动指导者"的资格,伪协和会也就成了"官民一体"的机构,从而加强了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中央本部内,将原设的一局三部一室,改为总务、指导、训练、调查四部,总务部下设三个科,指导、训练、调查等部分别设立了 5 个班、4 个班和 5 个班。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下,还设立了协和青少年团总监部和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 160 页。
②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 168 页。

协和义勇奉公队中央总监部等机构。通过这次改组，使伪协和会又进一步扩大了组织与增加了会员。至 1942 年 5 月，伪协和会本部增至 189 个，分会达 4 290 余个，会员达 289.4 万余人[①]，比 1938 年 11 月，增加本部 49 个，增加分会 1 000 余个，增加会员 175.7 万余人。其中，在伪都新京的分会为 164 个，会员人数达 9.8 万余人。比 1938 年增加分会 34 个，减少会员约 0.1 万人。

为了更好地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伪协和会又于 1944 年 1 月，于中央本部委员会下设立了常务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与第二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负责思想、民族、防卫等项，第二委员会负责经济、民生等项，常务委员会则对第一、第二委员会所决定的问题进行综合审议。1943 年 3 月、1944 年 5 月和 1945 年 2 月，先后制定了伪协和会运动的基本纲要，战时工作要纲和行动纲领等文件，妄图不断强化伪协和会的反动职能，使之更好地为太平洋战争效力。到 1944 年之后，伪协和会更加膨胀，其分会增加到 5 185 个，会员人数达 428 万余人，占当时东北人口总数的 14%以上。

伪协和会在伪都的反动活动　伪协和会自 1932 年成立到 1945 年瓦解，一直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效劳，直接插手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反动活动。概括起来，大体可分如下三个阶段：

(一)1932——1936 年

这阶段的反动活动主要有：创办反动刊物，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反动宣传；参与关东军在东北各地镇压抗日武装的活动，进行搜集情报、策反、招降等破坏工作；大肆进行反对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活动。其中，在伪都新京进行的反动活动举例如下：

(1)由设在伪都的伪《大同报》协和会，主办《国民文库》，进

---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 215 页。

行所谓"王道政治"、"五族协和"的反动宣传。

(2)1934 年 3 月，在伪都召开了伪协和会第一次全国联合协议会，宣誓"效忠帝制"。此后，每年在伪都举行一次全国联合协议会，进行所谓"宣德达情"活动。

(3)1935 年 12 月，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调查室开始发行《工作日报》，翌年改为《协和会志》，继续出版发行。

(4)1936 年 8 月，在伪都开始动工修建伪协和会馆，至翌年 7 月建成。

(5)1936 年 12 月，伪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排共"活动作为伪协和会开展的"国民运动"来进行。翌年 1 月，又在中央本部设立"青训指导委员会"，企图把青年训练成反共先锋。

(二)1937——1940 年

这一阶段伪协和会的反动活动更加繁多，主要有：继续充当日伪军警镇压与瓦解抗日武装的帮凶；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大搞"奉献劳力"、"捐献钱财"等"国民运动"，支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加强对青少年的毒害与奴役活动等。在伪都新京的反动活动也不少，摘列如下：

(1)1937 年 8 月 23 日，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在伪都"大同公园"举行"国民大会"，声援日军侵占我国华北。

(2)1937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伪协和会两次派遣"慰问使节团"，对侵驻华北的日军及伪军进行"慰问"。

(3)1938 年 10 月 25 日，伪协和会在伪都协和会馆举行"日德意防共协定"成立纪念排共大会。

(4)1938 年 11 月 3 日，伪协和会在伪都设立"首都协和义勇奉公队"，负责伪都的防卫、警护与"奉仕"等项任务。同时，为加强对伪首都及其它城市"义勇奉公队"的训练，还在伪都设立了伪协和会中央训练所。

(5)1940 年 10 月 1 日，伪协和会于伪都的军人会馆，召开

对苏思想战计划会议。根据这次会议决定，当时选拔了伪协和会中央训练所毕业生15名，组成对苏思想战主要人员培训班，进行5个月特殊训练后，分配到中苏边境各县的伪协和会本部。

（三）1941——1945年

这一阶段，伪协和会反动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日伪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除配合日伪军继续镇压与瓦解抗日武装，大搞“金属献纳”、“粮谷出荷”、“储蓄报国”、“北边振兴”、“开拓移民”等“国民运动”，奴役与毒化青少年等方面外，还积极插手于伪满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操纵其他外围组织等方面。如插手于“国民邻保组织”，实行“村治一元体制”，使协和会的地方分会直接控制基层大权。同时负责指导“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以及指导与监督“佛教会”、“回教会”、“基督教会”、“道教会”、“红卍字会”、“慈善会”等。这期间伪协和会在伪都新京的反动活动尤为繁多，现摘列如下：

（1）1941年7月25日，伪协和会在伪都召开伪“首都协和会青年自兴大会”，旨在掀起奴化青年的“自兴”运动，即谓：“重新认识建国精神”，“发现骨干”，“强化协和会组织”，“自发地推行协和会运动”的发展，以扩大伪协和会的反动作用。

（2）1942年1月，伪协和会决定对“青少年团”和协和“义勇奉公队”进行“国民训练”，以促进效忠日伪当局的“奉仕运动”。于同年6月8日始，驱使在伪都的“青少年团”与“义勇奉公队”对“忠灵庙”进行了“奉仕”劳动。

（3）1942年10月，伪协和会在伪都召开“全国联合协议会”，研讨农业增产，“粮谷出荷”等多项问题，以加强对农业的掠夺。

（4）1942年11月3日，伪协和会在伪都协和会馆召开了伪满“全国”“自兴村”恳谈会，总结“自兴村”运动的体验与教训，商讨推动“自兴村运动”的方法与政策。

（5）1943年7月，伪协和会在伪都召开了“兴亚运动总崛起

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伪协和会外，还有日本的“兴亚总同盟”、朝鲜的“总力同盟”、华北的“新民会”、南京的“东亚联盟”、蒙疆的“兴亚青年同盟”等团体的代表共100余人，用以“动员民族协和全力，誓为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而战。”

(6)1944年1月31日，伪协和会在伪都召开全伪满的协和会员大会，通过了战时紧急农畜增产运动实践事项、矿工增产运动实践事项，“国民”储蓄增强运动实践事项等决议，以图掀起增加战力的“全民”运动，来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

(7)1945年2月20日，伪协和会在伪都召开了第四次全伪满的会员大会。颁布了伪协和会的《战时行动纲领》，计15条，要求伪协和会会员，要“竭尽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宣扬的“大东亚共存共荣”而“挺身”、“奉公”①。

伪协和会的性质与特点 从伪协和会的创立、改组和反动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伪协和会的法西斯政党的性质。尽管日本殖民者通过改换名称的各种掩饰性的表述，但也无法隐瞒与改变伪协和会的反动性质。大量的事实表明，伪协和会是在日本关东军一手操纵下，深入到中国东北各民族各阶层各个领域的，旨在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法西斯政党组织，是与伪满政权“表里合一”、“二位一体”的参政党。

伪协和会作为法西斯政党组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官办的。伪协和会虽然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团体”，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官办的组织。它的出现是关东军一手操办的，它的宣言、纲领与章程的制定与修改，也都是按照关东军首脑旨意进行的。它的领导人开始就有相当数量的日伪官吏，后来则全部头目都由日伪官吏来充任，就连伪满的基层政权，也控制在伪协和会的基层分会头目手里。

---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149—156、175—187、229—234页。

第二，它有很大的欺骗性。在伪协和会的许多文件中，都曾用不少美丽动听的言辞，把伪协和会说成是“造福”于东北人民群众的团体。但在实际上这些都是用于欺骗的，即用这些骗人的言辞来腐蚀与毒化东北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以掩盖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本质。就拿其宣扬最为卖力的“民族协和”来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民族平等团结和睦可言的。有的只是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他们为东北各族的“核心”、“领导者”和“主人”，他们可以高高在上，号令一切，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实行极其残酷的民族压迫。而原在东北的汉、满、朝鲜、蒙古等各个民族，只能对日本人毕恭毕敬，俯首称诺，逆来顺受，任其宰割和驱使。这就是“民族协和”背后的真实写照。

第三，它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遍布于东北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角落。从伪协和会的组织系统看，既有中央本部，又有省、市、县、地区本部与支部以及大量的分会；从分会种类看，既有行业分会，又有乡村分会，也有按地区、部门、职业、民族、宗教等设立的分会。至1938年11月，共有分会3 218个，其中属于地区分会2 480个，部门分会511个，职业分会165个，民族分会56个，宗教分会6个，其他团体分会2个。从会员的民族成分看，其中“满洲人”(包括汉族、满族)96万余人，朝鲜族4.1万余人，蒙古族4 600余人，白俄2 800余人，另有侵入东北的日本人会员12.8万余人。

总之，伪协和会这个法西斯政党组织是无孔不入的，它是深入东北各民族各阶层各区域中进行腐蚀、奴化和残害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法西斯毒瘤，其流毒很深，遗患甚广。

5、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的罪行

第一〇〇部队的设立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设立的两个细菌战基地中的一个，地点在长春西南郊孟家屯。另一个是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设在哈尔滨东南郊平房。这是在1933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违背国际公法，把在日本东京建立的细菌战机构——“防疫研究所”迁至东北之后，又根据天皇裕仁的敕令而在东北设立的。初名为“关东军兽类防疫部”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0年后又分别密称“第一〇〇部队”与“第七三一部队”。这两支细菌部队都从事细菌研究、实验和制造细菌杀人武器的罪恶活动。所不同的是，第七三一部队以活人作细菌研究的实验材料，而第一〇〇部队既用牲畜作实验材料，也用活人作实验材料。

设在伪满首都新京市郊的第一〇〇部队，前身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成立于1931年11月，设在沈阳。1932年10月迁至长春二道沟，不久改名为临时病马厂，并于1933年秋开始了细菌研究与实验活动。1936年，根据天皇裕仁的敕令，改在孟家屯设立第九十三号军事基地（即细菌战基地），名为“关东军兽类传染病实验局”，又称“兽类防疫部”或“兽疫预防部”，也叫并河部队（部队长并河才三）。1940年改称为第一〇〇部队，1941年8月，若松有次郎少将出任部队长后，又被称作“若松部队”。直接管辖第一〇〇部队的机关是关东军兽医部，直接负责领导该部队活动的是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中将。

第一〇〇部队本部与分支机构 第一〇〇部队本部营地，即细菌工厂设在孟家屯（现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厂址），始建于1936年，到1939年建成。占地约2平方华里，1943年之后，又低价“收购”附近农民的大片良田，扩大为12平方华

里。该部队的机构和第七三一部队相似，在司令部下设有五部与总务部。第一部主要是研究鼻疽、炭疽热、传染性贫血等导至牲畜迅速死亡的各种病毒，以确定各种病症及其效能和传染方法。第二部是一〇〇部队的主要部门，主要是研究、实验和制造细菌武器及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具体又分6个分部：第一分部的是细菌分部，主要是实验、繁殖炭疽热、鼻疽、锈菌、羊痘、牛瘟等各种病菌；第二分部是病理学分部，主要是进行病理研究；第三分部是实验管理分部，主要是管理与繁殖实验用的动物；第四分部是有机化学分部，主要是实验与制造化学毒性药物；第五分部是植物学分部，主要是研究用细菌毒害农作物；第六分部于1943年12月设立，分来第一分部一些工作，是专门负责研制各种细菌武器和如何进行细菌战的方法。第三部是牲畜防疫。第四部是动物饲养。第五部是负责教育培训从事细菌工作的技术人员，又称五三一部队。总务部下设研究、设计等分部以及占地20公顷的牧场和占地60公顷的实验农场等。在各部与分部内，还分别设立一些细菌室、孵卵器室、冷藏库、培养室、小动物室、消毒室、化验室、制剂室、解剖室、实验室、病理研究室及特种仓库、禁闭室、火化场、养畜房等。整个从事细菌战的人员约600—800人，其中2/3的人员是兽医、医学、生物学、细菌学、化学等方面的专家或技术人员。这所细菌工厂的生产能力相当大，据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供认，1941年后，该部队一年内可生产炭疽热菌1 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供应实验材料的方法，除牲畜外，其活人，则是由日本宪兵队经过“特别输送”，把其由外地运至当地，然后再装进挂着黑布窗帘的“特别囚车”乘夜秘密送进这个细菌工厂。

第一〇〇部队除设有本部外，还在大连、拉古、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四平等地设有支队。在关东军所辖的一些军团中，还设有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在克山、东安、东宁、鸡宁、四平等地区。这些兽医部队的长官，大都是从第一〇〇部队内派去的细

菌学专科医生。这些支队与兽医部队，都密切配合第一〇〇部队本部，积极研制与实验细菌武器，可以说是第一〇〇部队本部的分工厂。一旦战争扩大时，这些分支与兽医部队，都将要生产更多的细菌和烈性毒药。

第一〇〇部队细菌杀人害畜罪行 第一〇〇部队虽然名为兽疫预防，实则干着实验与研制杀害人和牲畜的细菌和各种毒性药物，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在进行细菌实验时又是人畜并用。因而，不仅毒害了大批牲畜，而且也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中国民众。

在用细菌毒害牲畜方面，被毒死的牲畜是大批的。这里仅举几例：

例一，1943 年夏，第一〇〇部队兽医平樱全作按照第二部长穗坂的命令，用氰化钾和马前霜碱等毒物，对 45 匹马进行实验，结果毒死了 10 匹[①]。

例二，1944 年 6 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关东军责成第一〇〇部队，派出一支赴海拉尔地区的"远征队"，侦察与搜集当地的居民点、道路、牧场、贮水池、牲畜饲养数目与分布等情报。翌年夏，关东军又拨款 8 万日元，在该地区购买了 100 头牛，500 只羊和 90 匹马，暂时存养在附近的山沟里。准备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即对这些牲畜使用炭疽热、牛瘟、鼻疽等病菌进行感染，然后把这些病畜驱入苏联境内与边境地区，使当地牲畜染上各种病毒，企图在中苏边境制造大面积感染区，造成牲畜大批死亡，从而造成混乱，以破坏苏军的进攻[②]。

例三，1944 年 9 月，第一〇〇部队在安达站第七三一部队

---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50—351 页。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80 页。

的特殊靶场，以300头牛马作实验材料，用飞机撒下毒菌，进行细菌和烈性毒物实验演习。结果，使这300头牲畜全部被毒死①。

在用细菌杀人方面，虽无确切数目，但从以下的许多事实来看，被毒害的我国同胞也是很多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几名日本从事细菌战活动的当事者的供述。从这些供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亲自参加了制造细菌武器的勾当，并参与或目睹了用活人作细菌或毒药实验的具体活动。他们的供述如下：

原第一〇〇部队兽医福任光供述："第一〇〇部队是用许多细菌学工作员、化学家、兽医和农艺家配合起来的一个试验工作队"，"该部队及各支队人员曾进行一种科学研究工作，……专门探求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物来大规模歼灭牲畜和人命的方法"。"为了确定这种毒药的效能，曾用动物和活人来进行过实验②。

原第一〇〇部队实验员畑木章供述："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专门繁殖和培养传播鼻疽、炭疽热、牛瘟等兽疫的病菌"，"第一〇〇部队中曾用家畜与活人来试验细菌效能，所以在这部队内专门养得有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有一些活人"。"预备作实验的人被拘禁在一〇〇部队守卫所附设的禁闭室内，我送饭时见到禁闭四个人，两个中国人，两个俄国人。""当我从实验室里拿饭去给这些犯人吃时，科学工作员松井给了我一种白色药水，要我带去交给他们。这乃是毒药。""我并没亲自交给他们，而是由宪兵水野交给他们的。""我知道他们经过两三天后就死掉了。""我们把这几具尸体埋到了部队后面的牲畜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9页。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8页。

掩坑所那里。”①

原第一〇〇部队兽医平樱全作供述：“在第一〇〇部队内任职的细菌学家、化学家、兽医等都曾从事培养各种细菌、研究细菌特性，探求大量传染牲畜和人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第一〇〇部队内曾用活人和牲畜来进行过细菌与毒药效能的实验。”“1944年间，我从海拉尔回到部队去作工作报告，……当我……走入部队营房时，我遇见了科学工作员松井，他手里拿着盛有某种菜食的器皿。当我问他把菜食拿到何处去时，他回答说是拿到禁闭室去用活人进行实验的……。”②

原第一〇〇部队实验员三友一男供述：“我进入该部队后，住过炭疽热菌和鼻疽菌培养法训练班，曾用专门由我看管的孵育器，培养过此种病菌。”“我又多次参加过用动物和活人来实验我所培养出的致命细菌效能。”“1944年八九月间，我由科学工作员松井经考指导，在第一〇〇部队场内用七八个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进行过实验，在他们身上检验过毒药效能。方法就是把被我放上了毒药的食物发给这些被捕的人去吃。”“1944年8月末，我遵照松井指示，把一公分‘海洛因’放到一碗稀饭里，然后……发给一个被捕的中国人吃下。他吃下之后，经过30分钟就失去了知觉，再经过十五六个钟头就死掉了。”“我对某些被捕者每人进行过五六次实验，目的是要检验……‘朝颜’、‘海洛因’、‘巴克塔尔’和‘蓖麻膏’等毒药的效能。”“有个……俄国人在受实验之后，身体虚弱得已经不能用来进行这种实验了，松井叫我注射了一针氰化钾，把他毒死。这个人受到这种注射之后，马上就死掉了。”“其次有三个被捕者经我进行实验后，就由宪兵当着我面把他们枪毙了。”“用人进行实验一事是由四个人负责

---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11、417页。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79、333—334页。

进行的：指导一切工作的科学工作员井田，参加工作的有中岛中尉，实验员松井以及我。"①

其次，看一看曾了解一点细菌战情况的两名中国人的回忆。这两人的回忆也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地进行细菌战的罪恶行径。

其一，是曾任关东军司令部嘱托、伪满军事部嘱托、军事顾问部经济研究主任，并与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相熟的韩蔚。他通过金璧东之妹金璧辉（日本名叫川岛芳子）的介绍，结识了第一○○部队的中村吉二医生。据他回忆，在1941年6月，中村吉二邀他参观了第一○○部队的化验室、实验室和培养室等处。在一处地下暗室，他嗅到了"一股令人作呕又强烈刺激眼睛的恶臭"，看到了从用黑红布门帘挡门的一间屋子里，"推出一辆手术床"，上面用白布盖着"，高高叠起不少于三具的"尸体"②。韩蔚还回忆了曾任伪满驻冀东宪兵团翻译的郝玉衡对他谈起的在伪满垮台前，日军在秦皇岛的两次毒气演习情况。1945年6月，第一○○部队部分人员参加了在秦皇岛举行的日军驻冀东部队的军事演习。其中的一次演习，是先把两名在押的中国人放在指定地点，然后由低空飞行的飞机向他们施放毒气和化学毒品。结果，使这两人的皮肤被灼伤，呼吸困难，两眼睁不开。30分钟后，两人的皮肤上都长出扁豆大小的红斑。另一次演习，是由飞机投下无声炸弹，炸时产生一股黑绿色烟雾，笼罩着地面。30分钟后，烟雾消散，被害的中国民众呼吸困难，嗓子沙哑，晕眩、咳嗽、呕吐，口角流血沫，最后口流鲜血而死亡③。

其二，是曾在伪满军政部直属的陆军军需学校当过学员的李野光。他回忆说：1937年7月中旬，他和别的学员（包括日本

---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82—84、343页。

② 《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5—6页。

③ 《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9—10页。

学生和中国学生)曾一起去第一〇〇部队参观。在小动物室,他看见了水泥槽里饲养的供作细菌实验用的短尾野鼠。在陈列室,他看见了在粗大玻璃缸中用药水浸泡着的"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等人体各部位的标本。在另一陈列室,他还看到了曾在小五马路见过的布尔(吉卜赛)人被炭疽热菌感染而丧生的颜面照片[①]。此外,在营地外边他还看到了高大的烟囱中冒出"褐黄色的烟尘",嗅到了"混在空气中的焦臭气味"。

再次,看一看当地群众所见到的几个具体事例。这些事例也可以证明第一〇〇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一些罪行。

例一,在日本投降前夕,住在细菌部队附近的大广村农民阎洪喜,无端被第一〇〇部队军医抓去,强行注射了一针毒药。放回后,阎洪喜全家5口人都得了伤寒病,其中3人被夺去了生命[②]。

例二,大广村的农民刘方仁曾被第一〇〇部队抓去当苦力,他亲眼见到一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第一〇〇部队,诬说他得了传染病,将他浑身缠上白布,之后再未放出。日本投降后,刘方仁到被日本人炸毁的细菌部队残址去查看,发现在牲畜棚外有一个大炕,坑内还残存有没被掩埋掉的人头、手脚等遗骨。他还在焚尸炉旁挖出一个大竹筐,筐内则装满了人的骨灰[③]。

例三,1950年2月14日的《长春新报》登载了记者王亚晖访问大广村农民群众的报道:《孟家屯日寇细菌工厂纪实》。该报道说:"1949年春,当地老乡为了挖肥料上地,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也有人骨,后来越挖发现人的尸体越多,弄得大家谁也不敢挖了。挖掘出尸体的老乡们讲,有男有女,有穿黄衣裳的,也有穿蓝劳动服的。郑洪生老乡说:'掩埋场西边一里来地的一长条,

---

① 《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22—24页。

② ③ 《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33页。

完全埋的是人，'张子斌老乡讲：'不仅上面是人，挖到6尺到1丈深，还有人的尸体。'"[1]

例四，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后，第一〇〇部队还在继续作恶，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从事的细菌战罪恶活动，也还在继续贻害中国人民。如1945年8月20日，第一〇〇部队所属的二六三〇支队工作员木村等6人，竟在支队的马棚里，将鼻疽菌掺入燕麦里喂给60匹马，然后把这些马匹全部驱赶进附近的村庄。结果，使一些村庄的不少马匹都染上了鼻疽病[2]。再如，由于第一〇〇部队残存或逸出的带病菌的鼠蚤等原因，使长春宋家洼子与二道河子等地，在1945年秋发生了十分猖獗的传染病，造成了大批居民死亡。同年冬，又使孟家屯、石虎洞一带也蔓延了鼠疫，其病期竟长达数月之久。1946年9月的一次霍乱流行，长春共死亡民众8 456人[3]。

日本在长其他机构的细菌杀人罪行 除第一〇〇部队外，设在长春的日本千早医院、"新京"第二陆军医院、伪新京卫生技术厂、伪新京防疫所、伪大陆科学院所属的马疫研究处和关东军兽医部、伪马政局畜牧司、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伪新京医科大学等部门，也都与第一〇〇部队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事细菌战的罪恶勾当。这些单位的许多官吏和有关专家学者，也都在关东军的指挥下，参加了罪恶滔天的研制与实验细菌武器的活动。这些部门与人员相互配合，狼狈为奸，共同用细菌武器残杀我无辜的同胞。

实际的情况正是这样。如千早医院，除设有特殊传染病隔离所，大批收容鼠疫、霍乱等病人外，还常常向第一〇〇部队提供进行细菌实验的活体和解剖用的尸体，以补充日本宪兵队向第

---

① 郭世魁：《日本关东军一〇〇部队罪行访问记》，《吉林史志》1985年第5期，第39页。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16页。

③ 《长春史志》，1989年第1期，第17页。

一〇〇部队提供活人"实验材料"的不足。再如，伪马疫研究处，经常向第一〇〇部队提供炭疽热、鼻疽、腺疫、媾疫等毒力很强的细菌毒苗和人、畜的活体标本。该处的细菌研究室和病理研究室也常常提供给第一〇〇部队和第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实验使用。又如，第一〇〇部队则经常到各部门或东北各地进行采集菌苗，并让畜产兽医大学的学生和其他部门一些人员到该部队进行从事细菌工作训练，参加散布细菌和检疫等活动。这样，第一〇〇部队则为其本身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培训了一大批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人才"。此外，上述各部门的有关专家，也经常密切合作，共同进行细菌实验与病理解剖工作以及开展细菌战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总之，即以第一〇〇部队为中心，通过与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大肆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残酷杀害了中国东北的许多民众和大批牲畜。下面仅就细菌杀人方面摘举数例：

1.1938 年 7 月，伪新京卫生技术厂厂长阿部某，把带有鼠疫菌的昆虫，撒在长春兴运路和日本桥通一带的贫民区，随即引起了鼠疫的泛滥，蔓延。到 8 月下旬，发现患者 80 余人，嫌疑患者 400 余人。于是，日伪当局则派遣警宪把患者的房屋烧掉，并将患者与嫌疑患者收容到千早医院。其中患者死亡了 90%，嫌疑患者后被释放[①]。

2.1940 年 6 月，农安县城流行鼠疫，日伪统治当局从伪新京一些部门和第七三一部队派出 200 余人的防疫班去进行检疫。这些人到达农安城乡后，随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除随意打骂、隔离群众、烧毁民房外，还对许多患者与怀疑患者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其中，据当时任日本"新京"宪兵队情报系军曹的冈野今吾供认：被解剖人体者不下 50 名。此外，还有一些怀疑患者被注射毒菌药剂后被折磨而死。在当时防疫班统计的死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52—353 页。

亡者 295 人中，有不少人是被日军的细菌武器杀害的[1]。

3. 1940 年 9 月，日本"新京"宪兵队逮捕了三名中国工人，后转给陆军医院军医小管原武作药物实验。小管原武等人在这三名中国工人身上注射了空气和毒药，然后观察反映。结果把这三名工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当这三人濒临死亡时，日本军医便把他们的头颅砍下，并将其中一人尸体进行了解剖[2]。

4. 1941 年夏，伪治安部医务科卫生股长山本升，为探索斑疹伤寒菌的传染性能与效果，用伪治安部在押的中国人 12 名为实验材料，在他们身上用带有斑疹伤寒菌的虱子作实验。结果，使 8 人患病，连续发高烧五六天，体温达 39℃至 40℃[3]。

5. 1942 年夏，《青年文化》编辑赵仁昌被日本警察以"反满抗日"罪名逮捕，转送至千早医院密室监禁。一星期后，很客气地将赵释放。释放前，给赵注射了一针毒菌。结果，赵在三个月后便咳嗽吐血，5 个月后肺部全烂，随即死亡[3]。

6. 1942 年 9—10 月，由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师生组成的鼠疫防疫班，在长春二道沟三不管地区进行检疫，闹得人心惶惶，日夜不得安宁。这次检疫虽未发现多少真性鼠疫病人，却把倒在路上的中国民众诊断为疑似鼠疫，并先后强制收容了 130 余名"患者"，送至伪新京特别市立传染病医院。其中有近 30 人被作为鼠疫的活体实验材料而遭杀害。此外，还将该地的民房烧掉，强迫当地数千名居民迁至宋家洼子[4]。

上述的一系列事实，都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但是，这些事实只是日

---

①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52—353 页。

② 谢玉叶、刘于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未刊稿。

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吉林文史资料》，第 14 辑，第 25—26 页。

⑤《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54 页。

本帝国主义用细菌武器毒杀中国人民的很少一部分。究竟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一带的机构，用细菌武器杀害了多少中国民众，现在尚无确切统计，但就上述一些事例却完全可以断定，被细菌和烈性毒物吞噬生命的中国人民是相当多的。

三、经济统制中枢的资源掠夺

1、经济统制政策在长春出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我国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的物资供应基地，变成它销售商品，输出资本，掠夺资源的重要场所，利用其炮制的伪满傀儡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劫夺了东北的铁路、银行、工矿、海关等各个方面的权益，垄断了东北的交通、金融、重要产业和对外贸易等各个行业与部门。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全面深入地控制中国东北的经济，更多地掠夺资源，变中国东北经济为日本经济的附庸，又在东北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政策。

炮制《经济建设纲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统治部（后改为特务部）就和满铁经济调查会一起，精心策划对伪满的经济政策，经过近一年半的时间，炮制出了一个《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于 1933 年 3 月 1 日由伪满政府公布。

这个《纲要》，由十个部分组成，第一为序言，第二为经济建设之根本方针，第三为经济统制之方案，其后以次为交通、农业、矿工业、金融、商业、私人经济等，最后为结论。其核心内容集中在第二、三部分。在第二部分中提出了伪满经济建设的四大根本方针：“一曰：以国民全体利益为其主眼，凡开拓利源，振兴实业之利益，务摈除一部阶级垄断之弊，必使万民咸享其利而同其乐。二曰：举国内天赋之所有资源，开发无滥，而谋经济各部门之

综合的发达，特于重要之部门，施以国家之统制，切实讲求合理之计划。三曰：当开发利源，奖励实业之际，本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精神，广求资金于世界，尤应采取先进各国之技术经验，并搜集一切文明精华，利用弗遗，以收实效。四曰：以东亚经济之融合与'合理化'为其鹄的，先审查满日两国相依相辅之经济关系，而注重其谐协，使相互扶助之关系益加紧密"[1]。这四条根本方针，除其"以国民全体利益"为"主眼"，"摈除""阶级垄断"，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广求""外资"和"先进""技术"，实现"东亚经济""融合"等等漂亮词句和难以实现的口号之外，其实际内容则是：通过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变我国东北经济为殖民地经济，使东北经济服从和服务于日本经济的需要，并依附于日本经济。《纲要》的第三部分，提出了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的原则，即：(一)对"带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要以公营或令特殊公司经营"；(二)对其它产业及资源等各种经济事项，则"委诸民间自由经营"，但对"生产消费两方面"要"施以必要之调剂"[2]。

落实《经济建设纲要》的措施　伪满《经济建设纲要》，虽然正式规定了经济统制的方针政策，但只是规定了一些较为抽象的原则，对统制的范围、方法等等尚不够明确，因而未能吸收到大批日本资本家的勇跃投资。由此，为了落实《经济建设纲要》所规定的经济统制政策，弥补其不足之处，日本殖民统治者，于 1934 年 6 月，通过伪满政府发表了《对一般企业的声明》，提出了对"国防"上的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工业，包括交通通讯、钢铁、轻金属、采金、煤炭、石油、汽车、制碱、伐木等产业，要实行特别统制，而对其它的一般产业，只根据该产业的性质，加以某种行政上的统制，广泛欢迎民间投资经营。同时，还提出划分统制企业与自由企业的界限，即：(一)由

---

①　②　伪满洲行政学会编：《满洲新六法》，[产业]，第 1 页。

"国营"、公营或"特殊会社"经营的事业，共22种，包括特殊银行、邮政、铁路、电报电话、航空、采金、林业、矿业、钢铁、石油、电业、兵器等；(二)须经许可的事业，共24种，包括普通银行、保险事业、地方铁路、汽车、海运、渔业、硫铵、制盐、制碱、烟草、棉花加工等；(三)可以自由经营的事业，共20种，包括农牧、农产品加工、制糖、制粉、酿造、油脂、纺织、食品、皮革、造纸、机械工业等。

为了进一步落实伪满《经济建设纲要》提出的经济统制政策，变中国东北经济为日本经济的附庸，日伪又于1935年7月15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南次郎和伪满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在长春签订了《关于设置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的协定》，同时，在长春成立了"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委员会计有委员8人，日伪各半。日方人员有：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局总长、驻伪满大使馆参事官和一名关东军顾问；伪满方面人员有：伪财政、外交、实业部三名大臣和伪总务厅长官。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担任。该委员会虽然按其规定，它是对日伪两政府有关重要经济事项进行"咨询"的机构，可以提出意见与建议，但在实际上它是由关东军指挥，凌驾于伪满政府之上，为加强其殖民地经济掠夺的统制机构。可以说，"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的设立，一方面标志着东北殖民经济的初步形成，同时也促使东北经济完全纳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

实施《重要产业统制法》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同时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以便加速变东北为战争物资供应基地的过程。为此，于"七·七"事变前两个月，即1937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政府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比较详尽地规定了对重要产业的经济统制政策。该法共14条，其主要内容是：凡属有关经营重要产业，以及从事重要产业方面的活动，诸如产业的种类、规模、计划、设备、财务以及产业的扩大、转让、合并、休业、解散等等，都

必须经过主管部“大臣”的许可，都要受主管部“大臣”的监督。违反者就要给予处罚，轻者处以 5 000 元以下的罚金，重者则由主管部“大臣”撤销其经营重要产业的许可。

在发布《重要产业统制法》的同时，伪满政府还发布了《关于施行重要产业统制法之件》，规定了重要产业的种类，计有兵器、飞机、汽车、液体燃料制造业、铁、钢、铝、镁、铅、锌、金、银及铜之精炼业、煤炭业、毛织物及棉织物制造业、棉纱、麻纺织业、麻制线业、制粉业、制酒业、制糖业、制碱业、烟草、苏打、化肥、纸浆、水泥、火柴等制造业和油坊业等 21 种。同时对各个产业的主管部“大臣”也作了明确分工。

《重要产业统制法》及其《施行之件》的公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政权干预经济，给予了法律依据，加强了对重要产业的统制。随后，伪实业部、蒙政部、军政部、财政部等又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施行规则》，用以贯彻落实《重要产业统制法》。

《重要产业统制法》，扩大了产业统制的范围，除了涉及日本帝国主义所企图掠夺的战略物资外，还包括了部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如与其 1934 年 6 月的《对一般企业的声明》所规定的统制范围相比，则将原属自由经营的水泥、造纸、纺织、制糖、制粉等产业也纳入统制圈内。这样，便使日本殖民统治者，可以通过对重要产业的统制，一方面可以保证大量掠夺中国东北的战略物资，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不冲击日本国内经济，而使日本的轻纺织品可以充斥中国东北市场。

为了加强经济统制，日伪还加强与充实了一些统制机构，制定与实施了一些统制法令。主要的是 1938 年 7 月，伪满政府于伪国务院内成立了企划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伪国务总理大臣监督下，负责综合审议产业、经济统制政策，是伪满经济统制的中心机关。伪企划委员会会长由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担任，干事长由伪总务厅企划处长充任。该委员会内还设有汇兑、物资物价、金融贸易、劳动等委员会，分别审议管理各方面的事务。同时又公

布与实施了《汇兑管理法》、《贸易统制法》、《临时资金统制法》、《劳动统制法》、《物价物资统制法》等法令，用以加强对汇兑、金融、贸易、劳务和物资物价等方面的统制。此外，日伪还在农业方面制定实施了一些统制法令，建立一些统制机构，对粮食和油料作物等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领域实行了统制。

推行各项战时紧急经济政策　1941年12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伪满的经济也随之进入了“战时体制”。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政府于战争爆发后的14天，即1941年12月22日，发布了《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要求进一步强化对伪满的经济统制，控制从日本输入资材，减少伪满国内的粮食分配，保证与增加钢铁、煤炭、液体燃料、轻金属、非铁金属、农产品等的对日输出，以“充分满足战时紧急需要”。

接着，于1942年10月6日，伪满政府又公布了《产业统制法》，代替1937年5月公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新的产业统治法较之以前的重要产业统制法，大大扩展了产业统制的范围，不仅对重要产业要实施统制，而且对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并把经济统制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领域。

此后，伪满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农产品强制出卖法》、《物品销售业统制法》、《配给统制要纲》等法令，进一步加紧了经济统制与资源掠夺。到伪满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几乎对东北的一切产业、一切资源，都实行完全彻底的统制与掠夺。

2、垄断各行业的“特殊会社”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实行经济统制的手段，主要是实行“特殊会社”制度。这种制度是伪满政府于1933年3月，在其

《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首次公布的。《纲要》的第三部分“经济统制之方案”中，曾这样规定：对“带有国防的或公共公益的性质之重要事业”要“以公营或令特殊公司经营为原则”。这里，提出的统制手段分为公营与特殊会社（即公司）经营两种，但实际上，由伪满政府实行直接投资经营的产业却不多，而最多最主要的则是由特殊会社经营的。

日伪合资的“特殊会社” 所谓特殊会社，是根据特定的立法建立的会社，或基于日伪之间签订的条约而建立的会社。它是由日伪合资开办的企业，原则上既有伪满“国家资本”参加，也有日本资本参加。在经营上与伪满“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差别，伪满政府按照“特殊会社法”给予特殊会社以种种特权和保护，同时又对特殊会社实行严格的深入内部的监督，特殊会社也负有接受伪满政府严格监督的义务。特殊会社的首脑人物，原则上由股东大会选任，经伪满政府批准，也有由伪满政府直接任命的。有关主管部“大臣”，对特殊会社的财产和经营情况拥有监督权和命令权，可以对特殊会社随时进行检查，有的还派去管理官长期驻在会社内进行直接监督。可以说，特殊会社实际上是按照日伪的经济政策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代行机构，因而又被称作“国策会社”。它是按照日本帝国主义“变东北为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的“国策”行事的，它的实际支配权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指挥下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及实业部、产业部的日本人官员和各特殊会社日本人董事长等人手中。

除特殊会社外，还有准特殊会社。所谓准特殊会社，也是按照特殊会社的企业形式建立起来的。所不同的是，它不象特殊会社有一个特定的立法，而是受《重要产业统制法》制约的。在业务上也受伪满政府监督指导，在经营上和特殊会社没有什么原则差别，其资金来源，也多是由日伪两部份构成。

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都是按照一业一会社的原则建立的。即一个行业或一个部门建立一个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以

该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来垄断该行业或部门。一般地说，属于必须统制的重要产业部门建立特殊会社，而属于可以自由经营又需加以统制的部门，则建立准特殊会社。

总社设在伪都的"特殊会社"　东北沦陷十四年期间，日伪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近百个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其中，总社设在长春的始终占 2/3 以上。1932 年 7 月，首先在长春建立了第一个特殊会社——伪中央银行。到 1937 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前，日伪在东北所设立的特殊会社为 27 个，准特殊会社 5 个，计 32 个，其中总社设在长春的为 22 个，占全部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的 68.7%。到 1942 年，设立的特殊会社增至 55 个、准特殊会社增至 32 个，计 87 个，其中总社设在长春的 67 个，占 77%。到 1944 年，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共计 92 个，其中总社设在长春的为 72 个，占 78.2%。此外，还有密山煤矿、昭和制钢所、东边道开发、满洲轻金属制造、本溪湖煤铁、同和汽车工业、"满洲航空"等 9 个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的分社或办事处设在长春。可见，长春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日伪实行经济统制的中心。总社设在长春的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总社在长春的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一览表

一、特殊会社

序号	会社名称	设立年月日	最初资本（万元）	本社地点
1	满洲中央银行	1932.7.1	3 000（1942.10 为 1 亿元）	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西北侧
2	大兴公司	1933.7.1	600	

3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	1933.8.31	5 000	大同广场西侧
4	满洲石油株式会社	1934.2.24	500 （后 2 0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今长春市人民政府址）
5	满洲煤矿株式会社	1934.5.16	1 600 （后 8 000）	锦町（今四平路）
6	满洲采金株式会社	1934.5.16	1 2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7	满洲特产中央会	1935.6.21	125 （基本资金）	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
8	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	1935.8.24	500	大同大街
9	满洲拓殖株式会社	1936.1.4	1 5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10	满洲林业株式会社	1936.2.29	500	丰乐路（今重庆路）
11	满洲盐业株式会社	1936.4.28	5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12	满鲜拓殖株式会社	1936.9.14	1 5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13	株式会社满洲弘报协会	1936.9.28	500	中央通（今斯大林大街北段）

14	满洲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1936.10.23	3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15	满洲计器株式会社	1936.10.26	300	丰乐路
16	满洲兴业银行	1936.12.7	3 000	大同大街
17	满洲图书株式会社	1937.4.6	200	七马路
18	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	1937.8.6	5 000	兴仁大路特产中央会
19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	1937.8.21	500	大同大街日毛大楼，后迁至洪熙街(今红旗街)
20	满洲拓植公社	1937.8.31	5 0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21	满洲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	1937.9.7	5 0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22	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1937.12.27	45 000	大同大街406号
23	满洲油化工业株式会社	1938.2.22	2 000	大同大街ビル
24	满洲房产株式会社	1938.5.1	3 000	大同大街

25	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	1938.6.20	2 000	先在沈阳后迁至长春
26	满洲硫铵工业株式会社	1938.10.24	3 000	八岛通(今北京大街)
27	满洲粮谷株式会社	1938.12.21	1 000	兴仁大路
28	满洲汽车制造株式会社	1939.5.10	10 000	
29	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	1939.6.1	2 000	
30	满洲生活必需品配给株式会社	1939.6.23	1 000	
31	满蒙天然开发株式会社	1939.7.6	300	
32	满洲特产专管公社	1939.10.20	3 000	
33	满洲产业株式会社	1939.11.1	100	
34	满洲谷粉管理株式会社	1940.1.16	1 000	
35	株式会社满洲资源爱护协会	1940.6.6	250	

36	满洲投资证券株式会社	1941. 6. 1	40 000	
37	满洲农产公社	1941. 7. 2	7 000	
38	满洲国通信社	1942. 1. 20	280	
39	康德新闻社	1942. 1. 22	340	
40	满洲新闻社	1942. 1. 22	170	
41	兴农金库	1943. 8. 1	5 000	
42	满洲农地开发公社	1944. 2. 21	5 000	
43	满洲制铁株式会社	1944. 4. 1	74 000	
44	满洲畜产公社	1944. 5. 1	3 500	
45	满洲纤维公社	1944. 5. 8	3 000	
46	满洲林业公社	1944. 8. 14	7 000	

二、准特殊会社

序号	会社名称	设立年月日	最初资本（万元）	本社地点
1	满洲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1933.5.30	5 000	
2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	1934.11.1	9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3	满洲制碱株式会社	1936.5.22	8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4	日满商事株式会社	1936.10.1	1 000	
5	东亚矿山株式会社	1937.7.5	100	
6	热河矿山株式会社	1937.7.5	100	崇智胡同
7	满洲畜产株式会社	1937.9.1	500（后为1 500）	大同大街康德会馆
8	满洲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	1937.12.1	500	

9	满洲实业振兴株式会社	1937.12.28		
10	满洲特殊制纸株式会社	1938.3.1	50	中央通
11	满洲石绵株式会社	1938.6.6	100	
12	满洲镁工业株式会社	1938.7.2	1 000	
13	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	1938.9.14	3 000	大同大街
14	满洲共同水泥株式会社	1938.10.1	130	
15	满洲矿山株式会社	1938.12.28	5 000	
16	协和铁山株式会社	1939.8.5	1 000	
17	满洲柞蚕株式会社	1339.8.19	5 000	
18	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	1939.12.27	2	

19	株式会社满洲情况介绍所	1939. 12. 28	50	
20	满洲重机株式会社	1940. 5. 17	5 000	
21	满洲大豆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1940. 7. 20	3 000	
22	满洲特殊铁矿株式会社	1940. 10. 15	3 000	
23	满洲麻袋株式会社	1940. 12. 2	2 000	
24	满洲造林株式会社	1941. 2. 15	800	
25	扎赉煤矿株式会社	1941. 11. 21	5 000	
26	满洲林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1942. 7. 8	2 000	

资料来源:[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译文(上),第 401—408 页;
[日]三浦:《新京概况》,第 72—87 页,康德 6 年版;
[日]永见文太郎:《新京案内》,康德 6 年版,第 88—90 页。

特殊会社在伪满经济中的垄断地位　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统制中国东北经济的重要工具,在其统制东北经济和掠夺东北资源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统制经济方面,许多特殊会社都在该行业中占有垄断地位。例如,

1932 年 7 月在长春建立的伪满中央银行，便垄断了东北的金融，1933 年 8 月在长春建立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则控制了东北的通讯，1934 年在长春建立的“满洲煤炭株式会社”与“满洲采金株式会社”，则分别操纵了东北的煤炭业与采金业。再如，至 1936 年，东北地区共有各种会社 794 个，资本总额为 13.37 亿元，其中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只有 26 个，占 2.3%，但资本总额却达 9.56 亿元，占 72%[①]。又如，于 1942 年，在东北所有资本在 20 万元以上的会社中，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数目，只是一般会社数目的 1/15，但拥有资本的总额，却是全部一般会社的 2 倍[②]。从上述的事实可以看出，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在伪满的经济领域中确实占有垄断的地位。

在掠夺资源方面，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 1937 年日伪开始实行的伪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为例，就是依靠在各个产业中占有垄断地位的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来承担与执行这一旨在全面掠夺东北资源的计划的。可以说，“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就是特殊会社一切经营活动的总纲领，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就是特殊会社的具体指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撑其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曾脱离伪满的经济实际，一再漫无边际地扩充产业计划的各项指标，采取竭泽而渔的反科学方法，对东北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在这场掠夺中，尤以 1937 年 12 月，在长春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简称“满业”）最为卖力，它充当了实施这一掠夺计划的急先锋。

“满业”的突出作用　“满业”的前身是日本产业股份公司（简称“日产”），是日本产业资本的新兴财阀。它适应日本陆军省和关东军全面掠夺东北资源的需要，与之结合一起，于 1937 年 12 月，将日产总社迁至长春，改名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

①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 134 頁。
② 《中日关系史论集》第 6 辑，第 266 頁。

社”。“满业”的资本总额为4.5亿日元，日产财阀和伪满洲国各持一半股份。12月20日，伪满公布了“满业管理法”，给日产财阀以优厚的特惠，规定在10年之内，保证日产财阀对所投资本总额获6分红利，如营业收益达不到时，则由伪满政府补其不足；在伪满与日产财阀的利润分配比例上，也照顾日产财阀，规定如会社解散，日产财阀则有处理财产的优先权等等。

“满业”成立后，还根据关东军关于《成立满洲国重工业会社纲要》的规定，将原属满铁的有关重工业的子公司，诸如昭和制钢所、“满洲煤矿”、“日满镁”、“满洲铝矿”、同和汽车、“满洲石油”等会社，接收过来，并且陆续设立与接收一些子公司，如本溪湖煤铁会社、东边道开发会社、“满洲轻金属会社”等等。这样，“满业”便垄断了东北的采掘、钢铁、轻金属和汽车、飞机制造等行业，从而成为一个既包括原料工业，又包括精密制造业的东北最大的托拉斯组织，成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的重要经济侵略机构。而且也打破了特殊会社制度中原先的一业一会社的形式，使之转向为一业多会社形成与一业一会社形式的共同并存。

“满业”在经营东北重工业各部门的过程中，利用本身的垄断地位，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如“满业”所属的子公司昭和制钢所，1936年的生铁产量仅为49.15万吨，而到1942年时，就达130.42万吨，增长了一倍半以上。其中大量被运往日本。仅1942年一年就运往日本50.93万吨，占当年日本生铁总输入量的57.9%[①]。再如，属于“满业”的“满洲煤矿会社”，以阜新、西安、北票、鹤岗四大煤矿为核心，增产幅度很大，1937年为232万吨，1941年增至1 116万吨，增长了3.8倍[②]，其中大部分也运往日本。同时，“满业”本身也不断扩大，并捞取了巨额利润。至1941年，“满业”的子公司由1938年的20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上，译文，第268—269页。
② 陈本善主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506页。

家增至32家，资产也由1938年的5.51亿日元增至17.24亿日元，并在该年收齐全部4.5亿日元的额定资本。至1944年，满业共有子公司40家，资产达28.63亿日元以上，并控制了东北采煤业的80%以上，钢铁冶炼业的80%左右，稀有金属和轻金属生产的80%，飞机与汽车制造业的100%，机床制造的90%，武器制造的50%，化学工业的25%[1]。进而，更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与物资。

3、操纵金融命脉的日伪银行

"九一八"事变前后设在长春的中日银行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金融势力就侵入中国东北各地，至1931年6月，共有日本银行总行12处，分行44处，名义资本3 147.5万元，已缴资本1 358.1万元。设在长春的日本金融机构有：朝鲜银行支店、正金银行支店、"满洲银行"支店、正隆银行支店、东拓支店、东省实业支店、长春银行、长春实业银行、福信金融株式会社、日华金融株式会社、长春贮金信托株式会社、长春金融组合等。此外属于其他外国银行还有美国的花旗银行支店。属于中国金融机构设在长春的主要有：东三省官银号长春分号、边业银行长春支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中国银行长春支行、交通银行长春支行及益通银行、益发银行、惠华银行、长春交易所等。

"九一八"事变后，设在东北各地的中国各主要银行，尽陷于敌手。9月19日至11月19日，日本关东军派兵先后占领查封了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及下属各分行号和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交通两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随后，纠集满铁和朝鲜银行、正金银行的职员，对上述各银行进行多次检查。其中，设在长春的东三省官银

---

①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317页。

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等各分支行号，于9月19日被日军占领查封。9月28日，又派人对上述3个分行号的通货库存及帐册进行检查。接着，召集了行号经理，令其提出"不动用库存通货"、"不作利敌行为"、接受"随时检查"与"监督"的誓约书后，准于9月29日恢复营业。对东北"四行号"①的其他总行号与分行号也采取同样措施，使之陆续在日本军队和银行职员监督下恢复营业。这次对东北三省上述行号的劫掠，共夺取库存资金和财产，达4.19亿余元②。

伪满中央银行　在吞并东北四行号的同时，为了垄断中国东北的金融命脉，控制经济，日本帝国主义又在积极筹划设立伪满中央银行。经过关东军、满铁、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及正金、朝鲜银行等方面的谋划准备，于1932年6月，由伪满政府公布了《满洲中央银行法》及其组织办法，任命了头目，于当年7月1日正式开业。该银行总裁由伪满财政部总长熙洽的亲信，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担任，副总裁由台湾银行理事，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的亲属山成乔六担任，控制其实权。此外设理事4人，日伪各半，监事1人。刚成立时，资本金额定为伪币3 000万元，实缴1 500万元。1942年，分别增至1亿元和2 500万元。总社设在长春，地点为原吉林省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所在地(今大马路西三道街东端路北处)，1938年6月迁至"大同广场"西北侧(今人民广场西北侧，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分行址)。伪中央银行开业时，在沈阳、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设有分行，在县以上城镇设有支行。全行总、分、支行及办事处计128处。至1936年增至144处。总行内初设4部13课，4部为业务、总务、发行、兴业等；至1943年为10个部，部下仍设课，分掌其行政与

① 东北四行号指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

② 《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专题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470页。

业务活动。1933 年 3 月，日军侵占热河后，伪中央银行又“接收”了热河的兴业银行的总支行。

伪满中央银行名义上是伪满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实际上它是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并为之服务的殖民地银行，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财富的工具。它受关东军的全面控制，积极为其提供军费和筹集物资。它按照日本银行的办法实行货币和信用管理，日本银行则在其内部设置参事官，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日本银行在我国东北的特别分支机构。它的经营范围包括：发行各种票据、债券、贷款、存款、汇兑、通货买卖与保管等。

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中国东北金融，控制中国东北经济，掠夺中国东北资源效力。它参与伪满金融方针政策的制定，垄断伪币的制造与发行，操纵中国东北的金融市场；它发布法令，积聚资金与存款，垄断放款，收买黄金，实行资金统制；它强化汇兑管理，垄断金银外汇，摧残民族金融事业；它通过强行摊销储蓄和公债，扶植垄断企业，独霸中国东北经济、资源；它代理日本国库业务，承办特殊财金业务，办理预算出纳和日本关东军军事费，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用以操纵中国东北金融事业的中枢。

伪兴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除了伪满中央银行外，还有日本的朝鲜银行支店、正金银行支店、“满洲银行”支店、正隆银行支店、“新京银行”、“新京金融组合”、东洋拓植株式会社支店和伪满的兴业银行，兴农金库、金融合作社等。这些机构的总社或分支设在长春，起着控制与操纵中国东北金融的作用。如朝鲜银行，是日本在中国东北银行中最有势力的银行，在设立伪满中央银行过程中，它派员与关东军、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等进行了筹划，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又通过它向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垄断财阀，借入 2 000 万元，作为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伪币的准备金，仍存放在朝鲜银行之内，以此来控制伪满中央银行，使之依

附于日本的金融资本。再如正金银行，则利用其从事汇兑业务的优势，垄断了中国东北的汇兑交易市场，有时还代替日本政府向伪满中央银行“借款”，为关东军筹集军费。其它如“新京银行”、正隆银行、“满洲银行”等，也都在统制中国东北金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东北资源的掠夺，决定从1937年起实行“第一期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为此实行了所谓“日满金融一体化”，将日本的正隆银行、“满洲银行”和朝鲜银行的支行合并，组成了伪满兴业银行，于1937年1月1日开业。伪满兴业银行是除伪满中央银行之外，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又一得力工具。它继承了合并前三银行支行的存、放、汇兑款等各项业务，以“一般金融之周转和供应各种产业开发所需之长期低利资金为宗旨”[①]，是一个主要为工矿业服务的专业银行。伪满兴业银行成立时，额定资本为3 000万元，由伪满政府和朝鲜银行各出一半。后来资本增长很快，至1942年增至6 000万元，至1945年6月末，从伪满中央银行取得的贷款额高达35.15亿元，占该行同期借款总额的97.5%。伪满兴业银行的总行设在长春，在东北各地设有分支行与事务所，为46个，至1944年7月末增至67个。总行内设8个课，1941年时增至12个课，1943年12月改设秘书、监察2室和人事、总务、资金、普通金融、特殊金融等5部，部下设课，至1944年6月，又在本行内设立了兴农防卫本部。

伪满兴业银行成立后，以“满业”及所属工矿业子公司为重点，对一些特殊会社、准特殊会社给予优惠待遇，实行无担保放款。至1944年3月末，已为“满业”发放了12.3亿元的贷款，占该行同期放款总额的50%[②]。同时，还利用其拥有“发行实缴资

① 《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专题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495页。
② 《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专题国际学术会议文集》，第500页。

本15倍为限的债券"的特权，发行大量债券，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战略物资提供了大量资金。

在农业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控制农村金融市场，于1934年9月公布了《金融合作社法》，开始在中国东北各地推行"金融合作社"制度。实行以地照抵押或找保人担保的放款与存款。至1940年，与"农事合作社"合并，组成"兴农合作社"后，仍保留金融方面的存放款业务。至1943年8月，伪满政府又在长春成立"兴农金库"，下设分支与派出机构113个，分布在中国东北各地，作为特殊金融机关，专门负责农业贷款，全面控制了农村的金融事业。

此外，还有大兴公司，是伪满最大的当铺中心，它所控制的当铺数占全东北的30%，放款占40%，实际上垄断了东北的典当业。另有"满洲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满洲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操纵了中国东北的保险事业。

日伪银行对东北资源的掠夺　通过上述这些日伪的主要金融机构，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金融事业。操纵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因而，随着垄断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资源的掠夺也逐步加深，并趋于疯狂。这种掠夺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行伪币，统一币制

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为了独占东北金融市场，掠夺财富，日伪立即着手发行伪币，收兑原有的各种货币，实行币制统一。在收兑原有货币过程中，伪满中央银行采取压低原来货币兑价，少兑换原有货币、低价强兑金银等办法，掠夺了巨额财富。如在收兑吉林永衡官帖(当时流通量达103.1亿吊)时，竟压低比价30%进行兑换，规定每500吊官贴兑换伪币1元。结果，从中捞取了800多万元的财富。再如，在收兑"四行号"发行的各种票券过程中，日伪曾宣称应折合伪币14 223万元，但实际收回为13 821万元，即少收回402万元。此外，还通过故意压低"四行

号"资本额扩大其负债额，伪造"四行号"亏损 3 300 万元，然后，则以由伪满政府弥补亏损为名，发行"补偿公债"3 300 万元，从中获取了大量资财。

第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中央银行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从 1936 年起，伪币的发行量大增，至 1941 年已达 13.17 亿元，比 1932 年增长 38 倍。1942 年后更急骤增加，至 1945 年 7 月，发行额猛增至 80 亿元，比 1932 年增长了 52 倍。到日伪垮台时，伪币的最后发行额为 136 亿元，为 1932 年的 96 倍。通过通货膨胀，既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产业"开发"，掠夺资源和扩大军事开支，提供了巨额资金，也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横财，更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东北的投资与资源的掠夺。伪满中央银行于 1932——1944 年的 13 年间，共获利润 200 963 464 元。1937——1945 年 8 月，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个财阀，投向中国东北的资本由 26.7 亿日元增至 98.9 亿日元[①]。

第三，实行资金统制

为了支持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对中国东北金融的垄断地位，大搞资金统制。1938 年 9 月，日伪当局发布了《临时资金统制法》，对社会资金供求双方都加以统制，特别是贷款方面，以全力支援军事产业部门。统制资金的主要手段是由伪满中央银行垄断资金的贷放，为此，在伪满中央银行总行考查课内设立了资本统制系，1940 年初，又扩大为资金统制课，专门负责资金的统制。伪满中央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伪满兴业银行、"兴农金库"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其中，伪满兴业银行占 35%，"兴农金库"与正金银行占 40%。以兴业银行为例，它则把伪中央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投给生产战略、军需物资的 30

① 《革命春秋》，1989 年 3 期，第 20 页。

余家会社。此外，日伪还通过伪满中央银行，兴业银行、正金银行等严格管理汇兑，以控制资金外流。规定：除日本外，凡输出伪国境的汇兑，超过 1 000 元者，都必须经过伪中央银行的审批。并强制摊销公债、储蓄，采取借款抵押、按比例先行扣除，按其部门存款、纯益金和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强行扣除等办法，大肆搜刮民财。1937 年，伪满发行的公债为 4.44 亿余元，至 1942 年，增至 28.98 亿余元，增长了 6.5 倍[①]。伪满的储蓄目标，1939 年为 5 亿元，1942 年增至 15 亿元，1944 年为 30 亿元，1945 年伪满垮台时为 60 亿元，增长了 11 倍。

第四，垮台时的疯狂掠夺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伪统治者在即将灭亡之前，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他们以借款，提取存款、遣散费、向外汇款等办法，从日伪银行中掠夺了大量的钱财。

4、中日工商业的两极分化

在中国东北沦陷 14 年间，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殖民统治中心的伪都新京，其工商业曾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也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点。当时，根据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旨意和需要，在长春并未建立与发展大工业，而是建立与发展了以生产和销售生活资料为主的中小工商业。这样，就使长春成为日伪经济统制下的消费城市。设在长春的经济部门，除了那些操纵东北金融命脉的日伪银行和垄断各个行业的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的总社与分社机构外，其它的工商企业，则绝大多数是供应消费需要的中小工商业。在这些工商企业中，主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它们由于适应于长春城市扩大、人口增加和在长春日本人特别是日本上层殖民统治者的

---

①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 307—308 页。

各方面需要，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控制了长春中小工商业的形势；另一部分是由中国人经营的民族工商业，它们在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摧残与日人资本企业的排挤下，得不到正常发展，而是逐步走上衰退、歇业、破产之途。

中小工商业的发展及其特点　"九一八"事变前，长春的工商业数量不多，大的厂店较少，规模也不大。据《长春工业》一书所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长春的主要工厂有35家，包括制粉业7家，制油业8家，制酒业5家，碾米业3家，电灯业2家，窑业3家，制材与木制品业4家，火柴制造业2家，铁工厂1家。从商业看，主要是购销转售农产品的粮栈等行业。至于民需的日用百货等行业，虽然数量多达600余家，但规模很小，绝大多数是前店后场的手工业作坊。在这些工商业中，也包括少部分日本人经营的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伪满建都于长春后，随着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以生产、销售生活资料为主的中小工商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表现为厂店增多，资本扩大，职工人数增加，生产与销售额提高。

在工业方面，至1935年，长春有工厂384家，其中金属、机械器具、车辆制造业为77家，窑业、制材业为74家，纺织、化学、食品、杂品等业为233家，较"九一八"事变前有了较大的增长[①]。资本总额为10 350 413元，平均一厂26 850元。职工人数为11 846人。至1940年12月，长春有工厂760家，其中金属、机械器具业为125家，窑业、制材业为131家，纺织、化学、食品、杂工业等为459家，分别比1935年增长了62%，90.5%与97%，资本总额为52 584 376元，平均一厂69 189元，也较1935年有较大增长。职工人数为21 501人，较1935年增长了81.5%。在这760家工厂中，属于"九一八"事变前设立的143

①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135页。

家，占 18.8%，1932——1936 年设立的 370 家，占 51.3%，1937——1940 年设立的 227 家，占 29.9%[①]，后两项合计为 617 家，占 81.2%。虽然，这里尚没有"九一八"事变后破产、歇业工厂的数字，但从新开设的工厂所占 4/5 以上的比例来看，在"九一八"事变后，长春的工业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商业方面，也较"九一八"事变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如 1939 年，属于伪新京商工公会系统的商业企业，有 2 794 家，其中批发店 281 家，零售与小卖店 2 053 家，零售兼批发店 460 家。销售总额为 394 778 925 元，一店平均销售额为141 298.8 元[②]。贩卖的品种除粮油等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外，还包括纺织、服装、家具、毛皮、五金、木材、纸张、杂货等许多种。并且还在长春旧城、商埠地一带，形成了 6 个繁华的商业街。

但是，东北沦陷时期长春工商业的增长、发展，却是很有限的，而且也是不平衡的。这是当时长春工商业发展的两个特点。

（一）所谓有限，是指这些工商企业从总的看，还是规模较小，资本额较低，职工人数较少，技术不够先进，业种不全，以生产与销售生活资料为主。在工业方面：至 1939 年 1 月，长春有 5 名职工以上的工厂 330 家，其中，31——100 名职工的工厂仅 7 家，101 名以上职工的工厂仅 2 家，而 5——30 名职工的工厂则为 327 家，占 330 家工厂的 97.3%[③]。在这 330 家工厂中，属于株式会社的 19 家，合资会社的 74 家，有法人组织的工厂 93 家，占 20.9%，个人经营的 237 家，占 79.1%。投资总额1 939.2万元，其中，占工厂总数近 80%的个人经营的工厂的投资额，仅为 115 元，占 7%。这表明，大部分工厂还处于手工业作坊的落后状态。至于这些工厂企业的种类，主要分为食品、纺织、化学、金属、

① [伪满]《新京商工事情》，第 2 辑，第 4—16 页。

②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 169 页。

③ [伪满]《国都新京》，第 124 页，康德 7 年版。

机械器具、制材与木制品、印刷与装订、窑业、杂工业等 9 种，基本上属于以民用为主的消费资料工业。这些工业的生产总额为 2 053.2 万元，其中食品工业占 46%，而在食品工业中，占 90% 左右的为制粉业[1]。在商业方面，仍以上述 1939 年统计的 2 794 家商店为例，其资本总额为 135 355 498 元，平均一店的资本额仅 4.8 万余元。所经营的品种为百货、食品、布匹、服装、木制品、五金、毛皮、纸张、杂货等，多是人们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商品。

（二）所谓不平衡，是指发展较大较快的工商业，大都是日本人经营的工商业，而中国人经营的民族工商业，除个别者外，基本上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多是在重重困难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挣扎，并逐步趋于衰落，直至破产。这一兴一衰的两极分化状态，大体可分为程度不同的三个阶段。

1932——1937 年的工商业　这期间，随着日本殖民势力的大量侵入，日本资本的不断输入，日本人经营的工商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并在与中国民族工商业竞争中逐步占有主要的地位。

在工业方面，据 1934 年的不完全统计，长春有日人经营的火柴制造厂 4 家，制材厂 6 家，铁工厂 6 家，印刷厂 8 家，分别较“九一八”事变前的日人经营的同类工厂增长 1 倍、1/2 倍、5 倍和 3 倍[2]。当时，在长春的另一些工业中，虽然日人经营的数量较少，但其资本较多，产量较高。以制油业为例，1934 年，长春共有制油工厂 11 家，其中中国人 10 家，日本人 1 家。中国人经营的有 2 家工厂已处于停业状态，而日本人经营的“满洲制油”工厂，虽仅一家，但它的产品产量却远远高出另外 8 家中国人经营的工厂产量的总和，豆饼与豆油产量分别为 8 家中国人工厂的

---

① [伪满]《国都新京》，第 124—125 页。

②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 140—144 页。

2.5倍与5.5倍[1]。至1935年，在长春的384家工厂企业中，日本人经营的126家，中国人经营的258家，但日本人所拥有的资本却为6 939 892元，占全部384家工厂企业资本总额67.5%，中国人所拥有的资本仅为3 410 531元，占所有企业资本总额的32.5%。即厂数不足中国人1/2的日本人，拥有资本为中国人资本的2倍以上[2]。

在商业方面，1937年时，长春有较大的百货店6家，其中日人经营的占5家，为：宝山百货店(今中兴大厦址)、三中井百货店(今百货大楼旧楼址)、金泰洋行(拆除前为长春市药材公司址)、平本洋行(今秋林公司址)。此外，在长春6个较大的商业街中，日人经营的商店也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其中如吉野町(今长江路)是当时长春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1937年约有商店60余家，除一二家由中国人经营，四五家由俄国人、土耳其人经营的之外，其余50余家全由日人经营[3]。其它如大亚街(今贵阳街)、日本桥通(今胜利大街)、祝町(今珠江路)、北大马路等商业街，也有较多的日人经营的各种商店。

另一方面，在1931年至1937年间，中国人经营的民族工商业，则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与排挤，得不到正常发展，有些更被迫停业或倒闭。先是"九一八"事变引起的社会动荡，使东北民族资本的典型行业——油坊与制粉业遭受了很大的冲击。长春的制油业一直不景气。1931年至1933年，豆饼产量由995 550块，降为682 000块，豆油产量由4 679 500斤，降为2 922 500斤。在这两个数字中，当然还包含1家日本人经营的制油厂，但也无法改变制油业产量下降的趋势。长春的制粉业产量下降更大，由1930年的5.2万吨，下降到1933年的0.3万吨。1934年后，随

---

①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140—144页。

② 《长春商业史料》，第15页表，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51。

③ 纪文：《新京指南》，第38页。

着经济统制的实施与加强，加上日本资本的侵入与竞争，更使资本微薄、技术落后的一些民族资本工商业在竞争中遭到减产、歇业，以至倒闭。如制油业，日本的三井财团的三泰油坊，除在大连设总厂外，还在长春设总店一处，在东北其他地方设主店 3 处，支店 33 处，办事处 1 处，使民族资本制油业受到严重打击，长春的民族资本制油业 1934 年为 10 家，到 1937 年减少为 3 家。再如制粉业，也在日本几家财团联合成立的"日满制粉株式会社"的收买下，而遭到打击，长春的民族资本制粉业 1934 年时为 9 家，到 1937 年时仅存 5 家[①]。又如民族资本经营的银行、钱庄，也受到了严重摧残。1933 年 11 月，伪满公布了《银行法》，对民营行庄进行整顿，结果东北各地 169 家行庄被砍掉 81 家，只存 88 家，长春的 37 户钱庄，至 1936 年仅有 17 户，此后继续被淘汰[②]，仅存益通、益发、功成、惠华等 4 家。

在一些民族工商业衰落、停业、破产和被吞并的同时，也有些民族工商业尚能在困难中挣扎前进，采取各种手段，求得了生存和某些发展。至 1937 年，长春的民族工商业厂店为 479 家，其中"九一八"事变后开设的 291 家，占 66.8%(其中 1934——1936 年开设的 178 家，占 35%。)，"九一八"事变前开设的 188 家，占 33.2%[③]。这里，虽然没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工商业歇业，倒闭厂店的情况统计，但从"九一八"事变后新开业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两倍，或从 1934——1936 年新开设企业占总数的 35%来看，可以看出，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 1934—1936 年，部分民族工商业还是得到了某些发展。再从在东北民族工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长春益发合来看，也可看出民族工商业的某些发展。在工业方面，益发合于 1934 年将手工织布机厂改为

---

①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 137 页。

② 满铁新京支社业务课：《新京经济的基本动向》，第 156 页。

③ [伪满]满洲中银调查课：《对满洲满人中小商工业者业态调查》，第 14、18—19 页。

机器织布厂，1937年又买进织布机38台，使该厂成为拥有织布机78台，日产粗布200匹的较大企业。同时，又对其制粉厂更新设备，扩建厂房，使面粉的日产量由4 000袋增至7 000袋。此外，还在哈尔滨松浦镇买下了日产3 000袋的奉大火磨。在商业方面，益发合利用日伪对百货业无限制的机会，积极扩大百货业。从1932年始，便在长春大马路四马路口，修建了一座三层楼房的百货商店，名曰泰发和百货商场（今长春第一百货商店址），从1932年12月末开始营业，雇用职工120余人，其资本由最初的15万元，增至300万元，是长春民族工商业开设的最大商店，也是前述长春6大百货店中唯一的中国人经营的百货店。除泰发和百货商场外，还扩大了在哈尔滨的益发合货店和东发合货店，并从东发合货店支出一部分，在长春开设了销售茶叶兼营百货的东发合百货店，职工人数逐渐增至100余名。在外贸方面，益发合还利用日伪对大豆出口方面的薄弱之处，在其大连的益发合粮栈中设立了出口部，以欧洲和南洋为主要对象进行出口贸易；其中于1935——1937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益发合的发展还表现在利润增长方面，其盈利金额1934年为23.8万余元。1936年1—6月，仅半年时间即为85.1万余元[1]。

长春的某些民族工商业所以能有某些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日伪统治东北前期，经济统制政策还不够完善、严密，殖民统治的经济体系还未完全确立，因而使民族工商业得以利用殖民统治经济政策的空隙，求得某些行业的某些发展。二是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商业，大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难于缺少。特别是长春作为伪都，人口激增，对生活资料的需求急剧扩大，更需要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民族工商业。三是日本资本的工商业虽然不断增长，但也需要一个过程，在1937年以前，尚不能完全控制长春整个工商业的各个行业与部门。当然，

---

① 《长春文史资料》第9辑，第50—58页。

这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是很有限的，不充分的，多数仍为规模很小、资本很少的企业，而且有 1/5 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并且亏损比例还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1938——1941 年的工商业　这期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对中国东北经济统制与掠夺的加强，日本资本的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增长。其中制粉业，至 1938 年，日人经营的为 24 家，占全部 65 家制粉厂的 37%，但生产能力却占 60%。在长春则有"满洲日本制粉"、"康德制粉新京工厂"、亚洲兴业面粉等日人经营的工厂。此外，在长春的日本资本的企业还有制酒、木材、精谷、制冰、酱油酿造、特殊制纸、被服等 10 家。至 1939 年 1 月，长春的较大工厂有 37 家，其中日人经营的 27 家，中国人经营的 10 家。职工人数在 101 人以上的工厂 2 家，全是日人经营的，即烟草业与火柴业各一家。资本额最高者为 1 200 万元，即为日人经营的"满洲烟草会社"①。在商业方面，1938 年后，日人经营的商店也有新的增加与扩大。如商业街吉野町，有各种商店 100 余家，其中日人经营的 90 余家，较 1937 年时增加了 40 家。其中金泰洋行与平本洋行都扩大了营业面积，金泰洋行还增设了分店满泰洋行(拆除前的春风商店址)。1939 年，长春较大商店共 13 家，日人经营的占 8 家。再据 1939 年伪新京市的商业实态调查统计，资本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商店共 126 家，其中日本人经营的 99 家，中国人经营的仅 25 家。从上述的一些事例可见，日本资本在长春的工商业中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基本上控制了长春工商业的发展形势。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由于日伪实施所谓第一次五年开发计划和进一步加强经济统制与掠夺，加重了对民族工商业的打击与摧残，使民族工商业除少数个别企业继续有某些发展外，其余的企业基本上处于不景气或面临歇业、倒闭的状态。加之特殊会

---

① [伪满]《新京指南》，第 51—54 页。

社的增加，物价、外贸和各种农产品统制法令的实施，行业组合及专卖机构的设立，更使民族工商业度日越发艰难，无法摆脱日趋衰败的命运。据1940年伪满政府调查，当年长春有杂货、文具等377家民族资本的店铺，因连年亏损，无力经营而废业[①]。其中基础较好的益发合，这一时期虽然因采取各种办法，在困难中挣扎前进，并使本身在1938年至1940年间得到了某些发展。如1938年增设了制米厂，1939年增设了制酒厂，1940年在长春增设了制油厂与制米厂，在青岛设立了染织厂，在四平设立了制米厂与油坊。泰发合百货店也扩大了营业，增加营业室为15个部，并内设制鞋、制帽、衬衣等3个附属工厂，自制鞋、帽、衬衣等商品。同时，益发合的企业利润也在增长，其盈余额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为97万余元，1939年7月至1940年6月，为199万余元，增长了一倍。但是，它的发展也很有限。而且从1938年开始也出现了不景气的状况。如制粉业因原料不足，销路不畅，生产日益衰退。1938年，生产面粉870 611袋，生产麸皮122 797袋，到1940年，仅生产面粉222 918袋，麸皮22 083袋，分别下降了3倍与4.6倍，并改成加工包米面。此外，1939年设立的制酒厂到1941年被迫停产，制油厂也无法维持生产，织布厂到1940年时不再生产面袋，而改成加工厂。除益发合外，1939外至1941年间在长春尚有裕昌源、振兴和、天兴福、天益兴、鸿发兴、宝泰昌、积德泉、慎发祥、同发合，天锡昌、聚盛昌、洪发源等制粉、制油、碾米、制酒、百货、运输、特产等14家民族工商业能够维持或取得某些发展，但也好景不长。此外，这期间还有新设的较大一点的民族工商业10家，其中工业6家，商业4家[②]，但成立不久，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1942—1945的工商业　　这期间，在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

① 《长春商业史料》，第23頁。

②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192—194頁。

后，加紧了对中国东北殖民地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及东北各地日人经营的工商业通过新建、扩大、收买、合并，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在长春，从工业方面看，较大的企业有120余家(其中包括19家支店)，其业种繁多，包括民需的制粉、制米、制油、制酒、食品糖果、饮料、棉毛麻织、服装、鞋帽、机械器具、铁工、造纸、电气、制材、水泥、印刷、制药、化工、燃料、农机、家具等等，应有尽有；其规模也大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商业方面，较大的企业计280余家(包括支店74家)，经营的种类十分繁多，资本与规模也大于中国民族资本商业。此外，日资经营的金融业，也比以前有较大的增长，除特殊会社中的大银行外，较大一点的日资金融会社由1936年的6家，增至1942年的13家，在数量方面也超过了中国民族资本的金融业。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经济统制与掠夺的加剧，使民族工商业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摧残。继1940年日伪公布的《物价物资统制法》等法令，实行原料配给、销售统制、控制产品价格之后，1941年7月末，日伪又公布了《七二五禁止令》，冻结了物价。规定全部商品价格以当年7月25日为准，一律不许上涨。特别是1942年10月，日伪又公布了《产业统制法》，代替1937年的《重要产业统制法》，进一步扩大了统制范围，不仅对重要产业实行统制，而且对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即在生产领域中，对当时的一切产业实行全面的统制。到1943年，又公布了《物品销售业统制法》，又对流通领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业的处境极其悲惨，不仅因物价冻结，货源断绝，销售阻塞而难于度日，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余地，连企图凭借和利用的夹缝，都很难找到。其结果只能是倒闭破产，或者为日伪统制机构所吞并，成为其加工厂、代销店和收购站，靠取得微薄的加工费和销售差价等等来支撑局面。

还以益发合为例，在日伪不断强化的经济统制和掠夺下，在

日资企业的排挤吞并下，已日趋萧条，奄奄一息。它在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等4个支店的利润明显下降，由1939年的95.5万元，降至1942年的61.6万元。其中，大连支店在1942年时，只靠“配给”粮食来维持，结果入不抵出，计亏损1.2万余元。长春的益发合制粉厂生产逐年下降，自1940年始，靠为日伪加工包米面度日，至1945年，全部变成为日伪加工包米面的加工厂。在哈尔滨的益发合制米厂，因交通阻塞，未获得“配给”权，后被认可为农业特约收买人，遂成为替日伪收购农产品的收购站。在长春的泰发合与东发合等百货店，自“七二五禁止令”发布后，货源断绝，经营惨淡，日趋凋零。至1944年，泰发合的三层大楼的营业，缩到一层，其附属的3个工厂均已停业，职工人数由600余人减少为100余人。一年中仅盈利1 000元。总之，到伪满后期，益发合所属的工厂变成了日伪经济统制机构的加工厂，粮栈变成了“粮谷出荷”的收购所，百货店成了“配给”店，库房成为“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满洲农产公社”等机构的仓库。而且益发合的收入也急剧下降，盈利越来越少，最后变为亏损。详见下表：

益发合在伪满最后4年的利润数额表[①]

年　度　(年·月)	盈余或亏损数额(元)	
1941.7——1942.6	盈余	1 355 882.85
1942.7——1943.6	盈余	920 587.53
1943.7——1944.6	盈余	590 412.05
1944.7——1945.6	亏损	236 529.61

除益发合外，其它一些民族工商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到1942年之后，长春尚存能勉强维持的较大一点的30余家民族

① 《长春文史资料》第9辑，第71页。

工商业，也逐渐被迫歇业、倒闭或被吞并。至于更小一些的民族工商业，则倒闭、破产的更多。1943 年，长春计有破产、歇业的制油、制粉、纺织等中小民族企业 200 余家。至于民族资本的金融业，处境也很悲惨。至 1937 年，长春仅存的 3 家银行也都不景气。其中益发银行曾企图通过增加分行的办法来维持利润，结果机构扩大为 16 个分行，其中在长春的 3 个，但利润却在下降。到伪满最后几年，民族资本的银行又被并、砍，益发银行被迫与益通银行合并。因而，到伪满垮台前，长春的民族资本银行，只剩下益发银行与功成银行两家。

这里还应当提及的就是，原为民族资本中的较大企业裕昌源，因为在 1941 年并入了日本资本，加上经理王荆山投靠日本殖民统治者，使其企业不再是民族资本企业，而成为以官僚买办资本为主的企业。因而没有衰落下去，而却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下属有“新京”、哈尔滨、吉林、安达等 4 个制粉厂及“新京酿酒厂”、“新京铁工厂”等。其资本，1942 年为 433 万元，到日伪垮台前增至 1 000 万元[1]。当然，其他有些民族资本企业，也通过向日伪银行借款，与日伪经济保持一定的联系，来维持其经营。

5、农业掠夺与移民侵略

掠夺土地与调查资源　　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主要是掠夺土地和进行农业资源调查，积极为统制农业经济，掠夺农产品作准备。

在掠夺土地方面：自伪满政权建立起，日本殖民者就以“接收官产”的形式，对所谓“国有荒地”实行没收，变成伪满的“国有财产”。如长春地区的双阳驿站荒地就在“没收”之列。此外，还以“军用地”、“城市计划用地”、“电台用地”等名义，强占或低价

---

①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 157—158 页。

收买大量土地，如为建设伪都新京，至1936年，就以低价收去92.7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军用地”为9平方公里[①]。与此同时，又设立了一些有关管理与掠夺土地的机构。于1932年5月，在伪满政府民政部下设立了土地局，负责对东北过去的土地关系和制度进行调查，并拟定伪满的土地政策。在伪都，则开始了地籍测量工作和地形测定工作。1935年8月，又设立了临时土地制度调查会。1936年3月，又在伪国务院内设立了土地整理局，开始对东北各地实施为期8年的地籍整理计划。1937年之后，又成立了“满洲拓殖公社”，作为低价收购与掠夺土地的机构。

在资源调查方面：伪满政权于1935年1月成立了临时产业调查局，作为伪实业部的直属局，调配人员300名，对农业、商业和工矿业等进行了调查。其中对农业的调查，包括土地、金融、生产、流通及农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掌握了东北殖民地农业的资源概况，从而为其对农业经济的统制与掠夺，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这期间，日本殖民统治者还开始了对大豆等经济作物的征购统制。为此，在长春成立了“中央实业局”，在沈阳、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立了分局。

对农产品的统制与掠夺　　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除继续侵占土地和实行农业资源调查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农产品的统制与掠夺。为此，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伪满政权，把东北殖民地的许多农产品都列入了所谓“物资动员计划”和“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内，实行了对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一系列统制政策。其中，主要的有1937年10月公布的《棉花统制法》，1938年11月公布的《米谷管理法》，1939年3月公布的《原棉、棉制品统制法》，10月公布的《主要特产品专管法》，11月公布的《主要粮谷

① 《长春史志》，1990年第4期，第49—50页。

统制法》、《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1940 年公布的《粮谷管理法》等。同时，又相应建立了"满洲粮谷会社"、"满洲特产专管会社"、"满洲谷物管理株式会社"等机构，作为对农产品实行全面统制的机构。至 1941 年 7 月，又将上述三个会社合到一起，设立"满洲农产公社"，以不断强化对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统制。

统制的目的在于掠夺。为了不断加强对农产品的掠夺，日本殖民统治者，则把许多农产品的生产列入所谓"第一次开发五年计划"之内，其重点是为了输出和供应军需的农产品，包括大豆、荞麦、花生、小麦、大麦、洋麻、棉花、烟草、甜菜、水稻、亚麻、蓖麻等等，此外，也包括一些用于民生的高粱、谷子、玉米、柞蚕等。可见即对东北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实行掠夺。

同时，为了扩大掠夺，日伪也强化了一些增产措施，主要是扩大耕地面积，改良品种，防止病虫害，增加施肥面积，加强田间管理等。突出的有：日伪当局于 1938 年出资 2 000 万元，设立了"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用这个特殊会社来统一经营有关伪满政府、"满拓"、"鲜拓"或公共团体所取得的而未被利用的土地"开发"工作，专门从事所谓"农地造成"事业。1939 年，日伪当局又设立了属于伪产业部的开拓总局，制定了《未利用土地开发纲要》，而刚刚成立的开拓总局也制订了 20 年的"改土造田"计划。这一"改土造田"计划，包括了长春县西部的新开河地区低洼地改水田的工程，该工程自 1941 年开始施工，到 1945 年部分完成。在品种改良方面，由公主岭农事试验场与哈尔滨农事试验场，培育出改良品种，其中在长春地区推广的有大豆品种"黄宝珠"，高粱品种"长春三号"，谷子品种"大白"、"大穗黄"，水稻品种"京租"、"长春无芒"等。此外，日伪当局为了全面统制与掠夺农产品，还在一些县市的农村设立了"实验村"。其中，在长春，于 1939 年建立了"实验村"，选定郊区力行、清明、净月、芙蓉、出云等村为"指导农村"，计有农户 90 户，土地 790 陌，并往这些村内

派去驻在的"指导员",用以"指导"农民实行"民族协和",组成农业组合,实行共同"出荷",共同售销农产品和进行增产肥料、改良土壤、普及新农机具、防止病虫害以及农产品加工、畜牧业、蔬菜业的增产奖励等活动,力图造成殖民统治下供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模范村"①。

几种"合作社"的演变　为加强农业掠夺,日伪还在农村实行了"合作社"制度。首先,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应付"九一八"事变以来战乱与水灾等造成的农业衰落局面和进行农业掠夺,进行了一些所谓"恢复生产"和控制农村金融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自1934年9月,由伪满政府公布了《金融合作社法》,在东北各地普遍地设立"金融合作社"。到1937年时,全东北已有金融合作社100余家,普及到主要县份。长春县也设有金融合作社。金融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二:一是为"社员"提供生产贷款,二是受理"社员"储蓄。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因而得到贷款的只有农村的地主富农和一部分中农,而广大贫苦农民则很难得到贷款。相反,这种贷款还助长了地主富农对贫苦农民的高利贷盘剥,即地主富农可以把从金融合作社取得的贷款,再高利贷给贫苦农民。除在县设立金融合作社外,还在各省设立金融合作社总处,在伪财政部内则设金融合作社联合总处。在伪都还设立了金融合作社联合会,掌管东北各地金融合作社的有关事宜。日伪在东北农村实施"金融合作社"制度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它来控制农村金融,用以扩大土地开垦及"复兴"废耕地,以利于更多地掠夺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

至1937年之后,为了加强对农业的统制与掠夺,日伪又于当年6月公布了《农事合作社设立纲要》,在东北各地普遍地设立了"农事合作社"。农事合作社的人员与机构同行政区划一致,以县为单位,每县设一个农事合作社。农事合作社内设有正副董

---

①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7年版,第59—60页。

事长各一人，分别由伪县长与参事官（后为副县长）兼任，并设董事与监事若干名。县农事合作社下，以街村、保甲和屯为单位，设“实行合作社”，在实行合作社与县农事合作社之间，每个行政村设一个办事处。在县农事合作社之上，还有省一级的“农事合作社联合会”。1939 年，还在伪都新京设立了“农事合作社辅导部”，作为各农事合作社的中央机构，使农事合作社成为具有国家统治机关的性质。到 1939 年，全东北已有县农事合作社 153 个。在长春县，这期间也设有一个农事合作社，上属吉林省农事合作社联合会统辖，下设卡伦、米沙子、小合隆、双城堡、大屯等 5 个办事处，32 个村实行合作社，874 个屯实行合作社，共有社员 50 849 人[①]。

农事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比金融合作社广泛，它如同一张大网，把东北各地农产品的收购、贮运、加工和销售等全面统制起来。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经营交易场，通过对农产品的检验、划价，收取检查费，并以此排挤民族资本经营的粮栈，全面控制各种农副产品的生产与流通。

至 1940 年 4 月，日伪当局又根据金融合作社与农事合作社并存，经常在业务上发生矛盾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统制与掠夺，决定将两种合作社合并为兴农合作社。兴农合作社的机构设置，大体与农事合作社相同。在伪满首都，设有“兴农合作社中央会”，在各省，设有“兴农合作社联合会”，在各市县旗设兴农合作社，在街村设办事处，在各屯设“兴农会”。兴农合作社与伪满行政官署、“协和会”机构三位一体，各县正副县长分任兴农合作社的正副社长。兴农合作社成立后发展很快，至 1941 年，东北各地区已有省联合会 18 个，县合作社 185 个，屯兴农会 2 085 个，社员达 235 万人。在长春县也设有兴农合作社。在伪都

① ［日］片桐裕子：《满洲国的合作社政策》，《东北亚研究动态》1984 年第 1 期，第 13 页。

新京特别市，则于 1940 年 7 月，设立了兴农合作社，地点在民康路 426 号。社长由伪市长兼任，社长下设理事长及其管辖下的庶务、信用、农事、购销等 4 个系。兴农合作社下按行政区划设有净月、南河东、北河东、双德、合隆、大屯等 6 个办事处及其下属的 24 个兴农会，计有社员 4 601 人[①]。兴农合作社的任务主要有五项，即：(一)发放农业贷款；(二)统一购买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三)经营交易场；(四)强迫农民"粮谷出荷"；(五)推行、受理储蓄。可见，通过兴农合作社在东北的普遍设立，进一步全面地统制了农村的生产、金融和农产品流通等各个领域，进而加强了对农业经济的全面掠夺。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疯狂掠夺 在 1942—1945 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撑这场不断扩大，并走向失败的侵略战争，千方百计地疯狂地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其中包括大量搜刮东北的各种农产品。1941 年 12 月 22 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战时紧急经济方案要纲》，确定当时的经济政策的方针是："充分满足日本的战时紧急需要"。其中第三项内容，则明确规定："保持农产品的增产搜荷，强化国内配给，以增加对日输出。"同时，还把大豆、粮谷、纤维作物、油脂等作为"确保战争的急需产品"，而列入 1941 年末修改的"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之内。为了确保农副产品充分满足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紧急需要"，日伪特别强化了"搜荷"工作。1942 年 1 月，伪满政府公布了《农产品强制出荷法》，实行"省、县、旗、村、屯的责任体制"，并采取武力强迫农民"出荷"。1943 年与 1944 年又先后抛出《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案要纲》与《战时农产物搜荷对策要纲》，使之对农产品的掠夺更加疯狂与残暴。其具体办法是：动员日伪各种反动势力，倾巢出动，进行"搜荷"。当时，在伪中央和各省都成立了"出荷"督励班，各县旗成立了"搜荷"督励本部，下设"搜荷"工

①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 9 年版，第 94—95 页。

作班、取缔班、情报班、配给班、宣抚班及青少年特别班。每年到秋收季节，上述各反动机构与人员，则全部出动，在当地官吏、“协和会”及兴农合作社头目及警特人员配合下，在农村布下天罗地网，强行搜刮，把农村折腾得乌烟瘴气。他们随意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刨坑拆墙，搜缴粮食，把农民手中的粮食包括口粮和种子在内几乎全部刮尽。对不顺从交粮的农民，非打即骂，随意处罚、监禁或烧房。如在长春县，由伪兴农合作社主任日籍朝鲜人新春到吉，经常率领伪自卫团到各村屯搜缴“出荷粮”，致使蓝家乡农民 20 余户绝粮断炊[①]。在伪都新京，1943 年的“出荷”数量占当年全部农产品产量的 40%以上。

同时，为了扩大掠夺、搜刮，日伪更在这一时期，继续采取一些增产措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扩大耕地面积。为此，于 1943 年，伪满政府颁布了《紧急造成农地计划纲要》，规定：“所开垦之农地，预定生产的粮食，除生产者自食部分外，全部供给日本。”在伪都新京，则继续实行 1940 年拟定的《新开河土地改良事业计划书》，将长春县的烧锅、福仁、三岗、龙王、华家桥，农安县的巴吉垒、匡家窝棚，长岭县的李药铺等 9 村，总面积 2.4 万公顷的土地，划为造田范围。使用“国民勤劳奉公队”，进行工程建设。到 1944 年完成太平池水库的大部分工程和一部分排灌工程，形成旱田 2 800 公顷，开发水田计划落空。

此外，在这期间，日伪还于 1942 年 4 月，制造了建立“自兴村”的“五年计划”，第一年准备建设 75 个自兴村。其办法，以原先的“实验村”为核心而设立，用以指导农业增产，进行农事训练，造成“模范农家”。在长春市，则于 1942 年在南河东区设立了一处“自兴村”，用以培养“自兴精神”，造成“模范农家”。并从该村选出 3 名青年，送至伪中央农事训练所，培训一年，以作为从事农业“增产”的“指导者”与骨干。

---

① 《长春史志》，1992 年第 2 期，第 83 页。

由于采取上述一些增产与“搜荷”措施，曾扩大了耕地面积，1937年，长春有耕地面积为9 578陌，至1941年3月，增至17 383陌。因而也提高了粮豆的总产量，使日伪掠夺了更多的农产品，但在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却下降了17.99%。而且由于疯狂“搜荷”及其它掠夺，使广大农民越发贫困，进而造成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

对畜产资源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长春的土地和农产品进行大肆掠夺的同时，也对畜产资源进行了掠夺。为此，对羊毛加工业进行了统制，对其它畜产品加工业，虽允许自由经营，但对其生产与销售则进行一些限制。同时，又在长春创办农事试验场、种畜场、养猪场、养鸡场、奶牛场等，并输入大量良种畜禽，进行改良品种，以期推动长春畜牧业的发展，而加大对畜产资源的掠夺。1931年，在大屯设置了种猪场，随后于1934年始从日本输入大量的巴克夏、约克夏种猪，与中国东北当地猪进行杂交，以改良品种；在长春东郊设置了“新京酪农株式会社奶牛场”，饲养奶牛1 000多头，并在长春西郊由日人加藤设置牧场，也有奶牛数百头，还不断从日本北海道输入大型日系荷兰奶牛；在长春南郊孟家屯设置“新京养鸡场”，饲养引入的来航种鸡3 000余只；此外还在长春设置种马场，引入日本的杂种马，进行品种改良。1942年9月，伪马政局曾在长春举行一次改良马展览会，展出改良马40余匹，并奖励了改良增殖种马的25个“模范县”，其中包括长春县。

为了扩大对畜产品的掠夺，伪满还设了一些畜产机构，并于1937年始实施了伪满“畜产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果，使长春的制革、骨粉、肉食、白粉等工业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制革等工业发展尤快。1940年，在长春的制革数中，牛革为4 631张，马革为5 415张，猪革为13 550张，羊革为3 200张[1]。

---

① 《长春史志》，1993年1—2期，第15—16页。

至 1942 年，日伪又实施了“畜产开发第二个五年计划”，除把羊和马作重点外，还从军需方面需要出发，将牛、猪、鸡、兔等也列为生产重点。随后不久，又制订了“战时紧急畜产振兴计划”，以期尽快地掠夺更多的畜产品。

此外，还在长春设立伪畜产兽医大学和马疫研究处等畜牧科研与教学机构，并对长春及东北的畜牧业情况进行了多次调查，以图扩大对畜产资源的掠夺。其中畜产科研工作因周期较长，到伪满垮台前尚未获得结果。

上述的一些措施，曾使长春的畜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马、骡等大牲畜数目有了较大的增长。从长春地区的长春、九台、德惠、农安、榆树等 5 县来看，大牲畜增长了 24.1%，其中马增长 27.4%，骡增长 73.5%，而牛、驴、猪、羊则分别下降 27.4%、17.7%、1.44 倍与 77.2%。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畜牧业的发展与畜产品的增长，只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与产品，对从事畜牧业的长春人民仍然难以吃用自己生产的畜禽产品。

移民政策的制定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东北农业实行全面统制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东北实行了移民侵略。移民侵略的目的与原因主要有四条：(一)直接控制中国东北农村，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二)加强对中国东北农业的掠夺；(三)适应进攻苏联的需要；(四)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为此自“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制定移民侵略政策与计划，不断扩大移民侵略。关东军从 1932 年 1 月始，先后进行几次会议，策划移民方案。1934 年 11—12 月，关东军在伪都新京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等移民方案。1935 年 5 月 7 日，日本拓务省根据关东军的移民方案，制定了《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针之件》，确定了移民计划的根本方案，决定自 1936 年起，在 15 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 10 万户的移民计划。1936 个 1 月又在中国东北设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简称“满拓”)。日

本侵略者还从1932年9月至1936年5月，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四次武装移民和一次集团移民，计2 800户。

1936年4—5月，关东军又于伪都新京召开了第二次移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日本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伪满政府、满拓、满铁等代表。会议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及《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纲案》，其主要内容是日本计划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相当于日本全部农民的18%）；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为10万户，以后每次递增10万户，到1956年完成。同时，又先后设立了"移民事务处理委员会"、"满洲拓殖公社"和"满洲拓殖委员会"，以期全面统辖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事宜。此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侵略，并继续召开多次会议，制定新的政策，设立新的机构。其主要的有《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开拓团法》和设在伪兴农部下的"开拓总局"。

对长春地区的移民　　日本实行移民侵略的地区，主要集中于沿苏联边境一带，山林边远地区和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中心地区。长春是伪国都所在地，属于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中心，当然也是日本进行移民侵略的地区之一。

日本对长春地区的移民侵略，开始于1938年4月，即所谓第七次移民，由日本的熊本、长崎等地迁入，计30户，约200人，类别属于分散移民。至1943年，剩下26户，189人，迁至净月区的"力行村"。此后，从1939年至1943年间，每年都有一个团或几个团的日本移民迁入。至1943年12月，伪新京共迁入日本移民270户，1 102人。长春县除新安某地一处外，共迁入日本移民430户，977人。两项合计700户，2 079人。

迁入长春市及长春县的日本移民统计表

（1943 年 12 月）

迁至地区		种类	来源	团长名	迁入时间	计划户数	现有户数	现有人数
长春市（伪都新京特别市）	净月区　力行村	分散	熊本、长崎、冈山	平州正喜	1938.4	30	26	189
	双德区　清明村	分散	各县	小室宇	1939.6	50	21	86
	北河东区　出云村（杨家店）	集合	岛根	吉田军藏	1940.4	50	26	103
	净月区　净月村（南家店）	集合	各县	后藤清治	1940.4	50	46	165
	南河东区　芙蓉村	集合	静冈	峡	1940.4	50	26	119
	××区　三家子村	分散	各县	高桥东顺	1941.2	26	1	4
	合隆区　美浓村（崔家营子）	集合	岐阜	野村宇吉	1941.4	50	38	132
	双德区　丰荣村	分散	宫崎、各县	矢野实秋	1941.12	12	11	34
	北河东区　云井村（金钱堡）	集合	高知	山冈勇	1942.4	50	25	82
	××区　住磨村（王家屯）	集合	长野	小泽洞一	1942.4	50	50	188
	小计			（10 个团）		412	270	1 102

长春县	太毛	分散	各县	木村枫吉	1941.4	10	13	24
	?	分散	北海道	木村宽吉	1942.3	30	10	28
	长春岗	集团	山形	渡边物弥	1942.5	300	55	167
	杏木岗	集团归农	高知	迷弗盛喜	1942.5	200	130	423
	新安	集团归农	东京	三端一雄	1942.5	200	155	258
	洼中	集团	广岛	冈本勇	1943.3	200	67	77
	新安	集团归农	东京	——	1943.3	200	?	?
	小　计			（7个团）		1 140	430	977
合　计				（17个团）		1 552	700	2 079

资料来源：[日]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译文，第538—542页；
[日]《满洲建国十年史》，第3部，第366、368、372页；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9年版，第93页。

此外，在长春地区的德惠、九台、双阳等地，也迁至一些日本移民和朝鲜移民。1942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东北各地设立了17个“报国农场”，其中包括在长春净月地区设立的一个“报国农场”。参加“报国农场”劳役的均为从日本组织的“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人员，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全部运往日本[1]。

移民侵略带给人民的苦难　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直接给中国东北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剥夺了广大东北农民的土地，并给农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在长春市及长春地区也同样。如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20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计划，于1939年决定在德惠县的松花江伊通河、饮马河沿岸低价收买土地73 713垧，其中熟地占38 040垧，后因中国人民的反对，被迫减少了收买数量，但仍强行占去熟地5 000垧[2]。再如，在长春西北50公里的新开河地区，日本

① [日]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卷，译文，第534页。
②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366页。

侵略者为安置第11次至第13次的移民，计1 100户，从1941年起大批收买土地，并将二三百户当地农民强行迁居北满。至1945年日本垮台前，已迁入该地区的日本移民占移民计划的一半①。又如，在九台县，日伪为了安置迁进的600余名日本移民和从延边地区迁进的400余名朝鲜族民众，竟把饮马河车站至石头口门的当地农民2 000余名迁往外地②。

此外，在九台县有由"满拓"与"鲜拓"于1939年6月联合开办的"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在饮马河设立的"土地开发株式会社饮马河事务所，用以管理移民和掠夺土地；在伪都新京特别市则有日本移民团于1943年12月设立的"长野县满洲开发事务所"，作为管理移民事务和掠夺土地的机构；在双阳，朝鲜移民也占去中国农民的不少土地，并被改成了水田。更有甚者，即有些移民团的日本移民，占据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后，自己并不耕种，反而租给中国农民，或雇佣中国农民耕种，使他们自己变成了剥削中国农民的日籍地主富农。这样，又使中国农民遭受中日双重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其生活则更加贫穷与困苦。

6、奴役劳动，搜刮民财

劳动统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实行的劳动统制是它整个经济统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统制政策，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疯狂掠夺，也是对我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奴役。自伪满政权建立后，日伪便开始制定劳动统制政策，设立劳动统制机构。1933年9月5日，伪满政府便在伪都新京设立了"劳动统制委员会"，作为伪满最高的劳动统制机构。该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兼任关东军特务部长的关东军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上，译文，第330—331页。
② 高奉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水利状况》，第7页。

参谋长小矶国昭担任，委员由日本的关东军参谋部、驻伪满"大使馆"、关东厅、满铁经济调查会、朝鲜总督府和伪满的民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交通部、土建协会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劳动统制委员会组成后，于 1934 年 1 月 9 日与 3 月 12 日，在伪都新京分别召开了第一次与第二次会议，研究制定了对东北劳动力统制和限制华北劳动者进入东北等政策。接着，于 1935 年 3 月 9 日与 12 日，分别由关东局和伪满民政部发表了《外国（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关内也称为"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划》，对限制华北劳动者进入东北作了具体规定，并将 1934 年设立的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劳务机构——大东公司，作为执行限制华北劳动者进入东北这一政策的专设机构。

加强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与控制　至 1937 年之后，日伪由于实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部振兴三年计划"，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为此，日伪曾放松了对华北劳动者进入东北的限制。旋因"七·七"事变的爆发，使进入东北的华北劳动者明显减少。为了更多地掠夺劳动力资源，解决劳动力的不足，日伪强化了劳动统制。伪民政部于 1937 年 12 月，制定了《满洲劳工协会法》，到翌年 1 月，在伪都新京设立了"满洲劳工协会"，负责垄断劳动者募集、运输、训练及劳动力市场管理等各种业务。并在伪都新京及奉天、佳木斯、牡丹江等地设立了四处简易宿舍，负责收留、训练、管理、招募工人等工作。1938 年 2 月，又公布了《总动员法》，其中的第 21—25 条，对平战两时征用劳动力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同时，又在新设的伪国务院规划委员会下，设立了"劳务委员会"，以代替 1933 年 9 月成立的"劳动统制委员会"。1938 年 6 月，开始实施《暂行劳动票发给规划》，7 月，又制定《劳动统制要纲》，12 月则又颁布了《劳动统制法》。通过这几个规定、法令，企图采用缔结同业者的地区协定、"全国"协定、分科协定和进行劳动登记及指纹登记等措施，来加强对劳动者的供需统制，防止其流动。此后，又于 1939 年 9 月制定了《调

整劳动力供需要纲》和《工资统制方策要纲》,1940 年 11 月,又制定了《劳动者移动防止对策》等法令,用以控制与防止劳动力的流动。

"劳务新体制"的推行 至 1941 年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苏备战的扩大和发动太平洋战争,使军事工程和军事运输等方面所需的劳动力急剧增加。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日伪确立了所谓"劳动力国内的自治体系",即推行"劳务新体制",用强制手段疯狂地掠夺劳动力资源,无偿地奴役我国东北各阶层的民众。于是便于 1941 年 9 月,颁布了《劳务新体制要纲》,10 月颁布了《劳动兴国会法》,在伪都成立了"满洲劳务兴国会",撤销了 1938 年成立的"满洲劳工协会",由"劳务兴国会"来接管劳工协会所辖的事务。在《劳务新体制要纲》中,提出了所谓"勤劳尊重、国民皆劳、劳务兴国"等三大方针,根据《劳务新体制要纲》的精神,于 1942 年之后,又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强化劳动统制的法令。

"劳务新体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推行"勤劳奉公制度"。对此,日伪当局于 1942 年 6 月,制定了《勤奉制创设要纲》,10 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局官制》,11 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12 月,又颁布了《学生勤劳奉公法》,并在伪民生部下设立了"国民勤劳奉公局"(1945 年 3 月后,民生部撤销,又设"国民勤劳部")。根据《国民勤劳奉公法》等法令的规定,凡年满 20—23 岁的青年男子,未被征为"国兵"者,都有参加"勤奉队"的义务,服役时间为三年之间共 12 个月。大学生(后来扩大为中学生)每年要参加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的劳役,否则不准毕业。"勤奉队"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建造军事工程、水利工程,修筑铁路与公路,"开发"土地、矿山等繁重劳役。根据"勤奉制"的法令,先后在东北各地都设立了"勤劳奉公队"的各级组织,其头目由日伪各级政权机构的头目担任。伪都的各阶层群众也都参加了"勤奉

队”，无偿地供日伪统治者驱使与奴役。在大屯，还设有“勤奉队”的“中央干部训练所”，所长由“勤劳奉公局”局长半田敏治兼任，负责训练“勤奉队”的大、中、小队长等各级干部。此外，在伪都新京还设有“发卖奉仕香烟所”，用于“慰安”“勤奉队”员。

二是实行“紧急就劳”。即用强制手段摊派劳工，或用武力抓捕劳动者。对此，伪民生部曾于1942年2月，颁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随后，又颁布了《劳动者紧急募集要纲》。根据这些文件，日伪各级机构，可以“公共事业和国策事业的紧急需要”为由，随时随地地大肆摊派劳工，无偿地占用与驱使大批劳动力，为其从事各种繁重艰苦的劳役。至1943年以后，为了补充劳动力的紧急需要，日伪当局还常以“抓浮浪”为名，出动警察，强行抓捕平民百姓充作劳工。如在1943年4月19日午后与夜间，伪首都警察厅就出动大批警察，在市内各处进行搜捕，共抓去3 160人，将其中1 287人强行充作劳工[①]。

三是实行工资统制和“劳动手帐制度”，防止工人流动。继1939年发布《工资统制方策要纲》之后，1942年4月，伪民生部又发布了《工资统制规定》，即在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以工人最低生活费为标准，来规定工人的工资，控制企业提高工人工资，防止工人流动。又于1943年12月，发布了《国民手帐法》，实行“劳动手帐制度”。根据《国民手帐法》规定，如果工人得不到当局发给的“手帐”，就会失去就业机会。这样，就使工人只得按照日伪当局的摆布，出卖自己劳动力，换取十分微薄的报酬。

对劳动人民的奴役与迫害　　在日伪的劳动统制下，长春的各阶层民众，和整个东北各地的民众一样，遭受了深重的剥削与压榨。特别是工人，不仅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收入甚微，或毫无所得。如在1940年9月，伪新京的标准工资规定，就十分低下。每个男性工人，每天虽然劳动12个小时以上，但一般工人的

---

①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97页。

每日工资仅有 1 元，日工、杂工为 1.2 元，力工 1.45 元，石匠 2.35 元，木工、瓦工及其他技工 2.2 元。而日本工人的每日工资，分别都高出中国工人 1/4[①]。

不仅如此，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劳动力的疯狂掠夺下，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得安宁，时刻都要受到“抓劳工”、“抓浮浪”的威胁。而被抓去充作劳工者，又会受到各种非人的奴役与迫害，有些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被折磨致死，或遭日伪军警的残暴杀害。如在 1944 年冬，日伪大批警察特务，在长春的头道沟、二道沟、宋家洼子等地“抓浮浪”，将抓到的 100 余名青壮年五花大绑，用黑布蒙上眼睛，押送到营城煤矿“浮浪坑”内挖煤。仅 2 个月期间就因过于劳累、日警的打骂虐待、冻饿与疾病折磨，放炮冒顶崩压等事故，死亡了数十人[②]。

此外，还有伪协和会所搞的“勤劳奉仕运动”，“劳务兴国会、所”搞的“劳务兴国运动”，都驱使各阶层民众，包括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在内，无偿地为日伪当局从事各种繁重的苦役。如在伪都新京，许多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学生都参加了伪协和会组织的诸如修筑“忠灵庙”、伪皇宫、“绿化”伪都等“勤劳奉仕”的劳役，使许多学校的学生荒费了学业，而成为为日本“大东亚圣战”而效力的劳动大军。

日伪统治东北时期，除了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大肆掠夺东北各种资源外，还千方百计地搜刮东北各地的民财，直接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其搜刮手段很多，摘举下列六种。

不断增加税收　1932 年 6 月，伪满政府公布了税制，随即实行了名目繁多的税收。开始时沿用了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权的税种，此后，随着日伪法西斯统治的不断加强，税收的种类与数额也不断增加。至 1939 年，伪满的现行税目已达 24 种，并

---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下，译文，第 822 页。
② 《吉林文史资料》第 17 辑，第 119—1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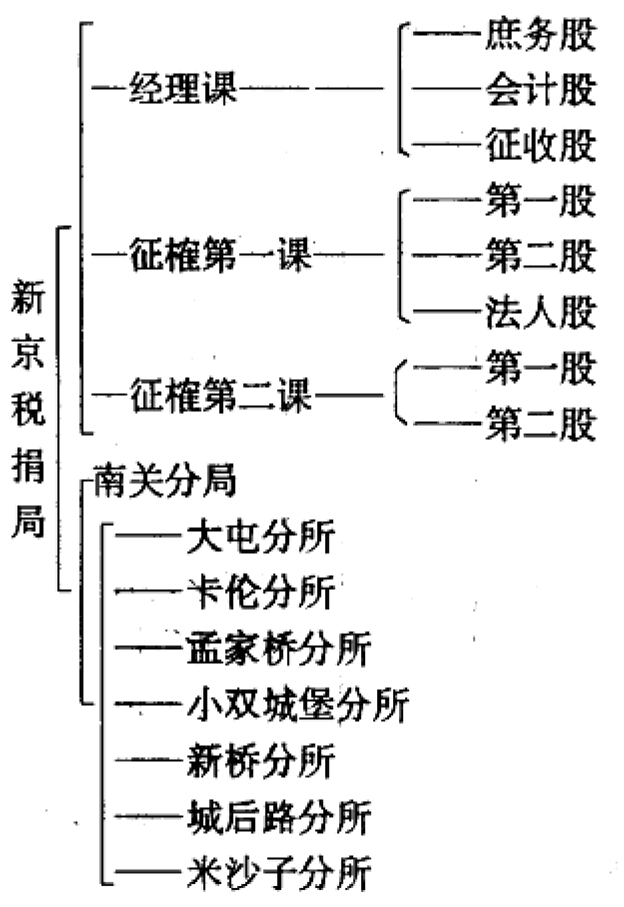
形成了以收益税、消费税、交通税三大税种为骨干的较为严密的租税体系。至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更不顾东北人民的死活，大幅度地增加税收，突出地表现在，自1941年至1944年，连续四次实施所谓“战时增税”，从东北各阶层民众身上搜刮了9.53亿元的血汗[1]。伪满1943年的消费税与收益税分别比1937年增长了6.5倍与7倍[2]，平均每人负担的税额有6.68元，增至16.20元，增长了约一倍半[3]。

在伪都新京，为了增加税收，首先整顿与强化了税收机构。1932年设立了税捐局，1933年又设立了隶属于伪财政部税务监督署的“新京派出所”，负责管理伪新京市和长春县的税收。1932年，伪新京税捐局下设16个分局、18个分卡。1933年，伪“新京税捐局”下设南关、廖家油坊、卡伦、赵家窑、吉长站、孟家桥、新桥、大屯、小合隆、米沙子、小双城堡、城后路等12个分所。到1937年5月，将原新京税捐局内设的总务、经征、稽查三课改为经理和征榷第一课、第二课和下属8个股，以及一个分局和7个分所，其组织机构如下：

① 《长春文史资料》第2辑，第84—86页。

②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510页。

③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4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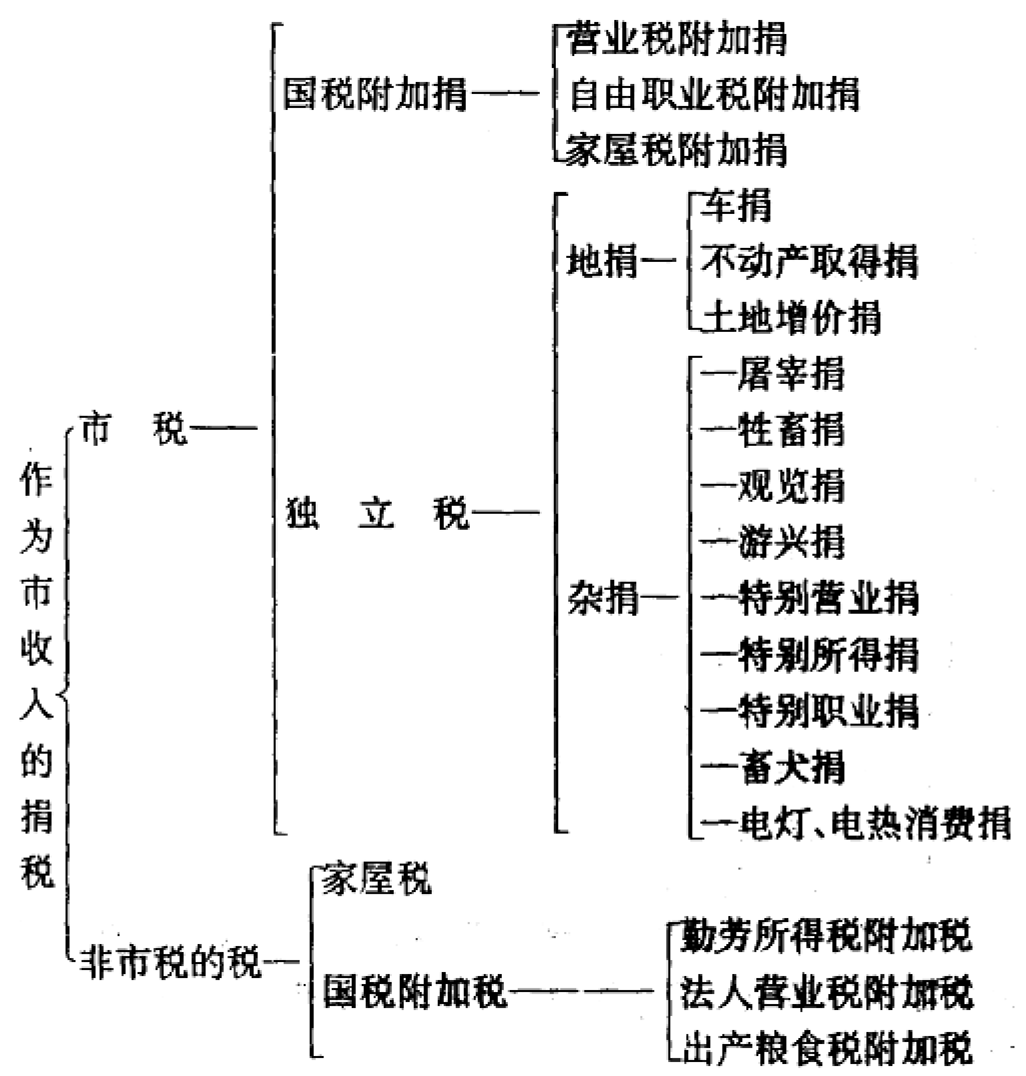
除了"新京"税捐局为专管的征税机构之外，还有"新京特别市公署"与长春县公署也作为非专管征税机构，征收部分内"国税"和地方税。

在强化税收机构的同时，也加强了税收工作。自 1934 年 7 月开始，伪新京特别市取消了旧有的一些税捐，实行了"新税制"。这时实行的税目主要有：地捐、房捐、营业捐、杂捐、户别捐等多种；其中营业捐包括银行捐、窑业捐、经纪业捐、妓馆捐等。杂捐包括车捐、不动产所得捐、土地增价捐、牲口捐、影剧捐等[1]。到 1938 年时，伪都新京，随着伪满对"国税"附加税和省地方费税的实施与修改，制定了新的市税征收办法，其征收的市税名目如下：

---

① 《长春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64 页。

①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时较1934年又增加了自由职业税附加捐，杂捐中的屠宰捐、观览捐、游兴捐、畜犬捐、电灯、电热消费捐以及“国税”附加税中3种附加税等。至1941年时，又将营业捐和自由职业税附加捐取消，代之为事业所得税附加捐。此外还增加了特别卖钱税分与税等税目②。

随着税捐数目的增加，税收的数额及群众的负担也呈上升趋势。至1937年之后，则急剧增涨。其税收额1941年为1932年

① 《长春文史资料》第2辑，第64页。
②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9年版，第75页。

的 171.9 倍，人均负担，1941 年为 1932 年的 36.25 倍。详见下表：(单位：元)[①]

年　度	税收总额	人口数	人均负担额
1932	80 817	104 778	0.77
1934	511 793	136 215	3.76
1937	829 468	241 553	3.43
1939	4 862 593	378 242	12.85
1941	13 771 315	492 911	27.93

1941 年至伪满垮台，随着伪满在东北各地连续实施四次战时大增税，伪都新京也同样受到严重的搜刮，这是不言而喻的。

大量发行公债　日伪统治当局，自 1932 年始，即发行各种公债，强制各阶层民众认购。在 1937 年前，主要公债有：继承亏损补贴公债、积缺善后公债、三铁路收回补偿公债、北满铁路公债、"建国功劳赐金公债"、整理公债等；至 1937 年后，主要有："开拓事业公债"、"报国公债"、"兴农债券"、"兴业债券"、水力电气公债、"金融合作社公债"等。从发行数额上看，逐年增加，至 1937 年后，则急剧增长。1932 年为 3 500 万元，1937 年为 4 亿余元，1941 年为 27 亿余元，1945 年 8 月达 40.55 亿元，为 1937 年的 10 倍多，更为 1932 年的 115.8 倍多。但偿还数却很少，仅为 1.4 亿元，只占公债总数的 3.5%。在 1945 年 8 月的 40.55 亿元公债中，内债 30.25 亿元，为 1933 年内债总数 5 092.5 万元的 59.4 倍，其偿还额更少，仅 0.57 亿元，只占内债总数的 1.8%[②]。

---

①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 202 页。
② 《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第 520—521 页。

伪都新京也不例外，各阶层群众也深受伪满发行的各种债券的盘剥。此外，伪都新京，在进行土木、上下水、住宅、电气、商业市场、学校、医院等建设方面，又从伪中央银行、伪兴业银行、贮金部、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借入大批资金。1939 年 1 月，伪都新京特别市的市债总额为 1 297 万余元，每户平均负担 154 元，每人负担 31.2 元。1941 年 12 月，市债总额增至 2 049 万余元，每户负担达 181 元，每人负责 33.4 元①。这些债务负担，必然转嫁给伪都的各阶层民众，进而加重了当时及以后对伪新京市民的搜刮。

强制推行义务储蓄　日伪统治当局从 1938 年开始，便设立了一些机构，颁布了一些法令，陆续在东北各地开展“储蓄运动”。1938 年 9 月，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国民储蓄联络委员会”，开始在伪都新京以及大连、锦州等地，开展所谓“勤俭储蓄运动”。随后，又在各地设立了各级“国民储蓄联络委员会”。1939 年 12 月，伪满政府公布《贮金部法》，在伪中央银行内设立了储蓄部，专门办理储蓄业务。1940 年，伪协和会制定《国民储蓄运动加强实施要纲》，提出了开展“国民储蓄运动”的指导方针。1941 年，伪经济部又颁发《国民储蓄奖励实施要纲》，以图加强对“国民储蓄”的控制。1942 年 6 月，伪满政府又发布《国民储蓄会法》，明确规定参加储蓄是“国民”的义务，并扩大“储蓄会”的范围，规定上自官署，下至街村、车间，一律组织“国民储蓄会”。又在伪中央及地方设置“国民储蓄实践委员会”，作为“中央国民储蓄联络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并在“中央国民储蓄实践委员会”内设事务局，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至 1944 年，又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置储蓄奖励本部，作为储蓄运动的指挥机关。

为了开展储蓄运动，日伪当局还采取种种办法进行欺骗宣传，其中突出的有举办“储蓄运动实践旬”、“实践周”、“实践日”，

①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 7 年版，第 45 頁；康德 9 年版，第 84 頁。

印发传单、标语、明信片和发布广告、文告等。由于民众穷困，无力购买储蓄，因而宣传效果不大。日伪当局则采取强行摊派，硬性克扣，强制搭配等手段，强迫民众义务储蓄，企图由此完成储蓄任务。如 1939 年，日伪当局规定，全伪满的储蓄额为 5 亿余元。为完成这项指标，则强行摊派给伪都新京及吉林、奉天、龙江等 14 个省市，其中，伪新京最多，为 1.42 亿元，占总额的 1/4 强。此外，还采取不动产销售储蓄、鸦片瘾者储蓄、小学生储蓄，以及发行“必胜储蓄票”、“爱国储蓄票”和各种彩票等办法，强制进行储蓄，或从工资、奖金中扣除。甚至连看电影、戏剧，参加娱乐活动，下饭馆，购买烟、酒、茶等日用品，也要按销售额或商品价格，搭配一定数量的储蓄票。

强制推行义务储蓄，“储蓄报国运动”的结果，使日伪当局从民众身上榨取了巨额奖金。1939 年为 6.3 亿元，1940 年为 8.3 亿元，1941 年为 8.9 亿元，1942 年为 11.6 亿元，1943 年为 16.4 亿元，1944 年为 37.8 亿元，1945 年预计为 60 亿元[①]。

实施消费品“配给”统制　日伪实施消费品“配给”统制，始于 1938 年。当年 12 月 27 日，伪国务院就通过了《生活必需品配给统制要纲》，并于翌年 2 月 23 日成立“满洲生活必需品配给株式会社”，用以整顿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机构和配售网以及统制其价格。随后，于 1939 年 6 月，实行大米统制，禁止一般民众食用大米。7 月，日伪当局，在伪都新京设立“米谷配给组合”，对米谷实行统制。9 月，“满洲生活必需品配给株式会社”，决定对全部生活必需品采取“配给”办法，在全伪满城市实行“配给制”，结果在 18 个城市设立了 41 个“配给所”。在伪都新京则设有吉野町（今长江路）、丰乐路（今重庆路）、安达街、永春路等四个“配给所”。1940 年 3 月，伪满政府又颁布《主要生活必需品输入及配给统制实施要领》，规定：对砂糖、茶叶、淀粉、皮鞋、“协和会”制

---

① 《伪满中央银行史料》，第 359 页。

服等甲号品，由“满洲生活必需品配给株式会社”进行统制；对罐头、海产品、乳制品、纺织物等乙种品，由“满洲生活必需品配给株式会社”和“输入联盟”进行统制。同年6月15日，伪满又在农村实行生活必需品“配给”统制。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伪当局根据物资紧张状况，又提出确保军需的“顺位配给”措施；规定：物资“配给”的顺序是军需、准军需、官需、特需、准特需、重要民需、纯民需等7等，即把民需排到最后一位。对民众所需的物资，包括粮食、食盐、酱油、面碱、劈柴、煤炭、棉花、棉布、衣服、鞋袜、火柴、蜡烛、灯泡、纸张、砂糖、烟草等等，均实行“通帐配给制”，发给用户“通帐”，凭“通帐”到指定“配给所(店)”去购买。伪都新京除“通帐”外，还有卡片。“配给”的生活用品数量少，质量低，根本不能保证民众最低限度的需要。以粮食为例，一般民众每人每月“配给”粮食：城市，大人9公斤，小孩7公斤，农村大人6.5公斤，小孩6公斤。至1943年后，标准又降低，大人5—7公斤，小孩2—3公斤。而且质量低劣，常常将发霉的玉米面等强行“配给”民众。伪都新京民众的生活用品配给情况也和东北各地一样，由于数量少、质量差，根本无法保证民众最低限度的需要，有许多急需的日用品，不得不到黑市去高价购买，这便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使之更加贫困。

滥发伪币，造成物价飞涨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通过设在伪都的伪满中央银行，控制了中国东北的金融大权，垄断了伪满货币的发行。伪中央银行根据1932年6月伪满政府颁布的《货币法》与《旧货币整理办法》，强制进行了收兑原有货币，统一伪满货币的工作。至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以日元作为伪满通货的标准，自1936年起，随着日本的通货膨胀，伪满也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从中又榨取了东北人民的大量血汗。至“七·七”事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侵略战争的巨大消耗，造成了伪满财政的拮据。为了扭转财政危机，日伪进一

步实施通货膨胀政策，使伪币的发行量由1941年的13亿余元增至1945年7月的80亿余元。滥发纸币，必然导至物价上涨。1936年的物价指数为100，至1944年上升为385.3。其中伪都新京的物价上涨趋势也大体相同。以1933年为100，1937年增至125.1，1941年增至248.6，1944年增至357.8[①]。由于物价上涨，必然造成人民生活费的上涨，生活水平的下降。据统计，以1936年长春生活费平均指数为100，1937年升为108.18，1941年升为250.5，1944年升为377.9[②]。

同时，由于生活必需品实行统制，且数量少、质量低，供不应求，所以一般民众就不得不到黑市去购买急需日用品，而黑市物价上涨比例更大，上涨速度更快，从而使民众的生活水平更加低下。以1940年为例，长春的大豆、豆油、玉米、精白高粱米的黑市价格都高出公定价格的1/3到2/3[③]。至1942年之后，长春的黑市物价上涨到惊人地步，使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如官定价格为100，高粱米的价格指数，1942年为583.5，1943年为1 078.7，1944年为1 445.9；大豆，1942年为294.7，1943年为556.9，1944年为1 001.4；豆油，1942年为440.5，1943年为916.2，1944年为2 414；火柴，1942年为592.8，1943年为937.2，1944年为1 241.6；砂糖，1942年为397.6，1943年为977.5，1944年为3 083.8[④]。

大搞"金属献纳"运动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巨大消耗，日本帝国主义对金属类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增加。为此，日伪便于1942年4月开始，搞了一个所谓"金属献纳强调运动"，在中国东北各地回收废旧金属制品。当年4月8日，日伪就制定了关于"献纳金属的处理要领"，1943年4月8日，又以伪皇帝溥仪的名义，下令回收金属，支援"大东亚圣战"。同年8月，伪满政府又

---

①　②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205—208页。

③　④　孔经纬：《长春经济演变》，第207—209页。

颁布了《金属类回收法》，把手伸向民间，对每户民家都规定了具体的“献金”数额，限期缴纳；不能按期完成者，课以罚款。这样，“金属献纳”运动便以伪首都新京和其他10个较大城市为主，在东北各地开展起来。伪皇帝溥仪为了表示对日本主子的忠心，带头将自己收藏的金银制品“献纳”出来，并将伪皇宫内60余种金属制品一并“献纳”。至1944年，“献金”运动扩展到119个市县，回收种类由1943年规定的53种，扩大到99种。从民众生活使用的汤匙，到衣箱家具的小五金，甚至铜、铝等炊具，也都成为“献纳”品。一些人家无物“献纳”，为免去受罚，不得不到黑市去高价购买金属制品，以应上差。

上述的六个方面，并不能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人民，包括长春人民在内进行疯狂搜刮的全部。但仅就这六个方面却能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群众的经济搜刮，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榨取了东北民众的大量血汗，攫取了巨额财富，使包括长春人民在内的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缺衣少食，入不付出，陷于十分悲惨的境地。

四、殖民地“特别市”的市政建设

1、伪新京市的统治机构与行政区划

辖区面积的扩大　长春沦陷不久，便设立了伪长春市政府。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奠都”后，将伪长春市政府改为伪新京市政公署。1933年4月，又改为伪新京特别市公署。这时的城市面积均为200平方公里。1936年1月1日，随着伪北满特别区的取消，将原属“北满特别区”管辖的二道沟一带划归伪新京特别市所辖。1937年10月，又将长春、双阳两县各一部（包括卡伦、大合隆、大屯、草沟堡等地）并入伪新京特别市。同年12月，由于日本废除所谓“治外法权”，将“满铁附属地”行政权交给伪满政府，则将原属满铁所辖头道沟一带约5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伪新京特别市。这样，便使伪新京特别市的面积由200平方公里增至444.19平方公里，其中市街区107.45平方公里，农村区336.74平方公里①。相当于当时日本首都东京市面积的70%，英国首都伦敦市面积的150%。

统治机构及制度　伪新京特别市公署的统治机构，在1933年4月，设有伪国务院直属的“特别市”市长，市长下设总务、行政、工务等三个处。1935年8月，增设财务处。到1937年7月，进行机构调整，除设市长外，还设副市长。在下属机构中，

①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9年版，第56—57页。

将总务处取消，改设官房，并增设卫生处。1938年1月，将原归伪国务院管辖的伪国建设局降格，改为"临时国都建设局"，作为伪新京特别市所属的一个局。1940年11月，又将原隶属于伪国务院的伪首都警察厅降格，改由伪新京市长所辖。1942年，又将伪临时国都建设局撤销，随后又增设水道处，1943年再将财务处改为实业处。

在这些机构中，虽然伪市长一直由汉奸充当，但副市长则一直由日本人充任。他们掌握着伪新京市的实际大权。在下属各处中，除行政处外，其余各处头目也几乎都是日本人，分别掌握各方面的实权。至于临时国都建设局的局长及伪首都警察厅的副总监也同样由日本人充任，掌握着实权。市长、副市长任职情况详见下表：

伪新京特别市历任市长、副市长职官表

"特别市长"：

金璧东　1932年3月10日—1935年5月24日(其中1932年3月10日—1933年3月为市长)

韩云阶　1935年5月25日—1937年5月6日(1937年5月7日—6月30日由植田贡太郎代理)

徐绍卿　1937年7月1日—1938年2月9日

于静远　1938年2月10日—1940年5月15日

金名世　1940年5月21日—1942年9月27日

张联文　1942年9月28日—1945年8月10日

于镜涛　1945年8月11日—1945年8月15日

副市长：

关屋悌藏　1937年7月1日—1941年2月4日

大迫幸男　1941年2月5日—1945年8月15日

资料来源：

《长春史志》，1991年第3期，67—73页；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94版，第63—64页。

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伪新京特别市的统治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1935 年 7 月，日伪在伪新京特别市制定与公布了施政纲领，提出所谓“政治王道化”、“日满一体化”、“官民一心化”的“三化”目标，企图把伪都新京建成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统治中心。从组织上，先是设立了“自治委员会”，至 1937 年，将其取消，改设咨议会，作为伪市长的咨询机关。咨议会设议长 1 人，咨议会员 15 人（包括日伪两方人员和个别朝鲜人），负责咨议伪新京特别市的规章、法令、预算、税收、财务等各方面事务。至 1941 年，又取消了咨议会，此后事务由伪协和会“首都本部”的委员来担当。

关于伪新京特别市的基层统治，在 1934 年，曾实施了保甲制与街内会制。至 1937 个 12 月，随着伪新京市区的扩大，取消了保甲制，改为行政区制与街（屯）会制。各区作为市的辅助机构，设有区长 1 人和区事务所。区事务所设事务主任 1 人和 4—10 名事务员（后来，人数又有新的增加），区事务所的工作，主要是辅助区长，对下属街（屯）会进行指导和区内事务处理。区长下设街（屯）会长及副会长、多名事务员，负责街（屯）内的事务处理。在 1941 年伪满实施“国民邻保组织”之后，街（屯）会制也取消，其事务由设在街（屯）内的“协和分会”充担。这时的“协和分会”负责人又是“国民邻保组织”的负责人，实现了所谓“市政与协和会”的“一元化”。

行政区划的几次调整　　为了加强对伪新京特别市的殖民统治，日伪当局还多次对伪新京特别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1937 年，有 18 个行政区，包括吉野、敷岛、宽城、大经、长春、和顺、兴安、顺天、东光、车站、承德、惠仁等 12 个市街区和净月、合隆、大屯、南河东、北河东、双德等 6 个农村区[1]。1940 年 1 月，改为 14 个行政区，包括敷岛、宽城、长春、和顺、顺天、东光、承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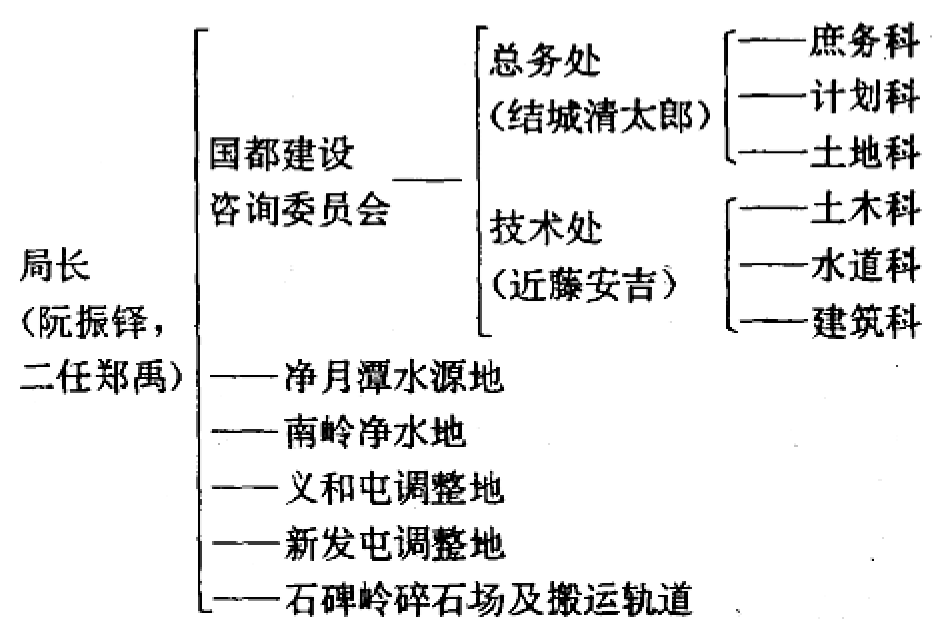
① [伪满]《新京指南》，第 5 页。

惠仁等8个市街区和净月、合隆、大屯、南河东、北河东、双德等6个农村区①。1942年2月，又改为16个行政区。其中农村6个区未变，市街区计10个，分别为敷岛、长春、宽城、大同、安民、西阳、东光、和顺、东荣、顺天等区②。1944年，又增至18个行政区，其中市街区10个未变，农村区增至8个，为净月、合隆、大屯、南河东、北河东、双德、劝农和春阳③。

2、伪国都建设计划及实施

伪国都建设计划的制订　　日本帝国主义把长春定为伪满国都后，即着手在长春进行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指派关东军统治部的安正利、赤濑川安彦等两名嘱托，对长春市区的房产等情况秘密进行调查，紧接着关东军又于1932年2月，指使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发布关于在长春市区及近郊禁止买卖土地的法令，冻结了长春周围方圆40里范围内的土地买卖，以期防止地价上涨。伪满政权建立后，即开始了伪国都建设计划的筹划制订工作。3月下旬，刚刚成立两个月的满铁经济调查会便着手起草伪国都建设方案。4月1日，伪满政府设立了直属于伪国务院的"国都建设局"。7月，伪国都建设局接替满铁经济调查会进行伪国都建设计划的起草工作。9月16日，伪满政府又发布伪国都建设局官制和伪国都建设计划咨询委员会官制，成立了伪国都建设咨询委员会。伪国都建设局的组织机构如下表④：

①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7年版，第28页。
② [伪满]《国都新京》，康德9年版，第56页。
③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社：《满洲国史》分论，下，详文，第593页。
④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下，详文，第573页。



当年8月，关东军特务部又指令满铁经济调查会继续参加伪国都建设计划的起草工作。之后，关东军特务部于8月下旬、10月中旬、11月上旬，连续3次召开有关东军特务部、伪国都建设局、满铁经济调查会三方人员参加的联合碰头会，具体研讨伪国都建设计划。其中，第一次碰头会由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主持，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关东军顾问藤根寿吉、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伪国都建设局总务处长结城清太郎、满铁第三部主查佐藤俊久等14人参加。会议对伪国都建设局的设计方案作了介绍与说明，并着重讨论了城市建设费用等问题。第二次碰头会由关东军顾问、满铁理事、铁道部长藤根寿吉主持，参加会议者12人，对满铁经济调查会的设计方案作了介绍与说明。会议在讨论方案时，伪国都建设局与满铁经济调查会人员对伪满执政府机关的建造地点，正门方向问题发生了分岐。为此，会后双方又一起进行了两次协商，并共同进行了3天的现地调查，但分岐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第三次碰头会共9人参加，主要是对10天后的三方联合研究会作准备。11月17日，关东军在特务部会议室召开了三方人员共19人(其中关东军等方面12人，伪国都建设局方面3人，满铁经济

调查会方面4人)参加的联合研究会,审议确定伪国都建设计划方案,对有分岐的伪满执政府机关地点问题,决定建在旧城市街以西的杏花村,建筑物座北朝南;南岭等处为后补场地,先行绿化,加以保护。根据这次会议审议的伪国都建设计划方案为基础,关东军司令部于12月5日,制定了伪《满洲国国都建设计划概要》。《概要》共分11部分,对长春的人口、范围、公共设施、计划预算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至此,伪国都建设计划被确定下来。此后,又于12月27日,经过伪国都建设咨询委员会的咨询,由伪满政府于1933年1月24日,发布了《关于国都建设事业计划执行之件》,4月19日,伪满政府又公布了《国都建设计划法》与《国都建设计划施行令》。按照这些法令,伪国都建设计划,由伪国都建设局主持实施。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伪国都建设计划的制订过程,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点,自始至终完全由掌管中国东北殖民地一切权力的日本殖民统治者们一手包办,没有任何一名中国人参加。连日本帝国主义者御用的大汉奸,包括伪国务院总理和各部总长,以及伪国都建设局长、"新京市长"等等,都排斥在外。

伪国都建设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伪国都建设计划概要的规定,伪都新京远期建设计划区域为200平方公里,包括近期市街建设区域100平方公里和近郊近邻地100平方公里。200平方公里的远期建设计划区域呈长方多角形,周围的边界为:西北端到崔家营子附近,东北端到金钱堡附近,南至高家店,西至小隋家窝堡,东至石碑岭。在近期市街建设区域中,官府与公用地占47平方公里,包括日伪机关、道路、公共设施、公园、运动场用地和军用地等;民用地53平方公里,包括住宅、商业、工业、蔬菜、畜牧和预留地等区域。在这近期市街建设区域的100平方公里中,还包括"铁路附属地"、旧城和商埠地等已建成区计21平方公里在内,所以近期市街建设面积实际为79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期(20年内)计划为50万,到1942年2月,又提出伪"国

都的合理人口为 100 万”，并把市街建设计划区域扩大为 160 平方公里。

伪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伪国都近期市街建设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实施计划，原订为 5 年，要求执行建设面积为 20 平方公里。实际用了 5 年半以上，即从 1932 年 3 月至 1937 年 12 月，完成建设面积为 21.4 平方公里。建设区域几乎全都是新区。第二期实施计划原订为 3 年，执行面积为 79 平方公里内除第一期完成的其余部分，同时完成第一期实施计划区域内需要充实与完善的部分。实际上用了 4 年，即从 1938 年 1 月至 1941 年 12 月，有些项目则延续到 1942 年以后。实施区域以新区为主，继续完成第一期尚未完成（包括完善）和第二期建设计划新增设的一些工程与设施，同时也对历史上的建成区的部分街道进行整修，部分排水设施进行扩大与新设。

为了实施伪国都建设计划，日伪当局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地形、地籍进行了全面测量。地形测量，包括远期计划区域内除“铁路附属地”、旧城与商埠地外的 179 平方公里，从 1932 年 5 月开始，到 1935 年 5 月完成。地籍测量，除包括近期市街实际建设面积 79 平方公里外，还包括电台、军用地、公共墓地等约 15 平方公里的区域，计 94 平方公里。自 1932 年 6 月开始，到 1937 年 3 月大部分完成。二是解决了建设资金来源问题。如第一期计划预定需要资金 3 059.6 万元，平均每年需用 500—600 万元。对此，伪国都建设局采取了以前“满铁附属地”使用过的经营土地的办法，即先向伪中央银行借款 500 万元，用以征购土地和各种设备。接着，将征购来的土地进行整理和完善其基础设施之后，采取招标的方法，向土地用户出售或出租，把出售或出租土地获得的收益作为建设项目的资金。为此，伪满政府曾于 1933 年 5 月，发布了伪《国都建设局土地建筑物出售及出租规划》，同年 6 月，伪国都建设局也制定了《商租国有地暂行办法》。在进行土地经营过程中，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采取压低地价，强

行收购，再高价出售等手段，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至 1941 年末，共收买土地 107.6 平方公里，支出金额为 1 057 万元，共卖出土地 80.4 平方公里，收入金额为 3 340 万元，平均每平方公里获利 31.7 万元。并通过出租土地、建筑物获得资金。此外，日伪当局还根据伪国都建设计划概要和其它法规，严加管理。不仅对建筑用地的种类、分区，建筑物的面积、高度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先地下后地上的建筑程序也相当分明。并动用伪首都警察机构来强化建筑工程的管理和监督计划的执行。1938 年 12 月，又根据 1936 年公布的《城市规划法》，制定并公布了新的《伪国都建设计划法》及其《施行令》，并由日人副市长兼任伪临时国都建设局的局长，以强化对伪国都建设的统辖。

经过前后两期约 10 年的城市建设，完成了市街新区范围内的一些建筑工程和设施。第一期实施计划于 1937 年 12 月大体完成。在街路方面，完成了道型筑造面积 560.5 平方米，铺修路面 139 万平方米，修成了直径 300 米的“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在给排水方面，打出深井 20 眼，使用者 12 眼，日供水能力为 1.1 万吨。完成了 4.7 平方公里的净月潭水库和南岭净水场，日供水能力达 2 万吨，安装送水管道 226 公里，埋设排水管道 320 公里。在公园绿化方面，完成了大同（今儿童公园）、白山、牡丹（今吉大校园）、和顺等公园，顺天公园（今朝阳公园）完成了 80%，修建了面积 0.62 平方公里的人造湖——南湖。此外还有南岭综合运动场、铁西的高尔夫球场、赛马场等。在修建楼房厅舍方面，建成官民楼房计 8 900 户。

第二期实施计划于 1941 年末完成了大部分。在街路方面，道型筑造面积扩大为 7[illegible]0.6 万平方米，铺修路面增至 362.2 万平方米，修建了顺天、安民、兴安、兴亚等广场。道路面积占市街面积的 22%。在给排水方面，到 1942 年又完成了新的供水 2 万吨的设施，加上净月潭水库增加的 1 万吨供水能力，使日供水能力扩大为 6.2 吨（地面水 5 万吨、地下水 1.2 万吨）；送水管道增

至 365 公里，排水管道增至 521.5 公里，并形成 9 个独立的排水区域。在公园、绿化方面，又修建与扩大了一些公园，并完善一些公园的设施，进而使公园总面积达到 5.2 平方公里，其中较大公园 8 个(包括伪满以前建立的西公园)，小公园 6 个(原有 1 个)。南湖公园的积水面积扩大至 0.96 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动植物园和南湖苗圃、大房身苗圃等。整个公园加上运动场面积约占市区建设面积的 7%。在楼房方面，建成了一大批各种房舍，包括日伪统治机构的办公大楼和日伪官吏的官邸以及其他一些民宅，到 1940 年末，已建成各种楼房 3 万户。

总之，自 1932 年至 1941 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在长春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朝阳区)主要完成了街路、广场、给排水、绿化系列等基础工程，建成了一大批各类房舍(包括日伪机关、会社、高等院校、官邸、公寓和民宅等)。此外，还有电力电讯线路和 25 万平方米的煤气地下管道。在建成区的旧城与商埠地(相当于现在的南关区和宽城区各一部)整修了一些街路的干线和部分排水设施。在"铁路附属地"也整修了部分道路，补修了以前未完成的一些排水设施。

在交通方面，至 1941 年，在市内开辟了公共汽车线路 21 条和有轨电车线路 2 条，并整修了长春至各方向的公路干线 7 条。此外，还修建了飞机场、"南新京火车站"、兴安街铁路立交桥和伊通河上的桥梁。在近期计划之外的净月潭，还从 1935 年起建有造林场，1936 年改为林业试验场。在那里设有标本园 6.5 公顷，除经营天然次生林外，还栽植各种林木，包括培植多种珍奇树种。

至 1941 年末，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加剧了对中国东北殖民地物力与财力的掠夺与搜刮，使建筑材料与建筑经费奇缺，致使伪国都建设的速度猛减，甚至处于停顿状态。如街路建设，大部分是完成了路型筑造，而路面铺装只完成规划面积的 23%。第二期实施计划时，动工的新伪皇宫，只修了

围墙，打了正殿的基础，便停止了施工。1941 年开始修建的从南岭大街至铁西区的输水管道，只修到了般若寺。1942 年初开始扩建的给排水设施工程也半途停建。原计划修建的地下铁路和高速公路等设想更成为泡影，原打算修建的无轨电车线路，改为有轨线路。至 1942 年末，连 1938 年改为由伪新京特别市直辖的伪临时国都建设局也被取消。在新区，由于一些工程尚未最后完成，以至出现建筑物稀稀拉拉，许多街地空闲的状况。至 1944 年，原订的伪国都建设近期市街计划区域 100 平方公里的任务，大体上只完成了 80 平方公里，其中新区为 59 平方公里，即在新区实际建设计划面积的 79 平方公里中，尚有 20 平方公里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

3、近代化新区的建设

新区的近代化设施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长春的新区建设，主要集中于西公园（今胜利公园）以南，旧城西南，南岭大街以西，盛京大路（今南湖大路）以北，西洋大街（今和平大街）以东的地区，按当时的区划主要包括顺天、安民、东光、西阳等区和大同区西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朝阳区和南关区的南部）。这些地区，当时正是日本人集居的地区。在这里，日本殖民统治者聘用建筑、道路、给排水、绿化等方面的一些专家，吸收了当时欧美和中日方面的建筑理论和经验，采用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些先进技术，利用中国东北廉价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建筑了一些具有近代化水平的工程与设施，进而使长春迈入了近代化城市的行列。这些近代化工程和设施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街道宽敞、规整、美观。全部市街道路占市街总面积的 22%。道路分干线、支线、附助线三类，干线幅宽高达 54 米，支线幅宽为 10—18 米。主要街路相交、实行平面循环交叉，各交叉路口多建有圆形广场。整个市区以“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大

同大街"(今斯大林大街)、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西段)、兴安大路(今西安大路)、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安民大路(今工农大路)等为骨架,组成方格形、放射形加对角线的街路网。街路的路面主要有柏油路面和石面两种,靠近市中心的主干路均为柏油路,并设有漂亮的路灯。市街的电力、电讯、照明等线路都埋设在地下,主要架空线路则设在相平行的次要街路上。有轨电车线路也不设在主要干线上。

第二,给排水、煤气等设施较完备、先进。给水方面,采取打深井、修水库和净水场等方法,使地面水和地下水共同利用,并实行净化,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长春城市用水问题。排水方面,采取分流方式,使污水流入伊通河,雨水流入市内各公园,一些地方还安装了水冲式厕所。整个给排水系统组成了管道网。在煤气方面,修建了煤气地下管道和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水平炉,第二、第三精制室及第二号、第三号煤气贮罐(容积分别为1万立方米与1.43万立方米),至1942年,使煤气产量增至6.2立方米,贮气量增至2.86万立方米,煤气管道的总长度,由1931年的33.8公里增至208公里[①]。

第三,建造了面积较大的绿化区,即利用丘陵地带的起伏地形和天然沟渠,造成了多条绿化带,整修与建造了一些公园、动植物园的苗圃。同时还在一些广场、街心和街道两旁,栽植许多杨、柳、榆等树木和各种花草,形成了街巷绿地,一些庭院也进行了绿化。在市区周围还造有环状的绿化带。公园和运动场等绿化面积占整个市街面积的7%[②]。

第四,修建了一些较先进的交通设施。在市内交通方面,开辟了公共汽车与有轨电车线路,大批使用汽车与电车。至1941年,已有市内公共汽车线路16条(大部分在新区)、市郊线路10

---

① 《当代长春城市建设》,第93页。

②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下,译文,第588页。

条，特殊线路 5 条，线路总长为 928.9 公里，车辆 156 台。1941 年，有有轨电车线路 2 条，至 1944 年，增至 7 条(其中 6 条在新区)，有轨电车线路全长 47.9 公里，共有电车 72 台。在铁路方面，修建了"南新京火车站"和长春至白城的铁路。在公路方面，整修了长春至怀德、公主岭、伊通、双阳、吉林、德惠、农安等方面的公路干线，与市街周围的环路相连，不穿越市区。在航空方面，修建了飞机场，开通了长春南至沈阳、大连，北至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东至敦化、图们以及至日本东京等航线。

这里还应当指出，日本殖民统治者在长春新区的建设，并不都是先进的，有些设施的近现代程度也是很有限的。例如，为了"显示国威"，在"大同大街"和顺天大街两侧建造的"大厦"，只有三四层高，这与当时国际上崛起的高层建筑潮流相比，就显得相当矮小和不适应，更谈不上与"世界各大城市一比高低"了。再如，当时市区使用的配水管道，多用直径为 100—150 毫米的细管，输水能力低，不大适应近代化的需要。排水管道的管径也比较窄小，排水不畅。又如，40 年代设置的有轨电车也落后于无轨电车。至于地铁、高速公路等先进建筑，则仅仅是"计划"与"设想"而已。

日本侵略者对新区建设的用心　　从上述的情况看，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对伪国都新区建设上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花费了不小的气力的。但是，他们所以这样做，决不是象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是出于对中国东北人民的热心帮助，是为了改善长春人民的生活条件，而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对长春新区的近代化建设，完全是出于其实现殖民统治的需要，并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点。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决不是权宜之计和短期行为，而是企图长期以至永久霸占。从这一险恶用心出发，日本殖民统治者则把长春作为它永久霸占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中心来加以建设，当然是要下大

功夫，花费大气力的。其中尤为注重发挥其军政中心的作用。例如，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使长春成为对内“招明民心”，对外“震扬国威”的殖民统治中心，对其在长春的军政衙署及经济、文化统治机构的建筑规模、风格和地点，都作了精心的设计与选择，即在宽敞的“大同广场”四周以及“大同大街”、兴仁大路、顺天大街等街路两侧，建筑了一大批三四层高各种格调的高楼大厦，用以显示日伪统治的“威严”与“壮观”，并把这些地区称作甲种美观地区（建筑物高度在22米以上）或特殊美观地区，大加宣扬。其中，在“大同大街”两侧和“大同广场”周围的有关东军司令部与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今中共吉林省委办公楼）、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与关东局（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楼）、伪地籍整理局与“满洲开发株式会社”（今吉林省工会、共青团、妇联办公楼）、康德公馆（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楼）、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今《吉林日报》社址）、伪满洲中央银行（今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址）、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今长春市电信局址）、伪首都警察厅（今长春市公安局）、伪新京特别市公署（今中共长春市委办公楼）、伪需局与水电建设局（拆迁前为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伪禁烟总局（今长春税务学院院部楼）、伪国民勤劳部（今长春税务学院教学楼）、伪大陆科学院（今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旧楼）等；在兴仁大路两侧的有伪专卖总局（今吉林大学数学楼）、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今吉林大学图书馆楼）、满鲜拓殖株式会社（今吉林大学校部楼）、伪邮政总局（今吉林省邮电管理局楼）等；在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两侧有伪国务院（今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楼）、伪军事部（今白求恩医大第一临床学院楼）、伪司法部（今白求恩医大校部楼））、伪交通部（今白求恩医大预防医学院楼）等；在安民广场有伪综合法衙（今空军长春医院院址）；在至圣大路（今自由大路）有伪文教部（今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址）、伪兴农部（今东北师大附中校址）等。而在顺天大街设立的伪军事、经济、司法、交通等四部和至圣大路的伪兴农、文教两部以及

兴亚街（今建设街）的伪外交部（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楼）、"大同大街"的伪国民勤劳部等，被人们称作伪满的"八大部"。可见，日本殖民统治者把一些最高统治机构，都集中地设在新区的中心，以突出其军政中心的作用。再如，从新伪皇宫的设计与建设的情况来看，也能看出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恶毒用心。当年新伪皇宫的建筑地是根据伪《新京都市建建设方案》关于伪皇宫"应成为国民向往的居城"，必须保持"禁城的威严"，以"招明民心"，"震扬国威"和伪"中央政府机关用地及配置，应与帝宫统一安排"的规定，而选择了杏花村（今长春地质学院校址）的。这是一块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地块，面积为200万平方米，地势是南北较高，中间较低。日伪把伪皇宫建在北端最高的台地上，坐北朝南，象征着"龙首"，可以俯瞰南面的建筑物。伪皇宫东西两边南北走向的大街，取名东西万寿大街（今东西民主大街）。伪皇宫正殿前面是广阔的顺天广场（今长春地质学院楼前广场），作为"国民遥拜"伪皇帝的场所。广场南横跨过兴仁大路是南北走向的顺天大街，街心有绿化带，顺天大街两侧为伪国务院及几大部的机关楼，大街南端为安民广场（今新民广场），再南是绿树成荫的南湖公园。这一切则象征着"顺天安民"的"王道政治"和伪皇帝的"龙位常青"与"万寿无疆"。

总之，日伪把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伪皇宫、伪国务院和几大部及一些重要会社等都设在新区的中心地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此外，在建筑风格上，虽然采取了欧亚各国的不同风格，但也注意表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殖民统治思想。如关东军司令部的建筑采取"帝冠式"，顺天大街的伪国务院及几大部采取"兴亚式"建筑，都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的思想。

其次，日本人在长春新区的建设，是从适应与满足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高标准的生活与消费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事实上，长春新区近代化的生活设施，正是为供给这些日本殖民统治者们所

享用的。如，日本人主要集中于顺天、安民、敷岛、大同、长春、东光、西阳等区。其中除敷岛区属于原"满铁附属地"、长春区属于原商埠地，大同区大部属于原旧城外，其余都是新区。据1942年4月20日统计，按日本人居民总数计算，最多者为顺天区，有日本人53 250人，其后的顺序是敷岛区40 914人，大同区12 904人，长春区10 975人，东光区8 563人，安民区7 353人。按日本人居民人数占该区总人口数的比例计算，最大的是安民区与顺天区，日本人分别占该区人口总数的91%与88%，以下的顺序是：西阳区占67.7%，敷岛区占60.5%，东光区占48.3%[①]。为了便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生活享用，除了在新区各地建造了较多高大壮观的楼房，作为其办公机关外，还建有幽静美观的官邸、住宅和公寓。这些官邸、住宅和公寓，大都是环境优美、清静、舒适的庭院式住宅，每户都有较大的院落，以满足日照的需要。按当时规定，住宅区的标准共分四级：其中一级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住4 000人，每户院落占地875平方米；二级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住5 000人，每户院落占地770平方米；三级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万人，每户占地440平方米；四级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万人，每户占地330米。日本殖民统治者都在第一、二级住宅区。这些官邸、公寓与住宅的绿化设施也很好。如设在新发路北的关东军司令官官邸（今松苑宾馆旧楼），在占地十几万平方米的庭院内，到处都栽植各种针阔叶乔木、花灌和攀缘植物，是庭院绿化面积最大的一处。而在这些住宅、公寓的内部，则都设有必备的电灯、电话、给水、排水、煤气等先进设施。以煤气为例，其绝大部分都由日本殖民统治者所享有。据1942年出版的《满洲矿工年鉴》所载，当年长春的煤气用户共24 018户，为1931年的10.4倍。其中日本人用户23 833户，中国人用户仅185户。

---

① ［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官房编：《国都新京》，康德9年版，第51页。

在新区，还设有整齐宽敞的街道、广场和风景秀丽的公园及其他娱乐场所，为日本殖民统治者们的游玩、娱乐、休息和享受，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如在新区中心的顺天区及大同区西部、东光区北部一带（相当于今天的朝阳区东北部和南关区西南部），其街道、广场尤为宽敞、美观、整齐。如全市有8条三板四带式（即有快车道一块板，慢车道两块板和四排树）的街道，这里即有7条。主干线占全市的90%，全为柏油路面。再如，全市共有8个较大公园和6个小公园，在新区就有较大公园6个，小公园3个。其中顺天区有较大公园5个（白山、牡丹、顺天、南湖、黄龙），小公园3个（“忠灵塔外苑”、安达街、湖西路），大同区有较大公园1个（大同）。在娱乐方面，在铁西的双阳区，设有高尔夫球场和赛马场；在东光区设有动植物园；在顺天区设有运动场、棒球场、网球场与滑冰场；在安达街设有日本人的娱乐中心。此外在新区一些地方还设有妓院、赌场（又叫麻雀俱乐部）、烟馆以及舞厅、影剧院等。在市区交通方面，还开设了5条公共汽车特殊线路，专供日本殖民统治者们及伪官吏们上下班所用。

再次，从新区的位置选择来看，也是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出发的。日本人将新区设在上风头的长春西南部地区，以便为他们创造一个清新的环境，减少灰尘及有害气体等各种污染。

新区建设中的中日专家　　在长春新区的近代化建设中，一些城市规划、建筑、给排水、绿化、园林等方面的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不仅有日本方面的专家，如武井高四郎（京都大学教授、城市规划专家）、佐野利器（东京大学教授、城市规划与建筑专家）、大井清一（京都大学教授、给水专家）、草间伟（东京大学教授、排水专家）、折下吉延（公园专家）、近藤泰夫（京都大学教授、道路专家）、镰田弥助（土地问题专家）等，而且也有中国专家的参加。如当年在伪国都建设局任职的中国建筑师彭野教授，曾主持了在杏花村建造伪皇宫的规划工作。他遵照中国古宫廷

前朝后寝的布局传统，发扬了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潮，根据北京故宫的布局格调、建筑造型和造园艺术，精心设计了新伪皇宫的建设方案，对外庭、内庭与围墙的设计，包括天安门、午门、太和殿、御夫房、重华门、翊坤门、御花园、神武门等处和太庙、佛堂等功能不同的建筑以及周围环境的安排等等，继承与运用了中国宫城规划布局的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宫廷建筑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御花园的灵活布局，采用中国古园林造园布局，体现了我国古园林艺术的特有风采。以一池碧水（万代池），几点山峰（万寿山），小巧的亭、廊、阁、轩藏建于树丛之间的手法，创造了一幅优美的境界①。再如，在净月潭林场，中国的造林和种苗专家陈希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1934—1945年兼任净月潭林场主任期间，刻苦实践，辛勤耕耘，在主持、指导该林场的育苗、造林、建造标本园，进行野生植物调查、试验，引进珍奇树种，培训林业人材等方面，都作出应有的贡献，受到了中日同行的好评②。

4、破陋落后的旧区与边缘区

落后的旧区　与长春新区有天壤之别的是中国人集居的长春旧区和边缘区。长春旧区包括旧城与商埠地两处，面积约计12平方公里，其中旧城8平方公里，商埠地4平方公里。在长春失陷之前，这里就陈旧落后，破败不堪。在沦陷十四年期间，日伪除铺装部分道路和整修一部分排水设施外，几乎再未进行其它象样的建设。

旧城是典型的中国古老城镇的传统格式，街区为自然形成，布局不规则，也不系统。主要街道有南北走向的南大街与北大街和与之交叉的一、二、三、四道街。街路大部分是土路或砂石路，

① 范世奇：《评伪满洲国帝宫规划》，第30—32页。
② 《净月林业史料》，第13—14、38—39页。

质地较差，路面较窄，两侧无边石和人行道。路上是人畜车马混行，交通不畅。排水主要靠明沟与自然蒸发渗透，致使土路凹凸不平，车辙成沟。

商埠地稍好于旧城。主要街路纵向的有永长路、大马路、大经路，横向的有二、三、四、五、六马路。其中，除主干线大马路铺有柏油路面外，其余街路大部分是土路，少部分是方石路，也有半土半石路，如永长路、长通路。排水有部分地下管道，其余则为明沟。路面也比较狭窄，交通也相当拥塞。

伪国都建设计划实施后，伪新京特别市公署曾制定了道路下水道计划，对旧区街路及排水设施进行了整修，但成绩不大。至 1941 年末，进行道路铺装仅 0.65 平方公里，其中简易铺装 0.28 平方公里，碎石铺装 0.23 平方公里，高级铺装只 0.14 平方公里，增修排水设施长 43.2 公里。这种情况不仅和新区差别极大，就与“满铁附属地”相比也差距很大，即面积占“满铁附属地”2.4 倍的旧区，其道路装修面积仅比“满铁附属地”多修了 0.02 平方公里，而排水设施长度则比“满铁附属地”少 13.7 公里[①]。而“满铁附属地”的街路与排水设施更比旧区优越得多。

整个旧区(不论旧城或商埠地)的住宅建设也与新区有巨大差别。不仅二三层楼房很少，住宅比较低暗，居住比较拥挤，而且住宅区还多与店铺混建在一起，致使环境嘈杂，卫生条件恶劣，有些街区则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如民康大路(今民康路)东段路面的黄瓜沟，两侧人烟稠密，大量的污水与粪便汇入沟中，与倾倒在沟旁的垃圾相混杂，致使千百米内腐臭难闻，附近居民多受其害。在旧区，绿化的情况更差，全区计 12 平方公里，只有小五马路与翠华两处小公园，全部面积仅 2.45 万平方米，只占南湖公园面积的 1.1%，大同公园的 6%。至于其它近代化设施则更少或没有。旧区的人口密度和新区相比也相差很大。据 1940

---

① [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官房编:《国都新京》，康德 9 年版，第 198 頁。

年 10 月统计，长春市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是长春区与大同区（此两区大都分属于商埠地与旧城），分别为每平方公里 3.4 万人与 3 万人，而新区中密度最大的顺天区，每平方公里人口仅为 7 700人，相差达 4 倍左右。此外，在旧区，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供其嫖淫玩乐和腐蚀中国民众，而不惜由伪国都建设局拿出 35 万元巨款，在长春大街南、永长路东、东天街西的桃园路一带，建筑了面积 2.6 万余平方米，拥有 900 余间房屋的妓院，称为“新天地”，又叫“欢乐地”，把散在市内各处零散的中国人妓院集中于此。计有妓院 119 家，妓女 800 余人①。

破陋的边缘区　　边缘区主要包括铁北、宋家洼子、杨家崴子、东安屯、八里堡、二道河子等东、北部地区。这里大都是长春的贫民区，并大部分是下风向的棚户区。除有部分电灯设施外，几乎无任何的公共设施。街区多为狭窄的小街小巷，八里堡区只有远达街一条干道，东安屯只有一条东莱街。街路绝大多数是泥泞的土路，只有二道河子的一段吉林大路铺装了半幅宽的小方石路面。饮水使用土井或共用水栓，排水是明沟，住宅矮小、昏暗，房屋密集拥挤，环境肮脏杂乱，生活条件十分低下。宋家洼子、杨家崴子等处也是土路，排水也靠明沟。晴天则是尘土飞扬，如遇雨天，则是积水成河，泥泞不堪；夏季蚊蝇孳生，冬季冰包隆起，环境卫生相当恶劣。特别是伊通河东西两岸的二道河子、八里堡、东安屯、杨家崴子等地，常受伊通河水害。东岸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内涝严重。两岸均无象样的河堤，每逢汛期，洪水暴涨，常有大片土地被淹。据记载，1934 年至 1935 年间，伊通河洪水泛滥，使长春沿河地区及德惠等地遭受了重大损失。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把污浊无环保设施的工业区安排在八里堡、二道河子和铁北等边缘区，更给边缘区的中国民众带来了许多环

① ［日］越泽明：《殖民地满洲的城市计划》，第 166 页；魏丽晶：《长春娼妓业的改造与取缔》，《长春史志》1990 年第 6 期，第 54 页。

境污染之害。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二道河子、八里堡、宋家洼子等边缘区的贫民窟，是日本侵略者在沦陷时期一手造成的。这里原来居住的中国民众是不多的，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开辟长春新区，将原在新区范围内属于乡五区的约40个村屯的数千户贫苦农民，通过压低地价，强行征购土地，残暴地驱赶等办法，赶至上述边缘区。被驱赶的农民群众，绝大部分被迫迁居边缘区，也有少部分人远奔他乡，流离失所，还有的农民因不愿离开自己祖居200多年的故地而悲愤自杀[①]。

从上所述可见，落后的破败不堪的旧区和边缘区，同近代化的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判若两个世界，反映了尖锐的民族压迫现实。一方面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居住在近代化设备齐全、上风头的长春西南部新区内，享受着宗主国人在殖民地的优厚的特殊待遇，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的中国民众，居住在破陋不堪、下风头的长春东北部的棚户区里，于陈旧落后脏乱的环境与条件下挣扎，忍受着民族压迫的种种苦痛。近代化设施分布的极端不合理，日本殖民统治者与被压榨的中国人民在生活条件上的悬殊差别，恰恰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长春城市建设的殖民主义性质与特点。

历史上的形成区　　除了上述的新区、旧区、边缘区外，在沦陷时期，长春还有两块历史上的形成区，或叫附属地区。一是在二道沟一带俄国占据的“中东铁路附属地”，二是在头道沟一带日本占据的“满铁附属地”。这两块“附属地”的建设，好于旧区与边缘区，次于新区。其中，较早形成的俄国“中东路附属地”，有自成系统的街路网，并有部分街路铺装了柏油路面。此外还有一些俄国式的建筑和部分近代化的设施。自1935年苏联势力撤出后，其命运也同旧区与边缘区一样，在整个沦陷期间，几乎再未

---

① [日]越泽明：《殖民地满洲的城市计划》，第165页。

进行任何新的建设。至于日本人经营多年的“满铁附属地”，则好于俄国的“附属地”，相当于或相近于日本国内的水平。在长春沦陷前，这里就形成了放射形（南部）与网格形（北部）的街路网，干线路幅较宽，最宽达37米，广场较多，主要干线路面为柏油与大小方石铺装，并建有一些较漂亮的楼房厅舍和舒适的住宅及近代化的给排水与煤气设施。此外还设有两个公园（西公园与日本桥公园）。因为这里是日本侵略者最早集居的地方，所以在沦陷期间又进行了部分的建设，整修了部分街路，增设了一些下水管道，使其近代化的设施逐步趋于完善与配套。使这里成为仅次于新区的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5、人口激增及其后果

人口激增及特点　　在长春的城市建设中，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一味追求发挥其殖民统治中心作用，失去了对城市发展速度与规模的控制，使长春人口发生了急剧膨胀。至1944年，长春的人口已为1932年的5.5倍，更为1931年沦陷当时的6.4倍。长春人口增长的详情见下表：

年　别	1931	1932	1934	1936	1938	1940	1942	1944
人口数（万人）	12.8	14.9	22.5	30.6	37.8	55.5	64.5	81.7

资料来源：[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官房编：《国都新京》，康德9年版，第45—52页；长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长春市的规划与建设概况》，第5页。

在人口猛长过程中，日本人的增长是最快的，远远超过中国人的增长速度。据日伪当局统计，1931年末至1941年，长春的

日本人人口数增长了 11.2 倍，而中国人人口数仅增长了 2.3 倍[①]。同时，随着长春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口的民族构成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人在长春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而中国人所占的比例则逐步下降。据日伪当局统计，日本人占长春人口总数的比例为：

1931 年——8.3%，1934 年——16.9%；1937 年——19.5%，1941 年——24.5%；

而中国占长春总人口数的比例为：

1931 年——89.4%，1934 年——80.3%，1937 年——78.2%，1941 年——72.1%[②]。

日本人口比例的迅速增大，表明日本殖民势力在长春的扩大和对长春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加剧。

给长春人民带来的灾害　由于人口的激增，给长春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本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争，把中国东北经济置于战争轨道，已使长春和整个东北一样，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生活用品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再加上人口的猛长，更使长春的经济陷于物价不断上涨，生活用品十分匮乏的境地，造成了长春人民，特别是工人和一般市民的经济生活更加困难。其中，特别突出的问题是，随着人口的飞快增长，使长春的住宅紧张状况迅速加剧。不仅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严重缺乏住宅，就连占人口 20%以上的日本人也缺少相当数量的住宅。为了解决住宅问题，日伪当局对建房材料和房租实行了统制，成立了“满洲房产株式会社”，并制定与发布了《临时住宅对策要纲》、《住宅建设对策要纲》等法令。但是，这些法令与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人缺少住宅而实行的，对严重缺乏住宅的中国民众是没有多大好处的。以日伪制订的长春 1940 年住宅计划为例，该计划规定，共建住宅 8 000 户，其中，“日系住宅”6 200

---

①　②　[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官房编：《国都新京》，康德 9 年版，第 46 页。

户，占 77.5%，“满系住宅”1 800 户，占 22.5%。“日系住宅”的建筑面积分为 100、86、68、45、38、25 平方米，计 6 个等级，“满系住宅”的建筑面积分为 38、25、20 平方米，计 3 个等级。即“满系住宅”建筑面积最高的两等和“日系住宅”建筑面积最低的两等标准相同。这最高两等的“满系住宅”所建户数为 720 户，占“满系住宅”全部户数的 40%[①]。这表明，在严重缺乏住宅的中国人中，只有 720 户中国人才能有资格住上日本人最低两种标准中的一种住宅，而其余许多中国人则无房可住，或者顶多只能住上低于日本人最低标准的小房间。至于“日系住宅”中标准较高的那 4 种住宅，中国人更是没有份的。至 1944 年，又根据日伪规定的“战时规格”，中国人住宅面积标准下降为 10—15 平方米，理由是“多数中国劳动者有好游动的恶习”[②]。由此可见，在住宅分配上，日本人与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相形之下，缺乏住宅数量较少的日本人，得到的住宅是数量多，面积大，规格高，而严重缺乏住宅的中国人，得到的住宅却是数量很少，面积很小，规格很低。显而易见，日伪时期的住宅建设政策，也突出地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者歧视与压迫中国人民的殖民主义状况。

① ② 越泽明：《殖民地满洲的城市计划》，第 172、173 页。

五、文化专制中心的思想奴化

1、摧残民族文化，设立专制机构

摧残破坏东北的民族文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的民族文化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摧残。日本帝国主义摧残破坏东北民族文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限制和禁绝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传播。具体表现在禁止发行、输入和焚烧书刊以及禁映有损日伪形象的影片方面。据记载，1932年3—7月，日伪就在东北各地烧毁各种书籍650万册，1934年禁止36种报纸和杂志输入东北，1936年被禁演的影片达178部①。

其次，大量输入日本的各种文化作品，占领中国东北的思想文化阵地，用以腐蚀与奴化东北人民。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余册，1937年增至280万册；1936年，日本向伪满输出影片154部，1937年增至232部②。

再次，制定各种反动法令，限制人民言论、出版等自由，直接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如在伪满政权建立后，便立即发出通令，明确规定在东北各地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许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日伪当局批准，不许进行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活动。1932年10月24日，伪满政府

---

①　②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212—213页。

抛出《出版法》，全文计 45 条，对出版发行事业，提出了种种限制，如违反规定，则对发行人、编辑人及著作者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00 元以下罚金”。1934 年 3 月发布了修正后的伪《治安警察法》，也对文化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

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民族教育的破坏摧残也是相当严重的。东北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纷纷被关闭、停课。至 1932—1933 年后，虽开始进行了整顿、恢复与创办，但发展缓慢，质量低下，到 1937 年时，仍未达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

先看初等教育。1935 年末，东北计有小学校 10 925 所，学生 596 689 人，教职员 19 632 人，远远未达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长春市的初等教育，也大体如此，经过恢复，到 1935 年末，小学校共 23 所，学生 8 516 人，大体相当于“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水平。长春县的初等教育，低于东北各地的水平。“九一八”事变前，共有小学校 88 所，学生班数为 194 个，教育经费为 9 568 万余元，到 1934 年末，仅有小学校 54 所，学生班数 94 个，教育经费仅达 4 020 万余元。儿童就学率很低，仅占 11.1%，入学儿童约 4 706 余人，失学儿童高达 42 226 人[①]。

再看中等教育。：“九一八”事变前，东北计有中学 194 所，学生人数为 34 671 人，教职员工 921 人。从 1933 年始，伪满虽对中学教育进行恢复和创办，但进展不快，至 1935 年，全东北仅有中学 180 所，学生人数 19 415 人，仍未达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长春市的中等教育也同样，“九一八”事变前有中学 3 所（公立 2，私立 1），学生 400 余人，至 1935 年 12 月，仅恢复 2 所（公立、私立各 1 所），学生 244 人[②]，至 1937 年，才增至 4 所。

---

① 〔伪满〕《满洲国地方事情·吉林省长春县》，第 426—427 页。
② 〔伪满〕《满洲帝国教育事情》之《满洲帝国学校统计表》。

最后看高等教育。“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大学8所。日本侵占东北后，大部分大专院校被查封、关闭，有的则迁入关内。伪满政权建立后，虽然着手恢复与新办，但很缓慢。1935年开课的只有7所。1937年开课的也只有10余所，而且规模小，设备差，多为一些私立的专科学校。在伪都新京，1937年末以前，只有伪大同学院1所，1938—1944年，才又陆续设立了7所大学。整个东北的大专院校至1943年共有21所，其中大学15所，独立学院6所[①]。

对爱国知识分子的迫害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的摧残与破坏，还表现在对广大中国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的镇压与迫害方面。其中，伪都新京更是镇压与迫害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场所。伪满政权建立后不久，驻长春的日本宪兵队，就按照关东军“铲除排日教材”的密令，多次到长春市各中学校搜查，其中一次就查禁与烧毁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书籍50余种，400余册。并威吓年轻的爱国教师说：“今后再有教授排日教材者，按照武装反抗日本论处。”[②]1934年5月，日伪宪特机构，逮捕了长春二中和其他学校爱国教师9名，其中4名被杀，5名下落不明[③]。特别是1940年后，迫害事件更为频繁，1941年12月30日，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逮捕了由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的“青年读书会”领导人伪《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等10余人。1942年3月，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又逮捕了伪建国大学的爱国师生17名，其中分别被判处死刑或其他徒刑。同年，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还逮捕了大同剧团团长赵刚和部分演员，赵刚被折磨致死。1944年，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又先后逮捕了“满映”的主要编导

---

① 东北大学编：《东北要览》，第691—696页。

②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225页。

③ 孙继英：《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殖民地奴化教育》，第2—3页。

王则，“满映”话剧团编导张辛实及其妻、妹，初光剧团团长初光及演员，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青年文化》杂志主编王天穆及编辑，共40余人，经严刑拷打、迫害，其中有12人被折磨致死或秘密杀害。除长春外，在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沈阳、锦州、安东等各地，逮捕、杀害中国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文化专制机构的设立　在摧残中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日伪当局还对文化领域实行法西斯专制政策，推行“官制文化”，即对伪满的新闻、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事业，进行直接控制与干预，向东北广大民众强制灌输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文化、观点、道德，不许东北有任何自由、进步、爱国的文化活动出现。为此设立了文化专制机构，全面操纵伪满的宣传和舆论大权。

伪满最初的文化专制机构是1932年3月，随着伪满政权建立，设在伪国务院资政局下的弘法处。该处的宗旨规定为“宣传建国及施政精神，涵养民力，善导民心，普及自治思想”。说穿了，即是围绕所谓建立伪满政权，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向人民灌输东北“独立”思想，打击与破坏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和抗日活动。此后，随着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思想文化统治，于1933年底将资政局解散，另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了情报处，统管伪满的新闻、出版、广播和其他一些文化事业，并出版发行了《宣抚月报》、《满洲国概览》、《省政汇览》等书刊及其他各种宣传资料。在各省也分别在各省公署的总务厅内，设有文化专制机构，控制各省的文化、宣传、舆论大权。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随着形势变化的需要，日伪又将情报处改为弘报处。弘报处内设总务、情报、监理3科，即较情报处时增设了监理科，同时，也扩大了对文化专制的权限与范围。计有五项：（1）弘报机关的监理；（2）宣传计划的制

订；(3) 宣传的联络统制；(4) 重要的对外宣传；(5) 掌管情报。即控制伪满的舆论、文艺，掌管主要政策的发表，领导与监督新闻机构，管理与控制广播及通讯机构，管理出版物、电影和其他宣传品，掌管情报，负责对外的宣传。总之，包揽了伪满的文化、宣传的各个方面，成为统辖和全面控制伪满文化的中枢机构。

至1941年之后，日伪根据太平洋战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弘报处的职能，将伪治安部对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的控制和监听国外短波的审查与监视，伪民生部对文艺、美术、音乐、戏剧等文化的行政领导，伪外交部（或外务局）的对外宣传等业务，都纳入弘报处的管理之中。

除弘报处统一管辖各文化机构，实行文化专制外，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艺、戏剧等事业又各成体系，实行“条条”专政。

2、严格控制新闻广播出版业

设立伪“国通社”　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后，日伪便对新闻报纸广播等要害部门进行了严格控制。于1932年12月在伪都新京成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取代了原中国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将以前的大小通讯社或撤销或合并。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实行“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政策，强化对东北各地新闻机构和新闻事业的垄断。“国通社”的社长是日本人森田久，其他理事与监事也由日本人充任。“国通社”机构较庞大，内设通讯局、编辑局、总务局、业务局、印刷所等，外在中国东北其他地方、关内及日本东京、大阪设立分社、支局等机构。1939年，计有6个分社，26个支局，4个通讯部，

9个商通部，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垄断通讯网。伪国通社向伪满境内的汉、日、俄、英、朝文等各报纸及广播电台发送新闻稿，任何新闻团体与个人，都不能自由发稿。而且伪国通社发出的原稿都是日文，各报大都设翻译部，翻译后才能刊登。

伪国通社成立后，还积极实行所谓"日满通讯网一元化"，1937年4月，伪国通社与日本的同盟社，订立了契约。该契约的内容是：（1）伪国通社派驻日本和中国关内的通讯员都入籍于日本同盟社，日本同盟社派驻伪满的通讯员，皆加入伪国通社，相互在主持者指挥下，从事通讯业务活动；（2）将缔约前"国通社"驻在日本东京、大阪的分社和同盟社驻伪满各地的支局互相转让；（3）实行新闻交流。"国通社"从伪满发送消息到日本或其他国家及中国关内时，使用同盟社的名义，同盟社从其他国家或日本发送消息到伪满时，则使用伪国通社的名义。这个契约的签定，实现了"日满通讯一元化"的目标，实际上把伪国通社变成了日本同盟社的附庸，成为同盟社设在伪满的一个分社。此后，伪国通社则通过同盟社的海外关系，联系了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联合社、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德国的德意志社、意大利的斯泰芬尼社、苏联的塔斯社等通讯社，形成了国际通讯网，收采、发送国际新闻，除供东北各地报社使用外，还供给日伪官署、军宪机构、银行、会社等使用[1]。

此外，伪国通社还出版《新民》画刊，《支那事变画报》、《满洲国现势》、《协和日记》，发行《满洲国读本》，翻译日本的战争文学等等，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效力。

成立伪"满洲弘报协会"　1936年9月，日伪在伪都新京成立了"满洲弘报协会"。该协会是由日本人操纵的对伪满境内各种报社和新闻社的统制机构。理事长由伪国通社社长森田久

---

① 郭君、陈湘：《试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第196—197页。

充任，5名理事，1名监事，以及下属庶务、业务、计理等课长，全由日本人充任。伪"满洲弘报协会"成立后，即实行"一地一社"的方针，对伪满各地的报社等进行了兼并与整理，以期控制全伪满的报业。首先，兼并了伪国通社，但至1937年后，因业务不便，伪国通社又分离出来，独立经营，然仍隶属于弘报协会。至1936年9月，由弘报协会统制的报社有设在伪都新京的《大同报》（中文）、《大新京日报》（日文，后改为《满洲新闻》）、《满鲜日报》（日文），设在大连的《满洲每日新闻》（英文），设在哈尔滨的《大北新报》（中文）、《哈尔滨日日新闻》（日文）等报社，以及设在伪都的《满洲事情案内所》等9个单位。至1940年，入盟弘报协会者增加至18个。对于不宜兼并的，则进行"整理"合并，即用大报吃小报的办法，共"整理"了20余家报社，包括把长春的《满洲商工日报》，并入《满洲新闻》，把大连的《满洲报》、《关东报》，并入《泰东日报》，把沈阳的《大亚公报》、《民报》、《奉天公报》、《民声晚报》、《奉天日报》，并于《盛京日报》等。

弘报协会不仅在政治上有实力，而且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力，它由伪满政府、"满铁"和"电电会社"投资，资本由200万元增至800余万元。加盟的单位可以得到补助费，而不加盟的则没有。弘报协会靠它的政治、经济实力，将3/4的报社吞并，控制了报纸发行量的85%。一些未入盟的报社，有的被查封，有的停刊、倒闭，有的靠登载一些社会新闻而苟延残喘①。

实施"新闻新体制" 1940年12月，伪满解散了"满洲弘报协会"。次年1月，又成立了伪"满洲新闻协会"。参加"满洲新闻协会"的新闻通讯机构计27家。此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准备与爆发，日伪进一步强化了对新闻通讯的统制，于1941

① 郭君、陈潮：《试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第197—199页。

年 8 月 25 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满洲国通讯社法》和《新闻社法》、《记者法》，以图建立“新闻新体制”。

“新闻新体制”的方针和主要内容是：(1) 对大中城市一些内容重复的报纸实行停刊；(2) 在边远地方，要创办新的中文报纸；(3) 伪满的现有报纸，要积极报道伪满“国情”，进行殖民教育。

根据新体制的要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对伪国通社进行了改组，进一步加强对新闻通讯的垄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对报社实行大吞并，除“国通社”外，又设立了三大新闻社，即：(1)《康德新闻》社，用中文出版，统管中文报纸，共合并了 81 家报社；(2)《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 3 家报社；(3)《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 6 家报社，统管日文报纸。至 1944 年 5 月，《满洲新闻》社与《满洲日日新闻》社又合并为《满洲日报》社。

伪《大同报》 在日伪的一些报纸中，设在伪都新京的主要有：由《新京日报》、《大新京日报》改称的《满洲新闻》(并合并了《满洲商工日报》，社址在中央通)；由《长春实业新闻》改称的《新京日日新闻》(社址在永乐町，今广州路)；《大同报》(社址在东六马路)；《满鲜日报》(社址在永昌路)和 1939 年由大连迁至长春的《满洲每日新闻》(社址在八岛通，今北京大街)。

其中，伪《大同报》是用中文出版的伪满洲国政府的机关报，它是秉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旨意，宣扬殖民主义思想的奴隶型报纸。每天发行朝夕两刊，为对开三大张，共 12 版，版面设有重要新闻、专文、本市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社说、副刊、广告等栏目。在重要新闻中，只刊登一些政令新闻，即公布伪满政府一些法令，强迫人民遵守，并宣扬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果以及对东北抗日武装和民众的造谣诬蔑，但对国际方面的新闻，如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等情况则很少报道。在社会新闻

中主要登载“日满亲善佳话”新闻，再就是登载些情杀和桃色新闻。在社说中，只登载一些“严防偷窃”、“种痘与防疫”、“医师不足与保健”、“妇女职业与道德关系”等无关紧要的内容，而不涉及当前形势的重大事件。在专文中，也多为“日满亲善”、法院旁听、“国军”视察记等内容，不大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大事。在副刊中，则多登载一些毒汁较大的消闲文字，当然，由于被爱国文艺工作者利用，在副刊“文艺”、“夜哨”等栏目中也刊载一些反映在日本统治下东北同胞的痛苦生活和不满日伪统治的诗文。

伪《大同报》是伪满时期销行全东北的头号大报之一。报社设有发行部，并在日本东京、大阪和中国东北的大连、沈阳、吉林等地设有分社。1943年，伪《大同报》并入了伪《康德新闻》①。

对广播事业的控制　日伪对广播事业一直控制很严。“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占东北各地，即对东北各地的广播与通讯机构与设施进行了接管。1932年4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拟制了《满洲电信及广播事业统制方案》。1933年3月，日本政府与伪满政府签订了《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信公司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于当年9月在伪都新京设立了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会社”)，由这个会社统制伪满的电报、电话和广播事业。1932年10月，在伪都新京开设了伪奉天广播局新京演奏所，1933年4月，又以原长春广播电台所为基础，成立了新京广播局。“电电会社”成立后，东北所有的广播台站播放的消息、节目，都须经该会社审定，对重要消息的播出实行统一口径，不允许各台站各行其事。1938年，电电会社的营业部广播科升格为广播部，伪满在“新京”、

---

① 郭君、陈渊：《试论日本帝国主义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第199—202页。

大连、奉天、哈尔滨等地的广播局改为“中央广播局”。1944 年 12 月，电电会社改组机构，在伪都新京设立了“满洲广播总局”，统管全伪满的广播，进一步强化了对广播事业的统制。

对出版业的控制 继 1932 年 10 月实施《出版法》和同年 9 月实施《治安警察法》，加强对各种出版物的控制之后，1937 年，伪满又成立了“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统一管辖伪满的出版事业、印刷事业和发行事业。通过图书株式会社大量出版发行了宣扬殖民主义侵略“功绩”的书籍、课本，以确保伪满国策的施行，对民众进行思想腐蚀与毒化。1939 年 12 月，又在伪都设立了“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负责书籍的购入、分配，垄断了图书的行发工作。1941 年，又设立了伪“满洲出版协会”，进一步强化了对出版事业的垄断。伪满的一切出版物，均需该协会审查通过方可出版发行，凡不符合日伪当局要求的出版物，一律禁止付印。据该协会统计，1944 年经审查的出版物，不予承认的为 170 件，占出版总数的 18.3%，驳回的为 12 件，保留的为 177 件，占总数的 19.4%。其批准出版的，主要是宣扬殖民统治的政治宣传品和战争鼓动品、庸俗低下的娱乐品以及语学参考等，约占出版物的 60%左右。

此外，设在伪新京的，1939 年改组为特殊会社的“满洲事情案内所”，也出版了 50 余册为日本殖民统治与掠夺服务的涉及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书籍与资料。

3、对文学艺术领域的专制

设立与控制文艺团体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伪当局为了干预和控制伪满的文艺事业，于 1933 年 12 月，在伪都新京设立了“满日文化协会”。该会总裁为伪满执政溥仪，会长为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副会长为日本人冈部长景和汉奸宝熙。

与此同时，日本的文艺界人士和团体纷纷涌入中国东北。他们出版《作文》、《满洲月刊》、《艺术满洲》、《满洲浪漫》等杂志刊物，配合日军的侵略活动，宣扬所谓“建国精神”，企图控制伪满的文艺活动，此后，于1937年6月，在大连成立了“满洲文话会”。并在伪民生部社会司和“满日文化协会”的支持下，于当年9月，在伪都新京召开了“满日”文艺界人士交往的文艺“和睦会”。翌年，又将“满洲文话会”的总部迁至“新京”，推举荣厚为会长，并取得了伪民政部的补助费。进而，使满洲文话会扩大起来，分成文艺、美术、音乐、戏剧和电影5部，并在东北各地设立了一些支部。这样，就使日本的一些文艺团体，逐步控制了伪满的文艺活动。随后，东北的少部分文艺界人士和团体，也迎合了日伪的需要，于1940年前后，相继加入了满洲文话会，为日本的殖民文化统治效力。而伪都新京也逐渐成为日伪进行殖民文化专制的中心。

在文学界，有“艺文志事务会”和“满洲歌友协会”等；在美术界，1934年曾在大连和伪都新京，分别成立“满洲美术协会”和“新京美术学会”。随后又在伪都和其他城市举行多次以日本美术作品为主的展览会，用以大量输入日本文化。1938年，伪都新京又成立了漫画团体，出版了一些宣扬伪满国策的美术作品。1940年，又在伪新京特别市副市长关屋悌藏的规划下，设立了“新京美术学院”；在摄影界，由于伪都各特殊会社，为宣传自己的“业绩”，都设有摄影部，使伪都成为伪满的摄影中心。自1936年以来，先后成立了“拍照俱乐部”和“新京摄友会”及“新京摄影研究会”等团体。1939年，更以“满洲新闻社”为中心，联络与组织东北的30多个摄影团体，在伪都新京成立“满洲摄影联盟”。1940年，伪总务厅弘报处实行摄影登记，进一步加强了对摄影界的控制。此外，在音乐、戏剧界，也在“新京”及东北各地设立了一些团体。其中一部分是由日伪官办或特殊会社办的“国策”文化团体，充当了日伪进行文化思想

统治的工具。

实施《艺文指导要纲》 1941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即于当年3月23日发布了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要纲》，加强了对文化界的全面统制，该《要纲》共分五部分，即：（一）宗旨；（二）艺文的特质；（三）艺文团体的确立；（四）艺文活动的促进；（五）艺文教育及研究机关。《要纲》的中心内容为：伪满的文艺性质是以伪"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日本称霸世界的"八纮一宇"精神的"美的显现"。因此，伪满的文艺只能为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而存在。为此，伪满文艺要以日本文艺为"经"，伪满的民族固有的文艺为"纬"而编织，伪满的一切文艺团体及其文艺活动，都要听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直接指导与统制。这就是说，伪满的文艺要完全成为日伪法西斯政权的工具。

《艺文指导要纲》出笼后，东北的反日进步的文艺受到了严重摧残。同时，为了适应"大东亚圣战"时期对文化统治实施一体化的需要，加强了对各文艺团体的控制，并新设了一些文艺团体。当时，原已设立的文艺团体有"满日文化协会"、"满洲文话会"、"满洲歌友协会"、"满洲美术学会"、"满洲表演艺术协会"等。其中，将"满洲文话会"解散，新设了"满洲文艺家协会"。同时，新设的协会还有"满洲剧团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满洲作曲家协会"、"满洲舞蹈家协会"、"开拓文化会"等。这些文艺团体的总部大都设在伪都新京特别市。此外，又于1941年9月，在伪都新京设立了控制与联络其它各文艺协会的"满洲文艺联盟"。该"联盟"内设有事务局，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则通过"满洲文艺联盟事务局"控制各个文艺团体，并通过控制"满洲文艺联盟"和其它各文艺协会，控制整个伪满的文艺，实行清一色的"国策文艺"和"官制文艺"。即在太

平洋战争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通过这些协会，利用文艺活动，进行“圣战”动员，宣扬“皇军”的“战绩”。另一方面，日伪当局又利用警宪特机构，不断强化对文艺界人士及团体的监视与迫害活动。

伪新京音乐院与新京音乐团 为了控制伪满的音乐事业，使之为日伪的殖民统治服务，由日伪当局出面，建立了宣扬伪满“国策”的御用音乐团体。其中，中枢机构和核心团体是伪“新京音乐院”与“新京音乐团”。

1937年7月，由伪都新京副市长关屋悌藏和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甘粕正彦及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事务官和泉德一等人筹划，于当年10月在伪都新京成立了伪新京音乐协会。该协会成立后，为了充实队伍，扩大影响，关屋悌藏责成和泉德一等人，在中国东北及日本聘请招募指挥、作曲、演奏等各种人员。首先请来了日本东京音乐学校教授大冢淳，担任新京音乐协会的指挥，同时又陆续从日本新交响乐团、宝冢剧场、月话电影株式会社弦乐部、松竹电影株式会社弦乐部、日本海军军乐队和伪宫内府乐队等招请来一些人才和乐手，经过一年来的筹备扩充，于1939年4月，将新京音乐协会改建成新京音乐院。

伪新京音乐院为伪新京市公署的直属部门，受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管辖。该院设有管弦乐部（对外叫“新京交响乐团”）、吹奏乐部（即“新京吹奏乐团”）、合唱部（即“新京合唱团”）、“满洲乐部”、作曲部等5个业务部。还设有教育部（下附属音乐体操研究所）、协议员会议、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广播音乐委员会、电影音乐委员会、“满洲乐联盟结成准备委员会”、学校音乐委员会、团体音乐委员会、乡土音乐研究会、乐员养成所等部门。院长为大冢淳，监事和泉德一，事务局长村松道弥。各部的部长、指挥等骨干及交响乐团，吹奏乐团的乐员，均由日本人担任，其中只有一名中国人。伪新京音乐院成

立的目的是企图通过音乐活动来宣扬伪“建国精神”，进行文化思想侵略，并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呐喊助威。

1941年12月，日本法西斯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一些技巧较高的乐手，离开了伪新京音乐院，回到日本，代替他们的是一些舞厅的乐手。这使伪新京音乐院受到很大影响，出现了严重缺编的状况，尤其是交响乐团，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难以进行正常演出。恰在这时，日伪当局又正在筹备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活动，于是日伪对各音乐团体及人员进行了大调整，将伪新京音乐院、日本蓄音器株式会社（简称“日蓄”）管弦乐团、“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简称：“满蓄”）管弦乐团、“新京广播管弦乐团”、“新京广播合唱团”等撤销，于1942年4月9日，联合组成财团法人——伪新京音乐团。伪新京音乐团由伪满政府、伪新京市公署、满铁、电电会社等共筹集基金40万元伪币，另外每年还有30万元的活动经费。伪新京音乐团的理事长为甘粕正彦，常务理事祖川贞，理事5人，监事2人，全系日本人。伪新京音乐团内设管弦乐部（“新京交响乐团”）、小管弦乐部（“新京小管弦乐团”）、吹奏乐部、作曲部、“满洲乐部”、合唱部和乐员养成所等部门。各部部长与养成所主事分别由大冢淳、佐和辉喜、大冢淳、上野耐之、市场幸助、陈其芬、王孝则充任。

伪新京音乐院和新京音乐团，先后进行了多次各种演出活动。首先是定期演出活动。仅伪新京交响乐团自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间，就组织了定期演出活动31次，平均每月一次。此外，各部、各团还参加日伪的重要节日、纪念日、庆典纪念与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演出活动，并与其他音乐团体合作，进行各种联合演出活动。同时，伪新京音乐团各部各团，还经常到东北各地区进行巡回演出，并在伪都新京为日本女中、男中及伪建国大学等进行演出，或到广播电台进行演播。其中一些节目又被“日蓄”、“满蓄”灌制成唱片。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来看，伪新京音乐院与新京音乐团，是按照日伪当局的要求，通过演出一系列“国策”节目，包括吹捧日本侵略军的武力和“功绩”，颂扬伪满的“王道乐土”、“民族协和”，夸耀日本的“东亚共荣”、“开拓移民”等内容的节目，来为日本法西斯的反动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而积极效力，用以欺骗世界舆论和毒害中国人民。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特别是伪满垮台前夕，日伪更通过音乐团体的演出活动，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战争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或祭祀亡灵，从而使每次音乐演奏活动，都笼罩着侵略战争的阴森气氛。

但是，伪新京音乐院和新京音乐团也还演奏了诸如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许多西洋名曲，通过这些名曲的演出，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洋音乐文化，传播西洋演唱、演奏技巧的作用。当然也应看到，中国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受到了忽视、限制以至摧残。

此外，还应看到，在伪新京音乐院与新京音乐团中，除了掌握实权，控制音乐团体，使之为殖民统治与侵略活动服务的军国主义分子甘粕正彦、武藤富男等人之外，也还有象大冢淳这样有真才实学，为人正直，艺术创作态度比较严谨的音乐家及音乐工作者，他们在音乐创作、排练、演出等活动中，给中国一些乐生和乐员以真诚的帮助与指导，在中国乐生和乐员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同时，在伪新京音乐院和新京音乐团的“满洲乐部”中，也多少排练并演出了一些中国的民族乐曲，诸如《皆大欢喜》、《茉莉花》、《百鸟朝凤》、《贵妃醉酒》、《梅花三弄》等，尽管这里有装点门面，掩人耳目和取悦观众的因素，但在客观上也多少锻炼培养了中国的音乐人才[①]。

其它一些音乐团体　除伪满新京音乐院与新京音乐团外，

① 韩玉洁：《伪新京音乐院》，《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第95—102页；韩凤觉：《新京音乐院》，《长春文史资料》1989年第2辑，第1—5页。

伪满时期还有不少音乐团体。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其中官办的，大都是“国策”音乐团体，而民办的，则多是为保存与振兴民族音乐而奋斗的音乐团体。当时在伪都新京，主要有伪“满洲国乐社”、伪“宫内府乐队”和“薰风音乐会”等。

伪满洲国乐社是在伪满政权建立后开始筹建的。1933年，由伪文教部责成曾作过清朝和声署庶使的邵继云出面，筹款4 000元伪币，建成了一所礼乐学校，定名为“燕乐传习所”。于当年4月，吸收30名16—20岁的乐生，正式开学。校长邵继云，助教赵连兴，书记高鸿炎。乐生学习的科目主要有笙、管、笛、箫、板、鼓、云等7种乐器。每天进行三节课，计6小时的雅尔训练。每月发给乐生10元伙食费。每期学习3个月，毕业时一名学员要学会10余首乐曲。这所学校是筹资兴办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不久，因经费困难而停办。随后，由伪执政府内务处技正王季烈倡导，得到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伪文教部次长许汝棻，伪文教部总务司长西山政诸，伪文教部学务司长上村哲弥等人支持，于1933年7月，将“燕乐传习所”改为“满洲国乐社”。“满洲国乐社”成立后，聘请了对国乐比较精通的许雨香任教，从伪新京市第二小学校选出40名学生，集中于孔庙内进行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有：南江丝竹乐、昆曲与祭典用的音乐，重点是培养与训练学生的演奏能力。所用器材，初时有笙管笛箫及钟鼓等，其后又增加琵琶、编钟、编磬、排箫、搏拍云锣、大钹等。经过排练已能演奏昆曲《长生殿》、《赐合》、《游园惊梦》等。到1936年时，“满洲国乐社”的学员已学会30多个乐曲。此后又继续招收新生。

“国乐社”虽然是在日伪提倡“国乐”的名义下办起的，但在限制中华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政策下，却无法得以扩大，而且由于伪满政府不提供经费，所需经费靠发起人募捐和“国乐社”成员共同负担，因而，使“国乐社”的许多业务因经费困难而不能正常开展。至1938年6月，伪满洲国乐社趋于解体。

后来有人出面与伪新京广播电台联系，以伪满洲国乐社的名义对外播出六七次，演播的内容主要是乐生所学的一些中国乐曲。1940年后，“满洲国乐社”瓦解。

伪宫内府乐队，亦叫宫内府音乐部，是一支鲜为人知的伪宫廷御用乐队。它是由跟随伪皇帝溥仪的乐师金春筹办的。金春从1932年起，先后去北京，招西洋管弦乐队演奏员20余人，经过短期训练，就成了以演奏宫内乐为主的宫内府乐队，乐队长金春。后来，因内部打架，乐生纷纷离去。

1935年，原为日本海军军乐队队员小林绢太郎、安藤义彦等多人陆续调入伪宫内府，正式接管了乐队。由掌礼处招收15岁以下的小学生，重新组织乐队，乐队长小林。先后招收四期学生，共52名。所学课程有视听练习、基础乐理、和声学、曲式学、西洋音乐史以及语文、英语、日语等，并要每天进行掌握乐器的演奏训练。

经过三年学习训练，第一批学员毕业，又开始了宫内府乐队的演奏与排练活动。在排练中，曾特聘大冢淳兼任乐队指挥与艺术指导，在大冢淳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乐员们进步较快，合奏水平迅速提高，整个乐队到1939年前后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并排练一些欧洲古典乐派、浪漫乐派及民族乐派的名曲。

但是，伪宫内府乐队主要是在元旦、伪皇帝生日，以及伪国宴、重要人物进宫谒见“皇帝”时进行演奏或充当仪仗队，很少参加社会上的演出。因此，虽然实力较强，但对社会影响不大。最后，于1945年8月，伪满政府垮台时解散①。

薰风音乐会是中国人在长春组建的一个国乐团体。它是由在伪新京广播局任学艺科长的车教藏、副科长陈鸿滨以及韩东

---

① 吕金藻、冯伯阳：《溥仪的宫内府乐队》，韩玉洁《满洲国乐社和祀孔》，《长春文史资料》1989年第2辑，第19—32、44—47页。

德等人以原伪满洲国乐社学员张禹田、王玉平等人为骨干，于1940年成立的“艺光雅尔社”发展而成的。艺光雅尔社成立后，哈尔滨古风音乐会的成员朱炳扬因工作调动，参加了艺光雅尔社的工作，同时，一些有音乐修养与才能的青年也相继加入了乐社，使艺光雅尔社得以扩大。这时，艺光雅尔社又派王玉平去哈尔滨拜访古凤音乐会，交流与学习了技艺并开阔了眼界。王玉平回来后，就开始酝酿在长春成立薰风音乐会。结果在伪新京广播局学艺科长陈鸿滨的支持下，于1941年正式在长春成立了薰风音乐会，会长朱炳扬。

薰风音乐会是个半职业性的国乐团体，它成立后即多次进行公演和到广播电台进行演播活动。它所演奏的曲目有：广东音乐（如《三潭印月》、《连环扣》、《昭君怨》、《雨打芭蕉》、《平湖秋月》、《旱天雷》、《孔雀开屏》等40余首）、丝竹乐（如《三六》、《皆大欢喜》、《薰风曲》、《梅花三弄》等）和本音乐会自己创作的曲目（如《苏堤春晓》、《乘风凉》、《秋月明宫》）等。此外还演播一些流行歌曲或给一些歌星演唱会伴奏。

薰风音乐会还与伪新京音乐团“满洲乐部”、“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简称“满蓄”）、哈尔滨的古风音乐会等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进行联合演出或灌制唱片。其中，1943年夏，曾去哈尔滨与古风音乐会联合演出三天，受到了热烈欢迎。1944年，又同“新京乐团”、哈尔滨声乐团等合作，赶赴沈阳、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北安、牡丹江等地巡回演出。

1944年之后，伪都的日伪警特对薰风音乐会及其人员进行了监视、搜捕和迫害活动。当年秋，逮捕了伪新京中央局学艺科音乐班的副班长张万春、薰风音乐会成员张禹田等人，皆被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而监禁。此后，薰风音乐会的演出活动更受到了严格限制，排练和演出活动都很少。至1945年光复

时，该音乐会解体[①]。

在伪都新京，除上述几个音乐团体外，还有关东军军乐队，伪满国军军乐队和民众的音乐团体：新京白鸥乐团、春汀新乐社、“满洲民乐社”等。此外在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营口、大连等大中城市也还有一些音乐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尔滨交响乐团。

伪“大同剧团”与伪满戏剧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人逐渐控制了伪满的戏剧界。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的殖民主义思想统治，日本人于1935年在伪都新京建立了银星剧团（话剧团），开始在伪都的小戏院“义演”话剧。1937年发展成“大同剧团”。大同剧团是一个“国策”剧团，团长甘粕正彦，人员逐渐增至50余名。成立后不久，除在伪都新京经常进行宣扬“王道政治”、“五族协和”、“日满亲善”等内容的演出活动外，于1938年10月至11月，又到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等地进行演出。随后，将该剧团转为专业性剧团，并划分了两个“义演班”，频繁进行演出活动。一个班叫地方“义演班”，派到伪满的边远地区，为中国民众与日伪军警演出。其中，如1938年，曾派到东南满地区，配合日伪军对抗日武装讨伐，进行慰问军警和“宣抚”民众的演出活动。另一个“义演班”，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巡回演出活动。到1942年后，伪大同剧团又配合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进行演出。除慰问日伪军警外，还给“勤劳奉公队”和为促进增产与加强防卫而进行演出活动，直至东北光复[②]。

在伪都新京的戏剧团体，除伪大同剧团外，还有三友剧团、文艺话剧团、银青剧团、同仁剧团、初光剧团、新京广播剧团

① 韦风：《古风音乐会和薰风音乐会》，《长春文史资料》1989年第2辑，第53—58页。

②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下，译文，第793—794页。

(后改为“满洲中央剧团”)、春秋剧团、共荣剧团等。这些剧团大都演出了一些传统剧目和进步剧目，受到民众的欢迎，有些还得到了某些发展。此外，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也有一些剧团。

在日伪重视话剧团，以便直接为伪满“国策”服务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评剧和其他地方戏等进行了压制。对戏剧界的人士也进行了监视、迫害。

4、成立“满映”，推行“国策”电影

伪“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的成立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伪当局为了扩大对内对外的欺骗宣传，曾委托“满铁”映画班和日本电影公司拍摄了一些宣传日军侵略“功绩”和伪满各部门“成就”的纪录片，利用伪都新京及东北各地的电影院和其他场所进行放映。此后，为了进一步使电影成为对民众灌输殖民思想的有力宣传工具，日伪当局又多方筹划建立伪满的电影统制机构。关于建立伪满国营电影统制机构的设想，是关东军参谋小林于1933年5月提出的，他的意见得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及伪满警察机构的支持。于是，便以小林为中心，在伪都新京成立了“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随后，经过筹备，于当年8月28日，在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召开了“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关东军第四课、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伪民政部警务司、伪文教部社会教育科、伪军政部顾问部以及伪国都电影研究会的人员共10人。会上，讨论了建立“电影国策研究会”的目的和任务，选举了研究会领导人员。结果，会长由伪满实业部总长张燕卿充任，副会长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和伪文教部次长许汝棻充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小林任委员长，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志村、伪总务厅

情报处处长川崎任委员，并确定了待补的委员名额。

“电影国策研究会”成立后，经常开展活动，讨论电影政策与建立电影机构问题。其具体活动内容为：（一）通过经常召开恳谈会和不定期的放映技术讲习会，来普及电影知识，扩大影响，介绍世界各国电影情况，并研究美英德意等国的电影政策，要求伪满积极投资建立“国营”电影统制机构，以便防止“外国”电影占领“本国”市场，扶植“本国”电影的发展，促进“本国”影片的输出；（二）进行观赏影片活动，借以扩大电影的影响；（三）经过三年的酝酿准备，于1936年7月，向日伪当局提出了《满洲国电影对策树立案》，中心是要求伪满洲国尽快成立“国策电影”机构，为此目前首先应设立“电影国策审议委员会”和“准备委员会”[①]。这样，伪电影国策研究会便为建立“满映”，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满映”的建立及使命 根据1936年7月伪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提出的《满洲国电影对策树立案》，日伪当局很快便成立了“电影国策审议委员会”和“准备委员会”。

“审议委员会”由20名日本人官吏组成。委员长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委员分别由关东军参谋、司令部军官，日驻伪满海军部军官，伪总务厅企事、秘书、主计、情报各处长，伪军政部顾问，伪外交部宣化司长，伪文教部总务司长，伪民政部总务司长、警务司长，关东局高等警察课长，日驻伪满大使馆书记官，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满铁庶务科长，铁道总局弘报系官吏，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等充任。

“准备委员会”由10名日本人官吏组成，委员长是关东军参谋稻村，委员有关东军司令部军官、伪总务厅情报处事务官、伪军政部军事调查部、伪文教部社会教育科、伪民政部警务司特务科检阅股、关东局、伪协和会、满铁弘报系主任等人员。

---

① 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第22——29页。

经过上述两个委员会的一段工作，到1937年8月2日，伪满国务院通过了“电影国策案”，决定投资500万元，设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并于8月14日由伪满政府颁布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法》。《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法》共26条，主要内容有五项：

（一）设立满映的目的是为了统制伪满的电影事业；

（二）满映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影片的制作，影片的输出输入，影片的发行等三项；

（三）满映的本社设在伪都新京特别市；

（四）满映的资本为500万元，伪满政府出资一半；

（五）满映设理事长1人，理事3人，监事2人，分别负责管理与监察满映的业务。

在公布该法的同时，又任命了伪总务厅次长神吉正一等7名设立委员。随后于8月21日，由设立委员会主持，在设在伪都新京的“日满军人会馆”，召开了“满洲映画协会创立总会”，正式建立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首任理事长由汉奸金璧东充任，理事有林显藏、姚任、松本丰三，其中林显藏为专务理事，他原为满铁的庶务课长，由他掌握“满映”的实权。监事有中川增藏和恩麟。

满映刚成立时，暂借大同大街日本毛织品商店（即日毛商店，今通达商场）二楼作办公室，暂借二道沟一座铁路仓库（今长春机车厂院内）作临时摄影棚。后于1939年11月迁入洪熙街新建的满映办公楼与摄影棚（今红旗街长春电影制片厂址）。初建时满映设有总务、业务、制作三个部，各部下又设若干课，至1937年9月10日，满映共有各方面人员100人。

满映是伪满的一个“特殊国策会社”，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使命，按照当时的一份文件，曾规定了五项：（一）对“国民”，普及伪“建国精神”，进行“国民思想”建设；（二）对“国外”，介绍与宣传伪满“国情”；（三）根据“日满一体”的伪国

策，介绍和输入日本的文化；（四）对“学术技艺”的发展作出贡献；（五）一旦有事，借着电影和整体的力量，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

从上述五条可以看出，日伪建立满映的根本目的和意图，就是在平时向我国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传播殖民主义文化，灌输奴化思想，在战时把它作为思想战的有力武器，为其扩大侵略，称霸世界效力。总之，把电影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思想文化，奴化和毒害我国人民的一种政治工具。

1937年10月7日，伪满又颁布了《电影法》，该法计18条，通过该法进一步加强了伪满对电影事业的监督与控制[1]。

满映的机构改组与人员变动 满映建立后，为了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早日出片，迅速健全了内部机构，扩充了人员，内设总务、业务、制作3个部，人员达100人。至1938年春，对理事及机构进行了调整，把总务部改为理事长室，将业务部改为配给部，理事较前增加了精通业务的根岸宽一和古山胜夫，将松本丰三换掉。理事长室、配给部与制作部也分别下设一些课室等部门，其中制作部下设的演员训练所在半年内连续招收三批计142名男女学员，训练期为一年。至1939年冬，三批学员均已毕业，这时满映人员增至690人，满映的新摄影棚及办公楼也建成，投入使用，加之满映的投资数额也由原来的500万元增至900万元，进而使满映具备了迅速开始生产各种影片的必要条件。

1939年11月，曾任伪民政部警务司长的甘粕正彦被伪总务厅弘报处任命为满映的第二任理事长。甘粕到任后不久，便于1940年2月与12月，对满映机构进行了两次改组。

1940年2月的改组，保留了配给部、制作部，将理事长室取消，原属的部门直接隶属于理事长，新设了企划委员会、经

---

① 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第29—36页。

理部和开发部。各部下面一律设课，所设的课有些也较以前有所增加与改动。其中在理事长直属下增设了映画科学研究所。此外，还对职员，特别是演员的工资进行了调整。经过这次改组后，满映的人员又有较大增加，至1940年12月1日，满映人员增至919人，其中理事长直属部门234人，经理部54人，配给部131人，开发部110人，制作部285人，演员105人。

1940年12月，甘粕正彦再次对满映的机构进行调整。这次调整，将企划委员会改成企划室，将制作部分为“娱民映画部”与“启民映画部”，新设了理事长室、上映部与作业管理所，将演员训练所扩大为演员养成所，将原东京代办所升格为东京支社，其它大连、奉天、哈尔滨三个代办所依旧保留。在理事方面，除林显藏、根岸宽一外，又换下古山胜夫，换上神守原一郎，将理事姚任改任监事。对各部室内的机构也有某些变动或更换名称。其中养成所的学员以中国人为主，第一期自1941年3月至1942年3月，共毕业54人，以后又陆续招收了几期学员。除机构改组外，甘粕还启用中国人导演独立拍片，并采用中国人编写的剧目。当时被启用的中国人导演有：周晓波、朱文顺，王则、徐绍周、张天赐、宋绍宗、王心斋、杨叶等，采用中国人编写的剧本作者有：张权我、杨叶、周晓波、姜学潜、张天赐、王则、王智侠、朱文顺、张南、刘国权、梁孟庚等。

1943年之后，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当年6月，甘粕再次对满映机构进行改组。主要是：将“娱民映画部”、“启民映画部”和作业管理所三个部门合并为制作部，在制作部下设“娱民映画”、“启民映画”、时事映画和技术等四处，将配给部合并到上映部内，将理事长室、经理部合并为总务部，将企划室改为调查企划局，新设了监察员。原直属的映画科学研究所、演员养成所、东京支社及各代办所等未变。此外，理事由3名增至4名，监事由3名减至2名。

1944年11月，又进行一次机构调整。这次调整，取消了总

务部，设立了厚生部，恢复了理事长室、经理部，新设了资材部。制作部下保留技术处，新设计划处，“娱民映画处”与“启民映画处”改为“娱民课”与“启民课”，上由制作部所辖。取消了时事映画处，其人员和业务合并到“启民课”内。其它上映部、厚生部、经理部及企划调查局等机构未变。这次改组，满映人员已增至1 857人，其中日本人1 075人，占全体人员的57.9%，中国人731人，占39.4%，朝鲜人51人，占2.7%。

1945年1月，满映进行了最后一次机构改组。理事长室、调查企划局、厚生部、经理部、资材部、上映部未变。制作部又改设“娱民映画”与“启民映画”两处，该两处下又分别设一些课和班。另外，还设立了青年学校，将哈尔滨、奉天、大连等代办所改为地区事务所，并设立了“新京”、牡丹江两个地区事务所。理事减少为2名，监事取消[1]。

国策电影的实施 满映是伪满电影制作、输出输入、发行、上映的专门统制机构，它既是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又是影片输出输入的发行放映公司。它生产的影片，主要分“娱民映画”、“启民映画”、“时事映画”三种。“娱民映画”、即故事片，时事映画，即新闻片，“启民映画”又叫文化映画，即“教育片”与记录片。从满映建立到伪满垮台的8年时间，满映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与记录片189部，新闻简报约200期，输入和发行“外国”影片数千部。1938年就生产故事片9部、“教育片”与记录片22部，新闻片11期。以后逐渐增加，1941年时达到了高峰，计生产故事片26部，“教育片”与记录片45部。1942年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人力物力困难增加，影片生产又处于逐年下降趋势。

在影片内容上，把宣传伪满“国策”放在了首位，即利用各种影片来宣传日本关东军的“功绩”，夸耀伪满的’成就”，并

---

① 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第37—43、88—97页

污蔑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例如：在1937年—1938年拍摄的纪录片中，主要有《北支事变》、《黎明的华北》、《战斗的关东军》、《铁都鞍山》、《进展的国都》、《跃进满洲》、《协和青年》、《日满一如》、《光明的大地》等，主要是宣扬关东军的侵略"功绩"，伪满的"新貌"和"日满亲善"思想。在1938年制的故事片中，诸如《壮志烛天》、《大陆长虹》、《田园春光》、《国法无私》等，也都是典型的"国策"片，分别宣扬伪满国军、伪满警察的"功绩"和美化伪满农村生活。

1938年末与1939年初，满映又会同关东军，伪满政府，伪协和会等制定了《满洲帝国映画大观》的庞大的摄制计划，把拍摄的篇目分为"建国"、"国政"、产业、交通、社会、文化、对外宣传等7大类，计40多个篇目，并在以后几年内付诸实施，用以全面宣扬伪满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其中如《我们的军队》、《光辉日本》、《满洲建国史》、《关东军》、《满洲中央银行》、《满洲的特殊会社》、《建国十年》、《日本产业》等影片，都是按照《大观》规定而拍摄的"国策"影片，用以颂扬日本侵略者的各方面"功绩"和对伪满"建国"的"贡献"以及伪满"建国"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再从满映摄制的故事片来看，也多是典型的"国策"片，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突出的事例有：1939年拍摄的《国境之花》，1940年拍摄的《黎明曙光》，1942年拍摄的《黄河》，1943年拍摄的《碧血艳影》，1945年拍摄的《大地逢春》等。《国境之花》是描写一个青年军官在"保卫"伪满边疆战斗中"勇敢精神"和"功绩"的；《黎明曙光》是描写一名日本人参事官参加日伪军警对安东省境内抗日武装的讨伐，被打死的故事，用片头字幕点题，让民众来"悼念"日伪军的"亡灵"；《黄河》是污蔑中国军队的故事片，描写国民党军队在对日军作战中，用黄河决堤办法阻止日军前进，结果水淹了四县，致使数十万人

流离失所，而日军和汪伪军则组织当地群众，修复河堤，“挽救”了受灾民众；《碧血艳影》是歌颂伪警察的，描写了一个伪警察打入土匪内部，最后擒住匪首的故事；《大地逢春》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露骨污蔑的故事片。影片中描写了承德地区一对农民夫妇，过着平静美满的生活，因土匪袭击，男的参加了八路军，后在一次对伪满国军战斗中，这名农民战士，亲眼看到他的连长侮辱自己的妻子，于是开枪打死连长，携妻逃跑。后来伪满国军打跑了八路军，消灭了土匪，使这一对农民夫妇重新过上安静美好的生活。从上述一系列故事片的内容来看，满映确实成为日伪当局进行殖民主义思想统治的有力工具。他们利用电影进行政治宣传和说教，来宣扬日伪统治的“功德”。

由于把影片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失去了电影的艺术魅力，必然遭到广大民众的冷落，很少有人观看。在这种情况下，满映为了维持生产，保持市场上的上映节目，取悦于观众，不得不放松限制，放宽题材，拍摄一些情节性强，宣传性淡的影片。其中有娱乐性较强的影片，如《七巧图》、《知心曲》、《情海航程》、《如花美眷》等，还有反映婚姻、家庭和下层社会民众生活的影片，如《她的秘密》、《雨暴花残》、《艺苑情侣》、《流浪歌女》、《歌女恨》、《劫后鸳鸯》等，也有喜剧和古装片，喜剧片如《运转时来》、《一顺百顺》、《皆大欢喜》、《荒唐英雄》等，古装片如《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黑脸贼》、《燕青与李师师》、《璎珞公主》等。

1943年以后，由于太平洋战争吃紧，满映也实行了战时体制，不少摄影师被派调作战前线，随军拍摄记录片。这时满映拍摄了一些日本“胜利进军”等影片，诸如《日本舰队堂堂出师》、《夏威夷、马来海战》、《南海之花束》、《空之神兵》等，可见满映作到了“用整体力量”“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

战"，为日本侵略战争积极效力[①]。

总之，从满映制作的影片来看，全面、始终贯彻了"国策"电影的"精神"，是千方百计地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此外，在输入"外国"影片方面，也不断减少美英等片的进口，而增加日本影片的进口，以期用日本的电影文化来占领伪满的电影市场。

应当指出，随着满映的扩大，各种"国策"影片的大量生产、发行与放映，确实发挥了"国策"电影的作用，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人民进行殖民主义思想统治，奴化与毒害东北人民的灵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在电影工作过程中，客观上也培养、锻炼了一些中国人的演员、导演、编剧、摄影、音乐指挥等等方面的人才，这些人在新中国建立后，大都成为长影及其他电影制片厂的骨干。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没有料到和不愿看到的。

5、实施奴化愚民教育

殖民主义教育机构的设立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摧残破坏东北原有的教育的同时，又从其强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建立了以奴化愚民教育为中心的殖民教育体系。为此，自伪满政权建立后，就在伪都新京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教育机构。1932 年 3 月，在伪民政部设文教司，作为管辖伪满教育的最高机关，由 3 名日本人掌管伪满的教育大权。当年 7 月，将文教司升格为独立的伪文教部，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伪文教部总长。伪文教部内设总务、学务、社教 3 个司，其中总务与学务司长分别由日本人西山政猪和上村哲弥充

① 胡昶：《试论伪满的国策电影》，《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第 189—192 页。

任，由总务司长等人掌管伪文教部的实权。在学务司内设有督学官室，该室计3名督学官，日本人2名，负责对殖民教育进行监督指导。伪文教部全部职员100余人，日本人占1/3，分布在各科、室内，分掌各方面的一些权力。在伪都新京市公署，则在行政处内设有教育科，统管市内教育。科内设学务股和社教股，学务股内也有专门负责督学的人员，以加强对市内教育的监督指导。1934年，伪满还在伪都成立了“满洲帝国教育会”，并在伪都及各地设立分会，负责编辑、发行有关“满洲教育”方面的杂志和课外读物，以期加强殖民教育工作。

1937年6月，随着伪满行政机构的改组，伪文教部被撤销，文教工作划归伪民生部文教司掌管。但并未削弱伪满的殖民教育，反而通行实施新学制，强化了奴化愚民教育。1943年3月，根据实施战时教育体制的需要，日伪又重新设立了伪文教部，直至日伪垮台。

奴化愚民教育制度的实施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伪都新京推行以奴化愚民教育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也和东北各地一样，大体分为3个阶段：

（一）1931年至1937年，主要是实行“王道主义”教育方针，初步开展奴化愚民教育。其内容为：“以重仁义，讲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人民生活方面谋求独立安全，对交友方面尚自重节义，对世界民族方面讲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为宗旨。”[①] 据此，要求各学校要暂用四书、孝经来讲授，废除党义教材。1935年后，又先后发行百余册的奴化教材，通过宣扬“王道主义”、“建国精神”、“日满亲善”等论调，来腐蚀与奴化中国东北青少年的思想。这时，虽然保留了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的学制，但却把许多普通中学改为实科学校，降低了知识水平。其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奴化思想和普通知识技

---

① 孙继英：《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殖民地奴化教育》，第4页。

能的“奴才”。

(二)1937年至1940年，主要是实行“皇道”教育方针，推行“新学制”。这时的教育方针内容是：依据伪“建国精神”和伪皇帝“诏书”，加深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及“民族协和”精神，阐明“东方道德”，使学生致意于“忠孝大义”，养成“旺盛的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学得实用“知识技能”，增进身体健康，成为“忠良之国民”。这一方针，较“王道主义”方针，“前进”了一大步，把“仁义礼让”，换成了“忠孝大义”，把“亲仁善邻”，改为“日满一德一心”，并明确提出了要成为“忠良国民”具体目标。简言之，就是要造就忠于日本天皇并为之效力的“奴才”。

基于这一方针而推行的“新学制”，把教育分成初、中、高三个阶段及师道、职业教育两个部门。初等教育，原6年制不变，把4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两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并增加了1—3年单级制的“国民学舍”与“国民义塾”。中等教育，将原6年制减为4年制，将原初、高中分阶段不再分段，一律改为实科学校，称作“国民高等学校”，分为农、工、商、水产、商船五科，其中以农科“国民高等学校”为最多。高等教育，将原4年制减为3年制，分为大学和特殊教育设施两种。另外师范学校一律改称“师道学校”或“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名称不变。全部学习年限为13年，比原有的16年减少了3年，比日本学制18年少5年。这样一改，使大学和中学都缩短了学时，减少了学习内容，降低了知识水平。同时突出了奴化愚民教育，把所谓国民道德科（中学）或国民科（小学）定为主科，把日语定为“国语”，增加了课时，同时对汉语和文化课则大减。结果，虽然增加了“日满一德一心”，“崇拜与效忠日本天皇及满洲国皇帝”等奴化内容，但教材的知识水平浅鲜，缺乏系统性，加之忽视理论，只注重实习、实验等教育，更使教育的知识水平低下，大学的水平只相当于专科水平，中等教

育水平只相当于初中水平。

（三）1940年至1945年，实行“神道”教育方针，推行教育战时体制。这时的教育方针，又较“皇道”教育方针有了新的变化，即把“皇道”变成了“神道”，“日满一德一心”改为“日满一体”，把“日满不可分”的关系由“盟邦”上升为“亲邦”。通过“神道”教育，宣扬“创造日本国的元神”——“天照大神”，也是伪满的“建国元神”，“日满本为一体”，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伪满的每个“国民”也和日本国民一样，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因此要求日伪统治下的青少年，要绝对服从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圣战”而效力。

基于这一方针，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化了对学校的尊神敬神教育，把原设的“国民道德”科改为“建国精神”科，并让学生经常向日本天皇和伪皇帝的居室进行“遥拜”，背诵《国民训》。同时还强化了“国防训练”和“勤劳奉仕”等为内容的教育战时体制。通过这些活动，以期把东北青少年变成为其“大东亚圣战”而效力的各种层次的劳动大军。这样，不仅剥夺了青少年的学习权利和大好时光，并通过繁重的劳役，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伪都新京的小学教育　伪都新京的小学校，1935年12月，共有小学校23所（公立18所，私立5所），至1937年12月，小学校数目增至33所，其中两级小学校16所（公立12所，私立4所），初级小学校17所，详见下列2表：

（1）两级小学校教职员、学生数目表（1937年12月）

项目＼校名	大经路	自强	长通路	文庙	公学校	东盛路	宽城子	西安桥
公立·私立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教职员人数	23	23	22	20	16	13	14	10
学生人数	1 126	943	885	918	649	669	442	366

项目＼校名	龙王庙	四道街	大同街	普通学校	华文	晓钟	伊斯兰	慈智	合计
公立·私立	公	公	公	公	私	私	私	私	公 12 私 4
教职员人数	10	8	7	5	6	9	7	4	197
学生人数	423	282	239	119	361	259	259	115	8 055

（2）市立初级小学校教职员、学生数目表（1937年12月）

项目＼校名	孟家桥	军用路	小河沿	杨家屯	大房身	三家子	逯家窝堡	苏家窝堡	唐家营子
教职员数	8	8	2	1	1	1	1	1	1
学生数	319	415	92	38	37	38	35	59	50
项目＼校名	陈家沟	广宁王	兴隆屯	逯家窝堡	杨家店	小南屯	吴家屯	毛家桥	合计
教职员数	1	1	1	1	1	1	1	1	32
学生数	74	53	60	36	471	75	31	42	1 502

资料来源：伪新京商工公会编：《新京商工公会统计年表》上卷，康德4年版，第6—9页。

1938年实施“新学制”后，把初级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把两级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与“国民优级学校”，这样，使小学校数目增加很多，计有52所（扣去一校变两校重复数目，实为41所），其中公立45所，包括“国民学校”31所，“国民优级学校”14所，私立7所，包括“国民学校”4所，

“国民优级学校”3所。另有“国民义塾”12所，私塾38所①。在这些小学校中，最主要的学校有自强小学、大经路小学、文庙小学、长通路小学、东盛路小学、龙王庙小学、大和通小学等。其中，自强小学历史较久，是在1915年由王荆山、王焕青兄弟出资创办的，1936年改为公立的“新京特别市自强街小学”，此时分主校与分校两部，共有20个班，998名学生，教员23人。1938年实施新学制后改为“自强国民学校”与“自强国民优级学校”，后又有新的扩大，学生人数达1 500人，教员39人②。文庙小学在“九一八”前为长春县立城区第二小学，1933年改称“新京第十九小学”，1935年改为文庙小学，1937年末计有教员20人，学生918人，1938年后改为“文庙国民学校”与“文庙国民优级学校”③。大经路小学也是一所较大的小学，1937年末，共有18个班，学生1 126人，教师23人。1938年实行新学制时改为“大路经国民学校”和“大经路国民优级学校”，不久，“大经路国民优级学校”合并到“永长路国民优级学校”④。此外还有“满铁附属地”经营的长春公学堂，伪满时改为“新京公学校”，到1937年12月，教员16人，学生649人。1938年实行新学制后改名为“大和通国民学校”和“大和通国民优级学校”。1942年时增至21个班，学生人数达1 142人⑤。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长春的各小学校普遍实施了奴化愚民教育，集中表现在教学目的的确立，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的规定和学校日常活动的安排等方面。如新学制规定的初等教育目的为：“施行一般国民之基础教育及其实务教育，以涵养

---

① 纪文：《新京指南》，第134—136页。

② ③孙继英：《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殖民地奴化教育》，第6—7页。

④ 王国琪：《日伪统治下的长春市中小学》，《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第79页；伪满新京商工会编：《新京商工公会统计公报》上卷，第6—7页。

⑤ 郝廷芳：《南京大街小学的建立与发展》，宽城区地志办编：《史志资料》，1989年，第5期，第53—55页。

忠良国民之性格。”根据这个目的，在各小学校设置了“国民科”、“作业”和“实务”等课程，其中用作奴化教育的“国民科”课时几乎占全部课时的 1/2。而且还规定必须用日语教授 45—50%的课时[1]。1941 年后，又把“国民科”课改为“建国精神课，”教授内容全是“日满一体”、“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并将日语定为“国语”，增加其课时，减少汉语（称为“满语”）课时。同时开设作业（初小）、实务（高小）课，也是为了落实奴化愚民教育。总之，当时的小学教育，是为日本侵略者培养具有奴化思想和初等文化水平，顺从其驱使的“职工”。

为了加强对各小学校的控制，日伪还不断向各小学校派来日本人充作校长或教员，掌握各小学校的实权，推行奴化愚民教育。如大经路小学，1936 年就派来一名日本人主事，叫小竹森，相当于副校长，和中国人校长孔庆春同屋办公，掌握实权。同时，其他小学也陆续派来日本人。后来不叫主事而叫首席教员，但不教课，职务也相当于副校长。如自强小学派来的首席教员是斋藤棐。此外还派来日本人充当教员，直接教日语和其他科目。如日本人经营的大和通小学，校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教员中除国文教师外也全是日本人。在实施新学制前后，该校的大部分日本人教员又陆续被派到其他小学任首席教员。

为了进一步奴化中国少年儿童，日伪还在各小学校里大搞“皇道”教育与“神道”教育。遇上日本天皇的诞辰——“天长节”和伪满皇帝的生日——“万寿节”，各小学校都要举行仪式，挂上溥仪“御影”，供师生“参拜”。平时通过每天上“朝会”（每天早晨上课前举行的一种仪式），让学生面向东方和伪皇宫方向，对日本天皇与伪满皇帝进行“遥拜”，或者让学生们背诵伪皇帝的“诏书”或“国民训”。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搞“阶

① 孙继英：《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殖民地奴化教育》，第 7—8 页。

级服从”（指“等级服从”）活动，进行奴性教育与训练。如大和通小学的校长由伪“建大”教授岩闻德也兼任，他在校内设立“建国神庙”，大讲“唯神之道”。并大搞“阶级服从”，对中国师生横加摧残。以至允许“日系”教师当学生面打骂“满系”教师，让高年级学生任意打骂低年级学生等等，竟然把这所小学校变成了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典型学校[①]。

特别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竟在长春各个小学校里搞“终日实习”、“终日训练”和“勤劳奉仕”活动。规定小学生每年终日实习与终日训练 20 天，“勤劳奉仕”10 天，合计 30 天。这样，既缩短了学时，降低了学生的知识水平，而且也损害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如九台县各小学校 6 年级学生共 1 000余人，1945 年被派到营城煤矿从事挖人工河的“勤劳奉仕”60 天。因功累过度，伙食不好，卫生条件差，致使许多学生生病[②]。

伪都新京的中学教育 伪都新京的中学，1935 年为 2 所，公私立各 1 所。1937 年增至 4 所，公立 3 所，私立 1 所。即：吉林省立长春两级中学校、吉林省立宽城两级中学校、市立初级女子中学校和私立萃文女子初级中学校。4 校共有教员 44 人，学生 1 178 人[③]。1938 年实施新学制后，分别改称“国民高等学校”，又增加两所私立中学。此时即有公立“国民高等学校”3 所，私立“国民高等学校”3 所。另有职业学校 1 所。1942 年 4 月，增至 11 所。其中，公立“国民高等学校”3 所，私立的 2 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2 所，职业学校 4 所。以后又增加了两所私立“国民高等学校”。总计 13 所。其中公立的“国民

---

① 郝廷芳：《南京大街小学的建立与发展》，宽城区《史志资料》第 5 期，第 55 页。

② 杨玉辉《小学生“勤劳奉仕”》，《九台文史资料》第 2 辑。

③〔伪满〕新京商工会编：《新京商工公会统计年报》，上卷，康德 4 年版，第 5—6 页。

高等学校”有：“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工科），由原宽城两级中学改成；“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商科），由原长春两级中学改成；“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农科），新建；“第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由原长春县立女子中学改成；“第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由基督教会办的萃文女子中学改成。私立的“国民高等学校”有：“文化国民高等学校”（商科），由日本人坪田武矢经营；其它还有“宏文国民高等学校”、“中央国民高等学校”和“东亚工业国民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有：中央商业学校（商科）、蒙古实业学院（商科）、“新京工学院”（工科）和女子职业学校，大都为私立。

日伪对伪都新京市的中学教育也和对待小学教育一样，实施一系列的奴化愚民教育，特别是实施新学制后，更不断强化。从教育目的上看，新学制规定：“国民高等学校”是“以涵养国民道德，修炼国民精神，锻炼身体，置根于实业教育，授与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养成堪为国民之中坚男子为目的”；“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是“以涵养国民道德，特别注重妇德，修炼国民精神，锻炼身体，授与女子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养成堪为良妻贤母者为目的[①]。简言之，中等教育的目的，就是以实业或实务教育为主，培养其“中坚国民”。为此，在各中学都设立了“国民道德”、“国语”、“实业”、“家事”等课程。其中，“国民道德”课主要是贩卖“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不可分”，日本“盟邦”侵略战争“必胜”等货色。1941 年后，改为“建国精神”课，更增加了“神道”教育等奴化内容，包括“日满一体”，“崇敬与效忠”日本天皇及伪满皇帝，为“大东亚圣战”效力等。对日语课大量增加课时，并改为“国语”，用其排斥汉语，以至使日语的授课时数竟达汉语的

①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第二部分，学校法规中的《学制要纲》，第 455—456 页。

两倍。同时，还特别注重实业科，如农科课分为20余种，商科课分为10余种，以期培养训练仅有浅薄实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又根据培养“良妻贤母”的目标，开设的家事、裁缝、手艺等课，都是围绕家庭生活方面的，具体包括衣、食、住、养老、看护、卫生、剪裁、缝纫、修补、刺绣、造花、编织、育儿、教育子女等。显而易见，日伪的加强奴化教育和注重实业，只能培养忠于他们，具有一般实业知识技能，而供其驱使的“人才”。

为了加强对中等教育的控制，日本侵略者也象小学一样，往各中学派遣了日本人充当校长或教员。在实施新学制后，长春的各中学校长大都换成了日本人，“日系”教员也逐年增加。这更便于日本侵略者大搞奴化愚民教育活动。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突出了神道教育，大搞崇神敬神活动，从平时的上“朝会”到“天长节”、“万寿节”的庆祝仪式，都大搞向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遥拜”活动，还让中学师生参拜“建国神庙”，背诵伪皇帝“诏书”和“国民训”，唱伪满“国歌”，等等，用这些活动来腐蚀中学生的思想。同时又在各中学大搞“终日实习”、“终日训练”和“勤劳奉仕”活动。规定中学生每年的“终日实习”为30天，“终日训练”为15天，“勤劳奉仕”为20天，合计65天，远远高出小学生。到1944年至1945年间，勤劳奉仕成为中学校的主课，特别是农科学生，一年四季除“建国精神课”和日语课外，几乎所有时间都从事田间劳动。这种企图把中学生变成支援“大东亚圣战”的劳动力的愚民活动，不仅剥夺了中国青少年的学习时光，也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设在伪都新京的几所大学　设在伪都新京的大学，除大同学院外，都设立于1938年实施新学制后，因此推行以奴化愚民教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教育也相当突出。

伪大同学院成立于1932年7月，校址在南岭（今吉林工业大学校址），是一所以培养、教育伪满官吏的特殊学校，由伪国

务院总务厅管辖。该校前身是由伪自治指导训练所改成的伪资政局训练所，曾经招收一些日本学生，实行短期训练后就分配到伪满所属各市县充当指导官、参事官或副市长等职务。成立大同学院后，继续从日本国内招来一些日本学生，到1934年后，也开始招收少量的中国学生。该校的《训育纲要》中规定，该校的教育方针是所谓：（一）养成尽忠报国、协和奉公之诚；（二）涵养至醇的热情与高超的识见；（三）炼成不挠的意志与强健的身体；（四）继承光辉的传统风尚；（五）陶冶作为国家指导者的品德[1]。教学内容为：（一）学术课，包括"建国精神"，士道论、政府机构及管理、国防论、民族论、东亚文化史、形势、日语与汉语；（二）训练课，包括军事、体育、击剑、马术；（三）行政实习和社会考察[2]。学制分三部，第一部，称为本科，培训期间为一年，主要招收日本人，中国人仅占1/5左右。第二部于1935年设立，培训期间为半年，主要是对在伪满政权供职的中国人进行培训。第三部虽预定成立，培训时间预定半年，培训对象是任职三年以上的荐任官，但没有招生。1937年，伪满实行文官令后，大同学院学生来源主要有参加伪满机构各部门任职一年以上的委任官、伪满各大学毕业生、伪满送往日本的留学生、日本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经过同等文官考试合格后，以"高等官试补"的资格，培训半年或一年，即可分配到伪满各机构去充任官吏。培训期间一般是先集中在院内进行学术课与训练课的学习与训练，之后便到伪中央各部和省市县进行行政实习和社会考察。

伪大同学院设有总务部，训育部与统制部，分别掌握院内总务、教育训练及对地方训练所、警察学校教育计划实施指导。1942年3月，又成立了研究所，企图培养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

①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第45页。

② ②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227—228页。

战争服务的“高级指导人员”。1943年，学院机构进行改组，将原三部改为管理部、第一练成部、第二练成部和训育统制部。管理部掌管一般庶务、计划、会计、图书资料、医务等项。第一练成部掌管高等文官录用考试或选拔合格人员的培训。第二练成部掌管高等文官升格考试合格或选拔合格人员的培训。两个练成部也还负责对伪协和会及“特殊会社”等职员的培训。训育统制部负责各部门训练机构的培训指导、计划管理、编辑资料等①。

伪大同学院只有少数专门教官负责军事、体育等教育，其学术课主要由在伪满机构任职的“日系”官吏充任兼职教员。伪大同学院院长、教务长、各部部长都由日本人充当。对学生采取法西斯的训练方法，强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和进行打骂摧残，致使迫害逮捕中国学生事件时有发生。

其他大学有1938年至1944年间陆续设立的伪“建国大学”、“新京医科大学”、“新京法政大学”、“新京工业大学”、“新京畜产兽医大学”、“新京女子师道大学”和改为大学的“王道书院”。

伪建国大学被称为伪满的“最高学府”，是1938年5月设立的。校址在欢喜岭（今卫星路1号，长春大学灰楼）。这是日伪创办的头一所文科大学，也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创设这所大学，按照日伪的说法是“以培养能够掌握建国精神精髓，探究学术问题奥义，并能亲身实践建设道义世界的有先觉的领导人才”②。一句话，就是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服务的“高等奴才”。它也由伪国务院管辖，该校的总长（即校长）始终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充任，副总长由日本人充任，掌握实权。首

① 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227—228页。

②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建国大学创立纲要》，第610页。

任副总长为作田庄一，1942年后改由日本军事参议官尾高龟藏充任。总长下的机构有：校本部、总务部、教务部、塾务部、军教部、图书资料部等，科长、主任以上的官员，全由日本人充任。学制为6年，分前后两期，每期各3年。每期招生约150名，其中日本学生占多数。教师30余人，大都是日本人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中国人很少。

伪建国大学的课程十分繁多，前期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作业训练、精神讲话、自然科学、数学、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日文、汉文、第一语言学、第二语言学，到了三年级又增加哲学概论、国家概论、法政概论、经济概论、文教概论、国防概论、现代思潮等课程。后期则有基础学科的教学（包括"建国精神"、"神道"与"皇道"、儒教等）、哲学、地理学、史学、国家学、文学、武学、实学和政治、经济、文教等专门学科。通过这些教学内容和其他"敬神"、"参拜"日本天皇及伪满皇帝等活动，来向中国学生灌输：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有"理"，压榨东北人民有"功"，东北人民要对日本侵略者"感恩戴德"，并要为"日满一体"，"共存共荣"，"大东亚圣战"的胜利，建设"道义世界"（即实现日本吞并世界野心）而出力卖命。此外，在进行奴化教育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实行怀柔政策，用免收学费、伙食费，中日学生同住，毕业后无条件任用为高等官吏，工资高于一般大学毕业生等，来笼络中国学生，使之甘心为其效力。

"建国大学"还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大学院招收本校后期毕业生和其他大学毕业生中的"适合"人员，让其从事专门高深的研究科目。研究院以伪建国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为主，吸收其他大学教职员和伪政府、"协和会"职员，共同进行有关伪满"建国原理"、"国民思想"、伪国政策等一些方面的研究，以为加强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及扩大战争服务。

伪新京医科大学也成立于1938年5月，是由原"新京医学

校”改升的，学制4年，学长（即校长）为日本人山口清治。校址在南岭(今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楼)，每年招收学生约100名。1941年，将日人私立的奉天药剂师养成所，改为“国立”，附属于“新京医大”，1944年末，又将该所改为“新京医大药学部”，并迁至伪都新京。

伪新京法政大学的前身是1934年10月设立的伪司法部法学校。1939年1月，正式改为“新京法政大学”。校内设经济学、法学两个部，分本科和特修科，学制均为3年。学长为日本人田所耕耘。校址在南岭（今光机研究所子弟小学校址）。

伪新京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938年1月在伪都成立的伪满洲工矿技术员养成所。学制2年。1939年1月，改为伪国立大学新京工矿技术院。1940年9月，正式改为“新京工业大学”。该校学制4年，其中预科1年，本科3年。学长为日本人武村清。校址在南岭（今东北师大物理系楼)。“新京工大”设有采矿、冶金、电气、机械、应用化学、土木、建筑等7个学科，1944年，又增设通讯学科。学生毕业统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分配到伪政府机构、特殊会社和其他会社任职。

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建于1940年5月，学制3年。学长为日本人新美佗太。校址在宽城子。开始时招生90余名。

伪新京女子师道大学原为“吉林师道高等学校”女子部，系1938年5月在伪都新京设立的。1944年2月，该女子部从“吉林师道大学”（由“吉林师道高等学校”改称）分出，单设为“新京女子师道大学”，学制3年，主要是培养伪满中学师资。校内设家政、裁缝、音乐、体育4科，每年招生约30人。学长为日本人佐佐木喜市。校址在原伪满大臣张燕卿的私邸（今西朝阳路口）。

伪王道书院是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东五马路创立的，利用晚间授课，被称为夜科。1938年正式改为大学，只招收中国学生，开始时为50人。院长蔡运升，副院长日高丙子郎。学制

3年。校址在兴运路，原道台衙门处。

上述的医科、法政、工业、畜产、“师道”等大学和“王道书院”，其领导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校长（“王道书院”为副院长）手中。教职员也主要是日本人。至1943年，“新京医科大学”有教职员80人，其中日本人56人，中国人24人；“新京工业大学”教职员133人，其中日本人100人，中国人33人；“新京法政大学”教职员78人，其中日本人60人，中国人18人；“新京畜产兽医大学”教职员45人，其中日本人33人，中国人12人；“王道书院”教职员18人，其中日本人11人，中国人7人。5校合计教职员354人，其中日本人260人，占73.4%，中国人94人，占26.6%[1]。而且主要教授人员和重要事务人员几乎全为日本人，中国人一般只担当下级教职员。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这些大学，对学生的奴化愚民教育也是相当突出的。在修业年限上除工业大学、医科大学为4年外，其余都是3年，这就大大减少了学习内容，降低了大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到太平洋战争后期，大学生负担的“勤劳奉仕”又不断增加，更占去了大量的时光。如1942年时就规定，每个大学生的“奉仕”天数为30—45天，到1944年把“勤劳奉仕”改为“勤劳奉公”，天数大量增加，一、二年级为50天，三年级为75天，四年级为125天。1944年后，又以“便于日本学生入营和入军校”，配合日本“取消征兵延期制度和缩短征兵年龄”，使学生早日到战场，将修业年限缩短半年。这样，使大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由原来的三、四年减为二、三年，根本无时间学到大学生应学到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通过加强“国民道德”课，加大日语授课时数，以及强化学生“崇敬”“天照大神”，效忠日本天皇等奴化教育活动，不断向学生灌输“日满一体”“为大东亚圣战效力”等奴化思想。此外，在教学中又只注重实务，忽

① 孙继英：《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殖民地奴化教育》，第13页。

视理论。这样，更使大学生的知识水平降低，基本上相当于专科水平，以致使大学教育只不过是稍高一点的职业教育而已。

在长春的日本人教育与"日满共学制" 除了中国人的初、中、高等教育的一些学校外，在伪都新京还有一些日本人经营的学校。1940年，日本人在伪都设立的小学校共11所，其中有2所既有寻常科，又有高等科，学制8年，寻常科6年，高等科2年。至1942年，又增加1所。中等学校1940年共5所，其中中学校2所，商业学校1所，高等女学校2所。1942年，又增加2所，1所商业学校，1所师范学校。这些学校为5年学制，只有绵丘女校为4年制。这些学校的培养目标是："遵循皇国之道，培养具有尽忠之诚的皇国国民"，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无愧于满洲国中坚分子的素养"[①]。简言之，就是要培养效忠于日本天皇，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日本国民。这些学校统由日本设在东北的教务部管理。这个教务部先设在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内，1939年改设在关东局内。

在长春，日本人并未专门设立日本人大学，而是实行所谓"日满共学制"。即在伪都的各大学内"日满学生共读"。据日伪1943年统计，"新京"的工业大学、医科大学、法政大学、畜产兽医大学4校，共有在校学生2 335人，其中日本学生1 306人，占55.9%，中国学生1 002人，占42.9%，其他学生27人，占1.2%。"新京工业大学"共有在校学生603人，日本学生为420人，占69.9%，中国学生108人，占29.9%。由此可见，伪满的大学并不是为中国人所设，而主要是为日本人设立的。这也是日本人不在长春专门设立日本人大学的原因所在。除在大学实行"日满共学制"外，日本侵略者还在中等学校实行"日满共学制"。这种在大中学校实行"日满共学制"的作法，按照曾任伪满文教部教育司长的星野直树所说，就是让"所有日本人

① 朴继英：《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殖民地奴化教育》，第13页。

都入大学”或“以日本人为中心，招收英俊的满人，来培养优秀的中坚分子”，“养成满洲各方面的指导者”。“日满共学制”的实行，突出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殖民地所享有的教育特权。

6、对宗教的限制与利用

东北沦陷时期长春宗教界概况 东北沦陷时期，做为伪都新京的宗教，主要分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和日本人信仰的宗教。中国人信仰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等；日本人信仰的宗教有：佛教、神道（包括天理教、金光教）和基督教等。据1938年下半年出版的《新京指南》记载：当时在伪都新京有佛教天台宗临济派的寺院11处，即为般若寺（长春大街）、朝阳寺（南关）、大佛寺（袁家窝堡，今华侨饭店南侧）、太平寺（大经路）、慈航寺（长春大街）、丛林寺（丰乐路，今重庆路）、地藏寺（东大桥）、全神寺（二道河子民丰路）、净居寺（二道河子东盛路）、观音寺（二道河子东盛路）、净土庵（长春大街），另有居士林一处；有道教龙门派庙宇3处，即为九圣祠（西二道街）、城隍庙（西头道街）、关帝庙（宽城子东临街），另有道院一处；有回教“新京伊斯兰教堂”即清真寺一处（长通路路北）；有基督教各教会9处，即为基督教长老会（西五马路）、基督教信义会（长通路）、基督教浸信会（南大街）、耶稣救世军（大经路）、天主堂（东四道街）、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东三马路）、“满洲基督教会”（南大街）、基督教徒奉主名聚会（西四马路）、天主教仁慈堂（大经路）。日本人信仰的佛教有12个寺院或教会，即为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祝町，今珠江路）、大谷派东本愿寺（曙町，今吴淞路）、净土宗长春寺（曙町）、日莲宗经王寺（曙町）、日莲宗日本山妙法寺（永乐町，今

广州路）、日莲本门法华宗布教所（南岭街）、日莲本门佛立教会（宝立胡同）、古义信言宗金刚寺（祝町）、天台宗北献山延历寺别院（惠民路）、曹洞宗大正寺（曙町）、曹洞宗“新京别院”（万宝街）、临济宗妙心寺（神泉路，今清华路）；日本人信仰的神道有6个教会（厅、所），即为神道金光教“新京教会所”（曙町）、天理教“满洲传道厅”（北安路）、天理教大陆教会（富士町，今黑水路）、天理教长春教会（东二条通，今东二条街）、天理教“国都教会”（羽衣町，今杭州路）、天理教关长教会（富士町）；日本人信仰的基督教会有6个，即为组合基督教会（老松町，今香港路）、日本基督教“新京教会堂”（中央通）、日本圣教会（室町，今天津路）、“新京日本基督教会”（中央通）、基督教整理会“新京教会”（曙町）、日本美以美教徒“新京教会”（东朝阳路）。日本人信仰的宗教，原不归伪满管辖，1937年12月实施所谓“治外法权转让”之后，都转由伪满管辖。

另据日伪1940年12月底统计，在伪都新京特别市的寺庙、教会、布教者和信徒情况如下表：

教别	庙、寺、教会数	布教者数	教徒数		
			男	女	计
佛教	36	427	45 975	32 173	78 148
道教	5	15	855	540	1 395
回教	1	15	2 920	2 270	5 190
天主教	18	14	656	561	1 217
耶稣教	20	63	1 279	1 305	2 584
希腊正教	2	2	174	175	349
道院	1	15	50	0	50
合计	83	551	51 909	37 024	88 933

资料来源：《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225—232页。其中天主教、耶稣教、希腊正教均为基督教的教派。1941年时，又在伪都建

立了一个兴隆寺（佛教）和清真寺（回教）。

对佛教的利用与限制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对在伪都中国人信仰的佛、道、回、基督等教和整个东北一样，采取了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即一方面，通过伪政权与“协和会”机构，往宗教组织内派驻日本教徒和特务人员，监视宗教人士的言行，搜集其情报，控制其活动，防止产生反日倾向和反日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立宗教统制机构，培养御用人物，宣扬“日满亲善”，超度日伪军士亡灵等措施，利用宗教势力与影响，为维持殖民统治效力。

日伪当局在限制与利用宗教方面，以对佛教的利用与限制尤为突出，不仅设立了一些机构，还把般若寺改名为“护国般若寺”，并利用各种措施和活动，不断强化对佛教的控制与利用。其具体利用和限制情况，选列如下：

（一）1933年后，由日本派出和尚今井昭庆与都筑玄妙，进驻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极乐寺和长春的般若寺，监视中国僧人的言行。特别是今井昭庆则系日本特务，负责对长、哈两市中国僧人的监视任务[①]。

（二）1934年4月，由哈尔滨极乐寺住持如光为团长，长春般若寺住持澍培和伪民政部教化司宗教科长王裕如为副团长，以东北各地僧人、居士等为团员的代表团共25人，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积极为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而效力。会上成立了“国际佛教青年会”，并让如光当上了副会长[②]。

（三）1936年5月3日至7月1日，长春的“护国般若寺”举行了首届“传戒道场”。这一活动得到了伪皇帝溥仪和日本特务今井昭庆等的支持，并请倓虚法师从青岛来长春传戒。可是当

---

① 《长春文史资料》1984年第5辑，第2页；1990年第3辑，第171—173页。
② 《长春文史资料》1984年第5辑，第3页。

倓虚法师带领 4 名弟子到长春后，却受到日伪宪特机关的严格控制，要求每天要写一次报告，并要传询倓虚法师。后在别人劝说下，派出两名日特到倓虚住处直接查问倓虚法师与朱庆澜等人在北京等地的见面化缘情况，没发现反日证据后，才肯作罢。

这次传戒道场规模很大，有 1661 人受戒。受戒期间，宣扬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道义”与“仁慈”和伪满的“建国精神”。如在受戒开始时，般若寺内公布了 12 条《受戒须知》，其中第一条就规定了“须知满洲建国本王道之精神”，其它 12 条又规定了“民众协和”、“上报国恩”，用“东亚文化救世”等内容。5 月 17 日，又在般若寺内举行“慰灵大祭”，为日伪方面阵亡的官兵等“发拨英灵”，“超升净土”。届时，日伪机构的要人纷纷来般若寺内进行试词、净坛、近灵、献供等活动，用以“追怀”和“超度”在日本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过程中而死亡的军警宪特人员和官吏，演出了一场闹剧[①]。此后在 1942 年 8 月至 10 月，又举行了第二次传戒，又受戒 1 547 人，并通过受戒宣扬了“日满一体”、“大东亚共荣”等论调。

（四）1936 年 6 月 16 日至 17 日，在伪文教部接待室举行了伪满第一次“全国佛教座谈会”。会议提出，要在伪都组建“全国佛教总会”，同时进行调查僧籍，整理寺院财产，设立佛教学校，普及佛法和防止南京国民政府利用佛教团体，灌输“邪说”，诋毁“建国精神”，扰乱伪满“治安”等问题。会后，由伪文教部下令，对设在伪新京的般若寺、关帝庙、清真寺等 16 个寺庙进行了调查。1937 年 10 月 5 日，伪民生部又在伪都新京召集伪新京和各省佛教代表 13 人再次举行座谈会，决定尽快成立伪满佛教机构。翌年 5 月 7 日，在伪都新京正式成立了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会长为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副会长为伪都

① 《长春文史资料》1990 年第 3 辑，第 210—215 页。

般若寺方丈澍培和日本西愿本寺管长姬宫智颐。而在幕后操纵者则为伪协和会中央本部辅导科职员坂井荣三郎、山田荣男，伪民生部宗教股长栗原繁及伊藤等日本人[①]。

（五）1938年5月5日至9日，伪都般若寺举行祈祷庆典浴佛节，由方丈澍培法师主持讲演"大乘佛法"和"日满一体"、"信仰团结"等，共进行了5天拜佛、听经、观戏活动。此后，还在伪都举办多次佛教总会的布教训练班。受训的人多为各地方分会的正副会长和干事，训练的内容，除宣讲佛教的教理外，主要是宣扬"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王道乐土"、"大和魂"、"大东亚共荣圈"等[②]。

（六）1938年夏，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在伪都召开佛教总会、大同佛教会、普化佛教会及道德总会、红卍字会、博济慈善会等团体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各团体选出2名"宣抚员"，组成计60余人的"宣抚班"，经过一段效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训练后，派往长白山一带，利用宗教人士进行"宣抚"和"情报"工作[③]。

（七）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伪曾利用宗教人士对狱中"犯人"进行"教诲"活动。般若寺的方丈善果和戒尘先后担当了伪新京监狱的"教诲师"。1943年秋，善果曾到伪新京的平治街分监，规劝"犯人"感戴伪满政府，"多作善事"，"多种福田"。对被处以死刑者，也通过"教诲师"在他们临被处决前，高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送他们去"极乐世界"，并为之种上来世的"福田"[④]。

（八）1943年至1945年，在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伪满统治越发动荡之时，日伪为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搞了

---

① 《长春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第175—179页。
② 《长春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第175—179页。
③ 《长春市文史料》1984年第5辑，第17页。
④ 《长春文史资料》1984年第5辑，第20—21页。

“金属献纳”、“捐献飞机”、“全民皆劳”等运动，般若寺及伪都佛教人士也被卷入这一运动之中，般若寺的和尚也把寺内的一些铁器与铜器“献纳”出来，伪都的僧人还捐资购买了一架飞机，献给关东军。1945年春，又以伪都的青年女教徒，参加伪“国防妇人会”，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而从事各种义务劳动[1]。

对回教、基督教、道教的限制与利用 自“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派人对在长春的回教人士进行监视活动。如派一名叫川村狂堂（又叫川村乙麻）的日本人，长驻在长通路的清真寺里，监视寺里的于少斋阿訇和其他教徒。此后，为控制与利用回教，于1933年8月，在川村狂堂的主持下，在伪都新京成立了“新京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1934年2月，正式成立了“新京伊斯兰教协会”。并以伪新京伊斯兰教协会为基础，于1934年7月，成立了全东北的“满洲伊斯兰教协会”，由川村狂堂任总裁，丁一青（又名丁兰亭）任会长，张仲三、铁汝章任副会长，王殿忠、马殿显为名誉会长，韩集斋为理事长。伪“满洲伊斯兰教协会”在各省会城市设支部，在各市县镇有清真寺的地方设分会。至1936年11月，改称为“满洲国回教协会”，下设支部10个，分会182个。并制定公布了《满洲国回教协会章程》以及《分会章程》和《支部章程》。伪“回协”章程的宗旨共5条，其中前两条即为：“宣扬大东亚精神”与“实现民族协和”。

1938年5月，日伪对伪“回协”进行了改组，取消总裁，川村狂堂退至幕后，改设总监，总监由伪满军官王殿忠担任。并由伪治安部拨给经费，于1939年1月，创办了《回光月刊》，作为伪“回协”的机关刊物，大肆宣扬“日满协和”精神，为日本的殖民主义思想统治服务。同时，又对回教人士仍在继续加以控制与监视。如1939年前后，曾任过伪都新京清真寺教长的

---

① 姜东平编：《伪满社会》，第599—600页。

于少斋阿訇从北京带领4名“海里凡”坐火车回长春时，在山海关车站受到了日本警宪的严格检查，以批件未经伪满洲国政府批准为由，将5人赶下车，并严加训斥，后来由在山海关车站的某回教人士为其说情和证明，加上于阿訇的百般央求，才只准于阿訇带2名“海里凡”去长春。于少斋等3人到长春后，日伪又派人对他们进行监视。

1939年11月，伪满政府派出伪军官洪启浚为团长以及伪民生部宗教股长栗原、伪回协总会总务科长韩鹄洲、奉天“回协”分会长杨进之、伪协和会本部嘱托张世安、奈鲁等组成“满洲国回教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日本“回协”举行的日本东京回教协会回教圈展览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亲日活动。1943年，伪满又派出“回协”代表团，披着宗教外衣，再次进行亲日活动[①]。

在对回教进行利用与限制的同时，日伪对在长春的基督教也进行了利用与限制。在利用方面，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宗教活动来扩大伪满的影响。其具体情况有：1934年3月，罗马教皇厅任命法籍主教高德惠为驻伪满的教皇代表，在东四道街的天主教堂院内设立罗马教皇厅驻伪满洲国代表部。此后，1936年，罗马教皇又赠给伪满各大臣以教廷勋章。1937年12月，伪满皇帝溥仪，为答谢罗马教皇，也向罗马教皇的主教及教皇厅要人等授予勋章。1938年7月，伪满政府派经济部大臣韩云阶为团长，组成“满洲亲善使节团”，去欧洲访问。到欧洲后，于9月13日，韩云阶将溥仪的“御书”呈交给罗马教皇，并与教皇十一世合影留念。当年10月10日，高德惠主教又将罗马教皇十一世的御书呈交给溥仪，并互致敬意。1939年2月，伪满各部大臣又参加了在伪都新京举行的悼念罗马教皇十一世的逝世大祭。此后，高德惠主教及其他神父，又多次与溥仪和伪满各大

---

① 马鸿超、田志和主编：《吉林回族》，第49—54页。

臣之间进行“亲善”活动。

在限制基督教方面的事例有：1935年9月，天主教请求在伪都新京修建一所中央神学大修院。此事虽经高德惠主教与伪满进行交涉，但直到1938年5月，伪满政府才予批准。1938年9月，伪新京市公署颁布《暂行寺庙布教者取缔规则》，限制了基督教的一些布教活动。1944年，伪新京天主教堂打算在八里堡设立分堂，买房需请伪新京市公署批准。但伪新京公署宗教股黄股长却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半年有余，后来经天主教两名神父给这位股长送去一袋白面和两条大前门香烟，才准予买房。到1944年至1945年，日伪进一步强化了对基督教的监视活动，甚至派出日伪特务公然到教会上班，直接监视基督教中中外教主与教徒的言行，千方百计地搜集教会及其各方面的情报①。

此外，日伪当局对在伪都新京的道教也进行了一些限制与利用，包括调查寺庙，整理财产，监视教徒，利用宗教活动宣传殖民思想等。

使日本“天照大神”侵入中国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利用宗教实行殖民主义思想统治的突出措施，是使日本的“天照大神”侵入中国东北，推行“惟神之道”。

所谓’天照大神”，是日本人信奉的“最元始的天神”，日本天皇则被奉为“天照大神”的“神裔”，广大日本人则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以神道设教，这是日本人的事，但是强行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搬到中国东北，使之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和伪皇帝的“新祖宗”，则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别有用心的阴谋伎俩。

这一阴谋活动始于“七·七”事变之前，当时在伪皇帝身边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就曾“建议”溥仪在伪满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理由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也应该相

① 《长春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第6—12、25页。

同”。1939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卸职前，也“规劝”溥仪考虑“满洲国在宗教上应同日本一致”的问题，理由仍是“日满亲善”。当年9月7日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更十分明确地“告诫”溥仪：“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把日本的皇族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①]。

经过一番安排之后，于1940年，即日本纪元2600年之际，由伪满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和“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等49名日伪官吏陪同，溥仪于当年6月22日从伪都新京出发，开始对日本进行第2次访问。这次访问共在日本呆了10天。此间，溥仪拜谒了日本天皇裕仁，参拜了几代日本天皇的神宫、陵寝和“靖国神社”，捧回了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的复制品，即为一把剑（草薙剑）、一面铜镜（八咫镜）和一块勾玉（八板琼曲玉）。7月6日，溥仪率众回到了伪都新京，随即把这三件神器供奉在刚刚在伪宫内府院内东南角建成的“建国神庙”之内。“建国神庙”内分本殿、祭祀殿、拜殿三部分，占地约3万平方米。同时还在南岭修建了“建国神庙”的“摄庙”——“建国忠灵庙”，供奉为日伪统治而死亡的日伪军警人员的灵位。

7月15日凌晨，伪皇帝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太郎等日伪官吏120余人以及伪协和会和特殊会社的代表，为“建国神庙”举行了“镇座祭”。上午，溥仪在“勤民楼”颁布了由日本人佐藤起草的《国本奠定诏书》。《诏书》提出伪满的“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声称伪满的“建立”与“发展”完全“仰赖”于日本“天照大神”的“神庥”和天皇的“保佑”，明确规定日本的“开国元神天照大神”是伪满的“建国之神”。这样，就把日本“天照大神”的神灵作为驱使中国东北人民为日本殖民者献身的强制精神力量。同一天，日伪还颁布了《建国神庙祭祀令》，并修改

---

①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277页。

了伪满的《组织法》，设立了直属于伪皇帝的祭祀府，专门负责对“建国神庙”及“建国忠灵庙”的祭祀事务。祭祀府总裁由曾任过关东军参谋长、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伪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充任，副总裁由伪参议沈瑞麟充任。1940年8月5日，伪民生部发布《关于国本奠定诏书圣旨奉体之件》，再次把日本“天照大神”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9月18日，日伪又在伪都南岭举行了“建国忠灵庙”的“镇祭之仪”。这时在伪“建国忠灵庙”内供奉日伪“英灵”数目已达2.4万余人，其中日本人占4/5。1941年7月15日，溥仪又亲自参加了所谓“建国神庙第一次元神祭”。

1941年12月8日，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之后，更在伪满进一步推行了“惟神之道”。1942年3月1日，溥仪颁布了《建国十周年诏书》，再次大肆宣扬“天照大神的神庥和天皇陛下的保佑”，强调伪满的“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并把日本从“盟邦”升为“亲邦”，要求作为“子邦”的伪满洲国要“奉翼亲邦之天业”，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效力。7月15日，又以伪皇帝溥仪“敕令”的形式颁布了《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该法规定，对于“建国神庙”及“摄庙”有不敬行为者，要处以七年以下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同时，又将净月潭地区2.3万公顷的土地，划为“建国元神”的“永久圣地”，并准备建造更大规格的“建国神庙”。这一计划，后因太平洋战争的失利而未能实现。此外，日伪还通令在伪都和东北各地的各部门、各单位，包括学校和部队，都必须设立神龛式的“天照大神”的“摄庙”，加以“供奉”与“参拜”。甚至要求青年男女结婚也要采取日本的“神前结婚”方式，接受“神官”发给的“神符”，捧回家中供奉。如不能“神前结婚”，则要把拜天地改为“遥拜”“建国神庙”。当年9月5日与12月8日，日伪又先后公布了新《国歌》和《国民训》，更进一步地推行“惟神之道”。其中“新国歌”的第一句是“神光开宇宙”，

“国民训”的第一条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

总之，自1940年7月始，日本“天照大神”作为对中国东北的宗教侵略是步步加深的。但是，“天照大神”的侵略与其他的宗教侵略不同：第一，其他的宗教侵略是通过传教士的活动，在民间逐渐开展的，而““天照大神””则是通过傀儡皇帝从“国”外捧回，从上而下地进行强制推行；第二，用“天照大神”的侵略，远远超出利用宗教信仰的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奴化性质，是日本殖民者企图用“天照大神”来同化中国东北的民族，以实现其对东北各民族的亡种灭族计划；第三，日伪当局把日本的“天照大神”凌驾于其它一切宗教之上，即为“神上神”，而要求其它佛、道、回、基督等教教义都必须维护“天照大神”，并以此来限制其它宗教的存在与发展。

控制与利用“教化团体” 除利用和限制各宗教团体外，日伪当局还对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教化团体”和“慈善机构”，进行种种限制与利用。据1938年出版的《新京指南》一书所载，当时设在伪都新京的这类团体主要有：红卍字会、道德会、圣道理善会、同善社等。

上述这些团体，设在伪都新京的机构主要有：“世界红卍字会满洲国总会”（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前市图书馆址）、“世界红卍字会新京特别市分会”（西三道街）、“满洲国道德总会”（东三马路）、“新京特别市道德总分会”（长春大街）、“新京特别市道德分会”（西三道街）、“长春县道德分会”（二道河子）、“理善总会”（东三马路）、“理善总会第二十乐善公所致善公所”（西四马路）、“新京惜字会”（西三马路），1941年后改为佛教居士林）、“满洲国博慈善总会”（西三马路）、崇德慈善会（近埠街）、正善堂劝戒烟酒所（东四道街）等。

对这些“教化”、“慈善”团体，日伪当局也和对待宗教团体一样，采取各种办法加以限制与利用。如把这些团体的负责

人拉入伪满的“国民教化委员会”，让其充当委员或顾问，或组成“教化联合会”等，通过这些名流人物，来控制与利用这些团体的活动。为了加强对这些团体的控制，也经常派遣特务、密侦人员以“教化”、“慈善”团体人员身份参加其活动，从中加以监视。如对红卍字会，“新京日本宪兵队本部”，就曾派出冈野曹长，经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介绍，加入该会，成为一名会员，直接从内部来监视该会会长、会员，特别是参加该会的伪满要人的言行，并搜集各种情报。

尊孔祭孔与表彰孝子节妇 伪满政权建立后，从宣传“王道政治”出发，加上一些日伪官吏的提倡，以伪都新京为中心，加强了尊孔、祭孔活动。即把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奉为儒教，并把祭孔列入伪满的法定祭日。于1932年4月，成立了孔教会，并利用在伪都新京东南隅建有的文庙，在一年之内进行三次祭祀孔子的活动。即为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和孔子诞辰祭（农历8月27日），其中春秋祭祀活动往往都由伪皇帝钦派伪国务总理担任主祭，有时伪皇帝也亲自参加。1939年8月，伪民生部公布《关于祀孔问题训令》，要求各学校春秋丁祭时也要到文庙前集体举行，或派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先是穿清朝时官服（大袍子），行三跪九叩礼，到1939年后改为身着“协和服”行三鞠躬礼。1940年，由于请来“天照大神”，把祭孔放在从属地位，但仍用其来腐蚀与“安抚”东北民众。祭孔活动是全伪满性的，除伪都新京外，在沈阳、辽阳、海城、盖平、金州、铁岭、郑家屯、吉林、哈尔滨等地，也分别利用设有的文庙，于一年内进行三次祭祀孔子活动。

在进行尊孔祭孔的同时，日伪当局还多方开展表彰孝子节妇活动。为此，1933年2月15日，伪文教部公布了《表彰孝子节妇等暂行规定》，规定“凡孝子节妇义仆等类及对社会教化上有显著功绩，可为国民模范者”，均予以表彰。1940年6月18日，伪民生部又公布了《孝子、节妇、社会教化有功人员表彰

规程》，并予以实施。至1942年，累计全伪满共表彰孝子660名，节妇2 510名，烈女28名，贞女2名。在伪都，最突出的事例是保留了在交通要道的孝子坟。

孝子坟大约建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占地约半市亩，座北朝南，呈长方形。坟墓用石垒成，四周有栅栏和树木，登坟需要上十余层石台阶。石台阶上立一小石牌坊，牌坊正中横书“天经地义”四字，两边有题额与对联。石牌坊后立一神道碑，碑文上记载了孝子的简略身世。孝子坟前有孝子亡母之墓。孝子坟后有一小屋，常居一守坟道士。传说孝子姓王，家境贫寒，从小十分孝顺。父病故后，继续孝敬双目失明的老母，母病故后，尽昼守坟，坐化成仙。群众敬他孝心，为他建造此墓，用以供奉。传说王孝子成仙后，神通广大，有求必应，凡来拜神问卜者，都十分灵验，凡赐出药符，均为灵丹妙药，包治百病，因此来往香客连续不断。

负责管理孝子坟的是老道观的几名道士。老道观设在孝子坟西“满炭”会社大楼（今吉林大学图书馆楼）附近，是一个小庭院，门上挂着“有求必应”的横匾，院内有三间红砖房，正中一间供奉着王孝子的笑面盘坐的塑像，东西两间分别为主持和其他道士的卧室。主持陈至生，另有几名道士则分别负责做饭、守坟、干杂活等事。来往香客除到孝子坟打卦抽签求神讨药外，也有人到老道观来烧香问卜求药讨符。

由于孝子坟位于“大同大街”的中间，占据西侧慢车道全部和快车道数米宽，必然阻碍交通，也影响市街的整齐壮观。但是日伪在修筑“大同大街”时，并没有把孝子坟拆除和搬迁，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更得到一些资助，得以修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的传说神乎其神，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略曰：开始动工毁坟修路时，劳工们便头痛、呕吐、昏迷，以至久治不愈，因而无人敢扒坟。后来日伪派军队用炮轰，连发三炮均打不中，而开炮之人却昏倒在地。日本人派工兵挖

坟，则兵士七窍流血，死于非命。甚至传说，在日伪派人挖坟时，孝子显灵，当夜风雨交加，雷闪猛烈，并在梦中痛斥关东军司令官。翌日该司令官告诉伪皇帝，伪皇帝又告诉伪大臣，从此再无人敢主张毁坟筑路了。对这些迷信传说，日伪当局并没有加以澄清，反而制造舆论说，伪国都建设局为开通道路，本想挪迁孝子坟。但从恭敬孝子，尊重人民的信仰出发，停止了挪坟活动，并“兴修砌石台阶，以便来往香客上下步行便利”。此外；在孝子坟和老道观还搞了几次道场。每办道场，都搭起木架大棚，棚内挂着二十四孝图和十八层地狱图等，棚外则挂着许多书写着“日满亲善”、“日满同心同德”和“忠灵不朽”等幛子[1]。从上述情况看，日伪保留孝子坟一直到伪满垮台，虽然名为尊重人民的信仰，实则是通过宣扬愚忠愚孝和迷信活动来愚弄和奴化中国东北各族人民和毒化东北各族人民的灵魂，进而达到维护其殖民主义思想统治的目的。

孝子坟一直保留到1958年，被人民政府下令拆除。

---

① 焦英棠：《长春孝子坟》；郝幼权：《孝子坟神道碑》，《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5辑，第299—309、318—319页。

六、燃烧在长春城乡的反日怒火

1、中共长春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斗争

长春地区的中共基层组织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长春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的的基层组织主要有长春特支和双阳特支。长春特支，曾一度出现长春监狱特支和长春油坊特支并存的状况。1933 年 5 月，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整顿，由监狱特支举 2 人，油坊特支举 1 人，统一组成一个特支，书记刘作垣。下设油坊、监狱等支部，党员发展为 27 名，分布在工厂、铁路、监狱、学校等部门。另在长春有共青团特支 1 个，计有团员 14 名，分布在伪满警察、翊卫队、被服厂及中学等部门，其中警察、翊卫队都设有支部。在双阳农村有双阳特支，书记金三哲。下设肚带河、桦木林两个支部，计有党员 11 名。1932 年 5 月，又在双阳西部的刘家店建有伊通特支领导下的刘家店支部，计有党员 6 人。双阳特支、伊通特支都归属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此外，在窑门（今德惠）还有陶赖昭特支领导下的党员 2 名，尚未成立支部。在榆树县华昌药房，还设有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负责人为药房医生杜伯华（字华昌）。

上述党的基层组织，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变化，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决议和指示精神，积极宣

传、组织、发动各阶层群众，组建各种反日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

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长春特支，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宣传群众和组织发动群众工作，在工厂、铁路、监狱、学校等许多部门，建立与发展工会、学生会、反日会、互济会等组织，开展罢工、怠工、增加工资、罢课及改善“犯人”待遇等斗争。1932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还在长春市内公园组织二师学生搞了一次反日“飞行集会”。并把党、团员和工会会员秘密派入伪满的警察、军队等部门中去。此外还准备或已经派人到卡伦及双阳、伊通农村开辟农村工作，派人到长春西南的采石工人中和东南的筑路工人中开辟反日工作。双阳特支，在双阳县南部地区组织了农民协会、反日同盟会、妇女会等团体，并于1932年5月在双阳的三道沟、桦木林一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五·一”反日暴动。伊通特支领导下的刘家店支部也在双阳西部一带建立了反日支会、妇女会、童子团、抗日少年连等组织，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和援助抗日武装斗争。窑门的党组织及党员也积极开展工农工作，并组建了铁路工会和农民协会。

筹建与支援抗日武装 长春地区的中共基层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的同时，还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开展筹建与支援抗日武装活动，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长春特支就提出了“没收敌人武装，拿起刀斧、梭镖和枪支，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的口号，动员青年工人、学生参军参战，并制订了筹建抗日武装计划。为此，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慰劳和援助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并选派优秀青年工人、学生参加磐石等地的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1932年8月，抗日救国义勇军宋国荣部拟袭击长春，派所部第一旅宣传处长肖丹峰秘密来长春与地下党联系，长春特支负责人刘

作垣答应，当义勇军攻打长春时，地下党组织“犯人”“炸狱”，以进行配合。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此事未能实现。另一方面，长春特支根据制订的筹建抗日游击队的计划，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筹建工作。如1934年春，曾派人到长春南的乐山镇活动，准备夺取五甲伪甲长的5支手枪，或取得另一名原救国军头目手中的6支手枪，以便组建一支小游击队。陶赖昭特支领导下的窑门党组织也积极准备组建20余名的农民抗日游击队，并积极为其他抗日武装购买枪械或其他物资。双阳特支、伊通特支属下的肚带河、桦木林、刘家店等支部，也积极组织发动群众，为抗日武装队伍筹集和运送物资，提供情报，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

党组织遭破坏　设在伪都的日伪当局，对在伪都新京及其附近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非常恐惧与痛恨，因而不时调动警特宪机构进行严密监视和大肆搜捕，给党的组织带来了很大的危害。1933年10月，由于在哈尔滨党的组织领导人被捕，使长春特支也受到了牵连。长春特支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发来的关于“哈总号倒闭，涉及长春分号，速做准备”的通知，决定特支干事会书记刘作垣和干事会成员唐吉昆立即转移，留下傅海龄（傅根深）继任特支干事会书记，坚持隐蔽斗争。1934年4月，由于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安仁和书记刘明佛相继被捕叛变，引起了日伪宪警对伪都新京的大检举大逮捕，长春特支书记傅海龄靠打入宽城伪警察署的工会会员赵俊山的帮助，转移到哈尔滨，后返关内。海龄的弟弟傅少洲和林中山被捕。当年7月，长春特支改为支部，张金水为书记，靖永安为组织、继武为宣传，尚有党员10名。此后，长春支部与中共满洲省委失去联系，活动也逐渐停止。

同时，双阳特支领导下的的两个支部由于环境困难，也相继停止了活动。其中肚带河支部由于多数党员被捕，而于1933年春经上级同意，支部停止活动，党员自行转移。桦木林支部

也于1933年初经上级决定化整为零，党员分头转移。其中支书曹外焕等3人秘密避往伪都新京。后因叛徒出卖，曹外焕于当年5月被捕，关押在吉林监狱。其他党员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伊通特支领导下的刘家店支部，工作地点由双阳西部刘家店转移到北部东赵家屯一带，继续坚持斗争，一直到1935年5月，因遭敌镇压而受到损失，并与上级失掉了联系，最后停止了活动。设在榆树县城华昌药房的中共地下联络站，因负责人杜伯华遭通缉，遂于1935年3月，避往北平。因而，该联系站也停止了活动。由陶赖昭特支领导下的窑门党组织，也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一样，由于失去与上级组织的联系，而渐渐停止了活动。

2、义勇军在长春周围的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长春的沦陷，在长春四周的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山林队等也和整个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一样，迅速勃起。他们遍布于伪都新京的东西南北，跃马挥枪，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反动气焰，大大鼓舞了长春地区各界人民的抗日热情。他们的斗争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各阶层民众的热情支援。

冯占海、汪亚臣等部在榆树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原东北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断然拒绝卖国求荣的原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改编命令，举旗抗日，率部北上，经永吉、桦甸、蛟河、舒兰到达五常，吸收了反日山林队宫长海、姚秉乾等部，壮大了队伍。在拉林附近，给尾追的伪军于琛澂部以重创。

在冯占海举旗抗日的同时，东北军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

也于永吉县乌拉街宣布抗日。不久，张作舟率部攻克了榆树县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1932年1月8日，日军一部和伪军于琛微部自舒兰向榆树进犯，张作舟部于榆树秀水甸子阻击敌人，将敌军击退。1月18日，日军及伪军于琛澂部再犯榆树县城，张作舟部奋勇迎敌，激战4小时，杀伤不少敌人，后因二十五旅某团团长杨秉藻叛变通敌，致使榆树县城失守，旅长张作舟被俘，二十五旅余部被迫退至五常。在张作舟率部与日伪军激战时，冯占海曾接到张作舟的告急信，立派宫长海骑兵驰援。但到达地点时，日伪军已将榆树县城占领，只好率队返回复命。后不久，张作舟的余部赵维斌、任玉山两团和骑兵连加入冯占海部抗日军。

1932年1月下旬，冯占海部与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李杜、二十八旅旅长丁超、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二十二旅代旅长赵毅等部，组成吉林抗日自卫军，先后参加了保卫哈尔滨和反攻哈尔滨等一系列战斗。1932年6月上旬，冯占海部脱离了吉林自卫军，改编成吉林抗日救国军，冯任总指挥，随后率部南下。6月20日，渡过拉林河，直扑榆树，迅速攻下了青山堡镇。6月23日，冯军宫长海等旅在董家窝堡将前来讨伐的日军大川支队千名骑兵团团围住，激战终日，歼敌近半，接着又乘胜追击逃敌，在靠山屯撵上敌军，继续予以痛歼。日军支队长大川高喜、副官阿部等均被击毙。是役，共毙伤日军大川大队大部，俘虏一部，只有很少的日军侥幸逃掉。此战后，冯军直逼榆树城下，伪军刘宝麟部，慌忙弃城而逃。刘宝麟部营长蒋鹤卿率全营及迫击炮连、伪保安队等数百人反正起义，夜袭日军，毙敌百余名后携械来归，冯军遂占领榆树县城。

冯军占领榆树县城后不久，日军一个旅和伪军刘宝麟部又复来夺取榆树县城和青山堡，并派兵防卫陶赖昭、窑门（今德惠）等处，企图阻止冯军南下。冯占海则率部退出榆树县城，经弓棚、刘家屯、五棵树等战斗，退至三岔河、三家子一带，随

后东征五常、舒兰，直奔吉林。在攻打吉林之前，冯部救国军曾在九台县其塔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吉林市的作战部署。9月中旬，连攻吉林多日不下，子弹、给养奇缺，遂决定西撤热河。为此，冯军各部又在德惠县大青嘴、九台饮马河等地与增援吉林的伪军吉兴、张海鹏等部交战，将伪军击退，并乘势追击，直抵德惠县布海、米沙子等地，冲破铁路线，渡过伊通河，到达农安县三盛玉。再次召开会议，决定田霖、王戎武二旅留在原地游击，其余大部均西进热河[①]。

在榆树县进行抗日活动的武装队伍，除冯占海、张作舟等外，还有抗日山林队"德林"、"双龙"等部。"德林"队起于舒兰，头领为宋德林。该部于1934年8月，深入到榆树县新立屯一带，发动过攻打新立屯和土桥子战斗。"双龙"队头领是汪亚臣，原系东北军第二十六旅的士兵，"九一八"事变后拉队抗日，报号"双龙"。1933年参加"德林"队，编为第四支队。1934年参加过攻打土桥子战斗。1935年5月，汪亚臣率队在舒榆边境，同伪军张海鹏及日军讨伐队激战，一举歼敌30余人。7月，又率队至弓棚子、黑林子等地开展抗日战斗，攻取敌人据点。1936年初，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1936年冬又被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汪亚臣均为军长。此后继续在舒兰、五常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所部第五团、第六团有时仍在榆树一带活动。1941年1月，汪亚臣在五常县蛤拉河石头亮战斗中壮烈牺牲[②]。

此外，活动于榆树境内的抗日山林队还有"靠山"、"闯江南"、"云中飞"、"天天好"、"海交"等部。他们在1935年9月，曾先后在榆树的茶棚庵屯、大于屯、三道街等地，与日伪军讨伐队进行多次交火，均给敌人以不小的杀伤。其中如"闯江

---

① 王希亮、谭译：《抗日将领冯占海》，第69——116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十一军》，第151——155页。

南"200余人，于9月29日晨在大于屯与30余名日军相遇，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击毙日军伊藤大尉等13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小炮1门，步枪13支。

罗明星部在九台 罗明星，山东范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在九台镇当浴池工人。"九一八"事变后，目睹东北沦陷，家乡人民遭受苦难，义愤填膺，奋起抗日。于1932年3月，联络于万林、王文和、吴振宇等人密商起事。2月20日，他率领6人夜袭伪九台守备队驻所，夺枪70余支，动员伪军20余人反正，遂正式举起抗日大旗。随后，火石岭煤矿矿工和土们岭、沐石河一带农民纷纷来投，仅4个月，队伍就增至七八百人。这时，在沐石河拉腰子屯整编队伍，正式命名为"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对外称"三江好"。8月，联合"赛驼龙"山林队攻打沐石河镇一所日本人开的永衡发的当铺，获枪40支，随即便有当铺炮手、伙计及当地100余人加入了"三江好"部。9月初，联合"殿臣"、"赵旅"等部攻打吉林，因配合不当未能奏效。9月中旬，罗明星率部北上，袭击张家湾（今德惠）车站，获枪械80余支。当年冬利用敌人诱降之机，获取了大量粮食、冬服，随后乘机攻入九台镇，捣毁了伪县公署，缴枪100余支，伪县长逃至吉林。

这次战斗后，日伪当局加强了对"三江好"部的讨伐"围剿"。"三江好"则转战于磐石、桦甸、双阳。此间。罗明星曾于1932年末，应敌人邀请，赴烟筒山"谈判"，发现敌人有诈，遂果断指挥将士首先向日军开火，击毙日军少佐等7人，继而迅速冲破敌人伏击圈，突围出去。随后，还于1933年春与杨靖宇率领的南满抗日游击队建立了联系。1933年夏，罗明星又率部返回九台，于8月16日在常家屯全歼前来讨伐的伪自卫团，捕获并处死了伪自卫团团长杨仲东，缴获枪械70余支。此后，"三江好"部继续活跃于九台、永吉、磐石等地。1935年7月29日夜8时左右，在长图线营城至土们岭间，拆毁路轨，伏击201

号列车，使列车颠覆，并击毙日军11名，给敌人以很大打击。

这次战斗后，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三江好”部的讨伐“围剿”，加之长期降雨，松花江涨水，活动十分困难。罗明星根据情况变化，遂将部队化整为零，潜伏在黑龙江省綦安镇（今属依兰县）。1938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罗明星在綦安被捕。1939年5月，在伪都新京壮烈就义，时年42岁①。

宋国荣、傅学文等部在双阳　宋国荣，吉林伊通县人，原为东北军第二十三旅六六五团一营营长，东北沦陷后为驻磐石伪军第五旅第十三团第一营营长。1932年6月，宋国荣在磐石黑石镇举义，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自任司令，队伍很快发展为4 000余人。后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为第四战区第八路军。

傅学文，吉林永吉县人，1932年春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报号“殿臣”。当年7月，伪吉林省保安队王子明等率部加入，使队伍增到3 000余人。这两支队伍成立后，活动于双阳、伊通、磐石、海龙等地。1932年8月26日，宋、傅两部联合“西边好”、“登山好”等部山林队，约万人，围攻双阳县城。伪县长冯荫树命该县伪公安局长刘振范率领300余名伪警察前往阻击。8月30日，双方在鲁家屯交火，伪警察队被抗日军一举全歼，刘振范也饮弹毙命。之后，双阳县城吃紧，伪县长靠800余名伪军顽抗多日，最后于9月20日逃往伪都新京。次日，抗日义勇军占领了双阳县城。这次战斗扩大了义勇军的影响。战斗后，土顶子乡伪自卫团长项子林率所部百余人反正，加入宋国荣部。不久，日伪派重兵前来讨伐，宋国荣、傅学文则率部撤离双阳，转战于磐石、桦甸、伊通等地②。1933年7月，宋国荣、

① 王霖，郭红婴：《“三江好”抗日义勇救国军事略》，《吉林党史资料》，1986年第3期，第128—134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七十年》，第63—64页。

傅学文等部又合攻伊通县营城子，毙伤俘伪警察多人。此后，率队退至西安县（今辽源市）境。

除了宋、傅两部抗日军外，在双阳还有由太阳岭村地方民团组成的一支抗日队伍，司令肖致和。该部在中共党员肖丹峰的帮助下，曾于1932年9月，集合400余人队伍攻打敌人花篓山据点，交火两个多小时，未克，遂撤离[1]。

李铁城部在农安 李铁城，字俊卿，号海青，满族，辽宁辽中县人。曾在奉系军阀骨干吴俊升手下当差，手下有一支骑兵队叫"海青"队。"九一八"前夕，因劝谏万福麟防止日军侵略而被软禁。"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其释放，并让他指挥一支队伍参加了江桥抗战。后马占山接受日本人要求，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李铁城部被收编为伪军。十余日后，李铁城于3月9日正式宣布抗日，将所部海青队改编抗日救国军，自任司令，率队由"三肇"（肇源、肇州、肇东）向扶余进发，于3月中旬一举攻下扶余县城。随后率主力渡过松花江，经哈拉海直奔农安，于3月27日，从西、北、东三面包围了农安县城。驻农安的伪吉林警备军骑兵第一旅旅长刘玉昆惊慌失措，一面派人与李铁城谈判，企图拖延时间，一面派人去伪都新京求援。伪都日伪当局派出日军清水支队和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独立守备队飞行队及伪军张海鹏部两个旅前往农安援助伪军刘玉昆部，与李铁城部救国军在农安周围交战、对峙。数日后，因扶余方面告急，李铁城则率队撤离农安，退救扶余。撤退途中，缴获了高家店伪警察分局枪械13支。驻高家店伪军第九中队反正，参加了李铁城部抗日救国军。李铁城部在扶余解围后，继续北上"三肇"地区，后知马占山再举义旗，便又投奔马占山，继续在安达、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抗战。接着又转战热河、察哈尔，参加了冯玉祥的同盟军。同盟军瓦解后，李铁城部被编

① 赵中权：《双阳抗日烽火》，《革命春秋》1991年第1期，第39页。

入宋哲元部，李铁城则把队伍拉出北上，准备入苏境休整。他本人于1939年回拜泉接子时，被叛徒杀害，时年33岁[1]。

王辅臣部在德惠　王辅臣，字弼卿，吉林德惠县人，清末秀才，曾任德惠县农会会长兼积谷仓董。“九一八”事变后，立志抗日救国。1931年末经中共党员赵尚志介绍，与设在宾县的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诚允取得了联系，诚允委任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1932年2月，他经过组织发动工作，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并通过缴械伪自卫团枪械和收编“占江南”、“打一面”、李子阳、陈魁首等部山林队，壮大了队伍，最多时达2 000余人，下设6个团。1932年9月5日，王辅臣率队攻打德惠县城大房身镇，攻入伪县公署和警察局，烧毁了伪财务局的房舍，伪县长逃入筑有高墙的伪保安队大院内躲避。由于日伪派来飞机轰炸，抗日义勇军第三路便退出战斗。此后，王辅臣率队转战于德惠、榆树、舒兰边境一带，并加入了冯占海抗日救国军，被委任为第二十五旅旅长。冯占海部西撤热河后，王辅臣部被敌包围打散，王辅臣化装逃出，后投奔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2]。

长春西南郊一带的义勇军　除了在长春西北、北、东北、东南等地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连续不断进行抗日战斗外，活跃于长春南郊及伊通、怀德等县的义勇军、山林队也不断发起战斗，袭击日伪据点，抗击日伪军的讨伐。具体的事例列举如下：

1931年9月28日夜，一支抗日武装潜入被日军占领的南岭兵营，烧毁了粮库和马厩13栋；

1931年11月11日，一支抗日武装袭击了长春南的公主岭、刘房子、范家屯等地；

---

① 李临华、林继红：《碧血涂兴岭，丹心照松水——抗日英雄李铁城的一生》。《学术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第82—85页。

② 于敏辉：《德惠抗日义勇军》。德惠县政协第362号资料。

1932年5月16日，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军第五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派人帮助下，举行哗变，与前来堵截的日伪军激战，突围后投奔磐石抗日游击队；

1933年6月25日，南满游击队与抗日义勇军马旅、赵旅等300余人，联合攻打伊通大兴川伪军兵营和附近的会兵，毙伤敌军10余人，其余敌军弃营逃走；

1934年5月1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团和少年营，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200余人，共同袭击伊通县二道沟的伪军和伪警察队，毙敌排长等5人，俘日本指导官1名，缴获轻机枪1挺。

1935年8月初，一支抗日武装夜袭孟家屯伪警察所，俘虏伪警察15名；

1935年11月25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联合伊通一带8支山林队，共同袭击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军某部机枪连，一举攻入院内，俘虏伪军15名，击毙1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6支及一些军衣、被服、药品等；

1936年夏，抗日山林队"天地荣"、"海青"等部在长春南郊乐山镇一带与伪国都宪兵交战。8月，"海青"队再次与伪国都宪兵队交战，不幸海青队首领牺牲。

活跃在长春周围的大刀会　"九一八"事变后，在长春周围，除了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外，还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凭着强烈的爱国思想，用最原始的武器——大刀、长矛，英勇地抗击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军，表达了中化民族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和不受欺侮的民族气节。如榆树县，有以白殿三为首的红枪会100余人，收编了向阳镇的地方大排，于1932年5月，围攻榆树县城，经过巷战一举攻克，杀伤敌军18名，缴获枪械300余支和大量物资，其余敌人弃城而逃。这支红枪会队伍在县城驻7日后主动撤出。行至三里堡遭日军骑兵和伪军警备旅的围攻，突围时红枪会损失较重，首

领白殿三也不幸被俘遭杀害。6 月下旬，当冯占海部救国军在榆树弓棚子、刘家屯、五棵树等地与日伪军作战时，附近的大刀会也主动前来助战，与冯部救国军一起英勇杀敌。再如，在九台县放牛沟团山一带，有农民孙殿文、刘福全等走村串户，于 1933 年组织了一支孔家店大刀会，积极进行演练武术，准备于 1934 年农历 5 月树旗起事，。因叛徒告密，于起事前一个月，即 1934 年农历 4 月，遭到 200 余名日军的突然围击，大刀会首领孙殿文等临危不惧，组织大刀会，高喊着“救中华匹夫有责”的口号拼力抗击，杀伤日军十余人。但在日军的机枪、步枪扫射下，有百余人伤亡，孙殿文也壮烈牺牲。此外，在长春周围其他地方，也有农民大刀会，协助义勇军英勇杀敌。

3、各阶层人民的反日浪潮

“九一八”事变后，长春的工农商学和市民群众，也和东北各地群众一样，都纷纷投身于抗日浪潮之中。其中有些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或帮助、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前，长春工人就同学生群众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举行过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后援会，积极支持当地农民群众保卫自己土地的正当要求。“九一八”事变后，长春的工人斗争更为活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行反日罢工斗争。

1932 年 12 月 19 日，长春油坊工人，在中共长春油坊特支领导下，为反对资本家降低工人工资（由 1 元降到 0. 65 元）进行罢工，获得了部分胜利，使工资由 0. 65 元上升到 0. 85 元，之后，工人们继续为工资恢复到 1 元进行斗争。

1933 年 6 月初，长春 11 家油坊 3 000 余名工人，为要求发

还欠薪举行同盟罢工。同时，长春51家砖窑6 000余名工人也举行同盟罢工。对此日伪当局惊呼：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罢工。

1933年7月4日，长春窑业会社120人，因把头拖延发放工资举行罢工。

1933年7月8日，长春建筑工人1 000名，为反对工头私吞工人工资举行罢工，获得部分胜利。

1933年7月26日，长春制油业“裕生源”等11家工厂370余名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结果获胜，工人每人每月工资由13元增至14元。

第二，破坏铁路运输。

1931年9月29日，日军侵占长春后，准备于23日派兵进犯哈尔滨。长春站的铁路工人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把近300节车箱转放到他处，使日军不能迅速运兵，无法立即北犯哈尔滨。

第三，拒绝为日伪服务。

长春的邮政工人，同东北各地邮政工人一起参加了反对伪满“接收”邮政的罢工斗争，于1932年4月全部签名退职，一起撤进关内。

第四，支援和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在长春市，经中共长春特支发动组织的工人们积极从物资、情报、人力等方面支援磐石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在九台，火石岭煤矿工人宋海山组织一支以矿工和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在窑门，工人们积极为抗日武装购买子弹、物资，支持他们的抗日武装斗争。

应当指出，长春的工人斗争也和整个东北的工人斗争一样，由于受到日伪派兵镇压和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一度出现挫折。1933年夏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后，虽有某些恢复，但到1934年上半年后，由于中共在长春及东北一些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转入低潮。然而，直到“七

·七”事变与太平洋战争之后，工人的斗争仍未停止。如1936年6月，有长春“康德火磨工厂”30余名工人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当年冬，长春20名煤气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1942年9月，营城子煤矿工人700余名痛打欺压工人的日本资本家和把头、监工；1943年营城煤矿工人60余名连续罢工15天等。

农民群众的反日斗争　长春的农民反日斗争，除前述的在“万宝山事件”中针锋相对的与日本警宪进行斗争和“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组织的大刀会、红枪会，直接参加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外，还有在中共的领导、帮助与影响下，或自发地进行组建反日群众团体，开展反日宣传，举行反日暴动，支援抗日武装等活动。具体的斗争情况列举如下：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伊通特支领导下的刘家店支部，在双阳西部与北部组建了农民协会、反日会、妇女会、童子团、少年抗日连等团体，积极开展反日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如少年抗日连，曾在双阳刘家店、前城子、黑泡、栗家屯等地散发反日传单，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扩大了抗日的政治影响。其他如农民协会、反日会、妇女会等则积极为抗日队伍筹集与运送各种物资，有的组织还直接选派人员参加抗日武装。

双阳特支领导下的桦木林、三道沟一带农民，曾于1932年5月举行了“五·一”大暴动，参加人员2 000余名，打着“中韩团结”的红旗，手持棍棒，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破坏了日伪的交通线60余里，将汉奸与亲日地主的粮食分给农民，吓得伪保甲长望风而逃。斗争共坚持了20余天，后遭到日伪军警的镇压，有13名群众惨遭杀害。

在德惠县境内的窑门车站附近，农民群众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与影响下，也进行了一些反日活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创造条件，为组建一支2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而努力。

在伊通县头道沟大房子屯，爱国的农民李坤和两个儿子，积极为抗日武装人员提供情报，购买日用品，并把这些物品及时送到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他们支援抗日武装的活动，引起了日伪警宪的注意，把他们父子列入黑名单。为了避祸，李坤让二儿子避入伪都新京郊区，给一家地主扛活，并负责搜集情报。但他自己却让敌人捕去，敌人让他带路去找抗日武装，可是在山里绕了一天，也未发现一点痕迹。第二天，敌人把他杀害。第三天又抓去他的大儿子李国有，不久也杀害于"新京"，李国有当时年仅 20 岁[①]。

上述的农民斗争，除了遭到日伪警宪的镇压之外，也受到了中共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如双阳的"五·一"暴动虽然表明了农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但也使党与群众团体的骨干暴露出来，因而不久之后，使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难以继续坚持长期的反日斗争。

文化教育界的反日斗争　长春的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也同其他阶层爱国民众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与无情揭露。"九一八"事变前两个多月，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后，长春的爱国知识界人士，便积极奋起进行斗争。7 月 7 日，在长春的吉林省立二师、二中和长春县立女中等校学生数百人，组成长春学生抗日后援会，举行罢课，并列队连续三天进行示威游行，沿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散发反日传单。还派出宣传小组，进行街头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事端，扩大侵略，准备出兵占领东北的阴谋。8 月，农安县立中学学生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9 月，吉林省城吉林市一些学校的学生也联合长春学生组成抗日后援会，并进行示威游行。12 日，长春商埠高小学生 20 余人，在老市场进行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

① 《伊通县文物志》，第 162—163 页。

制造"万宝山事件"的阴谋，日本宪兵军曹井上某伪装成民众进行捣乱，被学生撕破衣衫，打伤脸部。25日，长春学生抗日后援会与长春教育联合会联合向当局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就"万宝山事件"对日进行交涉。

同时，长春教育界知名人士36人，于8日开会，决定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万宝山事件"，成立长春国民外交协会。当即推举省立二中教师李世超和省立二师训育主任刘静岚等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宣言书的起草委员。13日，公布长春国民外交协会组织大纲，宣布其宗旨是以民众的力量，通过国民外交方法，作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对日进行交涉的后盾，并正式宣布成立国民外交协会。27日，长春国民外交协会召开排日会议，斥责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指使日本警察无理镇压中国农民，侵犯中国主权的罪行①。

"九一八"事变后，长春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文化舆论阵地，采取较隐蔽的手法，即通过撰写发表文艺作品、讲课和演出戏剧等合法手段，对学生及社会民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在文化界，前期有伪满机关报《大同报》的编辑爱国青年陈华，同东北的爱国作家一起，于1933年8月6日，在伪《大同报》创办了文艺副刊《夜哨》，刊登罗峰、金剑啸、萧红、萧军等人一些具有爱国反日思想内容的文艺作品，用隐晦的手法，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暗示民众只有起来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连续出刊5个月，计21期。后期有作家李季风，在《大同报》上发表具有反日内容的文艺作品；有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办的《青年文化》、《协和文化》主编王天穆，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影射手法，在上述刊物上发展具有反日爱国内容的文艺作品；还

①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活动大事纪》，第87—91页。

有“大同剧团”团长赵刚，初光剧团团长初光等人，利用修改台词，编演具有反日内容的戏剧来进行反日斗争。在教育界，则有爱国教师利用课堂教学、批改作业等工作，向学生灌输爱国反日思想，抵制与反对奴化愚民教育。如德惠县北山小学教师董雨航，原系共青团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1934年被捕入狱，1935年被释放后回到家乡，在北山小学任教。他经常利用教文学、教写作、教唱歌、讲故事、批改作业等时机，揭露日伪统治下“国破家亡，肝肠碎断”的悲惨生活状况，传播使“可爱的中华，早日强大兴旺”的爱国思想[①]。再如九台“国民高等学校”的教师郭维新，为了抵制日伪对学生们的“勤劳奉仕”，他在带领学生劳动时，竟在劳动现场给学生讲故事，同时派人“放哨”。见日本人来检查，他便比比划划指挥学生干活，日本人一走，他又领着学生们坐下来讲故事。并对学生说：“糊弄洋鬼了嘛！”[②]

二是热情支援并直接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如在双阳，当宋国荣抗日义勇军起事和攻占双阳前后，除前述的双阳中学学监肖丹峰参加该部，并充任宣传处长外，双阳中学的教师韩佐烈和七八名学生也相继投笔从戎，加入了宋国荣部，直接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在德惠，当王辅臣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成立前，就有德惠县立中学训育主任李郁华为之谋划和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这支抗日武装成立后，李郁华又以县立中学为联络点，向其提供情报，并组织该校师生积极支援和参加义勇军。结果有该校学生王明堂（王光宇）、陈世有（陶净非）、李英华、张靖华、宫振廷、董振国等都陆续加入了义勇军，为义勇军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为义勇军征集队员，扩大武装作了不少组

① 李柏林：《董雨航在德惠北山小学》。《吉林党史资料》1989年第3期，第66—70页。

② 杨铁铮：《我县第一个中学伪满九台“国高”》。《九台文史资料》第1辑，第220—121页。

织发动工作。

三是秘密组织反日群众团体，开展爱国反日教育，并为收复国土积蓄力量。自1939年至1941年，长春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机关职员曾在长春秘密建立多个反日群众团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日斗争。1940年5月，由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吕殿元、崔立福、孙景寅等7人发起，在校内成立了反日秘密团体"恢复会"。该会宗旨是："恢复东北失地和主权，驱逐日寇，准备武装起义。"[①]至1941年11月，已发展会员36人，占伪军校第一期中国学生的1/5。他们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传阅进步书籍，演唱反日歌曲、戏剧，来启发同学们的民族意识，宣传反日思想，并积极寻找共产党，以求得领导。1940年端午节，由伪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第二期毕业生陈树满、王国贤、李金山、李逢春等发起召集在长春及外地伪满机关工作的该养成所毕业生，在长春成立了"读书会"（也叫"全满读书会"），该读书会还在伪新京工业大学、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分别建立了读书小组。读书会及其读书小组的活动，主要是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并秘密张贴反日标语，制造失火事件。1941年6月，王国贤被捕供出了该会一些组织情况，因而遭到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的搜捕，陈树满、李金山、李逢春等及时逃离长春。此后，读书会的活动一时减少和更加隐蔽。当年9月，读书会的骨干马成龙、刘荣久等又重整旗鼓，联络伪新京工大、法大、医大和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成立了"东北铁血同盟"。该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原则规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政权，解放东北，建成社会主义；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②]。因此，要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以唤起民众，并积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争取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此外，还

---

① 于堤：《伪满时期长春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救亡》，第493—494页。
② 于堤：《伪满时期长春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救亡》，第491—492页。

有由李季风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读书会”，参加人员主要有伪《大同报》的编辑，伪新京海关、税务、中央银行、邮局的职员，伪新京医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等。他们的活动也是相互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用以进行爱国反帝教育。

后来由于读书会内有人叛变告密，并受了日伪警察利用共产党叛徒充当“共产党特派员”的欺骗，于1941年12月30日同时在伪都与哈尔滨进行大搜捕，捕去“东北铁血同盟”的骨干马成龙、刘荣久以及王德林、徐东升、孙海峰，“青年读书会”的李季风，伪军校崔立福、常吉等多人，并将刘荣久判处死刑，马成龙、徐连汉判无期徒刑，其余判有期徒刑。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捕和被刑讯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陈东升被捕后，在押解途中撞火车牺牲，孙海峰在敌人酷刑折磨下，誓不低头，后则跳楼牺牲。马成龙、王德林被敌人折磨得双目失明，或精神失常，但仍毫不屈服，最后都被折磨致死。刘荣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喊反日口号，从容走入刑场，英勇就义。李季风利用各种机会三次逃出虎口。其他被押知识界人士也誓不屈服，他们在监狱中留下了“为除寇盗除倭患，才到狱中来作囚”、“满腔热血兮将与谁洒，仰天长啸兮誓吞东夷”[①] 等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许多感人诗句。

1941年末的镇压之后，长春一些大学学生的读进步书籍活动，并没有停止。至1943年后，又在伪建国大学建立了新的读书会，其他大学如工大、法大、医大及伪军校也还有读书小组或进行读书活动。这些学校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依然在通过读书活动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抵制奴化教育，抵制学生参加“勤劳奉仕”劳役活动。而且，这时读的书籍较过去增多了，除了

---

① 杨子忱：《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中的反满抗日活动》，《长春史志》1987年第5期，第23页。

一些进步文艺作品外，还陆续增加了如《大众哲学》、《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共产党宣言》、《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中文或日文书籍，使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水平有更迅速的提高，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进行探讨与分析，也加速了他们寻找共产党或国民党，取得领导和支持的进程。

城镇市民各阶层的反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也引起了长春城镇工商业者及其他市民阶层的不满与反抗。如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时，长春的商民群众就进行了反抗斗争。当时长春的一些商贩，拒绝与日本“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人交易，致使日本人不得不从四平、昌图购进和运回蔬菜和水果等物品。“九一八”事变后，长春及周围各县城镇居民，继续投入了反日斗争的浪潮之中。他们的反日活动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道义、物资、钱财等方面积极支持抗日武装斗争。这突出表现在伪满初期对抗日义勇军的支持方面，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张作舟率东北军第二十五旅举旗抗日，攻占榆树县城后，受到了榆树县商民各界的热烈欢迎，全县各区都成立了“临时驻军给养筹备会”，共为张部抗日军捐款达1 800万元。1932年6月，冯占海部救国军再度攻占榆树县城时，又受到了市民各界的热烈欢迎。民众们自动列队悬旗，高呼口号，夹道迎接，并为义勇军提供较好的食宿条件。再如，宋国荣、殿臣等部义勇军攻打双阳县城时，伪县长弃城逃走后，城内民众则主动打开城门，欢迎义勇军进城。同时也积极为义勇军补充给养，提供情报，支援他们的武装抗日斗争。又如，在九台县，当罗明星带队攻打以放高利贷残酷盘剥中国民众的日本人开的沐石河永衡发当铺时，该当铺雇佣的中国人炮手、伙计却暗中与抗日军配合，使之取得缴枪40余支的胜利。战斗后，更有一些炮手、伙计和当地百姓100余人加入“三江好”队伍，

扩大了抗日义勇军的力量。

二是市民百姓直接进行反日抗暴斗争。这主要表现在长春市民众在伪满后期对日伪人员与物资的打杀与毁坏方面。例如：1942年冬，长春市内一些角落出现了不少传单和漫画。传单上写着："我们要万众一心，不怕他铜墙铁壁！"漫画画的是一只洋犬，脖子上挂着日本国旗，由一中国士兵用刺刀刺进洋犬的肚子。上边还有一行字，写着："你还想吃太阳吗?!"[1] 1943年秋，在日商开办的三中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旧楼处）二楼发现点燃的引火物，因扑救及时，没烧起来。此外，1943年秋还发生火烧关东军设在宽城子的一座军用仓库，1943年冬还发生一名欺行霸市的日本人在南岭被勒死，1944年冬还发生在牡丹公园附近一名日本人警察被人用扁凿子杀死等事件[2]。

4、共产党系统秘密活动的崛起

在长春的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由于组织遭到一些破坏，有些党员干部离开长春，和上级的联系中断，致使党在长春的活动一时处于基本停止状态。但是到"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系统的地工组织和人员在长春的活动又逐渐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

"东北青年救亡会"在长春的活动　"东北青年救亡会"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张为先（共产党员）、丁宜、赵家宾、侯洛、田琛、赵冬日、夏航、高亮、丁非等在日本东京创立的"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东北留学生读书会"等3个秘密抗日组织，于1938年合并而组成的。全称叫"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会"。该会到1939年时已

[1] [2]于堤：《伪满时期长春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救亡》，第503—505页。

发展会员60余人。

1937年6月，张为先回国，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并与随后回国的丁宜等人在沈阳成立中共领导下的地下情报组织“党社”。1938年春之后，东北青年救亡会的会员一些人先后回国，多数派到长春，少数派往沈阳与哈尔滨，因而于1938年秋首先在长春成立了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小组。1940年初，又有一些会员回国，汇集于长春，于是在东京的总部机构也随之移至长春，由侯洛、田琛、夏航主持，领导沈阳、哈尔滨及东京等地分支机构工作。随后不久，东北青年救亡会也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受了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领导，并将总部迁至沈阳，长春则为分站，计有会员21名。由田琛、夏航、高亮、关克主持。1942年初，中共中央派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情报科李振远、周梅影夫妇来东北指导工作，将在沈阳的“党社”与“东北救亡总会”合并，改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在长春设立分会，由田琛、高亮、关克、夏航负责。1943年，党又派张友恒代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来东北检查工作，并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于是在沈阳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李振远，组织委员张为先，宣传委员丁宜、周梅影，党员开始时为15人，后陆续发展为70余人。其中在长春的夏航、高亮、关克、田琛、石迪、张晋等均为党员，并成立了党小组。这样便形成了中共领导下的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联络东北一些市县的地下情报网。其中属长春所辖的市县有吉林、图们、四平、扶余等。

东北救亡总会在长春分会的成员，按照党的指示，先后潜入伪满在“新京”的一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取得了合法的社会职业的掩护，为搜集各种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高亮、马昆山、王焕墀打入了伪“国通社”，当上了记者，夏航不仅为伪“国通社”的记者，还是伪文教部的编审官、法大教授，为他们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他们还作了分工，高

亮侧重联系伪国务院，特别是在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周围，王焕墀负责联系伪经济部，夏航负责联系伪文教部。其他还有关克当上了伪军事部秘书官室的秘书，田琛在伪国务院官需局任职，于清怀在伪军铁石部队任中校参谋，在伪军校任教官。同时还将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伟也发展成该会会员，由高亮与他们联系，经常以会友、研究学术等为名，到张景惠官邸、家宅等地搜集情报，以至召开秘密会议，抄写与藏匿重要情报与机密文件。

东北救亡总会长春分会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社会职务和社会关系作掩护，搜集了大量的有关日伪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中共党组织进行抗日战争及迎接抗战胜利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他们提供的情报主要有：日本"神风队"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的情况、伪军铁石部队调防的情况；日本向东北移民情况、伪满大汉奸及宪兵特务名单、长春市区要图；"满铁"在东北北部边境修筑铁路情况、伪满的公路分布与扩建情况、伪满的铁矿与轻金属矿开采情况、伪满商业货源缺乏情况、伪满的新闻广播与社会舆论的动态、伪满文教界情况，等等。

东北救亡总会长春分会的成员，除了搜集情报外，还利用报纸或讲坛巧妙地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进行爱国反日宣传教育工作。此外也利用职务与社会关系为中共地工人员做些提供便利，帮助寻找掩护职业，躲避日伪警宪检查等事[①]。

中共派往长春的地工人员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还从1943年始，向东北各地派遣地工人员，为促进与迎接抗战胜利作准备。为此，于1942年5月，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担任搜集与研究日伪在东北

---

①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七十年》，第71—74页；杜刚一：《东北救亡总会长春分会简介》，《长春文志》1990年第5期，第37—39页。

的统治情况等工作，同时举办训练班，培训地工人员。其中派往长春的有傅根深、李焕章、许筠、赵东黎、申东黎、苏东、王永生、徐慎、田振铎、佟志杉等。这些地工人员到长春后，根据党的“建立阵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的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其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1943年7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傅根深（由傅海龄改名）潜入长春。他到长春后，利用当车站装卸工和锅炉工为掩护，通过讲《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在工人群众中广交朋友，开展抗日爱国教育，并从中培养考验一些觉悟高的工人，进而通过滚雪球的办法，发展十余名工人党员，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迎接抗战胜利，培养了骨干。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共产党员李焕章到长春做地下工作。他以长春益发银行庶务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情报搜集工作。他领导下的人员还有王刁、高永涵和在哈尔滨的陈之捷，在朱城子的梁若本等。搜集的情报主要有伪币发行、市场物价变动以及日伪警宪特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等方面。

1943年12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许筠来长春做地下工作。许到长春后，通过给伪皇帝当御医的父亲，搜集了许多伪满上层人物的情报。

1944年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共产党员赵东黎到农安做情报驻在员工作。赵在农安以与人合开一杂货铺为掩护，经常到长春、吉林等地进行“商业”活动，从中搜集日伪军政机关和社会思想等方面的情报。他与在长春益发银行的地工人员李焕章接上了关系，并与在吉林市第二伪宪兵团当上尉主任的哥哥联系上，为党搜集了不少日伪的军政和经济等情报。

1944年2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申东黎、苏东夫妇来长春。他们通过当伪警察的弟弟的帮助，落了户口，并找到了在合隆区杂业组合、区公所等处任职的掩护职业。根据党的指示，广泛接触群众、结交朋友，掌握了长春市在日伪统治下的许多情况，为迎接抗战胜利作了准备。

1944年3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王永生来长春，协助傅根深工作。王永生来长后，与傅根深接上了关系，在傅的领导下，以在一家铁工厂当工人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团结了不少工人，并打入了“家礼教”。

1945年5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徐慎来长春做地下工作。徐到长春后，通过姐夫的帮助，在某保险公司当雇员，并开始从事地下工作[①]。

此外，自1943年以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还往长春派遣了田振铎、佟志杉等人。田振铎到长春后，发展了一些地下党员，佟志杉来长春后，在伪军校任教官，联系了一些爱国青年学员。

除中共党组织派遣地工人员外，晋察冀豫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也于1943年12月派出共产党员刘建民来德惠做地工，负责联系东北抗联部队与地下党。工作9个月后返回太行区麻田镇汇报，1944年9月返回东北扶余，继续从事地工工作。

5、国民党系统地下组织的活跃

在东北沦陷期间，中国国民党的爱国人士也和东北各阶层

---

①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活动大事记》，第154—169页。

群众及各抗日党派团体一样，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他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是坚持隐蔽的地下斗争。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主要有三个系统，即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专。在长春活动的主要有党专、党务办事处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系统的机构。

“东北抗战机构” “东北抗战机构”属于国民党党专系统，它是由“抗战大联合”改称的，领导人是罗大愚和张宝慈、高士嘉等人。1935年，罗大愚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之命赴日本，在留日学生中物色对象，发展组织，准备毕业后回东北开辟抗日地下工作。1936年，罗与留学生张宝慈、高士嘉、刘世恒等组成“东京读书会”。“七·七”事变后，以“东北读书会”为基础，成立了“抗战大联合”，吸收了一批留日学生参加。“抗战大联合”的主要任务是吸收有民族气节、坚定的抗日分子参加组织，同时也搜集敌伪情报。1940年二三月间，参加“抗战大联合”的成员有一部分人毕业，从日本回到东北，随之该组织的领导机构也迁往沈阳，改名为“东北抗战机构”，由罗大愚、张宝慈、高士嘉等人坐镇沈阳，指挥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大连、吉林、四平及日本东京等地陆续建立的下属机构的活动。

长春的抗战机构是1940年春由罗大愚、高士嘉来长春建立的，负责人为王宏文（化名曹介村）、孙学宗（化名赵世贤）、张辅三（化名张硕强）3人，王宏文为长春专员。此后不久，罗又将伪《大同报》记者王觉（化名吴仲元）介绍给王宏文，协同领导长春的地下党务工作。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发展组织，此外，还有宣传、情报与联络工作。发展组织工作进展很快，在伪建大发展了17名学生，成立了“建大干部会”。在法大、工大、医大学校也各发展三四名师生。在伪“国通社”发展了数名记者。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少年科也发展了数名记者与编辑，在伪警察中还发展了3人，组成“自强会”。到1941年末，共发展了

50 余人（包括从外地调入的四五人），建立了 6 个小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宣传工作与情报工作。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以王觉为社长的新时代出版社和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少年科办的《青少年指导者》刊物，来出版或刊登一些影射或借题发挥的文章，进行爱国反日教育。至于情报工作，利用一名在伪国务院地下秘密监听外国广播的抗战机构成员取得重要情报，并及时传递出去。

1941 年末，日伪制造的逮捕国民党地下组织的"贞星事件"，牵连了"东北抗战机构"。在长春的王觉、王宏文、张辅三，于 1942 年 1 月相继被捕。3 月，"建大干部会" 17 人也在长春等地被捕。被捕的人员坚贞不屈，王觉、张辅三、柴纯然、王用中等被折磨致死，王宏文及其他人分别被判处无期与有期徒刑，关押在狱中，直至 1945 年东北光复才得重见天日[①]。

东北党专与东三省党部 "贞星事件"，使国民党党专系统的地下组织受到很大损失，但由于一些被捕人员的坚贞不屈，也使一些基层机构和人员得以保存下来。这时作为辽宁省党务专员并总揽东北及日本党专系统工作的罗大愚及时吸取了教训，放弃了"东北抗战机构"的名称，把党专系统的组织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为"核心"与"单位"两层。"核心"即"领导体"，更为秘密，不与下层人员发生直接联系。"单位"即"执行体"为基层组织，凡参加者都纳入这种组织内。同时，又在 1942 年 5 月至 1943 年 4 月，分别在沈阳、长春两地开办干训班，把未被捕的同志聚集起来，分组训练，使之坚定信心，加强纪律，提高保密观念。

在长春未被捕的人员伪"国通社"的记者吕文毓、王遇忱，伪汉医协会的崔景章，伪新京协和会的夏景衡等又恢复了联系，成立了秘密组织"抗日救亡会"（后改称为"勉励社"）。对内称

---

① 于廷：《伪满时期长春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救亡》，第 711—732 页。

二七区党部，并以此名义，在伪国通社、建大、工大、法大以及伪机关、会社、学校印刷所等单位，吸收教员、职员、学生、工人计 30 余人加入地下组织，成立了工大一〇一区分部，并利用去工矿实习的机会，搜集经济情报。在畜产兽医大学的教授张渠，也在兽大学生中发展了 30 余名加入组织，成立了第十八区分部。在沈阳、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也都恢复联系，发展了组织。

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系统的地下组织，也因 1941 年哈尔滨机构受到破坏而改设东三省党部。其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为石坚，书记长张滔，在长春也有地下组织人员在开展活动。1944 年 4 月，吉林党部书记长张滔在长春被捕，供出东三省党部一些组织情况，结果造成辽、吉、黑三省党部负责人等 20 余人相继被捕下狱，使党专与东三省党部之"双轨制"地下机构失去效力。于是在 1944 年 5 月，将东三省党部与党专合并，统由罗大愚负责领导。当年 7 月至翌年 4 月，罗大愚又在长春、沈阳、营口、辽阳、辽源等地举办第二期干训班，参加训练者 150 余人，一些市县也同时进行小组的自身训练。1944 年 10 月，罗大愚将党专总部由沈阳迁至长春，继续领导东北各地开展地下工作。1945 年 5 月 23 日，日伪在东北各地制造了"五·二三"事件，派出大批警宪对国民党地下组织进行大逮捕。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在长春逮捕了罗大愚、吕文毓（吉林省党务专员）等百余人。张宝慈等十人也在沈阳被捕。整个党专在东北各地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罗大愚入狱后，又在狱中办了秘密刊物《牢狱之花》，供难友们传阅[①]。

真勇社 真勇社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在伪治安部的地下组织，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光复中国。社

---

① 于堤：《伪满时期长春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救亡》，第 715—726 页。

长是王家善，曾先后任伪治安部少将军政科长、中将军政司长等职。1934年，王家善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曾受国民党军政部何应钦之命，在东北伪军中开展抗日工作。1936年9月18日，王家善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三民主义真勇社”。积极在陆军士官学校和商船学校的中国东北留学生中吸收社员。此后，又在日本成立了“留日陆海军同学会”和“留日陆士同窗会”等，作为真勇社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旋因被日本陆军省发现而先后解散。“七·七”事变前后，王家善回东北，真勇社总部也随之迁回东北，设在长春。1939年，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不久，王家善被调至该校任教授部长，便在伪军校内继续发展社员，开展反日活动。1941年夏，在伪军校设立了支社，负责人为战术教官刘启民。此后，又经刘启民手发展了不少社员，王家善也在伪军中发展一些社员。1941年末的“一二·三〇”事件，真勇社也有所暴露，真勇社的骨干何正卓（真勇社与党专的联络人）、林家岳、于文泽等相继被捕，王家善及其他主要成员也多被日伪警宪监视。于是王家善派人请示上级后，于1942年将真勇社改名为“东北青年军人挺进团”。到1945年东北光复前夕，真勇社的社员共有200余人，其中在长春伪军校中约40人，其机构除在长春的总社与支社外，还在吉林、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承德等地设有支社[①]。

① 《光复前的枪声》，《暴风雨中的长春青年》，第89—90页；于堤：《伪满时期长春 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救亡》第494—495、726—727页。

七、日伪统治崩溃，关东军投降

1、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

1944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日本法西斯也和德国法西斯一样，陷入了十分孤立和衰败、混乱的状态，并日趋灭亡。日本统治下的伪满，也和日本一样，呈现了一片动荡、混乱和衰败的景象。一方面，镇压东北人民的主力关东军已实力大减，另一方面，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日浪潮不断勃起，反日舆论到处传播。日伪统治已陷入摇摇欲坠，趋于垮台的境地。但是，日本法西斯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千方百计地在东北这块殖民地上做垂死挣扎。

末日来临前的"急救"措施　在日伪统治即将垮台的前夕，为应付时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急救"措施，其中在伪都实施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调整军警宪特，建立关东军直接指挥体系。1945年7月1日，为了适应战时需要，便于关东军控制，将伪警务总局特务处与伪中央保安局合并，协调了"防谍"、"防谋略"方面的关系；当年7—8月，又以关东宪兵队、特务机关、兵站警备队、铁路警护军和保安局人员，联合组成关东军特别警备队，作为"谋略部队"，统管战时监督军警、维持治安、镇压人民等各项任务。当时拟成立3个特别警备队，长春是属于第一特别警

备队（司令部在沈阳）的第二大队。

（二）加强城市的防空。在伪国务院内于1944年新设的防空部指挥下，伪都新京和其它大中城市一样，建立了各种防空组织，并经常进行防空演习，要求居民每户都要准备防火的沙箱、水桶以及防空窗帘、灯罩等物，窗户玻璃上一律贴上防震的纸条。为了消防车进出方便，还拆除了不少砖墙。此外还动员不少市民挖掘坦克壕。结果把长春居民折腾得日夜紧张忙乱，苦不堪言。

（三）更换伪市长。在伪政权垮台的前几天，把伪新京特别市市长张联文撤掉，换上了日本人认为更有能力更能保护日侨的于镜涛。同时也用赵万斌代替齐知政担任伪首都警察总监的职务。此外，还从四平调来饭田祥二郎中将任伪新京地区防卫司令官。

（四）加强对汉奸大臣们的监控。在伪满垮台前夕，利用关东宪兵队的特别情报班，加紧对伪满大臣们的监视、侦察。特情班除利用各“大臣”身边工作人员随时监视“大臣”外，还利用汉奸们的不同派系来相互监视，甚至用汉奸的亲属来监控汉奸，如张景惠的七姨太竟被用作监视张景惠的密探。当发现汉奸们有背离日本人倾向后，又采取让他们多在公开场合发表反苏、反共、反国民党的讲话和从经济上给以优惠待遇等办法，以图使汉奸们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主子效忠到底。

罪恶的“第4号作战计划”　“第4号作战计划”是关东军配合日本陆军决定的“本土决战”而于1944年下半年制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事部署，即关东军以北部中苏边境、长大线和长图线及以通化为中心的中朝边境作为防御苏军，并与苏军决战的3条防线；另一方面是破坏、烧杀的“焦土计划”，即在撤退时要将苏军可能利用的公路、桥梁、建筑物、电话线、火车站、铁路隧道等一律破坏、烧毁掉，军用的粮食、被服则尽量运往通化，运不过来的也统统毁掉。并准

备在东北西部与中部使用毒气与细菌武器。对东北各地反日民众，则进行残酷屠杀。结果该计划第一方面的内容，由于苏军的迅速进攻而未能实现，而计划的第二方面内容却在东北各地残酷地实施着。其中在伪都新京实施的主要有：利用警宪烧毁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本部孟家屯细菌工厂；由日本宪兵队和伪首都警察逮捕了13名中国人，9名白俄人，1名德国人；伪新京监狱以转监为名将70余名"犯人"押往吉林，准备途中集体杀掉，幸在二道河子遇上伪军校起义学生，得以救护；日本军宪连续制造26起镇压长春民众暴动事件，共杀害中国民众447人。其中较大的有：1945年8月14日在长春大经路，日本"新京"宪兵队镇压200余名中国暴动群众，开枪打死15名；8月15日在南关附近，关东军"敏"部队出动5辆坦克，镇压示威游行的200余名中国民众，当场打死150余名；8月15日在大经路，日军一队镇压100余名中国民众，打死20名；8月15日在大马路，日军一小队，配有4辆坦克，对正在欢庆东北光复而游行的1 000余名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打死20余名；8月16日在南关附近，日本"新京"宪兵队60人和防卫司令部一个中队80人，配有10辆坦克，镇压1 000余名中国民众，当即打死100余名；8月16日，在南湖附近，日本宪兵和防卫司令部各一小队，镇压600余名中国民众，杀害30余名；8月16日在孟家屯，第一特别警备队第二大队30人镇压向军用仓库跑来的200余名中国民众，打伤30余名①。此外，第一特别警备队第二大队，还准备炸毁长春的所有重要建筑设施，因苏军进攻迅速，而未能炸成。②。

烧毁档案文件，销毁罪证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召集了最后一次次长会议，决定要

---

① 张辅麟：《伪满末日》，第112—113页。
② 傅大中：《关东宪兵队》，第282页。

销毁伪满的全部机密文件档案。随后，8 月 16 日与 17 日两天，伪满行政机构各部门便刮起了一股烧毁档案文件，销毁日本侵略者罪证的妖风。其中以伪总务厅大保险金库中存放的极密文件和机密档案为最多。经过一番挑选，特别重要的诸如关东军司令部对伪总务长官的命令书、“诺门坎事件”的文件、“关特演”的档案、关东军的极密通牒档案、人事关系极秘档案、机密情报档案、民族政策档案、非常时局政策档案、“满洲开发五年计划”、物资动员计划、劳务动员计划、资金计划等机密档案等，均由武部六藏亲自动手烧毁，其余的档案文件由山田秘书官烧毁。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也亲自烧毁了他保存的关于关东军、伪满以及日籍次长会议议决的非公开的文件。由于连续两天在伪总务厅地下室暖气锅炉里烧毁各部门大量的档案文件，致使在盛夏季节，伪国务院办公室内温度剧增，各屋的暖气热得烫手。

在警宪特机构，以关东宪兵队的档案文件为最多。他们从 8 月 11 日就开始焚烧。一部分在宪兵司令部地下室的锅炉烧毁，另一部分拿到司令部后院焚烧。由于档案太多，直至苏军进驻长春时仍未烧完，只好在司令部后院挖一大深坑，把剩余档案文件埋在里面。伪军事部的一部分有关作战方面的文件已转移到临江，也于 8 月 17 日在临江烧毁。

同时，这股烧毁档案文件、销毁罪证的邪风也刮到东北各地，各省市县的行政、警务机构也在这几天内焚毁了各自保存的一些档案文件①。

2、日伪统治者的贪婪

日本统治者的最后榨取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其统治中国东

① 张辅麟：《伪满末日》，第 156—157 页。

北的 14 年中，通过各种手段，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各种资源，残酷地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他们究竟从东北掠夺了多少物资，榨取了多少血汗，是难以计算的。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在日伪政权垮台之际，仍在绞尽脑汁，企图最后再捞取一把。其中突出的事例有以下 3 个：

（一）榨取鸦片。据古海忠之交待，8 月 13 日，关东军第四课向伪总务厅企画局提出，要将在伪都现有的鸦片全部交给关东军运往通化。伪企画局副局长高仓请示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古海指令高仓和伪厚生部次长关屋悌藏联系，取出鸦片交给关东军。关东军得到鸦片后，于 8 月 15 日上午装上卡车由伪企画局参事官屋形负责送往通化。因为卡车前面和以往一样，插有日本太阳旗，结果未出长春城区，就遭到中国暴动群众的袭击，司机被打死，押车的士兵被打伤，屋形弃车逃命。8 月 19 日，关东军第四课代理课长原善四郎又打电话给古海忠之，说关东军司令部还有一些鸦片运不走，需要马上处理掉，请古海派一可靠人员和一辆汽车给予帮助。随后古海派秘书官岩田公六郎和司机高木乘小轿车前往，同原善及第四课勤务矢野和大轿车司机等 5 人，于 19 日夜把约 1 000 公斤鸦片秘密运至岩田住所，在一户无人住的房子地板下挖了一个大坑埋藏。另有 300 公斤的鸦片埋藏在另外地方。还余 80 公斤无处埋藏，由高木开车运至古海住所，藏匿在大榆树附近的地下防空洞内[①]。

（二）窃取白金和钻石。

白金，是日伪通过金属“献纳”运动，从东北人民手中榨取来的，大部分已分批运往日本，剩有 5 公斤左右，在垮台前未来得及运走，存放于伪中央银行。钻石是因工业生产需要从上海买来的，也存放于伪中央银行。8 月 16 日，关东军向伪中央银行董事生松净提出，要把白金和钻石提出。生松净请示古

① 张辅麟：《伪满末日》，第 158—160 页。

海忠之，古海让留下收据后提出。可是交给关东军后，关东军却没能运走，于是三天后又退回伪中央银行。古海知道此事后，想私吞这笔财富，于是让自己的老部下经济部金融司金属科长清岛与生松净商量，想法烧毁收据和帐簿，把白金和钻石取出。旋因苏军进驻长春，伪中央银行被苏军警戒起来，无法打开金库，而使古海等人窃吞白金和钻石的阴谋未能得逞[①]。

（三）捞取钱财。首先是关东军司令部下令，于8月13日禁止伪中央银行支付存款，同日便用汽车把伪中央银行的市民存款20亿元运走。接着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于8月15日给每个日伪官吏预支半年薪金，刮起了滥发钱财之风。随后更有一些日本人官吏则乘机捞取。如伪厚生会长岐部与平，于8月23日，以为厚生会员筹措薪金和退职金为由，指派理事横畑正彦到伪中央银行以“贷款”的形式，窃取了300万元资金[②]。

伪满官吏乘机中饱私囊 根据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决定，8月15日下午，伪满官吏已提前领取了半年工资。但这仅是一般情况，其中“大臣”、“省长、市长”等高级伪官吏则捞取的钱财更多。如伪宫内府大臣吉兴交待，他因要随同伪皇帝溥仪迁往通化，伪国务院发给他3万元钱。几天后，他从通化回来，伪军事部又发给他现款2 000元和一张10万元的支票。再如于静远交待，在他去临江前，伪总务厅曾发给他12万元的安家费。已经下台的伪首都警察厅总监齐知政，已跑到双阳躲避，听说发钱，又急忙赶回长春来领取。其中仅退职金就得了5．5万元。8月9日新上任的伪新京特别市长于镜涛，更利用独掌市政财务大权之便，将其掌管的2 000万元行政经费，拿出一部分按不同数目发给“市政公署”新任的处长科长等伪官吏及其它人员，而他自己则独吞400余万元，以个人名头存入玉名魁商号内。并让秘书徐克诚带上20万元现款，专程去哈尔滨，

---

①②张辅麟：《伪满末日》第159、162页。

把钱送给他的父亲[1]。此外还给伪警卫队团长樵铭远100万元，给伪宪兵总团司令刘尚华5万元。至于东北其他地方的一些伪军政官吏，也以预发薪金、领取军饷、安抚军心、维持治安、筹备冬季燃料等种种名义进行捞取钱财，中饱私囊。

3、日本侵略者垮台前的几场闹剧

"在乡军人"在"儿玉公园"的鼓噪 自1945年8月9日苏军开始对日作战以来，仅几天时间，关东军就出现了明显的败势。但是一些好战的法西斯分子，却抱着"大和魂精神"不放，千方百计地筹划进行最后挣扎。为此，于8月12日，在关东军兵事部的指导下，日本在长春的"在乡军人联合会"，在"儿玉公园"(今胜利公园)召开了6 000余人的动员大会，企图煽动与欺骗在长春的日本"在乡军人"，继续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与苏军对抗到底。动员会上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喧闹场面：有的磨拳擦掌，有的扼腕刺血，有的大哭狂叫，都表示要重振"大和魂精神"，誓与苏军死战到底。但鼓噪了两个小时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安排。于是这场闹剧也就随之收场。

"新京"火车站的逃亡景象 与"在乡军人"在"儿玉公园"鼓噪的同时，在伪新京火车站却发生了情形不同的混乱、吵闹的状况。从8月10日始，关东军就决定开设专列火车，运送撤退的日本人。运送的顺序是，先为军人和军人家属，接着是伪满机构中的日本人官吏和特殊会社的人员及其家属。日本在长春的一般职员、市民，看到了这种情况，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车站。他们有的拿着手提箱，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抱着孩子，争抢着挤向站台，一心想搭上火车，撤离东北。在站

① 张辅麟：《伪满末日》，第162—165页。

台上负责指挥输送的日本宪兵头目，高举着日本军刀，阻止一般日本人上车，只让军人和家属上车。军官及家属坐的是有棚货车，军士坐的是无棚货车。日本的平民百姓对关东军把他们扔下不管愤怒极了，他们叫骂着蜂拥而上，使列车无法开动。站内日本宪兵则拳打脚踢日本民众，阻止他们上车，有的宪兵甚至用军刀砍伤了上车的日本民众。

8 月 11 日晚上，是伪皇帝和“宫廷”职员乘车逃离长春车站迁往通化的日子。天下着雨，车站照样非常拥挤、混乱。站台上的人群中，有大量的日本妇女与儿童，她们用怨恨而又羡慕的目光，盯着上车的伪皇帝及其亲属和“宫廷”职员。据溥杰夫人爱新觉罗·浩回忆：这些日本妇女“无休止的等待着、拥挤在站台上，其中有些人用尽全力紧紧的抓住车门不肯放开”。并大声哀告着：“哪怕只让孩子们上去也行啊！站在厕所里也没关系。”“已经等了两天了，就让我们上去吧！行行好，拜托了……。”可是，宪兵们却怒气冲冲地说：“不行！这列车不准上！快走开！”同时则把那些死也不肯放手的妇女和孩子们推了下去。爱新觉罗·浩说：“深夜十二点，伴随着汽笛的尖叫声，列车离开了惨叫声连成一片的新京车站，半疯狂了的妇女们仍旧抓住车门不放手。”她认为当时的“新京”车站“简直象人间地狱”①。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多日，车站上人山人海，行李包裹堆了满地，天下雨了，一些人任凭雨淋，也不肯离开一步，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面对车站这一片逃亡景象，关东军第四课代理课长原善四郎却解释说，因为情况紧急，关东军家属容易组织，所以首先让军人家属走了。其实这种只让军人及家属先走，抛下平民百姓不管的作法，恰恰是日本法西斯毫不考虑民众死活的真实写照，是根本无法向民众交待的。后来，

① 爱新觉罗·浩：《流浪的王妃》，第 112 页。

关东军也不得不临时调些无棚货车来运输日本的一般职员和居民。

最后一次日本人官吏会议的喧闹 8月14日下午5时，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召集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各部次长、各特殊会社、准特殊会社负责人在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办公室开会。参加人员均为日本人，只有伪总务厅次长王贤沣一个中国人。

会议开始后先由武部六藏讲话，他以十分沉痛的语调先讲了德、意已垮台，日本处境险恶的形势和天皇关于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决定，通知大家明天要收听天皇裕仁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广播。接着又讲了当前的任务，就是等待接收，要求大家要整理（即烧毁）档案文件，并决定从明天起停止办公，除有关人员外，其余的来不来上班任其自便，同时决定明天给每个日伪官吏预发半年薪俸。

听了武部的讲话后，在场的一些日本官吏即刻作了发疯的表演：有的大哭，有的谩骂，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则表示要豁出一切，决战一场，绝不投降。谩骂的内容主要是“关东军无能”，“丢了大和民族的脸”，“应该揍这群混蛋”等，正当大家吵骂得起劲之时，一直没讲话的“满映”负责人甘粕正彦突然一拍桌子大声喊叫起来。他斥责那些乱哭乱叫的日本官吏说：“你们是日本人吗？这时候最需要的是镇静，光靠哭骂能解决什么问题吗？现在应当冷静地想一想，日本人今后会怎么样，我们自身会怎么样？”甘粕的一席话使喧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武部则抓住这个时机宣布散会。之后，又有人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可不可以晚发表几天”等问题，武部无可奈何说：“这是天皇陛下的决定，我们不能也没有办法晚发表。我也是从关东军那里知道的。关东军本来拟定了作战计划，共设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满苏国境线，第二道是哈尔滨防卫线，第三道是通化一带防卫线，现在都没有用了。”于是，在伪满垮台前

夕召开的最后一次日本人官吏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各伪部厅局职员照常上班，中午听了日本天皇广播之后，就领了半年薪水。随后除武部指定留下的人外，其余的职员都散了①。之后武部又召集十数名核心骨干人员开会，明确决定了烧毁档案文件等事。

关东军总司令部投降前的争吵 自 8 月 15 日中午收听了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广播之后，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就一直考虑着是战是降的问题。一方面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发来电报，要求关东军必须在 8 月 20 日中午以前放下武器，接受苏军受降，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大本营又未下达停战的命令。他经过与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商议，决定通过 8 月 16 日夜间会议，统一总司令部的认识，做出停战的决断。

当天半夜，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三楼中央作战室召开了最后一次关东军的参谋幕僚会议。会议由作战参谋草地卓吾主持，出席会议者共 18 人。在草地讲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决定关东军今后的命运"、"确立全军今后的方针"的重大会议的开场白，要求与会者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之后，会场上立即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情绪激昂的发言。大家提出的方案共三个：一是坚决战斗到底；二是继续作战，伺有利时机停战；三是立即停战。主张第一方案的占多数，主张第二方案的较少，主张第三方案的更少。特别是主张第一方案的，以主战派自居，在会上做了丧失理智的表演，有的吼道：投降，只有敌人懂得它，我只知道另两个字，战斗！有的狂叫：谁言投降，我就杀掉谁。还有几人同时说：我们惟愿效忠天皇，战死疆场，绝不言投降！说着说着，有的参谋还紧握军刀的刀柄，有的竟将手枪握在手中。同时，总司令部也接到了下面各方面军和各军发来的警告电报，如有的电文说：全军要以玉碎来充当皇国的柱石，希望总司令部

---

① 王贤沸：《崩溃前夕的日伪军政要员》，《伪满覆亡》，第 73—75 页。

对此精诚合作！这时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开始讲话，他说：作为军人，除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外，再没有别的忠节之道，不服从命令，将永远被看作是乱臣贼子。主张至死抵抗的人，请先把我们的脑袋砍下，然后再去。这时整个屋内变得鸦雀无声，有的人开始呜咽了。随后山田乙三总司令官站起来，在屋内踱了几趟，然后用平静的语调讲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很理解大家的心情，认为在战争中途自行放下武器是天皇军队的最大耻辱，苟延余生，寝食难安。但是他强调圣裁必须尊从，即使内心充满血泪、冤恨，也应遵从天皇陛下的命令，绝不可感情用事。最后他说："现在我们只能为结束战争而竭尽全力，进也好，退也好，只有一条奉公之路，照总参谋长的意见办，服从圣断！"这时那些狂热主战的人也都低下了头，一言不发了[①]。会议至此结束，结束时已至 17 日拂晓。

会议刚刚结束，就接到日本大本营发来的停战命令。这样，这场投降前的争吵闹剧便彻底完结了。8 月 22 日上午，在长春的关东军东城演习场上，按照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率领 97 名将领，1 500 余名校佐，正式向苏军投降。其中，在投降前两天，即 8 月 20 日，关东军曾举行一次烧毁军旗仪式，当时曾有对天皇愚忠的 20 余名日本关东军将官拔枪自杀。

4、伪皇帝的下场

伪皇帝逃往临江　在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即 8 月 10 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就决定伪满政府迁往通化临江。当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奉关东军之命，召集伪满政府各部

---

① 张辅麟：《日本战败前后的山田乙三》，《伪满人物》，第 39—43 页；〔日〕楠本舍三：《关东军全面崩溃》，《伪满覆亡》，第 251—256 页。

局头目开会，传达这一决定时，曾一度引起张景惠等汉奸们的普遍反对。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山田乙三以“战争需要”为由，断然拒绝了汉奸们的意见，汉奸们也只好默默地服从了。接着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去见溥仪，以“关东军早有准备，通化一带地下工事坚固，可保皇帝平安无事，如果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天皇陛下也来通化”等语来“劝”说溥仪迁往通化地区。溥仪表示接受，但提出因东西多来不及收拾，希望宽限两天，山田乙三则表示同意。山田等人走后，“御用挂”吉冈安直却威胁溥仪说：“如果皇帝不走，必定要遭到苏军的杀害。”溥仪害怕日本主子杀人灭口，为讨好关东军，当着吉冈的面，派人把张景惠与武部六藏找来，吩咐他们要竭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抗拒苏军到底。

在准备迁往通化之前，伪宫内府乱作一团。溥仪更是心神不宁，坐卧不安，他既怕日本人杀人灭口，又怕日本人把他扔下不管。为此，他让侄儿和随侍将他在天津写的日记和伪满时访日及“巡狩”所拍的电影胶片全部烧掉。不料在缉熙楼地下室锅炉烧毁胶片时，由于随侍的不小心，竟引起了一起不小的火灾，吓得溥仪光着脚从楼上跑下找人救火，幸好随侍们及时赶到用灭火器乱撒一气，总算把火扑灭了。

11日下午和晚上，溥仪及“皇后”、“贵人”、弟弟、妹妹、妹夫、侄儿、随侍、佣人等都相继离开伪皇宫，来到火车站。同时与溥仪一起分乘几辆汽车到火车站的还有捧着装有“天照大神”“神器”包袱的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等。在“天照大神”“神器”面前，溥仪只能乘坐第二辆汽车，第一辆汽车只能让捧着“神器”的桥本乘坐。随着“天照大神”“神器”的迁走，日本人随后放火烧了在宫内府东南角的“建国神庙”。溥仪乘汽车离开伪皇帝去火车站时，看到了“建国神庙”被烧着的火焰。

12日凌晨，火车开动，伪皇帝及“宫廷”人员经过吉林、梅河口、通化等地，于13日到达了临江大栗子。随后住进由日本

人开办的大栗子铁矿公司的办公室和住宅临时改成的伪皇帝“行宫”里[1]。随同伪皇帝逃往临江的还有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和熙洽、吉兴、张文铸、邢士廉、阮振铎、于静远、卢元善、阎传绂等伪大臣，以及伪禁卫队一个连。

伪皇帝的“退位”与被俘 8月13日，溥仪等人来到大栗子后，住在群山环绕，幽静秀美的地方，但是，溥仪等人无心观赏山景，特别是伪皇帝溥仪，几乎是整天进行打卦问卜，念经拜佛等事，祈祷神佛保佑平安。8月15日，吉冈安直代表关东军正式通知溥仪“日本天皇宣布停战”之后，溥仪由于害怕日本人杀人灭口，便立即跪下向日本皇宫方向磕头，并自打嘴巴十余下，来个“批颊请罪”表演，以示对日本主子的“忠心”。在场的吉冈安直也随之跪下，给日本天皇磕了一顿头。8月16日，由于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伪禁卫团反正，遂将溥仪由长春带到临江大栗子的一连伪禁卫军缴械，改用日本军宪来负责对伪皇帝的警卫。这更使溥仪心神动荡，他似乎感到死亡命运随时都有可能降临，于是查看地图，以寻找逃避的路线。

8月17日，由日本人作导演，在大栗子铁矿公司办公室又演出了一场伪皇帝“退位”的闹剧。事先，由日本人高仓用日文起草了《退位诏书》，然后译成中文。在经过桥本虎之助审阅时，用笔把前面那句“仰承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的套语勾掉了。17日午夜，在楼下一所房子里，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主持召集“随行大臣”们开了一个伪国务院临时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伪满的“随行大臣”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吉兴、张文铸、邢士廉、阮振铎、于静远、卢元善、阎传绂等人外，还有伪总务长官武部、伪参义鹿儿岛、伪宫内府次长荒井、“御用挂”吉冈、关东军第四课参谋山田、伪总理秘书

[1] 张辅麟：《伪满末日》，第135—137页；爱新觉罗·毓嶦：《最后一刻的伪皇帝》，《八一五这一天》，第227—230页。

官松本等人。会议先由武部讲了当时的形势和日本天皇的停战决定，接着张景惠讲话。他哽咽着说：“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的终结。”大家没有异议，张景惠便与臧式毅、熙洽一起捧着《退位诏书》去见伪皇帝溥仪，溥仪立即批准了《退位诏书》，同时又由伪尚书府大臣吉兴捧上“玉玺”加盖完毕。随后，在二楼一个很快布置好的小屋子里，伪国务总理大臣等“随行大臣”，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伪“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等都站在屋内，接着溥仪身穿伪满上将军服，带着大勋位兰花颈饰章的勋章，足登皮靴从邻室走出，站到一张旧桌子前，开始宣读《退位诏书》。两分钟后，“诏书”念完，溥仪又面带泪痕向各伪大臣们说：“本人基于日满一德一心的大义，现在退位，希望各位今后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有幸长生在世，想或许能有再见面的机会吧！”说完，便离开桌子走到伪大臣们面前，从张景惠开始，同各“大臣”们一一握手告别。

“退位”之后，溥仪照关东军的安排，准备逃亡日本。武部还告诉他，关东军已为他在日本准备了3亿日元的安置费。这时，溥仪又让随侍人员继续烧毁他带到大栗子的一木箱电影胶片和伪满初期写的日记，同时连从长春捧来的“祖宗牌位”也烧掉了。8月19日，溥仪抛下了“皇后”、“福贵人”和几个妹妹等人，带着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及随侍等人，在桥本虎之助、吉冈安直的陪护下，乘上飞机准备逃往日本。当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准备改乘大飞机时，被苏联红军逮捕。据说这是关东军同苏军事先安排好的。之后，溥仪便被送往苏联远东，被关押在赤塔、伯力和红河子等拘留所内[1]。

---

① 〔日〕田中鹤一：《满洲国皇帝的最后一天》，《八一五这一天》，第246—251页；张辅麟：《伪满末日》，第145—150页。

八、苏军空降，长春光复

1、苏军进驻长春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自8月9日起苏联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

8月9日零点10分，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及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从西、东、北3个方向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月17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通过沙漠区，翻越大兴安岭，兵分三路，以雷霆万钧之势，战张北、多伦、赤峰，克开鲁、通辽，进抵扎兰屯、博克图等城镇 。南路，第十七集团军经赤峰向辽东半岛进发；中路，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经鲁北向沈阳挺进；北路，第三十九集团军经洮安、开通直逼长春 。

苏军为迅速攻占东北腹地的战略要地，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命令："鉴于日军的反抗已被摧毁，而道路不通的情况却严重阻碍我军主力迅速前进完成既定任务，为了立即占领长春、奉天（今沈阳）、吉林和哈尔滨这几个城市，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武装精良的快速支队 。还必须用这些支队或与此类似的支队来解决各项后续任务，不要怕它们离自己的主

力太远。"[1] 8月17日，根据远东苏军总指挥部的命令，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阿尔捷缅科上校为全权代表，率空降兵飞往长春会见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命其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月19日8时，C—47型飞机载着军使团由通辽起飞，在9架歼击机的护航下，直飞长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同时电告山田乙三，电文如下：

"今日，8月19日8时整，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的全权代表阿尔捷缅科上校率领由五名军官和六名列兵组成的军使团，乘C—47型飞机，在九架歼击机的护航下，前往关东军司令部递交敦促无条件投降和停止抵抗的最后通牒。我最后一次要求保障并担保这次飞行的安全。对国际法如有违反，您个人要承担全部责任。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P·R·马利诺夫斯基（签名）"[2]

8月19日12时，伪满洲国首都上空阴云密布，细雨蒙蒙，在不宜飞行的恶劣气候条件下，3架苏军歼击机在其它战机空中的掩护下，如雷鸣闪电，突然从天而降，降落在日本军用机场的中央。一排排往日骄横一时的日军战机，霎时成为苏军的战利品，日军飞行员士气沮丧。运载着军使团的运输机随即安全着陆，阿尔捷缅科上校在苏军军官和关东军代表的陪同下，乘自备汽车路经日军设防的工事和关卡，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会晤山田乙三。

在关东军司令部，苏军全权代表递交了最后通牒：日军"立即在全线停火和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所有部队迅速撤出首

---

① ［苏］华西列夫斯基：《越过"满洲"边境之后》。《八·一五这一天》，第44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② ［苏］M·B·扎哈罗夫：《结局》第269—27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第1版。

都及其附近地区，到我指定的地点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①"无条件投降"如五雷轰顶，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竟然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妄图把无条件投降说成是："停战谈判"。山田乙三的梦幻，为伪满"首都"上空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声所打断。他所看到的是一大群苏军重型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护航下在头顶盘旋，运输机载着500多名空降兵一架接一架地在机场着陆，自动枪手们迅速占据了发电站、银行、广播电台和其它重要目标。苏军全权代表阿尔捷缅科坦率地山田乙三："这些飞机是我叫来的，是来帮助我顺利地进行谈判的"，"我作为这些部队的军事首长可以向您保证，不管您要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对我的态度如何，假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我不能向我军指挥部报告肯定的结果，被你们变成军事堡垒的长春市及其城郊必将遭到积极的破坏性的空中轰炸……。"②面对现实，山田乙三变得规矩了。山田乙三按照苏军的要求，通过广播发布了立即停火，向红军投降的命令，并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按照苏军的意旨，通过电台向东北人民宣布：日军已经投降，并已放下武器，战争已经停止，红军进入我国境内是为了从日本占领者统治下解放人民。并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长春市内1．5万名守军由苏军押往指定地点。1945年8月19日，是长春经历伪满14年黑暗统治获得解放的一天，是饱经苦难的长春人民获得新生的一天。苏联红军的功绩将永载史册。8月20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机械化部队开进长春。长春人民欢迎苏军，挤满了苏军通往市区的大街小巷，他们用掌声和欢呼声欢迎苏军的到来。

8月24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飞抵长春。31日，后贝加尔方面军

---

①②　［苏］M·B·扎哈罗夫：《结局》第271—2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1版。

司令部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迁至长春，"设于日满军人会馆"（今新发路36号，吉林省公安厅址）。9月3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到达长春。

在苏联红军挺进东北的前后，东北抗联武装力量配合苏军，在对日决战解放东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对日宣战前夕，抗联教导旅"首先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第一批先遣支队到苏军中去，进行统一军事训练。8月8日宣战时，有160人被派到苏联第一方面军，有80人派到第二方面军，有100人派到后贝加尔方面军作为先头部队执行特殊的战斗任务。"[①]他们同苏联红军并肩战斗，浴血奋战，为解放全东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8月11日，抗联教导旅最后一批400余名指战员即将奔赴前线的时刻，突然接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电报："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②]于是抗联教导旅改变了进占佳木斯的作战计划，拟定了进占东北57座城镇的行动方案。为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周保中更名为黄绍元，张寿篯更名为李兆麟，崔石泉更名为崔庸健，王一知改为佟涤新，于保合改为万内等。[③]从1945年8月中下旬至9月初，抗联指战员迅速完成了对东北三省57座城镇的进驻，并建立了地方人民政权。他们以驻地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的公开身份，负责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

1945年9月8日15时，周保中率部百余人飞抵长春。[④]周

①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② ③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475—4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④ 《周保中同志在东北抗日游击斗争中日记片断》（1936—1945）。

保中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①] 兼任苏联红军长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9月9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允诺周保中扩军急需武器的要求。于是,周保中向东北十几个大小城市的卫戍副司令下达了"抢运武器,扩充军队"的指令。并要求立即查封所辖城镇和地区的反动报刊,解散反动组织,消灭土匪,维持社会治安。[②] 周保中率部到达长春后,一方面协同苏联红军接管日伪政权,收缴敌伪武装和物资;一方面以抗联干部和中共长春地下党干部申东黎、傅根深等为骨干,在长春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武装,建立地方人民政权。同时,对那些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为掩护的汉奸、警察、特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仅解散了警备队,逮捕了大批"地下军"的特务,还查封了地方反动报刊,为迎接八路军进入吉林,进入长春,奠定了立脚的根基。9月10日,进入沈阳担任苏军卫戍副司令的抗联将领冯仲云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 000人进驻沈阳。"[③] 于是,周保中命令进驻长春广播电台的王一知和乔邦信立即播发八路军出关已占领沈阳的消息,号召人民紧跟共产党,踊跃参军,肃清敌伪残余,为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同时,请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供飞机派代表飞赴延安。华西列夫斯基高兴地说:"咱们想到一起去了。沈阳进驻了八路军曾克林部队,出现了一些情况,应与延安联系解决。"[④] 9月14日上午,曾克林在原抗联教导旅第一营大尉军官,周保中的部下卫斯别夫陪同下,带着周保中给中共中央的亲笔信飞抵延安。刘少奇及

---

① 1945年9月初,以抗联为主在长春组建了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兼政委,到10月中旬已发展到4.8万人。尔后,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②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4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③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④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4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并立即派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段子俊、莫春和等随机飞赴沈阳。

1945年9月20日至23日，周保中等在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汇报了东北抗日联军14年的斗争及进驻东北57座城镇的情况和当前各项紧迫的工作，同时移交了中共东北党委会的全部工作及档案材料。从此，东北党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陈云阐述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在东北要自力更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同时指出：要利用你们穿苏军军装的有利条件，控制铁路交通沿线，迎接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抓紧对已经控制的城市“三建”工作。[①] 周保中返回长春以后，立即向57座城镇的卫戍副司令传达了中共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在长春，抗联干部、长春地下党干部与东北局派来的干部密切配合，积极从事着建军、建党和建政的各项工作。

2、实行军事管制

苏军进驻长春后，于8月20日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现斯大林大街76号，吉林省军区军人俱乐部址）成立了长春城防卫戍司令部。苏军加尔洛夫少将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将领黄绍元中校（即周保中）任副司令，同日，用中、日、苏三国语发布文告，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

（1）从即日起，由苏军卫戍司令官负责长春市的治安。

（2）以苏军的名义，保障驻长春市的各国人的生命财产。

---

①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 官厅、会社照常继续执行公务。庶民勤于生业。商店立即开业。

(4) 要绝对服从苏军的命令，违者严惩。

(5) 下午八时以后，禁止一般市民外出。[1]

苏军卫戍司令加尔洛夫遂召见原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兼"新京特别市"市长于镜涛，命其继续担任市长，并协助苏军维持市内秩序，保证供电、供水、民用和军需物资的正常供应。于镜涛任用的市府官员，仍照常留用。赵万斌为公安局长，崔正儒为财务处长，曹肇元为总务处长并总管市府一切事务。卫戍司令部派红军代表，抗联干部齐连升中尉等到市府监督工作。同时，派红军代表接管了公安局、电话局、邮电局、放送局（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1945年9月27日，经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周保中推荐，苏军委派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张庆和接替赵万斌，任公安局局长。10月初，在中共长春市委安排下，经苏军同意，委任中共一二〇师锄奸部长李成功（即李俭珠）为公安局副局长。同时，苏军向8个分局派出了红军代表兼军事股长：一分局白萍、二分局王秉厚、三分局张华南、四分局李广学、五分局石斌、六分局王玉成、七分局宋焕然、八分局张恩。[2]

为迅即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群众，周保中率部到达长春后，通过苏军立即委派王一知和乔邦信接收了伪满新京放送局。放送局是伪满时期的要害部门，电台的技术工作和关键部位，均由日本人操纵和控制。当王一知和乔邦信身着苏军军官服装，带着苏军战士接收时，受到中国工作人员的欢迎，而日本人则态度冷漠。王一知向日本职员申明：只要好好工作，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我们决不会伤害

---

① 〔日〕《满蒙终战史》，第156—157页。

② 臧家声：《长春市人民公安史长编》，第4—6页。1989年4月版。

你们，也决不会歧视你们。同时，严厉地告诫心怀叵测的人，如果胆敢搞破坏活动，将严惩不贷。[①] 当时，电台戒备森严，内外均由苏军站岗警卫，但仍发生过打黑枪的事件。

9月10日，当王一知得知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进驻沈阳的喜讯时，便立即撰写报道，火速播出，使红色的电波传遍了东北城乡，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后来，李运昌见到王一知时说："抗联同志们播出我们出关的消息后，每天投奔八路军的青少年成千上万。当时，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求翻身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②]

苏军在对市政机关和要害部门实行军管的同时，对长春站仓库、"中央银行"、关东军兵工厂、关东军汽车厂及其重要建筑物等进行接收，一些重要物资和设备被运往苏联。

在苏军进驻长春的前后，伪满大臣们追随其主子在溃败和逃亡的过程中，仍企图苟延残喘，以求一逞。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等待他们的是异国的铁窗生涯。

8月25日，苏军卫戍司令部通知所有伪满大臣到原关东军司令部开会。[③] 当张景惠等人到会后，苏军柯瓦廖夫大将和一名苏军中将对他们说："目前长春局势还不算稳定，你们呆在这里很不方便。我们认为你们还是到苏联去比较好。"[④] 苏联将军的简短讲话，使这些伪满大臣们不知所措，无言以对。这些伪满战犯分作两批被押送至苏联赤塔附近的一所疗养院，后转押到伯力的红河子监狱。

当时被苏军逮捕的伪满大臣有：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

---

① 玄金璞：《接管长春广播的第一个回合》。《长春史志》1987年第5期。

②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4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③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总论）第819页。拘捕时间为8月31日。

④ 一辰：《有关"八一五"前后一些史料的辩证》。《长春史志》1989年第5期。

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厚生部大臣金名世，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驻南京伪大使吕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法部大臣　传arbitr。[1] 侥幸没有入网的有：原任伪经济部大臣韩云阶，原任伪民生部大臣孙其昌，伪驻日本大使谢介石，伪中央银行副总裁蔡运升等。伪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当在拘捕之列，但苏军误将溥仪的岳丈荣源抓去，荣厚才得以逃脱。被拘捕的日本军政官员有山田乙三、秦彦三郎、吉冈安直、桥本虎之助等。[2]

日伪要员被苏军拘捕以后，以张景惠为首的“东北地方维持会”亦被苏军取缔。伪市长于镜涛被押往苏联以后，由伪市府总务处长曹肇元接任市长职务。

苏军进驻长春以后，为纪念在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于1945年秋在“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中心，修建了苏军烈士纪念塔。

3、动荡的长春政局

苏军进驻军管长春以后，即将宽阔笔直的“大同大街”改称为“斯大林大街。”在“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四周的高大建筑物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每当夜幕降临之际，广场四周灯火通明，红旗招展，景色壮丽，是饱经14年黑暗统治的长春人民，从未见过的和平景象。

然而这种和平只是表面的，在阴暗的角落，反动势力反苏、

---

① 溥杰、万嘉熙、毓嶦：《溥仪在伯力收容所》，第4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② 吉皓：《伪满大臣们的结局》。《八一五这一天》，第25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据《长春市人民公安史长编》记载：以罗大愚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以王宏文为首的长春市党务专员办事处、以石坚为首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系统，分别在东三马路新新旅社和永春路振兴合仓库公开挂出了招牌；伪禁卫步兵团樵名远部于8月16日宣告独立，组织驻防军，自称司令，擅发布告，自立山头；伪宪兵团金济春部以维持治安为名独立行动；伪军高射炮部割据二道河子，招兵买马，独树一帜。还有地下国民党员陈新民自称陆军上将，受蒋介石委任来东北搞“地下建军”，挂起了“东北党政军联络部”的招牌；国民党旧军官何柱国、郭长升等组建了“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整编司令部”；旧军阀马占山部下张益三等建立了“东北挺进军”。以护国般若寺和尚为掩护身份的军统要员谭文治和自称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特派员的伪军校区队长佟泉有，伙同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石坚，大造舆论，收买人心，进行扩军活动；军统分子李树德乘机蛊惑伪满军校学生去九台县“接管”地方政权；朝鲜人组织了“大韩民团”、“光复军”等等。一时间把长春的局势搞得动荡不安。

长春是伪满的“新京”，也是日本军政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关东军溃败时，一些东北北部各大城镇的日本人多流入滞留于长春。苏军进驻长春，日本军政要员山田乙三等被苏军逮捕以后，少数日本军人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四处活动，或组织秘密团体，或与国民党地工人员相勾结，妄图东山再起。

据伪牡丹江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市原利行供述：他从牡丹江逃到长春以后，即与国民党地工人员，原伪满洲国军官学校上尉教官孙镜洁相勾结，并取得孙的信任。市原利行与原伪新京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平田密谋后，以救济日本难民为名，于1945年9月15日，在长春市梅枝町四丁目十四番地成立了“协力会”，意在要求滞留的日本人协助国民党“接收”长春。后经前绿园学院副院长永富直明提议，在“协力会”的基础上又成

立一个所谓“鸡鸣会”。“鸡鸣会”由永富直明负责，菊谷鹰司为参谋，市原利行负责与国民党联系。“鸡鸣会”的宗旨，是通过“协力会”利用国民党的力量，为重建日本帝国而“鸡鸣”。永富直明曾命令菊谷鹰司负责编拟谍报网设置计划及联络谍报要领。同时，以谍报班为主力，复活保安局。并以经商为掩护，在日本设立本部，在中国设立支部。利用同国民党之间的贸易筹集资金，以优厚的待遇网罗日本所有的科学技术专家，使之发明赢得战争胜利的秘密武器。为了欺骗群众，“鸡鸣会”拟创立一种迷信与现代科学合二而一的新宗教，以博取民众的“崇拜”，并注意把这种影响渗透到中国人和蒙古人中去。

刺探搜集驻长苏军情报，是国民党地工人员和日本法西斯分子一项重要的任务。“鸡鸣会”曾与日本法西斯团体“黑龙会”秘密派员潜入苏军设置于长春市兴业银行的一个调查室。并在长春至四平间铁路沿线，派谍报人员调查苏军武器兵员调动情况，用密码报告给孙镜洁。

市原利行根据孙镜洁的命令，曾派员调查未放下武器的日军在各地据守的情况，准备将在通化的一支日军残余部队和在四平、千山等地的溃散日军组成武装部队，协助国民党进行“接收”。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分子吉川等，则组织各地的“开拓团”成员编成“二二六总队”，预谋到沈阳发动叛乱。

“协力会”和“鸡鸣会”的首要分子永富直明和市原利行分别于 1946 年 1、2 月，被苏军逮捕，菊谷鹰司则病死在长春，他们的阴谋才没有最后得逞。日本军人中的少数反动分子与国民党地工人员相勾结所进行的罪恶活动，使已经动荡不安的长春政局更趋于复杂化。①

长春光复后，以张景惠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及各种牌号的国民党地工人员大造国民党“接收”的舆论，因而长春市民

---

① 长春市公安局日伪档案。

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还很不了解，正统观念较深，甚至有不正确的认识。一些伪官吏、伪警察，他们希望国民党能“接收”长春，这样“可以由地下一下子变成地上”，可以继续升官发财，鱼肉人民。长春有个“姓王的地主，他儿子是清华大学的，参加了革命，是八路军某部的后勤部长。这老头子听说儿子当了八路了，就说，“我得查查我祖宗三代，有没有杀牛的，怎么出了共产党？还说，他念书时，我也没缺他什么，他怎么跟穷党在一起了。”[①]这些人从思想上敌视共产党，欢迎国民党，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同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一些中产和自由职业者，有些人对中共根本不了解，他们轻信国民党的宣传，认为“八路没有一个好人，成不了大气候。”“二十多岁小孩，二尺半大棉袄，扛着大枪能打仗吗？”凡是当时街上出现抢的、偷的，都贴在八路军、共产党身上。[②]有些人对中共有初步的了解，但采取观望的态度。宋平是位医生，他的两个姐姐从延安回来，他相信姐姐没有走错路。共产党是看到了，但他还想看看国民党，还要看一看，等一等。[③]要进行一番比较，谁个优，谁个劣，然后再决定跟谁走。有这种思想的人，在这个阶层中，应该是多数。长春市广大劳动人民，有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比较了解。长春东荣区（八里堡），是个贫民区，大部分居民是从山东、河北革命根据地因日寇“扫荡”而跑到长春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村干部。他们拥护共产党，这里已变成长春市的小根据地。一些人则了解一点或不甚了解。

苏军进驻长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活动，尚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中共的影响还是微弱的。由于日伪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苏军违纪现象的屡屡发生，都影响了群众对中共的看法。因而反动势力利用这种环境和条件大肆活动，白天黑夜冷

---

① ②③ 徐慎同志在长春解放斗争史座谈会上发言摘要。《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第54页。1988年10月19日出版。

枪此起彼伏。表面上似乎平静的长春，实际上并不太平。

4、困厄的城市生活

"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垮台，伪满小朝廷的覆亡，使饱受日伪14年奴役，受尽欺凌和剥削的长春市民，有换了天地之感受，似乎在精神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自由"和"解放"的涵义。面对严酷的现实，人们惊奇的发现，日本人不行了，可伪满官吏和警察却摇身一变，成了无政府时期的主宰者。苏军进驻长春以后，尽管拘捕一些日伪要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伪满官吏和警察被任用，他们仍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人们由暂短的"自由"和"解放"的气氛中，又陷入了困厄、苦闷和惶恐之中。

日伪统治长春时，1943年共有大小企业440多个。[①]在中国人中，多数从事着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公务员等职业。日本宣布投降后，日本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纷纷逃离长春，致使商店关门，企业倒闭，店员工人失业，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难以为继。日商经营的"三中井"(今百货大楼旧楼)，是仅次于"宝山"(今长白山商场址)的大百货商店，到9、10月间仍然大门紧闭，使百余名店员失去生计。"帝国印刷厂"(今长春印刷厂)一些主要机器部件被苏军拆走，因而被迫停产，工人只好另寻生路。一些工厂虽然勉强维持生产，但仍保留着压迫工人，歧视工人的制度。如长春卷烟厂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女工、童工的待遇，男女之间同工不同酬，许多工人在经济上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有时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只能发几条烟作为报酬。工头仍象过去一样打骂工人，上下班实行搜身制度。光

① 朱胜利、李洪达、李彦玲：《解放战争时期长春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第137页。

复以后，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食品、印刷、服装、烟草、建筑等一类的轻工业和修理服务性工业，或因资本家逃亡，或因原料短缺，或因主要机器部件被拆走，而纷纷倒闭，工人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光复后的长春，市场仍然流通使用伪币。1945年9月，苏联红军进驻长春以后。曾令伪满中央银行增印无号码的伪币，发行额约97亿元。1945年12月11日，根据中苏两国协定，苏联红军发行军票，到1946年6月11日苏联政府照复，已发行9725百万元。[①] 大量伪币和红军票的流通，使长春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苏联红军利用手中的大把钞票肆意掠夺物资和日用消费品，使长春市民更难以维持生计。国民党"接收"长春以后，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于1945年12月22日，又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并规定与伪币、红军票等值行使。[②] 三种货币的同时流通，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乘机掠夺，把长春人民进一步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工厂倒闭，商业萧条，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日益恶性化的形势，长春市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交易方式，即破烂市场应运而生。这种破烂市场无人统一管理，就地摆摊，随处可见，较大的破烂市场有东盛、桂林、东大桥等处。出售的多为服装、鞋帽、字画、古钱、家具等旧物及日用品。其中日本军大衣、翻毛皮鞋、毛毯等成为畅销货。这些日本军需品，多为市民从日伪仓库中拣"洋捞"得来的。在破烂市场上，既有人们日常需用的物品，也有清宫秘室中的稀世珍宝。1945年8月11日，溥仪仓皇出逃通化时，仅从小白楼库房中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挑选了百余件书画精品及珠宝首饰、钻石翡翠等，逃上了东去的

---

①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王世杰给"东北行营"主任熊天翼的密电。辽宁档案馆JE1—3—497号卷02820—02824页。

② 李捷：《举世罕见的通货膨胀》。长春市档案馆20—1—809号档案。

列车，而剩下的珍本古籍及大量的国宝仍遗留在伪皇宫中。溥仪出逃以后，一些伪军发现了这个储藏国宝的库房，有识货的知道这是值钱的古代字画，于是一哄而抢。后来有些伪军衣食无着之际，把那些从伪皇宫掠来的字画，拿到破烂市场上廉价出售，以作为回归乡里的路费，或换取几张红军票以养家糊口。长春市破烂市场的出现，是市民在无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变卖家私，赖依糊口的一种谋生手段。这样的市场不仅长春有，东北各地城镇也都有这种交易，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困厄的城市生活，使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不安。一些人为了生存，为了糊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偷去抢。个别的苏联红军不付分文，见好吃的就拿，见值钱的就抢的事，也时有发生。在如此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往日以大米为主食的日本人，也只好调换口味，尝尝高粱米、小米和大煎饼的味道了。为了生计，一些日本人除了变卖糊口外，"大部分难民都和多少有点本钱的结合起来开露天小铺，在街头摆摊，或者出劳役，卖工夫等赖以糊口。"[①] 又据《满洲国史》记载：日本人"因为生活困苦，道德观念下降，盗窃行为猖獗。为了追求金钱的目的，充当中国官宪密探的，或告密战犯嫌疑分子的，挖日本人自己的墙脚自相残杀的，不一而足。""因而，促使整个社会笼罩在更加不安的气氛之中"。[②]

---

① ②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总论），第852页。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1990年9月。

九、国共对长春的争夺

1. 国民党政府设“东北行营”于长春

1945年8月9日，苏军主力发起全线进攻，关东军溃不成军。此时，国民党政府依据中苏签约，原打算苏军攻克一地，则派员“接收”一地。但未曾料到，配合苏军解放东北的抗联部队，已先机在57座城镇建立了人民政权，蒋介石“接收”计划随之落空。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远在大西南和缅甸一带，别说是“接收”东北，就是迅即调兵华北也难以实现。为了挽救上述被动不利的局面，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一方面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国家大计”，妄图在“和谈”的烟幕下，拖延时间，在美国的援助下把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和东北，准备武力“接收”。于此同时，蒋介石利用中苏签约的有利条件，在重庆开始筹划组建“接收”东北的班子。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曾以“东北复员委员会”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关于东北复员问题的几项原则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一）将东北三省改划为九省；（二）在东北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三）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并改编、整训伪满洲国军队，作为军事辅助；（四）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五）人事安排上，争取中间派合作，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在表面上要涂上一层亲苏、民主

的掩护色彩，特别要注意遏制中共势力的“扩张”。以上意见，均为蒋介石基本同意。①

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明令公布“东北行营”为东北最高军政机关。行营所设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分别主持政治和经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负责指挥军事，维持治安。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同时，任命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潘公弼为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9月初，国民党政府将原来的东北三省改划为九省和两个行政院直辖市，公布了《接收东北九省办法》。9月5日，经过各派系的激烈角逐以后，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九省二市主席、市长任命令：徐箴为辽宁省主席，刘翰东为辽北省主席，高惜冰为安东省主席，郑道儒为吉林省主席，关吉玉为松江省主席，吴瀚涛为合江省主席，韩俊杰为黑龙江省主席，彭济群为嫩江省主席，吴焕章为兴安省主席，杨绰庵为哈尔滨市长，沈怡为大连市长。

吉林省政府委员及厅长的人选，经郑道儒安排决定：吴至恭任委员兼秘书长，尚传道任委员兼民政厅长，王宁华任委员兼财政厅长，胡体乾任委员兼教育厅长，徐晴岚任委员兼建设厅长，张庆泗任委员兼吉林市长，侯景文任会计长、谷炳仑任警务处长。吉林省政府办事处驻重庆上清寺。

长春市位于东北腹地，又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苏军进驻东北以后，其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将“东北行营”亦设于此，以便以长春为中心，实施“接收”东北的计划。鉴于长春市在政治和军事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国民党政府曾拟将该市划为行政院辖市，但由于时任国民党政府文官

---

①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1985年1月。

长的吴鼎昌向蒋介石建议，遂将长春市改为吉林省辖市。这样，吴鼎昌就为郑道儒“争得一个重要地方”，其组织体制亦如行政院辖市。[1] 长春市长，经蒋经国直接向蒋介石保荐，由赵君迈充任。长春市政府的“接收”，皆由赵君迈安排，内定罗涤之任市府秘书长，叶绍南任社会局长，肖仁树任财政局长，张炯任警察局长。[2]

国民党政府将“接收”东北，“接收”吉林，“接收”长春的班底确定之后，这些“接收”大员受命于国民党政府，陆续飞赴东北，走马上任。

1945年10月7日，熊式辉派“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名义，郑道儒派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吉林市长张庆泗及其随从，由重庆飞经北平，于10月9日抵达长春。董彦平即与苏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商设“东北行营”于长春及其事宜。

10月10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在长春成立，营址设于伪满时期的满炭大楼（今吉林大学图书馆楼），并挂起了中华民国国旗。同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东北宣慰使”莫德惠等40余人由重庆起飞，于12日抵达长春，成为国民党“接收”东北，“接收”吉林，“接收”长春的急先锋。

2、中共建立民主政权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到长春安营扎寨，国共两党对长春对东北，开始了公开直接的角逐和争夺。苏军军管长春时期，周保中任苏军长春卫戍区副司令，苏军允许中共在城郊区、县乡建立人民政权和组建人民武装，这对中共都是

---

①②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1985年1月。

有利的。为了挫败国民党东北行营“接收”东北的阴谋，使长春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中共中央东北局经与莫斯科方面商定：苏联在长春的军管政府由中共选派一人当市长。[①] 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决定派刘居英任长春市长，[②] 陈云同志要求刘居英任职时，要利用政府来掩护中央的工作，要保证对苏军的供应。

刘居英到长春后，先后找到了周保中和市委书记石磊，并在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拜会了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11 月 15 日，在加尔洛夫办公室，刘居英会见了原市长曹肇元。下午 2 时，刘居英在苏军少将谢德明陪同下前往市政府，受到原政府人员的列队欢迎。在“原日本市长的办公室，曹肇元首先交出图章、人员名册、金库存款的条子，还有八百零几块钱的伪币。”[③]双方签署了《市政府交接事宜书类概要》和《市长工作费接交书》，刘居英市长正式接管了市政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春市第一个民主政权。

长春特别市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刘居英市长和张文海秘书长首先起草了施政纲领，经中共长春市委同意，在长春市政府成立之日，刘居英市长签发了《长春特别市政府布告政字第一号》，公布了七条施政纲领：

一、协助苏军实行军事管制，发展与巩固中苏友谊。

二、保障市民正当权益，建设民主政治，扶持民主团体。

三、致力市政建设，恢复公私工商业，取消配给制度，发展自由贸易以繁荣市面。

四、严惩罪大恶极市民共恨之汉奸，肃清捣乱分子，安定社会秩序。

---

① ③ 刘居英同志的发言。《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第 37 页。

② 刘居英，长春市人。1945 年 9 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1945 年 11 月，1946 年 4 月，两次担任长春市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

五、救济失业与被难市民，改善民生。

六、废除敌伪对市民之一切反动设施，取消苛捐杂税与各种劳役。

七、兴办社会国民教育，肃清奴化思想，树立民主观念。[①]

施政纲领的发布，使经受14年日伪法西斯黑暗统治的长春市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市民见日伪时期强迫东北人民出劳工，不让中国百姓吃大米白面的苛政都废除了，买卖也自由了，心情振奋，奔走相告。当时，在市民对共产党不太了解的情况下，长春特别市政府在"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由刘居英市长讲了上述七条施政纲领，宣传了中共的民主主张，反映了长春市各界人士和平民主的心声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愿。

长春特别市政府成立以后，首先任命了各区区长，同时加强了对公安总局的领导，保证了对市区的供水供电和对苏军的肉食供应。

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经吉林省工委决定，成立了长春市卫戍司令部。曹里怀任司令员，张庆和任副司令员，刘居英任政委。在卫戍司令部的领导下，组成公安总队，下辖六个大队，计2 300余人，是人民政权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在苏军的支持下，中共长春市委派余力行（于克）以市公安局的名义在拉拉屯伪满军校旧址成立了警察学校。余力行任校长，王波任副校长。学校成立后，对长春市和郊区的杂牌军、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后来，这支队伍编入了曹里怀吉黑支队。[②]长春特别市政府成立后，面对社会动荡，百业萧条，物价昂贵，市民生活困乏紧促的形势，为安定市民生活，发布了政

① 《长春新报》，中华民国34年11月23日。

② 臧家声：《长春市人民公安史长编》，第9页。

字第二号，现抄录如下：[1]

长春特别市布告政字第二号

为布告事，本府鉴于迩来物价高腾，兹为平抑物价，以利民生起见，特将伪满时代各官有仓库残有物资，集于本府所管消费公社内，开始出售。除指定本市大同区大马路老天合旧址为消费公社贩卖场外，特此布告周知。此布。

长春特别市市长 刘居英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此布告发出以后。长春市民拍手称快，《长春新报》代表民众之心声，称誉谓："盖亦新任市长之德政第一声也。"[2]

刘居英出任市长以后，中共长春市委机关报《长春新报》及时报道了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人民耳目一新，为之雀跃。刘居英市长在《长春新报》头版头条向全市人民坦诚表示："鄙人特别希望市民诸位能共同协力，不要再存有'官在上民在下'的思想。现在，所谓官并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公仆，替老百姓办事的人。应该多多的提出他们的要求和意见，鄙人无论如何，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以满足人民的期望。"[3]市长"是人民的公仆"，是"替老百姓办事的人"，这对长春市民来说，真是亘古所未见，亘古所未闻。人民市长的感人肺腑之言，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动摇了人们思想上盲目的正统观念，对共产党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长春光复后，由中共地下党组建或自发建立起来的群众团体，如东北工人联盟、新青年同盟、青年读书会、东北妇女同盟等，在中共长春市委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学习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为保卫胜利果实，壮大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当长春市人民欢庆解放，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东北的形势发生突变。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于11月16日占

---

①②③ 《长春新报》，中华民国34年11月23日第1版。

领山海关，继而连陷绥中、兴城、锦西，公然以武力"接收"东北。11月17日，蒋介石电令"东北行营"代主任张嘉璈：除留董彦平副参谋长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长春与苏军联系外，所有在长春"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待命。[1] 这是蒋介石与熊式辉等人在外交上对苏联采取的一次攻势，意在向世界宣示：苏军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从而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苏军为执行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决定把中长铁路上的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11月30日，苏军迫使中共撤出长春市。于是，长春特别市政府又移交曹肇元主持。

3、从行政到军事"接收"

国民党"接收"大员抵长后，眼见东北各战略要地及主要城镇已为中共先机占有，并已建立了人民政权，因而要求苏军协助国民政府进行"行政接收"。苏军总部则认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纯系东北人民自己建立的，与苏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和参与。[2] 后来，熊式辉提出派员到各地视察，苏军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市，而对其他人的"视察"则不负安全责任。为配合"接收"，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表齐世英在长春视察东北党务时，公开散布反苏反共言论，引起了苏军的强烈不满，因而苏军总部宣布不准国民党和三青团在长春公开活动。国民党在长春的"接收"屡屡碰壁，使这些"接收"大员们十分脑火，

---

①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29页。

② 尚传道：《从"接收"到被俘——记在长春吉林反动的三年》，《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用尚传道的话说，既"要对付苏联"，又"要对付共产党"，真是"障碍重重，不容乐观"。恰在这些"接收"大员一筹莫展之际，苏军总部又提出"东北各省内被日军利用的一切日本企业，均被苏联视为苏军战利品"的备忘录。熊式辉对此手足无措，不知如何答对。于是，熊式辉只好于10月21日离长赴渝，商讨对策。蒋介石决定：（一）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设备以及掩护中共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挠国民政府接收主权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至苏联政府，并要求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尊重中国在东北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二）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二市重要接收人员迅即飞往长春，作好行政接收的准备工作。（三）抽调中央精锐国军，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①] 从10月29日到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各路"接收"大员400余人麇集于长春伪满炭大楼，准备到各地进行"行政接收"。与此相配合，杜聿明于10月28日到长，会见了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商请苏军在营口掩护国民党军登陆问题。11月3日，当国民党军在美舰"脱罗尔号"的支援下预行在营口登陆时，受到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阻滞。至此，"国民党军幻想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已成泡影"。[②]

1945年11月初，国民党十三军在美军31艘军舰的护运下，在秦皇岛登陆。11月14日，国民党五十二军集中于海阳镇附近。国民党两个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公然以武力"接收"东北，并于16日攻占山海关。17日，蒋介石电令东北行营"接收"人员撤离长春，飞往北平待命，意在向苏联施加压力。12月初，"东北行营"代主任张嘉璈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再次由

---

①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1985年1月。

②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2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重庆飞抵长春。经与苏军总部协商，苏军同意协助国民党政府派联络员到各地“接收”。12月22日，赵君迈“接收”了长春市政府，前任市长曹肇元改任参议。

国民党政府为迅速实现其以武力“接收”长春的目的，于1946年1月5日，将国民党“东北行营”收编的“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部（即伪满军的铁石部队），由华北空运长春。

“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原系日本关东军于1932年组建的一支“靖安军”。1944年12月，调往冀东唐山，隶归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专门对付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是日本侵略军的帮凶。日本投降后，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所收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充当了蒋介石武力“接收”东北的走卒。“东北保安第二总队”空运长春后，立即与土匪、地痞流氓、逃亡地主、日寇残余武装相勾结，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他们藉修筑工事之名，强拉民夫，抢掠民财，派捐派款，民不聊生，使长春人民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1月6日。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接收”委员王宁华、吴至恭、尚传道、胡体乾等25人，由北平乘机二进长春，开始对吉林的“接收”。这些“接收”大员下机伊始，就与吉林各地来长的地主、官僚政客、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和“东北青年联盟”的骨干分子频繁接触，企图在苏军撤离之前，把交通干线上的重要城镇“接收”过来。

1月中旬，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任命张骏图为长春县长，乔树芳为九台县长，纪幕天为农安县长。乔树芳上任之后，原九台之地主乡绅，伪满官吏警宪纷至沓来，寻官觅爵。乔树芳应允在“接收”九台之后，一律官复官职。同时，将同乡密友孔庆春、董荣昌委以重任，分别就任县府秘书和教育科长。1月20日，乔树芳率“接收”人员，在苏军中校参谋陪同下，于中午抵达九台县城。当时，九台已建立人民政权，县人民政府负责人当即申明：自日本投降后，苏联解放了东北，伪满被消灭

了。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自己组成地方政权，现在重庆正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主张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你们如同意，就可以协商。否则，人民自己组成的政权，是绝对不能交出的。[1]乔树芳不敢擅专其事，只好带原班人马狼狈回长。此后，苏军根据中苏签约，要中共撤出九台，于是九台县人民政府迁至营城子办公。2月1日，国民党吉林省九台县政府正式组成，乔树芳任命孔庆春为主管财经的秘书，关文瑛为主管文书的秘书，郭雅儒为民政科长，左鸿儒为财政科长，侯佐祥为建设科长，董荣昌为教育科长，杨士德为警察局长。[2]与此同时，纪幕天"接收"了农安县城。乔树芳虽然当上了县令，但一想到中共撤离九台时留在县衙的布告，就胆战心惊，唯恐苏军撤走之后，国共两个地方政权必然交兵于县城，因而上任不久便逃之夭夭，后由张徐航接任其职。

根据苏军向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递交的《苏军从满洲撤退计划书》中规定，到1945年12月3日，苏军将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但由于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顽强抗击，致使国民政府"接收"屡屡受挫，因而国民党一再要求苏联延缓撤军。为表示中苏友好，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美龄由蒋经国陪同，于1946年1月22日，匆匆来长。宋美龄抵长后，一是利用"欢迎大会"的讲坛，"宣慰"东北人民；一是借盛大宴会之机，代表蒋介石向苏联将领授勋，藉以取得苏军的好感，请求苏联缓期撤军。这就是蒋介石精心导演的一幕夫人外交，以实现其在外交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目的。

1946年3月初，在苏军即将撤离东北的前夕，美国政府根据蒋介石关于"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秘密通报，派遣了以美国人鲍莱为首的联合国调查团到长春调

---

①② 乔树芳：《国民党"接收"九台的经过》，《吉林文史资料》第13辑，第45、46页。

查。据尚传道回忆："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请由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乾、合江省财政厅长祝步唐代表行营招待调查团。他们和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秘书张大同一起，关在屋子里编制了一份苏军运走东北工业设备器材统计材料交给调查团。据胡体乾告诉我，那份统计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资财共值约一百亿美元。"[1] 从宋美龄到鲍莱前后不足二个月的时间里，一个"慰问授勋"，一个前来调查，美蒋之间配合如此默契，真可谓软硬兼施，异曲同工。

1946 年 3 月 13 日，苏军由沈阳撤出，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于同日进占沈阳，并以沈阳为基地向四周扩张。从 3 月 18 日至 4 月 4 日，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沿中长铁路北犯，先后进占了铁岭、开原、昌图。第七十一军于 4 月 4 日，进占法库。当国民党军进犯四平时，为东北民主联军所阻击。[2]

4、人民军队首战长春

1946 年 3 月，苏联红军开始陆续撤退回国。国共两党为取得在东北的领导权，在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开始了对中长铁路大城市的争夺战。

为配合停战谈判，打击并迟滞国民党军向北满、东满解放区的猖狂进攻，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不惜牺牲打一、二个大胜仗，以利谈判和将来，要求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战略要地。为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3 月 25 日，东北局制定的《关于东北大会战的部署》中指

---

①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41 页。

② 1946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政委彭真，副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副政委罗荣桓、程子华，副司令兼参谋长肖劲光。1946 年 1 月到 9 月，东北民主联军先后组成五个纵队，即一、二、三、四、六纵队。

出：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于友方（指苏军）撤退时以敏捷迅速手段占领长、哈、齐各市，争取在一日之内全部干净消灭顽匪。[1] 从上述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中明确地指出了此举关系东北及中国革命前途甚大。在攻夺三大城市中，长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夺取长春，不仅可以从正面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而且可以关上国民党军北进东犯的大门，使整个战局出现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将攻夺长春的任务，交给了吉辽省委和吉辽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同时电令七师集结南下，准备参加攻夺长春的战斗。

面对苏军即将撤离长春，中共大军压境的形势，国民党"接收"大员们预感危难临头，便于3月25日纷纷乘飞机逃离长春，撤往锦州。"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留守长春，组成了防守司令员，任命"东北行营"少将高参陈家珍为城防司令，刘德溥为副司令，史维忠为参谋长。其防守力量主要有："东北保安"第二总队、第四总队、"吉林警察总队"、"长春警察纵队"、"吉林保安"第十四支队、"宪兵团"、土匪特务编成的"先遣军"、"挺进军"及日寇残余计两万余人。这些据守长春以伪满军为主体的杂牌部队，凭藉日伪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纵横交错的明碉暗堡，企图顽抗固守，等待国民党援军的到来。

针对国民党守城部队的布防情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3月28日指示攻城部队："根据长春伪匪内部情况，估计只要我部署得当，指挥正确，密切协同，虽用与敌相等之兵力亦能歼灭之。"[2] 4月8日，中共吉辽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林枫、周保中、陈光、张启龙及参战各部队负责人在卡伦镇召开了军事会议。4月11日，吉辽军区司令部制定了《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

---

①② 曾里怀、贺庆积、邓飞、徐斌洲：《首次攻克长春》，《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

东北民主联军投入攻夺长春的部队，除吉辽军区所属部队外，还有从北满奉命南下的七师及三师八旅一部，共两万余人。按战役部署，编为三个纵队：以杨国夫为司令员，刘其仁为政委，刘斌洲为副政委率领的西南纵队，由西南方向进攻；以曹里怀为司令员，谭甫仁为政委率领的东北纵队，从北和东北方面进攻；以贺庆积为司令员，邓飞为政委率领的东南纵队，从东南方向进攻。各路纵队攻击的最终目标，为市中心广场。

4月14日拂晓，中共攻夺长春的各路纵队兵临城下。上午，苏军将市政移交给国民党长春市政府。中午12时，苏军撤离长春。正当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守军庆幸长春得手之际，中共三路纵队于下午2时，从四面八方向长春外围发起了攻击。激烈的枪炮声和冲击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使国民党守军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西南纵队首先攻占孟家屯，同时进占洪熙街（今红旗街）南端。傍晚，经4小时激战。先后占领了民用和军用机场，切断了国民党空援长春的通道。国民党驻长空军司令金思心一听枪声，便乘机逃往锦州。东北和东南纵队，先后攻占了宽城子、拉拉屯和长春东站等地，扫清了外围之敌，迫使四郊之守军退守于市区。

4月15日凌晨5时，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区发起总攻。国民党守军空军司令部、"东北行营"、市政府、警察局等机关要员，先后撤到防守司令部（人民广场银行大楼）楼内。此时，市区炮声轰鸣，枪声四起，硝烟弥漫，攻城之东南纵队七十五团、七十一团进展迅速，陆续攻占了工业学校、农学院和理科院。当攻击大陆科学院（现长春应化所）时，受到守军的顽强抵抗。大陆科学院是守军南线的重要支撑点，火力较强，鹿砦重重，使攻击部队屡屡受阻。后调炮兵轰击，经反复冲杀肉搏，于傍晚时分方全歼守敌。与此同时，西南纵队和东北纵队，进展缓慢，在攻击火车站时受到阻击。16日，三路纵队先后攻占了长春火车站、伪国务院、南关浴池等要地，并向市中心进发。当东南

纵队副司令员吴恒夫在禁烟总局大楼(今长春税务学院南楼)引导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上楼观察敌情时，为窗外射进的子弹击中了头部而英勇牺牲。东南纵队的指战员怀着悲痛的心情，高喊着："为吴副司令员报仇!"冲向了红卍字总会大楼（今解放大路73号，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市分行)，全歼守敌100余人，扫清了通往市区的最后一道障碍。

17日到18日下午4时，三路纵队经过与守敌的反复争夺，相继占据了满炭大楼、关东军司令部、警察局、广播电台和护国般若寺，将守敌压缩到伪中央银行大楼里。正当守敌处于山穷水尽之际，国民党派飞机数架飞临长春上空，向"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投下弹药，使守敌精神为之一振。可打开箱子一看，"弹药与使用的武器口径不符，根本用不上，守城官兵无不感到气愤"。[1] 在守敌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弹药缺乏的情况下，防守司令陈家珍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18日晚6时向东南方向突围，直奔沈阳。

18日下午5时，攻城三路纵队发起最后攻击。当攻城部队以无数伤亡的代价越过广场，逼近大楼附近时，固守大楼的残敌4 000余众，突然从"银行"大楼冲出，向东南纵队方向猛扑过来，七十五团被压回到广场东南角的民康路口，情况万分紧急![2] 在此关键时刻，东南纵队司令员贺庆积、七十五团团长朴洛权振臂高呼，率部冲向敌群。在残酷的白刃格斗中，贺庆积与副司令员黄思沛先后负伤，朴洛权英勇牺牲。在东北、西南两路纵队的支援配合下，于晚7时占领了伪中央银行大楼，首战长春至此胜利结束。

在首战长春战役中，除刘德溥率少数守敌突出包围外，总共毙伤敌2 500余人，生俘第四总队兼长春卫戍司令中将指挥

---

① 郑显：《忆国民党新七军五十六师》，《吉林文史资料》第13辑。

② 贺庆积：《长春争夺战》，《长春日报》1986年4月11日第3版。

陈家祯以下官兵14 000余人（内有200余日本人）。国民党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长春市长赵君迈，长春警察局长张炯，社会局长叶绍南亦同时被俘。缴获轻机枪430余挺，各种炮50余门，长短枪11 150支，子弹110万发，飞机一架及其它军用物资甚多。人民军队伤亡1 500余人。[①]

这次攻夺长春，是东北民主联军首次取得攻坚战的一次重大胜利，为四平阻击战解除了后顾之忧，使长春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

5、重建人民政权

国民党军的覆灭，人民政权的新生，是长春人民也是东北人民的胜利。当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周保中率部进入长春时，“人民莫不欢腾若狂，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②] 中共长春市委和市政府亦随军进入市区，开始了重建人民政权的各项工作。当时，中共长春市委主要领导成员有：市委书记石磊，宣传部长陈东平、副部长徐慎，宣传部长赵东黎。[③] 各区区委书记是：东荣区黄霖，和顺区方明，长春区夏伯康，敷岛区于杰，宽城区赵东黎，大同区刘俊秀。[④] 长春市政府仍由刘居英任市长，市委各局要员多数是中共培养的干部，同时留用了部分伪职员。市公安总局长由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汪金祥担任，张化东任副局长。总局下设8个分局，70个派出所。

中共长春市委和市政府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布政策，稳定人心，恢复市政建设。4月18日晚和19日，刘居英市长先

---

① 曹里怀、贺庆积、邓飞、徐斌洲：《首次攻克长春》《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

② 《东北日报》，1946年4月28日第1版。

③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④ 玄金璞：《中共长春市委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长春党史资料》第4辑。

后两次到电台发表广播演说，重申1945年11月人民政府公布施政纲领继续生效，明确提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①]东北民主联军和市政府相继贴出《为建设和平民主的长春》和《长春市政府整顿市政》的布告。《东北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长春而奋斗》的社论。《社论》号召市民及各界人士“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帮助政府迅速完全恢复市政”；“惩治罪大恶极之汉奸，铲除敌伪势力”；“实行民主选举”，“改善人民生活”，保卫长春，建设长春。[②] 面对国民党守军对长春市政设施的严重破坏及战争所留下的创伤，人民政府于长春解放的第二天，即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解决电力、用水、粮食和燃料四大问题。至4月25日，经400百余人的抢修，市内供电已恢复一半。市政府水道科每日出动315人，经日夜修复水道，日供水量已达6万吨。长春解放时，东荣区已有2万余人断炊，人民政府及时将国民党“接收”大员囤积之3 000吨粮食发放给市民，同时平粜粮食150吨。为解决市内燃料之急需，已从九台紧急调运800吨，并已筹措煤炭5 000吨。市民对人民政府急人民之所需，无不拍手叫好。据《东北日报》报道：大家都这样说：“想不到民主联军，还有这样的能力，四五天内交通、电灯、用水恢复得这样快，煤炭、粮食解决得这样好。”[③] 到4月28日，铁路客货运输除通往四平外，其它各线均已通车。市内电车已正式营运，2 500辆马车及三轮车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商店开市，物价平稳。如大米“过去卖20多元一斤，现在只卖12元。豆油从30元跌到25元”，“高粱米也贱了，生活好过了。”[④]从4月18日到5月23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长春市各项事业均得到恢复和发展。此间，已复工的工厂

① 刘居英同志的发言。《长春党史资料》第3辑。

② ④ 《东北日报》，1946年4月28日第1版。

③ 《东北日报》，1946年5月1日第1版。

33个，准备复工的22个，人民政府已发放贷款2 000万元（苏联红军票）。市内自来水全部恢复，每日供水8万吨，电线全部修复，救济贫民1 000吨煤，3 000吨米，被救济人数达10万之众。小学34所，中学11所，在校学生33 000人，已全部复课。东北大学、军政大学、工人大学已相继创立和迁来长春。同时，还成立了20几所民众夜校。[1] 在报刊方面：《光明日报》、《长春新报》和《东北日报》均已出版发行。

肖谦之主编的《生活报》已问世，舒群主编的《知识》，王阑西和茌荪主编的《民主论坛》，张东川和公木主编的综合文艺刊物，陈学昭、严文开主编的纯文艺刊物亦在积极筹备中。陈学昭所著的《漫游解放区》一书，已在付印中。除新华书店正在筹备开办外，其他如宝山等各大书店，均已照常营业。[2] 据当时《东北日报》报道："此种欣欣向荣气象，使今后在本市文化教育艺术各方面，将在和平民主建设中起极其重大作用。"[3]

根据中共长春市委"尽快清除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地下组织，迅速恢复市内的正常秩序"的指示，长春市公安总局，立即紧急行动，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严密部署认真调查，在较短的时间内，搜捕到日伪战犯、汉奸和警察头目以及国民党特务200多人，简任（少将）以上的有60多名。其中有伪奉天省特务机关长三浦敏士、伪奉天省公署次长竹内德宪、伪中央银行总裁西山勉、伪经济部关东军顾问中村义雄、伪新京特别市市长徐绍乡、伪民生部大臣孙其昌、伪满驻日本大使谢介石、伪满首都宪兵团少将团长于惠乡、汉奸王树藩等。[4] 为维护社会治安，还关闭了烟馆，解散了妓院，查办捕捉各种不法分子近百人，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长春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

① 刘居英谈话记录。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2—46号卷。

② ③ 《东北日报》，1946年4月29日第1版。

④ 臧家声：《长春市人民公安史长编（1945年8月—1949年9月）》，第15页。

在清除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同时，在中共长春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翻身运动。全市共组织8个工作队，分赴8个行政区访贫问苦，帮助群众组织工会、贫农团、房产团和清算委员会等组织。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标语。4月30日，和顺区吉林分区居民，首先向“德增盛”和“聚兴泰”等9家“配给店”进行说理斗争，清算出盘剥居民钱款300余万元。随着翻身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区普遍开展了反房霸减房租分配敌伪土地等为中心的清算斗争。5月3日，东荣区八里堡分区居民，举行分配敌伪土地大会，每个人分得土地1—2亩。5月7日，敷岛区吉野分区居民，经过公议，将敌伪时期的房产29间，分配给了29户居民。东大桥分区和永长分区居民先后斗争了恶霸房东赵福祥和张云峰。群众反映：“国民党来了，是要穷人的命，共产党来了，是要穷人活！”[1] 与此同时，长春市各工厂也掀起了清算斗争高潮。仅长春烟草公司就清算出香烟50大箱，价值65万元，全部分给了工人。5月8日，电车工人斗争了伪科长关庆绅，200多名工人一致要求他将过去吞食的“配给”物品发还给工人。有的工人说：“你以前太狠心了，机器要擦油，人要吃饭，工人就算是你养的一条狗，也得喂喂食呀！你就忍心把我们的‘配给品’全都独吞了吗？”在工人们的说理斗争下，关答应吐出100多万元。[2] 电车工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他们日夜赶修，在5天内修好3辆电车，使当时长春营运的电车由4辆增至7辆。电车工人真正成了公司的主人。

5月2日，长春市敌逆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办公地址设于熙光路（今光明路）701号。主任委员叶季壮，副主任委员贺诚、孙立基。下设调查、清算、经理三个处。该会系由军政

---

① 《东北日报》1946年5月13日第1版。

② 《东北日报》1946年5月20日第1版。

机关联合组织，其任务是统一清理和分配敌逆财产，同时还制定发布了《举发敌逆财产奖励条例》，从而使全市的翻身运动和清算斗争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这场斗争不仅打击了敌伪势力，而且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通过对比，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打内战的阴谋和欺压人民的反动本性，共产党和民主联军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及其所实行的民主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建设人民政权，支援解放战争是当时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长春市职工代表大会于5月18日在东北总工会大礼堂隆重开幕。到会代表300余人，代表长春20万职工，选举了田文达、袁博之（女）、胡黎光、杨长春等40余人为执委，同时还选出了代表职工的工人参议员。彭真、石磊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号召"长春的工人们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援助前线，保卫长春。"[①]从5月13日起，长春市政府即筹备召开长春市参议会。参议会召开前夕，《东北日报》发表社论说："参议会是最高的民意机关，它将把全市各阶层人民的要求集中起来确定民主新长春的施政纲领，并民主选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委员，团结全市80万人民，把"九·一八"后14年中残害东北人民的首脑城市，建设为和平民主自由繁荣的城市。"为迎接这一盛会，在会场门前及临近的街道上，高搭彩楼，悬挂着巨幅的红布标语。正当130位代表准备于5月23日出席这一庄严隆重的大会时，因战事紧张而未能如期召开，但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心愿和人民政府的民主主张。

就在长春人民进行和平民主建设之时，四平保卫战激战犹酣。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保卫胜利果实，长春市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拥军劳军热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已筹集了3万双军鞋，1 200匹布及手巾、肥皂等物品，并组织120人慰问团

---

① 《东北日报》1946年5月22日第1版。

慰劳前方将士。[1]

长春地处四平战区的后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中共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东北局于5月初由梅河口迁到长春，并决定派出一些负责干部参加中共长春市委。调整后的市委领导成员是：书记林枫（兼），副书记石磊，组织部长陈东平，宣传部长王阑西，秘书长徐慎。委员有叶季壮、陈郁、汪金祥、张化东、刘俊有、刘居英、张文海、赵东黎、郭伟人、周桓等。[2] 此时，长春已成为中共在东北的政治中心。鉴于长春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光复后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并建立了地方政权的有利形势，毛泽东曾打算将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迁至长春。现将1946年3月，在苏军撤离长春前夕，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的电文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寅卯：

（一） 苏军距撤完只有三十五天，你和辰兄交涉时除请他们速让我军进占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外，另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二）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此事须迅速说服辰兄让我进驻，如得同意，东北局应准备迁长春；（三）……

子丑

寅有[3]

5月14日，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的兵力，分为三个兵团向四平街地区进犯，并于18日突破防线，进占四平。由于局势骤变，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因而改变了中央机关迁往长春的计划。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兵分三路向北进犯，希图与民主联军主力决战于长春、永吉一线，以便将民主联军压向

---

① 张世杰：《创办初期的长春新报》。《吉林省革命博物馆文集》第1辑。

② 中共吉林省组织史资料。

③ 电文中"辰兄"系指苏军司令部，"子丑"是指中共中央或某人，"寅有"为日期。

松花江以北，“在军事上，可与共军隔江对峙，形成天堑。[①]

面对国民党军的猖狂进攻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排除要继续坚守长春，把长春变为第二个凡尔登的不切实际的主张”。[②] 为保存主力。摆脱被动与不利的局面，东北民主联军遂于5月21日撤出公主岭，22日撤出长春。接着国民党军又进占了吉林、永吉、梅河口、海龙、双阳、伊通、磐石、九台、小丰满水电站、农安、德惠、桦甸等地，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大部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休整，分别在北满、东满等地创建根据地，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6、苏军与长春政局

从1945年8月19日至1946年4月14日，苏军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在国共两党几经争夺，几经易手的过程中，苏军当局对长春的政策出现了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对长春的解放事业，既有其积极因素，也有其消极影响；既支援了长春人民，也限制了人民的革命行动。

(一)支持中共在长春建立人民武装和地方政权　1945年8月19日苏军进驻长春以后，长春的政局仍然动荡不安。伪满汉奸和日本政客，国民党的各种政治派别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长春开始了公开的政治较量。一些伪满汉奸和政客竟然打出“东北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的招牌，公然表示等待国民党中央的“接收”。尽管这个“维持会”不久便被苏军解散，但它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使已经动荡不安的长春政局，更加动荡和混

---

①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②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辽沈决战》(上)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乱。因此，长春政局的稳定，对于苏军当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9月8日，周保中率部到达长春以后，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人民武装，保卫胜利果实。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苏军当局给予了全力的支持。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于9月9日看望周保中时，对于周保中要扩军支援武装的要求，曾幽默地说："可尽你的力量拿，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剩下的归我，这是咱们的战利品，我们分用。既然是战利品，中苏友好条约又没有规定将战利品交给国民党，所以，我只能交给他（国民党）武器库房，交给他长春市。"[①] 于是，周保中以抗联干部和中共长春地下党干部申东黎、傅根深等为骨干，在长春发动群众，组建了人民武装。同时，查封了反动报刊，解散了反动组织，稳定了长春政局，使长春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为了迅速发展革命力量，挫败国民党东北行营"接收"东北，"接收"长春的企图，1945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经与苏军协商同意，派刘居英任长春特别市市长，建立了中共领导下的长春市第一个民主政权。在发布新政府七条施政纲领的第一号文告中，将"协助苏军实行军事管制，发展与巩固中苏友谊"置于首要位置。

对于已经建立人民政权的城镇，苏军当局是支持的。1946年1月22日，国民党九台县长乔树芳在苏军联络员陪同下，赴九台"接收"。这时九台已建立人民政权，对于乔树芳的"接收"，县人民政府负责人据理予以驳斥。乔树芳无言以对，只好表示"你们不同意我就回去"。对此，苏军联络员则说："这是你们自己国内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干涉。"[②] 从而使乔树芳的

---

①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② 乔树芳"《国民党"接收"九台经过》，《吉林文史资料》第13辑，第45页。

“接收”，未能得逞。后来。乔虽然“接收”了九台，但只能在城内活动。九台苏军军管司令明确表示：“你们对外的重要行动，必须和我联系商酌，否则，我们不负安全的责任。”[①]

1946年4月14日12时，苏军撤离长春。在苏军的默许下，中共取得了首战长春的重大胜利。攻占长春，不仅使长春重获新生，同时也使国民党迅速侵占整个东北的企图受到沉重打击，对东北以及全国大局有着极大的影响。

从5月中旬开始，国民党集结重兵大举北进，5月19日进占四平，5月23日占领长春，嗣后又占据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的猖狂进攻，使东北解放区的形势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局面。当时，由于国民党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鞍海战役潘朔端起义，拉法之战又失掉一个团，增加了后顾之忧，加上中共坚持无条件停止内战，因而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战半个月。此时，苏联曾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警告：如美国再继续奉行这种对苏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②]苏联的积极干预，迫使马歇尔压蒋停止北进，应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无怪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陈嘉骥发出了“美国这一次是上了共匪的当”，“使我功败垂成，匪势藉机坐大，反败为胜”[③]的哀叹。

苏军驻长期间，对长春政局的发展是关注的，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支持了长春人民的解放事业，从而使国民党在长春的“接收”屡屡受挫。

（二）延缓撤军协助国民党“接收”长春 从苏军进驻长春伊始，根据中苏签约的有关条款，苏军就准备把长春交给国民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换文》第二条规定：“苏联政府以东

---

① 乔树芳：《国民党“接收”九台经过》。《吉林文史资料》第13辑，第45页。
② 杨泽民：《苏联与中国解放战争》。《世界史月刊》1989年第5期。
③ 陈嘉骥：《白山黑水的悲歌》第8页。汉威出版社，中华民国75年6月4版。

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同时，在《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中，明确规定：“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①] 从而确认了国民党“接收”长春的合法地位。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在苏联政府同意下，国民党政府主席“东北行营”在长春成立，并拟以长春为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政中心。由于有苏军当局的支持，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莫德惠等 40 余人才敢于由重庆飞抵长春，成为国民党首批到达东北的“接收”大员。为在国民党军出关前，尽快实施“外交接收”东北的企图，蒋介石令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及九省二市“接收”大员迅即赶赴长春。这些“接收”大员到长后，熊式辉曾向苏军总部提出派员到各地“视察”的要求。尽管苏军当局表示对去沈阳、哈尔滨的人不负有安全责任，但仍于 10 月 21 日派专列护送莫德惠到吉林进行所谓“宣慰”。

1945 年 10 月下旬，国民党在“行政接收”东北受挫以后，国民党军在美国的援助下，公然以武力“接收”东北，并于 11 月 16 日占领山海关。鉴于当时的形势，苏军为执行中苏签约中的有关规定，决定把中长铁路上的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交给国民党政府。12 月中旬，苏军当局迫使中共撤出了长春。1946 年 2 月初，在苏军的协助下，国民党“接收”了九台和农安，使已经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长春人民，又陷入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苏军当局将已经建立人民政权的城镇又拱手交给国民党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

① 王德贵等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第 484 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根据苏军向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递交的《苏军从满洲撤退计划书》规定，到1945年12月3日，苏军将从东北撤退回国。由于在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英勇抗击，使国民党无法实现如期“接收”的企图。国民党政府自己提出，如苏军按规定期限撤出“满洲”，该政府“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1] 于是，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苏联延缓撤军，先是推迟到1946年2月，后又延至4月。苏联政府之所以同意延缓撤军，“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将三大城市及中长铁路干线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2]。1946年1月22日，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匆匆来长，向苏军又是慰问，又是授勋，以表示对苏联的友好之意，感谢之情。正是由于苏联同意延缓撤军，才使国民党得以调兵遣将，并在美国的援助下，将军队和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北，使国民党军得以占据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三）关键在于苏联的对华政策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4月，国共两党对长春争夺期间，苏联当局对国共两党的态度，随着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而有所变化。对中共领导下的长春人民为建立革命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既支持又限制；对国民党的“接收”活动，是既协助又拖延。但主要方面，则表现在支持蒋介石在长春，在东北，在全中国的统治权。苏军当局的这一政策，是与苏联政府对华的总政策一脉相承的。

苏联政府对华的总政策，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的变化，在不同时期而有所不同，是“一种流动而有弹性的政策”。[3] 从雅尔塔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对华政策，在三

---

① 《1945—1949年的苏中关系》，王德贵等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第497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③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1957年9月翻印。

个时期，有着微妙的，甚至是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时期：从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前后到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雅尔塔会议达成了美英苏三国关于苏联对日出兵的协议，而这个协议是以同意恢复 1904 年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权益和维持外蒙古的现状等条款为先决条件，从而划分了三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为了防止苏联可能站在中共一边进行干预，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4 年夏就曾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蒋介石会谈，希望蒋介石同苏联签订某种协定，"以排除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①]

蒋介石在美国的授意下，为取得一统中国和实现日本投降后"行政接收"东北的迷梦，于 1945 年 7 月初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蒋介石政府以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为国际自由港；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旅顺军港租于苏联为代价，换取苏联对蒋政权的支持。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把《雅尔塔协定》更加合法化，使中苏之间的关系用条约的形式确认下来。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愿中国有纷争和内战；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并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②]这种所谓"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就是企图拉拢蒋介石政府倒向苏联，或最低限度也要促使蒋保持中立，以便使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域。

这一时期，由于苏联对中国政局的错误估量，因而导致了对华政策的全盘失误。这种失误集中表现在中苏签约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只相信蒋介石，而不相信毛泽东，从而否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时期：从 1945 年 8 月末八路军出关到 1949 年中华

---

① ［美］《1942—1946 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2 月第 1 版。

②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1957 年 9 月翻印。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出兵东北，使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为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八路军延安总部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号命令。靠近东北的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利用苏军进入东北的有利时机，首先向东北进发。与此同时，配合苏军作战的东北抗日联军，在57座城镇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共武装力量在东北的迅速发展，使蒋介石感到惊慌失措。此时，蒋介石一方面幻想依据中苏签约，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一方面依靠美国的援助，将集结于大西南的国民党军北调，以便用武力来争夺东北。

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北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倒向美国的事实，促使苏联重新考虑了对华政策。而制定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就在于维护苏联在东北的权益。苏联政府按照中苏签约，既要支持蒋介石，又不能忽视中共武装力量在东北的发展。因为这种力量可以限制美蒋势力向东北的扩张。如果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那么对苏联当然是十分有利的。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①] 苏联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在国共两党争夺长春，争夺东北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当中共的力量在长春迅速发展之时，苏军当局支持了长春人民。当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之际，又协助国民党进行“接收”。如此矛盾的现象，产生于矛盾的政策，说明苏联仍然相信国民党对中国政治和军事的统一，而对中国革命则是半信半疑。

第三时期：从1949年10月1日到50年代末。经过3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由支持国民党

---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政府转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苏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综观这段历史的发展，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十、国民党对长春的统治

1、强化军政机构，发布反动政令

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进占长春。国民党东北军事当局任命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为长春警备司令，并由该军负责长春地区的“治安责任”。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熊式辉保荐尚传道兼代长春市长。5月28日，尚传道携其班底部分成员市府秘书长刘守刚，警察局长许赓扬等到长任职。5月29日，“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名义进驻长春。[1]5月30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白崇禧、杜聿明的陪同下，由沈阳飞抵长春视察。在机场大厅会见长春地方豪绅、地主、巨富及各界代表时声称“保证不扩大战争”，而在接见国民党军将校官佐时，却扬言要向松花江以北进军。蒋介石在机场虽然仅逗留2个小时，然而其用心却昭然若揭。

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长春已成为国民党军向北满、东满进犯的桥头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加强国民党在长春的统治，“巩固已占领的据点”，准备大打，是蒋介石此行的真正目的所在。当时，长春军政机关林立，据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于1946年12日初统计：驻长部队、军事机关及其

---

①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

后勤机关有106个单位，警察21个单位，党团9个单位，地方行政机关26个单位，经济部各机关29个单位，交通部各机关38个单位，财政部各机关3个单位，教育部各机关5个单位，粮食部各机关3个单位，总计军政机关近240处之多。其中重要的军政机关有：长春警备司令部、长春市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军调部、美国军事战略情报处、空军司令部、美国副领事、“东北保安”第二总队、“东北行辕”办事处、“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1]吉林省党部等。[2]松江省、嫩江省、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党部办事处亦相继在长春市成立。长春已成为国民党北犯东进的前哨和大本营。

1946年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首战长春时，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为攻城部队俘获。后由蒋经国在重庆活动，经国共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协商同意，将赵君迈与国民党在沈阳拘押的中共方面的作家金人交换释放。[3]赵君迈于7月27日，到长春市政府“接篆视事”。熊式辉在给吉林省政府的训令中，称赵“忠贞可嘉”，并令“尚委员即回本职，无庸兼代该市市长职务”。[4]赵君迈重任市长后，组建了市府的班子，委任罗涤之为秘书长，肖仁树为财政局长，孙亚明为社会局长，佟贯廷为教育局长，董道铸为卫生局长，张维 沆为工务局长，杜理程为公用局长，许赓扬为警察局长。[5]市府下辖18个区，即中山区、中正区、长春区、鍾华区、和顺区、宽城区、东荣区、东光区、安民区、合隆区、大屯区、双德区、北河东区、南河东区、净月

---

①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8次常务会议决议：“各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其组织及职权均照旧办理。”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31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30号卷

③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

④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50号卷。

⑤ 《长春市局长及中等以上学校主管人員（七月份）报表》，民国35年市府长秘人字第562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23号卷。

区、春阳区、劝农区、西阳区。[1] 光复时，长春市人口计 80 余万。自 1946 年 8 月始，历时两个半月，遣送日侨俘 22 万余人，[2] 长春尚有人口计 611 186 人。[3] 其中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公务员和无职业者人口占有较大比重。

长春街区名称，多由日伪时期所命名。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皆予以“正名”，并贴上了“蒋记”的标签。1946 年 7 月 8 日，尚传道兼代市长时，因“敷岛、顺天、大同三区名称原系敌伪用语，与我国情不合。兹决定将敷岛区改为中山区、顺天区改为锺华区、大同区改为中正区，以整观瞻，而正视听”。[4] 嗣后，赵君迈接任市长时，又以布告的形式，将街路、广场、公园的名称重新命名。现将布告抄录如下：

长春市政府布告

（35）口都字第 537 号

查本市街路名称，其带有敌伪色彩者，业经本府请各界于本月二十日开会审查改正在案，兹特公布如左，仰各周知，此布。

计开

一、旧附属地地区

新命名	旧街名	新命名	旧街名
北中山街	北中央通	东二条街	东二条通
北一条街	北一条通	东三条街	东三条通

---

① 长春市保甲户口统计表（民国 36 年 8 月）。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2—28 号卷。

② 赵君迈：《长春市政府施政总报告》。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34 号卷。

③ 《长春市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表》（民国 36 年 1 月）。吉林省档案馆档案 D792 号卷。

④ 《长春市政府训令》（35）社区字第 264 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1—29 号卷。

北二条街	北二条通	东四条街	东四条通
北四条街	北四条通	东五条街	东五条通
北五条街	北五条通	东六条街	东六条通
北六条街	北六条通	东七条街	东七条通
北七条街	北七条通	东八条街	东八条通
北八条街	北八条通	西一条街	西一条通
北九条街	北九条通	西二条街	西二条通
北十条街	北十条通	西三条街	西三条通
忠孝路	住吉町	西四条街	西四条通
仁爱路	高沙町	西五条街	西五条通
信义路	尾上町	长白路	日出町
和平路	春日町	黑水路	富士町
中山大街	中央通	黄河路	三笠町
汉口街	敷岛通	长江路	吉野町
东一条街	东一条通	珠江路	祝町
天津路	室町	蔷薇路	山吹町
青岛路	弥生町	白菊路	白菊町
芷江路	浪速町	梅花路	菖蒲町
吴淞路	曙町	翠竹街	柏木町
宁波路	入般町	青松街	樟木町
厦门路	梅枝町	春郊路	千草町

广州路	永乐町	崇文路	菊水町
香港路	老松町	振武路	振武町
辽宁路	和泉町	百合街	樱木町
安东路	露月町	花园街	花园町
辽北路	羽衣町	北平大路	八岛通
永吉路	锦町	胜利大路	日本桥通
合江路	蓬莱町	南京大街	大和通
松江路	平安町	贵阳街	大亚街
龙江路	常盘町	上海街	朝日通
嫩江路	千鸟町	凯旋街	军用路
呼伦路	府后路		
山仙路	水仙町		
海棠路	结梗町		
芙蓉路	芙蓉町		

二、新市街区域

新命名	旧街名	新命名	旧街名
中正大街	大同大街	重庆路	丰乐路
民家路	天安路	自由大路	至圣大路
五强街	五色街	彩城街	映画街
东民主大街	东万寿大街	南湖大路	盛京大路

西民主大街	西万寿大街	敬业街	南岭同仁乡
桂林街	宝清路	台儿庄路	东高台路
万宝街	天宝街	复兴大路	协和大路
新疆街	龙门街	民权大街	顺天大街
民生大路	安民大街	吉顺街	永吉街
清华路	神泉路	太原大街	西阳大街
乐群街	乐土街	西康路	金辉路
徐州路	黄龙路	青海街	开元街
光明街	重光街	民族大街	和平大街
同志街	同治街		
普庆路	天庆路		
南昌路	元寿路		
东中华路	东顺治路		
西中华路	西顺治路		

三、其　　他

新命名	旧街名	新命名	旧街名
光荣路	共荣路	开封街	天佑街
昆明街	天福街	西安路	天光路
衡阳街	天道街		

四、广　　场

新命名	旧名称	新命名	旧名称
民生广场	建国广场	民族广场	盛京广场
民权广场	安民广场	自由广场	至圣广场
中正广场	大同广场		

五、公　　园

新命名	旧名称	新命名	旧名称
中山公园	儿玉公园	民权公园	顺天公园
中正公园	大同公园	南郊公园	黄龙公园
长春公园	新京公园		

市　　长　　赵君迈

工务局长　张维沆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

从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进占长春以后，至长春解放，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先后四易市长，初为尚传道兼代，继而为赵君迈复出。翌年10月初，蒋经国调赵君迈为上海渔业总局局长，赵遂辞职赴沪上任。1947年10月4日，孙桂籍由沈来长就任，当令4个月有余，各局局长皆由孙委任。秘书长喻崧、民政局长王家驹、财政局长曹肇元、教育局长李辉英、卫生局长徐庆瑞、工务局长张维沆（后改任孙亚明）、公用局长孙亚明、警察局长乐干。[2]1948年2月初，孙桂籍被选上国民党立法委员，于2月末辞去市长职务。同年3月1日，尚传道接任市长，至郑洞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29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23号卷。

国投诚。此间，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各局局长为：秘书长刘振钧、民政局长申惠文、财政局长张竹青、教育局长佟贵廷、工务局长张维沆、会计处长高镜清、警察局长袁家佩。[1]

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发布的反动政令及其规程多如牛毛，它如同条条锁链，将长春人民禁锢于囹圄之中。1946 年 5 月 25 日，当国民党军进占长春的第 3 天，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立即向长春市民发布布告，“严饬军政人员切实维持地方治安”，对“倘有不逞之徒造谣滋事破坏秩序，一经察觉，定予严惩，决不姑宽”。[2] 于是，特务横行，幽禁无辜，草菅人命。据《东北日报》转载长春《湘潮日报》报道，仅在一所秘密的地窟中就囚禁 70 余人，“在肮脏的地上，不准穿鞋”，过着非人的生活。又据《华声报》载，长春县警察局拘留所已人满为患。[3]

国民党长春市当局所发布政令及规程，多系转发“东北行营”所下达的“训令”及“法规”，经变通后，照发贯彻执行。仅 1946 年，《东北行营公报》第一、二、八、十期所公布的“法规”、“训令”、“告示”就有 33 项之多。其重要者如《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及处理办法》、《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东北各省市施行细则》、《收复区实施户口清查办法》、《各县保甲整编办法》等。[4] 根据“东北行营”发布之《东北日籍技术员工留用实施办法》，长春市“各机关留用日侨技术员工 4 千余人”。[5]

1946 年 8 月，国民党新六军调离长春，由新一军接替驻防。1947 年 11 月，沈阳“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电令新一军扩编为新

---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23 号卷。
② 《东北行营公报》第 1 期第 11 页，辽宁档案馆档案 JE1—1—185 号卷。
③ 《东北日报》1946 年 8 月 29 日第 1 版。
④ 辽宁档案馆档案 JE1—1—185 号卷。
⑤ 赵君迈：《长春市政府施政总报告》，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34 号卷。

一、新七两个军。编后新一军南调沈阳，新七军驻守长春。[1]除国民党正规军外，一些自立番号的“东北挺进军第十一路军”、“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等游杂部队亦挂牌立足长春。由于国民党市政当局拒绝“拨发给养”，因而他们四处抢掠，对长郊乡民危害甚大。

2、“接收”敌伪资产，扩张官僚资本

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根据“东北行营”公布的《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省市分会组织规程》及《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及处理办法》，成立了长春分会，并会同东北生产管理局长春分局“接收”敌伪事业资产。应予“接收”的范围，有“日本、德国公私事业机构及资产”；“伪满政府所有之资产及事业机构”；“朝鲜、台湾公营之事业机构及公有资产”等。按照《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及处理办法》第五项规定，“所有接收之各项敌伪事业资产，均应就各该事业资产之性质及按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之职掌，由总会分别决定接管机关接管之，同时报请东北行营转报行政院核备。”[2]

为了实施“接收”敌伪事业资产，扩张官僚资本，“东北行营”以法规的形式，先后公布了《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发动人民呈献敌伪物资办法》(以下简称呈献办法)、《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接收各军事机关及部队查封之敌伪物资办法》(以下简称查封办法)、《东北敌伪事业统一接收委员会随军接收敌伪物资办法》(以下简称随军接收办法)、《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敌伪物资告密奖励办法》(以下

① 郑圣：《忆国民党新七军五十六师》，《吉林文史资料》第13辑。
② 《东北行营公报》第2期，辽宁档案馆档案JE1—1—185号卷。

简称告密奖励办法）等。[①]《呈现办法》规定："各分支会及县市敌伪资产保管委员会于奉到本会命令后，应立即发动呈献运动，并须于发动之日起三周内完成之"；"呈现人首应将敌伪物资之品名、数量、存放地点等项，口头或书面报告于所在地之分支会或县市敌伪资产保管委员会"；"对于人民呈献之物资……应即按照售价或估价发给奖金"；"逾期仍不呈献者，一经查明，除将隐匿物资没收外，并依法惩处之"。[②]对于"东北收复区内所有敌伪之一切物资，如有利用各种方法企图隐匿偷漏走失转让者"，《告密奖励办法》中规定："任何人均向本会及所属各分支会告密"。凡"向本会告密之敌伪物资，经本会查验接收后，依该项物资之批发市价提出一定比例之奖金，以奖告密人"。[②]

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资产，理应归人民所有，只有人民才有使用和支配权。然而国民党却利用"法规"的形式，将敌伪资产窃为一党所有，这就充地暴露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反动本性。根据国民党"东北行营（辕）"制订的"法规"，国民党军及其政府"接收"人员打着合法"接收"的旗号，肆意进行掠夺式的查封和登记。按照《查封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各军事机关或部队对其查获之敌伪物资，如须留用时，应有优先留用权。"[③]于是，进占长春的国民党军各部队之间，到处占房子，抢地盘，贴封条，闹得长春市民怨声载道，鸡犬不宁。一些国民党大员以"接收"为名，也到处争夺房产。据《新生报》载："一个敌伪工厂或房屋，至少有七八个官衙调查贴封，而每个官衙的调查还不止一次。至于'××局员工宿舍'，'××官长住宅'之类的封条，不胜枚举。"[④][②]长春市国民党房屋分配委员会又以"公用优先于私用"之名，下令凡"八·一五"后民占敌产房屋，一律于一周之内迁出，如有不迁者，由监察小组强制

① ②③ 《东北行辕公报》第8期。辽宁档案馆档案JE1—1—185号卷。
② ④ 《东北日报》1946年8月29日1版。

执行之。于是，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有的竟宿于严霜寒月之屋檐下”。但时隔不久，市民便发现“该房屋分配委员会又将是项房屋以高价出租，大发其财”。[1] 在南长春一带，“其比如栉”的洋房大楼，到处都贴满了封条。而在长春收容所，则有1 165名难民无家可归。

从军队到政府，从国民党要员到一般官员掀起的这股抢占房屋贴封之风，愈演愈烈。长春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以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任何机关非经警备司令部及市政府会同许可，不得以任何名义自由接收。”“现在市内各敌伪事业资产已贴之封条，概属无效。自经布告以后，倘再有假借名义擅贴封条或挪移资产强占房屋者，一律以抢夺论罪。”[2] 这里所说的“以抢夺论罪”，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而明目张胆地抢夺，确已暴露无疑。。

长春市国民党当局为“接收”各项敌伪资产，根据“东北行营”关于《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及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分别成立了军政、内政、财政金融、教育、经济、交通、农林、粮政、社会、司法行政、宣传、水利、地政、卫生、生产、房地产、物资管理等组处。各组处分别派“接收”人员前往“接收”，并在月内造具《接收财产清册》报送分会，由分会转报总会听候处理。

“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长春分会内政组呈长春分会，至1946年7月26日，已“接收”国营印刷所等17处及各厂附属房产11所。又据东北生产管理局长春分局于1946年7月22日统计：日伪时期长春有工厂429家，已“接收”144家。现将分类列表如下：[3]

---

① 《东北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2版。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53号卷。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4—126号卷。

工厂类别	日伪时期工厂数	已接收数
金属机械工业	83	28
印刷及制纸业	59	1
制药及化学制品业	48	19
制材及木材加工业	43	10
被服布帛制作业	35	5
食料品工业	62	17
杂业及一般工业	65	40
窑　业	34	24
合　计	429	144

到1946年8月初，东北生产管理局长春分局已“接收”工厂189家，现摘录列入《接收财产清册》中的部分厂家，由此可窥其全貌。[①]

接收月日	番号	厂　名	厂　址	接收人
6月29日	长产1	满洲特殊制纸株式会社新京工厂	东盛大街804号	徐景昌
6月29日	长产4	新京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民丰路202号	吴宗禹
7月3日	长产28—12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曙町二丁目24号	赵心一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80号卷。

接收月日	番号	厂　　名	厂　　址	接收人
7月3日	长产30	满洲机械建设株式会社	兴安路641号	王明阳
7月25日	长产33	杉山铁工厂	大马路71号	刘维义
7月20日	长产36	满洲暖水瓶株式会社	三笠町五丁目1—3号	赵振华
8月5日	长产79	新京铸物制作所	乐土街701号	刘维义
7月18日	长产82	满洲大豆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中正大街上海大楼内	宋立生
7月25日	长产88	满洲粮食株式会社	东盛路	蒋国光
7月30日	长产93	康德轻金属工厂	东来北街332号	蒋国光

长春市国民党当局将已“接收”的日伪时期工厂多予更名，如“浅川铁工厂”更名为“广大铁工厂”，“东亚造酒”更名为“长春酿酒公司”，“东洋机工会社”更名为“华顺锯铁工厂”等。[①]对已“接收”的工厂在经营方式上，有官办者，如长春第一铁工厂、长春造纸厂、长春制材厂等。有租营和合营者，仅东北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72号卷。

生产管理局长春分局“接收”的工厂实行此种方式者就有61家。有由政府“接收”而下放为民营者，如原属日伪松村组的建筑业厂家。[1]上述工厂无论以何种方式经营，其目的都是为了榨取利润，扩张官僚资本，为战争机器输入物资和资金。

3、经济窘困，民不聊生

工业 1947年，长春市工业同业公会有31种，拥有会员2 165人，其中拥有百人以上的公会有10种，说明中小企业已具有一定规模。现将当时统计抄录如下：

长春市工业同业公会一览表[2]

1947年

公会名	会员数	公会名	会员数
制粉工业同业公会	128	腊烛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	20
粮业工业同业公会	168	胶皮车轮修理工业同业公会	67
油坊工业同业公会	43	油漆牌匾工业同业公会	58
制酒工业同业公会	51	铜锡器工业同业公会	45
酱业工业同业公会	65	印刷工业同业公会	96
粉条工业同业公会	21	铁工工业同业公会	122
豆腐工业同业公会	132	工程工业同业公会	139
糖果工业同业公会	20	制材工业同业公会	33
制药工业同业公会	13	木器工业同业公会	135
面碱工业同业公会	7	薄铁工业同业公会	150
被服工业同业公会	20	扎画工业同业公会	34

① “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档案，2—4—9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 20—1—414号卷。

公会名	会员数	公会名	会员数
纺织工业同业公会	41	清凉饮料工业同业公会	14
制棉工业同业公会	17	面包西点工业同业公会	29
染业工业同业公会	22	纸类加工工业同业公会	36
西服缝纫工业同业公会	107		
中服缝纫工业同业公会	196		
皮革工业同业公会	127	计 31 种	2 165

在上述同业公会中，长春市国民党当局十分重视粮米加工业的发展。1946年8月8日，“东北行营”军粮计核委员会奉“中央密令”，令长春市政府在10日内筹集大米1万包，“以备军用”。为此，市府于8月12日召开紧急会议进行摊派，并决定“各区购足后运至长春制粉厂集中”加工。[①] 这就使当时的粮米加工业突然地繁忙起来，然而这却是一种畸形发展。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长春两个面粉厂，平均日产量为239 250袋。352个碾米厂，日碾高粱米30 902 965斤。93个榨油厂，日产豆油1 424 170斤，日产豆饼356 820片。[②] 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处于孤立无援的长春市国民党当局，由于财源枯竭，物资匮乏，采取了管制、课以重税的种种办法搜刮民财，致使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就是为国民党军需服务的厂商也难以继为。

益发合创设于1892年，是旧中国在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日伪时期，曾是当时两个资本在300万元以上的民族工商业户之一。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因其接收政策，使益发合陷入困境。由于原料缺乏，资金短缺，水电常停，税率增加，致使所属制粉、制油、制米、制酒工厂陷入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53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2—28号卷。

半停工状态。1948年4、5月间，长春泰发合、东发合、益发银行和益通银行相继关门。5月以后，长春成为“陆上孤岛”，益发合所属各工厂停止生产，厂房变成了国民党六十军的兵营。①

商业 抗战胜利后，长春商业市场曾一度呈现暂时的繁荣。据1946年调查统计，商店总数达3 970家，列表如下：②

商业种类	商店数目	商业种类	商店数目
市场肉食品商	128	估衣行	111
猪肉商	106	鞭炮商	37
国药商	132	鞋帽商	76
饮食店商	518	理发商	96
茶海产商	22	饮料商	19
回教饭店商	76	自转车商	95
羊牛肉商	156	梨园商	9
冰果商	96	旅店商	119
薪炭商	46	汽车运输商	16
新药商	53	澡塘商	19
菜食鲜货商	62	棚铺商	14
煤业商	46	照像商	47
粮包材料商	15	古玩商	7
书籍文具商	51	茶社商	13
旧货商	137	电影商	10
百货店商	222	妓馆商	123
烟商	41	建筑材料商	24
五金电料商	74	兽肉商	21

① 刘益旺、曹涛：《长春益发合兴衰始末》，《长春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5月。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414号卷。

钟表眼镜商	68	载货马车商	1 065
商业合计			3 970

到1947年，商业同业公会会员有5 493户，从业者达76 440人。然而商业发展极不平衡，其中服务行业有3 930户，占商业会员的71.5%。在服务行业中，手推车、人力车、饮食业、妓馆多达2 432户，占服务行业的61.88%。[1] 这说明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长春市主要货物输出输入状况的统计，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物资交流的变化呈逆差趋势.详见下表：[2]

输出状况　　单位：吨

品名	输出总计	1946年7—12月	1947年1—6月
米谷	12 436	7 241	5 195
木材	2 705	2 023	682
木才加工	429	369	60
薪炭	93	63	30
大豆	31 444	20 464	10 780
豆油	1 094	1 064	30
豆饼	9 575	7 540	2 035
麻	370		370
其它	10 530	5 152	5 378
合计	68 676	43 916	24 760

输入状况　　单位：吨

品名	输入总计	1946年7—12月	1947年1—6月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51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414号卷。

棉布	72		72
棉纱	1 070	550	520
棉制品	2 778	2 645	133
面粉	210	210	
煤	52 135	16 670	35 465
酒类	72	72	
盐	42 138	24 378	17 760
干鲜果	7 379	2 781	4 598
汽油	408	180	228
其他	93 547	14 785	78 762
合计	199 809	62 271	137 538

到1948年6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对长春正式进行封锁围困以后，长春对外物资交流已完全终止。

财政与物价 商税锐减，财力维艰，使长春市经济处于窘困的境地。据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兼市长尚传道呈吉林省政府兼主席郑洞国关于《本府三十六年度岁入岁出总决算书》中统计：岁入决算总额为3 587 285 999.32元（东北地方流通券，下同），岁出决算总额为3 821 216 058.28元，岁计不足额为233 930 058.96元。[①] 其中仅7至11月份不足额就达165 172 737元。[②]主要系亏欠11月份员工薪饷及警察经费。面对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市府财政局长曹肇元不得不承认："当前财政，百孔千疮，无论中央地方，俱有同困，尤以本府财政，因屡经劫变，生产萎缩，商业凋零，农村荒芜，民生疲蔽，外困每告吃紧，税源顿呈枯竭"，"其困窘之程度，亦有增而无已"。[③] 国民党当局在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之际，"除续向行辕暨省府请求增拨补助费外"，唯一的出路就是向长春市民横征暴敛，即所谓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21号卷。
② 吉林省档案馆档案D92号卷。
③ 吉林省档案馆档案D92号卷。

"调整税率，整顿税收"，[①] 以维持其反动统治。

随着税率猛增，长春市物价扶摇直上。据当时长春市商会工商组统计，以1945年"八·一五"时基数为100，1947年1至7月份各类物价指数上涨的幅度，可以说明当时物价的严重形势。其物价指数如下：[②]

品名	单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白米	斤	433	544	774	933	1 467	2 067	2 067
高粱米	斤	441	733	717	1900	2 850	3 889	4 444
小米	斤	459	692	806	1 483	2 166	3 185	3 038
苞米面	斤	354	593	672	1 510	2 442	3 384	3 922
猪肉	斤	444	587	567	827	1 233	1 600	1 877
牛肉	斤	534	598	682	999	1 356	1 827	1 803
鸡卵	个	700	1 098	1 420	966	1 240	1 593	1 509
豆腐	块	333	500	667	1 000	1 750	2 000	2 000
豆油	斤	395	777	806	1212	1 601	1 679	1 795
酱油	斤	1 000	1 917	2 209	3 584	5 053	6 250	5 750
粒盐	斤	1 033	1 983	2 375	3 592	3 073	3 375	4 275
烧酒	斤	183	300	462	1 200	853	987	1 152
块煤	100斤	1 876	2 533	2 800	2 766	2 867	5 933	7 033
花其布	尺	417	506	539	789	1 155	1 593	2 278
洗衣肥皂	块	900	1 133	1 933	2 267	4 833	4 000	5 667
铅笔	打	750	2 666	4 170	4 160	6 000	6 000	7 500

1948年以后，物价逐日暴涨，其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涨势如下（价格单位：东北地方流通券，元）：[③]

① 孙桂藉：《长春市政府施政总报告》。吉林省档案馆档案D92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2—148号卷。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107号卷。

品种＼日期	大米（市斗）	高粱米（市斗）	苞米面（市斤）	猪肉（市斤）	豆油（市斤）	盐（市斤）	白士布（市尺）
1月5日	34 000	18 000	750	2 000	1 200	1 200	2 500
2月5日	60 000	33 000	1 900	3 500	3 500	5 000	6 000
3月15日	59 200	29 400	1 200	4 000	2 200	5 000	5 800
4月15日	116 800	70 000	4 000	10 000	5 000	15 000	14 000
5月15日	320 000	180 000	8 500	20 000	11 000	12 000	14 000
6月15日	2 260 000	1 200 000	78 000	90 000	50 000	46 000	48 000
6月25日	5 700 000	3 900 000	250 000	250 000	150 000	120 000	120 000

在上述生活必需品中，尤以粮价上涨最为迅猛。以高粱米为例，从1月5日至6月25日，已上涨了168倍。苞米面上涨了333倍。到长春解放前夕，已是有价无市了，长春市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

金融 1945年8月，苏军进驻长春以后，令伪满中央银行增印无号码的伪币97亿元。同时发行红军票9 725百万元。[①] 1945年12月22日，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开业，同日开始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其面值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在长春流通市场上，东北地方流通券与伪币、红军票等值行使。1946年5月，国民党当局陆续收回伪币。同年8月1日，东北行营经委会公告，自本日起登记红军票百元券，并停止流通。翌年5月15日，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公告，红军票10元、5元和1元自本日起至6月14日兑换，截止后即停止使用。到7月31日，长春（包括怀德、九台、农安、德惠等县）共收兑红军票110 284万元。止于9月1日，共销毁伪币74 600万元。[②]从1947年6月15日始，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东北地方流通券独占了长春市场。东北地方流通券在长春发行情况如下：[②]

①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809号卷。

② 李捷：《举世罕见的通货膨胀》，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809号卷。

时间	发行额	累计发行额	发行指数（以1947年末为100）
1945—1947年末	2 928 190	2 928 190	100
1948年1月	797 470	3 725 660	127.2
2月	655 000	4 380 660	149.6
3月	1 647 500	6 028 160	205.9
4月	2 050 000	8 078 160	275.8
—5月15日	2 600 040	10 678 200	364.7
5月16日—7月	39 321 800	50 000 000	1 707.5

长春市国民党当局为维持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发行了巨额钞票。以1947年末东北地方流通券累计发行额为例，比日伪统治东北时期发行的伪币和苏联出兵东北后发行的红军票的总和还多四分之一。[①]

长春的金融机构除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外，还有中国银行长春分行、交通银行长春分行、中国农民银行长春分行、中央信托局长春办事处。1946年10月，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长春支处。民营的金融机构有：本地的益发、益通银行、外地的成功、沈阳商业、志城、兴亚、哈尔滨银行长春分行等。[③]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大打内战，导致物价暴涨，财源枯竭，民生凋敝，经济崩溃，因而除中央银行承担军政费用汇款及印发钞票外，其他各行均于1948年3月8日先后停业。

农业　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撤离长春及周边各县后，农安、九台、双阳、德惠相继为国民党军所占据。逃往长春及各地的地主豪绅随之卷土重来，一些受到宽大处理的日伪警宪也原形毕露。他们以"维持城中治安"为名，成立警察大

---

①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809号卷。

队，组织地主武装，打家劫舍，抢掠民财和土地，奸淫烧杀，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双阳县于5月29日就逮捕农会干部及军政家属50余人，破坏了双阳镇东街区农会，杀害了东街、北街农会主任黄文义、刘俊及农会干部邹福政、刘清俊和新安堡区区长邓国军。双阳县政委乔海秋亦被敌人所暗害。[1]榆树县的一些伪满残余、惯匪和反动的地主武装也趁机作乱。育民乡北新村恶霸地主蒋兴周，纠合地主王松岩等组织起180多人的大排队，盘踞于六号"福兴永"烧锅大院，负隅顽抗。混入我土桥联防队的伪新立维持会分队长李清，乘民主联军转移，打死农会会员樊大个子，杀害民主联军战士朱柏林等4人。[2]

地主豪绅、伪满警宪依靠国民党的势力窃夺县城及区乡政权以后，占有大量的土地，对农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从1946年5月至1947年6月，双阳县17万垧耕地大部为地主所有，他们通过雇工剥削，收取地租和钱租。长春国民党守军经常到四郊烧杀抢掠，长春县小合隆区张乡约村被抢劫后，粮食及衣物几乎全被抢光。1948年，长春县兴隆山区，由于国民党军的洗劫，全区11 081垧地，只种上5 858垧，大片土地荒芜，无法耕种。卡伦岗子村，国民党军抢去牲畜400余头，烧掉农具1 000多件、房屋122间，使贫苦农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国民党军撤离双阳时，把6个区的粮仓的粮食分散到各大粮户埋藏起来，并组织地主武装在长春与双阳交界地区进行骚扰，使农民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劳动，造成土地杂草丛生，农业萎缩。[3]

煤气与公交　"八·一五"光复后，煤气生产即告中断。1947

---

① 《建国前党在双阳的活动大事记》，《长春史志》1986年第1期。

② 榆树县史志办公室：《解放战争时期榆树县根据地的建设》。

③ 《双阳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参军支前活动》，《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第173页。

年1月，煤气公司借得善后救济总署面粉2 940袋，为筹备第一期复工基金。[1]同年3月1日，成立煤气公司复工筹备处，历时6个月，仅修复一号水平炉，一号煤气储罐和第一精制室。从9月5日起，开始向今百货大楼、长白山商场以北供气，用户约2 000户。10月中旬，因营城至长春间交通断绝，煤斤无来源，煤气公司于10月28日宣告停业。从11月16日起，仅留员工20名，其余120余名"均予停薪留职"。[2]解放前夕，煤气厂的厂房和地板被拆毁，煤气制造设备除一号水平炉较为完整外，其余均遭破坏。[3]

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长农、长朝、长珠、吉长、公长、吉九长等公路干线，经粗略修整，由吉林省建设厅与商民合办的汽车尚可断续通行。不久，因战局紧迫，即告停运。市内交通主要以电车为主，汽车只修复2台，行驶于车站至南关间。有轨电车通行线路5条，日平均出车30辆。1946年7月拆除自由大路至动物园1.2公里线路，9月1日铺设了七马路至东大桥1.8公里单线。1947年6月拆除宽平大路到抚松路2.3公里线路，9月铺设了三马路至南关2.2公里线路。同年10月下旬，因停电，全线停止运行。后经改装，只有6台车靠发电机发电，仅可在上海路至西朝阳路，上海路至自由大路间营运。到1948年2月，因燃料缺乏，亦告停运。[4]在公共汽车和电车停运的情况下，马车和三轮车成为长春市区的唯一交通工具。据《长春市政概要》[5]于1947年9月统计，乘用及载货马车共9 250辆，三轮车1 510辆。长春解放前夕，有轨电车的天线多处被空投粮袋

---

① 民国36年9月《长春市政概要》。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2—143号卷。

② 民国36年12月15日《长春市政府工作报告》。吉林省档案馆档案D92号卷。

③ 《当代长春城市建设》。

④ 尹桂荣、黄再玉：《长春的有轨电车》。《长春史志》1989年第2期。

⑤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2—143号卷。

所砸断，轨道被拆除为构筑工事和碉堡所使用，车库、机器、厂房被拆毁破坏殆尽。

其他诸如供水系统，自1947年11月26日，国民党市政当局决定停止供电后，南岭水厂用柴油机送水，后因柴油紧缺，送水即告停止。国民党军政机关尚靠深井维持，而广大市民只好饮用土井水了。

4、严密保甲组织，强令修筑城防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1932年8月1日，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政府便正式宣布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法西斯统治制度。[1]

1946年5月，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至同年8月29日，在9个区先后组建1 102保，8 637甲。[2] 9月2日，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复出以后，以布告的形式将含有敌伪意识的旧有联保名称，均予改正。现将新旧联保名称按原布告抄录如下：[3]

区名	旧联保名	改正联保名
中山区	中国桥联保	中胜联保
	儿玉联保	中山联保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注释"第4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9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第1版。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17号卷。

③ 《长春市政府布告》长社区字第643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29号卷。

	朝日联保	中宁联保
	二条联保	南广场联保
	日出联保	东广场联保
	富士联保	站前联保
	大和联保	和平联保
	吉野联保	胜利联保
安民区	盛京联保	普民联保
	迪化联保	泽民联保
	黄龙联保	惠民联保
西阳区	菊水联保	崇文联保
宽城区	住吉联保	孟家桥联保
	高砂联保	铁北联保
	城山联保	城边联保
	利国联保	宽中联保
锺华区	五色联保	五权联保
	天宝联保	万宝联保
	周治联保	同志联保
	丰乐联保	建和联保
	樱木联保	清和联保
	南长春联保	春郊联保
和顺区	乐土联保	东郊联保
东荣区	昭荣联保	昌荣联保

据当时国民党市政当局关于《长春市行政区划及主要土地面积调查表》统计，联保数计有132个。[①] 从上述联保名称的变更中，可以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市政当局完全承袭了

①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17号卷。

日伪统治长春时期的保甲制，所不同的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有些日伪时期的保、甲长，又穿上了中山装，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1947 年 8 月，国民党市政当局在 18 个行政区中，经整编共设有 249 个保，8 077 个甲。[①] 区设区公所，内置民教、财建、警保三股。保设保办公处，甲设甲办公处。每区有职员 15 至 21 名，每保职员 2 名，“分别办理地方自治及政府委办事项”。[②] 按当时长春市保甲户口统计，不仅提供了各区的保甲数，而且还统计了当时户数及人口数字和应征壮丁数。此统计具有一定的参改价值，现抄录如下：[③]

长春市保甲户口统计表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

区别	保数	甲数	户数	人口数			壮丁数
				计	男	女	
总计	249	8 077	135 527	630 309	349 515	28 0794	154 240
中山区	14	622	12 009	52 749	30 867	21 882	16 121
中正区	42	1 355	18 254	86 856	49 461	37 395	24 512
长春区	31	1 530	21 314	97 028	55 182	41 846	26 917
键华区	14	494	7 946	34 022	18 741	15 281	8 076
和顺区	26	850	22 936	101 615	55 782	45 833	21 570
宽城区	16	459	5 754	26 251	14 922	11 329	7 092
东荣区	26	713	12 372	52 535	28 852	23 683	13 682
东光区	10	272	3 837	17 500	9456	8 044	4 056
安民区	6	66	856	3 417	1 819	1 598	953
合隆区	11	421	9 478	42 609	23 535	19 074	9 744
大屯区	10	174	4 047	19 533	10 326	9 207	4 279
双德区	9	203	2 623	14 040	7 355	6 685	2 798
北河东区	7	134	1 607	8792	4 701	4 091	1 847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2—143 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2—143 号卷。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2—28 号卷。

南河东区	4	90	1 439	8 638	4 684	3 954	251
净月区	7	159	2 578	14 124	7 547	6 577	2 842
春阳区	5	183	3 301	18 507	9 509	8 998	3 189
劝农区	6	315	4 479	29 143	19 171	13 972	5 501
西阳区	5	57	679	2 950	1 605	1 345	810

同年10月10日，孙桂籍当令之时，根据省府关于县市旗各级组织暂行办法之规定，又将各保冠以地名。如中山区第一保改为东广场保，保办公处设于东五条街。第二保改为珠江保，保办公处设于宁波路四段。第四保改为贵阳保，保办公处设于贵阳街，如此等等。[①]12月15日，根据户籍法和省府令，按市街区以30户为标准，农村区以15户为标准，对原有之保、甲进行了全部整编。整编后，保数为237，甲数为4 981。[②]

1948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近逼长春市郊后，国民党军政当局对长春市民采取了更加严酷的统治。为此，长春市政府制定了《严密保甲组织及办理户籍登记纲要》，推行联保连坐法。该《纲要》规定："同一连坐不得超过十户，各户取具切结后，依连坐规约之规定互负监视之责，倘发现违约不予告发时，同坐各户与犯案人受同一处分。"[③]《纲要》中所谓的《联保连坐规约》，就是指"出具联保连坐切结后联保各户居民中"，有违犯下列六项之一者，即："一、有开设烟馆或吸食鸦片毒品者；二、有为共匪或与共匪勾结或藏匿共匪侦探工作人员者；三、有为盗匪或与盗匪勾结隐藏赃物者；四、有破坏公共建筑物者；五、私藏军火不依法登记者；六、有及龄壮丁逃避不服兵役者。"《规约》还规定"联保各户应逐日轮流互相查察"，如有发现违

---

① 《长春市政府公报》第3卷第15期，第157页。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2—3号卷。

② 《长春市政府工作报告》第26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 D92号卷。

③ 《长春市政府重要法令计划汇编》第一册，第11页。

约者要立即报告，对“情节重大者”可“径行逮捕”。若隐匿不报，出具联保连坐切结各户“均受连坐处分”。[1] 其切结书格式抄录如下：[2]

联保连坐切结书

为出具联保连坐切结事，查具结人等皆系本甲良善居民，经相互查察愿相联保，自出切结后相约各遵联保连坐办法，互相劝勉，彼此监察。倘有违反连坐规约规定各事项及有其他非法行为者，具结人依法负检举报告之责任。如有扶同循隐匿不揭报情事，联保连坐各户甘愿共受惩罚。特此出具切结。

出具切结书人

长春市　　区　　保　　甲

联保连坐负责甲/户长　　印

户长　　户长　　户长

户长　　户长　　户长

户长　　户长　　户长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长春市国民党军政当局想以此种连坐法实施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然而人心相背，憎恨国民党，企盼解放的民众心愿已不可逆转。统治者深知此等办法只能奏效于一时，而绝不能长久。因而便抛出狠毒的一招，将市府战工队员及省府干训班毕业学员中最为反动者，“充区保指导员”。这些恶棍到任后，即分甲召集各户，“户长不到者押办”，“到后一一对保，无人敢保者”，“集体押送出境”。同时在各甲中密设情报网，进行密告和暗中监视。并被当局授予可“随时指挥警察拘捕奸宄”和对

① 《联保连坐规约》，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1 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41 号卷。

"拒捕图逃者，准予格杀勿论"的特权。[1]

保甲是国民党市政当局最基层的组织，一切诸如征丁拉夫，摊捐派款，推行反动政令，均通过这一组织强制予以实施。1946年8月2日，当局召集各区、保、甲长举行"长春市兵役会议"，即令全市住户于"十日内不准滥自迁移"。同时还宣布，征兵年龄由21岁至23岁，"虽回教信徒，亦在被征之列"。[2] 1947年7月，正当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战略反攻，并取得夏季攻势胜利之际，长春市国民党军政当局为重点防御固守长春，便大肆在市内和城郊征丁拉夫，修筑城防，使长春市民惶惶然不可终日。同年8月，在拥有63万余人口的长春市，当局就计划抓丁154 240人之多。是年11月初，当局奉长春团管区电令，冬季紧急征兵7 000人，广大青年纷纷藏匿躲避，结果只抓到1 660名。1948年5月，当东北民主联军兵临城下之际，国民党军政当局更加疯狂地扩充志愿兵团。被抓壮丁老幼不等，"年逾花甲者有之，未届弱冠者有之"，就是身为保、甲长者也不放过。据长春市和顺区公所致长春团管区司令的公函云："团管区于月之九日，[3]点编志愿兵团之际，因兵员缺额，商用本保甲长民夫20余名临时充数，点编完毕即可遣归。不料竟将该民等拨交五十二师第二团，迄未放还，家中老幼嗷嗷待哺，泣请保长转请释放。"[4]

长春市国民党军政当局除强征壮丁外，凡"自18岁至45岁，除公教人员、学生及残废者外，均编为自卫队员，分期训练"。这里所说的"自卫队"，是指于1947年7月所组编的"民

---

① 国民党长春市政府《签呈》，长民秘字第2219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21号卷。

② 《东北日报》1946年8月9日第1版。

③ 即5月9日。

④ 长春市和顺区公所公函，长和民字第38号，民国37年5月19日。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82号卷。

众自卫队”。市府设总队部，区设大队部，每数保设保中队部，由保长兼任中队长。当局规定，每个队员须经3个月的训练，每日训练不得少于3小时。其“民众自卫队”的任务是：构筑城防工事；请扫机场积雪；夜间巡查等。[①]据市政当局公报提供的有关统计，1947年5、6月份，构筑城壕出工的民夫累计达754 449人。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强大的秋季攻势，历时50天，共歼敌6.9万余人，收复和一度占领了城镇75座，其中有九台、农安、德惠等地，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城市。长春市国民党守军面对国民党在整个东北战局的失利，更加疯狂地驱赶市民修固城防。从9月19日起至11月底，共动用民工35万人之多。现将当局有关统计抄录如下：[②]

综合动员民工情况表

工作种别	共出民工数
修补外壕	328 617 名
修改碉堡外围地形	4 515 名
机场扫雪	4 395 名
临时协助驻军	15 110 名
总计	352 632 名

为强制市民修固城防，长春市国民党军政当局制定了《加强补壕工作修正民夫奖惩办法》。对“一日不到者，罚款2000元，并须补工”；若“保甲长隐匿不报”，“该保甲长应受连坐处分”；

① 吉林省档案馆档案D92号卷。

② 《长春市政府公报》第3卷第25期，第241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 D92号卷。

凡属“故意违抗”，则“由警察局依法处理”。在国民党当局的威逼之下，长春市民苦不堪言。

5、推行战时文化教育，出版反共刊物

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中小学教育的布局，仍维持日伪统治时期的原状。1946年7月27日，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复出以后，市管教育系统官员与各校之校长始配齐。市教育局长佟贵廷，长春市立第一中学校长王时庸，第二中学校长丁慕南，第三中学校长尹尚莘，第一女中校长谢润普，第二女中校长牟大毓，师范学校校长高鹤龄，市立工科职校校长陈炳。[1]1947年6月，杨熙靖任市教育局长时，对部分中学及师范的校长进行了调整，丁慕南任长春市立第一中学校长，孙经灏任二中校长，李光裕任女中校长，邓芝茹任师范学校校长。[2]1947年10月初，长春市政府孙桂籍当令时，任李辉英为市教育局局长，市立中学及师范校长依旧。1948年3月，尚传道出任长春市长时，任佟贵廷为教育局长。由于时局紧张，市民逃亡，学生锐减，当局对学校采取收缩合并措施，故将一中、二中合并改为市立高级中学，陈炳任校长，王国贤任初级中学校长，赵利民任女中校长，王素梅任市立高级护士助产学校校长。[3]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学编制是：校长之下设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训导主任多由国民党分子担任，各学校的军事教官，均由军队选派。当时学校所用教科书，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编发行。因东北战局所致，教科书纸版由内地空运长春，再付印刷，然后发往各校使用。

---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23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2—30号卷。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23号卷。

长春市国民党当局接管中小学后，教育事业曾一度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改定学制。恢复小学为六年制，中学为三三制。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将学年改为秋季始业。二、扩充学校。当局为尽量收容失学儿童，各小学添设两部，共增142学级，增加学生1 0124名。三、取缔私塾。对于偏远地区，因环境需要，仍保留9校，学生总数为398名。四、增设保民学校。据当局于1946年8月底统计，全市失学适龄儿童计6 827名，尤以锺华、安民、中山各区至为严重。经当局以资救济，增设保民学校12所，可容纳学生2 635名。五、整顿私立学校。长春各私立学校多不合规章，又因经费不足难以为继。经当局批准，兴华、东北、广育等校相继停办。原有学生1 100名，已分别安插于市立中学肄业。[1]现将长春市公私立中小学校统计表抄录如下：[2]

学校别		中等学校			国民学校				总计			
		公立	私立	计	公立	保立	私立	计	公立	保立	私立	计
校数	光复前	6	4	10	32	0	9	41	38	0	13	51
	现在	7	5	12	32	12	9	53	39	12	14	65
	增	1	1	2	0	12	0	12	1	12	1	14
学级数	光复前	77	22	99	594	0	46	640	671	0	68	739
	现在	125	25	150	636	43	52	731	761	43	77	881
	增	48	3	51	42	43	6	91	90	43	9	142

①②《教育局工作报告》(1946年7月)。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34号卷。

学生数	光复前	3 949	1 250	5 199	26 836	0	1 817	28 653	30 785	0	3 067	33 852
	现在	6 883	1 427	8 310	31 113	2 635	1 978	35 726	37 996	2 635	3 405	44 036
	增	2 934	177	3 111	4 277	2 635	161	7 073	7 211	2 635	338	10 184
教师数	光复前	134	93	227	876	0	48	924	1 010	0	141	1 151
	现在	203	55	258	923	52	58	1 033	1126	52	113	1 219
	增	69	38	31	47	52	10	109	116	52	—28	140

除上述中小学校以外，还有民众教育馆 1 所，职业补习学校 22 所，聋哑盲学校 2 所，美术研究社及国术馆各 1 所。

1947 年 1 月，据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公报关于《长春市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表》统计：当时长春市人口计 611 186 人，其中受高等教育者 4 195 人，受中等教育者 35 417 人，受初等教育者 111 093 人，私塾 12 792 人，识字 19 086 人，不识字者 428 549 人。①从上述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受过初等以上教育者计150 759 人，仅占总人口的 24.7%，而不识字者却占 75.3%。面对如此众多的文盲，国民党长春市教育当局虽然增设学校 14 所，但仍有大量适龄学童不能入学。由于教育经费“异常艰窘”，以致教职员薪俸亦不能按月发放。教育当局不得不承认：“在此种经济困难之情形下，各种工作未能令人满意，实属无庸讳言。”②

除市立中小学外，由省教育厅管辖的中学有：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省立高中、省立女中和松北联立中学。松北联立中学成立于 1946 年 10 月，拥有学生 5 000 多名，由校本部和 4 个分校组成。1948 年 1、2 月间，长春市国民党军事当局企图把松北联立中学学生编成部队，激起联中学生的义愤，举行示威游行，

① 《长春市政府公报》第 2 卷第 3 期，第 48 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 D792 号卷。

② 《教育局工作报告》。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34 号卷。

呼口号、贴标语，大反李鸿。同年2月松北联立中学解散，移交给长春市，改名为青年中学。

当时较有名望的小学有：大经路小学、正光小学、永昌路小学、一匡街小学、东盛路小学、南关小学、自强街小学等。[①]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委派臧启芳为“接收”东北教育特派员。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在东北成立5所高等院校，即国立东北大学（校址沈阳市）、国立沈阳医学院、国立长春大学、国立长白师范学院（校址吉林市）、国立滨江大学（校址哈尔滨市。哈尔滨在我解放区内，此“计划”无法实现，只好“待办”了）。国立长春大学成立于1946年10月20日，校址位于今东北师大医院旧址。

长大的行政编制是：校长下设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秘书室和会计室。第一任校长黄如今。1947年冬飞离长春后，由教务长张德馨代行校长职务。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罗云平为长大校长。

长大共设有6个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农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1个专修科：书记官专修科。全校计有25个系。有学生2 863名。[②]

1948年9月，长大师生绝大部分，约1 200多人离开长春投奔解放区，部分去了沈阳，也有自行回家的。从此，长春大学人去楼空，已不复存在。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除长春大学外，还有私立松江大学、中国红十字会立东北医学院等。[③]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认为这里是伪满的“首都”，市民“太奴化了”！因而录用师资和大学生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甄审。对应

---

① 徐一夫：《国民党时期的长春市中小学》。《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第86页。

② 周克让：《回忆长春大学》。《吉林文史资料》第18辑。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415号卷。

届大学毕业生寻求工作者，长春市府“为防止奸党份子渗入政府各部门潜伏工作起见”，曾制订三项办法，“密饬所属机关遵照”执行。[①] 对于中小学师资的“检定”，则“限期登记”，“严予考核”．“使优良者获得保障，滥竽者加以取缔”。[②] 这实际上是对中小学教师在政治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1946年暑期，由市教育局长主持成立了“长春市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历时20多天。每天都由国民党军政要员上课，如省秘书长讲国民党史；郑洞国、廖耀湘等讲抗战史。而且每人都要填写临时入党申请书，并于毕业式结束后，举行集体入党宣誓大会。[③] 此举虽属临时入党，由当局强制所为，但广大中小学教师心中怨愤，敢怒而不敢言。一些教师拒不交出申请书，以此蔑视当局的卑劣行径。为了在青年中培养所谓“戡乱救国”的新生力量，国民党教育当局于1946年11月下旬，又召开了长春市中学生“三青团”入团宣誓大会，凡是到会的学生都要举手宣誓。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接连发动了夏、秋、冬三次强大攻势。长春国民党军政当局为固守长春，便强制各校师生参加修筑城防工事，慰问伤兵，协助警察清查户口等。对年满6岁至12岁之儿童，一律编组成“儿童队”；年满13岁至17岁之少年，一律编组成“少年队”；年满18岁至45岁之男子一律编组成“自卫队”。[④] 在《长春市民众编组办法》第六条中规定：儿童队之中大队长以住在该管区内之小学校长或教育充任之。少年队之中大队长，以住在该管区内之中学校长或教育充任之。每个成员必须佩带由市政府统一制发的符号，否则一律禁止通行。[⑤]从此，长春市中小学教育，便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为强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2号卷。

② 《教育局工作报告》。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34号卷。

③ 徐一夫：《国民党时期的长春市中小学》。《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

④ ⑤ 《长春市民众编组办法》。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70号卷。

化战时教育体制，长春市政府教育局长佟贵廷签发了长教一字第3048号训令，向各校转发了长春私立萃文女子中学校长史延书的呈函《戡乱宣传办法》。该《宣传办法》内容是："一、本校在开学期间，每周第一日朝会时，由本校同人轮流演讲现在毛匪残暴行为及欺骗青年事实。二、本校在假期令学生向其亲戚邻里宣传，作成日记定为假期作业。三、令学生在相当场所，编贴戡乱壁报。"①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及其战时教育政策，长春市中小学教师以当局拖欠工资为名，爆发了大规模的罢教运动。各校学生也纷纷响应，掀起了罢课、罢考斗争。

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其文化事业概况如下：一、图书出版业有30余个单位。如吉林省立长春图书馆、东北经济委员会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分馆、民众教育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正书局长春分局、知行书局、益智书局、大隆书局、福昌书局、东方出版社、吉林新闻摄影社、吉林省印刷厂等。二、影剧院业有40余个单位。如艺光影院、上海影院、中国电影院、大安电影院、长安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国泰电影院、中山纪念堂、长江电影院、新新大戏院、新民戏院、龙春大戏院、兰鹰剧团、善文剧团、中山合唱团、长春制片厂、京城戏院等。三、体育游乐业有15余处。如高尔夫球场、赛马场、南岭总运动场、中山运动场、中正游泳池、中山游泳池、中山公园、中正公园、白山公园、牡丹公园、民权公园、南郊公园、和顺公园等。四、广播通讯社有12个单位。如长春广播电台、长春第二广播电台、夜雨广播电台、知音广播电台、东北通讯社长春分社、中央通讯社长春分社、西北通讯社、远东通讯社、军闻社、中正社等。②

在上述文化事业单位中，有一部分系由国民党军政党团所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84—3—4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415号卷。

主办或经营。如军队或与军队合办的有：国泰电影院、新民戏院、新新大戏院、鹰扬剧校、兰鹰剧团、毅刚剧团等。由政府主办的有：长春市贫民教育馆、中山纪念堂、普文剧团、军民联谊等。由国民党党部和三青团主办的有：知行书局、正文社、平安影院、青年会馆、中山合唱团、青年馆等。[1]

国民党军政当局为实施战时体制，长春市政府于1948年3月16日，决定组织战时工作总队，并制定了《长春市政府战时体制实施办法》、《长春市战时工作总队业务纲领》及《督察规则》三种。[2] 在《长春市战时工作总队业务纲领》中，明确规定总队必须以"参与"等方式，对文化部门进行"指导"。并在所谓"以军事掩护政治，以政治巩固军事之原则"下，强制文化部门必须运用各种方法，如壁报、童谣、山歌，利用民间娱乐集会，利用算命，测字看相，说书卖唱等方式，"宣扬政府法令"；"报导匪军祸国之史实"；"扩大行宪宣传"。该总队还负有"调查并破坏匪方文化及情报机关"之责任。[3] 从此，长春市国民党军政当局即将各文化事业单位，纳入了战时轨道。

关于长春市的医疗卫生情况，于1946年，市立医院有7所，公私立医院22所，其它无收容力医院74所，拥有病床1 962张，医师271人。所用卫生材料，因脱脂棉市场无货，仅有少数粗制品纱布代替。1946年7月初至8月末，长春市曾发生霍乱，患者2 922人，治愈587人，死亡2 335人。至1947年，私立医院和诊所增长迅速，当时有医院145所，齿科医院13所，中医诊疗所329所，中药商168个，西药商46个。有的虽挂牌某某医院，而医师仅有1人。市立医院仅剩二所，即市立第二医院和传染病医院。

---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415号卷。

② 《长春市政府公函》长秘一字第185号。长春市馆档案历23—3—38号卷。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38号卷。

1948年3月8日，国民党第六十军由吉林撤守长春。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吉林，[①] 长春已成为“陆上孤岛”。国民党军政当局以“缺乏伤患官兵治疗处所”为由，将长春市立第二医院于3月15日“借与”六十军，作为野战医院之用；将长春市立第二医院分院于3月20日“借与”新七军三十八师“充作野战医院收容伤病战士之用”。[②] 尽管长春市长尚传道在与军方“洽订之合同”书中明文规定：“保留门诊部仍为市民诊治疾病”，但市民又何敢到此登门求医呢？

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国民党军政党团要员为大造舆论，出版了种类繁多的反共报刊与黄色小报。各种报纸达40余种之多，刊物有近30种。其中较有影响，发行量较大的报纸计有3家。《中央日报》：该报为国民党机关报，由《中央日报社》长春分社出版发行。原社长系军统长春分部负责人、伪国大代表刘博昆。继由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锡恩接任。编辑人员由伪满《盛京时报》、《大同报》、《大北新报》人员所组成。社址：中山大街（今斯大林大街）44号。《长春日报》：该报办于1946年4月，是国民党、三青团与督察处合办的报纸，后因经费不足，于1947年底停刊。1948年3月，尚传道出任市长时，重新出刊，该报已成为长春市政府机关报。尚传道决定自7月4日起，在《长春日报》“按周辟栏登载‘长春市政周刊’”，以“宣达”本府“政策政令”。并要求附属机关“应一律订阅，视为正式公文处理，并归档保管”，[③] 由是发行量猛增。社长：国民党吉林省参议员金鸿润。1948年7月停刊。社址：中山大街3号。《前进报》：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新六军进占长春以后，由新六

---

① 1948年1月1日，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② 尚传道：《为市立第二医院分院及本院等病房借与新七军三十八师及六十军之军医院使用请予追认案》。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32号卷。

③ 《长春市政府训令》。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62号卷。

军军长廖耀湘出资筹办。同年8月，新六军调离长春，又因经费紧缺，曾一度停刊，并与《湘潮报》共同出联合版。社长：湖南《大公报》记者钟中。社址：中山大街41号。《新生报》：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支持创办。有工人200多，销路达六、七千份，是仅次于《中央日报》的大型报纸。社长：史问津。社址：上海路17号。《中正日报》：由梁华盛私家经营，创刊于1947年春。发行量最多时达1万份，其印刷设备仅次于《中央日报》和《新生报》。社长：王侯翔，曾任吉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社址：胜利大街38号。《工商报》：是由苏军管制长春期间长春市长曹肇元的秘书侯廷柏到工商界集资筹办的。创刊于1946年9月，曾因经费不足，两度停刊，由于工商界的支持，得以维持。以后参加"联合版"出刊。该报主要反映地方及国内外经济动态、工业状况等，文艺方面侧重工商趣味。评论有《经济评坛》、《老实话》、《逆耳谈》、《揭示版》、《忠言》等专栏。社长：侯廷柏。社址：中山大街24号。《华声报》：由新一军五十师师长潘玉昆于1946年驻防长春后所创办。翌年4月停刊，后于1948年6月再度复刊。有工人五、六十人。社长：新一军五十师政治部副主任杨任翔。社址：长春市重庆路。《新报》：是青年军二〇七师办的报纸。创刊于1946年12月。长春被围后，归"联合版"出版。社长：李光瑶。社址：上海路105号。[1]

除上述八家报纸以外，还有《中报》、《联合版》、《今天晚报》、《公正报》、《醒世报》、《力行日报》、《论坛报》、《大陆晚报》、《力报》、《长春午报》、《中山报》、《松花江晚报》、《湘潮日报》、《东北民报》、《中华报》、《国民公报》、《大东报》、《大华日报》、《忠勇日报》、《新声晚报》、《正气日报》、《民间日报》、《东方报》、《热潮报》、《今日东北》、《民报》、《北辰报》、

① 上述八家报纸情况，均摘引自《长春报业史料》。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819号卷。

《斯民报》、《东北导报》、《长白晚报》等。[1] 在上述报纸中，有的只挂牌而未出报者有《大东报》、《正气日报》等。《正气日报》是蒋经国派人在长春筹办的，该报社成立于1946年9月。社长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高理文。1947年10月，长春市长赵君迈调离长春时，将《正气日报》社委托时任市府社会局长孙亚明（中共地下党员）代管，孙又任刘育新（1948年3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该报社印刷厂厂长。从此，该报社便成为中共掩护条件较好的一个活动基地。[2]

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发行的刊物有：《国民公论》、《今日东北》、《国民文学》、《大风》、《关外诗歌》、《新世纪》、《经济周刊》、《边疆月刊》、《东北风》、《东北科学》、《黑水》（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主办）、《新运导报》（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主办）、《鹰扬画报》（新一军新闻室主办）、《忠勇月刊》等。[3]《忠勇月刊》由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主办。其《月刊》内容皆以吹捧梁华盛和污蔑中共为能事。如第二卷二、三期"分崩离析的中共"；第四期"由宣传战谈到中共"；第五期"共匪春季攻势纵横观"等。尚传道还曾于《忠勇月刊》民国三十六年"新年号"上题辞，大肆宣传"我们大家要以本刊提倡的忠勇精神努力向前迈进"，"要拯救被压迫的同胞"等等。[4] 上述报刊杂志多为国民党的舆论喉舌，随着时局紧迫与国民党的分崩离析，也就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

① 《长春市概况》（1945—1948）。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415号卷。

② 孙亚明：《我以国民党接收人员身份在长春开展地下党工作的情况》，《长春史志》1988年第5期，第6—8页。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415号卷。

④ 吉林省档案馆档案D933号卷。

6、实行白色恐怖，屠杀革命志士

为了镇压革命者和长春人民的反蒋斗争，国民党在长春建立了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保密局长春站、保密局东北特技组、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国防部二厅长春站、中统局长春区等40多个特务组织。1948年4月，长春国民党军政当局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为统一行动，实行残酷的镇压，维护其反动统治，经郑洞国批准，专门成立了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简称“特秘处”，是长春最高的特务组织，是各种特务联合办公的衙门。解放前的长春，已经成了特务的大本营。在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中，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活动是“恶不忍闻，罪不容诛”。督察处已成为“特秘处”的化身，是杀人的魔窟，他们以“通共”、“通匪”、“隐匿不报”或“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罪名，大肆拘捕杀戮。很多共产党人、革命志士、进步青年及无辜群众，残遭杀害。

国民党长春督察处由陈诚批准，文强（保密局沈阳督导室中将负责人）委任其秘书崔志光组建，并于1946年9月25日在原日本驻伪满总领事馆旧址（上海路30号，今吉林省政协所在地）正式办公。督察处对外由第一兵团司令部、长春警备司令部领导，对内则由保密局东北工作沈阳督导室和长春站操纵，又称“保密局长春督察处”。这个组织表面上是维护长春的社会治安，实际上握有生杀大权，是刺探情报，镇压革命人民的罪恶机关。督察处首任处长崔志光，次为安震东、张国卿。下设：督察室、秘书室、侦审室、第一科和第二科。侦审室对“案犯”施以“金、木、水、火、土”酷刑，而处决“人犯”则由督察室负责。长春督察处从它成立伊始，便成为长春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对长春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对中共代表进行特务活动　1946年3月27日，周恩来、张

治中、吉伦军事三人小组在怡园签订关于《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6月中旬，东北执行停战小组第27小组中共代表伍修权将军、国民党代表蔡宗廉将军、美方代表泰勒将军由沈阳移驻长春，并成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停战小组在长春调处期间，督察处受命于国防部二厅郑介民的指令，表面上负责中共代表的安全，实际上是进行暗中监视和特务活动。这个警卫组分内、外勤两个班。内勤班以茶房、杂役身份在中共代表住处窃听言谈，收集只字片纸，每日呈报。外勤班伪装商贩，隐藏于中共代表的住处第二招待所对面的老长记鞋店里，待中共代表一出门便尾随其后，进行跟踪和监视，它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东北通讯社事件　1947年10月，东北通讯社长春分社社长富春雨，从事中共党的地工工作，该社为探取“长春市城防工事委员会”绘制的城防工事图而被暴露，于是由督察处长安震东指挥，先后抓捕富春雨、袁学群等20余人。1984年6月3日晚，在督察处长张国卿、督察长关梦龄的指挥下，将袁学群等人及其他政治犯杀害于南岭。行刑时，袁学群等被反绑双手，黑布蒙眼，棉絮塞嘴，由特务用日本战刀砍断喉颈扔入坑中埋掉。②

逮捕经济大药房经理于经五　1948年2月，时任中统局长春区特务的李寿田（中共地工人员），被国民党情报科长怀疑有私通八路嫌疑，而受到指控。在威胁利诱下，供出地工小组负责人李真凡（时任吉林师管区司令部军法处中校主任），活动地点经济大药房，经理于经五，小组成员刘文成、冷志忠等人。5月28日，中统局长春区和督察处派特务搜捕经济大药房于经五

---

① 《长春文史资料》1987年第1辑，第21页；臧家声：《长春市人民公安史长编》，第29页。

② 《长春文史资料》1987年第1辑，第25页。

等10多人。后分别被杀害于南岭和督察处院内。[1]

搜捕长春大学 1946年10月长大成立以后，在关内各大学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高潮影响下，长大校园内反内战，争取和平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长大进步学生以书写壁报、标语和散发传单的形式，表达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义愤。学生们的正义之举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48年3月，六十军撤守长春后，形势日趋紧张，长大校园内多次出现《告长春市民书》、《告机关职员书》等传单、于是督察处决定搜捕、清洗长大。督察处"长大"学运组组长郝铮绘制了长大宿舍图和拟逮捕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妄图将中共长大地工组织成员一网打尽。

4月24日凌晨，新七军一个营和宪兵队荷枪实弹首先包围了长大，督察处的特务们蜂拥而入，逐屋搜人。他们翻箱倒柜，搜查书信，稍有可疑，便肆意捕人。一个特务查到一个同学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小说，这个特务竟大声斥责说："现在是戡乱建国时期，你们还要炼钢铁，想干什么？"于是将这位同学抓走。[2]这次大逮捕共抓走近百人之多，后经总务长孙亚明，代理校长张德馨多方营救，据理力争，大部分学生因证据不足，而陆续被释放。中共地工人员因事先得到情报，而幸免遇难。

对富源长制米厂的大逮捕 1948年5月，中共地工人员李国栋与高博儒筹办了富源长制米厂，并以此厂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6月3日，督察处的特务们将米厂封锁，把李国栋和高博儒逮捕，后被杀害于清华路一个土岗附近。

杀害无辜青少年 1947年秋，一个15岁的少年刘学亨，因

---

① 邹世魁：《国民党长春督察处罪行访查记》《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161页。

② 《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152页。

父母双亡，沿街乞讨，拣到几粒黄豆被特务搜出，硬说是“联络八路”的“暗号”而被抓到督察处。经严刑拷打后，在解放前夕被杀害于督察处后院假山下。又一卖报青年为招揽买主，因叫卖：“看报！看报！今天的好消息，八路军攻下德惠城！”而被特务抓捕杀害。[①]

垂死前的疯狂屠杀 1948年10月，在长春解放前夕，督察处的特务们自知灭亡在即，法网难逃，于是进行了垂死前的疯狂大屠杀。10月18日拂晓，在督察处处长张国卿的指令下，将关押在督察处的48人“全部用铁丝捆绑双手，黑布蒙眼，棉花堵嘴，提到督察处后院的大坑边，把“犯人”头朝坑里按倒，然后用刀砍脖颈，身首两段后推入坑内掩埋”。[②] 在国民党统治长春时期，督察处经办大小案件数千件，拘捕千余人。解放后，人民政府从督察处后院的假山附近、南岭的荒地中和白山公园附近挖掘出尸体近200具。[③] 仅经督察长关梦龄亲手杀害的“人犯”就有5次计46人。这些穷凶极恶的特务们在困守长春期间，杀戮遍野，血溅荒城，罪孽深重，罄竹难书。

---

① 《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152页。

② 臧家声：《长春市人民公安史长编》，第34页。

③ 《长春文史资料》1987年第1辑，第17页。

十一、久困长围与固守待援

1、围困前的态势与六十军撤守长春

1946年5月，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其势力所及已是东北的半壁河山。但是，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又被东北民主联军消灭了3个师，因而急需喘息。蒋介石在世界舆论和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压力下，提出了从6月6日起，停战半个月。东北民主联军从山海关到松花江，虽然阻滞了国民党军的猖狂进攻，但因为没有根据地和巩固的后方，因而面对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只好且战且退。为创建根据地，补充和整顿部队，中共也同意停战。从7月12日起，国民党50万军队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8月28日，又调集30万兵力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由于关内多处大打，无暇东顾，因而东北战场出现了4个多月的停战状态。

1946年7月上旬，中共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7月7日，通过了《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清除匪患，实行土地改革，建设与巩固革命根据地。仅7、8月，北满、西满、东满各地下乡干部达12 000多人，使东北广大农村的土改运动如暴风骤雨，蓬勃兴起。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仅榆树县就有41万贫苦农民

分得了土地和房屋，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了清除匪患，东满东北民主联军剿匪部队采取“搜剿、穷追、合击、驻剿”等战术，展开了对流窜各地土匪的全面围剿。曹里怀率领吉林军区独立支队，在榆树县消灭土匪1 500人，后又转战德惠、农安、乾安、扶余等地，历时4个月，消灭土匪5 500余人，从而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①] 清剿土匪和土改运动的伟大胜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掀起了支缓解放战争的革命热潮。到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达46.2万人，比1964年11月前增加兵力10余万人，仅东满就补充主力近万人，还另成立两个独立师。这些在土改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战士，为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成为人民武装力量中的生力军。从此，东北民主联军有了根据地的依托，有了兵源、粮源和财源，有了自己的家，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占热河解放区大部地区后，采取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向南满解放区根据地临江等地发起进攻，妄图一举进占南满，然后全力北犯，独霸全东北。从1946年12月27日至1947年3月27日，国民党纠集重兵4次进犯临江地区。面对十分危机的南满局势，中共中央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为了配合南满作战，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分别于1947年1月5日、2月21日和3月8日，3次飞渡松花江，攻克其塔木，奔袭城子街，激战靠山屯，包围农安城，取得了三下江南作战的巨大胜利。“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役历时4个月，歼敌4万余人，收复城市11座，保卫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创了新局

---

① 严启祥：《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剿匪斗争》。《吉林省革命博物馆文集》第一辑，1985年11月。

面。

1947年2月23日，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在二下江南作战中，首先取得了九台县城子街战斗的胜利，随即解放九台，逼近长春。3月1日上午8时半，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三师九团二营夺取了九台、长春间的重镇卡伦。该团随即派二营第五连副连长马如起率第三排战士，向长春方向搜索前进。当前进至祁家窝棚（卡伦镇西南8里）时，与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遭遇，马如起率部撤至卡伦镇西南3里处河溪堡，构筑工事，准备迎击。不久，即发现一辆涂有青天白日星徽的吉普车由敌方占领的李家店东北向阵地驶来，行至阵前200米处停下，下来两个美国军官和一个国民党军官。其中一名美国军官用望远镜进行侦察，另一名美国军官则进行拍照。此时，三排战士命其停止前进，国民党军官见事不好，迅即开车逃跑，三排战士则开火阻截，国民党军亦从李家店方向开火还击，伤三排班长1人。两名美国人见此情景惊魂落魄，扔掉望远镜和照相机，拼命追赶吉普车，边跑边喊："喂，停下！"马如起连长随即率部勇猛追击，战士李凤国高声喝令："站住！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两名美国人可能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于是举起双手当了俘虏。美国军官携带的短枪、望远镜和照相机，也成了民主联军的胜利品，此时正是中午12点。这就是在东北战场上轰动一时，在毛泽东所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说的"在长春附近的九台"事件。[①]

这两个美国人，一个是美国骑兵少校芮格（尼格），一个是美国步兵上尉柯林士（柯林）。两个美国军官均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到内战前线进行所谓"军事观察"。据芮格供认，出发前曾致电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我明天

---

① 白玉武、王元年：《两名美国军官被俘》，《长春党史资料》第二辑，第102—103页。

将去前线，以便对情况作一判断。”他们“经常往来于国民党区域，自由搜集情报”，国民党军事机关允许他们自由进出前线。他们承认：了解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要“把看到的东西报告给华盛顿”。芮格还供述：“美国为了解东北情况，不仅派有领事及武官从国民党军方面取得情报，并设有所谓‘国外调查团’的情报组织……这是属于国务院的一个组织，其中人员一半文职，一半武职。”[①]从上述美国军官的供词中，完全可以证明，美蒋勾结“接收”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公然在东北战场上刺探情报，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与哈尔滨大学校长均发表谈话，表明了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

国民党军以武力“接收”东北之初，对美国提供的重要军用物资所附带之美方标志，为掩人耳目，“以免国际间发生误会”，曾于1946年7月26日，按蒋介石训令，“东北行营”规定：“凡系美方移交我国之重要军品等，所有美国国徽及美军之队徽与陆军注册号码等，不论库存或已发出使用者，均着由主管人员以适色之油漆涂去……”，[②] 从上述国民党政府的“训令”中，不仅证明以枪炮援助蒋介石打内战是真实的，而且从“九台事件”中证明，美国派军事人员公开参加中国内战也是真实的。

“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胜利后，从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接连发动了夏、秋、冬三次强大攻势。

夏季攻势始于1947年5月13日至7月1日，历时50天，歼敌8万余人，收复城镇40余座，将国民党军压缩在以沈阳为

---

① 白玉武、王元年：《两名美国军官被俘》，《长春党史资料》第二辑。

② 东北行营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沈良字第7190号代电。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1—27号卷。

中心的中长铁路、北宁铁路及沈吉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重点防御。

为配合当时全国各战场已经形成的全面进攻的总形势，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9月又发起了秋季攻势。这次攻势历时50天，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6.9万余人。北线东北民主联军完全扫清了吉林、长春外围据点，控制了吉长铁路，收复了九台、农安、德惠等城镇，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营口等点线及附近地区。蒋介石面对东北战局的失利，派陈诚接替杜聿明，但仍不能挽救其败局。为了不给国民党军以喘息的机会，东北民主联军遂于1947年12月15日发起了持续3个月之久的冬季攻势。

1948年1月1日，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73万余人，使国民党军在数量上完全处于劣势。1月17日，蒋介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企图死守东北。

1948年3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在取得沈西三捷，收复法库，攻克鞍山，解放营口，合围四平的有利形势下，卫立煌唯恐孤守吉林的六十军被吃掉，因而决定撤守长春，以加强长春的防务。3月8日上午，卫立煌派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乘专机到达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下达了蒋介石的亲笔手谕和"剿总"的命令，大意是：①

> 为了缩短防线，聚集兵力固守战略要地，待机反攻，着令该军长率领六十军全军及吉林省政府所属党政军警机关全体人员和地方军警宪等武装全部于本日向长春紧急撤退；

---

① 张第东：《国民党六十军之参加内战及起义》，《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40页。

撤退前不能带走的军火、军事装备、给养、辎重等物，全部就地销毁，以免资敌；

撤退前必须彻底炸毁小丰满堤坝和发电厂全部设备；

沿吉长铁路、吉长公路线内侧之间地带，取道放牛沟向长春撤退；

限于三月七日夜间立即开始行动。[1]行动务必迅速、保密，不得有任何泄露；

已分令长春新七军派出得力部队，预先到中途放牛沟山岳地带占领要地接应。

郑洞国下达谕旨之后，便飞沈复命。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随即召集各师长布置撤退计划，同时急调前往乌拉街、江密峰一带抢粮的暂编二十一师陇耀所部限于当日回城集结。由于该部撤回吉林时已近午夜，因而撤往长春的命令，至是日夜12时始下达。撤退之时，兵分三路，向长春推进。政府机关在撤退前两小时接到通知，因而一时间，这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官员们，个个惶恐不安，一些豪绅巨贾也纷纷携眷及细软，麇集于西卡哨附近，致使“军民混杂，途为之塞”。

北国的初春，乍暖又寒，白日冰雪消融，道路泥泞，入夜寒风刺骨，冰封大地。时值又降大雪，浅至没膝，深达数米，白雪茫茫，路沟不辨，使这批撤逃的军民苦不堪言。据时任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张第东撰文《国民党六十军之参加内战及起义》中记述：“行军中由于急不择道和难于辨认道路，军队、地方机关和私人的汽车，有的开行只10余里便掉进山沟和水塘洼地里去了，动弹不得，有的汽油没了，马达或零件坏了，躺在道上，沿途东倒西歪的汽车不少。就连新七军暂时拨配六十军的榴弹炮四门，也由于拖炮的两辆十轮卡车在厚雪中

---

① 应改作八日。据陇耀《吉林撤退和长春起义》及张维鹏、张第东《长春起义前后》文，均作八日。

无法再向前开行，来不及烧毁就丢掉了。”“士兵中，有的由于行动异常吃力，十分疲惫，乘黑夜之中扔掉了身上的一些弹药；有的掉了队，黑夜中迷失了行进方向而成了‘散兵游勇’。”“带兵的官们也是这样……师、团长以至连排长的私人财物，大多抛弃净尽。几乎所有的官兵中，除随身所穿而外，多余的衣服都没有一件。许多人由于丢失甚多，损失较大，身无长物，对打内战前途，更增加了悲观失望和厌战情绪。”又据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少将参谋长杨肇骧撰文记述：“3 月 10 日，第六十军等撤逃部队在冰天雪地中行进。部队携带少许干粮吃光了，就沿村沿户搜劫老百姓藏匿的食品，搜着一坛子咸菜也如获至宝。前面过的部队把村子里的井水喝光了，后面的部队连水也找不到，只好吃雪解渴充饥。”“部队过了大水河，公路每隔几十公尺就被挖断一处，桥梁全部拆毁，汽车无法通行。”“财政厅长带出一小汽车钞票，到此也无法拿走了，守着钞票发愁，结果被落伍的士兵你一捆我一捆背起走了。一捆就几千万元，有的士兵拿着大钞票发了横财。”①

撤守长春的六十军在西进途中，先后在太平岭、磨刀石、波泥河子等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六师、第七师、第九师逐次阻击。据不完全统计：“共歼敌 4 139 人（其中不包括家属、孩子及逃亡地主 443 名），其中毙伤敌人 899 名，俘敌 3 240 名。缴获各种炮 44 门，掷弹筒 2 门，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49 挺，各种长短枪 938 支，子弹 25 万发，炮弹 400 发，手榴弹 1 047 枚。汽车 4 辆（不含敌毁坏的 50 余辆），大车 100 辆。电台 10 部，电话总机 20 部，电话单机 57 部，电话线 250 公里。骡马 228 匹。蒋币 7 000 万元。”②

---

① 杨肇骧：《第六十军在吉林的顽抗和撤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 612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② 《围困长春》第 19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3月11日，疲惫不堪的六十军到达长春东郊时，新七军以划分防区为借口，不准六十军进驻市区。当六十军请求调拨给养时，又复借口“库存有限，一时难以兼顾”，要六十军自筹，就地购买。三日后，经协商，方得进入市区。[1]

六十军此次从吉林撤退，由于行动密匿迅速，虽受到多处阻击，但未伤无气，因而蒋介石称之谓“吉林市撤退是最成功的一次撤退”。英国路透社竟把此次撤退，说成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从“敦刻尔克”撤退那样成功。[2]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将被遗弃在市内和沿途的国民党官员家属，统一收容在吉林文庙之中，并于17至18日，分别送往长春。[3]

六十军从吉林仓皇撤退时，有两点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是没有将“不能带走的军火、军事装备、给养、辎重等物，全部就地销毁”。而是决定“轻重武器全部带走，炮弹、步机枪弹及其它武器弹药和装备尽量设法多带，无法带走的，就地收藏起来”。[4] 二是没有执行“必须彻底炸毁小丰满堤坝和发电厂的全部设备”的命令。丰满电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和掠夺水电资源，于1937年在松花江上游动工修建的。这个水电工程如若毁于一旦，不仅是吉林市，而且整个松花江流域的城镇和乡村都将是汪洋一片，人民生命财产将蒙受重大损失。在秋季攻势中，国民党东北行辕曾预谋炸厂毁坝。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进指挥部，曾于1947年11月3日通谍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团长胡彦，应“毅然拒绝这种乱命”。现将通谍全文

---

① 张第东：《国民党六十军之参加内战及起义》，《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45页。

② ③《长春起义纪实》第13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④《围困长春》第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抄录如下：[1]

胡团长及小丰满全体官兵们：

蒋介石、陈诚、杜聿明这般内战祸首，卖国罪魁，不仅用强暴手段强占了你们的家乡，摧残着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不仅用欺骗手段，把你们骗到离家万里的东北，替他们打内战、当炮灰，抛骨异乡，而且现在正布置一个极端毒辣的阴谋，要使你们成为莫大的罪人，遗臭万代。你们知道吗，这般人民公敌正在积极准备待民主联军解放吉林时即要你们炸毁小丰满水闸，淹没吉林城和北满解放区，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尽被冲没。如果你们听从这种乱命，下此毒手，那你们便是自绝于人民，决不能逃脱人民法庭的最后裁判。民主联军亦将视你们为战犯，决不宽宥。如果你们尚有爱国天良，尚有正义感，便应毅然拒绝这种乱命，全力保护水闸，制止一切特务分子实行放水的阴谋手段，那你们便是对东北人民建立了大功，民主联军将视你们为起义友军，或继续为人民服务或回转家乡均听你们自愿而予以帮助。现在你们被困一隅，外援断绝，蒋贼亦自顾不暇，无法强制你们，你们有完全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究竟愿意听蒋贼乱命自绝于人民，还是毅然拒绝乱命，保护水闸，成为人民功臣，希望你们自择，这是我们的郑重警告。

东北民主联军前进指挥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

11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指出："本人奉命兹特再一次严重警告松江毁闸绝不能挽救匪军的覆灭。倘使蒋匪

[1] 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进指挥部致吉林小丰满国民党驻军官兵信。《革命春秋》1989年创刊号，第42页。

竟敢以此举世闻名之电站作其残酷的殉葬品，对其进行加以丝毫破坏，我军纵使追至天涯海角，亦必将下令指使及直接覅闸之战犯巨首，逮交人民法庭，严厉惩办，决不宽贷。”[1] 由于中共的严正警告和采取对驻守丰满守军喊话、散发传单等所开展的政治攻势，迫使六十军将领选择了明智的光明之路。在撤退时，曾泽生曾暗示驻守丰满电站的五四四团长胡彦：我们绝不能做花园口式的罪人。纵然军参谋长徐树民强令胡彦执行“剿总”命令，胡彦等亦难以从命，只是用集束手榴弹炸坏了电站的非要害部位和引爆了团弹药库，以造成炸毁电站的假象，从而使电站得以保存下来。

国民党第六十军由吉林撤守长春不久，东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13日攻克了战略要地四平，全歼守敌1．9万余人。至此，东北国民党军被全部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联系的孤立地区。

2、军事围困与相机出击

国民党第六十军撤守长春以后，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氏怀着一种“临危受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2] 于3月15日由沈阳飞到长春，3月25日在励志社礼堂宣誓就职，走马上任。郑氏为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战略要求，提出了“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的十六字实施计划。

为了实现其“持久防御”的方针，加强长春的城防工事，已成为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早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就曾在市内和郊区构筑了许多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市中心的关东军司令

① 《长春起义纪实》第12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② 《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第205页。

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及大兴公司等重要建筑，均设有坚固的坑道、地下室和铁闸门，形成了相互依托，又相互隔绝的防御体系。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又在市内增修明碉暗堡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150多处。同时，在春城四周设有宽2米，深2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及主要街道架设了铁丝网等各种障碍物，形成了要塞式的防御体系。郑氏坐镇以后，又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郊设置了多道防线，并亲自督促各部加强防御工事，以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按照郑氏的话说："我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了。"[①]国民党中央社曾大肆吹嘘："长春城防曾经聘请专家数十名精心设计，搜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的资料，动员技工数十万人，使用水泥6万袋，铁板1 500余吨，历时13个月才构成有'坚冠全国'的永久性工事。"[②]位于市中心的伪中央银行，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其外墙是用厚1米以上的花岗石砌成，室内存有大批弹药和粮食，能自行发电和供水，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当时，固守长春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加上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吉林师管区和地方游杂部队，号称10万之众。长春的城防部署是以纵贯南北的中山大街和中正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为界，新七军防守西半部，六十军防守东半部。郑氏出任兵团司令以后，曾部署兵力，加强了对西郊大房身机场和东郊一些高地的防守力量。为了加强城防守备力量，郑洞国还收编了两个土匪骑兵团，其余则任其在四郊流窜，到处烧杀抢劫，成为郊区人民和难民的心腹大患。新七军与六十军，因其嫡庶之别，矛盾甚深，为了能在危难时刻"同舟共济"，郑氏于同年4月保荐曾泽生为第一兵团副司令，李鸿为长春警备司令，但两军之间的矛盾非

---

① 《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第208页。

② 《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三辑，第86页。

但未能缓解，而更加日趋尖锐。

为了鼓舞士气，郑洞国于5月20日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际，在长春组织了一次阅兵典礼。此时此刻，郑氏已“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了”，“自己心里也很空虚”。据郑氏回忆：“当全部美械装备的新三十八师部队整整齐齐地在检阅台前通过时，我心头突然袭来一股难以名状的伤感情绪。该师是我非常熟悉并引为自豪的一支部队。抗战时期曾在印缅战场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功，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自进入东北参加内战以来，这支以往英勇善战的部队却累遭打击，士气下降。现在又随我陷入如此困境，将来还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1] 对于当时阅兵的气氛，用郑氏的话说：“倒真象是举行了一次葬礼。”[2]

5月21日，郑氏为了确保大房身机场的安全和搜刮粮食，指挥长春守军沿飞机场方向发起了大规模的出击行动。在机场外围构筑工事，并于当日下午进占了小合隆。正当郑氏庆幸初战告捷，自鸣得意之际，东北人民解放军独十师及六纵十六师一个团，于5月24日下午5时半攻占了大房身机场，俘敌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以下近600人。[3] 至此，长春外围战斗已胜利结束，国民党守军与沈阳间的唯一空中通道已被切断，长春已成为一座名实相副的“陆上孤岛”。

1948年3月15日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就考虑和部署攻打长春。从4月份开始，东北军区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作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术技术上为强攻长春进行了准备。4月18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要负责人正式提议：部队在军事、政治整训之后打长春。4月22日，中

---

①　②　郑洞国：《困守长春始末》，《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第210页。

③　王玉峰：《强攻大房身机场》，《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30页。王玉峰当时系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十师参谋长。

央军委、毛泽东复电，同意攻打长春，同时也批评林彪多次陈述的认为打沈阳、锦州、榆锦段以及入关作战困难的思想。[1]为了实施攻打长春，东北局决定成立第一前线指挥所（以后又叫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第一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准备指挥攻打长春。5 月 24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一纵、六纵乘国民党新七军出击之机，对长春进行了攻城试打，结果只消灭国民党军 6 000 人，外围战斗没有打好，并不成功。[2] 6 月 5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中央军委提出了 3 个方案：（一）一口气拿下来；（二）向南去；（三）围困长春。[3] 6 月 7 日，中央军委复电东北军区，同意第 3 个方案，对长春进行围困，练兵两个月以后再打。[4] 6 月 15 日至 20 日，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同时决定以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六、七、八、九、十，5 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团为围城部队。当即还发布命令：“为保卫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找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5]从 6 月 25 日起，围城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对长春正式进行封锁围困。在城外方圆 50 里

---

① 肖劲光：《解放长春》。《辽沈决战》（上），第 406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 1 版。

② 《阵中日记》（下册）第 789 页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③ ④ 《六月十五日吉林高级干部会议纪要》，《阵中日记》（下册），第 790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⑤ 肖劲光：《解放长春》，《辽沈决战》（上），第 407、409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的地面上，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在一、二线阵地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封锁线层层密密，纵横交错，双方碉堡相对，声息相闻。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在回忆录《解放长春》一文中说："除了有环城交通沟保持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系外，各部队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我军一兵一卒；但在地下面，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敌不过百把米，敌人吃什么饭都可以看清。"[1]

面对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的军事围困，国民党守军"剿总"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采取了"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策略。围困之初，国民党守军频繁出击，仅7月上旬就达6次之多。据《阵中日记》记载：7月3日至6日，国民党守军约1个团的兵力，向谭家营子独七师阵地冲锋3次，均被击退；新三十八师约1个团的兵力，向独十师据守之绿园、石虎沟、孟家店一线作试探性出击；新七军和保安旅约2个营，在迫击炮掩护下，向谭家营子及宋家洼子西北角三合屯等地进攻，均被击退。[2]7月7日至9日，国民党守军向独十师各团阵地出击，被击退；国民党守军出动1个团向独七师谭家营子一带阵地进犯，冲锋3次，均被击退。[3]7月10日至12日，国民党守军纠集暂五十二、暂二十一、暂六十一、新三十八师各约1个团的兵力，于6日晨在炮火掩护下，分别向西南、正南、东南3个方向出击，激战至下午，各路均被我击退。[4]面对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国民党守军损失惨重，不敢贸然出击袭扰。10月2日，蒋介石命郑洞国所部配合沈阳"国军"主力西进援锦时，率长春

---

① 肖劲光：《解放长春》，《辽沈战役》（上），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②③④ 《阵中日记》，第819、823、827、102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守军相机突围。从 10 月 3 日至 6 日，国民党新编第七军主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多次轮番向绿园一带出击，均以失败而告终。鉴于国民党守军的大肆出击有突围的迹象，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铁岭以北，长春以南及周围之十二纵队以及各独立师，统归一兵团肖劲光、肖华指挥”。[1] 从此，在长春以南，铁岭以北的这一地段，人民解放军集中了 2 个纵队、10 个独立师、19 个独立团的重兵，以防突围和便于阻击。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围困长春 3 个多月中，国民党守军共出击 30 余次，损兵折将 3 000 余名，企图撕开封锁线，重新占领机场和向南突围的迷梦，终成泡影。

3、经济封锁与战时经济体制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对国民党长春守军实施军事手段包围之，经济手段困扰之，政治手段瓦解之，是中共根据当时决战方针的确立，所采取的战略决策。

固守孤城，历来为兵家之大忌。郑洞国明知此举是走向败亡之路，但因受命于“国府”，也只好在此“固守待援”了。为了固守长春，10 万守军的吃粮成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据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当时“在卡哨内的人口约为 40 万人，郊区约 20 万，加上 10 万部队和军政人员，民食军糈，每日消耗很多，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就谈不到久守。”[2]为了储备粮食，在解放军围城之初，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在郑洞国的授意下，大量发行现钞，以支付抢购粮食的需用。国民党守军于 5 月中旬借军事出击之机，大肆抢劫粮食、牲畜和柴草，长春四郊

---

① 《阵中日记》第 827、1022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②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72、74 页。1985 年 1 月。

村屯无一幸免，同时，在市内用高价大量搜购粮食。到5月23日，共抢购军粮300万斤，加上尚传道从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扣买下存于长春的100万斤大豆，总计约400万斤。国民党市政当局还派员在全市进行户口清查和存粮登记，调查结果表明，全市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1]面对缺粮挨饿的慌恐，粮价急剧上涨。据长春市政府长秘一字860号签呈称："查近日本市粮价突然上涨……其主要原因如次：一、粮食存量有减无加，致供不应求，粮价难免上涨。二、采购军粮甚为急迫，团以上各单位均领到大批现钞，直接向市内粮米商出高价收购，因而刺激粮价上涨。三、商民往卡哨外购粮，出入均受限制"等等。[2]这里所说的"出入均受限制"，即指解放军的经济封锁。然而封锁之初，由于防堵不严，一些接合部和地段，粮食走私甚为猖獗。据双阳县委调查："最厉害的是经过新立城的伊长公路及伊通河两岸，在6月15日以前，每日有五六十石粮食流入长市。据难民谈：走私的人每帮二三十人。据说范家屯方向也是走私的要道，封锁后近来较少，多是夜间活动。最近20天来，奢岭区查获走私粮食即达8石之多。"[3]

为了断绝国民党守军的一切经济来源，"不给敌人一粒粮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内！"[4]解放军围城指挥部于6月28日，在吉林市召开了围城政工会议。肖华指出："长春约有60万居民，10万敌军，如果我们在空中陆上断绝敌人的生活资料，严禁城外食粮输入，不让长春与市外来往，这样经过两三个月后，敌内部情况定会发生剧烈变化，将会造成敌人的饥饿与困难，军民交困，军掠民怨，士气瓦解，社会秩序发生骚乱，生存条件为我操纵，这时也将是我大举攻城的有利时机。"[5]围城

---

①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74页。1985年1月。

②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3—3—21号卷。

④ ⑤《围城简报》第一期，第1、4、35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政工会议确定在三个方面进行陆上经济封锁，(一)粮食、菜蔬、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的生活资料。(二)断绝敌我区人员来往及亲朋商业关系。(三)肃清土匪敌特活动及一切走私爪牙，严防破坏分子钻入我区。在上述三点中以断绝粮源为第一要务。同时确定长春外围25公里内为封锁地带，由围城部队及各县区武装、民兵、自卫队为第一线。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为第二线。使军事封锁与群众封锁相结合，造成一个严密的封锁网。

断绝进入长春市的粮源，并非易事。合围之初，国民党守军征粮机关每日能购到二三十吨。主要是因为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封锁线距城太远，且市内粮价奇高，布匹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走私者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处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据《围城情况简报》报道：仅双阳县万宝山区3天之内没收走私粮，计2万多斤。[①] 为了断敌粮源，防止走私，解放军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30%（后为50%）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入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②] 为加强经济封锁，围城政工会议还规定：（一）敌我经常争夺的地区，要将地主存粮搬入我区保管。（二）在我区一律禁止使用白票。（三）以县为单位在封锁区内进行户口调查登记，重发新居住证，过去国民党发的居住证、身份证，一律收回焚毁。今后无证明的黑户不得收留。（四）严防敌人疏散市内人口。（五）严格部队的粮食制度，防止以粮换物。[③] 后来，在封锁区又实行粮食统制。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

---

① 《围城简报》，第1期，第5、17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② 林彪、罗荣桓、谭政：《围困长春报告》（1948年9月9日）。

③ 《围城简报》第1期第5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人民政府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口粮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1]由于实施军民联合封锁，严禁走私，致使国民党守军军粮日缺，士气低落，逃亡者日增，社会秩序已渐陷混乱，人心浮动，朝不保夕。郑洞国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2]

面对解放军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郑洞国曾联名两军六个师长电呈蒋介石，沥陈艰困情形，请速派援军及空投粮食。而蒋介石于7月初来电，却叫郑氏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3]如此一纸电文，郑氏心里明明白白，蒋介石不仅不派援军，就是空投粮食也难以保证，因而便向饥饿的长春人民施以杀民养军政策，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以维持其最后的统治。

1948年6月15日，经尚传道会同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和省府参事兼兵团政工处长王中兴草拟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6月22日，正式发布了《长春市战时粮食管制办法》。同时，还设置了由兵团司令部、吉林省政府、长春警备司令部、长春市政府等联合组织的长春市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由尚传道任主任委员。该《办法》管制的粮食种类有：大米（包括稻子及粳子）、小米（包括谷子）、高粱、高粱米、包米、大豆、小豆、豆饼、面粉、小麦，计10种。并规定："前条所列之粮食，不论为军粮或民食，不论为自存或代存，凡散在本市之商店民户及各公私机关团体学校者，均须予以登记。"由"政治工作大队"和"战时工作总队"派员协同区保指导员逐户

---

①② 林彪、罗荣桓、谭政：《围困长春报告》（1948年9月9日）。

③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79页。

清查登记。《办法》第七款规定："凡经存粮登记者，每户按其户籍登记所载之人口，每人每月以 45 市斤计算"，"准其存留……三个月之食用粮"。"如有多余，称为余粮"，"余粮"应由政府"征购"。[1] 对"登记不实"或"隐匿"不报者不仅要受到从重惩处，所"查获"之"私粮"还要"全部没收之"，并奖励"告密检举"者。市政府还同时印发了《没收粮食处分书》，其款式如下：[2]

没收粮食处分书

长春市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　字第　号

查　存有左列之粮食未能依法登记根据战时粮食管制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予以没收处分。

粮别								合计
数量								
所有人姓名								
处置								
备考								

右给　收执

兼主任委员　尚传道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7 月 15 日，经告密人检举，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张国卿派员查封锺华区七保十五甲六户居民李树彦余粮 2 000

① 《长春市政府代电》长秘字第 2128 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94 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4—8 号卷。

斤。[1] 8月4日，查封头道街正兴保四甲住户陈富山余粮5 023斤，“押送据点仓库”。[2]如此存有“余粮”者，在当时仅为少数，而多数居民早已断炊。所谓清查“余粮”就是公开抢夺市民手中仅有的一点活命粮。据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政工处第二课中校代理课长陈运刚在《孤城末日》中回忆：“征购余粮时，交给我们民政部门的任务是带领士兵到各区，分保甲挨户搜查。我也带了一组人到二道河子某街查粮，每到一家，先叫自动交出余粮，实际上是进屋就翻箱倒柜，用抢托敲击地板墙壁，检查有无夹墙地窖，如发现粮食，哪怕是少量的，也尽数拿走，根本不给钱。如要反抗，动辄打骂脚踢，甚至刺刀枪托相向。”[3]饥饿的国民党士兵，只要看到哪家老百姓的烟囱冒了烟，便蜂拥而至，把煮熟的饭抢吃一光。尚传道竟然在报纸上提出“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的号召，引起了这些士兵的强烈不满。尚氏还根据郑洞国的批示，发布告处决了3名被查获抬高粮价的“不法”商人，成了这一反动政令的牺牲品。[4] 而几十万市民则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搜刮民食，杀民养军的政策，致使粮价腾贵，一日三跃。据《长春分行关于长春市市场行情的报告》中统计：[5]

年	月	日	高粱米	（东北流通券）
37	7	23	160万元	
		24	180万元	
		26	350万元	

---

① ② 长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稽查字第196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101号卷。

③ 《新七军投诚》，第341页。《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

④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81页。

⑤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4—65号卷。

	27	400万元
8	11	730万元
	12	950万元
	14	1 000万元
	16	1 900万元
	17	2 000万元
	18	2 100万元
	26	3 000万元

至长春解放前夕，每斤高粱米高达3亿元之多，而且是有行无市。饥饿的市民以草根树皮为食，饿殍遍地，死尸横陈，奄奄一息者触目皆是，长春已成为一座人间地狱。

由于粮价暴涨，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已无法应付庞大的军政开支。据民国37年7月28日《长春中央银行各军政机关借款明细表》统计，从是年6月10日至7月28日，长春第一兵团司令部、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东北军粮筹购委员会长春分会等11个单位，累计借款5 117 100百万元。[①]又据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于8月2日电告中央银行总行，仅军粮一项每日即需6 500亿元之巨。[②]为弥补现钞之不足，郑洞国以长春最高军政长官的名义，强令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印制发行面额更大的流通券本票。最初，发行的面额30万元1张，继而发行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1张的，迅即增至1．2亿元1张。到长春解放前夕，还发行了不定额本票，截止10月6日已发行13种，

---

①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4—114号卷。

总额达 831 133 亿元。① 为了赶制军方日需本票 6 000 亿元，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不得不"逐日发动全体员工昼夜赶制"。② 这些大额本票的流通，使长春的金融和经济生活完全陷入了绝境。国民党守军用这些大额本票抢掠市民手中仅有的活命粮，而人民得到的却是一张废纸。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民谣说："本票、本票，几千万元买不到一个烧饼、半根油条；揩屁股不顶用，买手纸也买不到。③

长春滥发天文数字的大额本票，坑害了数十万长春市民，却中饱了国民党军政官员的私囊。他们利用关内外币价的悬殊差额，通过长春银行，将捞取掠夺的成百亿、上千亿的大量款子，汇往北平、上海、南京、湖南、广州等地，大发横财。从 6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汇往关内的款项达 8 600 亿元。④ 6 月份，长春交通银行汇往天津、北平及其他各地的汇款计 890 亿元。⑤ 中央信托局长春办事处汇往关内的款项达 9 500 余亿元。⑥ 据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列表统计，6 月 8 日，新七军官佐 500 人三笔汇款计 13 亿元之多。⑦ "这几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关内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⑧

粮食管制和发行大额本票，遭难的是春城百姓，饿死的也是春城百姓。据尚传道回忆，"市属人员没有饿死者"，"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⑨ 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不顾百姓的死活，照样灯红酒绿。大特务头子保密局北满站长项乃光

① 张庆文、曹俊卿、王哲：《中央银行本票》，《长春文史资料》1988 年第 5 辑，第 179 页。

② 民国 37 年 8 月 2 日，中央银行长春分行电告中央总行，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4—114 号卷。

③ 张荣东：《国民党六十军之参加内战及起义》，《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④ ⑤⑥⑦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4—91 号卷。

⑤ ⑧⑨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 404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版。

把从卡哨外抢来的一批羊大摆全羊席，招待郑洞国以下所有头目；第一兵团少将副官处长罗寿安及一些军官娶妻纳妾成风。他们双双出入金店、绸缎庄和饭馆，大摆延席，宴请宾客，跳舞通宵，挥霍无度，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1]

郑洞国推行的以“征购余粮”和发行大额“本票”为核心的战时经济体制，已将市民手中的活命粮搜刮殆尽，军糈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在大房身机场和宽城子机场相继为解放军占领后，空运已完全终止，郑氏为了“固守待援”，也只好依赖于空投了。

6月11日，长春国民党守军组成了空投接收委员会。分设两个空投场地，新七军为中山公园，六十军为南岭运动场。东北“剿总”和设在锦州的后勤总部第五分监兵站总监商定，每日空投长春10万斤军粮。每架大型运输机最多可载6.000斤，按10万斤计算，每日尚须17架，才可分到守军每天每人1斤粮食。据郑洞国在《困守长春始末》一文中回忆：“开始每天还有11—12架飞机来空投，以后减到每天3—4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这点粮食对于10万大军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尤其恼人的是，空军与新七军曾有摩擦，因此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2]在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对空炮火的有效控制下，国民党空军只好高空盲目空投，有的飘落到解放军阵地上。7月12日至25日，解放军拾得大米155包，衣服28包。仅9月5日就有389包之多，为围城部队所获。[3]国民党空军开始向长春空投时，仍使用降落伞(每伞100斤)，后来降落伞用光，则改用50斤一麻包直接空投，因而砸坏了不少民房。居住在西四马路191、189号居民张学曾和张占

① 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88页。

② 《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第215—216页。

③ 《阵中日记》第90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武之房盖均于9月21日午后3时40分被砸坏，虽经呈请修缮，而当局的答复竟是"暂不修理"，[①]一些居民因祸从天降而被砸死或砸伤。据目击者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部警卫连长刘震坤在《困守孤城的点滴见闻》一文中回忆："有一天我在四马路亲眼看到一个三轮车夫被空投的大米袋子砸死，真是祸从天降！他的妻子儿女哭得死去活来祈求用这袋米换些必要的东西来安葬死者，而狼心狗肺的纠察队竟把这袋米抢去了，实在令人发指。"[②]为了活命，国民党守军之间因争抢空投粮食和物资，经常发生冲突，乃至械斗。尽管郑洞国和曾泽生以司令官的名义发布命令："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③]但已无人听命了。到了9月，东北"剿总"声称"机油两缺"，而完全终止了空投，使国民党守军赖以生存的唯一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由于空投中断，处于饥肠辘辘的国民党士兵只能以酒糟、豆饼和野菜充饥，多数人浮肿，患有夜盲症。10月3日，郑洞国抽调新七军新三十八师和六十军一八二师向绿园方向突围，企图夺回机场或突围南下，在解放军强大火力的阻击下，国民党官兵终因饥饿过久，体力不支，不敢恋战，而败退市内。

在军事打击下屡屡败阵，在经济封锁下忍饥挨饿的国民党守军，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政治攻势，更是人心浮动，分崩离析。

4、政治攻势与巩固内部

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是三位一体，同步进行的，是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的重大决策。长春国民党守军是由中央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3号卷。

② 《新七军投诚》，第360页。《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③ 郑洞国：《困守长春始末》，《新七军投诚》，第216页；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4—72号卷。

嫡系部队、云南地方部队及土匪和伪军所组成，相互间矛盾甚深。潘朔端和王家善的起义对守军震动较大，对人民解放军的声威和优俘政策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以后，由于屡屡败北，因而征丁拉夫抓了不少东北籍新兵。这些新兵与解放区有着各种社会联系，他们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关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因而对蒋介石打内战心怀不满。经过军事围困与经济封锁，国民党守军士气低落颓丧，惶惶然不可终日。

鉴于上述情况，1948年6月28日，肖华在吉林召开的围城政工会上《关于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提纲》中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要求围城部队"要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减少甚至瓦解敌人的战斗力，求得达到夺取长春的军事目的"。[①] 8月17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围城中几个问题》中指出："政治攻势的重点是宣传攻势，而以目前长春外围之阵地对峙情形，宣传工作中喊话应成为主要方式，因喊话内容可根据具体对象灵活规定。"[②] 从此，在前沿阵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

国民党军新三十八师是守军中的主力，是过去远征军之一部，待遇优厚，正统思想较深，也比较顽固。但他们远离家乡，不愿打内战，因而思乡心切。该师一一二团与解放军二、三部队二十九团相距近在70至80米，远则200多米。为了在近距离有效地对守军进行喊话，减少伤亡，于是将直形喊话筒改为弯形喊话筒。有的群众看到话筒时笑着说："这个大喇叭就够三十八师受，怪不得兵都往这边跑。"解放军战士则说："这个筒子比三八式步枪还顶事。"[③] 二十九团针对新三十八师的内部情

---

① 《围城简报》第1期，第5—6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② 《围城简报》第2期，第5、22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③ 《围城简报》第2期，第22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况，进行了针对性的喊话宣传。解放军喊话人员抓住对方喊话中的矛盾，予以揭露和反击。

——“八路军弟兄们，过来吧，我们这里吃大米白面。”

——“三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长官说你们吃的是大米白面，你们吃的是大米吗？不是黄豆吗？”

——“八路军弟兄们，投诚到长春来，愿干的干，不愿干的有路费送你们回家！”

——“三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自己能离开长春一步吗？你们能出来吗？”

——“我们有飞机，我们用飞机送你们回家。”

——“三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的飞机能落下吗？我们的高射炮早把它打到云彩上面去了，它敢落下来吗？”[①]

在解放军喊话人员的有力反击下，守军宣传队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他们恼羞成怒，就找来一批妓女进行低级下流的色情宣传或进行扰乱喊话。他们让妓女唱流行歌曲，喊什么“八路哥哥呀，你们过来吧，我们等着嫁你呀”。扰乱不成，就大喊大叫，大骂大打。[③]

8月19日，围城指挥所又发出政治攻势突击周的指示，提出要个个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大家想办法，检查过去，表扬好的，批评坏的，针对具体对象进行工作。于是军民联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解放军各围城部队动员发动了广大群众和干部战士，特别是前沿部队及长市难民，长春外围群众，包括老头、小孩、妇女、学生，利用了逃兵、蒋军家属、俘虏等，都参加了政治政势。独八师二团八连全连170余人，即有110多人参加对守军的政治攻势。[②] 在配合喊话的同时，还制造

---

① 关青晨：《打败敌三十八师的政工队》，《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第153页。

② 唐天际：《三个月的政治攻势总结及今后政治攻势任务》，吉林省档案馆档案72—6号卷。

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和宣传单，据统计有54种之多，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通告》、《通行证》、《告长春市工商业界的同胞们》、《给蒋军中一切有正义的军官们指出大道》、《三条路走那条》、《人民解放军对放下武器蒋军官兵一律优待》、《告蒋军兄弟们》、《告长春市民书》、《天下穷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等。[1] 现将《告长市蒋军官兵书》抄录如下：

蒋军官兵弟兄们：

你们在蒋政权压迫与欺骗之下，离开了父母妻子，抛弃了可爱的故乡美丽的田园，出生入死，忍饥挨饿，为美国的走狗大卖国头子蒋介石争地盘打江山。我们是非常的同情你们这种痛苦，想你们家里的父母是如何的盼望着你们早日回来。我们坦白的告诉你们，为了要消灭蒋政权，为人民造幸福，在战场上不能不向你们开枪，这是我们感到很痛心很遗憾的事情。

现在蒋介石正看着锦州要垮，东北整个就被解放，又叫你们捏着三四个月以来每天吃半饱的肚子向沈阳逃跑。可是要知道放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在你们向沈阳退却的途中被解放军整个歼灭或者缴械。假如侥幸的逃到沈阳，可是沈阳的食粮和长春又是同样的缺乏，还是吃豆饼、糟糠，日后沈阳又要逃跑，那时你们再逃到那里呢？第二是在长春饿死冻死，因为锦州不久就要解放了，那时长春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空投遮断，除了一些大官有吃有喝，能玩能乐，你们这群可怜的低级干部和士兵们那能有吃的烧的呢？还不是束手饿死冻死吗？第三是你们投诚或者武装起义投奔解放军，反正回到解放区来，我们对于反正过来的蒋军官兵绝对不杀害不处罚，愿安家立业的，我们给开路条拿路费可以自由回家，并可同样分到土地和房屋，愿给干事的给介绍工作，愿求学的可以进学校。如果携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 案20—2—46号卷。

带武器和军事品过来的一定受到优待和奖励，我们是以最大的诚意欢迎你们悔过自新，放下武器回到解放区来，不咎前非。请你们闭上眼睛仔细想一想这些悲惨的情形吧，是替老蒋卖命到底呢？还是投奔解放区早日放下武器，回家团圆呢？望三思之。①

解放军中长部政治部
长春地区前进支部

为向守军输送宣传品和宣传单，解放军围城各部队群策群力，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打宣传弹、制造宣传船、放孔明灯，利用伊通河和南湖将宣传品飘放至城郊或城内。同时，还采取了给前沿守军送饭，阵地联欢和送伤放俘，中秋节送月饼等办法，有效地削弱了守军的战斗力。据时任国民党一兵团司令部警卫连长刘震坤回忆："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一位解放军指导员带领4名战士，扛着大米、荞面、猪肉、月饼等，通过哨卡来到洪熙街据点……。解放军指导员落坐之后，和蔼地说道：'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没有带武器，不是来打仗的，我们来一不想谈军事，二不想谈政治，我们只带来了一点礼物，想和你们一起过过节，唠唠家常。'解放军这样做，既体现了共产党对在国民党压榨下的士兵们的关怀，也说出了全国人民大团圆的真诚愿望，在场士兵无不感动之极。"②当时，在长春市内到处都可见到解放军的宣传单，其中《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尤为守军官兵所重视，妥善收藏，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出路。另外，还选择逃兵降兵俘虏中有条件者进行打入，同样是瓦解守军的有效办法。据围城以来二个月的统计，仅西线部队经过派遣人员拉出的人数计有459人，集体投诚共11次。③

---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2—46号卷。《中国共产党长春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第59页。

② 《新七军投诚》，第361—362页。《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③ 《围城简报》第4期，第6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在政治攻势中，做守军内部，尤其是对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是瓦解守军另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六十军的前身滇军，系云南地方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国民党六十军，曾参加过台儿庄、武汉、长沙会战，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令六十军入越南受降，同时发动了“昆明事件”，逼龙云交出云南军政大权。1946 年 4 月，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在东北战场两年半的时间里，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起义，暂二十一师损兵折将，败绩累累，军心浮动，撤退吉林，困守孤城以后，受虐待岐视，已陷入绝境。

为争取六十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曾先后派共产党员张天虚、周时英等到一八四师工作，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发展了部分党员。1944 年底，中共云南地下党派遣联大、云大孙公达、陆飞、赵雄等进步学生经中共地下党员骑兵搜索营营长杨滨安排，分别到营、连、排工作，后来均调派至军部机要岗位。

1946 年 4 月，六十军陆续到达东北。6 月中旬，中共中央由延安派往东北工作的刘浩在六十军驻地抚顺会见了杨滨、王立中和孙公达等地下党员，建立了与中共的直接联系。[①]据杨滨《在六十军做地下工作的回忆》：刘浩“对今后的工作做了以下几项决定：第一，具备党员条件的，分别逐个地发展入党（很快地解决了孙公达、陆飞的组织问题）；第二，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不满情绪，适时进行煽风、泄气、搭桥与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的工作；第三，注意搜集重要的军事情报，以配合我军作战的需要；第四，建立地下交通；第五，有选择地进行中上层军官的策反工作”。[②] 为使刘浩能经常往来于六十军

① 刘浩，云南人。1946 年 4 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刘浩等到东北做滇军工作。行前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接见。到东北后，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

② 《长春起义记实》，第 288—299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和九十三军等处，改刘姓赵，并挂了个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的头衔。从此，内外接上了关系，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1947 年 7 月，六十军在梅河口、磐石等地损兵折将以后，开始移住吉林市及其近郊。刘浩经六十军部副官处副官长兼特务营长杨滨（中共地下党员）“搭桥”，[1] 会见了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递交了东北军区领导人和潘朔端写给陇耀和曾泽生的亲笔信，介绍了中共的政策。应陇耀的要求，根据东北军区的指示，吉林省军区放还了暂编二十一师 200 多名被俘军官，在六十军内部产生了积极影响。[2]

1947 年 10 月，为加强瓦解六十军的工作，成立了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刘浩任处长，杨滨任副处长。1948 年 2 月，前方办事处到吉林外围活动。3 月 8 日，国民党六十军撤守长春后，办事处收容并遣送了 30 多名没有来得及随军撤走的中下级军官家属，在六十军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同妻儿团聚后，非常感动，主动给解放军写信说：“国民党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全家团圆；国民党抓住共产党的家属，不是扣作人质，就是枪毙、活埋，共产党收容我们的家属，处处优待。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国家忠良。”他在信中还表示，今后绝不再干坏事，绝不再打共产党，争取早日投靠人民。后来曾 3 次向解放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参加了长春起义。[3]

1948 年 4 月，经东北军区批准，“从解放团选择了经教育表现较好，与曾泽生、陇耀等六十军将领关系较深，在中下级军

---

① 杨滨当时化名杨重。1947 年下半年返回解放区，六十军地下组织由孙公达负责。

② 刘浩：《争取滇军工作的回忆》，《长春起义纪实》，第 255、257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③ 刘浩：《争取滇军工作的回忆》，《长春起义纪实》，第 257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官中有一定影响的六十军被俘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何尔寿，团副夏绍文，营长张士勋等，以放俘的形式遣回长春”。[①] 这些人回到长春以后，在六十军的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六十军中以孙公达为首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为六十军的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围困、经济封锁的密切配合下，国民党守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逃亡者与日俱增。据解放军第一兵团副政委唐天际在《围城敌工会议上的总结》中说：“自6月25日起到9月15日止，80天中共计收容敌逃兵13 500名，其中新七军3 439名，六十军3 821名，土杂部队6 240名。”“按月计9月1日至9月15日，共收容敌逃兵3 130名，每天平均208名，比7月份每天增加93名，比8月份每天增加28名。”[②] 国民党守军的大量逃亡，加速了内部的瓦解与分化，加速了国民党统治者败亡的进程。

9月23日，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召开了围城敌工会议，布置了第二期政治攻势，指出了今后的政工方针：除继续开展对敌猛烈宣传攻势，大量瓦解敌人外，特别强调组织蒋军战地起义工作，创造内应外合的条件。会议强调，政治攻势是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要“下本钱，用干部，拉长线，钓大鱼”。[③]随着对守军政治攻势广泛深入地开展，从9月16日至30日，又收容逃亡蒋军2 407名（缺两个师的报告）。[④] 围城部队“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斗争策略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军事手段最后夺取长春，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政当局面对解放军围城部队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

① 《长春起义纪实》，第25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② ③ 《围城简报》第4期，第1、2、15、52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1—6号卷。

④ 《围城简报》第4期，第1、2、15、52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6—6号卷。

所造成的士气颓丧，逃兵激增的严峻局面，为巩固其内部，做最后的垂死争扎，采取了举办各种训练班、在政府及官兵中推行联保连坐、实行白色恐怖屠杀革命志士、驱赶市民于卡哨外等反动措施，以维护其最后的反动统治。

举办训练班组建各种团队 在困守长春期间，国民党军政当局为提高士气，加强对内部的控制，曾举办了各种训练班。1948年4月，开办了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从吉林撤守长春的公教人员及长春市政府减编下来的人员共400余人。结业后，约有一半人员编入“长春市战时工作总队”，由尚传道兼任队长。该“总队”成员分别担任各区、保指导员，宣传反动政策，密查“嫌疑分子”，潜入解放区进行谍报活动。“这些人成为困守中的基层骨干，直接骑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1]是一支反动的别动队。5月，新七军在伪满满炭大楼旧址，举办了连排长级干部训练班。共举办4期，每期10至15天。训练期间除讲军事课以外，“还竭力掩盖当时惨败的现实，大谈东北战场上日渐‘有利于国军’的‘大好’形势，借以稳定军心”。[2]7月至9月，郑洞国在励志社又开办了两期兵团干部训练班，调训两个军师长以下受训。“主旨也在于继续灌输反动毒素，维系士气，加强团结，企图贯彻长期固守的方针。”[3]长春市教育局长佟贵廷秉承市长的旨意，也办起了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尚传道竟然要求教师们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做到“围城之中，弦歌不辍”。为了防止市民和学生们“闹事”，国民党当局还强制组建了“幼年兵团”。据《长春市民众编组办法》规定：年满6岁至12岁之儿童要编入“儿童队”。年满13岁至17岁

---

① 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② 彭云鹏：《我在兵团部特务团》，《新七军投诚》，第354页，《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

③ 《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之少年要编入“少年队”。年满18岁至45岁之妇女要编入“妇女会”。年满46岁以上之男子要编入“父老队”。年满46岁以上之妇女要编入“姥姥队”。[1]总之，一切人都要纳入编队之中，听命于反动当局，不得违抗。只有参加编队者方可佩带当局发放的“符号”和“通行证”，否则不准在市内通行。国民党当局尽管用各种手段强制民众于编队之中，以巩固其统治，但人心却难以强制，他们企望着和平和解放。

发布反动政令严防中共渗入 在解放军围城部队开展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副司令官曾泽生于5月28日，以“极机密”件令长春市政府。内称：“迩来长市潜伏奸匪甚多，乘机活动。希望严密防范并彻底清查户口，实施联保连坐办法。”并要求“对各通讯机构要地，如电台、电信局总机等及械弹油料仓库等处，须即饬加强警戒并构筑必要工事，以防意外。”[2]同时，郑洞国、尚传道又以吉林省主席和委员兼民政厅长的名义，转发了国民党政府于民国37年3月23日发布的《戡乱时期地方行政首长防匪保境奖惩条例》。[3]8月2日至16日，吉林省政府又分别转发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行政院关于《严密防范各大学毕业奸党分子渗入政府各部门潜伏工作》的训令：训令要求各政府机关及国营事业机关在任用本届各大学毕业生时，“须先送各校所在地青年运动委员会严格审查同意后，确无奸党嫌疑始得任用”，同时规定必须有介绍人“切实能保证无奸党嫌疑”。即或任用，所在单位保卫小组还要对其“加紧注意”。[4]8月16日，长春市政府向政治工作大队发布了“为洪熙街哨口外有化装破烂商之毛匪工作员仰注意防范”的训令。国民党军政当局为防止中共渗入，曾于民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70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2—140号卷。
③ 长吉民拳字第567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1号卷。
④ 长吉秘人字第1618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2号卷。

国35年7月8日就公布了《防止奸匪活动暂行办法》。其中第三项规定："如有执迷不悟甘心为匪传递消息并予掩护者，一经查获，以通匪论罪。"[1] 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中共的策反工作十分惶恐，他们大肆抓捕"通共"的"嫌疑分子"。据原吉林省保安旅步兵第一团上尉军械员李壮飞回忆："9月间，某连抓送到团部一个50岁的老太太和一个30岁的妇女，说是她俩在市场对士兵宣传投降的话。第三天早晨，她俩就在宽城子被我团派兵活埋了。我目睹了这一凄惨场面。"[2] 国民党军政当局还经常派出巡察队在长春火车站至大马路间的街道，对过往行人进行检查，有时一天之内就抓捕10多名没有带身份证的百姓，送交派出所进行查处。他们不仅到处抓捕百姓，就是对报童也不放过。原长春警备司令部直属第三、四巡察队上尉队长王世廷受安震东之命，抓捕报童30余名。他们利用威、逼、哄、吓等各种手段，让孩子们承认贴了"反动标语"，并交待出指使者。"这些孩子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小的才十一、二岁。有的被吓哭了，有的吵着要东西吃，有的要上厕所，一时间乱成一团"。后来，"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于是，我命令士兵把抓来的这些报童全都放了"。[3]

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推行联保连坐 1948年5月4日，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发布了民户字第128号《为限期取具所属公教警员工联保连坐切结令》。在其《联保连坐取具方案》"实施要领"中规定："本府以科（室）为联保单位，全体职员向科（室）主管长官出具联保连坐切结书。主管向所属局（处）长出具联保连坐切结书。各局处长再对市长出具联保连坐切结书。战

---

① 警备字第95号。长春市档馆档案历23—1—35号卷。
② 李壮飞：《我在保安旅一团的见闻》。《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399页。
③ 王世廷：《长春警备司令部巡察队》。《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464页。

时工作总队、民众自工队队员及警察队员警以 10 人为一组，学校教员及政府所属单位工友每 5 人为一组，分别向主管出具联保连坐切结书。切结书一式两份，一份存各属主管，一份呈送市长。”[1] 5 月 22 日，长春市政府根据吉林省政府的训令，政府各机关职员都必须填报《职员特种保证书》。在《特种保证办法》中规定：“职员每三人为一连保小组”，“连保人应相互监督，彼此之言语行为随时向主管密报，连保小组内有人违反保结情形，同组人不事前告发者，应负连坐责任”。[2] 这里所说的“违反保结情形”，即指《联保连坐规约》中所规定的六条：“一、有煽惑反动思想或暗行破坏政府组织及散布谣言者。二、有为奸匪或与共匪有勾结行为或藏匿共匪侦探工作人员者。三、有泄漏公务之秘密者。四、有侵占公有物或贪污情事者。五、有规避兵役或隐匿适龄壮丁不报者。六、有隐匿军火不报者。”[3]在上述六条中，尤以一、二条为重要，凡《保证书》及《连保保结》中，均将“不参加共产党”写入其中。现将当时已填报的《职员特种保证书》抄录如下：

职员特种保证书

被保证人姓名　　马和平

年龄　　三十

性别　　男

住址　　建国胡同 403 号

职务　　战工队队员

今保得右开被保证书人不参加共产党及有危害国家或有违背政府之组织及泄露职务上机密之行为，如有违反，愿负法律上一切责任。

---

①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46 号卷。

② 长吉秘人字第 493 号。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3—1 号卷。

具保证人姓名　杨仁晖（印）

职业　新七军司令部中校秘书

陈鸣人（印）

新三十八师少将副师长

（如系商店保，应具商店各地总经理姓名，商店图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三日[1]

这里出具的“特种保证”，系指“所任职务有特殊情形者”，如政府职员、战工队队员等，此等人员必须由本部、署、处、局较高官员二人或所在地殷实商店一家负责保证。同时，还要出具连保保结，方为有效。现将当时呈缴的连保保结抄录如下，以为佐证。

长春市政府职员连保保结

今刘全魁、于世功、张登甲、孙焕亭四人愿具连保保结，互相保证均不参加共产党及有危害国家之行为或违背政府之组织，如有违反，甘愿受连坐处分，谨呈。

具连保保结人　一等警士于世功（印）

一等警长张登甲（印）

二等警士孙焕亭（印）

二等警长刘全魁（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八日[2]

国民党军政当局想以此种“联保连坐”巩固其内部，实行法西斯统治，尽管能奏效于一时，但随着江河日下，人心背向，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了。

---

①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95号卷。

②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87号卷。

在军队中，均实行“连坐法”，每3人为一组，1人逃跑，其余2人则挨打；2人逃跑，剩下的1人则被枪决。国民党守军还规定，凡超过哨卡30米外，“如发现外出军人，任何人都有枪杀之权”。凡抓回逃亡者，无论带枪与否，均予枪毙。① 据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部警卫连长刘震坤回忆：“有天晚上，一个叫李桂林的士兵，听完解放军喊话后，因思亲情切，归心似箭，便偷偷地顺着解放军喊话的方向跑去，不料被哨兵发觉，将李桂林抓回，当即就枪毙了。”②

“连坐法”的实施，不仅没有控制住守军的逃亡，由于国民党官兵预感到蒋家王朝的覆亡，反而更促成守军成排成连地携械投诚和逃跑。仅中秋节的第二天，六十军一八二师第五四六团就有31人投诚。新七军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七连逃出士兵26人，其中班长唐国华把全班都带出来了。当时在长春守军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连坐法办，促成集体投降；杀身成仁，变做保身倒蒋。一批批地跑，一批批地降，打完了，守完了，跑完了。”③

5、卡哨内外

在人民解放军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的打击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已陷入绝境，长春已成为一座死城，一座人间地狱。国民党守军和长春市政府以“肃清奸宄，维护治安，减少食粮消耗”为由，决定从6月20日至6月末，疏散市内人口20

---

① 《围城简报》第3期，第27页。吉林档案馆档案 政72—6号卷。
② 《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361页。
③ 《吉林市文史资料》第3辑，第99页。

万。[1] 在《长春市政府疏散市民办法》中规定：被强制疏散的市民，“不得再行入市”，只准携带“十日份干粮及应用衣物”。当局还规定：“为集中强制疏散时，须于当日晚戒备后，由主办机关秘密执行，并于翌日三时前押出卡哨，送至指定地点。”[2] 国民党长春警备部宪兵队及各警察分局则以此令到处抓人，致使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军政当局还欺骗市民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开放八天”，而将市民大批赶出。[3] 7月末，蒋介石从庐山电令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市卡哨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回卡内。[4] 被疏散的长春市民由军警人员押送，通过东大桥、南关桥、西道口、兴安桥、影城街、南岭等卡哨驱逐出卡。每个卡哨设正副哨长一人，由军政宪警组合而成。“如军方有宪兵负责，政界有政工队负责，民众有警察负责，妇女有女警负责，奸宄有督察处派员负责。并有兵团部、市政府、市政工队、警备部负监督领导之责。”[5] 这些卡哨盘查人员如同凶神恶魔，将出卡饥民身上携带的一点救命干粮搜劫一空，然后驱逐于国共双方卡哨的中间地带，也叫“卡空”。

卡哨内人间地狱 从6月下旬以后，由于国民党军政当局实行“杀民养军”政策，一般居民家中粮食已被搜刮殆尽，开始用豆饼、酒糟充饥。6月26日，“孟家屯集长春难民5万人，每日饿死10余人”。[6] 到7月中旬，豆饼、酒糟也难以为继，只能以吃野菜、树皮度命。据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独九师7月17日报：“长春城内开始死人，已达200”。[7]一些“瘦骨嶙峋的小孩

---

① ② 长春市政府六月十二日签呈。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21号卷。

③ 《围城简报》第1期，第15页。

④ 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⑤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14号卷。

⑥ ⑦ 《阵中日记》第844、91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子，三五成群”，不顾生命危险，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抢搂树叶，该处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有碍观瞻责令哨兵吆喝驱逐，甚至举枪威胁，但也未能制止”。[①] 为强制疏散饥民于卡哨外，当局规定每个警察必须赶走8个人，每个保长必须撵走3户人家。不走者，将没收其全部家产。[②] 据时任新七军第六十一师第二团上校团长姚凤翔在《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一文中回忆："在疏散过程中，有些连病带饿的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有的小孩父母死去，而被遗弃路旁无人过问。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小孩被苍蝇叮满一身，躺在路口等死的惨状。"[③]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长春市民中每一家都有被饿死的，有的全家都无一人生还。开始时，还有人埋葬，后来则暴尸街头。在东大桥及公园僻处，狗吞鹰啄之饿死尸体臭气逼人，惨不忍睹。

每桶凉水已涨至7 000元，折合每茶杯凉水百元。[③] 有井者乘机抬价，饥饿者又无钱买水充饥，在酷暑烈日之下只好眼睁睁的等死。1948年9月，在长春街头竟然发生了卖人肉的惨事。有一天，长春第五医院的军医与一个卖肉的发生争吵，正赶上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到此巡察，并上前询问。军医对张说："我在买肉，这个卖肉的说是狗肉，但我肯定这不是狗肉，究竟是什么肉，卖肉的不肯实言。"于是，把卖肉的带到督察处。在督察处的棍棒、皮鞭下，卖肉的供认："我叫王万富，山东人，木匠。因没有吃的，我每日去市场哄骗孩子，说给他们吃的，把他们领回家，用斧子将他们砍死，骨头扔掉，肉煮出来卖。每个孩子只能有三四斤肉，大部分都是水，卖肉的钱，我再买粮。"嗣后，警备司令部将王万富枭首示众。[⑤④] 王万富是害人者，同时

---

① ③ 《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3页。

② 岳英：《在长春西地区所见》，《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60页。

④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3—33号卷。

⑤ 《长春文史资料》1987年第1辑，第101—102页。

也是被害者，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杀民养军”政策，把春城人民逼上了饥饿死亡的绝路。春城人民为长春的解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卡哨间尸横遍野 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之时，划长春市郊25公里以内为封锁区。这个封锁区，宽25公里，沿环城公路走向，其周长约90公里，这就是国共两军卡哨间的缓冲地带，也叫真空地带。卡哨中间，是土匪横行的天下。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郑洞国曾收编一部分游杂部队，而大部分由地主、日伪警宪、土匪等组成这群匪帮，则被拒之于市外，“让他们在城外自生自灭”。这群匪帮在中间地带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将郊区人民的衣食柴草抢劫一空，逼得人民走死逃亡。6月17日，仅田家油房一家就有7人无粮上吊身亡。[①] 国民党军政当局将奄奄一息的饥民驱赶于中间地带以后，又成为这群匪帮的抢掠蹂躏的牺牲品，使大批饥民死亡于中间地带。据时系天津《民国日报》记者杨治兴回忆：7月间，在二道河子外围缓冲地带，一些小商贩把窝头和玉米粥锁在铁笼子里，以防被饥民一抢而光。一个中年人用一枚金戒指换回一个窝头，给快要饿死的孩子吃。我抬头向前看去，几个赤裸着身子的孩子躺卧在田间道旁，身上落满绿头苍蝇，已被饿得奄奄一息，无力驱赶。离他们不远的高粱地里，横陈着几具发胀的尸体，无人掩埋。更惨的是，竟有人用刀子剜割刚断气人身上的肉充饥。[②] 又据时系第一兵团直属特务团准尉排长彭云鹏回忆：一天，我们连到二道河子区郊外一个村庄找烧柴。“我们发现，该村四周没有一个活人走动，房屋里有的死在炕上；有的虽然一息尚存，但连眼珠都转不动了，骨瘦如柴，躺在那儿静等死神的到来。野外的小路旁、水

---

① 《阵中日记》，第79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② 杨治兴：《在郑洞国将军身边》。《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第367—368页。

沟、空地、大树下等处，都可以看到倒毙在地的饿殍。”“这时，一个士兵发现一条饿狗正在撕咬着什么，一班长用枪将狗打死，走近一看，狗嘴巴里还衔着一根人骨头呢！”后来，把狗装上车带回，成了我们的佳肴。“这真是狗吃人，人吃狗，人狗相食啊！”[①] 在卡哨中间，死尸遍野，经过风吹雨淋日晒，肚皮暴裂，腐臭难闻。卡哨内已经成了悲惨的世界。

光复时，长春有人口 80 余万。国民党当局遣送日侨日俘后，长春尚有人口 67 万。1947 年 8 月，经当局整编保甲时统计，时有人口 630 309 人。后因战局所致，南逃沈阳者络绎不绝，至解放军于 1948 年 6 月 25 日围困长春时，据有关资料考据，市内实有人口 35—40 万。国民党军推行“杀民养军”政策，并于 8 月 1 日大量驱赶市民于卡哨外之后，市内人口急剧下降。9 月 12 日，长春分行给中央银行的第 2957 号电文称：“长市现有市民仅 13 万人，因饥饿惊慌而冒险外逃者与日俱增。”[②] 9 月 20 日，第 3059 号电文称：“长市现在居民不足 10 万人，所有公务人员均冒险外逃。”[③] 又 10 月 4 日第 3296 号电文称：“长市居民仅及军队半数，而物资枯竭。”[③] 根据上述电文中人口之变化，长春解放前夕，仅存市民 5 至 6 万人。

据尚传道在《四进长春》一文中回忆：“1957 年 6 月，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我们参观东北五大城市。在参观长春时，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向我们介绍长春解放前后情况，宣布 1948 年围城期间，长春市饿病而死的达 12 万人，解放军进城后共收尸 8 万余具。”[③]

在围困长春期间，因两军对峙而病饿死亡的百姓达 12 万之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浩劫，是国民党军推行“杀

---

① 彭云鹏：《我在兵团部特务团》，《长春文史资料》1988 年第二辑，第 354 页。
② ③ 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 23—4—65 号卷。
③ 《长春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83 页。

民养军”政策的结果。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用他们血肉之躯为长春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关于“放”与“堵”的论争 长春国民党军政当局用强制手段大量驱赶市民于卡哨外的罪恶行径，早已为中共围城部队所预料。6月28日，解放军一兵团政委肖华在围城政工会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高粮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此我对长春外出人员要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1] 8月17日，解放军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市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于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清楚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乙、不是大肆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饥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

---

① 《围城简报》第一期，第4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72—6号卷。

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处委会。丁、在前线放行之出口，设立检查站，后面设事务所，各师地区设办事处，以上均由军队地方双方参加组成。东地区已由吉林省委组织难民处理委员会，负责整个救济安置处理难民工作。”[①] 1948 年 9 月 9 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 50 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地，死亡即约两千。8 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 700 万跌为 500 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 1 000 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

① 《围城简报》第二期，第 2 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政 72—6 号卷。

稍好。"①

开放之初，围城指挥所和对敌斗争委员会还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对于难民带出枪械的规定是："一挺轻机枪可带出七人，步枪可带出三人，手枪可带出二人。"② 一些市民为了进入解放区，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在城内弄到枪支。据当时系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二团第三营九连文化教员王景春在《难忘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回忆："9月下旬。有一户老百姓从我连检查站出来，他说'我们倾家荡产地花了几十个亿（本票）买了点酒菜，把一个军官请来喝酒，把他灌醉了搞了个这个玩艺（一支手枪，顺手递给我检查站人员）全家来投奔你们的，希望你们救城内的老百姓，早日解放长春'。"③ 据二二部检查站分析，"带枪出来的人，实际多是有钱人和地主"。④而大批被强制出卡的贫苦市民，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饥饿和死亡。

从"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到有条件的"部分放行"是围城政策中关于难民问题的重大转折。而这种转折，是经过残酷的现实与斗争才得以实现的。林彪在其报告中说："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其实，岂止对饥民和战士"很费解释"？就是在高级领导层中，也有不同的意见。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就曾在难民问题上与林彪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现将《周保中将军传》中有关部分的记述抄录如下：

"就在围困长春之际，周保中在如何对待长春市内跑出来的饿得东倒西歪的难民问题上，又和林彪发生了分歧。林彪坚持'外不许进，内不许出，让老百姓和国民党抢粮'的方针。周保中认为，围城已久，城内粮食已空，我

① 《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第150—151页。
② ④ 江平：《介绍二二部检查站》。《围城简报》第2期，第45—46页。
③ 《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113页。

们已有取胜的绝对把握，就应该让外逃求生的老百姓自谋生路，哨卡放行他们。会上，周保中为此积极地向林彪提出建议，林彪没有表态。周保中深知林彪戒心重重，即使和他推心置腹交换意见，也难免招来新的是非。但他仍然果断地来到林彪的住处，诚恳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今天我们围城和明天打进城不都是为了人民吗？现在，眼看长春市内的百姓躺倒街头，奄奄一息，我们能无动于衷吗！我们对要求出城的百姓应该放行。'

林彪听后却说：'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原定方针不能变。'

'林总，我知道你是从整个战局出发，考虑问题是慎重的，但你想过没有，长春人民在十四年的抗战以及这两年的解放战争中，付出过重大牺牲，对我党有过巨大的支援，难道我们能看着这些有功的人民，就这样地倒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吗？'

林彪看了看周保中，非常严肃地说：'老兄，这是战争！'

不过，林彪还是听取了周保中和众多同志的意见，修正了'内不准出'的规定，同意积极安置从城中逃出来的居民。"①

周保中与林彪关于"堵"与"放"的论争，只是反映了这场斗争的一个侧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保中的意见，显然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卡哨外春满人间 8月4日是不寻常的一天，饿以待毙的饥民们终于盼到了可以分批进入解放区。从4日到9日的6天中，通过洪熙街（今红旗街）进入解放区的难民计1 8191人，加

①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24—5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上“长江”部队放进的300多名及偷进者，总数达2万人之多。[1]进入解放区的难民，“每人发三天粮，富者少发，穷者多发。”[2]一些因病饿在路上或到解放区后死去的119人，均予以掩埋。那些死难者的亲属在哭声中感激“共产党救活人埋死人，世世找不到这样恩人”。“很多老太太给我军下跪磕头等，感谢我们帮助推车拿送行李背小孩。”[3]

1948年8月14日，为救活数万难民着想，中共吉林省委做出了《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由前方指挥所唐天际等11人组成处理难民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决定长春、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永吉、磐石、舒兰、蛟河、桦甸等县应准备接受难民。同时规定：(一)有劳动力的工人及其他技术人员一律送省府及工业部，分别考查使用。(二)16岁以上青年学生(不论男女)一律送东北大学集中考查教育。(三)原属东北其他各省逃出的难民，回原省处理。(四)无依靠之小孩、妇女及老弱者，分散各县安插和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救济。(五)一般的市民，应利用其社会关系安插，或分散各县参加生产。(六)反动首领及重要嫌疑分子，属军事系统的送军区政治部，地方系统的送公安处分别处理。[4] 8月19日，该处委会下设兴隆、净月、长南三个办事处，负责调查、教育、管理、救济、转送等工作。同时确定以3处为难民开放路口，其它哨卡不准放行。救济难民时间始于8月21日，放出者每人发盐2两，发粮不超过10天，每天发粮1斤(粮食、豆饼各一半)。[5] 8月20日，吉林省处理长春外围难民委员会制定了《处理难民的组织和工

---

①②③ 方浩：《长南工作队一个月的工作总结》。《围城简报》第三期，第38—39页。吉林省档案馆档案 政72—6号卷。

④《省委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一册，(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第393—394页。

⑤ 吉林省处理长春外围难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围城简报》第二期，第20页。

作简则》。在《简则》中关于遣送难民办法，要求在转送线路中，40 里设一大站，20 里设一小站，大站负责食宿，小站负责临时休息，均委派地方干部负责此项工作。同时，还规定了难民应遵守的纪律，如“不准沿路偷青，违者受罚”等。[1]

兴隆山区从 8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共收容与救济：

学生 1 224 人，医生 194 人，车夫 851 人，小贩 1 621 人，商人 4 575 人，工人 6 305 人，农民 7 028 人，自由职业 1 229 人，其他 8 275 人，合计 31 302 人。

长南区从 8 月 12 日至 9 月 30 日，共收容与救济：

学生 3 202 人，医生 204 人，商人 2 528 人，工人 10 679 人，农民 3 368 人，技术人员 869 人，教师 517 人，职员 1 097 人，军人 160 人，铁路 258 人，邮政 21 人，其他 22 826 人，合计 68 471人。[2]

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救济粮 4 000 吨、救济金 6 亿元、食盐 500 斤，收容难民达 15 万人之多。[3]

为了拯救难民于水火之中，长春外围各接待站都设有粥锅，终日炊烟不断。每当难民端起粥碗，就止不住地流下泪来，感激救命恩人共产党、解放军和人民政府。难民们说：“从长春市内到解放区一线之隔，却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4]

---

① 《围城简报》第二期，第 48—49 页。

② 《围城简报》第四期，第 51 页。按：长南区原单项统计缺 1 人。

③ 肖劲光：《解放长春》，《辽沈决战》(上)，第 414 页；《长春起义纪实》，第 150 页。

④ 张亨三：《群众组成的封锁线》，《长春文史资料》1988 年第二辑，第 172—173 页。

十二、反蒋民主运动与根据地建设

1、广大师生争取民主的斗争

中小学师生罢教与罢课　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在“接收”机关企业的同时，也“接收”了全市的中小学校。据1946年7月国民党长春市《教育局工作报告》中统计，当时有中学12所，小学53所，计有教师1 291人，学生44 036人。国民党当局虽言称：“教育为百年大计，本府极为重视”，但同时又以“财政困难”为由，拒发教师工资，因而引起广大教师的极大愤慨。1946年9月，全市中学教师假中学运动会之机进行串联，并于运动会的第二天在女中召开了全市中学教师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了“长春中学教师罢教委员会”，推选栾世泮为主任委员，潘豁达、孙福元为副主任委员。[①] 大会决议向当局提出三项条件：（一）补发4、5、6、7月，共4个月的工资。（二）8、9两个月的工资不许拖欠。（三）今后工资要折合实物发给，并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②] 广大教师的罢教运动，深得广大市民和学生的积极支持，有的学校的学生自动罢课，并向当局提出改善学生生活，增添教育设施等要求。在一周左右的罢教斗争中，使反动当局惊恐不安，他们采取高压和

---

①②　徐一夫：《国民党时期的长春市中小学》，《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第92页。

软硬兼施的手段，逮捕教师，开除罢教中的骨干，从而使这次罢教运动被瓦解。罢教虽然失败，然而却教育了广大教师，使他们丢掉了幻想，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增强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在中学教师罢教的影响下，小学教师的罢教运动也迅猛发展起来。在文庙小学教师李深昌等人的带动下，各小学教师采取了统一的罢教行动。尽管中学教师的罢教被当局所瓦解，而小学教师的罢教斗争却仍在继续进行。对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和教育厅局长曾先后多次向代表施加压力，但代表们毫不畏惧。恫吓不成，当局则允诺提高工资，但事后又不按月发薪，这就更激起了广大教师的义愤。为了坚持长期斗争，1947 年 4 月初成立了长春市小学教师联谊会，公推李深昌为理事长，各校均设有分会，由 3 名理事组成。1948 年，国民党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局多次派军警对联谊会的活动进行威胁和阻挠。为了抗议当局的反动行径，联谊会决定从“五·四”日开始全市罢教。6 月 15 日，当局竟公然宣布，开除罢教带头人李深昌、于振声、郑维汉 3 人，致使罢教斗争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而被迫终止。[①]两次罢教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广大师生反饥饿、反迫害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运用各种手段，如“索米”运动，撒传单，贴标语等，同当局继续进行战斗，以迎接长春的解放。

松北联中反蒋民主运动　松北联中系由东北几个流亡党团的头头，取得“东北行营”的支持在长春成立的，它专门“接收”由解放区跑来的中学生，免费食宿，实行特务式的训导制度，大搞军事训练，发展反动组织，迫害进步青年，妄图把学生培养成为反共的工具。

---

① 徐一夫：《国民党时期的长春中小学》，《长春文史资料》1986 年第 6 辑，第 94 页。

1947年2月，松北联中一分校三青团支部在校方的支持下，以调整宿舍为名，准备将三青团员安插到各个宿舍中，以监视进步青年学生的活动。校方在公布调整宿舍名单的同时，强令学生迅速执行。为了反对校方阴谋，在中共地下党指示下，一些进步青年串联该校多数学生，掀起了一次反对调整宿舍的风潮。分校校长房殿华（兴安省三青团书记、军统特务）在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时，佩带少将军衔借以威吓学生。学生当即提出："反对学校不顾学生利益，竟在严冬季节调整宿舍"，"反对军阀式的统治学校"，在大多数学生的反对下，校方只能取消这项决定。①

松北联中成立以后，该校经费系由南京专汇。校方则利用该项经费大搞投机生意，校内贪污成风，学生伙食费不仅被克扣，就连教师员工的工资也停发3月有余，因而激起了广大教师的不满。1947年12月下旬，联中一分校教职工在教师东方英等号召下，自发地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决定立即罢课，并向6个分校发起呼吁，请各校派代表2人到一分校开会，向学校要工薪。大会公推东方英和刘玉文为一分校代表。嗣后，各分校代表一致同意罢课索薪，并立即到校务委员会提出要求。校务委员会金秘书以南京数月未予拨款为由，进行狡辩和有意拖延，于是教师代表决定到银行查帐。据查，12月18日南京曾给联中拨款30亿，校委会帐上有钱，足可发放工薪。代表们以银行的证明为凭据，决定上诉地方法院控告金秘书贪污公款、拖欠工薪。金秘书则送厚礼给邵检察官，将此事不了了之。为平息教师的愤懑，校方搬出前副校长王焕彬（三青团中央干事，军统特务）与代表谈判。代表当即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发工薪，连欠薪全部补发；二、向全体教职员工赔礼道歉；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对上述要求，王焕彬应允做了保证，

① 刘育新：《和进步青年并肩战斗》。《暴风雨中的长春青年》，第209页。

并在1948年1月中旬发了全部工薪，罢课索薪斗争就此结束。①

1948年2月，国民党当局图谋借学生放寒假之机解散松北联中，把各分校的学生强行编入国民党军队，以补充军队的缺额，因而激起联中学生的义愤，群起反抗。鉴于上述情况，中共地下党员刘育新（松北联中一分校教务主任）、孙亚明（时任长春大学总务长、经济系教授）通过外围组织发动联中和长春大学学生，联合起来反抗斗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反对强迫松北联中学生充当内战炮灰！""青年们动员起来，反对内战，支援松北联中同学！"② 于是两校学生连夜书写传单和标语，准备上街游行。联中训导处由于发觉了学生的行动，强令学生不准上街，而长大学生则于凌晨走上街头，沿途呼口号张贴标语，揭露当局的阴谋，深得市民的同情和支持。1948年2月底，国民党当局宣布解散松北联中，除部分学生被迫编入"幼年兵团"外，多数学生投奔了解放区。

长大学生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1946年7月，长春大学尚未筹建之际，一批在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学习的原伪满各大学学生，因反对当局滥收学生而集体前往长春，等候国立长春大学的成立。9月上旬，国立长春大学筹备处的牌子挂出以后，时任校长黄如今只承认在校的1 000多名学员是学生，而不承认伪满大学的学籍，必须经过甄审考试才能入学。③国民党教育当局对东北学生的歧视和刁难，引起在校学生的强烈不满。9月18日，学生代表与校方谈判破裂，晚饭后学生集体到校部示威请愿。在返回的路上，遭到新一军重炮营的鸣枪恫吓，激起

① 东方英：《松北联中的反蒋爱国运动》。《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第108—110页。

② 刘育新：《和进步青年并肩战斗》。《暴风雨中的长春青年》，第213页。

③ 周克让：《回忆长春大学》。《吉林文史资料》第18辑。

了学生的更大义愤。翌日，长大学联召开全体大会，向校方提出严重抗议，并散发传单，揭露校方无视学生的合理要求和勾结军队鸣枪镇压学生，在长春市内引起了反响。当局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新一军和校方不得不向学生赔礼道歉。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学校当局承认了原来的学历，全部免试入学，反甄审考试斗争取得了胜利。[①]

1947 年 4 月，长大训导处课外活动组主任孙锦廷因无理侮辱医学院院长郭松根教授，导致了医学院进而是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罢教、罢工和罢课。据周克让回忆："孙倚仗是'飞来的大员'对郭院长很不尊重，激起了医学院学生的群起愤怒，大字报铺天盖地，公开谴责和呼吁校方罢免孙锦廷"。[②] 为了阻止和破坏学生的罢课，学校当局采取各个击破，逮捕进步青年学生或藉口解放军靠近长春而疏散学生等卑劣手段，瓦解了这次罢课斗争。

1948 年 3 月，长大教职员中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和中统纠合在一起，发起了迁校平津的活动。一些逃离长大身居要职的反动教授徐家骥（长大文学院院长、军统少将）等人，也在平、津、沈遥相呼应，梦想迁校成功，便可官复原职。[③] 在少数教授的鼓动和倡议下，长大成立了迁校委员会，并推选长大总务长孙亚明（中共地下党员）为主任委员。在孙亚明的领导下，通过外围组织发动长大师生掀起了反迁校运动。这场斗争十分激烈，主张迁校的学生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眼看要打起来，东北一切都将毁灭，不能再安心读书了。"反对迁校的学生则说："东北是我们的家，不管国内时局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坚持在东北学习，绝不在关内流浪。"[④]双方唇枪舌剑，大字报铺天盖地。

---

① ④ 梁亦：《长春大学学生运动的回忆》，《长春史志》1986 年 3—4 期。

② 周克让：《回忆长春大学》，《吉林文史资料》第 18 辑，第 97 页。

③ 孙亚明：《我以国民党接收人員身份在长春开展地下党工作的情况》，《暴风雨中的长春青年》，第 200 页。

国民党六十军撤守长春以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广大师生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已是穷途末路，行将寿终正寝，因而支持迁校的人越来越少。迁校委员会主任孙亚明则利用其合法的身份，对少数要去北京报到的学生故意拖延签发证明，或以学校无钱为借口不发和少发助学金以阻止其南行。即或有少数随市民出卡者，也多为解放军卡哨所劝阻。随着政局的变化，长大少数人鼓动的迁校运动终未得逞。

自1948年2、3月以来，国民党教育部就中断了给长大的汇款。长春被围困以后，粮价暴涨，长大“员生均以豆饼树菜糊口，饿倒者甚伙，生活委实无法维持，情绪至为惨苦”。[①] 为解燃眉之急，校方曾多次向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借款，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激起广大师生对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是年端午节之日，学生以食堂停伙为导火线，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东朝阳路原校长黄如今的官邸时，正逢学校当局的头头们在那里宴会，因而群情激愤，纷纷要“吃大家”。长大三青团头头谢恕对学生态度蛮横，被学生痛打一顿。最后由孙亚明出面劝导，答应安排食堂开伙，此事方告平息。

到1948年夏秋之际，长大师生的绝大部分，约1 200多人已离开长春到达解放区。长春大学校长张德馨于同年6月3日，也安全到达到解放区。据张老回忆：“我去解放区非常保密，同行的商伴们并不知道我的意图，离长时我只带了长大的一名职员吴子义，他是我的亲戚，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的意图。如果稍露破绽，被人发现，告到长春督察处，不进监狱，就是枪毙，是非常危险的。”[②] 同年6月17日，张校长到吉林省教育厅报到

---

① 长春大学给东北政委会的请款报告。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历23—4—48号卷。

② 常城、苑宏光：《第一位走向解放区的大学校长》，《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5辑。

时，受到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副主席袁任远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

2、工人罢工与护厂斗争

国民党进占长春以后，长春市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工人的切身权益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46 年 11 月 6 日，长春市澡塘业所属 19 家工人因与资方利金分配问题，工人同资方进行了历时两周的不懈斗争，终于迫使资方让步，承认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同年 12 月 26 日，长春市重庆路大华皮鞋厂 300 余名工人，为反对厂方虐待和拖欠工资，举行了罢工斗争。[①]

1947 年 4 月 25 日，长春市国民党当局为搜罗炮灰，在“春季征兵”中抓走了 6 名电力局员工，激起了长春电业工人的义愤。按当时国民党征兵部令，凡属国防、邮电、电业、铁路的技术员工，一律缓征的规定，电业员工应属缓征之列。然而长春市政府的军事科长征兵官陈俊麟因窃电采暖被罚而怀恨在心，故借征兵之机进行报复。4 月 30 日早 6 时，电业工人 700 余人集会于白梅会馆（今电业俱乐部址），在李野光（中共地下党员）的指引下，大会决定向当局提出三项要求：一、立即安全放回被抓去的 6 个人；二、撤销陈俊麟军事科长职务，停止征兵抓人；三、要市长赵君迈公开向电业员工赔礼道歉。大会推选徐坚为主席，变电所技术员关二奎和局稽查股股长任秉钧为副主席，组成以任为首的请愿团，同时向小丰满和抚顺发电站厂打了求援电报。在请愿团请愿未果的情况下，小丰满和抚顺发来了“全力支持”电报，使全体电业员工深受鼓舞。在徐

---

① 张敬渊：《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春工人运动》，《长春党史资料》第 4 辑，第 105 页。

坚的率领下，打着“反对非法征兵”的横标，高呼：“反对抓电业工人当兵！”、“要求立即释放被抓六名工人兄弟！”等口号，沿中正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举行了示威游行。为配合这次行动，电业工人拉下电闸，致使全市停电，电车陷于瘫痪，从而震惊了国民党军政当局。在电业工人的强大压力下，当局通过与工人代表谈判，同意释放被抓员工和撤销陈俊麟的职务。①这次轰动全市的“断电风潮”，极大地鼓舞了电业工人的斗志，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长春工人阶级忍受着饥饿的威胁，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国民党残酷统治下，进行了英勇的护厂斗争，为保卫国家财产和市政设施做出了贡献。

长春市卷烟厂是长春市一家较大的企业，盈利较高，工人的待遇也较好。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到吉林任职后，到处劫收工厂，化公肥己。他到长春视察后，对长春卷烟厂贪心大发，准备将卷烟厂的机器设备搬往外地，窃为己有。卷烟厂工人奋起反抗，提出了“机械是我们保护住的，任何人都不能搬走”的口号，经工人的多次抗议，才使梁华威的阴谋未能得逞。②长春火柴厂工人为阻止厂方盗运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进行了抗议和罢工斗争，迫使厂方不敢轻举妄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工人们忍饥挨饿，终于完整地保护了工厂。长春解放后的第三天，该厂即恢复了生产，成为长春解放后第一个开工的工厂。③长春铁路工人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经常采取消极怠工，破坏机车零件和铁路器材，打乱行车计划等办法，阻挠了军车调动和军事物资的运输。同时，用各种办法使机务段保住了 9 个

---

① 徐坚：《忆长春电业工人“四卅”罢工》，《吉林文史资料》第 13 辑。

② 《中国共产党长春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长春市档案馆档案 20—2—46 号卷。

③ 张敬刚：《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春工人运动》，《长春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106 页；长春市档案馆档案 20—2—46 号卷。

材料仓库和22台机车。国民党五九师修械所的职工以怠工的方式，一年只生产了3门六零炮，并把它藏起来，交给了人民解放军。[①] 其他诸如长春发电厂、房地局、火砖厂、国民党后勤部汽车24厂、自来水公司和电车公司等单位的工人，为阻止国民党军队的抢掠和破坏，为保卫工厂的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

3、中共地下党的艰苦斗争

光复后，国共两党在争夺长春的斗争中，活动在长春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极其复杂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发展党的组织、组建人民武装、建立舆论阵地、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和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围困长春期间，为配合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他们潜伏在国民党的军政机构、大专院校和春城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当时，活动于长春的中共地下组织共有10几个系统，地工人员1 200余名。其主要系统有：

东北局城工部系统 城工部是对敌城市工作部的简称，其主要任务是向敌区派遣地下工作人员，设法潜入其内部，搜集党、政、军、经各方面的情报。发展地工组织，搞工人、学生运动及上层人物的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大、中城市和恢复城市生产建设。[②]

该系统成员徐慎、赵东黎、傅根深[③]、王永生、申东黎、苏

---

① 张敬刚：《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春工人运动》，《长春文史资料》第4辑，第106页。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2—46号卷。

② 吕天：《我在东北局城工部工作时的一段回忆》，《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第203页。

③ 傅根深、河北清苑县人，1904年生。1943年春受中共派遣重返长春，开展地下工作。1945年9月，任吉长部队政委。同年12月15日，在支援长岭战斗中英勇牺牲。

东、郭景兆等人于光复前后进入长春，开展秘密地下斗争。1945年9、10月间，上述成员分别参加了中共长春市委、吉长部队的创建及组建各种群众团体和设立秘密据点的工作。郭景兆则以合股开办"聚丰五金行"为掩护，组织与宣传群众。

孙亚明、孙大光由中共派遣，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随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进入长春 孙亚明以长春市政府参事、敌伪产业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市府社会局长、市府印刷厂长、公用局长、长春大学总务长、长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等头衔为掩护，为长春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长大期间，通过外围组织发动长大学生开展了支持联中和反迁校斗争。先后发展了刘育新、陈一华、安邦梁、秦宏伦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该系统打入军事部门，从事兵运活动的成员有：肖向春、刘志诚、翟福贵、王天恩、王文达、刘铁文、李凤桐、刘华、阎世斌、叶伟、佟炎、温旭山、郭群、王宏文等。[①] 1947年10月，根据吉北联络处陈少中选择时机，炸掉新七军设在海上大楼（今市中心医院址）地下室弹药库的指标，钱泽球、肖向春、那守田、刘树春小组，于"双十节"下午，巧妙地将弹药库引爆，震惊了国民党军政当局。后来，钱泽球在长春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杀害。[②]

1947年8月，城工部派李天成到长春大学搞学生运动。他发展了A、B、C、D四个组，这个组织称为"李梦星小组"，李天成为核心组长。到长春解放时已发展140余人。根据长春工委下达的任务，及时地将《长春大学国民党党团分子名单》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物资清单》送往九台。该小组还翻印了5 000余份各种传单，几百个小册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该小组还

---

①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七十年》，第107页。长春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② 宋树、刘树春：《智炸弹药库的独立小组》，《艰辛的历程》，第220页。《长春文史资料》第45辑。

经常向围城部队提供军事情报，推荐干部，医药用品和器械。同时，还组织学运，反对迁校，保护进步学生等。[①] 在长春大学从事地下活动的还有赵洪小组。赵洪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了两个秘密小组，第一小组组长陈辛，第二小组组长苏昆，通过主办《建国壁报》和《民主墙》等各种形式，开展了反饥饿、反迫害、争取民主的斗争。[②]

长春工委系统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城工部于1948年2月撤销。原三室杨实人率二室部分同志前往九台与江含的民运科合并组成长春工作委员会（简称长春工委）。[③] 其主要任务是：对长春进行地下派遣，广泛对敌军进行策反瓦解和搜集长春守敌的党政军警特及社会情报，为解放长春做准备工作。该系统向长春派遣主要通过以下四条渠道：一是由工委组织部长赵东黎和组织干事吕天负责，有地工人员200余人；二是由吉北联络处陈少中负责，有地工人员100余人；三是由九台联络站站长江含负责，主要任务是送往迎来；四是由陈泊、侯诺青领导的派遣工作，对外称解放军松前指挥所或长春情工组。[④] 从1948年3月至8月，长春情工组就向长春市派进10多个地工小组，发展地工关系380余人。搜集到有重要价值的情报180份，警报性情报45份，次要性情报95份，一般情报93份。通过各种渠道搞到文件805件，其中关于国民党特务机关和特务分子的219件，关于国民党党团活动的194件，关于长春市内一些社会恶劣现象的319件，关于国民党重要军事动态的73件。同时，还搞到了长春守军修建的64座钢骨水泥永久工事图纸和长春市地下水道图纸。情工组还通过李仲三（国民

---

① 李天成：《在另一条战线上》，《艰辛的历程》，第147—149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七十年》，第107—108页。长春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③ 《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第209页。

④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七十年》第113页。长春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党国防部二厅长春情报站少校督察）搞到了该站特务组织在长春的电台、人员、密码、文件等及该情报站向南京呈报的潜伏在洮南、海拉尔、哈尔滨、库伦、敦化、北安、延吉、牡丹江、九台等地特务名单，为人民政府一网打尽。[1] 在与敌特斗争中，地工人员于经五、刘勤轩、冷志中、李真凡等被敌特残酷杀害。

1948年春，东北军区松前指挥部司令员陈光指示其地工人员李野光等人，要不遗余力地寻找杨靖宇将军的遗颅，要千方百计抢救到手，一时转移有困难，也定要做好保护工作。为完成这一任务，李野光等人经过反复调查，得知先烈的遗颅存放于长春医学院。6月，医学院学生纷纷离校，校舍一部为国民党保安骑兵第二旅卫生队所占用，遂委派刘亚光打入该卫生队充任中尉军医。刘亚光利用职务之便，在大半毁损的器材堆里，找到了杨靖宇和陈翰章两位先烈的遗颅，并将其“间壁”起来。与此同时，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督察员曹路超与刑警大队队长何群伙同一批特务也闯进医学院进行搜寻，因未找到将军的遗首，只好扬长而去。同年8月，地工小组设法将遗首运至亚光医院保存。长春解放后，由张羽护送至哈尔滨，并珍藏于东北烈士纪念馆。[2]

长春解放前夕，长春工委和松前指挥所发出了保护长春的指示，随即成立了保护委员会，下设5个分会，调动了大批在长地工人员派往企业、工厂、学校、科研机关和各项建筑物，组织专责保护，免遭破坏。如陈光系统组织其成员在伪长春县政府，铁路机务段、电务段、车站和长春医学院，五六师机械所及有关工厂房地产部门进行保护，使这些单位和部门于解放后

---

① 《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第15—16页。

② 李野光：《抢救杨靖宇、陈翰章先烈遗颅经过》，《吉林文史资料》第23辑，第104—113页。

完整无损地交给了人民。[1]

东北局社会部系统 在长春设有工作站，其前身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光复后改名为“东北解放同盟”。成员有田琛、关克、高亮、丁一等50余人，成员中多数为留日爱国青年。主要活动于国民党军政部门，搜集情报。

苏军进入长春后，该工作站成员曾提供情报，配合苏军将伪满汉奸一网打尽。1945年冬，其成员曾将第一个到长春的国民党军少将张柏生的军统密码拍照下来，对破译军统密码电报，掌握敌情起了重要作用。苏军撤离长春前夕，将国民党军驻长第四纵队作战计划及时送交徐慎，使“四·一四”解放长春的战斗得以顺利进行。为了掌握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打入国民党军政部门。如丁一当了“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的中校秘书；田琛和关克到罗庆春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高亮则在新六军办的一个杂志部门里工作；石迪等人打入国民党的军事部门搞建军情报等等。[2] 据高亮在《我的片段回忆》一文记述：“在长春被围困期间，我们的同志忍饥挨饿，不少人吃酒糟，一直和敌人作隐蔽斗争，我盟员郭尔请同志（新闻记者），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狱中表现英勇不屈，始终未暴露组织，在长春第二次解放前夕，被杀害于国民党督察处。”[3] 此外，东北局社会部曾于1946年4月，派遣尚钦凯化装成国民党“接收大员”，搞到了国民党吉林省先遣军总司令石坚的全权军事联络员李树林（东北保安军第五支队少将司令）的照片及其在长春的3个住址。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后，立即将其逮捕，并通过其人供

---

① 《松前指挥所所属长春地工活动概况》，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2—46号卷。

② 田琛：《“东北青年救亡”在长春》，《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第129—130页。

③ 《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第134页。

出先遣军建军情况及主要骨干38人。[①]

军事系统　主要是东北军区政治部九台前方联络站。负责人刘浩，主要成员有杨重、王立中、孙公达、陆飞、赵雄、俞元、詹玉佩、詹玉填等。主要任务是开展对六十军的工作。

为策动国民党军投诚或起义，陈光系统和东北军区政治部九台前方联络站刘浩等曾分别派员打入新七军和六十军做策反工作。1948年4月20日，李野光利用为孔宪荣夫人购机票赴南京奔丧之机，将周保中的亲笔信交给了曾泽生将军。信的内容是：[②]

××兄大鉴：

蒋家小朝廷摇摇欲坠了……抗战创伤未平，故态复萌，忤天意而违民心，发动内战，再置人民于水火……当年护法，大北伐，以及抗敌期间的台儿庄血战，无一不流溅了三滇健儿的鲜血，滇军对国家、对民族、直至对蒋氏，都可以称竭忠殚力了，而蒋氏对三滇儿女的酬答却是炮轰五华山，血染昆明市！对其此类倒行逆施，背信弃义行径，闻者皆为切齿，受者能不伤心？蒋氏一贯排除异己……已临分崩离析之绝境……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响应革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其反动政权灭亡在即，倾巢之下，奚冀完卵？吾兄不辞关山万里，驻屣东北……数万家乡子弟之命运，唯兄是决……为国家人民而弃暗投明，大义昭然，所谓有负蒋氏……愿吾兄再勿徘徊……从速举义，以符乡老之望……。

一九四八年春月

乡地周保中拜

刘浩还通过六十军部副官处长杨重（中共地下党员）的联系，亲自会见了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向他介绍了中共的政

---

①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七十年》，第109页。长春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② 邹世魁：《为解放长春而战斗的无名英雄》，《长春史志》1987年6月。

策及过去同龙云的统战关系。同时还说："从个人关系讲，我们还是亲戚，我要为你着想，希望你为云南父老，为六十军数万官兵着想，站到人民一边来，同我们一道打倒蒋介石，打回云南去，解放全中国。"据刘浩回忆：陇耀听得很认真，一再表明打内战不是他自己的本意，大骂蒋介石不存好心。应陇耀的要求，吉林省军区放还了暂编二十一师被俘军官200余名，后来这些军官在六十军内部产生了积极影响。①

此外，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遣，于1946年10月来长春的方传进以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副司令的军衔为掩护，利用与新七军军长史说是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的关系为党做工作。1948年8月，曾乘机出卡，向围城部队提供了长春国民党守军军情，并呈交了一份陆大第十期同学录。六十军起义后，曾多次劝说史说放下武器，为新七军投诚做了有益的工作。②

1947年9月下旬，原新四军司令部情报处城工室派遣干部张正平，奉命由山东莱阳转赴长春，接续新四军对国民党新七军暂编五十六师的地下工作，相机策动起义。十月中旬到长春后，即与五十六师中"MP"接上关系。"MP"是伪满军中部分进步官兵在1937年至1939年期间建立的"满州人民抗日救亡社"的代称。张正平先后与金器之、李雪松、冷殿甲、张九福、李野光、李铁夫、么兆民、白殿升等"MP"成员取得了联系。嗣后，建立了5个地工小组，发展下级军官26名。经过秘密布置和上级同意，制定了该师起义计划，后因六十军突然撤守长春，而未能实施。

1948年1月，张正平在头道沟东二条43号开设"富源长制米厂"进行掩护活动，摸清了长春守军的实力；获取了空运情

---

① 刘浩：《争取滇军工作的回忆》，《长春起义纪实》，第254—25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② 方传进：《我在长春做地下工作的回忆》，《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况；通过暗中操纵米价，加速了守军粮食危机。6月3日，米厂被督察处特务包围，张正平的亲朋好友52人被捕入狱，经理李国栋、会计高博儒被特务秘密杀害于南岭。6月16日，张正平撤出长春，回到部队，任代理侦察科长，在东郊三道林子负责敌情侦察和市内地下工作。①

除上述几个较大系统外，还有池镜川、翟飞、陈方、厉男、马声波等地工系统。他们以不同的身份活动于各个部门和人民群众之中，为解放长春贡献了力量。②

地工人员的派遣多数由各系统进行，但也有中共中央直接派遣的，如刘浩、孙亚明等。为了占领舆论阵地，中共中央决定派金山和张瑞芳等人到长春工作。光复后，为使“满映”这个电影基地不能成为国民党用它做为“勘乱”的宣传工具，周恩来批准金山利用同国民党的上层关系，同张瑞芳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于1946年10月由重庆来到长春电影厂。金山任国民党中宣部长春电影厂厂长，张瑞芳为特约演员。先后随金山到长影的还有张楠、王紫东等进步文艺工作者20余人。在当时物资极端贫乏的情况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拍成了《松花江上》、《哈尔滨之夜》两个故事片和一部大型纪录片《看东北》。所拍影片突出了民族矛盾的内容，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东北人民的反抗，使国民党企图利用这个电影基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未能得逞。③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工人员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在内线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春城的解放，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

① 张正平：《MP—插进敌人心脏的利剑》。《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② 《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第7页。

③ 张瑞芳：《在长影工作的回忆》。《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第276—277页。

4. 根据地建设与支前活动

建立民主政权 东北光复后，长春周围的双阳、农安、德惠、榆树、九台五县曾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其反动势力，曾扩展至农安、德惠、九台、双阳四县，唯榆树县为人民政权所控制。

榆树县位于吉林省北部，南邻舒兰，西接扶余，西南以松花江为界与德惠相邻，北、东与黑龙江省双城、五常相望，哈大公路从县内通过，是扼制南北满的战略要地。光复后，榆树县伪县长宋天人组织了"榆树县地方治安维持会"，招兵买马，扩大地方武装，等待国民党的"接收"。1945 年 12 月 27 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曹里怀部、田松部和吉林保安游击总队张清华部解放了榆树县，建立了人民政权。李隽任中共榆树县委书记，张华清任县长，全县划为 10 个区，相继建立了区、村人民政权。正当全县人民欢庆解放，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刻，国民党军大举北犯，形势突变，榆树顿时成了前哨，与国统区隔江对峙。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些伪满残余、惯匪和反动地主武装趁机作乱，县属 10 个区中有 6 个区中队发生逃叛事件，一些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使县内局势十分混乱。为巩固榆树根据地，县委根据省委"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精神，会同驻军剿匪反霸，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平息了叛乱，剿灭了大小股匪，保卫了人民政权。[①]

国民党军占据双阳、农安、德惠、九台以后，实行法西斯统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7 年初，北满东北民主联军为策应和支援四保临江，曾三渡松花江，在各县人民的配合下，

① 榆树县史志办公室：《解放战争时期榆树县根据地的建设》，《长春史志》1986 年第 6 期。

激战于其塔木、张麻子沟、焦家岭、城子街、靠山屯、四道沟等地，取得了四保临江的伟大胜利，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从1947年5月始，东北民主联军接连发动了三次强大攻势。在夏、秋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4月15日解放了双阳，10月17、18日分别解放了九台和农安，10月20日解放了德惠。至此，长春周围各县全部获得了解放，各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又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

清除匪患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争夺东北，利用“中央”的招牌，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网罗和收编了大批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这些土匪打着“国民党东北挺进军”、“东北先遣军”等旗号，到处攻打解放区的县城，杀害共产党的干部。国民党还唆使一些反动分子，采取“明当八路，暗当中央军”的策略，伪装革命，混入内部，乘机叛变革命，如榆树、九台、农安都曾发生过叛乱。1945年12月26日，时任中共农安县委书记兼县长和独立八团政委的刘德彪就被混进该团的敌伪分子所杀害。东北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后，一些人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于是榆树县弓棚子、秀水的公安队和泗河、土桥及八号的联防队相继叛变，有的坐地为匪，有的到江西投靠了国民党军队。育民乡北新村恶霸地主蒋兴周纠合反动地主王松岩等组织起180多人的大排队，盘踞于六号“福兴永”烧锅大院，到处抢劫，为所欲为。刘庆三等勾结国民党杂牌军，夜袭大岭区政府，枪杀干部2名，抢去大枪24支，子弹3 000余发，并打开拘留所，放走重要人犯。[①]

国民党军固守长春期间，德惠地处长春外围，土匪活动十分猖厥。当时，大股土匪有“火龙”、“老三点”、“小乐子”等，每个匪队都有上百人，多数都是马队。这些土匪，大都是国民

---

① 榆树县史志办公室：《解放战争时期榆树县根据地的建设》，《长春史志》1986年6期。

党外围组织政治土匪和还乡团，他们流窜于长春外围，武器和弹药由长春补发，他们经常活动在德惠、农安两县边境，四处打家劫舍，无恶不作。

为了清除匪患，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抽调一部分主力，配合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946年5月，榆树县委领导分别带领工作队员和县保安团，同驻军一起剿匪反霸，首先开赴弓棚子，经三小时激战，打垮了叛部李洪彬等50余人。在八号区，打垮了地主围子姜家窑，枪毙了首要分子胡雨精和姜老四。嗣后，在青顶山智擒了匪首迟勇，在所家屯和大窝堡屯分别活捉了"所阎王"所继武、"占中央"谢文斌，在义和屯剿灭了"九江霸"。经过一年的剿匪反霸，消灭了大小股匪，保卫了榆树根据地。[①]

德惠、农安、双阳、九台四县与长春相邻，是当时国共两军必争之地。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这里曾是"三下江南"战役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龟缩长春前后，曾将周边地带村屯洗劫一空，成为土匪肆虐横行之地。上述4县重获解放之后，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1947年2月初，长农武工队全力围歼活动在农安地区被国民党招降的土匪队，激战1日，毙伤俘匪计37名。据1947年11月20日《吉林日报》报道："仅自上月二十九日至本月八日10天内，即收缴散匪步枪294支、短枪5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1个、自动步枪、冲锋式各1挺、弹药万余发，并俘匪40余名。现九台、德惠我新解放区内，已无大股土匪活动。"1948年9月，在德惠菜园子乡田家村后腰亮子屯剿匪战斗中，张怀珍队长、戴荣升排长等9人光荣牺牲，他们为保卫新生政权和解放长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使广大的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民的自

---

① 徐凤池、刘国勤：《榆树县民主政权建立后的剿匪斗争》，《长春党史》1990年创刊号。

卫武装得以建立和巩固，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行土地改革 实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摧毁敌伪统治经济基础的中心环节，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革命根据地才可能建立和巩固。

土地改革叫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普遍展开。然而由于各地解放时间不一，因而开始时间有早有晚。榆树县是个老区，从1946年6月中旬，县委委员便带领土改工作队进入了大岭区。当时土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反奸清算斗争。这是土地改革的前奏。汉奸、恶霸在日伪时期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光复后，又同国民党反动势力相勾结，为虎作伥，无恶不作。他们在群众中大搞欺骗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不是正统等等。因而对土改工作队的到来，采取怀疑观望、疏远的态度。为了打开局面，工作队进村后，便首先访贫问苦，把行李搬到最穷最苦受压迫最深的贫雇农的窝棚中去住，坚持三同，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现培养第一批积极分子。然后再通过这些根子在贫苦农民中串联，把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并依靠农会进行反清算斗争。[①] 在"有仇报仇，有冤申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口号的鼓舞下，首先在城区发动群众处决了大汉奸、大特务刘斌和程作全，接着又清算了大汉奸、大恶霸、土豪劣绅屈槐三、蔡梓安、王春璞，并在双井子村组织群众分了伪锦州省长姜泽人13垧逆产，使贫雇农有了地种。[②]

二是开展砍挖运动（即砍大树——指地主，挖地主的财宝）。为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解决土地问题，县委通过清算地主

① 吴介民："农民革命风暴亲历记》。《吉北的曙光》，第443—444页。

② 邓力群：《党的政策是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生命线》。《吉北的曙光》，第376、377页。

的剥削手段和举办翻身教育展览会，对农民进行生动形象的阶级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全县开展了砍挖运动，向地主斗财宝，追浮产，挖地窖，刨老根。土桥区有个岗李家，是榆树、五常、舒兰三县有名的大地主，三个县都有他的土地，共七八百垧，在砍挖运动中，有人认为他家分的差不多了。在深挖中，又挖出三、四缸银元宝。经过砍挖运动，全县斗出物资约值 30 亿元，牲口 6 378 匹，分土地 11 410 垧，同时还起出 50 多条枪，破获了几起特务案件，挖掉了一些匪根。通过砍挖运动，摧毁了地主的经济基础，而且从政治上打掉了地主的威风。[1]

在土改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如打击面过宽，把富裕中农当作富农斗了。有人提出："谁有就斗谁，谁趁就斗谁"，"中农是小闷头比谁都趁"。据统计，全县被斗的中农就占全县总户数的 5.1%，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6.5%。这种乱批乱斗的结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其次是斗争扩大化。只要沾上一点伪满的边，即或是在伪区公所里挑水、做饭、喂马的也当作"敌伪残余"给斗了。在运动后期，不得不进行一次纠偏，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如双阳县以刘家区为例，在纠偏中，被斗户由 40%，下降到 10%。退回胶车 13 台，大牲畜 51 匹（头）。刘家店街共斗了 11 家商业户，全街只剩下 4 家小摊床。通过纠偏退赔，落实政策后，集日里的摊床达到 54 家。[2]

三是平分土地。平分土地是土地改革的最后步骤，是彻底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平分土地中，榆树县委要求各区采取"召开雇贫农代表会议"的方法，部署平分土地。县委还提出了一些鼓舞群众，体现政策的口号。例如

---

① 《吉北的曙光》，第 376 页。

② 双阳县史志办公室：《双阳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始末》，《长春史志》1986 年 3—4 期。

"土地是命根子，百年大事要认真！""分地要按土地法大纲，人人同样一份才相当。""雇贫中农一家人，大伙合计把地分。""中农房地要尊重，少了补进，多不动。""边分土地，边上粪，加紧生产扎富根。"经过平分土地，全县65万人中有49万人分得土地31万垧。到1948年3月20日，全县土地改革全部结束。[①]

双阳土改始于1947年8月上旬，由解放较早的南部几个区逐步向北开展。经过8个多月的土改斗争，全县185 000人分得土地92万亩，每人平均分得土地4—5亩。翌年4月初，在"不闲一个人，不荒一垄地"的口号动员下，掀起了春耕生产高潮。[②] 九台县的土地改革吸取了江东根据地在土改中出现的偏差，使土改走上健康的轨道。根据九台县的具体情况，注意使土改运动与生产相结合。在西部靠近长春的地区，那里的地主多数逃往长春，在春耕之际只能粗略地将土地分给雇贫农和原来的佃户，谁种谁收，秋后再平分土地。距离长春较近的前沿地区，进行的较晚。长春市郊的土地改革自1948年12月中旬试点，至1949年3月初基本结束，历时75天。

农村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在长春周围各县掀起的翻身风暴，横扫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各地又掀起了参军、支前和备耕的热潮。

参军支前　1947年1月，在"三下江南"战役开始时，中共榆树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在东北局战勤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县城和秀水设立了大兵站，并分别在向阳泡、泗河城、大岭等处设立了小兵站，负责战勤动员，物资输送，接待过往军人和伤员的护理工作。五区74岁的王老太太，悉心照护伤员，被

① 《吉北曙光》，第379页。

② 《长春史志》1986年3—4期，第61页。

誉为“伤员之母”。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妇女参加了护理工作，当时流传着“住医院，上榆树”的佳话。[①] 在这次战役中，该县出动担架 5 800 副，民工 3.4 万人（次），大车 3 300 辆。在其塔木战斗中，秀水区担架队员阎文全和部队一起战斗，冒着生命危险运送炮弹，受到表扬。向阳区民工王景林等人，用扁担俘虏国民党兵 5 人，缴获美式枪若干支。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全县共有 16 690 名青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出动民工 11 万多人，工日近 270 万个，出动担架 2 万多副，大车 1.9 万多台（次），动员马力 4 万多匹（次），接待前方伤员 2 000 余名。1947 年，仅榆树县交公粮就达 38 328 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②]

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在“保家保田”口号的影响下，九台县掀起了参军支前热潮。仅据 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底的统计，全县就有 5 889 名青壮年参加了人民军队。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九台县人民共支援军粮 72 833 吨，军草约 3 万吨，军鞋近 6 万双，肥猪 3 000 余口。[③]

为配合对长春的军事围困，中共双阳县委和县政府将长春外围 50 华里内，双阳县所属劝农区、奢岭区和新安区一部分村屯划为军事戒严封锁区。在封锁区内，各村都成立了联防缉查队，组织了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站岗放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禁止一切物资流入市内。[④] 县委还规定：“严格管制刘家店、奢岭口子、新安堡三市集，建立粮站、实行粮食统制，专买专卖，取消新立城市集”，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对长春市的经济

---

① 榆树县党史办公室：《榆树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参军支前活动》，《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

② 《吉北的曙光》，第 380 页。《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第 183—185 页。

③ 九台县史志办公室：《九台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贡献》，《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

④ 双阳县史志办公室：《双阳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参军支前活动》，《长春党史资料》第三辑。

封锁。[①]

在参军支前活动中，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和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支前热潮。榆树县在支前中，因对伤员招待护理工作成绩突出，于1947年2月12日受到东北行政委员会通令嘉奖。在围困长春期间，九台地处前沿，为实现战勤任务，共出动大车4 039台，担架337副，民夫21 359人，为解放长春做出了贡献。双阳县石溪区常家沟村妇女主任王耀美为支援驻军用粮，组织全村妇女3天时间用17盘碾子磨米3万多斤。德惠县王兆信，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支前模范。为支援解放战争，在当时动员参军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她带头把长子刘青年交给了部队，并鼓励儿子杀敌立功，安心服役。她不仅带头送子参军，还动员了董运新、刘景年等10几名参军参战，并带领乡亲们选好粮支援解放战争，曾被县政府评为"征粮模范"。同时，还出色地完成了军鞋和晒干菜任务，受到部队和政府的表彰。[②]

据德惠县县志记载：老板们坐在公粮车上，欢天喜地唱着："大家都来纳公粮，看看谁比谁的强，战士吃了有力量，打的老蒋束手降。"这首民歌如实地反应了贫苦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和支援解放战争的巨大热情。

5、培养干部的摇篮——长春学院与吉北联中

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以后，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镇压学生，屠杀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使青年学生进一步看清了国民

① 《围城简报》第一期，第35页。
② 《德惠文史资料》，纪念德惠解放四十周年专辑，第120—122页。

党腐朽的反动本质。在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抉择中，长春大学、松北联中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冒险穿越岗哨，毅然投奔了解放区，立志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青春。

从1947年11月开始，长春青年学生陆续投奔九台县。12月25日，九台县政府在小河沿成立了专门接待学生的招待所。到1948年1月份，学生已增至80名，将招待所改名为学生大队。同年4月12日，经东北局批准，成立了长春学院。院址位于九台县近郊小河沿的三个大院。这里溪流环绕，绿树成荫，环境幽静，是一个学习的理想场所。开学之时有学生116名。院长由松江省主席冯仲云兼任，杨超主持日常工作，学院由长春工委领导。院下设教导处和总务处，负责全院的教学和后勤工作。

长春学院是一座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是指引青年走向革命之路的灯塔，是一座"抗大"式的学校。长春青年得知九台成立长春学院后，纷纷奔向九台。到7月10日为止，前后共收学生450人。其中一部分学生经短期学习，就被调出工作，在册学生有280人。在这些学生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结构大小不一，既有吉林、辽宁、黑龙江人，也有河南、山东、陕西、浙江人。学生分编在4个班中，班下分组。宿舍是教室，露天是课堂，尽管物质条件十分贫乏，但学生们充满了革命的激情。

学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计37天，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的启蒙教育，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第二阶段计52天，主要是学习时事政策。第三阶段计95天，主要是通过对吉林市的户口调查，参加实际斗争，为解放长春做好准备。[①]据李天成回忆：在吉林市户口调查中，"我们的工作是不分昼夜的，

① 长春学院院史编委会：《长春学院简介》。长春市档案馆档案20—1—555号卷。

白天要深入群众中去，挨门串户，了解调查。吃过晚饭后，就要开会听取组员汇报，汇总情况，分析问题。每天工作不少于12个小时”。“学员到了吉林，还都不是干部，除了吃、穿两项由公家解决外，连零用钱都没有。生活是清苦的，工作是紧张的，思想是向上的，精神是愉快的。”[1] 除户口调查外，还组织学生参加了长春守军兵力部署图的绘制工作；有的往返于九台长春之间，对国民党军进行瓦解宣传活动；有的做了一段审查和遣返国民党军俘虏的工作；有的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或帮助翻身农民进行生产劳动。[2]通过上述革命实践，使学生们进一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增长了才干，为解放长春培训储备了干部。后来，有的随军南下，有的去东北大学、吉林工专深造，而大部分则在长春解放时进入长春，分配在党、政、群、工、商、学、文各条战线上，成为长春市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吉北联中创建于1947年初，是一所新型的完全中学。它的前身是榆树两级中学和榆树女子师范学校。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学生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素养的革命人才，为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解放区建设服务。在教育上，注重“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解放区的反封建、斗地主的土改运动，参加征粮、丈量土地等社会实践，使学生在斗争中受到锤炼。吉北联中先后为东大、军大、医大输送新生94名，为军干校、青干校、航校等输送干部111名新生，为财政、工交、公安、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输送干部316名，从学校直接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195名。[3] 吉北联中虽然只有暂短的一年，但却为革命队伍培养输送了急需的人才。

---

① 李天威：《雷鸣中的歌声》。

② 王磊：《暴风雨中的长春青年》，第276页。

③ 徐凤池、赵冠石：《吉北青年革命的摇篮》，《吉北的曙光》，第408—411页。

十三、解放长春

1、战略决战与长春政局

194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经两年的艰苦奋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而且把第一大战役确定在东北战场上的锦、榆、唐一线。[①]

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经过夏、秋、冬三大攻势，国民党军已被消灭57万人，虽然尚存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武装计有55万人，但已元气大伤，并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联系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不利。当时，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坐镇沈阳及铁岭、新民、抚顺、辽阳诸县，统兵30万。"剿匪副总司令"兼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固守长春，统兵10万。"剿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锦州为中心，分别据守义县、锦西、葫芦岛等地，统兵15万。国民党军虽然仍具有一定实力，但由于孤立无援，因而丧失了整体的优势。撤则失地，守则受歼，何去何从，长时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和国民党军相反，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有雄兵百万，在战争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不但能够打运动战，而

---

① 《辽沈决战》(上)，第68—6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且能够打阵地战。经过五个月左右的休整、练兵，求战心切，士气高涨。再加上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兵源、粮源充足，使东北人民解放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东北战场上双方力量和条件的对比，已经形成了对解放军有利的局面，因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毅然决定将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国民党军，是一着深谋远虑的胜算。

如何消灭东北国民党军，早在冬季攻势尚未结束之际，毛泽东在致电林、罗、刘时就曾指出"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1948 年 3 月初，国民党六十军撤守长春以后，长春已孤悬于解放区的后方，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为解除后顾之忧，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于 4 月 18 日决定先打长春。4 月 22 日，在取得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后，遂于 5 月下旬以两个纵队试打长春，但由于没有实现预期目的，从 6 月 25 日开始，对长春采用"久困长围"的方针。同年 7 月，东北局决定除留一部分主力围困长春外，大部主力南下作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南下作战的目标"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①] 并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出动。8 月 11 日，林彪以大军南下粮食无法解决，河水暴涨，铁路、公路冲毁甚多，并提出华北人民解放军牵制傅作义部为由，而迟迟未能确定南下时间。直至 9 月 3 日，才决定挥师南下，但仍置重兵于新民、沈阳及长春之间。9 月 7 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为此，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

① 《辽沈决战》（上）第 69、113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

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53个师，计70余万人，在东北人民的支援和全国各解放区的配合下，发起了北起长春，南至锦、榆、唐一线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全面发起辽沈战役，并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辽西会战开始后，长春国民党守军惊恐万状，希图于解放军南下之机，孤注一掷，拼死向沈阳突围。9月16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向围城部队下达了防止国民党守军突围的电令，并提出了三个打击突围国民党军的方案。要求参战部队进行梯次配置，进行阻击、侧击和追击，在运动中消灭之。9月30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估计长春国民党守军可能向伊通、双阳、梅河口方向或沿中长铁路突围，因而对围城部队再次进行了部署。

(1）独七师以一个团及侦察部队担任上下水塔、班家营子、杨家粉房，主力及炮四团之炮兵营集结于桑家窝堡、驿马站以西以北地区。注意能以炮火切实封锁机场。与独八师交待警戒任务后，全部集结于新安堡附近待机。

(2）独十师由一个团级干部率一个营及侦察部队担任绿园及上下石虎沟之警戒，并归独七师指挥。师部率主力集结于范家屯东南五台子、景家台（主力靠景家台)。

(3）独六师及独十一师一个团，以一个团为侦察部队，担任孟家屯、丁家窝堡至刁家山一线警戒，师率三个团及炮四团一个野炮营集结于长春堡南之马家岭、东西马家店。

(4）独九师以一个团及侦察部队担任小河沿军官学校、杨家店及石碑岭一线之警戒，师率主力集结于奢岭口子附近。

(5）独十一师（欠一个团）是准备进城部队，以一个团及侦察部队接替独八师陶家窝堡、十里堡至钱家堡一线警戒，师

率另一个团位兴隆山附近。

(6) 聂〔鹤亭〕部以有力之一个团位于朝阳山、公主岭、二十家子一线，另以一个团控制伊通至通丹站、恒头营子、大孤山子一线有利阵地，以阻滞突围之敌，主力则集结于二十家子、靠山镇至伊通线南北地区。

(7) 兵团司令部在四家子。”①

从长春至沈阳一线，人民解放军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即或国民党军破釜沉舟死命突围，也是“沉水入火，自取灭亡”。

正当辽西战火纷飞，炮声轰鸣，硝烟弥漫之际，10月2日蒋介石“御驾亲征”沈阳，调兵遣将，令郑洞国率部突围，妄图挽回败局。

郑洞国为实现突围南下，曾亲自到洪熙街（今红旗街）查看地形，组织所部演练急行军、夜行军，杀了走不动的马匹，每人发了三天的军粮，把军官家属集中于海上大楼，准备孤注一掷。10月3、4两日，新七军新三十八师和六十军一八二师向绿园一带出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4日下午，郑氏又命六十军暂二十一师派一个团的兵力助攻。以后在长春西郊又打了3天，由于饿兵困将伤亡惨重，只好龟缩在城内。用郑氏的话说：“任凭我和各级官长亲自督战，士兵们也不肯卖命”，“我知道，此番突不出去，也就再无生机了”。②

2、六十军起义

辽西会战的炮声，震撼着东北大地，东北国民党军赖以支撑的三足鼎立局面，开始向锦州倾覆。孤悬于解放区后方的长

---

① 《阵中日记》，第1009—1010页。

② 郑洞国：《困守长春始末》，《新七军投诚》，第220页。

春国民党守军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军心浮动，各思出路。

据曾泽生军长撰文回忆："当时，摆在第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是城破军亡；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这是条活路。究竟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问题，也是盘踞在每个人心里的问题。"① 从"助桀为虐"到走向光明，对于"以服从为天职"并握有一军之权的曾将军来说并非易事，是由信任到被歧视，由一统全军到处处被分割，由挥师北上到固守孤城，经过痛苦的回忆、矛盾和斗争，反复的思索及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之后，所做出的明智抉择。

9月22日晚9时，曾泽生召集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和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到军部密商起义大事。曾、陇、白三人平日披肝沥胆，无所不谈。曾当即提出了反蒋起义的主张。陇耀听后很激动，就直率地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② 而白肇学则提出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的消极意见。翌日清晨，曾泽生再次做白肇学的思想工作，白表示："军座，我赞成你！"从9月22日至10月13日，曾、陇、白先后就出城联系的人选，全军官兵的心理状态，起义时间，如何对付新七军，起义的具体部署等问题，举行了七次密商，并就起义行动问题作了以下决定："第一，十四日晨派张秉昌、李峥先为代表③ 持信前往解放军方面接洽，信由白师长起草，我们三人亲笔签名，由陇耀布

---

①② 曾泽生：《长春起义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③ 张秉昌、李峥先原系六十军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团长、副团长，在梅河口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获，后经教育表现较好，放回城内做工作。

置张、李出城；第二，接洽妥当后，预定于十六日夜开始行动，除另有指示外，应采取积极行动向新七军布防；第三，布防完毕后，对其上级送信警告，对其士兵用喊话方式，说明本军意志；第四，对暂编五十二师，由第一八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各以一营兵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其师长、团长，然后挟制该师就范；第五，派纠察队维持市区治安，并由各部派员宣传、安抚，使之镇静；第六，处置好伤病及后方人员。"①

10月14日，在人民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之日，曾泽生、陇耀、白肇学当机立断，派张秉昌和李峥先携带三人的联名信，到穷岗子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前方办事处联络起义问题。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同志同意接谈，并告诫要做两手准备。16日，向张秉昌、李峥先传达了兵团的五点意见："一是表示欢迎六十军起义，但指出：如果不是真心起义，而想突围，我方将采取行动坚决消灭之；二是六十军下定决心起义，应立即调转枪口，沿长春中山大街（六十军和新七军防区的分界线）对新七军和郑洞国的东北副'剿总'司令部布防；三是准备配合我军消灭新七军；四是建议曾泽生军长用召开紧急会议的办法，把蒋介石配属六十军的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军统）及其三个团长扣押，强制该师服从指挥，以防意外；五是要曾泽生、陇耀派李佐、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出城商谈。"② 团政治部即派车送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去复命。

10月15日，锦州大捷，全歼范汉杰部10万余众。从此，人民解放军关闭了东北的大门，为辽沈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0月16日，长春晴空万里，正午12时左右，国民党空军两架P51飞机在中正广场（今人民广场）附近，投下了带有红

---

① 曾泽生：《长春起义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② 刘浩：《争取滇军工作的回顾》。《长春起义纪实》，第262页。

布标志的封筒一件，内有“国防部代电”及蒋介石给郑洞国的亲笔信，这是蒋给郑下的第三道突围手令。电文如下：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①

亲笔信的内容与电令大致相同，内称已派二〇七师去清原接应，务必率长春守军突围，否则将不能等候矣。②

郑洞国接到“总统手谕”之后，即电话通知新七军和六十军军长及兵团正副参谋长速到官邸开会。曾泽生此时正在吃饭，接到郑的紧急电话后，心中顿生疑惑。因为按原计划，去解放军联络起义的张秉昌和李峥先应于15日下午返回，而时至如今尚无消息，担心是否被新七军抓去而走漏了风声。为了预防万一，曾泽生电话陇耀和白肇学：“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③ 曾泽生做了最坏的打算。曾到兵团部后，当得知是看“代电”时，一切担心，“已全然消失”。郑当即决定17日四面出击，18日突围。曾表示：“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后，即告退回防区。

16日傍晚，张秉昌和李峥先顺利返回六十军军部，向曾军长报告了“解放军欢迎我们起义”的喜讯。曾立刻电话陇、白二位师长，并决定派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正式代表六十军出城与解放军商定起义具体事宜。同

---

① ② 郑洞国：《困守长春始末》。《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221页。

③ 曾泽生：《长春起义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13页。

时，曾泽生亲往上述两个师，进行起义发动。并及时扣留了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一、二团团长，命副职听从指挥，率部一起行动。

李佐和任孝宗带着蒋介石给郑洞国的手令和“国防部代电”及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到达了解放军驻地。唐天际主任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欢迎第六十军全体官兵起义，起义后的待遇完全同解放军一样；六十军不必参加解决新编第七军的作战，由解放军在接收六十军防务后，再解决新编第七军；六十军按照指定路线，开赴九台进行休整。[1]双方谈妥之后，刘浩作为解放军代表，随同六十军代表一起进城。

16日晚，是个不眠之夜，在六十军即将起义的前夕，曾泽生在裕昌源面粉厂临时指挥所的烛光下，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信，想规劝他们共襄义举。给郑洞国的信原文是：[2]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窃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春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① 《围困长春》，第217页。

② 曾泽生：《长春起义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17页。

戎缓！

曾泽生 敬启

17日清晨，郑洞国看完信对信使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同日上午，郑委派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前往六十军防区会晤曾泽生，希望"从长计议"。曾泽生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三位说客讨个没趣，本想继续纠缠，结果被下了逐客令。曾泽生返回裕昌源后，会见了解放军代表刘浩。刘浩说："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欢迎你们呢！"当日下午，曾军长在刘浩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一兵团政治部，受到唐天际的热烈欢迎。在有关防务交接商定后，曾泽生又返回指挥所进行具体部署。是日夜，解放军悄然进城，六十军同时撤出城外，开赴九台休整待命。

18日晨，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了原六十军防区，但已阻止不了六十军广大官兵反蒋起义，走向光明的决心。中午时分，当六十军起义官兵行至卡伦时，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委、唐天际主任等在兵团政治部热烈欢迎六十军起义将领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等人。以后，这支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完整地纳入了解放军序列。

3、新七军投诚

六十军光荣起义，使国民党军在长春的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国共两军隔街对峙，枪口对枪口，国军欲逃无路，欲守不能，除了起义或投诚，都是死路。在兵团部的核心圈内，除郑洞国、军统特务头子项乃光、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及蒋介石的两个督察官等少数顽固分子力主突围外，其他将校官佐及政府要员，则各有各的打算，千方百计地寻找一条生路。

17日上午，郑洞国曾召集新七军师长以上军官会议，由于

别无良策，只好怏怏而散。当日下午，沈阳电令务于十八日突围，郑氏随即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会上惟有崔垂言、项乃光等坚持要突围，而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则表示："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不过是又要无辜地死伤几万人罢了。"此时，项乃光、崔垂言两人用手指着史说的脸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拖到长白山打游击，难道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吗？"[1] 于是史说愤然离去，会议不欢而散。

17日晚，解放军代表刘浩通过电话对郑洞国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而郑洞国则回答："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2] 据刘浩回忆，郑氏当时还说过"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话。[3]

正当郑洞国力主突围，其他将领举棋不定，一筹莫展之际，新七军暂编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凤祥已率先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17日晨，当姚凤祥得知六十军起义，解放军已开进东部防区，"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的情况下，经过对长春局势的反复考虑，认为只有起义，才是一条活路。[4]为了稳定军心和争取一个能与解放军联系的环境，他命令团属各营，"无命令不准打枪"。[5] 是日上午，该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来到二团团部。姚与吴是同乡，平素相处甚佳，当吴得知姚的主张后，双方不谋而合。当时该团一营地处前沿，与解放军仅一街之隔，喊话之声，不绝于耳。为及早与解放军联系，二人相约，吴祥伯往一营设法与解放军接头，而姚凤祥则到军部探听虚实。此时军部尚无任何应变举措，姚旋即返回团部。吴

---

① 史说：《困守孤城的新编第七军》。

② 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3页。

③ 刘浩：《争取滇军工作的回忆》，《长春起义纪实》，第265页。

④ ⑤ 姚凤祥：《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前后》，《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84页。

祥伯请来的解放军代表周黎，是独九师二团团长，另有警卫员一人。双方见面后，姚凤祥非常敬佩周团长勇敢精神。经过暂短的会晤，双方协议保证互不侵犯，并由姚团向周团指挥所架上电话线，以资联系。

姚凤祥的果敢行动，在新七军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成了与解放军联系的核心人物。

18日上午10时，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在官邸召集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会上有些人主张突围，认为军人应该绝对服从。多数人则反对突围，理由是："第一，士兵体力太弱，部队饥饿将近一年，大多数都是腿脸浮肿，患夜盲病，就是徒手行军，日行也不过四五十里，何况有严重战斗任务的急行军呢？第二，长春部队退往清原、沈阳，但同时清原、沈阳部队又退往山海关，势必由我们担任后卫战，这不明明是为他们替死？第三，千多户家属及3 000伤残病员早应撤退，也容易撤退，可是置之不理，今日要我们忍心抛弃他们，这算什么指挥道德！这些人虽说出了平日不敢说的话，可是还不敢提出更进一步的主张。"[①]由于彼此争执，意见不一，最后由史说与龙国钧商定，"认为军心已涣散，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事，徒然将全军引入死路"，不如"引导全军投诚"。[②]史、龙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为防止主张突围的官佐铤而走险，副军长史说于当日下午4时，发布一道作战命令，准许他们率自己的部队向南突围，规定时间出击。这些部队长接到命令后，才实际估量了情况，考虑到突围后可能的后果，然后改变主张，自动放弃了突围打算，同意一致和谈协商放下武器。[③]

18日晚10时许，新七军和谈代表：兵团炮兵指挥官王及人、军新闻处长杨天挺、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六十一

---

①②③ 龙国钧：《长春解放经过》，《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第255、256、258页。

师副师长宁伟、暂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凤祥、暂五十六师第一团团长涂尚均共七人与解放军代表解沛然、白驰驹、廖中符、周黎、杨绪亮、王石俊等在东光寮（今吉林省建筑机械厂址）地下室进行了谈判。[①] 新七军提出的协议内容如下：

一、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新编第七军投诚人员不参加群众斗争大会，并保障任何人亦不得在群众大会上受斗争。

三、保留由新编第一军老弱伤残官兵经营××农场，并允许自由耕种。

四、对愿参加革命工作的，给予工作，不愿参加工作的，遣送还乡。

在上述协议上代表签字的是：解沛然、彭克立、宁伟、姚凤祥。[②]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代表向新编第七军提出如下要求：

一、新七军谈判代表杨天挺、宁伟、彭克立、涂尚均、王及人、吴祥伯、姚凤祥于今晚（18 日）12 时回部后，立即下达该军官兵放下武器之命令。

二、10 月 19 日上午 10 时，由新七军司令部派大卡车 3 辆并由该军派代表乘车接解放军代表前往接收，不得有任何冲突。

三、新七军所部驻守中央广场之一周（中央银行、电讯管理局、省政府、孝子坟、励志社、高等法院、南站、青年中学、关东军司令部、海上大楼等）10 个据点首先撤出，并由新七军派代表直接将解放军部队带至该处控制，以便保护新七军官兵及官兵之家属和建筑物。

四、保证十月十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将全部放下武器之人

---

① 杨绪亮：《进驻东光寮前后》，《新七军投诚》，第 138 页。

② 姚凤祥：《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前后》，《辽沈战役亲历记》，第 390 页。

员集中于指定地点（校级以上军官及其家属在原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尉级军官在新七军教导大队）。

五、将放下之武器和弹药及一切军用品分别集中于适当地点（由解放军代表小组指定）。

六、所有仓库及建筑物解放军一时不能控制则由新七军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或丢损，并由新七军派代表交解放军管理。

七、第一兵团司令部及新七军所属电台和机要密码无条件全部交出，不得有任何损坏和私存。

上述七条，新七军谈判代表全部负责完成。签字有：杨天挺、宁伟、彭克立、涂尚均、王及人、吴祥伯、姚凤祥。[1]

会谈结束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沛然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郑洞国信》交给了新七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委托转交郑洞国。信的内容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

[1] 宁伟：《新七军放下武器前后》。《新七军投诚》，第269—270页。

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1]

王及人回到新七军军部后，即将周恩来的信交与副军长史说。史说在其回忆录《困守孤城的新编第七军》一文中说："因信没有封口，我便抽出来看了。字是楷书，象是由电报转录的……。我派一个参谋送去，因兵团部的特务团尚在打枪抵抗，市内秩序亦乱，此信并未送到，这个参谋也未对我回报。"[2] 据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二团参谋长杨绪亮回忆："19日下午，我兵团司令部送来一封周恩来同志给郑洞国的信，是用毛笔写的，要我们转交郑洞国先生。当时，我正忙于接收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送去，就把信交给了廖师长[3]。黄昏时，我独九师的一、三团已从双阳、范家屯进入长春。廖师长命令一团到中央银行周围接替了我团三营防地。一团政委朱军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过去认识郑洞国先生，廖师长就派他去送周恩来给郑的信。后来得知他在中央银行见到杨友梅和郑洞国。"[4] 从上述史说和杨绪亮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解放军进城部队通过多种渠道力求将周恩来的信送达郑洞国，以实现中央军委给兵团部的指示：郑洞国及新七军乃黄埔嫡系，应力争其投降或起义，这对全国的影响将是极大的。[5]

1948年10月19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进城部队在新七军代表的引导下，在全市各重要街区开始接收新七军的投诚。当独立第七师二团进至范家店以东时，新七军的一个营已集合完毕，在楼门上挂起了一面小白旗，武器弹药整齐地排放在大

① 《周恩来选集》，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② 《新七军投诚》，第248页。《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③ 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师长廖中符。
④ 杨绪亮：《进驻东光寮前后》。《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136页。
⑤ 杨尚坤：《随解方参谋长进城》。《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159页。

街北侧，许多投诚官兵拍手向解放军致意。在兴安桥（今西安桥），新三十八师美械山炮营的16门山炮已整齐排放在操场上，等候接收。有的墙上还写着“欢迎解放军来接收”的大字标语。[1]独立第九师按规定地点，接收了新七军一个师部，二个团和一〇五榴炮营等单位，该师二团全部换上了美式武器。当时参加接收任务的部队，还有独立第六师和十一师。

下午5时，除郑洞国兵团部及特务团占据的中央银行大楼外，其余国民党守军已全部放下武器。

4、郑洞国放下武器

19日上午，当新七军全体官兵向解放军投诚之际，郑洞国所属兵团部机关及特务团仍固守“中央银行”大楼，负隅顽抗。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形势下，郑氏遂将长春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不久，杜聿明来电，言其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将郑接出，问有无降落地点。郑电复：“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2]

为争取郑洞国放下武器，包围“银行大楼”的独立第九师一团政委朱军曾电话郑洞国：“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新七军已投降，银行大楼这弹丸之地，你们是守不住的，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郑氏则回答：“败军之将，何以谈和”，就把电话挂断了。当朱军第二次打通电话时，接电话的是国民党军兵团部参谋处少将处长郭修甲，他希望解放军派代表到“银行大楼”谈判。

19日下午，独九师一团政委朱军、团参谋长师镜及两名警

---

① 程启文：《长春围困战中的独七师》，《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49—50页。

② 郑洞国：《困守长春始末》，《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233页。

卫员应邀前往“银行大楼”。谈判中，郭修甲提出三个条件：

1. 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2. 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发表谈话。

3. 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不要说自动投降。

上述一、二条双方同意，唯第三条宋军表示不能同意。双方还商定：21 日 6 时，解放军接收时，驻“中央银行”大楼的特务团对空射击 20 分钟，然后放下武器。[1]

为促使郑洞国走向光明之路，国民党兵团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郭修甲等人与解放军代表秘密接谈，并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以造成伤后被俘的假象，其用心可谓良苦。

20 日晚 8 时，驻“中央银行”大楼的特务团团长龚次言就 21 日晨放下武器问题作了具体布置，杨友梅到会讲了话。同日晚 11 时，郑洞国向蒋介石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其电文如下：

> 10 月 19 日下午 7 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 10 月 19 日竟日激战，毙伤匪 300 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落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祗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

---

① 师镜：《陪同郑洞国先生走出银行大楼》，《长春文史资料》1988 年第 2 辑，第 148 页。

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亲印。[①]

从上述电文来看，郑氏似有“成仁”之意，但他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段罢了。在19日下午，郑氏通过郭修甲与解放军代表谈判中所提出的三个条件，说明郑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只好步新七军的后尘，走放下武器投诚之路。

21日清晨，银行大楼忽然枪声大作，轻重机枪、冲锋枪和步枪一齐对空射击，象爆豆似的响成一片。据当时系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二团二营教导员罗兆雄回忆：“当时，天空阴雾蒙蒙，可以隐约地看见敌人在银行大楼顶上来回走动，有的高叫着：‘快打呀，打完了好走。’枪声响了约15分钟，一个人大声喝到：‘停止射击，停止射击。’一会儿，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不多时，银行的铁门打开了，门前的工事也推倒了，我们的人冲进银行。”[②]5时许，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政委朱军和团参谋长师镜首先进入银行大楼内。因朱军返回带领部队，师镜直奔三楼会议室。此时，沙发上坐着三个人，见解放军进入，便站起身来。师问：“哪位是郑司令官？”站在中间的人说：“我就是。”其他两人，一位是兵团部副参谋杨友梅，一位是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师说：“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进来了，现在请司令官随我出去。”[③]

郑洞国等人在师镜的陪同下，步出银行大楼，乘车前往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驻地四家子，受到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的热情接见。郑洞国属下特务团官兵400余人，也同时放下

---

① 郑洞国：《困守长春始末》，《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234页。

② 罗兆雄：《10月17日21时30分第一个由城南进入市区的部队》，《新七军投诚》，第145页。

③ 师镜：《陪同郑洞国先生走出银行大楼》，《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149页。

武器。至此，国民党军在长春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不攻而克，宣告解放。

5、市民欢庆解放

10 月 21 日，历经战火和饥饿的考验，饱经忧患的长春，终于回归于人民。长春解放之日，中共中央特电祝贺。电文如下：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锦州解放，歼敌 10 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此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工作人员与广大民众努力奋斗的结果。特电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8 年 10 月 20 日[①]

长春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当即任命邹大鹏为长春特别市政府市长，张文海为副市长，并成立了长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唐天际为主任，石磊、邹大鹏为副主任，以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生。

解放后的长春市，万众欢腾。据当时《东北日报》报道："两年来笼罩全城的饥馑与恐怖阴影，已倏然消逝。市民一敛困惫愁容，欣集街头争看解放军布告及前线捷报，每遇我指战员及入城工作人员则纷纷倾吐过去苦衷，亲如一家。"长春各区群众先后举行祝捷大会，欢庆长春和吉林全境解放。

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备妥了 600 万斤粮食运往市区，每日运进煤炭 1 200 余吨，大力挽救惨遭蹂躏、饥饿待毙的大批灾民。市民获米如珠，齐称人民政府和解放军为"人民父母"、

① 《东北日报》1948 年 10 月 22 日。

"救命恩人"，流下了欢欣感激的眼泪。

1948年11月28日《东北日报》转载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第二号作战公报，公布了长春围城及六十军起义与新七军投降之战果统计称：

"长春围城及六十军起义与新七军投降，敌军丧失兵力95 855人。分别统计如下：

（一）围城战果：自6月19日至10月6日，我共收容投诚官兵18 101人，携来武器计有：六零炮10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8挺，冲锋式8支，步马枪1 927支。另在历次外围战斗中，共计歼敌4 328名，合计歼敌22 429名。

（二）六十军起义：起义参加我军官兵共计26 000余名，配属武器计有：各种炮290门，其中榴弹炮4门，山炮8门，自动炮2门，战防炮1门，火箭炮4门，步兵炮14门，迫击炮70门，六零炮187门，另有：重机枪124挺，轻机枪696挺，冲锋式1 077支，战防枪14支，枪榴筒142个，汽车27辆，子弹609 979发，炮弹5 498发。

（三）新七军投诚战果：（甲）投诚部队番号，包括：第一兵团司令部，新七军军部及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军直属之骑兵团，汽车营等；地方部队番号，包括：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旅第一旅、第二旅，长春警备司令部，吉林师管区，松北五省流亡政府等单位。（乙）投诚人数，计正规军官兵32 000余名，地方军官兵7 926名，另收容各医院伤病蒋军官兵7 500余名，合计共47 000余名。（丙）缴出武器计有：各种炮317门，其中：榴弹炮8门，山炮9门，战防炮28门，平射炮24门，火箭炮14门，迫击炮51门，六零炮183门，另缴：重机枪146挺，轻机枪845挺，冲锋式1 205支，战防枪21支，步马枪13 435支，短枪170支，讯号枪9支，枪榴筒18个，掷弹筒25个，电台11部，无线电话55架，电话总机41架，单机240架，电线150里，飞机1架，装甲车2辆，汽车419辆，

大车 49 辆，子弹 4 509 278 发，手榴弹 12 848 个，炮弹 8 150 发，及其他仓库物资等全部完整。"[①]

在解放战争时期，长春的优秀儿女为家乡和全中国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有 6 200 余人。[②] 在围困长春的战斗中，"从外围战斗到围城结束，经历 30 余次大小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军伤亡 4 000 余人，有上千名干部、战士，长眠于长春外围，其中还有团营干部。"[③]

长春和平解放，史称"兵不血刃"。然而这和平却是用血换来的。除了在战斗中伤亡的干部、战士以外，还有12万长春父老兄弟姊妹长眠在这块沃土上。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长春解放后，长春人民在中共长春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克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各项工作中，取得了重要成就。长春人民以支援全中国的解放，建设新长春的实际行动，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

① 《长春党史资料》第 1 期，第 84—85 页。

② 《长春英烈》，第 144—353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③ 《围困长春》，第 250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后　记

本书第一至第七部分由霍燎原执笔，第八至第十三部分由崔国玺执笔，最后经原建新同志审阅定稿。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庆祥同志及其他诸位委员的鼎力支持，使本书得以付梓与读者见面。在查阅档案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还得到吉林省档案馆、长春市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长春市图书馆、长春市公安局档案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希望本书能在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以实现我们的初衷。

作　者

1995 年 3 月于长春

沦陷中的长春

——在灾难和斗争中崛起

（电视专题片史实框架文字稿）

●王庆祥

[编者按]

长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并因此而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当"九·一八"的炮声在沈阳响过以后，它是最早遭到日本军队攻击并经历了最激烈战斗的城市，它是在沦陷中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的。作为这次大战中由日本法西斯所建立的第一个殖民主义政权的"首都"，它所承受的灾难是无比惨痛的，它所进行的反抗斗争也是史无前例的，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又把它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后方和基地，把它绑在法西斯的战车上，使之蒙受污辱和亵渎，又何等惨痛！直到"八·一五"光复，当那个伟大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长春人民从灾难中走出，又何等欢欣鼓舞！而如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兹全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50周年之际，政协长春市委员会决定出版《从沦陷到解放》一书。同时，政协长春市委员会还与长春电视台联合编摄一部电视专题片《沦陷中的长春——在灾难和斗争中崛起》（后定名为《沉默与诉说》）。它通过伪满年代遗存的建筑，邀请学术界第一流专家评述当年军政、经济和文教等方面的殖民统治，以及长春和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再现长春沦陷十四年的史实，展示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这部专题片将在“八·一五”光复伟大的纪念日那天播出。现将该片框架文字稿和部分专家的谈话稿附于《从沦陷到解放》书后，以飨读者。

一、长春的开发与设治

长春，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心，位于松花江、伊通河、饮马河纵横其间的松辽平原的中心。

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松花江、伊通河与饮马河流域从事渔猎和耕作。

（画面：石器时代遗址和“榆树人”化石。）

秦汉时期，北方的肃慎族在这里生活过。

隋唐时期，靺鞨族在这里生活过，参预创造了发展中的渤海文化。据近年吉林大学董玉瑛教授的研究，渤海时代已出现古城，即今长春市南关区南部的宽城子，“城垣之形颇不规则，南北袤约四里，东西广约七里，盖东西广于南北一倍，故有宽城子之名”。

（画面：学者访谈、渤海国典籍及研究成果书影。）

北宋时期，契丹族在这里生活过，但这时古城已毁于战火。

南宋时期，女真族在这里生活过。

辽金两代，这里由建于农安县的著名的黄龙府统领。

（画面：农安古塔；净月潭水库南岸金朝开国重臣完颜娄室家族墓葬遗址石人石羊等物，以及现存旅顺博物馆的该墓出土的文物十余件。画外音：完颜娄室，生于公元1078年，是金代开国重臣，曾任黄龙府万户，追随金太祖发动反辽战争，直到擒获辽代末代皇帝天祚帝。死后葬于封地石碑岭。）

在元朝，这里隶属辽阳行省开元路，其间，从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蒙古族自西北向东南迁移，这里便成了他们的游牧地。

明朝时，在这里设置了隶属于奴儿干都司的亦东（伊通）河卫和亦迷（饮马）河卫，仍然属于蒙古族游牧地。

清初时，这里是蒙古族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辅国公的封地，在此后的清政府各级文书中开始把这里称作“长春堡”。

（画面：今长春郊区尚有的“永春乡”。）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设长春厅，任命吉林长春厅理事通判统管，隶属于吉林将军，建衙署于伊通边门附近的新立城。

（画面：新立城长春厅衙署遗址。）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长春厅衙署迁到宽城子。当时这里已有了农村集镇的规模，居民主要还是农民，但已有作坊和较为集中的商业店铺，设治后又增建了衙署、监狱、街道、城墙和城壕等。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始建长春城，在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有南北走向的南大街与北大街，东西走向的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与四道街，此即后来所称的“旧城”。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长春厅升格为“长春府”，仍隶属于吉林将军。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长春府，改设长春县，隶属于吉林省吉长道。

（画面：吉长道尹衙门遗址。）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设长春市政公所。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改称长春市政筹备处，以废道制，隶属吉林省。

二、帝国主义染指长春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的魔掌伸向中华大地的同时，也伸向了长春这块富庶而重要的土地。

1844年，法国传教士首先在小八家子（今农安县小合隆乡）兴建了天主教堂，40年后又在长春城内东四道街分设长春天主教堂。继而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长春开办医院或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画面：长春市内教堂旧址。）

1860年以来，俄、日、英、法等国不断派出“考察”人员，进行调查、勘测，为进一步侵略作准备。

1903年，俄国人利用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中东铁路筑路权，在二道沟建成宽城子火车站，同时修筑了站房、兵营、制粉厂、俄国员工住宅和两条俄国式街道：秋林街与巴珊街。

1907年，日本人利用日俄战争后取得的特权，在头道沟、二道沟之间强购民田，开始修筑长春车站及其周围的“满铁附属地”，包括给水、排水、电力、煤气、电话、绿化、柏油马路等设施，实为后来在这里建设“国都”的一次预演。

（画面：西广场贮水塔，全城第一座水塔；铁北电厂，全城第一座电厂；东公园，已平毁，全城第一座公园；大和旅馆，今春谊宾馆，全城最早拥有全套水、电、卫生、供暖设备的西式建筑。）

1909年，由于长春地理位置及其重要作用逐步显露，清政府被迫签约，将长春作为商埠开放，设立开埠局；还举行了开埠仪式。从此，帝国主义资本进入长春，他们划定租界，开办

工厂和商业机构，进行商品输出输入。其间还雇了英国工程师邓芝伟主持商埠地的规划，从今四道街至长春车站由 16 条马路和 29 条街巷组成。商埠区内有 42 种行业，各种公司、店铺 1 550 多户，成为外国取得廉价原料和倾销剩余产品的经济侵略基地。

1911 年春，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南邻六合屯（今上海路南）购地兴建领事馆，在此之前俄国早设了领事馆，英、美两国也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在长春设馆。到辛亥革命前夕，长春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了。清政府甚至拟议把东三省总督衙门迁到长春来。

（画面：上海路南日本领事馆旧址。）

三、本世纪 30 年代初的长春

由清朝设治以后所建的旧城，20 世纪初年开埠以来发展起来的商埠地和日、俄"铁路附属地"等三部分组成，面积约 21 平方公里，人口 12 万余。

（画面：图片。）

日本驻长春的军警机构与势力：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司令部及下属第四联队第一、二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关东宪兵队，长春分队，关东军卫戍医院分院，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察署，"满铁附属地"警察署及派出所。以上总兵力约2 800人。

（画面：旧址实拍。）

1927 年，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策划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东北为中心的"积极政策"，决定了"以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方针。此后，日本在长春的军警等武装力量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随意超越"铁路附属地"的范围，更不顾规模上和时间上的限制，或在城中横冲直撞扰乱市街炫耀武力，或在郊区肆意践踏农田达 1 500 余亩。1931 年 9 月 2 日，日军还

在长春城西的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进行了攻击长春的演习。

（画面：图片。）

1931年春夏之间，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领事田代重德，唆使朝鲜侨民擅自在长春县三区万宝山附近修筑水渠，毁田种稻，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日方一面调动军警开赴万宝山镇压当地村民，一面制造谣言煽动仇华情绪，并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抗议”，这就是所谓的“万宝山事件”。他们恣意挑起这一事件是为了煽起日本国内战争狂热情绪，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从而加紧调兵遣将，进行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画面：图片。）

1931年9月13日至1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率领若干参谋，“视察”了长春与公主岭等地，“检阅”了当地日军的军事活动，并训令日军要尽保卫日本“在满利益”的“天职”。

（画面：本庄繁照片。）

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制定的第一期作战计划中，攻占长春与攻占沈阳和南满，同为重要步骤。

（画面：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书影。）

四、在“九·一八”炮火中沦陷

1931年9月18日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随即派兵攻打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不到5个小时，即9月19日凌晨3时5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下令：“步兵第四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负责长春的警备，同时秘密准备攻击该地附近的中国军。”日军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少将即命对长春发动总攻击。

（画面："九·一八"事变历史资料片镜头。）

9月19日3时10分，日军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长黑厂武城少佐率第五、第七两个中队，偷袭南岭兵营中国驻军。东北军炮兵第十九团和步兵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一团毫无准备仓促应战，36门大炮被毁，有些士兵还在梦中就被残杀，坚持到下午4时，兵营陷落。长春的战斗是最激烈的，共毙伤日军145人，其中打死66人。

（画面：在旧址前采访见证人。）

9月19日凌晨4时10分，日军步兵第四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率第一大队第一、第二、第三中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以及机枪中队，偷袭二道沟兵营中国驻军。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三团第二营官兵奋起抵抗，营长傅冠军阵亡，官兵伤亡很大，坚持到上午11时10分，兵营失陷。

（画面：采访见证人或知情人；图片。）

9月19日午夜前，日军先后侵占了长春市公安局、市政筹备处、吉长镇守使署、长春县公署、无线电台、《大东报》社和各银行等机关。市政筹备处长周玉柄和市公安局长修长余等人按照吉林省公署代主席熙洽的"不准抵抗"的命令，向日军缴械投降。

（画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书影。）

五、溥仪与长春

由于长春沦陷，有一个人与长春发生了联系，他就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1959年12月4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大厅内，主席台上悬挂着巨大横幅"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由辽宁省高级法院代表宣读特赦人员名单，头一名便叫到"爱新

觉罗·溥仪”，这时并没有思想准备的溥仪，走到主席台前没等接过特赦通知书就激动得大哭起来，哭声响彻大厅。

（画面：抚顺战犯管理所谢罪碑、溥仪囚室、俱乐部大厅、溥仪特赦时痛哭流涕照片。）

溥仪痛哭，是因为想起了对民族和祖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认为自己百死不足以蔽其辜，如今却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赦免，又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溥仪痛哭，他不能不想起在长春那座虚伪宫廷中所度过的可憎岁月，也不能不想起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当年对他的豢养和利用，以及他们之间难以启齿的勾结。

（画面：镜头由溥仪痛哭照片转向历史。）

溥仪3岁登基，成为大清帝国宣统皇帝，6岁退位，根据中华民国的优待条件继续盘踞在紫禁城内，又当了13年“关门皇帝”，于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不久，即被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接入公使馆内“保护”起来，又在1925年2月23日（旧历二月初二日）这个民间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把溥仪送往天津日本“租界”内，长期豢养。7年后“大用”的机会终于来了。

（画面：借用纪录影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内从溥仪登基至溥仪到天津张园的有关镜头。）

1931年6月下旬，正在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高等科读书的溥杰，忽然接到由日本鹿儿岛步兵第45联队大队长吉冈安直少佐寄来的一封信。溥仪在天津时，吉冈安直任日本驻津部队上尉参谋，常与溥仪酬酢来往。是日本帝国主义派去专门搜集溥仪情报的人，到了伪满时期，他又担任溥仪的“帝室御用挂”，更靠监视溥仪有功而扶摇直上。溥杰收到吉冈的信后，即以金秉藩这个化名于1931年6月24日致函乃兄溥仪，信中说：

金秉藩谨禀：奉二十四日手谕，现藩之意，于考试完毕后即赴鹿儿岛吉冈大队长之约，在海边约住七八日后即

拟候船归国。一二日中藩拟与吉冈一信先辞此次之约。（闻人言大队长所入甚薄，等赴其家时彼竭力招待，藩殊觉不忍也。）不过，彼果然竭力邀约时，藩亦不好过拂其意，只得在其家小住数日也。藩届时拟先与之去信，请其勿庸过于招待，过于招待殊不敢住等语，与之去先行约好也。

（画外音：这封信活现了溥仪通过溥杰和吉冈而与日本军界互相试探的微妙的传神关系。）

溥杰在其自传中叙述他与吉冈安直见面以后的情形说：

我坐的火车刚进鹿儿岛站，吉冈就不熟装熟地上来打招呼，雇车将我送到他的家里。他每天都领我到海滨游泳或到附近的名胜古迹游览，带到联队参观，到军官食堂和旅团长未松茂治家聚餐。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才鬼鬼祟祟地对我讲："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的到来。"

1931 年 7 月 22 日，溥杰回到天津，第二天便被溥仪召见，遂把在鹿儿岛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兄长。7 月 29 日来访的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向溥仪赠呈一把日本折扇，扇面上有"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了越国，越国勾践被俘后卧薪尝胆，与忠臣范蠡等同心协力，终于灭吴而恢复了越国。溥杰当时向溥仪讲述在日本引用这两句话的典故：1331 年，日本后醍醐天皇为灭掉镰仓幕府而举兵，因战败被幕府所俘，随即被流放到日本海的隐岐岛。流放途中，天皇在日本的中国美作地方的一个院子里休息时，一位名叫儿岛高德的忠臣就把这两句话刻在院中的一棵樱花树干上，鼓励天皇要学习中国的勾践，为恢复故土而奋斗。

（画面：溥杰在日本留学时照片；《溥仪自传》内书影。）

1931 年 9 月下旬，日本驻天津司令官香椎浩平找溥仪谈话，劝他到东北去"主持一切"。溥仪在交待材料中写道："我

一听正合我意，我心里很高兴，但因为这关系着我的前途，我就和我的老臣陈宝琛、秘书胡嗣瑗商议，他们劝我不可贸然轻信，要慎重从事。恐其中有诈，所以我才没有答应。”

（画面：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交待材料，载《战犯情况报告》第32期，1959年11月5日。）

继尔，溥仪派陈宝琛的处甥刘骧业以及佟济煦、商衍瀛携带郑孝胥致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信，潜赴大连、沈阳、长春和吉林等地探听虚实。

（画面：刘骧业、佟济煦、商衍瀛照片。）

1931年9月30日，溥仪在天津海光寺日本兵营内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住宅，会见关东军参谋部陆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派来的代表上角利一，遗老罗振玉带着远支宗室熙洽（时任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亲笔信，敦请溥仪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借助日本人的武力，先据满洲，再图关内。香椎浩平也以“天津治安不好，难以保证安全”为由，促其动身，溥仪当时未作答复。

（画面：《我的前半生》书影，相关图片。）

1931年下旬，溥仪命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肃亲王之子宪原和宪基，携带他的亲笔黄绫信潜赴东北，投奔洮南镇守使张海鹏部任职。溥仪在信中鼓励张海鹏静待复辟大清的时机。与此同时，溥仪在天津静园命随侍整理行装，特命贴身侍从李国雄砸开汽车房直通院外的侧门门锁，以图潜逃时能够避开已经受到监视的正门。

（画面：李国雄回忆录《伴驾生涯》书影及李国雄照片。）

1931年10月1日，《商报》刊出消息，题为《暴日拟利用溥仪，鼓吹建立满蒙独立国》，揭露日本“意在袭亡韩故智”。

1931年10月7日，《新天津报》刊出消息，题为《日人治下之满蒙皇帝梦》，揭露说：“日本鼓动满蒙独立，近日愈形显著，且更积极，昨又宣传拥戴溥仪为大皇帝。”

（画面：剪报照片。）

当时，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朱益藩都认为日本方面态度不明，反对溥仪出关，"但主拒，不主迎"，连溥仪的"御医"萧丙炎也反对他前往东北。

1931年10月7日，溥杰自日本致信溥仪，希望他何去何从早下决断，不必因臣下谏阻而犹豫不决。信中说：

> 奎秉藩谨禀：谨于月之六日奉到手谕三件，无任欣悦之至。夫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我君之博采众议，折衷短长，实有斯气象。惟只能以之寡过少尤而已，至于决大疑、定大策，则须本心中所定大纲而行其余细目，自须以妥密周详出之，盖大人始可任巨负，小人则不过辅之助之，助荷重负之人以期万全而已。孔子曰再思可矣，诗曰筑室道谋皆可引为大戒也。

（画面：溥杰当年照片。）

1931年10月10日，溥仪公开发表谈话，故意隐瞒真相，否认将赴东北。《新天津报》刊出了他答记者问的讲话：

> 我自辛亥逊政，本十分信任国民，不但中原原有疆土还之民国，连我祖宗创造之满蒙，及继续开拓之西藏，均一举付之国民之手，成为五族共和。原希望刷新政治同享太平，二十年来一切不闻不问，不料并我先祖陵墓所在之故乡，先已变为今日情状，惟有与国民同声伤叹，岂忍藉机行其攘夺之举！全国真正之民意，即是余之意见。余视权位如草芥，日夕所不安者，惟世界之纷扰，与人民之涂炭为忧耳，其他岂能移余之志！

（画面：剪报照片。）

1931年10月11日，也就是溥仪答记者问的第二天，即派父亲载沣家的家庭日语教师远山猛雄，带着溥仪致日本陆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黄绢亲笔信（郑孝胥签名副署），前往日本，联络复辟清朝有关事宜，信中写道：

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往见，诸当面详。

1946年8月21日，溥仪在东京法庭上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时，尽管日本战犯的律师布莱克尼已经拿出了黄绢信，还是被溥仪坚决否认了，只见他象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了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然而，黄绢信确实是历史事实，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明白地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原委。

（画面：溥仪在东京法庭上作证照片；《法庭上的皇帝》书影。）

1931年10月19日，《商报》刊出消息：首都（南京）抗日救国会致电溥仪，"劝善勿中日人奸计，应团结一致对日，以复华夏光荣历史"。

同日，《庸报》刊出消息：陆军第56师特别党部致信溥仪，信中写道："我中华五族人民利害相同，生死与共，必须精诚团结，始能永保整个国土。我公深明大义，当不至为彼野心日人所利用。如有不肖之徒，甘为张邦昌、李完用第二，我全体武装同志势必长戈北指，歼此公仇，祸福之机尚祈抉择。"

（画面：剪报照片。）

1931年10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刊出消息：张学良副司令发表谈话说，溥仪等"运动组织独立政府事，凡稍具时势知识之中国民众，均承认此种无聊之努力必致失败"，又说，溥仪真这样做的话，也肯定"只为外人之傀儡"。

（画面：剪报照片。）

1931年10月28日，《天津民国日报》刊出消息：蒙藏委员会委员兼立法委员诺那呼图克图电告溥仪，"共体时艰，毋为倭奴傀儡"。

（画面：剪报照片。）

1931年11月2日，日本关东军驻辽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之一土肥原贤二，秘密来到津门，夜访溥仪，与之密谈。土肥原说，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在“满洲”的行动，目的只在于反对张学良，而对“满洲”毫无领土要求，并愿意帮助“满洲人民”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日本还将与溥仪为首的这个“独立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土肥原保证“新国家”实行“帝制”，溥仪则同意出任“皇帝”。他们还商量了行动日期和联络办法。

（画面：土肥原照片；土肥原到津剪报照片。）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代表面见溥仪，表示：只要他答应不住在日本或“满洲”，政府允许恢复优待清室条件；如溥仪希望离开天津，可以在北平、上海或其它任何地方自由择居，政府负责为置住宅，溥仪对此全不理会。

（画面：蒋介石照片；剪报照片。）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交代材料：

正在这个时候，日寇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来天津见我，劝我到东北去主持一切，并说日本愿竭力帮助我，尊重领土主权和我的自主，绝不进行干涉等语。我相信这是日本关东军负责人的正式表示，我就相信不疑地答应了。我认为“良机”已到，因为这正是我多年以来心里希望的事情。我想，中华民国把东北丢了，日本帮助我到东北去，我很快就能恢复祖宗发祥之地，满洲既归我统治，又“拯救”了东北人民，再以此为基地“入主中原”，就可以恢复大清帝国在全中国的封建统治了。

（画面：抚顺战犯管理所编：《战犯情况报告》第32期，1959年11月5日印发。）

剪报一束（选用）：

“土肥原到津，迎溥仪赴沈做皇帝。”（《新天津报》1931年

11月4日）

“土肥原欲挟溥仪，组织‘明光帝国’，金梁亦秘密来津游说。”（《北平晨报》1931年11月4日）

“土肥原威迫溥仪赴辽，鼓惑日侨与华人寻衅。”（《天津益世报》1931年11月4日）

“土肥原威逼溥仪，如溥仪不允前往，土肥原声称将用某种手段对付之。”（《庸报》1931年11月5日）

“将发现‘明光帝国’帝制余孽又将蠢动。”（《国强报》1931年11月5日）

“土肥原来津之大阴谋，竟威胁溥仪赴辽独立。溥氏深明大义，致被日军监视，刻虽继续诱惑，谅难入其彀中。”（《天津民国日报》1931年11月5日）

“土肥原黔驴伎俩难施，溥仪拒绝煽诱被监视。”（《天津益世报》1931年11月5日）

“溥浩然行动已失自由，原有巡捕外，新拨宪兵并特务9人，电话移入护卫室，仆役出入须检查。”（《民国日报》1931年11月6日）

“溥仪宅发现炸弹。”（《新天津报》1931年11月8日）

“炸弹充礼物，逊帝溥仪受警告，中国旅馆茶役被累。”（《天津商报》1931年11月8日）

“日租界溥仪宅，前晚发现炸弹。有人到宅送礼，藏弹果筐内。日警察署现正搜查送礼人，”（《大公报》1931年11月8日）

（画面：剪报叠出。）

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藏在一辆旧式赛车的后厢内溜出静园，化装成日本军人模样，乘“比治山丸”汽船偷渡白河，又改乘日本“淡路丸”商轮，由郑孝胥父子以及工藤忠等扈从，秘密离津出关，走上罪恶之途。

（画面：溥仪在“淡路丸”上的照片。）

1931年11月13日，“淡路丸”商轮抵营口码头，溥仪登岸后换乘火车到达汤岗子温泉，立即被封锁在对翠阁旅馆内，与外界完全隔绝。

（画面：汤岗子对翠阁旅馆实景；当时历史照片。）

1931年11月下旬，板垣征四郎以“安全”为由，打电话让溥仪迁居旅顺，随即又把他封锁在旅顺大和旅馆中。

（画面：旅顺大和旅馆历史照片。）

1931年12月25日，“皇后”婉容由肃亲王之女和热衷于“满蒙独立”的著名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之养女川岛芳子陪护，老师陈曾寿、日本驻津翻译官吉田忠太郎以及溥仪的二妹韫和、三妹韫颖随行，从海路直抵大连，暂住清朝遗臣王季烈的别墅。

（画面：川岛芳子和婉容照片；采访见证人。）

1931年12月下旬，婉容在大连听到许多关于“皇上”行动失去自由，甚至可能被害的传说，向日方联络人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哭闹，才得以前往旅顺与溥仪见了一面。三两天后，日本关东军同意溥仪迁居旅顺肃亲王府（当时肃亲王善耆之子宪章在此居住），婉容也迁此同居。

（画面：旅顺肃亲王府历史照片；拍摄肃亲王府实景。）

日方联络人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不许溥仪与外界接触，连追随多年的老臣胡嗣瑗、陈曾寿也不许在旅顺下榻，师傅陈宝琛前来看望，也只允见了一面。这期间能够接近溥仪的只有郑孝胥、郑垂父子和罗振玉等少数几个人。

（画面：《郑孝胥日记》书影；罗振玉《集蓼编》书影。）

1932年1月和2月，是溥仪与日本关东军讨价还价的两个月，郑孝胥和罗振玉作为溥仪的代表，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就“满洲新国家”的体制和溥仪的政治地位问题进行了许多轮谈判。溥仪要恢复“大清帝国”，被严辞拒绝；溥仪又表示至少要实行“帝制”，让他当“皇帝”，日方仍不允许。

1932年2月23日下午，溥仪会见板垣，板垣当面向溥仪描

述了“满洲新国家”的面貌：

>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也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板垣说着又从皮包里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满洲国”五色旗和所谓的《满蒙人民宣言书》，并说溥仪作为“新国家”的“元首”，将出任“执政”。板垣脸色阴沉，说话毫不客气：“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溥仪无奈，乃以“暂任执政一年”再过渡到“帝制”为条件，接受了日本关东军安排。

（画面：《我的前半生》书影；照片。）

1932 年 3 月 8 日下午 3 时，溥仪携婉容乘专列到达长春站，受到日本宪兵队、张景惠等投降派“巨头”，以及熙洽等打着黄龙旗的满族旗人的“恭迎”。

（画面：溥仪到达长春站的历史照片和当年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溥仪》镜头。）

1932 年 3 月 9 日，在长春道尹衙门举行了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的典礼。

（画面：当年拍摄的新闻纪录片镜头。）

六、日本侵略者的选择

在当时，论面积、人口、发展程度，长春比沈阳、哈尔滨和吉林等城市的规模都小，但日本帝国主义偏偏选中长春作为“满洲国”“首都”。

1932 年 1 月 4 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殖民统治方案中，第一次提出将伪满“首都”设在长春，继而从 1932 年 1 月 22 日

起在沈阳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又连续多次召开所谓的“建国幕僚会议”，直到2月16日由张景惠出面按照关东军司令官的指令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便是确定长春为伪满“首都”。2月23日板垣与溥仪会面的时候，又得到溥仪的首肯。日本关东军遂指使汉奸张景惠等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在2月25日发表通电，宣布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其内容中即包括了将伪国都设在长春。3月10日，伪满国务院发布第1号布告，正式宣布把长春作为伪满的“首都”，3月14日，伪满国务院又发表第2号布告，将长春改名为“新京”。

（画面：《伪满国务院布告》第1、2号书影。）

把长春作为“满洲国”的“首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决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年前，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就提出，应在日军占领“满蒙”以后，把“满蒙独立国”总督的“首府”设立在长春。伪满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驹井德三的一次发言，更集中表达了他们的“意志”。驹井讲了5条理由：

1、长春位于“满洲”的中央。

这是从地理位置上看的，长春地处我国东北中心，与偏南的沈阳、偏北的哈尔滨和偏东的吉林相比，更有控制东北各地的便利条件。

（画面：地图图形示意。）

2、长春的“政治色彩稀薄”。

沈阳市作为辽宁地区的省城，吉林市作为吉林地区的省城，都曾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中心，而哈尔滨则是俄国经营多年的城市，除了奉系军阀的影响外，还有来自苏联的深刻影响。与这种情势相比，长春确属“政治色彩稀薄”，便于日本人培植并扩大新的政治影响。

（画面：沈阳大帅府建筑；哈尔滨的俄式建筑。）

3、长春地处交通要冲。

长春处在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的连结点上，又是吉长、吉敦铁路的起点，铁路运输四通八达，而且长春与日本的交通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既可通过南满铁路经大连由水路去日本，又可通过其它铁路经安东或开山屯出朝鲜抵日本，此外还可以开辟长春至东京间较短距离的航线。这就给日本殖民统治者控制伪满政权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画面：原长春火车站、铁路交通示意图。）

4、长春的饮用水丰富。

长春虽然不象沈阳、吉林或哈尔滨等城市位于辽河或松花江等较大河流沿岸，但也有水量丰沛的伊通河和饮马河从市区附近流过，而且长春的地下水非常丰富。按当时测算，足够三百万市民使用，解决城市发展的用水问题没有困难。

（画面：与长春水利资源相关的图片或镜头。）

5、长春的地价便宜。

长春市区地域宽旷，地价便宜，每平方公里只需5万余元，便于日本殖民者对土地的低价征购与掠夺。

（画面：长春市区鸟瞰或适于表现的特写镜头。）

综上所述，就自然地理条件、交通及经济“开发”条件和政治条件等多方面来看，长春都有优越的一面，把它作为“满洲国”的“首都”，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既定的侵略政策，实现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进而南侵霸占整个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北攻苏联，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驹井常常夸耀在长春“建都”之举是“最佳”选择，是“非常英明的决断”。

（画面：驹井德三照片；驹井谈话书影。）

七、伪国都建设

1932年盛夏，溥杰回到“满洲国”“首都”度假，他后来曾这样回忆当年见到的溥仪在“执政府”内见客的情景：

凡是日本军官到来，溥仪总是随到随见，甚至有一次日本的校级军官带着朋友来参观“执政”的大客厅并抚摸“执政专用雕椅”。来时既未通知溥仪，也不办任何手续，便直接找溥仪的佣人吴长鸣要钥匙开门，吴也没有告诉溥仪便开门延入。溥仪当时对日本“客人”敢怒而不敢言。在“客人”走后，便把满腹闷气泄在吴的身上，大发一通脾气。我当时在旁看着，不禁觉得现在溥仪这种傀儡生活既不能和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在天津做“关门皇帝”时相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我感到惶惑。

(画面：“执政府”大厅以及“雕椅”等设施实景；溥杰回到长春度假照片。)

日本帝国主义让溥仪当伪满“执政”以及后来又让他登上“康德皇帝”的宝座，显然都是虚假的，然而，他们把长春作为“国都”来建设，却是真实的。为了把长春变成实现殖民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统治的中心，他们不能不在这里投下“血本”，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蓄谋策划：“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指派关东军统制部的安正利、赤濑川安彦等两名嘱托，对长春市区的房产等情况秘密进行调查；紧接着关东军又于1932年2月，指使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发布关于在长春市区及近郊禁止买卖土地的法令，冻结了长春周围方圆40里范围的土地买卖。

制定计划：自1932年4月到11月，由关东军统制部、伪国都建设局和满铁经济调查会三方多次研讨伪国都建设方案，最后由日本关东军敲定并于12月5日公布了伪《满洲国国都建设计划概要》。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以及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等臭名昭著的侵略者都参与了这项决策。其间，自始至终完全由日本殖民统治者一手包办，不准一个中国人参加，连伪满“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

长”、“国都建设局长”和“新京市长”等大汉奸，也一概被排斥在外。

（画面：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的照片。）

计划实施：按照伪国都建设计划概要的规定，“新京特别市”市区建设面积为100平方公里，扣除原有的旧城、“铁路附属地、商埠地面积，实际新建设面积为79平方公里，实际完成59平方公里。按计划，人口将达到50万，实际则大大突破了，到1944年已达到81万。这还仅仅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近期计划，他们还有远期建设计划，人口要达到100万。虽然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难以付诸实施，却反映了他们要把长春作为永久的战略基地的狂妄野心。

（画面：伪《满洲国国都建设计划概要》书影。）

建设特点：

1、城市绿化：日本殖民统治者把一大批第一流的城市规划日本专家集中到长春来，吸收了欧美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规划全市绿化系统，同时还根据长春的城市环境，在建设新区内采用了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的清净，还利用每一条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自然地形的绿化带。

（画面：显示长春绿化城面貌的实拍镜头或照片。）

2、电路地下化：长春主要干道都采用了电力、电讯、照明线路的地下化，在建设新区则设置了电力线路的走廊。

（画面：没有地上输电线路的宽广街道，如斯大林大街、新民大街等实拍。）

3、圆形幅射式广场：为适应30年代的城市交通方式，多处采用了平面的环状交叉，建成多处圆形幅射式广场。

（画面：人民广场［原大同广场］、新民广场［原安民广场］、南广场、新发广场等照片或实拍。）

日本殖民统治者把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伪新皇宫、伪国务院和各部及一些重要会社，都设置在建设新区

的中心地区，在大同大街（今斯大林大街）、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的两侧或四周，这是为了显示日伪统治的“威严”与“壮观”。

（画面：街景和旧建筑群实拍。）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建设风格上也力图体现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殖民统治的思想，例如关东军司令部采用“帝冠式”建筑，所谓帝冠式，是日本“兴亚式”中最富威严的一种，建筑的上半部分带着古典式的帽子，中间有琉璃瓦屋檐，下半部分则是现代风格。伪国务院及各“大部”则采用“兴亚式”中多种形式，如伪满国务院办公楼是仿日本帝都博物馆修建的，但规模更大，表现了“帝冠式”和“闭合式”相结合的特点。

（画面：关东军司令部和伪国务院等旧址实拍。）

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新区建设，首先是为了适应与满足他们自己高标准的生活与消费，为了他们自己享乐。例如具有庭院式官邸、住宅和公寓以及近代化生活设施的建筑，都集中在日本人集居的顺天（今长春地质学院一带）、安民（今长春新民广场一带）、敷岛（原“满铁附属地”）、大同（原旧城）、长春（原商埠地）、东光（今长春桂林路、同光路一带）、西阳（今长春西朝阳路一带）等区。

（画面：日本人旧住宅实拍。）

八、灾难和斗争的岁月

当年耸立起来的建筑物依然存在，它们曾经有过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思想控制和反“满”抗日的种种功能，度越半个世纪的尘封，仍可再现那血淋淋的历史画面，述说着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那是法西斯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那是侵略者逼迫我东北同胞起来斗争。

字幕：殖民统治

1.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今斯大林大街47号，中共吉林省委所在地），建 于1935年，日本式建筑。西面另有关东军司令官官邸（今新发路21号，松苑宾馆）。

关东军号称100万人，甲级编制，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控制整个东北的武装集团，也是后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预备力量。

伪满期间的历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大使”：

第一任：本庄繁（1931年8月至1932年8月）。他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炮制了伪满洲国。

第二任：武藤信义（1932年8月至1933年7月）。他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手签了《日满议定书》，掠走了我国东北的主权。

第三任：菱刈隆（1933年8月至1934年12月）。在他这一任期内，溥仪当上了“康德皇帝”，伪国都建设也进入了“大兴土木”的阶段。

第四任：南次郎（1934年12月至1936年3月）。在他看来日本天皇的御弟雍仁和伪满皇帝溥仪的互访，似乎反映了伪满的“发展”与“繁荣”，他为此而踌躇满志，得意忘形。

第五任：植田谦吉（1936年3月至1939年9月）。他凶狠地“清剿”抗联队伍，并不断派出部将入关，扩大侵华战争。

第六任：梅津美治郎（1939年9月至1944年7月）。他一面无情地残害反满抗日的爱国民众，一面以“大东亚圣战”的口号，把我国东北人民拖进太平洋战争更大的灾难之中。

第七任：山田乙三（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他统帅的日本关东军进行了垂死的挣扎，直到裕仁天皇下诏投降，才不得不停止在这座司令部里的军事指挥，并命令他的残兵败将放下武器，结束战争。

（画面：两座建筑实拍；学者访谈。）

2. 伪满皇宫旧址（今光复北路5号，伪皇宫陈列馆和省博物馆），1932年3月利用原吉黑榷运局办公楼改建，1936年增

建同德殿，是溥仪任伪执政和伪皇帝期间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玩弄傀儡于股掌的历史见证。

爱新觉罗·溥仪早在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中，走上罪恶之途时，就跟长春联系在一起了，1932 年 3 月 9 日就任伪满“执政”，1934 年 3 月 1 日“登极”为“康德皇帝”，在这座虚伪的“皇宫”里，犯下了背叛祖国的一桩桩罪行。

（画面：旧址实拍并各楼解说；溥仪在伪满各时期照片。）

溥仪在伪满时期的政治活动片断：

1932 年 5 月 4 日，溥仪在“执政府”会见由英、美、德、意、中等 5 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亦称李顿调查团）。

（画面：照片；伪宫内会见场所、沙发、白熊皮等。）

1932 年 9 月 15 日，在“执政府”内，签订《日满议定书》，溥仪与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举杯祝贺。

（画面：伪宫旧址实拍；历史照片。）

1934 年 3 月 1 日，溥仪“登极”成为“康德皇帝”，颁发《即位诏书》。

（画面：历史照片；伪宫内“勤民殿”实拍；历史资料片镜头。）

1934 年 7 月，溥仪因派护军到火车站迎护载沣，不料却违反了非日本武装人员不得进入日本“铁路附属地”的规定，而遭致关东军抗议，溥仪只好道歉了事，有受辱之感。

（画面：出现旧火车站镜头的历史照片；“护军”照片。）

1934 年 10 月 19 日至 20 日，溥仪“巡幸”奉天祭祀祖陵，却不准身着清朝官服。

（画面：历史资料片镜头。）

1935 年 4 月 2 日至 27 日溥仪首次访日后，于 5 月 2 日颁发《回銮训民诏书》，感谢主子的“仗义援助”，并推进“日满亲善”。

（画面：历史资料片镜头；历史照片。）

1937 年 9 月 16 日，溥仪在“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内举行的伪国都建设纪念典礼上宣读敕书，嗣后前往安民广场（今全安广场）和“国都”建设局（今市委大楼）楼顶平台眺望市政建设。

（画面：历史照片。）

1940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10 日，溥仪第二次访日，迎回“天照大神”让我国东北人民供奉，并颁发所谓《国本奠定诏书》，把“日满关系”，由“友邦”升格为“亲邦”。

（画面：历史资料片镜头；历史照片。）

1941 年 2 月 20 日，溥仪会见此后成为反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同年 12 月 5 日，又公布《国防保安法》、《国防资源秘密保护法》，把长春乃至整个东北变成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12 月 8 日日本对美、英宣战之际，溥仪颁发《时局诏书》，表示与日本“固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把伪满牢牢地拴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上。

（画面：《时局诏书》等书影；历史照片。）

1942 年 3 月 1 日，溥仪颁发《建国十周年诏书》，要求“臣下”，“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

1942 年 4 月 22 日，溥仪会见“蒙古德王”和“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5 月 8 日，溥仪会见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0 月 7 日，溥仪会见华北傀儡政权头目王揖唐。

（画面：历史照片。）

1943 年 4 月 2 日，溥仪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

（画面：历史照片。）

1943 年 4 月 10 日，溥仪会见南京伪政权头目周佛海。5 月 18 日，溥仪会见华北伪政权头目王克敏。

（画面：历史照片。）

学者评说：对于溥仪这种身份的人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早就打定主意加以利用。在溥仪身上，他

们的第一策略就是“养”，从1924年到1931年整整养了7年。他们的第二个策略就是“骗”，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亲往天津敦促溥仪出关时对他说，给你土地，给你矿山，给你实权，是为了引诱溥仪上钩。他们的第三个策略就是“限”，待溥仪真入了圈套，立即限制他的一切活动，让他乖乖就范、听话、当傀儡。在伪满这座虚伪的“皇宫”中，日本帝国主义对溥仪的限制达到了高峰，弄得他“可悲可怜”。吉冈安直一天到晚监视他，对外讲几句话也要按吉冈事先写好的纸条念；“同德殿”建成，他不敢住进去，怕日本人安了窃听器，他跟亲属谈私房话要躲到卫生间中，后来干脆连处理文件，签字画“可”，也在卫生间的“恭桶”上办了。他们的第四个策略就是“变”，改变伪满皇帝的血统，利用溥仪不能生育的生理缺欠，让他的二弟溥杰与日本女姓结婚，生出日本血统的孩子以继承“帝位”，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政略婚姻”，最终把伪满皇帝变成日本人，把整个东北变成日本“本土”。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傀儡皇帝由“养”到“骗”，由“骗”到“限”，由“限”到“变”的一整套策略。今天我们参观伪皇宫陈列馆就能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3. 伪满国务院旧址（今新民大街2号，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学部），建于1935年。

从表面看，伪国务院总理大臣是国务院最高官员，但实际控制伪国务院的人，是担任总务厅长官的日本人。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福建闽侯人。作为遗老长期追随溥仪，1932年3月出任伪国务总理，1934年3月改称“国务总理大臣”。他主张伪满对帝国主义列强“门户开放”，以实行“国际共管”，因此惹恼了日本殖民统治者。1935年5月，他在“王道书院”讲演时发牢骚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让他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几句话刚说完，便被撵出伪国务院，回家“养老”去了。

张景惠（1872——1958年），字叙五，辽宁台安人。这个出身“豆腐匠”的“粗人”，因生就一副奴才相而得以继任伪总理大臣。他的“名言”是“凡是亲邦所需要的东西，要什么给什么，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此，人们称呼他为“要啥给人啥的总理大臣”。

（画面：旧址实拍；采访见证人；郑孝胥、张景惠照片。）

4. 伪满军事部旧址（今新民大街1号，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建于1935年（1970年上接一层）。

伪满初年称军政部，1937年改称治安部，1943年改称军事部。管辖“国防”、兵事、军政、铁道及水运的警护。这里是镇压抗日民众的中心，伪满的将校们在这里秉承日本主子的意志，指挥东北各地军、警、宪 、特镇压人民，残酷“围剿”抗日力量，强令东北人民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把东北变为日寇的殖民地。

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于琛澂、吉兴等伪满军队中的“五将军”，实为出身行伍的五大降将。张海鹏（1867——1951年），辽宁盘山人。原为东北军上将洮辽镇守使，伪满时给溥仪当“上将侍从武官长”。于芷山（1882——?），字澜波，辽宁台安人。原为东北军上将东边道镇守使，伪满时曾任伪军政部大臣和伪治安部大臣。于琛澂（1887——?），字险洲，黑龙江双城人。原为东北军陆军第十六师师长，伪满 时曾任伪治安部大臣。吉兴（1879年——？），字培之，辽宁沈阳人。原为东北军延吉警备司令，伪满时曾给溥仪当“侍从武官长”。

（画面：旧址实拍；知情人讲述抗联遭到镇压史实；五大降将照片。）

5.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旧址（今新发路11号，吉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建于1931年。

关东宪兵队约2 000人，地下室设有绞人机，灭绝人性地屠杀中国人民。伪满期间先后有14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后来曾

任日本首相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于1935年9月至1937年3月间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

（画面：旧址实拍。）

6. 日本关东军空军司令部旧址（今西安大路140号，七航校1号楼）。

当年日本空军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就曾特意把溥仪约到军用飞机场，观看日制飞机与苏制飞机飞行速度和性能比较的表演，当然是日制飞机“占上风”，不过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确是以空中打击致胜。

（画面：旧址实拍。）

7. 伪满司法部旧址（今新民大街6号，白求恩医科大学校部），建于1935年。

该部成立于1932年底，掌管司法、法院、检察院、监狱、民事、刑事、民籍、地籍及其它司法等事项。它以制定镇压爱国力量的法律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服务。

张焕相（1881—1956年），辽宁抚顺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东省特区行政长官等职。“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天津，却于1936年秋乘船经大连回乡，在抚顺自建“神社”，供奉“天照大神”，遂被日、伪当局捧为“敬神家”，并于1937年5月出任伪司法部大臣，到1942年9月转任伪参议。

阎传绂（1895——?），字绂韬，辽宁金县人。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作为受过日本教育的“关东州”中国人，得以被另眼相看，官运亨通，在战时紧急状态下，接替了张焕相的伪司法部大臣的职务。

（画面：旧址实拍：张焕相、阎传绂照片；学者访谈。）

8. 伪满综合法衙旧址（今自由大路2号，空军461医院），1936年竣工。

所谓“综合法衙”，实为伪满最高检察厅、最高法衙、“新京特别市”高等法衙等机构的合称。它是伪满最高司法机关，是

日本殖民统治者镇压中国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楼内设有刑讯室和绞人机等几十种刑具，不但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罪名”残酷迫害东北人民，还可以根据“国防拘禁”、“保护监察”等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捕人杀人。

（画面：旧址实拍。）

9. 伪满首都警察厅旧址（今斯大林大街 67 号，长春市公安局），建于 1932 年。

下辖 8 个警察署，1 个消防署，1 个“新京地方警察学校”和 200 多人的警察队，由担任副总监的日本人掌握实权，对人民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其中的警察和特务可以捏造各种“罪名”，逮捕和殴打无辜人民，其“罪名”有所谓反帝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交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持罪等 50 余种，并冠以所谓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等。说一句“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饭就是“经济犯”。

（画面：旧址实拍；知情者讲述逮捕、迫害国民党地工人员等反日党派、团体，镇压知识界爱国人士，迫害市民等史实。）

10. 伪满外交部旧址（今建设街副 12 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楼），建于 1932 年。

这是一座欧洲风格的宫堡式建筑，从高空俯视就象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大船。它所从事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为了“与亲邦日本”建立“不可分之一体关系”，把我国东北的主权一项项出卖给殖民统治者。

谢介石（1878—？），台湾新竹人。他早年曾参与张勋复辟事件，也以遗老自居，与溥仪早有联系，伪满初年当上第一任伪外交部总长兼“协和会”事务局长，后又改任伪满驻日特命全权大使。

（画面：旧址实拍；谢介石照片。）

11. 日本驻伪满大使馆旧址（今上海路 30 号，吉林省政协）。

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和关东军司令部是两个名称的一个实体，即“大使馆”的“大使”和关东军的司令官由一人担任，全权控制和指挥日本“在满”各个机构，是“在满”最高统治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二位一体制”。“大使馆”建立以后，在东北各地开设大量的“总领事馆”和“领事馆”，搜集、掌握了东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画面：旧址实拍；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等历任司令官兼“大使”照片。）

12. 日本关东军一〇〇细菌部队旧址（今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建于1936年至1939年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设立的两个细菌战基地中的一个，初名为关东军兽类防疫部，负责试验与研制杀害人和牲畜的细菌以及毒性药物，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残酷地使用活人和牲畜作为试验材料。

（画面：旧址实拍；知情人讲述见闻。）

13. 原大和旅馆策划暗杀斯大林阴谋旧址（今斯大林大街2号，春谊宾馆），南侧一座建于1939年，北侧一座建于1940年。

这座俄式木结构建筑在伪满年代称为“大和旅馆”，本是日本上层人士频繁往来的地方，日本高级特工曾在这里策划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画面：旧址实拍；知情人讲述见闻。）

14. 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旧址（今斯大林大街76号，军人俱乐部）。

伪满协和会由“执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名誉顾问，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任名誉理事，伪满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任会长。日本殖民统治者设立政党性质的“协和会”，目的是通过它鼓吹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振

兴经济”、“民族协和”等殖民论调，排斥与诋毁反日和一切进步思想，用以欺骗与毒害中国东北各族人民，掩盖其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实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民族压迫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实质。

（画面：旧址实拍；采访知情人；“协和会”成立历史照片。）

字幕：经济掠夺

15. 伪满经济部旧址（今新民大街5号，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建于1935年。

伪满初年称财政部，由熙洽出任伪财政部总长，孙其昌、韩云阶相继出任伪财政部大臣。1937年改称经济部，蔡运升、阮振铎、于静远相继出任伪经济部大臣。日本侵略者在部内以顾问或权威等身份掌握实权，疯狂掠夺东北资源，排挤地方民族工业，为侵略战争服务。

于静远（1898—?），字任朴，辽宁辽阳人。其父于冲汉是出卖祖国资源的老牌汉奸。他在1938年2月至1940年5月间，当过一任伪新京特别市市长，后来先后出任伪兴农部大臣、伪产业部大臣、伪民生部大臣和伪经济部大臣。如果不是伪满很快就跨台了，他是最有希望爬上伪总理大臣那把交椅的人。

（画面：旧址实拍；于静远照片；学者访谈。）

16. 伪满国民勤劳部旧址（今斯大林大街82号，长春税务学院教学楼），建于伪满年间。

1933年，伪满政府便在“新京”设立“劳动统制委员会”，1938年改设“满洲劳工协会”，1941年又改设“满洲劳务兴国会”，1942年改设“国民勤劳奉公局”，1945年3月改设“国民勤劳部”。推行所谓“勤劳奉公制度”，开展所谓“勤劳奉仕”运动，使用强制手段摊派劳工或以武力抓捕被称为“浮浪”的劳动者，驱赶他们参加建造军事工程、水利工程，修筑铁路与公路，“开发”土地及矿山，从事伪国都建设等各种繁重艰苦的劳役，使他们受到非人的奴役与迫害。许多人在打骂虐待、冻饿

和疾病等恶劣的环境里被折磨致死，或遭日伪军警的残暴杀害。

于镜涛（1898—1986年），字鉴寰，长春人。此人颇“精明强干”，不但在伪满后期当上了“国民勤劳部大臣”兼“新京特别市市长”，“八·一五”光复后，他还给进驻的苏军当了几天长春市长。后来苏军司令官加尔洛夫召集原伪满大臣开会，遂一网打尽，把他这个市长也包括进去了。但他的结局还不错，经过改造，获得特赦，被安置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以90岁高龄去世前后，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

（画面：旧址实拍；于镜涛照片；采访见证人。）

17. 伪满中央银行旧址（今斯大林大街63号，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建于1938年。

伪满中央银行名义上是伪满政权的“国家银行”，实际是日本银行在我国东北的特别分支机构。在关东军的全面控制下，积极为其提供军费和筹集战备物资，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东北财富的工具。

（画面：旧址实拍；学者访谈。）

18. 伪满兴农部旧址（今自由大路8号，东北师大附属中学），建于伪满前期。

伪满初年设实业部，由张燕卿出任总长，1935年丁鉴修继任伪实业部大臣，1937年改称“产业部”，吕荣寰任伪产业部大臣，1940年又改称“兴农部”，于静远和黄富俊先后出任伪兴农部大臣。它掌握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矿产业、工业、“开拓殖民”以及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事项，是为日本殖民统治者“开发”我国东北资源的专门机构，也是要把东北变成“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的执行机关。

黄富俊（1890—?），字润轩，辽宁沈阳人。他原为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顾问，伪满期间先当了两任伪省长，1942年以后出任伪兴农部大臣。他成为战犯以后是这样为自己开脱的：“反正得当亡国奴，当汉奸在伪满政府有个地位，总比一般

老姓强得多。"于是逢场作戏，把汉奸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对农民的"粮谷出荷"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日本主子的嘉奖。

（画面：旧址实拍；黄富俊照片。）

19．伪满民生部旧址（今斯大林大街77号，吉林省化工设计院），建于1937年。

伪满初年设"民政部"，由臧式毅出任总长，1935年吕荣寰继任伪民政部大臣，嗣后，孙其昌、谷次亨、于静远相继出任该部"大臣"，掌管直接关系"国民生活"的政策，如学校教育、保健卫生、社会设施和礼教等。其目的是制造奴化舆论，以封建的、殖民地的意识形态，蒙骗麻痹中国人民，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

孙其昌（1883—1954年），字仲舞，辽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以前曾任吉长道尹、吉林省建设厅长，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倒把，大发横财。伪满年间，自1937年至1940年任伪民生部大臣，仍用老方法捞钱。他上任第一年就撤换伪县长21人，凡经他手安排的新县长，都必须进贡钱财和金银珠宝，不令他满意是绝不能走马上任的。他虽然逃脱了被俘的命运，却摆脱不了被枪毙的结局。

（画面：旧址实拍；孙其昌照片。）

20．伪满交通部旧址（今新民大街7号，白求恩医科大学预防医学院），建于1935年。

伪满初期即设立"交通部"，丁鉴修出任伪总长，1935年由李绍庚继任伪交通部大臣，1942年以后谷次亨任该部"大臣"。该部负责管理铁路、邮便、电信、电话、航空、水运及一般交通事宜。水、路、空三位一体，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大动脉。

21．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旧址（今斯大林大街65号，长春市电信局），建于伪满初年（1986年上接一层）。

该会社名义上由日本政府、伪满政府、满铁、日本放送协

会和朝鲜银行等合办，实际上由日本一手控制和包办，由日本人充任总裁，是经营管理电信、电话、广播及其它电气通信事业的统一机构，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军事上的要求。

（画面：旧址实拍。）

22. 伪满康德会馆旧址（今斯大林大街57号，长春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建于1935年。

"康德会馆"系为旨在掠夺中国资源来华的日本企业、贸易、矿产和交通等各大财团提供交通、膳宿、邮电及游乐等各方面服务，同时兼营房地产出租活动，它连结着吸吮中国膏血的巨大网络，是一处充满罪恶的巢穴。

（画面：旧址实拍；采访知情人。）

字幕：思想控制

23. 伪满文教部旧址（今自由大路10号，东北师大附属小学），建于1938年（1986年顶部烧毁，后又修复）。

1932年3月，仅在伪民政部内设文教司，同年7月增设文教部，由郑孝胥兼任"总长"，1935年阮振铎继任伪文教部大臣，1937年一度撤销，其业务纳入"民生部"，1943年又恢复"文教部"，卢元善出任"大臣"，主管普通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社会调查和宗教等事宜，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从思想上控制东北人民，加以文化专制统治的专设机构。

卢元善（1882—1959年），字仰三，辽宁金县人。他凭藉在日本学过农业技术的资本，到伪满时办了几个农事试验场，当上伪龙江省实业厅长，继而又在"开拓移民"方面作出"成绩"，升任伪三江省长。此后他又以曾在"关东州"日本殖民地搞过20来年奴化教育的条件，于1943年4月出任伪文教部大臣，积极推行"惟神之道"，钳制东北人民的思想。

（画面：旧址实拍；卢元善照片。）

24. 伪满建国大学旧址（今卫星路1号，长春大学灰楼），建于1938年5月。

该校直属伪满国务院，由“总理大臣”兼任校长（称“总长”），实权操纵在日本人“副总长”尾高龟藏之手，主要招收日本学生，兼收少量中国人、蒙古人和俄国人。学校开设“建国精神”、“神建及皇建”、“军事训练”及人事、历史、地理、法学等课程。另外还设有研究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办的一所重点大学，当时被吹嘘为“名冠亚洲”，学生毕业后均担任伪满国家官吏。初创时作为“名誉校长”的伪满皇帝溥仪还发布“敕语”：“今于此创立政府建国大学，为将来国家造就骨干栋梁人才之时机也……使命之重大，刻不容缓。”1943 年 6 月 12 日，溥仪亲临伪满建国大学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

（画面：旧址实拍；采访知情人。）

25. 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今拉拉屯装甲兵技术学校），建于 1939 年。

这是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模式而在 1939 年建立的，实际是日本士官学校设在伪满的分校，所设置的课程均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和本科教材，专门为伪满军队培养各级军官。溥仪的二弟溥杰、四妹夫赵国圻等都曾在此担任教官。1941 年 6 月 20 日，伪满皇帝溥仪曾亲临视察，并发布“敕语”：“尔军官生徒，为朕股肱，宜愈尽瘁国军，朕深赖之。”嗣后，溥仪每年都出席该校的毕业典礼。

虽然校方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极为严格，但学生中仍然产生了一些反满抗日的秘密组织。1940 年 5 月，由学员吕殿元（吕天）、崔黎夫（崔立福）等 7 人发起成立“恢复会”，通过传阅进步书刊、创作革命诗词等团结群众，激励斗志，从事抗日活动。此外还有陈东升组织的“仙洲同盟”，军校教育部长陆军少将王家善组织的“真勇社”，赵镜澜、王文萃等 10 人组织的“东北青年苏生联盟会”，邓昶组织的“反帝大同盟”以及“抗日建国青年军人会”等秘密组织。

（画面：旧址实拍；溥仪“临幸”军官学校历史照片；采访

健在的原军校学生。）

26. 伪满新京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旧址（今南岭大街4号，长春地质学校）。

当时伪满中、小学校都与这所学校差不多，校长是日本人，主要教师也是日本人，日语是必修课，以日本式服装为校服，实行奴化教育。

27. 伪满大陆科学院旧址（今斯大林大街109号，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旧楼），建于伪满中期。

这是一座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的自然科学研究机关，从事有机化学、农产化学、生物化学和电气化学等研究工作，为战争狂人提供最先进的杀人武器。

（画面：旧址实拍；请应化所专家说解。）

28. 伪满洲国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旧址（今红旗街16号，长春电影制片厂），建于1937年。

“满映”主要摄制三类影片：一谓文化电影（记录片），如《北方部队》、《开拓团之春》；二谓时事电影（新闻片）和《满映时报》；三谓“娱民电影”（故事片），如《蜜月快车》、《壮志烛火》。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国策”，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扬“大东亚共荣”，为侵略战争效劳。

（画面：旧址实拍；采访长影知情人；“满映”电影片断。）

29. 伪满“新京神社”旧址（今斯大林大街33号，吉林省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建于1932年。

这是一座日本民族式样砖木结构建筑，有正殿和偏殿，房盖原为紫铜，1950年后均经改建。在这里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写下了屈辱的一页。

（画面：旧址实拍；溥仪“迎神”历史照片。）

30. 日本“神武殿”旧址（今朝阳区立信街6号，吉林大学礼堂），建于1936年。

这座日本庙宇式建筑，系“在满”的日本人为祭祀神武天

皇而修建的一座宫殿，这里也是日本人培养“武士道精神”，训练传统柔道、击剑、散打等武功和肉搏、劈刺等军事项目的场所，其地下室内存放阵亡日本将士的骨灰。

（画面：旧址实拍；溥仪前来参拜历史照片。）

31. 伪满“建国忠灵庙”旧址（今斯大林大街121号，空军预校仓库），建成于1938年。

这是安放“尽忠殉职”的伪满文武官员灵牌的处所。日本殖民统治者藉此加深对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以便让还活着的日伪官员更加卖命。溥仪每年两次来此参加春季和秋季“恒例大祭”。

（画面：旧址实拍；溥仪祭祀照片。）

32. 伪满年代溥杰在长春的故居（今西朝阳路1号，白求恩医科大学托儿所），建于1937年，1995年拆出。

由曾任日本陆相的南次郎和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作媒，伪满皇帝的胞弟溥杰和日本天皇的亲属嵯峨浩，于1937年4月3日在日本东京结婚，这就是伪满年代里有名的“政略婚姻”。当年10月，溥杰携嵯峨浩回到“新京”，即在此居住，直到伪满垮台。他们的长女慧生于1938年1月出生于此，次女嫮生也于1941年出生在这里。

（画面：旧址录相；溥杰夫妇在此生活时历史照片和有关的电影镜头；专家说解。）

字幕：反“满”抗日

33. 二道沟中共长春地下党活动旧址（今宽城区二道沟一心街4号，一座灰色二层居民住宅楼）。

此楼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为二道沟邮局。1925年中国共产党东北特支成立以后，即派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到长春，在此楼建立了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代号为“龚长之”，成为中共中央与北满党组织的联络站。1929年刘少奇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后，派遣赵尚志在这里组建了中共长春特支的领导机构——干事

会，多次召开会议，组织革命活动。长春沦陷以后，中共地下党组织继续在这里领导反对日伪统治的艰苦斗争。

（画面：旧址实拍；采访知情人；学者访谈。）

34.“还我河山”爱国宣传壁画（今宽城区长盛街小学校教室北山墙外壁中部上方）。

壁画为彩绘中国政区全图（高 3. 33 米，呈正方形），边线绘以红色，而周边用黑色标明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割去中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共 11 条，包括英国侵占的香港、九龙，葡萄牙侵占的澳门，沙俄侵占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新疆以西共 153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日本侵占的琉球、台湾、澎湖列岛和日俄分割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条约》等。）彩图上方冠以“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右侧下方书有“东省特别区立第十二小学校一九二九年绘”。这幅宣传画的作者即第十二小学校美术教员苏少权，他在日本侵占东北的前夕，亲眼见到日本人欺压中国人的情景，又因为该校校长中共党员宋兑民从事爱国活动在哈尔滨惨遭杀害而义愤填膺，乃挥笔作画。此画历经整个伪满年代而保存至今，实为我长春人民抗日爱国的壮烈之举。

（画面：旧址实拍。）

35. 原“大和旅馆”中共长春地下党活动旧址（今春谊宾馆）。

这个过去日本上层人士频繁往来的地方，后来也是中共长春市地下党组织经常集会和活动的场所。申东黎、徐慎、赵东黎、傅根深、王永生等党的领导人都曾在这里接头、开会，制订对敌斗争的工作方针、方法和策略。1945 年，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曾在这里举行会议，组成了中共长春市委员会。

（画面：旧址实拍；学者访谈。）

36. 九台团山子放牛沟农民大刀会抗日战迹地（今放牛沟乡甘家岭村前沟屯西南一华里的漫岗上，西北三华里是甘家岭

村，南二华里是高林子屯，北二华里是放牛沟至石头口门水库的公路）。

1933年，农民孙殿文、刘福全等人在团山子一带走村串户，秘密宣传抗日，组建孔家店大刀会，以大刀长矛习武操练，拟在1934年旧历五月起事。因叛徒告密，200余名日本兵于旧历四月前来“围剿”，孙殿文率领大刀会阻击，高呼“救中华匹夫有责”的口号，杀死日军10余人，孙殿文壮烈牺牲，大刀会伤亡百余人，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画面：旧址实拍；孔家店大刀会留下的会章、大刀、铁矛等遗物。）

37. 吉林抗日义勇军在榆树境内活动地点（今榆树县青山堡至李合乡石塘村靠山屯一带）。

吉林抗日义勇军前身是国民党东北边防军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警卫团，团长冯占海。“九·一八”事变后，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叛变投敌，冯占海毅然举义，率部向榆树、五常一带转移，在两县城以少胜多，击溃熙洽派来“追剿”的伪军。1932年7月，冯部又强渡拉林河，夺占青山堡，在靠山屯一带重创守敌日、伪军，继而击毙大川、河部、高世等日军参谋人员，俘虏伪军500余人，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画面：旧址实拍；抗日义勇军及冯占海历史照片；学者访谈。）

38. 东北抗联第十军在榆树活动地点（今榆树县大新立屯至土桥子一带）。

抗联第十军前身即双龙队，是汪亚臣将军在“九·一八”事变初期组织的抗日武装，活动于拉林河上游一带，1935年前后在攻打榆树大新立屯和土桥子两次战斗中重创日、伪军，同年底接受中共领导，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1937年又改编为抗联第十军。在汪亚臣军长统率下，坚持长期的抗日斗争。后来在日军残酷“讨伐”下，汪军长壮烈牺牲。

（画面：旧址实拍；知情人讲述汪亚臣的头颅被抢救和保护的经过。）

39. 中共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华昌药房（今榆树镇华昌路南）。

华昌药房由杜伯华（字华昌）创建，自“九·一八”事变后，开业4年多，其间秘密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送药治病和筹集资金，进行革命活动。杜伯华也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1934年冬遭到日、伪反动当局追捕，乃转赴关内。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部下参与活捉蒋介石的行动，后来又当过晋察冀边区房梁县县长。1941年6月因试制药物中毒牺牲，遗骨与白求恩、柯棣华同葬于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烈士陵园。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批示将他生产创办的药厂命名为“伯华药厂”。

（画面：旧址实拍；杜伯华墓碑、照片，以及他在华昌药房行医时看过的医书、开过的处方。）

40. 杨靖宇烈士遗首受到人民的保护。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濛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壮烈殉国，敌人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枯草和棉絮，颇为钦佩，遂割下他的头颅带走。光复后被人民抢救并保护起来，直到五十年代入土安葬。

（画面：杨靖宇墓；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吉林省革命博物馆中的照片；采访知情人。）

41. 采访见证人，了解读书会、铁血同盟、青年读书会等抗日团体的活动，1941年“一二·三〇”事件，以及长春各阶层民众的反日斗争等详情。

由日、伪警特机关策划，以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安井寻志为头目，组成130余人日本人警察为骨干的搜查队，于1941年12月30日夜，对在长春的爱国学生、职员、文艺工作者组

成的秘密团体“铁血同盟”、“恢复会”、“青年读书会”等进行大搜捕。第一个被捕的就是反“满”抗日作家李季风，陆续遭逮捕的还有伪建国大学、伪工业大学、伪法政大学、伪医科大学等校学生，共50余人，其中折磨致死者10余人。

作家李季风（李季疯），于1939年以后，任“新京”《大同报》副刊编辑。他创作了不少进步文学作品，并把一些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组成青年读书会，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扩大组织。李季风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于1941年12月30日他被捕后拘押二年，于1943年越狱成功，1944年2月又被伪桦甸县警察局逮捕，押回长春伪首都警察厅，嗣后二次越狱，引起日伪当局的惊慌。“九三”胜利后，李季风在沈阳街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42. 采访见证人，了解国民党地下组织“建大干部会”的抗日活动，“贞星事件”详情。

所谓“贞星事件”是指逮捕国民党抗日爱国人士的事件。这次逮捕从1941年12月中旬开始，进行了约3个月，在长春逮捕了约130人，全东北共约700多人，经严刑审讯后，一部分判处死刑，一部分判处徒刑。因为这次事件开始于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他便把自己的姓作为这次镇压事件的代号，称作“贞星工作”，遂扩大到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等地。

43. 逮捕国民党地工人员。

1944年4月，伪首都警察厅特务警察60余人，由副总监三田正夫指挥，逮捕了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主任石坚等100余人。数日后，又根据被捕人员供出的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情况，从5月至8月相继在沈阳、营口、盖平、哈尔滨等地逮捕了380余人，其中部分被判刑，部分被处死或折磨致死。

44. 镇压知识界、文艺界爱国人士。

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于1942年逮捕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文化宣传部内大同剧团团长赵刚和部分人员，因宣传反“满”抗

日，赵刚被严刑折磨致死。

1942年冬，长春出现反日传单漫画，日伪警察为此抓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或关押在“思想矫正局”，或送进劳工大队加以役使。

“满映”编导王则，因摄制进步影片于1944年春被捕，在严刑审讯中坚贞不屈，被折磨6个月后死于狱中。

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青年文化杂志》社总务部长兼《青年文化》、《协和青年》主编王穆天及编辑等11人，1943年因宣传爱国思想被逮捕刑讯并秘密处死。

初光剧团团长初光及演员30余人，于1944年夏因编演反“满”抗日的剧目而被捕并严加刑讯。

1944年秋，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以公演话剧《沙沉》有反“满”抗日内容，将“满映”话剧团编导张辛实及其妻、妹逮捕，加以迫害。

仅1941年至1944年间被捕的爱国作家、记者、编辑、画家、编导和出版业者等共100余人，有的被杀害，有的长期关押，有的送去“思想矫正”，还有的发配到中苏边境修筑工事，难得生还。

45. 长春市民自发的反“满”抗日斗争。

1942年6月，东大桥菜市场群众痛打了欺压和刁难菜农的日本人评购员。1943年秋，有人纵火烧毁了关东军仓库内的大量军用物资。1943年11月，伪四道街警察署的日本人警长，在南岭被勒死。1944年冬，伪顺天警察署一名日本人警卫在牡丹公园被人用扁凿子打死。这类事在当时层出不穷，反映了长春市民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切齿痛恨。

九、“新京”的末日

日本殖民统治者选定杏花村作为伪满新皇宫的建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设计，并投入了施工，他们要把这座傀儡

皇宫建成“国民向往的居城”，保持“禁城的威严”，以“招明民心”，“震扬国威”。

杏花村是一块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地块，其地势南北较高，而中间较低，总面积200万平方米。新“皇宫”就建在北端最高的台地上，坐北朝南，象征着“龙首”，可以俯瞰南面的伪满国务院及各部建筑。新“皇宫”东西两边南北走向的大街（今东民主大街和西民主大街），分别取名叫东万寿大街和西万寿大街，溥杰的住宅即座落于西万寿大街117号，正是新“皇宫”的右侧。新“皇宫”正殿前面，则是广阔的顺天广场（今长春地质学院楼前广场），作为“国民遥拜”伪皇帝的场所。广场南跨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阔的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街心建有美丽的绿化长带，随着季节变化而有不同花木呈现出缤纷的色彩。大街两侧便是伪国务院和各部办公大楼。顺天大街南端建有圆形极为宽广的安民广场（今新民广场），再向南便是绿树成荫森林式的南湖公园。这一政治化的布局，象征着“顺天安民”的“王道政治”和伪皇帝的“龙位长青”与“万寿无疆”。

当年在伪国都建设局任职的中国建筑师彭野教授，主持了新皇宫的规划工作。他遵照中国古代宫廷“前朝后寝”的传统模式，根据北京清宫的布局格调、建筑造型和造园艺术，精心设计了新“皇宫”的建设方案，如对外廷、内廷与围墙的设计，对天安门、午门、太和殿、御夫房、重华门、翊坤门、御花园、神武门以及太庙、佛堂等功能不同的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安排，都是非常精心和独到的。以体现了中国古园林特有艺术风格的御花园的设计来说，一池碧水（万代池），几点山峰（万寿山），把小巧玲珑的亭、廊、阁、轩藏建于树丛之间，用这种手法勾绘出一幅美丽的山水图画。

（画面：地质宫广场、新民大街、新民广场实景实拍。）

尽管日本殖民统治者用心良苦，设计甚美，却未能把傀儡

皇帝放到新“皇宫太和殿”的“金銮宝座”上，也未能让他足涉“万代池”，手攀“万寿山”。当日军大将山下奉文晋见溥仪之后，率部南侵而成为“马来亚之虎”的时候，在太平洋战争隆隆炮声中不要说新“皇宫”的建设，连悬于旧“皇宫”大厅的吊灯上的黄铜、铺设在宫内的的地毯及一切装饰物中的白金制品，通通作为“军需品”捐献给“大东亚圣战”了。彭野教授的新“皇宫”建筑的精美设计也只能付诸一纸空文，而留下一片唯供想象的地基与框架。这也是一段“历史悲剧”吧！

在太平洋战争的炮声中，长春的伪国都建设一切施工现场都停止了，长春的上空也充满了浓烈的火药气味，日本关东军被一批又一批地调往南方战场，东北的粮食和物资也被源源不断地装满军需列车，开往前沿阵地。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关东军就有20个师团，9个旅团，1个方面军司令部，3个军司令部，9个炮兵、工兵、运输兵司令部被陆续调往东南亚，还有7个师团调往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国内，以备“本土决战”，而关东军储备的军用物资约三分之一和一大批军事指挥官也调回国内。关东军在我国东北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后来虽经扩充或重新组建，毕竟元气大伤，已不再是“精锐”部队了。关东军司令官也不再叫嚣“北进”，“主动出击，毁灭苏联沿岸海空军基地”了，而把对苏作战的方针改定为“大体维持现状，加强防卫，严密警戒，尽量避免发生战争”。

（画面：截取纪录片中的太平洋战争的活动场面。）

为了维持形势日益险恶的太平洋战争，关东军司令官不断从他在“新京”的官邸发布命令，在全东北搜刮“军需物资”，连老百姓吃饭用的铜汤勺、房门金属拉手、老太太嘴里叼的旱烟袋的铜烟袋锅等全在强征之列。

1943年9月，时局已入“非常时期”，连溥仪的伪宫内府也接到通知，要为“皇上”筹备食品和饮料，以6人在两日间的食用量及调和供奉用具为一份，要准备两份，一份放在“同德

殿"，一份放在近侍处，以备"紧急行动"时随身携带。

从1944年开始，溥仪就在"同德殿"前的庭院里，接见一批又一批的日本"神风队员"。他们是从关东军中被挑选出来的，其任务是以自己的身体和所驾驶的飞机作为炮弹，向对方发起有去无回的攻击。溥仪或是拍拍这些青年的肩，或是轻轻拥抱一下，鼓励他们无可选择地走向死亡。

到1944年下半年，伪满已呈现出一片动荡、混乱和衰败的景象，日伪统治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日本陆军正在策划以250万人兵力和700架飞机作老本，进行"本土决战"，关东军遂于1944年8月拟定"第4号作战计划"加以配合，规定仍把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新京"，指挥并调动部署在东北各地及朝鲜半岛上的军事力量，"新京"的战争气氛更浓了。

1944年，伪满国务院增设了"防空部"，"新京"也层层建立了防空组织，居民都要准备防火沙箱、水桶和防空窗帘、灯罩，窗户玻璃要贴防震纸条，每天都有防空演习。居民还被强迫拆除可能成为路障的砖墙，并挖掘防坦克壕。

（画面：贴有"米"字纸条的窗户照片。）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节节失利，日本东条英机内阁被迫在1944年7月下台，小矶国昭内阁继而又下台，到1944年11月，战争逼近日本本土，日本企图停战议和，又遭到苏联拒绝，形势更加危急。关东宪兵队特别情报班加紧了对包括汉奸大臣在内的社会各界上层人物的监控，甚至收买了张景惠的七姨太徐芷卿，用作"枕边密探"。她原为天津唱京剧老生的名伶，颇有"须眉气概"，倍受宠爱，曾任伪满国防妇女会长，活跃于贵妇人之间，出尽风头。

（画面：张景惠和七姨太及子女照片。）

1945年春，从东南亚战场回到"新京"出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的山下奉文又要返回前线去了，临行留着"泪"向溥仪"诀别"说："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溥仪提笔写了"忠诚"

二字送给他以示劝慰。

1945 年 3 月，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主持，有日军的各军司令官和伪满政府中司长以上的日本人官员参加，在“新京”军人会馆开秘密会议，阴谋策划了 10 天之久，确定了周密的退走通化计划。其内容是苏日开战以后，日军将放弃东北的大部地区，而把日、伪主要机关转移到通化，以奉天、吉林、延吉一线为抵抗线，将苏军导入内地，断其后路，再图反攻。

1945 年 4 月，伪满军事部奉关东军之命召开所属各军管区和直属独立部队参谋长会议，宣布收缴伪军掌握的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重武器，以防他们在动荡中哗变。

1945 年 5 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东京“大陆首脑会议”上，对伪满和伪南京政府的首脑沮丧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大陆首脑会议了”，希望“诸位好自为之”，“以期万全”。会后，日、伪当局即调整和强化了伪首都的一些机构。1945 年 7 月 1 日，于镜涛取代张联文出任“新京”特别市市长，事先由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亲自找于谈话，告以时局紧迫，责任重大。当时“新京”周围还有一个师团兵力，再加上伪满军警，一时尚可苟安，于镜涛乃欣然走马上任。在这次人事更动中，还调换了伪首都警察总监和伪新京地区防卫司令官。与此同时，还调整了关东军与伪满在“新京”的军警宪特机构，建立起适应战时需要的关东军直接指挥体系。

（画面：于镜涛照片。）

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开会，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并提出停止战争的七项条件，对此日本政府尚在犹豫。张景惠奉关东军之命召集伪省长会议，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部署在“新京”和各主要城市修建土围墙及街巷碉堡，这已是巷战的准备了。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10万人顷刻丧命，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零时，150万苏联红军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还有一路进入朝鲜，同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又有10万日本人民不得不代好战的政府受过，在几秒钟内惨死于蘑菇云下。

（画面：截取历史纪录片中相关的镜头。）

1945年8月9日，由张景惠和臧式毅主持召开伪满政府各部、局会议，武部六藏奉关东军之命宣布“满洲国”进入战时体制，“政府”立即迁往通化，以通化为中心进行防御战，只留下于镜涛等4个伪大臣“留守”。张景惠等人虽然不愿意离开长春，也只好服从关东军的命令。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满洲防卫法》。

同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亲往伪宫动员溥仪撤退通化，山田哄骗说，通化已被关东军修成地下长城，工事坚固，可以保证平安无事，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天皇陛下也将来通化。他还恶狠狠地警告溥仪说：“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一定首先把你杀掉！”溥仪要求缓限3天清理文件、物品。其间，溥仪命侍从人员烧毁了带不走的文件和宫中保存的反映溥仪政治和生活的纪录影片。

1945年8月11日夜，溥仪由伪侍从武官二弟溥杰、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扈从，携“皇后”婉容和“贵人”李玉琴及皇族眷属乘专列逃离长春。当溥仪的汽车开出伪宫大门时，宫内供奉“天照大神”的“建国神庙”就被一把火烧了。

（画面：历史资料片镜头或照片。）

1945年8月12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飞抵通化，准备在这里研究下一步作战指导和防御部署等问题。当晚他还登上刚刚到达通化的溥仪的专列，在火车上谒见“皇帝”。

1945年8月13日，溥仪的专列到达临江县大栗子沟车站，

伪皇帝暂居该地铁矿公司办公楼，命族侄和侍从把他保存的天津时期和伪满时期的整整一皮箱日记全部焚毁，以毁灭罪证。

（画面：历史资料片镜头或照片。）

1945 年 8 月 14 日下午，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等关东军司令部要员接到大本营通知，说东京将有重大问题发生，“必须立即返回新京听命”，他们随即飞返。当夜，又在关东军司令部内收到日本陆军大臣的电报，要求关东军在大本营没有新的军事命令前，继续执行以前的战斗命令。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午，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及其主要参谋幕僚，在收音机前聆听天皇广播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由于尚未得到大本营停止战斗的命令，山田也不下令停战。当天下午，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召集日本官吏的核心骨干人员开会，部署了烧毁极密文件及机密档案的安排。

根据“第 4 号作战计划”的规定，关东军撤退时还要全部破坏苏军可能利用的公路、桥梁、建筑物、电话线、火车站和铁路隧道，烧毁运不走的军用被服和粮草，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施放毒气与细菌，炸毁丰满水电站，使吉林和长春两市被洪水淹没，虽然由于苏军突然进攻而未及全面实行这些计划，但也干了不少坏事。据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日伪战犯土屋芳雄等 41 人统计，烧毁军用设施 1 254 栋、地方机关建筑 153 栋、民众住宅 1 687 栋、粮食 15 000 吨、干草 6 000 吨。

日本宪兵队和伪首都警察厅准备炸毁长春的所有主要建筑设施，未能实现。但也烧毁了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本部孟家屯细菌工厂，还先后制造了 26 起镇压长春民众暴动的事件，在大经路、南关等处杀害民众 447 人。

1945 年 8 月 16 日夜，在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室召开参谋幕僚会议，由作战参谋草地卓吾主持，商讨关东军下一步行动，司令官山田乙三和总参谋长秦彦三郎都主张“奉戴圣旨，立即结束战争”。同日，关东军司令部、伪满国务院和各部都开始焚烧

文件。

1945年8月17日，天皇派特使竹田宫飞抵“新京”，传谕停战，要求关东军正确对待“终战”。

1945年8月17日上午，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奉关东军之命，乘飞机从长春到大栗子沟，召集张景惠等“重臣”布置溥仪退位事宜。当晚，张景惠召集随行的伪满大臣在大栗子铁矿公司某办公室召开“国务院临时会议”，议决“由皇上宣布退位，使满洲国藉此来个终结”。随后，张景惠率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和伪宫内府大臣熙洽谒见溥仪，呈交《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溥仪立即批准，照本宣读一遍，“康德皇帝”的一页便淹没在历史的陈年老帐之中了。退位以后，吉冈安直请他立即准备前往日本，武部六藏则告诉他说，由关东军安排的专机已将价值3亿日元的金条先行运往日本，并指定由“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赴日具体处理此事，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当天深夜，溥仪带着二弟溥杰、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以及3名族侄、1名御医和1名随侍，离开大栗子沟，登上了赴日之途。临行，又携带了一小皮箱贵重珠宝，内有赤金盾4个、白金表四五十块、白金表链20余根和金首饰、宝石、钻石、珠子等物。溥仪还让随侍李国雄把历代清朝皇帝使用过的帽顶珠和传国御玺找出带走，然而这两件珍宝却不翼而飞了。

清朝肇兴于长白山，因吞食朱果受孕生下库布里雍顺的天女的故事，流传了数百年，这里也就成了清朝龙兴之地，所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关的时候，也以“龙归故里”相标榜。非常巧合的是，他作为伪满傀儡皇帝又恰恰在长白山脚下的通化大栗子沟“退位”。有人说清朝走过了“奇妙的八卦图”，为自己在历史上画了句号。其实，“康德”绝不等于“宣统”，溥仪出关后这一段罪恶的途程实在是给他的列祖列宗画蛇添足了。

（画面：长白山的天池、瀑布、森林。）

1945年8月19日清晨，溥仪及其随行人员在沈阳机场被

苏军俘获，经通辽押往西伯利亚赤塔郊外的莫洛阔夫卡，彻底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

（画面：溥仪被俘照片。）

1945年8月19日下午3时30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宫川，在哈尔滨举行会晤。日方就投降程序、受降地点、行动路线和时间等，全部接受了苏方的条件。

（画面：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和长春解放纪念碑实拍。）

尾声

长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也在这场战争中崛起，并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名城。

字幕：

沈阳　1931年9月18日　中国人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长春　1932年3月9日　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的“首都”。

北平　1937年7月7日　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台儿庄　1938年4月7日　国民党抗日战场上的重大胜利。

慕尼黑　1938年9月29日　《慕尼黑协定》助长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但泽（革但斯克）　1939年9月1日　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奥斯维辛　1940年5月20日　希特勒残酷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的象征。

明斯克　1941年6月22日　德军不宣而战，苏联卫国战争开始。

莫斯科　1941年7月22日　在保卫战中摧毁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珍珠港　1941月12月8日　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途岛　1942年6月6日　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日本从此失去主动权。

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　1943年1月10日　揭开苏联红军大反攻的序幕。

西西里岛　1943年7月9日　盟军在地中海战场发起进攻。

罗马　1943年10月13日　意大利退出法西斯同盟并对德国宣战。

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美、英军队登陆，开辟了西欧第二战场。

巴黎　1944年8月25日　宣告解放。

贝尔格莱德　1944年10月20日　宣告解放。

柏林　1945年5月8日　德国法西斯投降，欧洲战争结束。

旧金山　1945年6月26日　美、苏、英、法、中等50国代表签订《联合国宪章》。

冲绳　1945年7月2日　美军把战争推进到日本本土。

东京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无条件投降。

“密苏里”号美国战列舰　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长春　1945年9月3日　长春与世界人民同庆胜利。

有关统计资料（备用）

1931年至1937年，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21 780 000吨；掠夺生铁2 213 899吨。

1937年至1945年，日本要求伪满政府每年向日本提供煤

炭 2 900 万吨、钢铁 150 万吨、粮食 1 000 万吨。

日本向东北移民总数：106 000 户　31. 8 万人。

日本在东北侵夺土地：3 900 多万垧（其中日本移民直接占地 228. 15 万垧）。

1941 年，东北粮谷生产量为 18 667 053 吨；“出荷”量为 5 445 644吨；“出荷”率占 29. 3%（长春地区生产量为 15 827 吨；“出荷”量为 13，808 吨；“出荷”率占 87. 2%）。

1942 年，东北粮谷生产量为 17 657 146 吨；“出荷”量为 6 408 359吨；“出荷”率占 36. 5%（其中长春地区生产量为8 473 吨；“出荷”量为 4 100 吨；“出荷”率占 48. 3%）。

1943 年，东北粮谷生产量为 22 055 364 吨；“出荷”量为 7 671 820吨；“出荷”率占 39. 5%（其中长春地区生产量为 32 564吨；“出荷”量为 24 662 吨；“出荷”率占 39. 5%）。

伪满时期“新京”地区粮食“配给”标准（月定量）：市内居民属于特殊会社、机关以上机构人员及其眷属为成人 12 公斤、儿童 7 公斤，其他人员为成人 9 公斤、儿童 7 公斤；农村地区成人 6. 5 公斤、儿童 5. 1 公斤；属于特殊劳动需要的成人为 15. 5 公斤至 24 公斤。

1944 年，在东北强征劳工 250 万至 260 万人，1945 年计划动员数为 221. 4 万人。

1942 年，仅强行抓捕平民百姓充作劳工，即所谓“抓浮浪”一项就达到 219 238 人。

1943 年 4 月 19 日午后和夜间，伪首都警察一次抓捕 3 160 人，将其中 1 287 人强充劳工。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国军民损失为，国民党军 3 216 079 人、共产党军 584 267 人、民众 18 744 974 人、财产 1 000 亿美元以上。

1931 年至 1945 年，中国损失人口计 35 000 000 人，其中死亡 18 000 000 人（约占全世界总死亡人数的 1/3，负伤

17，000，000人。

1937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歼灭日军1 387 048人，其中，共产党军歼敌527 422人，国民党军歼敌859 626人（不包括俘虏及反正人数）。

伪满期间，东北抗日联军毙伤日军约17．2万人。

（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員。）

长春在“九一八”的炮火中沦陷

●陈本善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在制造柳条湖事件后，立即向沈阳、长春和满铁沿线各据点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预谋、有准备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

早在1928年12月，张学良实行易帜、中国在形式上实现统一后，日本就加紧了战争准备工作。为此，它先后派遣了一批长期侵华老手到东北来。其中有：板垣征四郎大佐（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土肥原贤二大佐（关东军高级参谋、驻奉天特务机关长）、本庄繁中将（关东军司令官）等等。

关东军参谋人员在板垣、石原等主持下，自1928年末以来，进行了大量的战争准备工作。之后，日本参谋本部在1931年4月，在制订《1931年度形势判断》中，特意加了一项：“以解决满蒙问题为先行条件，完成国家改造”，要以发动战争使军部掌握日本主导权，实行军事法西斯化。为此，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三阶段方案：（1）树立亲日政权；（2）建立“独立国家”；（3）“占领满蒙”。接着，日本军部在6月19日，进而草拟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规定：（1）要以一年为期，作

好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2）要作好舆论准备，以取得国内外的谅解；（3）作好军事部署，要关东军制订军事行动计划，上报参谋本部；（4）使关东军熟悉中央的方针和意图。

上述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发动“九一八”事变，既不是关东军的什么擅自行动，也不是板垣、石原的什么个人行动，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预谋、有准备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在这当中，关东军只不过按照日本军部规定的战略目标、步骤和方案，提前发动了战争。而当关东军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日本政府不但加以追认，而且还调兵遣将，终于占领了全东北，并拼凑了一个伪满政权，对中国东北实行了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达十四年之久。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满洲事变政略日志》1931年9月19日条中写道：“下午，接到已攻进奉天附近、营口和凤凰城，完全解除敌军武装，只有长春附近仍在激战中的报告。”

长春位于东三省的中部，当时它既是南满铁路的北端，中东铁路的南端，也是吉长铁路的西端，地势极为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日本发动的这次战争序战中，长春与沈阳并列是两次重要战役。结果虽然由于执行不抵抗政策，因而很快都失陷了，但由于长春守军进行了拼死抵抗，而发展成为激战，这是应该指出的。

1931年9月19日凌晨零时许，日军驻长春部队的司令官，即步兵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少将，从长春满铁事务所那里得知沈阳事变的情报后，本想按关东军司令部的事先部署，准备派其主力南下，向沈阳集中，并以一大队袭击长春南岭的中国炮兵营。当他正在调动部队时，3时5分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要他“指挥步兵第四联队和骑兵第二联队担任长春的警备并要秘密作好攻击该地中国守军”。因此，长谷部立即改变部署，下令：（1）日军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长黑石武城少佐率第五、第七两个中队，偷袭长春南的中国驻军；（2）日军

步兵第四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率第一大队第一、第二、第三中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以及机枪中队，偷袭二道沟兵营的中国驻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长春守军就在南岭和二道沟，同日军展开了激战。

战斗首先在二道沟打响。19日凌晨4时30分，偷袭的日军到达二道沟中国兵营的南300米一线展开。这时，中国守军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三团第二营（营长傅冠军）官兵已经发觉了敌军的行动，并立即作了战斗准备。4时45分，日军开始进攻。由于中国守军当即据守坚固的兵营，顽强进行抵抗，使日军的偷袭变成了强攻，激战达七小时之久。终因敌军以强大的炮火来支援，而我军却孤立无援，到上午11时10分，敌军以付出巨大牺牲为代价，攻陷了二道沟兵营。

其次是南岭战斗。中国在南岭驻有炮兵第十九团和步兵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一团，火力极强，大炮有36门，我军处于优势地位。痛惜中国守军既没有战斗准备，也没有发觉敌军来攻。当天早晨5时左右，偷袭的敌军直接攻入了第一营，很快被占领，并被破坏了火炮16门。当敌军进而攻击第二营和第三营时，我军虽然接到了吉林省公署代主席熙洽"不准抵抗"的命令，但我守军皆怨不可遏，争说与其等死，不如拼命，遂开枪开炮进行还击，展开了一场激战，迫使敌军后撤。后来，敌军在得到来自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的支援，于上午10时，从东、西两面展开攻击，中国守军仍然顽强进行抵抗，坚持到下午4时，南岭兵营终于失陷。

与此同时，敌军还分兵占领了长春城内外的要地和各机关，中国军警由于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周玉柄和市公安局长修长余等执行了熙洽的"不准抵抗"命令，向日军缴械投降。19日晚8时21分，关东军第二师团自沈阳到达长春，长春终于失陷。敌军在长春战役中，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据统计，敌军共有66人

（其中有军官 3 名）被打死，76 人（其中有军官 3 名）负伤。

（作者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关东军——伪满时期的太上皇

●陈本善

关东军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陆军部队，其前身为日俄战后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9年改为关东军，一般配备2个师团，1939年增至5个师团，1941年又增到13个师团，成为侵华、反苏的先锋。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它立即着手拼凑伪满傀儡政权，它作为太上皇，实行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达14年之久。

早在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就制订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开始策划"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国防及外交由日本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为此，还决定起用熙洽、张海鹏、张景惠等汉奸。从此，日本一面制订具体方案，一面导演汉奸上演什么"独立"、"建国"闹剧。1931年12月，在关东军内成立"统治部"（后改叫特务部），具体筹划此事。1932年2月，经日本政府同意，决定"国名"叫"满洲国"，"元首"叫"执政"，"国旗""新五色旗"，"国都"在长春，改叫"新京"，"年号""大同"等方案。3月1日，发表"建国宣言"，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面见溥仪，逼他于3月6日在汤岗子签密约，3月9日把他拉到长春，举行了"执政就职仪式"。这样，伪满这出傀儡戏就算正式开演了。

日本在表面上，把这个傀儡政权打扮成一个"独立国"，叫

一批汉奸扮演成什么“执政”、“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过市，但在他们的内心里也很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可由他们随意摆布的傀儡。日本在一份内部文件，即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于1932年6月起草的《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中，将其内幕全盘托出了。

它规定的“方针”是，“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其要点是：(1)“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要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为此，(2)“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担任指导满洲国政府”；(3)关东军司令官除了指挥关东军、掌管伪满的“国防”和治安外，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掌管外交事务”，同时“还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4)“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重大事项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与其执政或国务总理进行谈判，其他事项则以关东军参谋长名义，与其总务长官进行谈判”；(5)“为使满洲国政府……的重要政务不超越我国企图之外，其国务院会议之决定事项，于提交参议府会议前，必须使总务长官向关东军参谋长通报，凡有关东军难以认为妥当的事项时，由参议府会议加以改正”。这真是一份极为“坦率”的自供状！它把日本政府——关东军——伪满傀儡政权之间的关系，暴露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傀儡政权所独有的所谓“总务厅中心主义”，事情就更清楚了。原来，日本人在伪“国务院”内设一个“总务厅”，其长官由关东军任命的日本人充任（一般由关东军统治部（后改叫特务部）长兼任），其任务，一是监督伪满掌握实权、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的活动；二是由他主持、只由“日系”高官参加的秘密例会（“火曜会”，即星期二例会），来制订“国务院会议”的文件和决定。正是通过上述这一套办法，使总务长官成

了伪满政权的实际总管，也使伪满成了关东军随意操纵的傀儡。关东军司令官是日本统治伪满的太上皇。

到1934年，日本在伪满实行“帝制”，溥仪由“执政”升格为“皇帝”，“国名”也改叫“满洲帝国”，“年号”也改叫“康德”，“总长”改叫“大臣”。随之，伪满对日本的关系也由“友邦”一变而为“盟邦”，最后干脆就叫“亲邦”，犹如父子关系。相应地，关东军在1935年把它的“高级参谋”吉冈安直中佐（后提升为中将）派到溥仪跟前，叫作“帝室御用挂”（内廷行走），对溥仪的一言一行也严加指导、控制和监视。这时的日本与伪满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在吉冈与溥仪的关系上。开始时，吉冈把他与溥仪的关系，叫作“手指与足指的关系”；但到1936年，吉冈对溥仪说，“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最后，他甚至对溥仪说，“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

在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内，日本先后任命了7名关东军司令官，他们是：

（1）本庄繁（1931、8——1932、8），他长期担任日本驻华武官、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指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并开始主持制造伪满政权，因此受到了日皇的嘉奖，封为男爵和大将，并出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枢密院顾问官。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垮台后，他自杀身亡。他的两个干将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也恶贯满盈，被远东军法庭判处绞刑。

（2）武藤信义（1932、8——1933、7），自他开始，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日本“驻满全权大使”，成了统治中国东北的太上皇。在他任内完成了制造伪满工作，签订“日满议定书”，开始大规模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斗争，他死于任上。

（3）菱刈隆（1933、7——1934、12）在他任内，除了继续镇压屠杀中国人，并开始向华北侵略；1934年在伪满实施“帝

制”，进一步加强了对伪满的控制。

（4）南次郎（1934、12——1936、3），他在“九一八”事变时是陆军大臣，在他任内，关东军继续加强对中国人民的镇压活动，进一步向华北侵略；这时，还搞了伪满“皇帝”第一次访日活动。

（5）植田谦吉（1936、3——1939、9），任内除了继续上述侵华活动外，还先后对苏联挑起了张鼓峰战争和诺蒙汗战争，终于遭到惨败而下台。

（6）梅津美治郎（1939、9——1944、7），任内发生两个事件：一是1940年叫溥仪第二次访日，把日本皇室祖先“天照大神”（“三种神器”）接到伪满，将日本“神道”立为伪满的“国教”；二是1941年日本搞了一次“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关东军由5个师团猛增至13个师团，人数达70万人，准备对苏作战。只是由于德军在莫斯科战败，日本才未敢轻举妄动。

（7）山田乙三（1944、7——1945、8），此时日本在伪满的“国策”，是竭尽全力来搜刮粮食和工矿产品，所谓“经营满蒙”也由“养鸡生蛋”一变而成为“杀鸡取卵”，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同时，自1943年起，日本越来越多的把关东军精锐部队抽调到中国和太平洋其他战场，使它变成了一个空架子。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人民奋起举行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关东军停止战斗。当天，山田乙三致电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要求停战并交出武器，苏军立即要求他无条件投降。关东军在慌乱中还没忘记导演伪满傀儡戏的闭幕式。1945年8月18日凌晨，关东军叫逃到通化大栗子沟的溥仪，念了“退位诏书”，草草举行了“皇帝退位”仪式。20日，山田乙三在长春进行无条件投降，长春市宣告解放。关东军被消灭了，伪满这出傀儡戏也就收场了。

满铁、二战与长春

●苏崇民

长春曾经被日本入侵者定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在二战期间，它作为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个日本最大的殖民地，这个日本的战略物资——煤炭、钢铁、石油、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在支持日本侵略战争，统治东北人民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长春，一提起二战，人们自然会想到伪满洲国，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其实，在伪满洲国出现之前，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经营了26年。早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全东北之前，它已在东北拥有许多特权，不仅将东北南部（日本人称为"南满"）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将势力延伸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北部（北满），而且在铁路、金融、电业、航运、贸易、重工业、新兴工业方面占有明显优势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当时，日本势力的代表机构有四个，它们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军、关东州厅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其中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设立的推行日本"国策"的公司。日本"国策"当时称为"经营满洲"政策，即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关键一环，所以满铁就是推行日本"大陆政策"

的急先锋。满铁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拥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所能有的各种特权，它在形式上是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是代行日本政府职能的日本殖民侵略机构。

满铁是1906年设立的，1907年4月1日正式开业，经过20余年的经营，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它不仅拥有长春至大连这个被称为南满铁路干线和沈阳（当时称奉天）至安东（今丹东）的安奉铁路以及两路的支线，全长1 100余公里，并控制吉长、吉敦、四洮、洮昂等借款铁路；直接经营号称东洋第一的抚顺煤矿以及鞍山制铁所、大连中央试验所和公主岭农事试验场等大型重工业和科学试验机构；此外，还投资于几十个子公司，分别垄断了东北南部的电业、煤气、搬运、保险、玻璃、制糖、棉纺、毛纺、制材等各种行业。

满铁还是政治和文化侵略机构。在南满铁路沿线有所谓满铁附属地，在各个车站附近都形成日本市街。日本不仅在这个"附属地"驻军设警，还抽捐收税，俨然是日本"租借地"向北延伸。它像一把尖刀一样从旅大"租借地"（日本称为"关东州"）直插东北的心脏地区——沈阳和长春。日本在"附属地"排斥中国主权实行殖民统治并无法律根据，它是靠曲解条约和恃强霸占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当局默认的。满铁在"附属地"大兴土木招徕商户，在中国市镇之外形成另一商业中心，利用铁路之便夺走中国市镇的繁荣，在"附属地"遍设银行、交易所、市场等，操纵特产出口贸易。还在"附属地"开设大、中、小学以及医院、图书馆，修建"神社"、会馆进行文化侵略。"附属地"为日本移民东北提供了各种便利，成为日本人在东北发展的根据地。

"满铁附属地"还是日本窝藏土匪、贩卖枪支、走私鸦片、私运军火、扰乱中国社会治安的据点，成为各种犯罪的滋生地。

长春是南满铁路的最北端，在这里与中东铁路的宽城子车站毗连。因此，长春是日俄势力接触的前沿阵地，是二者商战

的主战场。满铁的长春站和长春“附属地”是它向北发展的前哨，从这里将北满大豆等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南满铁路运往大连出口，它成为满铁收入的主要源泉。

满铁的沈阳、辽阳、铁岭、开原、四平等站的“附属地”主要是从原东省铁路“接管”的，而长春“附属地”则是满铁设立后直接从中国人民手中强行“收买”的。这片土地本来已由中国政府预定作为商埠地和吉长铁路的车站用地。日本陆军大臣、满铁设立委员会委员长寺内正毅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考虑选中了这片土地作为南满铁路的长春车站用地，因为这片土地位于长春旧城与俄中东铁路宽城子车站之间，它可以遮断宽城子车站与长春市街的联系。在日本的威压下，当时的清政府只好屈服，于是占地470公顷的广大面积就变成了满铁的长春“附属地”。这就是从车站到胜利公园及其东西两侧的广大地区。当时人们称它为“日本地”。这项“收买”是在1907年8月完成的，比伪满洲国出现早26年。由于中东铁路是宽轨，与南满铁路轨距不同，从哈尔滨和大连运来的货物必须在长春倒车换装，加上吉长铁路从吉林方面以及用大车从北满各地运来的大豆等货物都在长春集中，所以长春有“豆都”之称，特别是一战期间，长春繁荣已极，当时的交易额不下于上海。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制造爆破南满铁路事件作为借口，也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满铁就是日本在中国的所谓“特殊权益”的化身和象征。南满铁路被说成是日本的生命线，在东北的“日侨”，90％以上靠满铁为生，日本各政党、官僚、浪人都把满铁看作取之不尽的财源。而在1925年之后，在东北的中国铁路有所进展，特别是张学良易帜之后，中国自办铁路在逐步摆脱对南满铁路的附庸地位，开始形成与满铁对抗的独立的交通体系。于是日本大造满铁被包围的舆论。又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和白银跌价的影响，满铁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赤字，满铁股票价格猛跌，牵动了满铁股东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的

心。日本在东北的“日侨”及满铁职员、陆军以至浪人中的法西斯分子、殖民主义分子认为，只有占领中国东北，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直接策划“九一八”事变，实行军事占领的虽然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而孕育和促成了这种形势的却是满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铁积极配合和支援关东军，首先是承担关东军的运输。关东军所有参战的兵员、军事辎重几乎都是满铁运输的，使关东军可以迅速集结转移，以两万余人的兵力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国土大一倍多的广大地区。这固然是由于张学良军队主力进了关、东北防务空虚和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所致，也完全是靠满铁的军事运输实现的。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2年到3月，满铁的军用列车运行4 056次，每天平均22次，运送军需品197 980吨，平均每日运送1 000多吨。除军事运输外，满铁还组装了6组装甲列车，直接参加军事行动并承担铁路的警备。满铁的人员还组成了“自卫队”，全副武装担任军队开拔后“附属地”的“警卫”。满铁不仅提供300万日元现金供关东军使用，还提供各种物资设备4 850多种，供给各种物资，价值达3 000万日元。“附属地”的宿舍、仓库、学校、剧场都提供给关东军作为兵营、基地，医院则成为野战医院。总之整个“附属地”成为关东军集结、休整的后方基地，而满铁本身就好比是关东军的总后勤部。

由于满铁和关东军一道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日本天皇对于“有功”的满铁社员，按照日本陆军军衔授与勋章，被授予勋章者达2 330人，囊括了全体日本职工。因此，说日本占领东北是满铁与关东军共同完成的，也未尝不可。

满铁积极参加了伪满洲国的筹建工作。为援助关东军的各项工作，满铁派遣了大量人员为关东军效力，截至1933年3月，满铁派出人员总计达2 600名，其中包括到关东军参谋部的41名，副官部的10名，特务部的161名。在1932年度，从满铁

退职、正式转为伪满洲国官吏的多达244名，他们构成了伪满“日系官吏”的主体。1932年4月，在身居要职的24名“日系官吏”中，就有11名是原满铁人员。例如伪满交通部的总务司长就是原满铁铁道部的课长森田成之，铁道部主要岗位都为满铁人员所把持。当关东军决定成立自治指导部时，满铁的地方课长中西敏宪、卫生课长金井章次还有结城清乃郎等成为其指导力量，而帮助关东军掌握县一级政权的自治指导员、参事官们大都是满铁派出的青年职、雇员。当各省伪省市政府成立之时，一些满铁职员成为伪省市政府的顾问或总务厅长，金井章次就成为伪奉天省政府总务厅长。

除满铁的日本职员外，满铁长期豢养和收买的一批汉奸也成为伪满洲国中“满系”高官的一个重要来源。上面提到的自治指导部部长就是早在1911年就投靠日本成为满铁“嘱托”(特聘人员)的老牌汉奸于冲汉，还有伪东北交通委员会长丁鉴修等交通委员，卢元善、顾琅等人成为日本人最可靠的奴仆。

可见，满铁的长期经营还在组织上为伪满洲国的成立作了准备。因此，可以说满铁是孕育伪满洲国的母体，没有满铁就不会出现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事实上的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官以“全权大使”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对伪满洲国行使“内部指导”。满铁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关东军的保护下，满铁的经营扩展到东北全境，开始垄断东北全境的铁路、港口、水路和公路运输的经营，同时承担新铁路的修筑和经营。在日伪实行的经济统治和所谓“三大国策”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中，都扮演了主要角色。

从1932年到1937年，满铁仍然是日本投资东北的主要渠道，1937年，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成立，满铁将重工业转交出去，它的投资仍占到30%多。

满铁投资的大部分用于修建其军事铁路网，实现其早已策划的“满蒙铁路网计划”，新建铁路 5 000 余公里，干线还实现了复线化。满铁还垄断了松黑两江的航运和“国有”公路运输，控制了各种现代化的地面交通，用以镇压人民，加强统治，掠夺资源，倾销日货，运送移民，服务军运。

满铁投资的另一重点是发展军火工业所必需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大部分是满铁和伪满国家资本及日本财阀资本联合投资的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它们是伪满洲国经济“开发”和统治的骨干。1938 年，满铁将重工业移交给“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之后，又在石油化学工业方面倾注了力量。

满铁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东北，它的触角遍及半个中国，特别是在华北。“七·七”事变前后，满铁大举向华北扩张，一度成为华北经济的主宰。特别是满铁有一个庞大调查情报机构，是日本的“国策”调查机关，它的活动范围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尼西亚、大洋洲，涉及整个中国和东南亚以至欧美大陆。它的调查情报工作为侵略战争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服务。可见，满铁在二战期间是支持日本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支柱，是一种战争力量。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时，满铁的资产已超过 50 亿日元，营业收入和支出每年都超过 10 亿元，利润超亿元，总从业人员超过 40 万人，其中日本人 14 万余人，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超级巨型企业。

战后，日本有人不承认满铁是侵略机构，他们说满铁与侵略无缘而是“经济开发”的火车头，并且要将这种观点和所谓“满铁精神”传给子孙后代，还要到中国人中为这种观点寻找市场。因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满铁“开发有功”的观点和“侵略有理”是一脉相通的。必须指出，问题不在于满铁是否修建了铁路、工厂、矿山，搞了“经济开发”，问题在于它搞的是什么样的“开发”，它的“开发”目的、手段以及其产生的

后果。我们说它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开发”，是为侵略和掠夺服务的“开发”。它并不是为了东北人民为了东北经济的发展而“开发”。它的“开发”是以掠夺东北的物的和人的资源为目的，它的手段是在高压统治下奴役东北人民，甚至采取杀鸡取卵和人命换煤的方法，破坏了东北的矿藏，摧残了东北的人民。它的“开发”给东北人民造成深灾大难，挣扎在死亡线上。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将铁路矿山等夺回自己手中，满铁“开发”的这些成果，才成为经济建设的手段，而满铁已经成为历史了。

（作者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理事）

殖民地时代的中国东北经济

●孔经纬

199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此时此刻重温50年以前的一段历史是非常必要的。

1931年“九一八”以前，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和经济掠夺就已达到了相当的地步；“九一八”后，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在中国东北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侵略和经济掠夺。

东北的殖民地经济开始形成 于1935年前后，之后不断深化，到日本投降前已经极度膨胀。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总是以前一个时期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伪满殖民地经济膨胀同样离不开东北地区的原有经济基础。“九一八”前的东北地区尚处于自身开发过程中，社会经济已有一定程度发展。殖民主义者利用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而且带有疯狂性。殖民主义掠夺，与殖民地经济膨胀是连在一起的。殖民地经济带来的后果，同一般国家和地区独立自主地正常发展经济的进程是有很大区别的。

日本对残存的别国经济势力也照样予以排挤，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英、美断交并接管了英、美等国的动产与不动产。在经济上，也实行所谓名副其实的一国独占。

在日伪经济垄断中，“满铁”和1937年12月设立的“满洲

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占有重要地位，有前有“满铁王国”，后有“满业王国”之称。

不同类型社会有不同类型的高速度，殖民地经济扩展也有其特有的高速度，伪满殖民地经济即以畸形的高速度而实现其膨胀的，这种高速度是以不顾殖民地人民死活而拼命进行的。殖民主义者通常很少在殖民地搞重工业，大搞就更为少见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却大搞了重工业，尤其在后期搞的更凶。这一方面出于它们称霸的军事需要，同时和它们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和使东北领土日本化的侵略野心密切相关。日伪的所谓“计划经济”，无非是有计划的殖民主义经济掠夺。1937年开始的“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实行于矿工业、农畜产、交通通信等各个部门，但以矿工业为主要目标；1942年开始的“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同样涉及各个部门，占用资金最多的还是矿工业。伪满矿工业乃系殖民地性质的畸形物，重工业以资源掠夺为主。

日伪统治者对金融的统制，主要是通过“满洲中央银行”这一特殊金融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满洲中央银行”却是靠吞并旧行号露骨掠夺而组建起来的。

伪满的所谓物资“配售”（即人们所说的“配给制”），对中国人民的威胁相当大。其目的在于保证日伪统治者的需要和最大限度压缩中国人民消费，在七类“配售”对象中前六类（军需、准军需、官需、特需、准特需、重要民需）均与中国人民无关，只有第七类民需才属于维持普通生活需要。白面和大米，一般既不准中国人民贮存，也不准中国人民吃，违者便被打成“经济犯”、“国事犯”。

伪满的进出口贸易，主要由日本安排，具有极大的对日依赖性。不论进口与出口，伪满主要是为了直接满足日本的需要。

到“九一八”前，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已经有了很大的积累，但由于“九一八”前后它们同日本帝国主义形成了势不两立的

敌对状态，东北地区一经被占领并变成殖民地，其所拥有的经济实体便横遭洗劫。另一方面，少部分原属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势力投靠于它们而变成汉奸并丧失独立性者又成为汉奸官僚买办资本。

殖民地下的东北民族资本境遇越来越糟，尤其倍受日伪经济统治的摧残，到后期更加每况愈下，日趋没落。当然，个别较大的民族资本也有向官僚买办资本转化的。长春裕昌源原属民族资本企业，伪满后期掌企业大权的王荆山逐步变成汉奸而使企业向官僚买办资本转化，与日伪勾结，引进日货，成为以官僚买办资本为主体夹杂民族资本成分的企业。

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工人即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种压迫，而在殖民地条件下，中国工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苦力或一般工人，一类是特殊劳力或特殊工人。即以一般苦力或一般工人而论，其所受剥削压迫程度也大大超过半殖民地时代的情况。至于特殊苦力或特殊工人，乃通常所说的“劳工”，那是特种奴隶，蒙受极大摧残。伪满在1942年征了100万“劳工”，1943年120万，1944年130万，1945年达160万。“劳工”致残致死者甚多。另外在1941年以后，日伪组织所谓“勤劳奉公队”，强迫中国人“勤劳奉仕”（“奉仕”的表面意思是服务），内中包括经检查而不合格的“国兵漏”（青年）和广大学生。

伪满初，日本以“处理”旧有皇产官地和“国有荒”、“国有林”为名，大量掠取土地。又借所谓“商租权整理”和“地籍整理”，进行土地侵占。后期，又打着“收买”和开造未利用地的幌子掠夺土地。日本在东北直接侵夺土地达3 900多万垧，日本移民直接占地280. 15多万垧。日伪统治者还不断地增设各类“农场”，进行农业掠夺。并设带“农”字机构统制农民经济和控制农产品产销，先后有“农事组合”，“农事合作社”，“兴农合作社”。伪满的“粮谷出荷”正是通过“兴农合作社”来

搞的，它打着粮谷上市的招牌，而对粮谷实行强征。从1940年实行“粮谷出荷”制度起，一共强征粮谷3 660万吨。

殖民主义者向殖民地移民是常见的，问题在于除了搞一般移民外，还搞了农业移民，而且越来越大规模进行。到日本投降前，移到东北的日本移民共达106 000户、31.8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构成为殖民主义扩张的一种新的升级，也是和它们长期占领东北和使东北领土日本化的侵略野心连在一起的。在日本移民占领下，尚有大批中国农民被逐出本乡本土，搞所谓“内国开拓民”。

在伪满时期，封建经济还在延续，除有一般地主经济外，分化出一部分汉奸地主经济势力。殖民主义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利用封建势力实现自己的统治，只有到了它们不再需要的时候才有可能否定其存在。

1932年3月，长春成为伪满“国都”并改成“新京特别市”，它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虽然原有基础不如沈阳和哈尔滨，而长春经济也在不断扩展。世界上并不存在纯消费性都城。长春除拥有伪满国务院所属各部外，各种公司势力自伪满初年起即日趋增加并愈来愈集中，尤其是其中的大公司。1942年，伪满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的总社绝大部分设于长春，有些会社虽不在长春设总社，却设有分社（支店）。

整个东北地区，是在侵略者武装占领下并实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由于殖民者以侵略、掠夺为目的，而以野蛮性“开发”为手段的双重主观性，它们必然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实惠。

伪满对“九一八”前的社会经济，从总体上看是否定的，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经济上看，既有否定性又有继承性。战后以来的社会对伪满经济，从总体上看也是否定的，乃由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国统区）或新民主主义社会（如解放区）以至社会主义社会（如新中国成立后）；从经济上看，同样是既有否定性又有

继承性。在社会经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都无例外地存在着继承性与否定性，这是一般规律。但是，在这里同样帮不了“侵略有功论”的忙。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物质基础乃系殖民地人民所创造，一旦归属于中国便是被掠夺果实还家。我们必须从事实出发，引出应有的科学结论。

（作者系吉林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长）

伪满时期的战时经济掠夺

●解学诗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所实行的不是一般的殖民统治，而是地道的军事殖民统治。因为：第一，伪满14年间，日军——关东军大批师团一直对东北实行武装占领；第二，日本军部——关东军司令官始终是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第三，伪满洲国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为了实行这种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不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高压统治，而且进行愈演愈烈的经济掠夺。伪满时期经济掠夺的军事性质，在两个“产业五年计划”上体现的尤为明显。1937年开始推行的“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完全以军事工业和基础工矿业为中心。开始执行后，不断扩大计划规模，并从1940年起，实行重点主义，掠夺目标集中地指向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粮食等五项物资。自1942年开始执行的“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更加集中地指向“战时紧需物资”，并实行“紧急”掠夺。

东北煤炭资源丰富，伪满后期统计，埋藏量达200亿吨以上。但是，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煤炭资源的一部分，即被帝国主义所霸占，当时的产量不到1 000万吨。伪满时期，经过战时经济掠夺计划的推行，1941——1944年产量达2 400万吨。伪满14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煤炭掠夺总量达2．5亿吨。为了掠夺更多的煤炭，在战时原材料日益困难的情

况下，日伪竟实行“人肉开采”政策，用中国矿工的血肉和生命换取煤炭。在资源的利用上，则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宝藏。

东北的钢铁资源，也是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即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不过，当时的东北生铁产量只有20余万吨。伪满时期，钢铁始终是掠夺重点，并实行铁钢连续作业。1942年和1943年，生铁和钢的产量，分别达132万吨和86万吨，其中供应日本的生铁1942年为71.5万吨，供应日本的钢坯1943年达14万吨，钢锭为2.6万吨。

日本是贫油国家，他们掠夺石油的口号是:“一滴油就是一滴血”。伪满出笼伊始，“满洲石油会社”就曾处心积虑地寻找地下石油源，奈因当时勘探技术水平所限，终无所获。但是，在开发油页岩方面却取得了成功。满铁抚顺煤矿西制油厂，在日本陆海军的直接参与下，利用露天矿煤层顶部的油页岩，使页岩油粗油生产能力达28万吨，实际产量达25万吨。这一产量指标超过了日本国内的石油总产量，所以它具有重大意义。日本帝国主义还曾试图利用抚顺、舒兰、辽源、阜新等地的煤炭，建立和发展煤炭液化工业，但未遂所愿。

有色金属的掠夺重点，是铜和铝，后者是重点中的重点。而铝的生产主要依靠满洲轻金属会社的抚顺工厂和安东工厂，它们分别以东北和山东的矾土页岩为原料。1941——1944年，铝的产量从6 000吨增至8 000吨；铜的产量从400吨增至2 205吨。为了搜掠更多的金属，特别是有色金属，日伪还强制实行金属“回收”，名“金属献纳运动”。结果，群众生活所用的金属器件被掠一空，公共设施的金属构件也荡然无存。甚至连伪皇溥仪收藏的白金和名闻中外的承德离宫铜殿，也同样被掠。

伪满后期，我国东北不仅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兵站基地”，也成了所谓“大东亚粮食基地”。因此，在重点掠夺目标中，粮食从第五位跃居第一位。日伪为了掠夺粮食，一方面以

"出荷"之名，采取种种强制手段，从农民手中夺取粮食。1940—1944年，共掠夺粮食3 276万吨，其中1944年的掠夺量为当年产量的二分之一，达870多万吨。另一方面，又实行粮食"配给"，极力压低粮食供应量，甚至经常中断供应，从而将城乡人民都置于饥饿线上。尤其在春夏的青黄不接之际，东北大地，从南到北，到处闹无米之炊，吃草根，啃树皮，被迫自缢身亡者也时有所闻。所以，粮食的"出荷"与"配给"，是伪满后期普遍性灾难之一。

另一个灾难就是劳务奴役。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无论是战时经济掠夺，还是备战的军事工程，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伪满后期，每年需要劳工达200万人以上，由于劳工流动率极高，实际需要量达数百万人。而东北劳动力主要来源——关内流向东北的劳动力，由于种种原因，却日趋减少。在这种形势下，伪满洲国从1940年开始实行所谓"劳务新体制"，靠伪满洲国自身实行所谓"国民皆劳"，也就是全民劳工化和战时奴隶化。这样，不仅学生、青年、职工被编成"勤劳奉仕队"或"勤劳奉公队"，驱赶到各种工程现场，被迫服劳役，而且在广大居民中摊派劳工，并从摊派劳工发展到肆意抓捕劳工。于是，成千上万的劳工被送到各个劳动现场，风餐露宿，挨打受骂，倍受残害。无数黎民百姓，去而无回，家破人亡。据战犯交待，仅王爷庙附近的一项军事工程，即因气候严寒、生活恶劣，而死亡6 000余名劳工。在各个矿山和大规模土木工程现场，无不有埋葬大批死亡工人尸骨的所谓"万人坑"。

伪满时期，战时经济掠夺和劳务奴役的基本政策，是经济统制。这是法西斯强权政策，人民没有经济自由。伪满初期，日伪就建立一系列特殊会社，将经济命脉和基础产业控制起来。1937年实行《重要产业统制法》，20多个行业被划为统制产业。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又颁布《产业统制法》，统制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产业。与此同时，流通领域，诸如：金融、交易、市场、

物价、物资、劳务、工资等等，通通实行战时统制。结果，不仅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酷限制，而且各阶层人民动辄触犯经济统制，每年被打成“经济犯”者达数十万人。但是，经济统制政策不是科学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它不但不能解决愈演愈烈的战时经济矛盾，反而更加剧了战时经济危机。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战时经济，维持战时掠夺，以支撑侵略战争，又不能抛弃经济统制政策。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法避免的悲剧所在。所以，从经济角度看，它也是注定失败的。

（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劳工的血泪仇

●苏崇民

在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抓劳工的问题曾经使东北人民谈虎色变，胆战心惊，许多被抓过劳工的人至今犹心有余痛。讲到劳工需要从“华工”说起。“华工”是日伪对从关内到东北来谋生的工人的称谓，以区别于东北当地的工人，他们将当地工人称作“满洲工人”。

东北沦陷期间，如同“九一八”事变前一样，每年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关内主要是华北的劳动人民出关做工。他们或是被生活所迫，或是被招骗所诱，或是被日伪所逼，到东北充当苦力或劳工，大多在日伪的矿山、码头、工地充当矿工、装卸工、力工或各种杂工，从事最繁重最艰苦的体力劳动。正是他们的血肉之躯构筑了许多巨大工程的基础。由于关内大量“华工”来到东北，不仅保证了东北需要补充的劳动力，还压低了东北的工资，这一切都对控制东北经济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利。

然而，日本关东军却从维持其殖民地秩序和日本移民政策出发，决定限制“华工”入境，不但在数量上进行限制，还要进行政治和健康的审查，实行了所谓劳动的国民统制。其结果是华北劳动者出关人数大减，1934 年为 63 万人，到 1937 年已减为 32．3 万人。

1937 年，日伪执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日伪当局不得不缓和对出关“华工”数量的限制并进而

采取积极招徕华北工人的方针。从1939年到1942年，每年都有百万左右的华北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被招骗或征集到东北。

从1940年起，日伪在华北招募工人遇到困难，需要量增加而应募者减少。1941年，尽管日伪当局用尽各种办法，出关"华工"还是在减少，而且，这种倾向仍在继续。迫使日伪当局不得不修正它的劳动政策，将对华北工人的依赖转变为"国内自给体制"，发起了"劳务兴国运动"。

1941年7月，伪满洲国制定了《劳务新体制确立纲要》，要确立"举国勤劳"的劳务新体制，即将劳动力对华北的依存转向动员东北当地劳动力，建立"劳力自给体制"。实施"国民总服役制"，强迫人民服役，确立"全民义务劳动制"。实际上是将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大的劳动集中营。

从1942年起，伪满总务厅企划处每年都要制定"劳务动员计划"，"劳务动员"的主要支柱是"紧急供出"。1942年2月9日，伪民生部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则规定军需、重要厂矿在紧急必要时可向伪民生部大臣提出申请，经民生部大臣认可，再通过伪省、市、县政府层层下达指标，地方政府即据此实行强制征集，用行政手段强行征集劳动力，叫作"行政供出'。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出劳工"，而对于不愿"出劳工"的就派警察去抓，就是"抓劳工"。在城市中还有在闹市区集中抓人的"抓浮浪"，它和"供出劳工"不同。"供出劳工"实质是要农民出劳役。被指定的"就劳义务者"为18岁至50岁的男子。被指定的"就劳义务者"不得逃亡、潜匿或装病，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被动员的劳工"以县为单位被编入"劳动报国队"。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以"供出劳工作"为劳力的主要来源。

"供出劳工"的人数，1942年为35万人，1943年为50万人，1944年为60万人，1945年计划仍为60万人。他们分别为当年"劳工动员"总数的35%、41．9%、46．1%和37．5%

。这些劳工被用于修筑军用道路、部队营房、机场、“防御工事”和水利工程。由于这种“紧急供出”加重了各级伪政权的行政负担，而且随“供出”而来的摊派问题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村的稳定。从 1943 年起，日伪采取了压缩“紧急供出”的比重，发展“勤劳奉公制”的方针。

1942 年 5 月 27 日，伪满国务院通过了《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纲要》，决定创设义务的“国民勤劳奉公制”，使未服兵役的男子服劳役。同年，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年龄在 21 至 23 岁之间的男子未服兵役者，除了残疾者、精神异状者和身体特别虚弱者外，都要到“国民勤劳奉公队”服劳役，期限为在 3 年中，共 12 个月，每年 4 个月。1945 年又将适龄由 23 岁延到 30 岁，并将其服务期限延长为 3 年，每年 6 个月，分 6 年完成。“国民勤劳奉公队”要从事的是：(1)“国防建设”事业，(2)铁道及公路建设事业，(3)治水、水利及造林事业，(4)“土地开发”事业，(5)重要生产事业，(6)农作物生产收获事业，(7)灾害救护事业，(8)其他伪民生部大臣特别指定之事业。对于为逃避劳役而逃亡或潜匿、毁伤身体、故作疾病或其他作伪之行为者，处 2 年以下之徒刑或 2 000 元以下之罚金。

为了实行《国民勤劳奉公法》，1942 年 10 月在伪民生部下增设“国民勤劳奉公局”。1945 年 3 月，又将劳务行政由伪民生部分离，新设伪国民勤劳部。“勤劳奉公队”按市、县、旗区域采取军队编制。经过各省集中，进而由伪满中央政权统制，伪国民勤劳部长于镜涛和次长半田敏治就分别兼任“国民勤劳奉公队”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所以它是伪满政权直接掌管的一支劳动大军。是日伪统治者无偿占有广大青年劳动成果的半奴隶式劳动营。对“勤奉队员”不付工资，只发给少许津贴。

1943 年是全面推行“勤奉制”的第一年，在 12 个县动员了 10 万人。1944 年在各地全面推开，1945 年“勤奉队员”达 30

万人，而其长远目标是100万人，使之成为征集劳动力的主要手段。"勤劳奉公队"队员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劳动效率自然比一般劳工高。为了培训"勤劳奉公队"的骨干，伪勤劳部曾在长春附近的大屯修建房舍，计划训练7 000名"勤劳奉公队"干部，由于日本战败投降，这一计划成为泡影。在伪满未检查上"国兵"的人，群众称之为"国兵漏"，就是这些青年躲过兵役却受到更严酷的劳役的折磨，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被折磨致死致残。

日伪集中使用"勤奉队"的地方主要是它的紧急造田水利工程和关东军的军事工程。

1944年和1945年，在前郭旗水利工地，有伪吉林省在舒兰、双阳、怀德等14个县征集的"勤劳奉公队"约4万人。1945年在查哈阳水利工地修水田的"勤奉队"有白城、扶余等13个县1万余人。

1945年在铁岭军事工程集聚了几万劳工，其中有滨江、巴彦两县两个勤奉大队2 400人，从3月到8月的5个月时间，只剩下600人，其余的都死了。

在日伪统治者的眼里东北人民全部是它们任意宰割的劳工，在校就读的青少年学生也未能避过他们张开的大网。1942年，大学、专科学校的在校学生约2万名，伪国民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约16万人，这一年12月23日伪满政权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在学男生都要参加"学生勤劳奉公"，期限为每年30天至45天，要以学校为单位编成"学生勤劳奉公队"。对于认为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勤劳奉公"的学生，不许毕业。1943年6月3日，又公布了《学校勤劳奉仕规程》，将上述精神扩展到中学和小学的在校学生，将"勤劳奉仕"编为正课，在"勤劳奉仕"的名义下驱使中小学生做各种摧残身心的繁重劳动。日伪的统治使中国东北成为一个"全民皆劳"的劳动营，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劳动资源的掠夺已经达到极点。

在当时，所有华工、苦力、劳工、“勤奉队员”等集中的矿山、土建工地、水利工程、道路、机场和其他军事工程。劳动条件均极为恶劣，很少机械设备，全靠人们拼体力，而且劳动时间超长，人们疲惫不堪，恶性事故时有发生。加上住处潮湿简陋，休息不好，食粮不足，食不饱腹，衣不蔽体，卫生条件太差，疾病流行。加上日本监工、把头拿人命当儿戏，任意打骂工人，致残致死。还有日军动辄开枪杀人以至集体屠杀。结果，到处留下万人坑、万人坟、乱死岗。

举几个例证，可见一斑。

1942 年 4 月 26 日，本溪湖煤矿柳塘坑瓦斯爆炸，死中国矿工 1493 名，是世界煤炭工业史上最惨重的事件。留下了获沟万人坑。1943 年 1 月 6 日，鹤岗煤矿南岗三坑瓦斯爆炸，使 94 名矿工丧生。1943 年，鸡西滴道煤矿老二井一次瓦斯爆炸炸死矿工 146 人。

1942 年丰满水电站工地大坝合龙，施工在冒险中进行，合龙处被冲垮，100 多名劳工被江水冲走。

1942 年 4 月到 8 月 19 日，满铁老头沟煤矿病死工人 114 人，其中大肠炎 56 人，伤寒 3 人，当时使用工人总数为 2 378 人。还有 7 名“供出工人”没有死亡诊断书就被埋葬了。

1941 年 12 月，密山县滴道煤矿发生食用水污染事件，3 000 余人中毒死亡。1942 年 1 至 6 月，东边道开发公司工人患病者达 1 030 人，死亡 268 人，而全体工人总数不过 3 000 余人。

1941 年夏季，在本溪湖煤铁公司仅仅几个月，就有 1 600 名工人死去。同年，在满铁绥化线工地也有近千名土工死亡。

1943 年，伪吉林省为伪交通部东安土木工程处“供出”的约 7 000 名劳工中生病累计 6 765 人，因病送还者 1 689 人，死亡者 340 人。

1943 年 1 月，在麻山煤矿，仅一次流行性传染病就死亡工人和家属 1400 余人。1940 年从 2 月到 9 月，在乌拉嘎舍矿小乌

拉岛，3 000 多矿工因瘟疫，剩下不到 1 000 人。

在孙吴、瑷珲、虎林、虎头、海拉尔等关东军的地下工程，集体屠杀的事屡见不鲜，特别是海拉尔，民工只见运入不见运出，据说，数以万计劳工无一生还，全部遇害。

1944 年，在王爷庙关东军直辖兴安岭筑城工程中，从各县征用的 1. 5 万到 2 万人的劳工中，死亡了 6 000 多名。1944 年 9 月，伪满洲国交通部直辖的穆兴水路改修工程，使用劳工约 7 000人，死亡 1 700 多人。

总之，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产业开发"，完全是以中国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作基础的。

有人算了一笔帐，在北票煤矿，在日寇统治的 12 年零 5 个月中，共夺走精煤 8 639 636 吨，这一时期进矿矿工 56 530 人，被摧残致死的 31 200 余人，占进矿总人数的 55. 2%，平均每生产 277 吨煤，就要牺牲一位矿工的生命。北票是这样，其他煤矿也大同小异。

我们今天来算这笔旧帐，当然不是要向谁讨还血债，但是，我们要深刻理解落后就要挨打以及帝国主义是凶恶的这个道理。要知道今天中国的局面来之不易，要不断地揭穿日本右翼反动分子的谎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回潮，要建设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系吉林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理事）

野川隆的生活之路与“北满型农事合作社事件”

●吕元明

在日本对所谓的“满洲国”殖民主义统治日益深化的中后期，也是文化领域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统治斗争最深刻的阶段。其程度远比伪满初期阶段深刻。当时有一百几十万日本人生活在中国东北。作为这一时期敢于与殖民统治战斗的日本人，是以佐藤大四郎、野川隆等为首的北满型农事合作社运动的成员。其中野川隆是作家。本文将研讨他在文化领域的抵抗军国主义与殖民地统治的创作及其精神。

野川隆生于1901年，日本千叶县人。父在岐阜县经营大垣病院，因被火灾所毁，破落而亡。野川隆在大垣市读了小学和中学，1921年入东京大东文化学院，其后又考入东洋大学。但在东洋大学攻读一年不到，便中途退学。野川在中学读书时，开始醉心文学，大学退学后也曾想成为演员，过戏剧生活。1922年始发表诗作和随笔。最初倾心现代主义艺术，但在日本左翼文艺浪潮影响下，很快转向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先后参加《文党》、《少年战旗》、《战旗》、《太鼓》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多量创作。1931年，在担当《少年战旗》编辑时，参加日本共产党。第二年被捕入狱。两年后转向出狱，但坚持前进的立场不移，曾以讽刺诗的手法嘲弄过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麻吕的内阁。

由于在国内再次遭到逮捕、拘留，野川隆来到日本当时占

领、组建傀儡国家的伪“满洲国”的中国东北。最初想为日本移民干点事，但到中国东北后，感到农村有百分之八十是中国劳苦农民群众，便去滨江省（今属黑龙江省）呼兰县“农事合作社”任职，后来被选为理事。

日本殖民地主义者视中国东北为“大东亚战争的粮食基地”，对中国农村的殖民统治与掠夺是十分残酷的。先后设置了“农事合作社”、“金融合作社”、“金融会”，以后又统辖为“兴农合作社”。日本的这种机构，直接掠夺农民生产成果，称为“出荷”。在当时的东北农村，无口粮、无一条被褥、无蔽体衣穿的农民比比皆是。

野川隆之所以进入“农事合作社”，是因为他有些左翼出身的朋友也在“农事合作社”。佐藤大四郎就是其中一人。他于1934年到中国东北，1937年出任滨江省绥化县“农事合作社”和以后任滨江省“农事合作社”辅导委负会事务局主事。佐藤大四郎、野川隆等一批左翼出身的人，都在干这种“农事合作社”的工作。他们的思想、方法常常和他们的上司、主管部门不一致，后来他们看到中国农村殖民地式的、封建式的结构，感到“北满”适合大规模农业经营，主张不只向有经济能力的地主、富农贷款，也向困穷的贫农、雇农贷款，低价供应生活与生产用品。翻看他们出版的《农事合作社》（1940年一度改为《北满合作》）杂志，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东北农村的分析、组织“农事合作社”的方法，和官方的口径，常常出入很大。特别是《北满合作》这一命名的杂志，出到第五期，便不得不停刊。该刊登载的野川隆的文章，往往半途而终，甚至是目录上有名，正文却被抽掉。佐藤大四郎、野川隆等人的活动，必然为当权者所不满，也引起关东军的注意。1941年，他们和岩间义人、井上林、进藤甚四郎、小松七郎等先后以“北满农事合作社”之罪名被捕，佐藤大四郎、佐睛生、西雅雄、守随一等先后死于狱中。田中武男从狱中假释几天后死去，野川隆假释

出狱，实际重病难治，几个月后死于奉天医大病院。其实这和死于狱中没什么差别。

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的镇压是极其凶恶的，而他们对日本正直人士、勇于抵制殖民政策并为中国人民说话的人的镇压，也毫不含糊。所谓“北满型农事合作社事件”涉及之广，镇压的严酷，在当时的日本人中引起极大的恐惶和不满。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全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长春地区抗日反“满”斗争概况

●李鸿文

·长春地区抗日义勇军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东北若干城镇。当此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长春一带同东北各地一样，各类抗日义勇军兴起，抗日烽火漫延各地。其中，东北军第25旅张作舟部在9月25日即行在榆树宣布抗日，并于1932年1月18日同前来进攻的伪军发生激战。同年6月25日，由前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组建的吉林抗日救国军部队，再行收复榆树县城。10月中旬，这支部队兵临米沙子、布海、饮马河一带，威胁长春，日伪统治者慌忙布防。此时，伊通一带发生了几起伪军反正事件，其中由原伪军第5旅营长宋国荣率领反正的部队，即于7月12、13日相继收复双阳和营城子，并欲进攻长春。中共党员肖丹峰便曾带领几名学生参加了这支部队的抗日斗争。此外，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也进攻过农安。直到1935年夏，报号“三江好”的抗日山林队罗明星部还在九台县境土们岭附近颠覆由长春开往朝鲜清津的国际列车一列。另一部抗日武装袭击了长春市孟家屯伪警察所。使得日伪统治中心长春长时期不得安宁。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敢于违反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自动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且曾发展至30万人的规模，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自1933年9月由磐石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以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至1934年已经活跃在辉发河南北十几个县。该军第一团一直在磐石、伊通、双阳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年5月17日，这支部队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进攻伊通县二道沟，歼灭伪军警一部。这里距长春近在咫尺，不久，敌人由长春调派其精锐部队伪军"模范骑兵连"，进攻人民革命军，却被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1936年，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军长杨靖宇的主持下，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将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此外，东北抗联第10军的前身——汪亚臣率领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1935年前后也攻打过榆树县大新立屯和土桥子等地给日伪军以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先后编成11个军，数量达3万人，成为国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支抗日武装力量之一（另两支是集结在陕甘宁地区的抗日红军和在长江以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

1940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孤立无援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经过长期战斗后遭受严重挫折。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于同年2月23日，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境内壮烈殉国。这位一直使敌人闻之丧胆的民族英雄的头颅被敌人割下送往长春。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地下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寻觅、保护之后，于建国后被安葬在通化靖宇烈士陵园。

·长春地下的抗日斗争· 日本侵占长春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长春特支立即行动起来，党员分别深入工厂、铁路、学校，宣传抗日主张，组织罢工、罢课等抗日斗争。

在日伪统治时期，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不甘心当亡国奴，渴望祖国的解放，他们采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同日伪统治者进行不懈的斗争。其中，伪陆军军官学校中，以吕殿元（吕天）、崔黎夫等为首的爱国青年，甘冒被杀头、坐牢的危险，

于1940年组建“恢复会”反日组织。他们的誓词是：“生死与共，反抗日寇，准备起义”。平时秘密传阅进步书刊，探索救国真理。当时，伪建国大学中也有爱国组织在秘密活动，其中有聂长林等组成的“读书会”，也有国民党人的“建大干部会”。作家李季风于1939年以后，任伪《大同报》副刊编辑期间，除注意创作进步文学作品外，还组建“青年读书会”，启发青年们的民族意识。

上述爱国活动很快引起日伪警宪机关的注意，并在1941年12月相继对“恢复会”、“青年读书会”和“建大干部会”成员进行大搜捕，前后共逮捕180余人，其中不少人被判处死刑，或在监狱中被折磨而死。

此后，敌人对长春文化界中一些爱国人士利用创作文学作品和演出戏剧等形式进行的抗日活动，更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其中，在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逮捕了涉嫌宣传抗日反“满”的伪协和会大同剧团团长赵刚等人。同年冬，因长春出现反日传单、漫画，敌人又抓捕了100余名学生。1943年，《青年文化》杂志主编王穆天等人被敌人以宣传抗日思想逮捕。1944年，初光剧团团长初光等人因排演抗日反“满”剧目被捕。接着又将涉嫌摄制进步影片的“满映”编导王则逮捕。不久又将因演出话剧《沙沉》中有抗日反“满”内容的“满映”话剧团编导张辛实夫妇等逮捕。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至1944年间被捕的爱国作家、记者、编辑、编导、画家等共100余人。其中不少人被杀害、长期关押，或从事苦役。

但是，敌人的子弹、监狱是吓不倒敢于反抗侵略者的爱国青年的，他们迎着敌人的白色恐怖继续战斗下去。1940年春，由一些留学日本的爱国青年组建的“东北青年救亡会”的成员返回长春，会合前已回国的成员组成救亡会长春分站，共有田深、侯洛、关克、夏航、高亮等20余人。不久，这个抗日组织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分局的领导，并更名为“东北青年救

亡总会”。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重要情报。为此，该组织成员便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先后打入伪“国际通讯社”、伪军事部、伪国务院军需局、伪军铁石部队中任职，甚至同在日本留学时已加入东北青年救亡会的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伟接通联系。他们将搜集的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及时交给党的组织。例如，1943年1月，一位打入伪军事部次长秘书室的救亡总会成员，获得伪军铁石部队拟去冀东进攻八路军的计划后，便迅速经组织转送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这支伪军在赴目的地途中就遭受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这个组织中的爱国青年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其中一些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与此同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按中央指示建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陆续向长春及其周围地区派遣了傅根深、申东黎、王永生、徐镇等地下工作人员，以社会职业为掩护潜伏下来。他们宣传群众、团结群众，准备将来配合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收复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八路军、新四军迅速解放东北。上述地下工作人员、抗日团体立即行动起来，为配合中国军队和苏军解放东北做出了贡献。

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14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和长春地区人民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进行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抗日反“满”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些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日伪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了处于苦难中的东北人民以莫大的鼓舞，给他们带来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这些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

略论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朱建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入东北。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因而不到半年内，亦即1932年春，东北三省的大中城镇及战略要地大部沦入敌手。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与其军事侵略的同时，即着手在东北建立殖民统治。经过一番策划，便于1932年3月建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对东北三省人民进行血腥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坚决收复失地，坚决抗日的正确主张。9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分别发表宣言，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其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恶行径。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号召在东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动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浪潮，东北人民毅然拿起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生死的搏斗，开展了广泛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由反日

游击队到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正式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

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日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她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经常以少数兵力击败敌军数十倍的兵力，浴血奋战，对全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先遣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的六年中，东北抗日联军始终站在全国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消灭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仅从日军陆军省1936年3月18日公布的日本关东军伤亡数字来看，从1931年“九一八”至1935年末，日本关东军战殁者4 200人，伤病者17.13万人。加上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统计的1936年至1937年9月的日军死伤2 662人的数字，6年来，日本关东军死伤病者共计17.83万人。这就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挫伤了日军不可一世的疯狂气焰，从而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二，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战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此后，东北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关内大举进攻，东北作为它的重要后方基地，关内就变成了全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配合关内对日作战，牵制日本侵略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斗志顽强，士气旺盛，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抗联一路军所辖的一、二军，向南满各地敌人主动出击，猛烈地开展了游击战争。他们到处袭击敌人据点，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击毙敌军，缴获大

量军需品，消耗了日军的巨大人力、财力和物力。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部及主力部队活动在抚松、桦甸一带，有时还跨过鸭绿江一带进入日本统治的朝鲜境内活动，不时进出吉敦线，经常袭击敌人，扩大自己的队伍。

抗联第二路军各军在西起哈长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地区，联合作战，主动进攻敌人。抗联四、五、六军于1937年8月间进行攻击凉水泉子警察署的战斗。五、八军联合部队进行三道岗子截击战，毙伤大量日军和战马，缴获了大量枪支和弹药，吓得敌人不敢出扰达半个月之久。四、五军联合部队于1937年12月，将佳木斯南聚宝山伪警察署和警备队包围，将其全部缴械。12月，抗联七、五军联合部队联合作战，突袭七星河，一举消灭伪军一个连，缴获许多枪支和军用物资。

抗联第三路军纵横驰骋，到处打击日本侵略者。“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六军三师支持下，汤泉河格节军民举行了抗日反“满”大暴动。

总之，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高潮．它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统治的根基，消耗侵略者的实力。日本侵略者一直视东北抗日联军为敌，是致敌于死地的“癌”症，惊呼“‘共产匪’团，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计划巧妙，富有组织性，对于组织民众极有功效”。

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的广泛而激烈的游击战争，不仅杀伤了大量的日伪军，而且把数十万精锐的日本关东军死死地拖住在东北境内，是对全国抗战最有力和大量的支援。据统计，日本帝国主义用于关内的侵略总人数：1937年为50万，1940年为80万，1941年为61万，1941年为55万，1943年为60万，1944年为73万，1945年为100余万。用于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人数：1931年——1933年为50万，1934年——1937年为40万，1937

年——1938年为50万，1939年——1941年为70万，1942年——1944年增至100万人。两者相差无几。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大量的关东军留驻东北，其原因之一是准备阴谋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于“讨伐”和防范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经常破坏日伪的工矿生产，阻碍其交通运输，截击其运输车辆，使其被迫停产、停运，也是对关内抗战的一种有力配合。

第三，东北抗日联军在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接着苏联红军从西、东、北三个战区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东北抗日联军各部按照统一计划，分别进行配合行动。组织先遣部队，参加苏空降或担任苏军向导工作；调动队伍，配合红军对日作战。

苏联对日宣战后，隐藏在各地的做地下工作的抗联人员也纷纷起来，号召群众组织武装部队，向日本补给线出击，收缴溃散的日军武装。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抗联部队积极配合苏军抢占东北战略要地，共有12个中心，在每个大的战略要地下面又各有若干个小战略点。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积极协助苏联红军肃清敌伪残余，维持社会秩序。这些，在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所坚持的14年的游击战争，集中地反映了东北人民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坚强意志。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在与关内军民和中共中央完全隔绝的条件下，始终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前仆后继，英勇不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地位曾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义勇军及

全体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苦难奋斗的模范”。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并说“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将会永远铭记东北抗日联军为东北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所建树的光辉业绩，并会从他们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东北抗日联军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发向前！

（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黑土深仇

曹保明

(一)

今天，在全国人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要告诉人们关于发生在长春的有关三颗头颅的悲壮的故事。

“9·18”事变之后，东北整个的沦陷了，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东北的大好河山，全中国人民投入了全国性的抗战斗争中去，而东北首当其冲是斗争的前沿。1939年，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为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达到长久占领东北的目的，日寇从1931年开始先后出兵200万，残酷地屠杀中国的抗日力量，1939年之后，东北抗日联军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劣，战士们衣单腹空，冒着严寒和死亡，与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1940年春天，敌人纠集40万兵力，直扑通化“讨伐”使他们胆战心惊的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部。这时，经过几年的苦战，杨靖宇率领的一路军只剩下200来人，他们冒着长白山里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与敌人周旋。

酷寒的1940年2月，长白山区濛江大甸子一带，满山遍野蠕动着“讨伐”抗联的日伪军警，空中还有带着膏药旗的飞机，其实他们追击的，已经只剩下包括杨靖宇将军在内的几名战士了。

2月23日，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和成百上

千的敌人进行了面对面射击，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英勇牺牲了，年仅35岁。当晚，日寇把将军遗体运到县城，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又在县民众医院剖腹化验，胃肠中到处是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竟然连一粒粮食也找不到。

数年来被伪治安部大臣悬赏一万元要得其头颅的大人物，腹内竟没有一粒粮食，站在将军遗体旁的伪通化警务厅长，警察本部队长等日本军政要人一个个惊愕不已：中国竟有这样威武不屈的人！

1940年2月24日下午，日伪军在警察本部门前空场上召开"庆功会"，同时拍摄了遗首照，送通化印洗了几麻袋、用飞机向抗联活动的山林投撒。日酋为宣扬"战功"用汽车载着将军的头颅，在伪通化省所属主要县城各"示众"3天，最后送往伪新京（长春）请赏，并在今省委大院，从前的关东军司令部里展示将军头颅、以显示其"战功"。

在这里被残忍的日本军人展示的还有陈翰章将军的头颅。陈将军是敦化县人，1913年出生，"九·一八"事变后随王德林、吴义成抗日救国军转战于吉东、牡丹江一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建立抗联游击队，历任抗联五军二师师长，第三方面军指挥等职。1940年12月8日在与敌人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殉国后，敌人残暴地用铡刀铡下了他的头颅，送到伪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请赏。

也是在这里，凶残的敌人还把东北抗日联军第十路军负责人汪亚臣将军的遗首摆放过。汪亚臣将军是黑龙江省五常县人，早年组织东北义勇军进行抗日、并给自己起名"双龙"。他牺牲后，敌人凶狠地割下他的头颅，也送到伪新京请功领赏。

后来，汪亚臣将军的头颅渐渐腐烂，于是日本人便把头颅装在一个木头笼子里，在一个深夜，偷偷地在二马路大庙的南墙根下埋掉了。

杨靖宇和陈翰章将军的头颅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最后和

遗体合葬。

就在杨将军殉难的第7天头上，伪蒙江县警务科长王士洪和伪警察大队长桑文海突然接到省城打来的电话，岸谷隆一郎命令把抛弃在荒野雪地上的杨靖宇将军的遗体快快起出来，找人刻个假头给将军安上，然后隆重举行“慰灵祭”。因为，据说杨将军被害的这7天里，满洲南地区讨伐司令官野副昌德将军夜夜做恶梦，睡不安宁，总是梦见杨靖宇伸出大手跟他要头，他醒来总是头疼。于是，他立刻置办棺椁，搭起灵棚，叫来上等木工，一夜之间刻了个假头颅，请来当地知名书法家李咸阳老先生写了墓碑。3月5日，岸谷隆一郎出场，在“慰灵祭”上亲自为杨靖宇将军主祭下葬……

这一切，都在向世人述说着一个辉煌的传奇。关东军，这些同样是父母生养的男儿，在战争中变成了一只只凶狂残暴的野兽，从事着砍头挖心的勾当，而且，还装出一副懂得中国民俗历史的样子，他们从心灵上惧怕杨靖宇将军那崇高而伟大的灵魂。这段难忘的历史，不正是如此吗？

江河改道，天翻地覆，人们也忘不了脚下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是黑土地上的永久的深仇。

长春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仿佛都是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纪念二战胜利的日子里，不能不张开口，发出那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声音——长春，应该是一座历史不能忘记的城市。

长春解放前夕，我地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医学院地下室寻找到杨、陈二位将军的遗首，并迎救出来，保送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1957年初秋，靖宇陵园告竣，各界代表于8月20日将靖宇将军的遗骨连同木刻假头一起恭送到通化市靖宇陵园。1958年2月23日，在伟大的将军殉国18周年的日子里，通化各界民众把将军的头颅与遗体对接起来，并覆盖国旗隆重安葬。

1955年清明节，黑龙江暨哈尔滨市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界人民，隆重举行公祭陈翰章烈士大会，并把他伟大的被敌人残酷迫害的不屈头颅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里，以志永远的纪念。

历史经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很多事情也许已经被人淡忘了，可是，发生在关东黑土地上的这些故事，人们能忘却吗……

（二）

二战期间，日本在我国北方秘密建立了许多细菌和毒气试验基地，大家知道的象在哈尔滨郊区的“731”部队，在长春的“100”号部队，都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而许多挂着医院牌子的真正的医院，也都从事过这种试验。今天座落在西安桥外大街的生物制品所，从前是日本的千早医院。许多时候，人们一提起战争，往往只是记述枪炮的轰鸣和血肉的横飞，可是在长春沦陷期间，日本使用包括枪炮之外的另一种残酷形式，屠杀了无数的我国同胞，这场战争中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是由日本人犯下的。

日军以屠杀中国民众取乐，为鼓舞士气而奸淫年轻妇女，强行在亚洲地区征集“慰安妇”20万人，还进行恐怖性的生物细菌试验，而称之为生物制品所的“千早医院”就是日军在其配套细菌生产基地731部队、100号部队中的一项环节基地。

长春沦陷之后，日军在“新京”（长春）进行过多次“百斯笃”试验，当年在伪皇宫前大街和七马路一带，日军多次投放有鼠疫菌的霍乱和伤寒菌，这就是所谓“新京”特别市进行的所谓“百斯笃”试验，然后再将这些民房点火焚烧。1938年7月的一次实验，就有400多名市民患病被收容到“千早医院”做观察试验，90%以上的人均死亡。

就是在这些地方，日军把中国青年和有反抗思想的群众随意抓来，进行活体细菌试验。原长春《文化青年》刊物的编辑赵仁昌就是被他们抓进了千早医院，进行了细菌试验，而后不明不白的死掉了，他的坟至今埋在松花江边上，日夜在向世人

控诉着自己的不幸和日本鬼子的残忍。

下边，我们来看看一名日本军医拿中国人做试验的亲口交代吧。

中岛京子是日军陆军医院西村部队的一名护士，1954年9月3日她在战犯管理所期间亲笔写了一段供词。没有必要作任何的加工，还是全文录在下面，让今天一切想了解二战和日军在中国的情况的人自己去看看吧。

她是这样说的：我于1939年7月作为陆军医院西村部队的特殊志愿护士参加了潞安作战。

盛夏7月的一天，医院里送来了4名抗日军士兵俘虏，其中的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是一个容貌端正的善良青年，被日本军使用的糜烂性毒气弄得全身溃烂，左脚尤为严重，根本不能行走。

当时我想："为什么把这样子脏的中国人带到这里来？"可是，医院里的卫生护士长远藤军曹却对我说："这家伙由你负责！"我十分生气，心想："没有他，我还忙得不可开交，再塞给我这么一个脏东西，受得了么？快点死掉算了！"因此我在处理创面时，也只是涂点红药水，应付了事。

有一次我想："如果在他溃烂的身上的伤口里涂上碘酒，他将会痛成什么样子？"于是便在他溃烂不堪的腿上厚厚地涂上了一层碘酒，这个青年痛得打着滚呻吟，苦不堪言。3天间，我没有很好地让他吃饭，大小便也不给他处理，再加上伤痛，他陷于极度的衰弱状态，溃烂的腿上和粪便上落满了苍蝇，蛆虫到处乱爬。我想："我得想个办法快点把他处理掉才好！"傍晚，远藤护士长对我说："给那个中国人作手术，你做好准备！"我作好了手术室的准备工作。远藤护士长，加藤一等卫生兵，还有护士吉田幼子、川口睦子，我和另一个人，6个人作为助手，穿好手术衣，等待手术的开始。小岛军医进入手术室后便命令："今天由我指导，由远藤作手术。"我们便将这一青年绑到手术

台上。远藤只是简单地作了局部麻醉，使用手术刀割开皮肤，切开肌肉，进行止血。

最初我曾帮助止血。我想："我倒是用肉和鱼作过菜，可用刀去切人肉不知是什么样？反正一两个中国人死活是没有关系的。军医也承认我是有胆量的护士，是个人才。我也干出点成绩来！"于是便向军医请求道："请允许我来做截肢手术吧！"

军医说："你能干吗？"

他没有接受我的要求。

我再次要求说："没有问题，请让我来作吧！"结果，军医批准了。

这时，远藤说："反正是个中国人，这就算不错了！"说着，他马马虎虎地停止了止血。我拿过手术锯，从右膝关节的下面开始象锯木头一样咔哧咔哧地截肢。因为我是第一次作手术，进行得很不顺利。军医和护士长都在注视着我，我心里发慌，汗流夹背，手术衣都湿透了……

由于作的是局部麻醉，不十分有效，青年人痛得大声喊叫，一名士兵和一名护士，两个人按着他被绑着的腿，他仍然扭动着身躯，腿迟迟锯不下来。我嫌他讨厌，便在他嘴里塞满了纱布，让他喊不出声来。青年人由于痛苦和愤恨，咬着牙，用可怕的眼睛瞪着我。由于没有充分地止血，所以每当他呼吸或扭动身体的时候，鲜血便从刀口咕嘟嘟地喷射出来。

不知什么时候，军医早已走开了。截断这一根骨头竟用去40分钟。从手术开始到全部结束，整整用了两个小时。然后，便把青年抬回病房。由于流血过多，他已精疲力竭，脉搏微弱，陷入危重状态。立即通知远藤，向军医进行汇报。军医说："先注射8毫升B，过五、六分钟后，如没有变化，再注身5毫升A，然后注意观察情况。"说着拿来了两个瓶装的液体。

我给他注射了B，不到3分钟，只见他痛苦得满床乱滚，从鼻孔中流出通红的鲜血，开始挣扎，但已发不出呻吟声了。一

会儿，他用像蚊子般微弱的声音说："妈妈！"可能是呼唤他的母亲。

接着，他向我要水喝，我却没有给他。当注射后12分钟左右，这个年轻人便断气了。根据注射后急剧发生变化和A、B这两种使用代号的药名，我意识到这就是当时由潞安陆军医院研制的细菌液。后来，这个青年还被军医们作为研究材料解剖了。象这样宰割活人，把人代替豚鼠，用作细菌试验等，这就是天皇制军队的真实情况，也是戴着"白衣天使"假面具的我的本来面目。

（作者系吉林省民俗学会秘书长、编审）

面对历史的沉思

●王维礼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半个世纪，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中国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14年的悲惨历史，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经历过黑暗痛苦的亡国奴生活的人，不会忘记这历史的创伤、沉重的代价。然而在幸福生活中的一些青少年，似乎已经淡忘了这段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14年的统治是一部侵略、掠夺、压榨的历史，它们对东北人民残酷的镇压，血腥的屠杀，手段的残忍，罪孽的深重，罄竹难书。特别是作为敌伪政治中心的"首都"——"新京"，更是军、警、宪、特横行，组成凶残暴戾的法西斯统治魔网，无所不及，无孔不入，伸延到各个角落，长春人民生活在一座血雨腥风、森严恐怖的集中营里。

这就是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日本社会，其中包括知名政要、学者等各界相当一部分人；一再公开否认日本侵略的事实，宣扬"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日本侵略翻案。诸如，所谓以"精密的实证"，"阐明事实真相为己任"的《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的主编角田顺，在论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时竟说：是中国的"排日运动"动摇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因而"经过数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以武力解决当地问题的良策。"更有甚者，那些在中国东北统治了14年的原日本殖

民地官员们所撰写的《满洲国史》中，更竭力宣扬“创建”伪满傀儡政权的“善良动机”，恬不知耻地自夸其“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现代国家”的“功绩”，竭力吹嘘在经济“开发”方面“高速度发展”的“贡献”和“奇迹”，甚至说它构成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楷模”等等。这些榨干东北人民血汗、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殖民地官员们，如此自我吹嘘，充分暴露出这些贼心不死的殖民地官员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难道他们是否还想让被侵略、被奴役的中国东北人民为他们立“功德碑”?!

东北人民不会忘记，哪一座矿山的开采，不是中国人的血汗？哪座矿山的周围没有埋葬被压榨而死的冤魂？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煤矿工人们，深深知道每一块煤炭都搅拌着他们的汗水和鲜血！

食不果腹的广大农民，自己吃橡子面，却把用汗水培育出的粮食，无偿地供给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皇军”！

丰满电站的大坝，是用中国人的白骨堆起来的，如果在天有灵，这些死难的工人们绝不会“赞扬”殖民统治的“建设成就”！

在长春，当年耸立起来的座座建筑依然存在，这些用中国人的血汗建起的、专门用来统治东北人民的各种机构，尽管已经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尘，那血淋淋的历史是抹不掉的！这绝不是什么“贡献”，这是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证！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侵略者也不能逃脱这历史法则，它们终于被推上历史审判台，任何妄图倒转历史的人都不会得逞。如今，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一切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包括日本大多数国民，都在诅咒这14年阴暗的日子，希望能够从这里吸取历史教训，共创未来。中国人民从来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股逆流。对待这段历

史，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但绝不允许任意篡改、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歪曲战争真象；掩盖、抹杀侵华战争种种暴行。对历史对人民采取不忠实态度，怎能真正建立和维护中日友好关系？一个日本史学家说："日本不最后清算自己的战争罪行，它不可能与亚洲邻国真正友好相处，也无法在这种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中摆脱对历史的扭曲。"

历史过去了，再也不能重现。但是，过去的历史绝不会无声无息地消逝，它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未来的创造而又不会忘记过去的人来说，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